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七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说　　明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的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们对本室一九七九年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11册）作了增补，将近年来党史研究中发掘和收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史料，续编七册（序号12—18）：党的创立时期一册（12）；一战时期一册（13）；二战时期二册（14、15）；抗战时期二册（16、17）；三战时期一册（18）。同时，编印社会主义时期资料十四册（19—32）。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为保持文件原貌，所有资料均未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曲延绩、张天荣、肖甡、胡庆云、林蕴晖、何理、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选编，刘星星参加了资料的汇编、整理工作。

第17册由何理、王瑞清选编，林蕴晖、李浚统编。

资料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魏政、李浚具体经办。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中共中央关于克服投降危险克服抗战困难的声明（1941年2月）……………………（1）
中共中央关于日军进攻河南与我党对时局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2日）……………（2）
关于目前我之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2日）……………毛泽东　朱　德　王稼祥（3）
中共中央关于八路军停止给蒋介石一切呈报的决定（1941年2月2日）……………（3）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通报第二号（1941年2月3日）……………………………（4）
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2月7日）……………（4）
中央书记处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殉国烈士大会内容
　的通知（1941年2月8日）………………………………………………（5）
毛泽东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1941年2月14日）…………（6）
中共中央同意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讨论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14日）…………（7）
关于执行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政策的指示
　（1941年2月17日）……………………………毛泽东　朱　德　王稼祥　叶剑英（7）
毛泽东询问周恩来、董必武是否已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等
　问题（1941年2月20日）…………………………………………………（8）
周恩来关于提出十二条和张冲交涉情况给中共中央的
　报告（1941年2月20日）…………………………………………………（9）
中共中央关于谈判解决时局之十二条件应告张冲各点给周恩来的
　指示（1941年2月23日）…………………………………………………（10）
中共中央代拟叶剑英致张冲信（1941年2月23日）………………………………（11）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
　报告（1941年2月25日）…………………………………………………（12）
周恩来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41年2月26日）………（13）
中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26日）………………（13）
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各小党派提议组织各党派委员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
　报告（1941年2月27日）…………………………………………………（14）
中共中央关于对各党派委员会的态度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28日）………（15）
中共中央关于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问题给周恩来的
　指示（1941年2月28日）…………………………………………………（16）
中央军委对皖南事变后的四点战略指示（1941年2月28日）…………………………（17）
总政治部关于我军对皖南事变的态度的指示（1941年2月30日）……………………（17）
中央军委对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战略地区的指示（1941年3月1日）………（18）
周恩来关于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日）…………………（19）

周恩来关于各小党派被蒋介石拉拢后的表现给中共中央的
报告（1941年3月1日）……………………………………………………………………（20）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日）……………………（21）
中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
指示（1941年3月1日）……………………………………………………………………（22）
周恩来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1941年3月2日）………………………………………（22）
毛泽东关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23）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各根据地对国民参政会应取置之不理态度的
通知（1941年3月12日）…………………………………………………………………（23）
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5日）………………（24）
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3月15日）………………（25）
周恩来关于拟用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向毛泽东的建议（1941年3月15日）………（25）
毛泽东关于同意由周恩来处写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致周恩来
（1941年3月15日）………………………………………………………………………（26）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命令（1940年12月25日）………………………………（26）
中央关于建军问题的决定（1941年）………………………………………………………（27）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1941年4月23日）……………（32）
胡服在皖南事变问题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5月）………………………………（34）
陈毅在皖南事变问题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5月17日）…………………………（48）
胡服在干部会议上的总结（1941年5月）…………………………………………………（54）
党内对时局错误意见之来源（1941年6月12日）……………………………刘少奇（70）
刘少奇在军分会会议上的发言（1941年6月）……………………………………………（71）
军委总政对新四军四师军政工作的指示（1941年7月3日）……………………………（82）
一致努力长期坚持江南抗战（1941年7月5日）……………………………刘少奇（84）
论建军工作（1941年7月10日）……………………………………………………陈　毅（89）
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1941年2月）……………………………………（107）

对苏中今后工作方针问题的指示(1941年3月17日)……陈　毅 刘少奇 饶漱石 赖传珠（109）
中央军委对反共军与友军政策及工作的指示（1941年4月）……………………………（110）
中央关于准备应付反共高潮（1941年4月17日）…………………………………………（112）
彭德怀对冀热边支持长期战争的指示（1941年5月8日）………………………………（112）
中央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1941年5月9日）………………………………………（113）
中央军委关于粉碎敌之蚕食政策及发展地方武装的指示（1941年5月9日）…………（113）
中央军委关于青纱帐起整休部队的指示（1941年5月12日）……………………………（114）
中央关于老苏区老游击区的指示（1941年6月7日）……………………………………（115）
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1941年6月12日）……………………………………………（116）
冀南形势与坚持平原根据地的方针（1941年6月12日）………………………彭德怀（116）
毛泽东关于对蒋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117）

对蒋、何斗争与联合的方针（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118)
中央军委指示一一五师建军小册子结论有错误（1941年7月）………………………(118)
中央书记处对大青山工作的意见（1941年8月9日）……………………………………(119)
中央对晋西南工作方针指示（1941年8月24日）………………………………………(120)
新军党委关于新军党政组织及工作变更的决定（1941年9月20日）………………(121)
配合湘洛作战的方针（1941年10月9日）…………………………………………………(122)
周恩来对南委工作的意见（1941年10月27日）……………………………………………(123)

华中局对反清乡斗争指示（1941年8月24日）……………………………………………(124)
论扫荡与反扫荡（1941年9月）…………………………………………………………陈　毅(126)
华中局对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指示（1941年10月7日）……………………………………(133)
五年来敌扫荡华北的情况（1941年12月）…………………………………………………(135)
战争指导问题（1941年）……………………………………………………………………左　权(137)

对国际形势的估计（1941年12月12日）…………………………………………………毛泽东(142)
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1年12月17日）………(143)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应取的政策
　指示（1941年12月20日）…………………………………………………………………(145)
我党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1942年1月8日）…………………………………毛泽东(145)
　〔附〕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施行要点（1941年9月6日）…………………(146)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
　　　根本方针（1942年12月21日）…………………………………………………………(147)
　　日汪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1943年1月9日）……………………(148)
　　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1944年9月5日）…………(149)
　　打通粤汉铁路南部作战计划概要（1944年11月）……………………………………(150)
　　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1942年6月2日）……………………………………………(151)
　　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
　　　换文（节录）（1943年1月11日）………………………………………………………(153)
　　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
　　　换文（节录）（1943年1月11日）………………………………………………………(155)

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1942年3月）…刘少奇(159)
对山东工作意见的报告（1942年4月28日）……………………………………………胡　服(171)

北方局军分会关于对付敌人大规模清乡的指示（1942年2月25日）…………………(175)
北方局军分会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1942年5月4日）……………………(178)
中央北方局、集总野政治部关于展开全华北全面对敌政治攻势的
　指令（1942年7月7日）……………………………………………………………………(181)
论军事建设（1942年7月15日）……………………………………………………………陈　毅(183)

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1942年7月）……………………………………陈　毅（197）
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1942年8月）……………………………………罗荣桓（201）
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1942年8月）……………………………刘伯承（204）
关于太行区反蚕食斗争的总结报告（1942年9月28日）………………一二九师政治部（219）
一九四二年华北形势大纲（1942年11月3日）…………………………………………（227）
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1942年11月）……………………罗荣桓（235）
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1942年11月）…………………………………………程子华（237）

同意陈饶之分散计划（1943年1月5日）……………………………………毛泽东（250）
北方局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250）
晋察冀边区六年来的工作简报（1943年）…………………………………………（252）
林平关于东江及南番、中顺两游击区及地方组织工作给南方局的
　报告（1943年3月）……………………………………………………………………（268）
对苏中反清乡的指示（1943年3月16日）…………陈　毅　饶漱石　张云逸　赖传珠（270）
新四军首长对苏中军区反清乡准备工作的指示（1943年3月16日）……………（272）
对华中工作指示（1943年6月18日）……………………………………………刘少奇（274）
我们怎样坚持了华北六年的抗战（1943年7月3日）…………………………彭德怀（275）
新四军在华中（1943年7月5日）…………………………………………………陈　毅（279）
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1943年7月7日）………………………………………刘伯承（285）
华中局对整理自卫军和提高民兵工作的指示（1943年9月30日）………………（290）
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1943年12月15日）……………………………………陈　毅（293）
东江纵队成立特电中央军委（1943年12月2日）…………………………………（298）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1943年12月2日）……………………（298）

关于国共关系的估计（1942年7月31日）…………………………………毛泽东（302）
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303）
对顽军以斗争求团结（1942年10月25日）………………………………中央书记处（303）
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304）
周恩来林彪向张治中所提国共问题之四条件（1943年1月）……………………（306）
国民党在十中全会上对我党的对策（1943年1月6日）…………………………（307）
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对四条件进一步谈判（1943年1月7日）……………………（308）
国民党对我之办法有三（1943年2月5日）………………………………………周恩来（309）
国民党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案（1943年6月）………………………………………（310）
国民党的五大困难和我党今后方策（1943年6月1日）…………………毛泽东（313）
蒋胡内战阴谋破产应克服困难保持国共一年和平（1943年7月13日）…………毛泽东（314）
对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1943年7月15日）……………………………中央书记处（314）
中央目前宣传方针——揭露蒋之本质（1943年7月21日）……………………毛泽东（315）
南方局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提纲（1943年12月12日）……………………（316）

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1944年2月4日）……………………………………毛泽东(319)
关于反顽清剿指示（1944年3月14日）……………………………………………………(320)
对鲁各派顽军工作指示（1944年3月16日）………………………………………………(322)
毛泽东关于时局近况的通报（1944年7月19日）…………………………………………(323)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点协议草案（1944年11月10日）……………………………………(324)

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函电和文件(1941年10月—1943年12月)………(325)
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1941年）……………………………………………任弼时(340)
中央军委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1941年11月29日）……………………………(343)
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344)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347)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942年3月）…………………………………毛泽东(351)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354)
中央军委与总政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1942年6月16日）…………(357)
北方局、野政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2月5日）………………………(360)
华中局关于今年整风学习的指示（1943年4月10日）……………………………………(361)
北方局关于整风的指示（1943年8月8日）………………………………………………(363)
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2月4日）……………………(364)
新四军政治部对整风善后工作的指示（1945年3月）……………………………………(368)
毛泽东致何凯丰、秦邦宪、郭沫若的信（1943年——1944年）…………………………(369)
“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372

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刘少奇(379)
抢救失足者——康生在中央直属大会的报告（1943年7月15日）………………………(380)
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385)
中共中央关于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少捉不杀的指示
（1943年12月27日）……………………………………………………………………(386)
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1月24日）………………………(387)
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389)
中央关于审干反奸问题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11月26日）………………………………(391)

对太行生产运动的指示（1943年1月15日）………………………………………彭德怀(393)
南泥湾驻军展览生产成绩（1943年11月）…………………………………………………(394)
更向前一步（1944年1月25日）……………………………………………………李富春(395)
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1945年4月9日）…………………毛泽东(404)

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通知（1942年4月22日）………………………………………(405)
中央关于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的指示（1942年12月1日）…………………………………(407)
中央对于各军区分区精简的指示（1942年12月1日）……………………………………(408)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精兵简政的一组函电（1942年8月——1943年8月）……(409)
华中执行精兵简政指示的情况报告（1942年5月21日）……陈　毅(412)
彻底实行精兵政策（1942年8月3日）……《解放日报》社论(414)
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8月19日）……毛　铎(416)
精兵简政的模范（1942年8月24日）……《解放日报》社论(422)
华中局军分会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1942年9月26日）……(424)

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1944年8月18日）……林　枫(426)
华中局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1944年8月27日）……饶漱石(431)
〔附〕抗战六年来北岳区农村经济与阶级关系的变化（1943年5月）……(436)

华中部队准备大发展（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　陈　毅(460)
中共军委关于打击阎军东侵，消灭六十一军主力的指示（1944年6月30日）……(460)
中央同意五师巩固原地区并向河南湘鄂赣发展的方针（1944年7月10日）……(461)
中共中央、军委对华南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4年7月15日）……(462)
中央对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1944年7月25日）……(463)
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1944年7月25日）……(464)
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1944年7月25日）……(465)
对华中整训部队的指示（1944年8月22日）……毛泽东　刘少奇　陈　毅(467)
同意八路军南下打击耿冯二顽牵制韩顽向四师之进攻
（1944年8月29日）……毛泽东　朱　德(468)
中央、军委关于民兵工作指示（草稿）（1944年9月26日）……(468)
华中局关于在日寇占领福州后对福建党的工作任务指示（1944年10月）……(472)
中央关于巩固中条阵地建立沁河豫北基地的指示（1944年10月14日）……(473)
军委对开辟河南根据地的指示（1944年10月14日）……(474)
中央对四师的指示（1944年10月18日）……(474)
军委关于对阎方针的指示（1944年10月20日）……(475)
东江纵队给南方局并中央的报告——对东江当局罪行的控诉（1944年10月）……(476)
华中局关于时局与华中党的任务的指示（1944年11月7日）……(479)
中央对东江行动与发展方针的指示（1944年11月14日）……(482)
东江纵队一年半（1943—1944.6）工作报告（1944年11月）……(482)
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及我军发展与扩大解放区指示（1944年12月18日）……毛泽东(486)
对发展江南准备工作的意见（1944年12月26日）……刘少奇　陈　毅(487)
中共中央关于武工队工作的指示（1945年1月25日）……(489)

中央关于开展南方工作指示（1945年1月28日）……(490)
大后方的一般概况（1945年春）……董必武(491)
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1944年8月）……彭德怀(525)
新四军抗战始末（1945年5月1日）……陈　毅(544)
〔附〕何应钦对（国民党）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摘要）……(554)

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政治部关于坚持边沿区对敌斗争对策的指示（1945年2月20日）（557）

中央对潮梅闽西南工作的指示（1945年3月6日）……（560）
山东分局关于伪军工作经验简报（1945年3月15日）……（561）
华中局关于目前形势与苏中斗争任务的指示（1945年3月15日）……（564）
华中局关于深入开展江南新区工作的指示（1945年3月16日）……（566）
华中局、军政治部关于伪军伪组织工作的指示（1945年3月27日）……（567）
南下支队湘鄂赣边斗争的教训总结（1945年）……王恩茂（569）
琼崖情况报告（1945年5月7日）……林　平（574）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5年6月2日）……（576）
中央对广东区党委的指示（1945年6月16日）……（576）
中央关于对美政策（1945年6月17日）……（578）
告时局方针（1945年6月18日）……毛泽东（578）
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1945年6月24日）……毛泽东（579）
军委关于一年内创造五岭基地的指示（1945年7月15日）……（580）
〔附〕东纵六月初旬人员武器统计（1945年6月29日）……（581）
令启龙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581）
中央关于开创湘粤边工作指示（1945年8月4日）……（582）
中央指示五师应付将来局面办法（1945年8月4日）……（583）
中央对广东区党委工作指示（1945年8月6日）……（584）
中央关于美军登陆前加强控制山东的指示（1945年8月6日）……（585）

日寇投降后我对伪顽之军事政策（1945年8月）……（585）
中央关于迅速进攻占领徐州济南等大小城市准备接受敌伪
投降给山东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586）
中央关于坚持到湘粤边创造根据地的指示（1945年8月11日）……（586）
华中局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1945年8月11日）……（587）
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1945年8月12日）……（588）
军委对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的部署（1945年8月12日）……（588）
华中局关于发动群众指示（1945年8月12日）……（589）
华中局对发展江浙步骤方法的指示（1945年8月14日）……（590）
令坚持苏浙皖并告打胜仗之道（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591）
中央关于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指示（1945年8月16日）……（592）
中央、军委对目前方针指示（1945年8月22日）……（592）
日寇投降后华中工作方针（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593）
关于与顽军作战的原则（1945年8月29日）……刘少奇（594）
〔附〕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御前会议记录（1945年8月9日）……（595）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599）

中共中央关于克服投降危险克服抗战困难的声明

（一九四一年二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继续执行本党六中全会在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所作“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组织”的决定，一部分地方党尚未严格执行此决定者，应即加以纠正。本党对待一切抗日友军的政策是团结与巩固他们，而不是分裂与破坏他们。但是我们要求中国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友军，亦以同样对待八路军与新四军，以求泯去猜疑，齐心抗战，而使一切抗日军队同在最高统帅指挥之下，担负杀敌致果的任务。

本党同人认为：要克服即将到来的空前的投降危险与投降的抗战困难，必须取消现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制共”的政策，因为在这个政策的执行中，已经产生了削弱抗战力量引起人心不安的严重结果，须知抗战决不能采取既要对外又要对内的两面战政策，这种政策实无异于自杀，法国法拉第政府之反共复辙，中国应引为深戒。

本党同人认为：要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战困难，必须改变在抗战的许多作法；必须实行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必须释放一切被捕的共产党员与爱国分子；必须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的存在权；必须召集民主的国民大会；必须废止有害的特务作风；必须改变不适时宜的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与兵役政策；必须把抗战的重心放在自力更生上面，而不应依赖任何不可靠的外援。

全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日困难是到来了，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这些危险与困难是完全能够克服的。中国存在着克服任何危险与困难的一切必要条件，只要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善于去利用，中国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决非亚比西尼亚可比与西班牙可比，更非荷兰与比利时可比，亦非法国可比，而日本则远不宜德国，中国还保存数百万大军，有国共两党与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团结，有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有强大的苏联与革命斗争（世界的革命斗争）可以为援，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整整一百年中，经历了无数的危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孙中山先生的英勇奋斗尤是为我们全国模范，当此民族危难严重之秋，我们一定要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遗教，执行它伟大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执行它的临终遗嘱，打破一切悲观动摇与没有出路的情绪，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奋斗下去，则投降危险必然克服，抗战必然胜利建国必然成功，中华民族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战到底！

团结到底！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日军进攻河南与我党对时局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

（一）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反共之际，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以东。信阳一路为敌之主力，连日向北急进，正与汤恩伯主力激战中，已占领沁阳、舞阳、西平、上蔡各县，叶县电讯已不通，卫立煌仓促赴叶县督师，洛阳政府机关向卢氏迁移。同时宿县之敌渡过淮河，占领蒙城涡阳，正与何柱国、李仙洲激战中。开封之敌，亦有由尉氏南下讯。潼关一带之中央军，星夜向前线增援，敌另在荆、当一带作小出击，牵制川军、西北军不能北援。

（二）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以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蒋介石自三国同盟成立，日美矛盾激化，英美苏三国助华之后，即兴高彩烈，轻视日本，集中其精力拼命反共。乃蒋介石一手造成国共裂痕之后（一月十三日对皖南解决新四军、一月十七日下令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后），敌即于一月下旬发动大举进攻，蒋介石反共结果已如此明显。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强调的提出我党中央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只有蒋介石立即悔祸，实行我党中央所提办法，才能使已被蒋介石开始破裂了的国内团结，重新恢复。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挽救国家于危亡。

（三）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最后派遣叶剑英同志回延商洽，今日已从重庆起飞，明日可到，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各地应将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广为传播，使社会各界人人知道，造成有利于解决的社会舆论，是为至要。

附中共中央委员会向蒋介石提出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革命命令，并宣布下令者自己是完全错了；

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

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

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剑英已于二月二日上午抵延）

关于目前我之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

毛泽东　朱　德　王稼祥

一、敌有占洛阳可能，汤胡卫主力有被击溃可能，中条山胡卫两军大别山桂军均有处于狼狈地位可能，西北胡军有一部援豫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

二、我之方针：

1、政治方面，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十二条，对十月十三日皖南事变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此条由周董负责）。

2、军事方面，八路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克诚即改新四番号，新四已成全国人民中极荣誉军队这是皖南代价换来的）。

3、统战方面，彭左刘邓注意中条各军，雪枫注意河南各军，先念注意湖北河南各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

三、苏鲁两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坚决歼灭之。

中共中央关于八路军停止给蒋介石一切呈报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

中央决定在蒋介石对新四军问题没有满意答复前，我八路军停止给他任何呈报（战报亦停止），亦不向他请领经费。他的来件，办事处可以照例收下，但不要复他。

---

* 这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给新四军、山东军区等负责同志的指示。文件是毛主席起草的。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通报第二号

（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

（一）国民党对皖南事变的宣传要点：

甲、军纪问题不论政治的党派的意义。

乙、不许涉及中共及第十八集团军，企图借此和缓进步势力及中间派对事变的反感。

（二）蒋令庞炳勋部东进与高树勋部配合，企图把陇海路断绝华北、华中交通。

（三）敌已占涡阳、蒙城，继续挺进，有攻占阜阳及新黄河，进占周家口、沈邱之可能。汤、何诸部已大部西撤阜、太。汤恩伯对所属作战之指示，是避免正面作战，用机动游击对抗等法。

（四）叶参谋长于本日乘机抵延。

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

（一）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

（二）汤集团军损失不小，三个军已转回豫西，南汤〔阳〕四日失陷。李仙洲尚在淮河西岸，战况亦烈，敌一路由上蔡攻占项城，捣李之背，一路由亳州攻占太和，迫李之前，估计李军战败亦将西撤。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主力，现与后方交通断绝，变成了敌后部队，这对桂系是一大打击，估计莫德宏部将来亦有向西撤退可能。范汉杰军已从中条山南调，如洛阳危急，他军亦非渡河不可，原定庞炳勋出冀南隔断我冀鲁交通的部署，当然要放弃。胡部李铁军军已星夜东调，第八师从正宁撤至邠州，大概是准备东调的，包围边区兵力已经减弱，河南战况发展，有再调一部可能。总之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了。

（三）蒋介石原知一、二、三月内敌人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我在反共了，国共冲突扩到很大，日本会坐山观虎斗吧？拖过几个月，希特勒就会迫令日本南进，

中国就太平了。岂知日本人的想法是另一样：第一，时间不让他等待，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你是骗我拖延时间的，倒不如利用国共冲突，乘击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了。三十日东条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第二，日本人不愿意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四）在外边宣传时请将佳电中"肺腑之言"那一段（从"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蜂起之时"起至"深愿为两公一吐者"止，共百〇二个字）着重指出，使国民党及中间派想一想目前发生在国共间、中日间的危险状况，我们实不幸而言中。他们一定要"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所以造成了"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何及"的结果。

（五）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此种估计是否适当？你的意见如何？

中央书记处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殉国烈士大会内容的通知

（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

在抗议"一·一三"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士大会中，除前指示者外，应在大会通过致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的电报，请求他们接受中共中央解决时局十二条件，平反皖南冤案。驱逐亲日派何应钦等，撤销利敌误国、分裂团结的反共计划，重整抗日阵容，组织对敌反攻。在大会中不应提出成立中央政府，请求八路派兵南下及八路军新四军开到大后方去镇压亲日派等主张，这些主张在目前是错误的，不策略的。

毛泽东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

各次报告均悉。

（一）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

（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敌必向蒋进攻，□□□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目前国共是僵局（如陈布雷所说），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那时蒋表示对我缓和，我亦可以稍示和缓，但目前尚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于蒋不利。

（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蒋再令汤集团进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已自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十四）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的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点请向□□□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中共中央同意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讨论给周恩来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

（一）同意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

（二）同意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

关于执行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七日）

毛泽东　朱　德　王稼祥　叶剑英

（一）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

（二）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

（三）八路军尤应利用蒋差别对待政策（新四军问题不牵涉八路），除中下级可以声援新四军外，总部应取沉默态度（此种态度一方表示留余地，一方亦是示威），军事上则取防御姿态。

（四）新四军已无合法地位，本来可以大闹，但为不使日蒋矛盾缩小，相反应使之扩

* 这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同志给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同志的指示。文件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

大，故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河南敌退后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应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

（五）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准备愈快愈好，以防万一。实行愈迟愈好以便配合国际国内的最有利条件，因此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燥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六）因此在目前只有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才是适合上述要求的。战略的军事攻势只在必要条件成熟时才是正确的。所谓必要条件：第一是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并且投降时（他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第二是国际最有利时机的到来。只在这些条件具备时我们才有主动权，否则我们将限于政治上军事上的被动地位。这种主动权，我们必须拿在自己的手中。

（七）请你们根据上述方针部署军事，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

毛泽东询问周恩来、董必武是否已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等问题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

（一）关于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是否已经办了，如已办了，请将文件告知，以便公开发表。

（二）关于委任新四军七个师长的命令，收到后请在重庆散布。

（三）拟用剑英名义复张冲一电，是否有此必要。

周恩来关于提出十二条和张冲交涉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

昨日将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原文照抄）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此公函抄送各小党派及有正义感之参政员二十余人。王世杰得公函后，立即找张冲谈话，认为此系中共表示破裂。黄、左等访王世杰，亦说时局严重，必须设法解决。张冲从昨晚至今午，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此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我谈话，我均严词拒绝，指出自剑英回后，只十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张认为十二条虽已提出一月，举国皆知，但为对外宣传，尚非正式公文，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而其中有取消一·一七命令，取消一党专政，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我告以：翻脸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仍是撤过黄河那一套。张冲仍纠缠不休，请求以他名义代转延安，缓期两日提出。本来缓期两日，便于我们准备，未尝不可，但公函已送出，决不能收回。因此，我只答应将他的意见代转延安，其他不能答应。现特请示你们。我想，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见蒋毫无结果，而且击退顽方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员来调解是必要的。我们的条件，如果能由各党派委员会在会外从政治上讨论党派纠纷及十二条，则不直接提出参政会，也是可以的。如此可拉住各小党派，争取民主，以为难国民党。或者国民党承认二届参政会延期开会，则我们的问题也可稍缓提出，便于我们先在外边作扩大宣传。否则，我们一切都准备了，即他捕杀讨扣，毫无所惧。中央意见如何？请立复。

中共中央关于谈判解决时局之十二条件应告张冲各点给周恩来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甲）同意你的根本立场，但不拒绝谈判。

（乙）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并须广泛发布。

（丙）应告张冲如下各点：

（一）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是国民党表示破裂的开始行动，我党七参政员公函，是我党企图挽救此种破裂的行动，因为现时挽救破裂，除请求国民党及参政会实行十二条外，无其他方法。

（二）自一月二十五日将十二条交与张冲转达蒋先生后，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

（三）如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方面自可暂时不付讨论，而由两党在会外谈判，但在谈判无满意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

（四）国民党方面如无破裂决心，必须迅速停止各方面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如你所举各项。军事进攻则为庞炳勋向大名推进，李仙洲向彭雪枫进攻，李品仙向张云逸进攻，陈大庆向李先念进攻，胡宗南向关中进攻），否则一切都是欺骗之词，我们不能置信。

中共中央代拟叶剑英致张冲信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恩来同志：

下电请交张冲。

“淮南先生：

来电敬悉，当即转呈敝党中央，兹将敝党中央意旨奉达如下：

（一）一月十三日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命令，是国民党方面开始破裂国共合作的行动。

（二）为挽救此种破裂危机，恢复合作局面，坚持对日抗战起见，本党中央经由本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于一月二十五日将本党中央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之十二条办法面交国民党代表张冲先生转达国民党中央。

（三）本党中央认为除由国民党方面采纳十二条办法之外，绝无任何其他办法足以挽救由国民党方面所引起的破裂危机，而此种破裂危机如不挽救，则民族危亡之大祸将随之而至。

（四）一月二十五日以后，国民党方面对于本党所提十二条办法久无答复，故又指令本党七参政员于某月某日将十二条办法向国民参政会提出，要求讨论解决，以利抗战。

（五）截至本日为止，国民党方面对于本党之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有加无已。关于政治压迫者，例如：

（甲）对《新华日报》之种种压迫；

（乙）对八路军办事处之种种压迫；

（丙）各地继续不断的逮捕与暗杀共产党员；

（丁）各地报纸公开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及新四军；

（戊）各地强迫共产党员自首、脱党等等。

关于军事进攻者，例如：

（甲）庞炳勋向冀南进攻；

（乙）李仙洲向淮北进攻；

（丙）李品仙向皖东进攻；

（丁）陈大庆向鄂中进攻；

（戊）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等等。

（六）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满意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能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将毫无补于实际。以上是敝党中央嘱剑英向先生提出的全部意见，敬祈转达蒋先生及贵党中央，并祈见复。

先生殷勤恳切，至企贤劳，敝党中央诸同志对于目前时局甚为关切，倘能由贵党方面采

纳十二条办法，使目前之不幸事态转祸为福，则非第两党之幸，民族国家实利赖之。

叶 剑 英

漾”

（请周将七参政员公函递送之时日填进去。）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张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前函可称文字有错，拿出校对一次，以便蒋能见周，否则在公函压迫下，蒋训令大家，蒋说蒋是被迫而见的。我告以具体当不能及尤目前见蒋亦无意义，因不会得有任何结果的。张说：不然。他根据各方可能意见，提出具体办法如下，请我报告中央：

（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说游击部队愿留多少是多少，可是为中央留面子，声明正规军队开黄河以北），其他仍还我一军，补新四缺，归还叶挺及其他干部。边区及冀察政权照前议。派两人传发。

（二）参政会改请董、邓出席议会，而毛泽东不能来时，指定人呈意□□□则提新四问题，另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讨论党派问题以蒋为主席、周为副。

（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蒋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我答他：现谈判具体条件我可报告中央请示，无必要取回公函，更无必要见蒋。张冲答：如果你们不出现参政会，已表示破裂，则一切无从谈起，如在公函不撤情况下，政治方面仍坚持十二条压迫而让步的，蒋无法接受，国民党亦将大哗。我答：不拒绝谈判，但绝对不撤回公函，彼此僵了三小时。张最后请我将所提三项办法，报告延安请示，张之唯一的要求，是出席参政会，并望明早答他，因为参政会，三月一号开会，及小党派已向声明参政会中共参加必不可少，提议成立各方面联合委员会。我党以报告可发，一切待延指示，但公函决不能撤回。我观张冲所谈急是急，但此面子是要，我们是公函不能撤回，谈判之一拍，参政会不参加，但此种关系到如何程度，要是目前坚持十二条一条不让步，我与他们具体，还是坚持不接受十二条即不出席参政会，或答复商议十二条即可出席参政会，在他们今天不愿面对十二条，（张冲□之为二十一条，我痛□之），而我们各处扣住十二条，你们意见如何，请告，以便答复张冲及各小党派。

*此稿原件为抄件，其中文字错漏较多，不一一注明，照原样排印。

周恩来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顷见张冲，将剑英漾电及你的意见给他看了。张冲表示，漾电等于破裂。我说，责在国民党。我党为挽救破裂，故提出十二条。张云：十二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做不到，但昨日三项办法已答复了十二条。我说：所以中央要我回去讨论。张说：你如回去，他们（指国民党）又要说你们破裂了。我说：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张说：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邓两位可出席参政会。我说：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滑稽剧，不是侮辱我们？张说：董、邓如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我说：我本准备在此待捕的。张转又说：若董、邓不出席，则主席团选毛成立调解委员会，岂不成了单思病。我说：你晓得我们开会赞成不赞成你提的那套办法呢？张更说即使董、邓只出席一人也好。我说：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张说：骂人者不能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说的。我坚决的告以：出席是不可能的。张请我报告延安。我答：一切谈判我都报告延安，中央说出席的希望决不会有的。

综观张之谈话，目的在找我们捧场。居里在此犹未走，闻系专等观光参政会开会的（我早已面告居里，我们决不出席）。他们英美派很急，连胡秋原都被动员了，找吴克坚劝中共出席参政会。而白崇禧等军人，则仍在大骂说：非打不可。亲日顽固分子则仍在压迫。这仍然是哄、吓、压三策并进。我以为只有决不撤回公函，坚决拒绝出席，才可揭破流氓骗局（骗外骗内）。

中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

（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

（三）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各小党派提议组织各党派委员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甲、中央二十六日指示悉，当即通知张冲。

乙、今日上午蒋见各小党派代表六人（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

各小党派代表陈述四点：

一、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

二、军队国家化，与党派绝缘。

三、检讨抗战建国纲领及一切决议之实行。

四、成立各方面有关的委员会，以讨论并保证上项之执行。

蒋答原则上同意：

一、参政会原为政府邀请大家共谋团结者，无条件可言。在政府，当然希望中共参加，但中共出席与否，当由其自决。

二、军队与党派绝缘，最好勿向外说，否则国民党人会以为向中共投降（莫明其所指，大概怕地方军人离心）。

然后各党派代表又说明四点：

一、此委员会不属参政会。

二、委员会九人，请蒋为主席。

三、请各党派负责人参加，决不限于参政员。

四、以此与中共代表商谈。蒋答复：可以。但所商决者，须中共能执行。左舜生云：须大家能执行。

丙、各代表退后即约周谈，告以如上所述。周答复两点：

第一点：十二条有满意解决的办法，完全确有保证之后，才能出席参政会。第二点：各方面委员会，可以在参政会外公开商讨十二条及一切国家大计，中共愿参加；但委员会名额应扩大，中共代表人选及其意见，须请示延安。各代表闻言，褚辅成最右，他还相信蒋有诚意，能纠正部下错误。黄炎培说：应对组织委员会与出席参政会分开。左舜生又说：如中共不出席，则委员会恐无望。张君劢主张先开委员会，要蒋下令停止进攻中共军队，如能做到，中共再出席。张澜说：要看委员会有无希望，再谈出席问题，即出席晚到最后几天也可以。沈老说：委员会这仅是我们希望有。后周表示：委员会事，当报告延安，中共出席事决做不到。

丁、蒋现用一切力量骗我们出席参政会，我们决不上当。我们以各党派委员会民主讨论难蒋，蒋想以此为我们出席交换，我们也决不交换。

戊、各党派委员会组织和讨论内容，及中共代表人选如何？请中央指示，以便以此难蒋。

中共中央关于对各党派委员会的态度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可以加入各党派代表委员会，每党派代表一人。

（二）我党派恩来为代表参加委员会。

（三）委员会以讨论各党派关系（当然首先是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国家大事为其任务。

（四）委员会不属于参政会。

（五）我党参加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

中共中央关于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请以你自己或董老名义（不用延安名义），向张冲表示下列临时解决办法：

（一）两个集团军，八路四个军，新集团军两个军，共六个军。

（二）华北、华中、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

（三）释放叶挺充任军职。

（四）释放所有皖南被俘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

（五）交还所有皖南人枪。

（六）下令停止向我进攻。

（七）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

（八）停止全国政治压迫，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被捕人员。

（九）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周恩来为副主席。

（十）周恩来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十一）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

（十二）承认敌后抗日政权。

在以上各点见之明文与事实后，我党可以出席参政会。同时并向张冲表示，如彼方同意上述办法，由你偕张冲同来延安谈判。参政会延期两星期开会。以上由你或董老用口头向张冲表示，不用文字。

中央军委对皖南事变后的四点战略指示*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延安军委已公开发表新四军领导人员，发表抨击重庆谈话并代你们发表就职通电及声讨亲日派宣言，你们都收到否望广为散发。

二、在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后，我们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有政策上的变动即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完全孤立他的政策，在党内外尽量揭破他的反动阴谋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但对实行三三制及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指示中所述各项政策均不变对统一战线原则均不变。

三、对皖南失散力量张邓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燕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

四、对皖西鄂东及河南方面即应布置游击战争，在皖西之桐城舒城潜山一带张邓负责加强游击纵队的力量以便不久能向大别山前进，在鄂东之浠水黄梅一带，在豫西现时敌人进攻地区（敌已占领泌阳）由先念负责布置，雪枫应准备两个精干的游击支队，以便在适当时机派往豫西活动，苏南方面望胡陈速收集，皖南东移力量暂时在苏南活动，准备将来出天目山。

总政治部关于我军对皖南事变的态度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二月三十日）①

总部、三个师、军区、五个纵队、江北、先念、肖克、朱瑞、胡陈、八路军并各级政治部：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及发表“一一七”反革命命令，是蒋介石对我全面破裂的开始，我党我军必须充分准备对这次严重的破裂，使破裂的结果于我有利，我们须利用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之间的一段过渡时间。因此，中央决定在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表示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态度，不发表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而动员民众团体发表文件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声援新四军，驳斥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命令及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演说。对蒋暂时不要提打倒口号，也不要提拥护口号，在根据他的命令及演说作社论时，称他为蒋介石氏，民众团体发表文件指责政府时以当局二字代替蒋介石的名字，而中心应痛骂日寇与亲日派联合发动内战消灭抗日军队的阴谋。望遵照执行为要。

---

* 这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给新四军，山东军区及彭德怀、左权等的指示。

① 原稿时间有误。

中央军委对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战略地区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

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地区是鄂豫陕边，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在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利用日蒋矛盾及目前日寇向豫北豫西进攻机会（日寇此次东从涡阳南从信阳作包围汤、李、何桂之战役攻击，汤李何有受极大损失可能），你们第一，应令彭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待汤、李、何大部向西应战淮西空虚时，渡过淮河，向淮河平汉间发展，如此着成功，则是战略上绝大胜利，替我华北部队开辟了一条南进出路。彭雪枫部应恢复新四军番号，如将来华北部队南进，亦用新四军番号，新四军现在是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了，他可不受任何法律拘束，（国民党元老中有忧虑浙赣皖豫将遍地皆匪者）如此着成功，黄克诚应准备向河南发展。第二，你们应令张云逸、邓子恢向皖西发展，应使他知道打破桂军进攻，主要是取外线发展的方针，桐城根据地是绝好战略基地，此次敌军进攻，莫树杰已令其商城部队应战，如敌军打汤、李、何后移向在大别山集中的桂军主力进攻，张邓就可将主要发展方向移至皖西。去年十月你们复电谓巢湖、瓦隔湖间不过百里通过甚难，但现时我在无为桐城已有根据地，虽只一二县，其战略意义却胜过敌后大块根据地，应极端重视之。

第三，李先念的发展方向是鄂西、豫西、鄂东三方面，鄂东即令现有之浠水黄岗支队及路东支队担任，加强其政治领导能力，鄂西豫西均随着日寇的进展向前推进。以上彭、张、李三区均能很好的利用蒋矛盾，实施我之战略发展。华中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苏南是江南聚集力量的中心，应用大力经营之。

该方情况我们不甚明了，望作一详报来。该方将来应准备出天目山。皖南应派人过江指导残余力量仍在芜湖一带抗日，在一年内逐渐聚集一个二三千人枪的支队，联系地方党、准备将来向黄山及赣东北发展，不要全部过江，已过江的待生息一时期后仍可考虑派他们回到芜湖一带去，自一月十七后形势大部改变了，过去项英错误的南进政策，用在今后就是正确的，皖南损失据国民党报导亦只伤亡二千余，俘虏三千余，项部原有万人似尚有三千左右已突出或被击散，你们应注意派人指导收集，其往苏南者即在苏南行动，不要过江了，苏南应加强无线电通讯该方至少要有五个电台，皖南应立即着手建立一个电台，曾希圣愿打游击不愿做老工作，可以就令他带领现到无为的部队，将来可令他回到皖南去，如可能并必要时，你们亦可考虑派孙仲德随曾希圣过江，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

---

* 这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给刘少奇、陈毅的指示。

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江南第四个战略基地是闽浙赣边，该方有三个藏有少数武装与民众甚好的小根据地，你们目前应开始了解该方情况，小饶曾有详报，如你处没有可转给你们该地目前是加强地下工作，准备将来武装起义，恢复过去公开根据地。以上是江南四个战略基地的指导任务。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并应准备于一年内消灭反共军聚集大量武装力量的地方，但你们应把这地方看作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他在总任务上的作用是出干部派军队向西边南边去的地方，好象汉高祖的关中我们现在有华北、苏鲁及南方（闽粤）三个大的战略根据地，华北的任务是出陕甘川云贵，你们的任务是出鄂豫陕边与闽浙赣边，南方的任务是经营五岭南北。为适应蒋介石暂时只打击新四军的情况（各个击破策略）除你们提议的编四个师外应加黄克诚彭雪枫两部各编为新四军的一个师，共有六个正规师时局虽变化甚大，但日蒋矛盾仍可利用，仍是目前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中之最基本矛盾，蒋介石无论他怎样造反，但闹来闹去，只会把他自己闹垮台的。中央关于一月十七日以后新时局的决定，不日可以发给你们。

周恩来关于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

顷见张冲以个人意见相谈，结果如下：

（一）他易于回答者为第三条释放叶挺，他提出由我们请任军职；第四条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他提苏北被捕者亦请我们释放；第五条放人发枪械；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他愿做；第九条他不能更改蒋使之附属于参政会的意见，周为副尚未提；第十条是他们提的，非我们提的；第十一条关于边区划分，他的主张前议。

（二）他最难回答的为第一条两集团六个军，他只愿提十个师四个军，分属两集团，还须晚两月设法；第二条维持现在防地，他只承认在改编前临时办法，以后的以正规在华北，游击留华中；第十二条敌后抗日政权，他只谈到实施新县制，讨论各党及各群众团体地位，即参加的政权。

（三）目前时间只有张不能作主，今晚决不能见蒋，提出之条件具体答复都谈不到，更谈不上保证，延期两周已不可能，尤其预备会选主席团，更不会再等，故不出席与谈判仍是对立着，无法解决。

周恩来关于各小党派被蒋介石拉拢后的表现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

蒋调来张群、宋美龄拉拢小党派，想借此孤立我们，同时也哄骗我们，以便共各个击破。小党派被拉之后表现意见如下：

（一）黄炎培等力说：三日来到处奔走，今日直等至夜半，犹守听我们的电话，他的主旨在和，一切都被顾承意旨。

（二）张澜极不满意政府，但也让我们再忍一次。

（三）褚辅成是国民党，也是和事老。

（四）梁漱溟认为一切都无大希望，但愿做一步看一步，所以也劝我们要再一试。

（五）张君劢、罗隆基是急于求效者，张目的在有主席团，也盼登主席团。罗颇急进，但也认为可试一试。

（六）左舜生认为蒋之表面让步，乃□□□之功。中共如出席，国民党得面子，中共得全国同情。

（七）救国会同意我们估计，不信任蒋，但认为现在各小党派出头，蒋稍让步，正好借此抓住各小党追蒋自新，缓和时机，以便中共布置，另一方面暴露蒋之欺骗拉拢，各小党派共进退。蒋表示□□不出席就是中共决心分裂，这表明蒋内幕有抗战投降之争。中共出席可多争抗战派，否则，将确难再讲话，即使上当也是最后一次，目的在争小党派，故全体望我们出席。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

（一）现在是僵局对峙着，须打开一关。

（二）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鹊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象落水狗一样，无精打彩的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诸老想出种种方法来调和，我们咸拒绝了。黄炎培钦佩的说，贤才不堪为铁的纪律摧毁，昨使孙的心都拿在手里，专等着中共代表出席，以为中共不来，一切□□我们□千言□。

□□□“我已一夜多未睡”也还不能□冲被重庆恐惧的□□故单就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这是我们（周、董、邓）共同的认识。

毛主席，现在已是十八点了，只是今夜无论如何谈判不出结果。就参政会本身，我们已有了大影响，现在全重庆都在等待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但没有保证和结果，使出席实在□□□。现在僵局必须打开，中间的办法已没有用，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详情见另一报告。

（三）现在困难的是：一切谈判均无保证，而且还未具体化，如出席，太便宜这个大流氓，但今晚一夜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结果的。所以从僵局要做只有听之，然而在蒋这种历次摇尾乞怜状态下，人心是不能不受影响的，而蒋也有流氓一着。

（四）因此我们不能不请示中央，如要开，在告办法，只有将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十项要求（共有二十多件）于开会前直接见蒋，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基本问题，在参政会开时讨论，并约同张冲来延这是一个办法。另一个办法便是硬到底，我们也是准备了。不过中间的办法，现在是没有了，请立复。

---

* 原件为抄件，其中文字错漏较多，不一一注明。

中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

（一）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确保证，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

（二）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延安回复已到，为顾全团结大局起见，同意临时办法十二条在有结果有明确保证时可以出席，以示我党仁至义尽。

（三）判断此次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出外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如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

（四）即选周为主席团亦决不能出席。

周恩来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

敬启者，数日来承奔走团结，钦感无既。敝党代表之碍难出席此参政会，所有苦衷，早经洞鉴。现为顾全大局起见，特与敝党中央往返电商，改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具见于与参政会公函中。凡有可以谋团结之道者，同人等无不惟力是赴。今兹所提，已力求容忍，倘能得有结果，并获有明确保证，必武、颖超必亲往参政会报到。考其形，容或有负诸先生之望；察其心，又知诸先生之必能见谅。方命事小，国家事大，惟求诸先生能一致主张，俾此临时办法早得结果，斯真国家民族之福。万一因一时扞格，大局趋于恶化，同人等实已委曲求全，问心可告无愧。而诸先生尤为爱国先进，届时必有更多匡时宏谟，同人等窃愿追随不懈也。延安诸同人闻诸先生之热诚苦心，亦极感奋，并电嘱转致谢意。特此奉达。敬请

公安！

---

* 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十七日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和审判叶挺军长的命令。为了打退顽固派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严重抗议，并拒绝出席第二届参政会。这封信是就中共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致各党派领导人士的（指当时受聘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中国职业教育社、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黄炎培、沈钧儒、李璜、冷遹、梁漱溟、张君劢、张澜、褚辅成、周士观、章伯钧、邹韬奋、左舜生、罗隆基、江问渔、杨赓陶、张申府）。署名的还有董必武、邓颖超。

毛泽东关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

（一）我们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

（二）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七参政员齐电，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续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

（三）六日蒋演说，似有去年四月程潜在西安报纸上发表谈话宣布我十大罪状相似的用意，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参政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四）我们却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路上少捉人）。

（五）对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拟不作防御式的答辩，置之不理，而利用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由中央去一电，重申双十二条的必要，给他正面一攻，你以为如何。

（六）小党派中国社党与青年党已暂时变成蒋介石工具，但真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黄炎培、张表方等派依然是中间派。

（七）胡宗南对关中进攻已停止，我反扩大了一个区的地盘，边区四周已平静，皖东桂军被日寇打得七零八落，李先念在鄂东有发展，莫树杰之八十四军忙于应付。陈大庆在鄂中，李仙洲在淮北，亦无能为，各方皆有停顿之势，再过两个月欧战大打，南洋紧急，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各根据地对国民参政会应取置之不理态度的通知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

在各根据地，对重庆国民参政会的一切东西都不要发表，亦不要批评，取置之不理态度。

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甲、毛主席十二日指示收悉。

乙、昨（十四）日蒋约我谈半小时，宋美龄在座。

丙、蒋谈话目的在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也许可解决一些小问题（如新华、捕人、发护照等事）。解决大问题尚非其时。

丁、蒋表示有数点：

（一）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

（二）不管怎样，条件总是提向他的（又承认提向他了）。

（三）当然没有那样答复，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

（四）问会后延安有否电来，我答没有。他要我电延，问最近意见。我告他：问题总要解决才有办法。于是将新四事件及二月份各种压迫说了一顿，但他对新四事件置不答，而对压迫事则说这是底下做的，不明白他的意旨。对新华、放李涛等人、发护照，都可做到。要我直接写给他，其实我早已全部写给他了，现拟再分写给他。

（五）我提到防地、扩军，他对防地未答，但也未谈开黄河北岸事，只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我当告以自一月起已无饷。他连说可以发。

（六）我说闻叶希夷已到，我要见他。他说：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

（七）我说，党政委员会改组中，我的名义可取消。他说另找实际工作。我说不必要。

（八）他约下星期再见，宋并说请吃饭。

戊、现在的问题是在我攻势下，蒋为敷衍门面，想谋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

己、我们办法是利用目前可能，先解决一些小问题（如新华、捕人、发护照、发饷等），还是等着大问题一道解决？请即示复，以便应付。

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一）可以先解决新华、捕人、发护照、发饷等小问题，惟对大问题绝不放松。

（二）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形势不容许他不让步。

周恩来关于拟用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向毛泽东的建议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你十二日的分析完全对的，目前外边的重视，不是国民党的八中全会，而是蒋的六号讲话。因那篇讲话，在不明内情的人，多少会受一点骗，尤其是在国外。而国民党八中全会，只是讨论其党内事，现在已经在酝酿着党内斗争（党政之争，西西及政学系、朱陈之争，元老与少壮之争）。我们可让他们自己火并去。四天前，蒋宴西西各省中坚干部，贵州黄宇人说，要调整党政关系，蒋拍案大骂说："十个黄宇人也敌不上一个吴达全。假使我做省主席，连黄宇人的面也不会见。"可见西西与政学系暗斗之烈。故我们意见，致电国民党八中全会无甚必要。因即使送到，他们也不会在会上宣读的，还不如用一篇文章或谈话回答蒋之六号讲演。如中央不写，我们拟一篇回答，并在海外发表。如何，仍请示复。

毛泽东关于同意由周恩来处写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致周恩来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一）同意你的意见，由你处写一回答六号讲演的东西，中央对八中全会不再发文件。

（二）延安《新中华报》已有一篇社论泛评参政会及当局反动政策，未提蒋演说。

（三）你处发表文件，似亦以泛论为宜（如申明十二条的必要性等），不提蒋演说，不作防御式的答辩。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命令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加强干部教育，提高干部能力，是提高我军战斗力，战胜目前艰难斗争环境，适应部队发展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抗战以来，我军各级干部虽有不少进步，但缺陷仍多，尤以军事方面的进步极为低微，我们不应因一时干部缺乏，只顾目前需要，而忘记百年大计，更不应满足现状，因此不断提高干部能力，对建设我军成为铁军，完成巨大斗争任务具有严重意义。具有现抗大总校已改为专门培养上级干部机关，凡下级干部分由各战略区抗大分校教育，高级干部由延安军政学院训练，其目的在使我军能大批培养干部，各级干部均有受教育之机会与造成之教育场所，使不断提高各级干部之能力，各兵团应送抗总受训之上级干部及送军政学院之高级干部，尚未送出者应立即根据军委总政及集总野政八月二十日规定数目迅速送出，不应有任何借口请求免调，推延时日等等。此令。

中央关于建军问题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

一、自六次大会以来，我党在武装工作上确实获得了非常卓著的成绩，就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一支大量的有战斗力的正规军队，这支铁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创建，它不仅在过去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战争，直接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的统治，而且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建立和全民族抗战的重大因素，尤其是在抗战四年来，又壮大了本身超过原有主力十倍以上，收复失地数千万方里，建立成为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目前正在半个中国境内英勇顽强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这支军队自始至终一贯坚持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成为中国抗战军队中一支唯一的模范的前进军队，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骨干，成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柱，成为将来完成中国革命的有力基石。这支军队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战争的学说，正确吸收古今中外的关于战争与军队的理论与实践，根据中国的实际环境，以及从与党内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自己独立的新的军队理论与实践，新的战略战术和革命军队的建设原则和政治工作制度，更根据中日战争的具体条件的分析，进一步发展了所有这些创造。这支军队中已拥有一大批的革命军队干部，他们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现在这支军队在党的完全领导下，已经奠下了正规化的结实基础，由于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迫切要求这支军队更大量发展和壮大，表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作用。

二、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军队之前，斯大林同志就明白的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过去十多年的斗争实际也证明了在中国“革命形式主要是武装斗争”，全党同志必须深刻理解“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一切漠视革命军队的重要意义，对于革命军队的建设抱消极态度，都是极端有害，党绝不自满于过去的成就，在抗日战争中，关于军事和军队的更繁重的任务是：

（一）最大限度的扩大和发展正规的常备军，在战术上和技术上尽量提高追求现代化，造成在中国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是党的首要任务。

（二）尽可能繁殖和发展与人民血肉相关的游击队，普遍组织人民抗日的自卫武装，使它成为民兵制和征兵制的准备基础。

（三）竭尽努力帮助一切进步性的武装力量，争取他们继续进步，建立长期合作的同盟军，树立持久抗战中的党的扩大外围军队，为了壮大抗日武装力量起见，党对这种外围军队的建立，应该加以重视。

（四）特别注意创造提拔大量的军队干部，更多培养有丰富知识经验，高深理论修养，

具有专长和全才与独立领导能力的中上级干部，加强学校教育质量，增大效率，力求精干深造。

三、党要建立一支铁的党军，这支军队是工人和农民成份占绝对优势，但应该深刻认识党在执行建军任务中，不但不排除，而且必须保证革命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青年在党军中的地位，应明确规定，在阶级性上不仅是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中华民族一切进步人士的军队，因此，在建军过程中，注意不断吸收中国知识青年参加到部队中来是有极大意义；这支军队要有巩固健全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和党的支部之制度和工作，以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掌握党军在政治上须是绝对忠实于共产党，忠实于工人阶级和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其战斗力量是智勇兼备，无坚不催的铁军，他是被广大群众爱戴备至，与人民血肉关联的军队；有合理统御统一指挥的民主集中制度，高度政治团结的精神和政治自觉的铁的纪律。这样成为中华民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与中国工人阶级求得彻底解放的可靠保证和最有力的革命工具。

四、能够建设一支强大革命军队的条件，已经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历史充分证明。首先是党在长期领导革命战争中，蓄积了丰富的建军经验和善于运用这些经验的大量人材；其次是异军侵入国土，广大群众的抗日斗争要求武装自卫；加以统一战线环境下，我党我军政治影响的空前提高和社会基础的扩大。必须重视这些有利条件，把建军工作看成党的任务，同时，不能忽视在建军中经常遭遇的物质经济困难和敌寇与反共分子各方面对我们的包围封锁与破坏，因此，党就必须以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力量，减少和克服物质困难，以经常的战斗胜利换取空间与时间补充自己，整理军队进行一切建设工作，须提高政治警觉，与一切反革命阴谋破坏作无情的斗争。应该认识我党建军特有的过程，一般是由无而有，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由游击队而正规军，要以坚固的自信，耐心顽强的进行军队建设。

五、必须认识建军过程中部队壮大与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对建军工作的正确认识：

1、巩固与扩大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要注意在发展中求得巩固，巩固中不忘发展，无重心的平均主义与机械划分工作阶段都有害于部队的巩固与扩大，所谓“民族革命中不怕无人只愁无枪”的对扩大抱消极态度，与“人员减少，武器尚存仍属幸事”的对巩固漠不关心的论调皆须纠正。

2、积极寻求作战，从战斗胜利中补偿消耗求得壮大。

战斗中遭受消耗，又以战斗胜利兴奋群众，组织广大群众补充和壮大军队，畏惧作战简单的保存实力的观点完全是对革命军队发展规律之无知，张国焘主义之领导军队，正犯过这样错误，要坚定的深入敌后从与敌人斗争中求得发展和巩固，曾有经验证明，退到我后方的部队最易瓦解崩溃；同时又要反对不注意及时补充和保持满员及李特观点的单拼消耗，防止部队遭受削弱和缩小。

3、正规化与地方性。

必须使党所领导的全国性的常备军在每一个行动区域与当地人民密切联系，成为当时当地之地方性的子弟兵，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对地方性的游击部队应时刻注意采取一切必要办法和设施：逐渐减少其乡土和地域观念，使游击队向正规军方向发展，使其脱离保守主义，能够在宽广地域行动，这是建军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把正规化与地方性隔断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4、部队愈大，困难与克服困难的力量亦随之增大。

部队在不断壮大和发展中，有着不断生长的困难，同时也增长了克服困难的力量，因此以缩小部队的扩大来避免困难的观点完全错误，只有保证部队的壮大和巩固，才是克服困难的保证。

（二）依靠根据地和最大限度的保障与党政民的联系和紧密的互助。

1、建军与建设根据地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地是武装生存发展的泉源和依靠，军队又是根据地的中心支柱，因此，党在建设军队中必须努力于建设根据地的一切工作，在军队中克服各种不爱护根据地的现象，克服一切对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灰心和缺乏信心的现象。

2、建军与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群众运动是不可分离的。

没有军队党和政权的存在与活动，群众运动的发展将感到困难，没有党的领导配合，没有政权的帮助，没有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支持，军队的发展和巩固将受阻碍。党不能把建军工作孤立看待，必须把配合与尊重地方党的工作，帮助政权建设，扶植群众运动列为建军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便取得党政民对建军工作的必要帮助，保障建军工作的胜利完成。

（三）建军是一个不断斗争发展的过程。

党必须向部队内部不断发生的不良倾向和对建军问题的各式各样的错误观点作斗争，必须与敌探奸细各种破坏分子作斗争，必须与外部敌人和反革命势力进行不断的军事斗争，从不断斗争胜利中完成建军事业。

六、当日寇侵入国土的每一地方时，必须迅速以高度积极性去组织党领导的武装，发动群众斗争，采取各种办法深入敌区去动员有生力量到抗日军来，这是建军工作中大量发展武装的有效办法。

发展部队，应广泛采用各种方式，个别动员，组织游击队，经过地方政权群众团体和地方进步分子发动，把自己武装过渡到主力部队，深入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和争取改造地方原有武装等。最好方式是繁殖和发展游击队，同时恢复政权，再经政权号召武装，解决给养。要适应当时当地情形，运用各种不同形式，但中心要党确实掌握保证进步，应以主力为骨干，发展新的兵团，在没有主力的地方，地方党部一样要有预见的准备武装工作干部，紧握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和群众抗日的普遍性，派遣自己的党员深入敌后群众中，以积极抗日面目利用合法，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与当地政权、友军和上层社会联络争取同情赞助，求得一切可能武装群众。同时要选择政治、经济、地势、文化、交通、群众条件有利的区域创造基干作为中心。

抗战中的经验已经证明，只要有党的组织的区域，有能够正确的坚决的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一样能够从无到有建立正规化的党军，如山东和苏北便是很好的例子，在今后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应当尽量发挥和运用这一宝贵经验。

征调干部去新部队工作，使新部队迅速进步和正规化，应是主力部队的责任。

七、对于在抗日战争中自发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应当足够估计他们当中存在的抗日因素，确定是争取他们进步与我军密切团结，一致配合作战的政策，大胆的吸收和联合他们。但须争取他们进步，主要是以充分的政治工作，用各种方式传播我军光荣传统与共产党的主张，使其信赖，从内部生长力量，自觉的实行改造。因此，就完全依靠耐心艰苦的争取工作，多采取影响启发和诱导以模范行动团结感动，不是强迫命令，以外力包办执行，急性病和简单的改造办法只有害无益。对自愿接受党的领导，列入我军建制的武装力量，必须

采取慎重灵活的政策实行改造，在必要条件与具体环境下保持原有名义和形式。不论对何种样式的部队要严格避免"吞并"形式的改编。当新部队完全接受党的领导之一开始各种工作制度之建立，不宜要求一步成功的完全党军化，主要在于保证实质的政治领导，引导向胜利方向发展，启示壮大发展的前途必须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补充，使其能得到群众慰劳和战斗胜利，用一切办法提高其情绪，鼓励其前进精神。开始改造的重心在于考查干部，注意从内部提拔和培养新干部，逐渐淘汰那些真正阻碍进步的分子，党应重质不重量的派遣能起领导作用的得力人材担任新部队工作。

八、当武装力量在抗日斗争中蓬勃发展起来时，必须及时争取时机整理训练，树立正规化基础，保证进步与巩固。游击队一开始组成，便要立刻建立党的核心，训练新党员，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建立各种制度，确定游击队同样要有组织性与纪律性，在生活上纪律上和群众关系上，应该和正规军一般，因为游击队只有向正规军发展，才能发挥它的伟大作用。严防一切新部队在发展初期的过分浪费，贪污腐化，破坏纪律，脱离群众的现象，应当深刻认识，只有正规军的坚强和壮大才能完成战争之最后任务。因此整训部队应成为建军中一个经常工作，最主要办法，在于继续不断的反复进行整训，一般正规化的标准应是：

（一）适合情况的编制制度。

（二）有集中的领导与指挥。

（三）有健全的组织结构与军队各部门的组织和工作。

（四）有严格的管理与纪律。

（五）保证命令的执行。

（六）不断提高军事政治文化水平。

（七）保障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

（八）没有游击主义的习气。

为此必须在游击部队和新的兵团中进行许多有效的工作，主要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保证实现部队统一的编制与制度，加强集中的领导与指挥。

九、加强军区建设工作，对建设主力有极大意义，一般的军区是以游击姿态，巩固根据地，同时又给野战军（基干兵团）生长力量，任何军区在建设上都必须分别建立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以便有防守和野战，防卫巩固根据地与向外挺进转战的分工配合。因此，军区在其执行任务上，一方面是动员武装，普遍组织和训练自卫队、游击队，对于野战军（基干兵团）负责补充其兵员，供给资材，安顿其后方，收容与医治其伤病员，使基干兵团（野战军）得以保持充分机动与能力。另方面军区是负责指挥游击队和自卫队，不断打击敌人，摧毁敌伪组织，破坏敌人交通，侦察敌情，实行抗日戒严，领导人民清野空舍、肃清汉奸敌探，使基干兵团取得作战胜利。野战军一样要在军区范围经常作游击活动，必要时离开当地行动。因此军区在组织上一般以野战军首长兼军区首长，以负责领导地方的干部付之。野战军需要军区给以补充供给时，必须经过地方党的系统，任何野战军不得自动改编军区地方武装，须使地方武装经常保持必要力量，才能源源不绝的补充野战军，并灵活配合进行战斗任务。

十、军队的组成，完全依靠政治动员招收兵员，严格保持成份的纯洁，以工人农民为主要骨干，吸收进步的知识青年和一切革命分子，旧军队出身的士兵和军官，要加强其政治教育，建立其革命的人生观，洗除一切旧日恶习。

武器的不断补充，主要靠夺取敌伪武器武装自己，注意建设和改进自己的兵工事业，在

敌后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应设法分散经营，募集民枪，最好经过自卫武装去征集，要经常在部队中进行爱护武器，节省弹药的教育和检查。

努力于更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教育，提高部队政治军事文化知识水平，坚决消灭文盲，改善技术，提高技术。

积极加强干部军事政治理论修养，并提高文化水平，研究新式技术，特别着重通晓马列主义和正确掌握党的政策，求得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实际化，大众化，培养工人成为干部，须使干部养成高尚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品质在部队中有高度信仰。

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加强政治机关的质量，发挥创造，使部队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质量的军队，提高军队中党员的党性，积极发挥干部的以身作则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政治工作人员须有必要的军事修养。

参谋机关要经常整理战斗经验，研究和创造战略战术，尤其要研究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要有科学的工作制度，真正成为军队战术、作战、组织和检查的首脑机关。参谋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政治上要有绝对保证。

后方勤务部门，要适应新的环境建设工作，以自力更生，生产建设，保证军队的供给卫生后勤人员提高技术与提高政治质量并重。

采取一切措施，保持和发扬部队中紧张、切实、艰苦、团结、果敢和负责的优良作风。估计今后斗争形势的更加复杂困难，建军中的政治因素将应着重于军事因素。

为实现这一建军任务起见，要在已有的光荣成绩上，鼓起全党同志的高度热情，振奋全国革命群众，破除一切障碍，促成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的党的铁军的建设成功。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已强调的指出应该大量吸收同情分子参加我军工作，吸收这些专门家参加我军，便是吸收同情分子的重要的一环，我军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必须深刻认识中央这一指示的严重意义而切实执行之。

二、对于上述各种人材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知识为标准，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一般的说，专门家愈有学识和能力，则其为国民党特务利用的可能性愈小，随便怀疑这些专门家是错误的。

三、对于上述各项人材一律依据中央指示，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学识能力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出的人材，不惜重价延聘。要尽可能购置他们所须要的科学设备，在战时要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对他们的工作条件漠不关心与狭隘的克扣的态度是不应该的。

四、对非党的专门人材只要求他们服从我军纪律与各种章程条例，不强迫他们作政治学习，不强迫过政治生活，不强迫他们上政治课，参加政治集会及测验等。对于政治学习与政治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参加或不参加。履历表只填他们的学历及工作历史，不填政治历史（包括社会出身经济地位等），对于他们一些生活习惯不应干涉。

五、因为现在我们许多政治委员不懂技术，往往自作聪明，结果是妨害专门家的工作，造成他们的不安，甚至随意诬告他们、限制他们。因此，如管理该专门家工作部门的政治委员是不懂技术或其技术学识较低的话，则应规定该政治委员无权干涉该专门家的专门工作，亦不对上级负保证该专门家专门工作之责任，而由当地最高首长或其他高级首长直接负责任。

六、非党员的专门人材，要求入党时，我们应乐于吸收他们入党，对他们作苛刻的限制是不适宜的。

七、对于我军中老的专门家（在我军已久或由我军自行培养出来的）及新来的专门家的关系，我们必须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应以知识能力为标准，而不应以新旧资格为标准来分配他们的工作。一般的说，新来的专门家的知识能力均较老的为高，因此，老干部压倒新干部不肯给新干部以负责的工作，不肯在新干部领导下工作的观念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老干部应向新干部学习专门知识与技术。

八、对于国民党及无党派的军事专家，要依照上述原则吸收他们并给以工作，如他们要求带兵则不应即给他们带兵（因为现在情况下还不能实行，将来是可以的）必须经过一个训练与工作过程，才能照其政治觉醒与能力给以带兵的工作。但如果他是带了队伍来的，则不

应撤职，只在他带来的队伍中逐渐增加我军的政治影响。

九、对于在野的旧军人名流、会门领袖，凡可经过他们对友军及对伪军土匪等进行工作的，只要他本人品行尚属端正，不致假借我军名义鱼肉百姓的，或委以师旅团各级的名义或延聘为我军的参议，给以薪金，不管他政治派别政治背景如何。

十、为着切实实行中央指示，要坚决反对狭隘、反对不科学及反科学的落后现象，反对脱离社会的孤芳自赏，只有我军尊重科学并与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更进一步提高我军军事建设。只有我军深入社会与社会各方面联结起来，才能发展与巩固我军完成党中央给予我军的光荣任务，望以执行政策的认真精神，在这方面做出工作成绩并报告我们。

胡服在皖南事变问题高干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五月）

前　　言

皖南事变是一月十三日发生的，到现在已经有四个多月。参加这次皖南事变的同志，有许多都到了这里，不过还有主要负责的几个同志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同志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来，他们的情形还不清楚，我们不能再等，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开这个会。我想，今天开这个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同志们来学习经验教训，使得我们有更多的了解和进步，也就是党的进步；同时，使我们同志以及我们党在以后不再重复的发生这种错误。因此，这个会议，就是从这些意义上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同样，我的报告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为了学习起见，我的报告就要扯远一点。我想从抗战以来，把我党在华北、华中以及华南的工作经验基本总结讲一下，同时可以对华中的今后工作讨论一下。这样来讨论，对我们更加有帮助。

我的报告分四部分：

一、绪论。

二、抗战前后我们在华北工作的基本总结。

三、华中工作的基本总结。

四、项英和袁国平的错误。

第一部分　绪　　论

一、历史行程的曲折性

历史行程是曲折性的。有一个时期历史走得很快，甚至于胜过几百几千年所走的路程；但有时又走得很慢，慢得似乎有停止的状态；或者有个别的地方，历史似乎在倒退，当然实际上历史永远是往前进的。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那么，我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适应这种规律性，否则，我们的事情就做不好。

在历史走得很快的时候，我们怎样呢？我们决不能落在历史后面，一定要跟着历史很快的走，而且是站在历史的前面，大踏步的走，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在革命中已经成熟的任务。我们不要落在历史后面，阻碍历史前进；相反的，在历史走得快的时候，我们

* “胡服”即刘少奇同志。

更要推动它尽可能的前进。这样才叫做我们是站在历史的前面，领导历史前进。这是当着历史走得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样。但，当看历史走得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不能犯急性病，要有耐心，善于等待、积蓄力量，善于保存力量、准备力量，甚至于善于退却，等到有利时期能大踏步的前进，有计划有组织的前进。如果在历史逆转了，我们着急，一个人前进，那么你的结果，还是不能前进。所以，我们共产党做工作，就要会适应这种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问题虽然非常平常，讲起来大家懂得，但我们同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毛病，就是在历史走得快的时候，不能有大刀阔斧的方式，去解决革命中已成熟的各种任务，还落在历史的后面。那么，在历史走得慢的时候，我们同志就犯急性病，烦躁，不善于埋头苦干，等待时机，准备力量，不善于退却，积蓄力量，以至于他一个人前进，使革命失败。这种毛病，在我党的历史上面也常看见的，就是在抗战以后，我党的工作中间，也在个别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我们拿抗战以后的党的工作经验，来讲明白这个问题。

二、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新形势，党的新任务和新方式

芦沟桥事变是中国历史行程上一个转折点。在芦沟桥事变以前，中国形势不同，因此，我们党有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工作方式。

芦沟桥事变前后，中国的形势有些什么变动以及我们工作方式应该有些什么变动？

在芦沟桥事变以前，中国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在芦沟桥事变以后侵略中国的方式变了。事件以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是非武装的，包括经济、政治、外交等侵略，以这些办法企图灭亡中国——这里除了"九一八"发生的武装斗争——因此，在事件以前，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主要方式，也是非武装的。比如：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办外交各种办法，抗日运动，如一二九运动、文化界的七君子救国运动，这些都不是拿枪杆子，为非武装的斗争。这就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式。同时，在当时国内斗争与事件以后也是不同的。当时国内阶级斗争是武装的。中国从民国元年以来，一直是在内战，打了二、三十年，一直到西安事变后，中国停止了内战，国内阶级斗争也变了，由武装斗争变到非武装斗争。内战停止，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政治斗争。抗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方式，由非武装转到武装斗争，用军事进攻占领了上海、南京、武汉。其他外交、经济、政治斗争还是存在的，不过那些已不成为主要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的改变，所以中国人民反对日帝国主义的方式也改变了，主要是武装抗日。游行、示威、写文章，过去那些抗日方式，还是有的，但已不成为主要的方式了。由于这样一变，所以把过去那些最出风头的学生、写文章的人，变得不著名了。而现在最出风头的是拿枪杆子的将军们。在这个时候，谁要在政治生活中取得地位，他必须要懂得武装斗争，打几个胜仗，那么这个人，或这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在中国人民中，取得地位。否则，是不可能的。在事件后，国内阶级斗争表现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对于抗战两条路线斗争为中心。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抗战路线与无产阶级的抗战路线的斗争。那么，要决定国内斗争中谁有办法，就要看谁在政治斗争中有办法。具体来说，就是要懂得在抗日战争中同资产阶级打官司，孤立资产阶级。

所以，在事件以后，我们党的新任务也变了。这个时期，我们提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建立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政治上面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且孤立资产阶级，从抗战一开始就孤立它，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共和国的新道路。这个方针我们是永不变动的，我们党已经按照这个方针做了。

三、在芦沟桥事件以后，我们党应该采取那种方式的斗争，应以何种地区为党的主要工作地区？

一般来讲，所谓武装斗争也者，有三种主要方式：

（一）正规战——包括运动战、阵地战；

（二）游击战；

（三）武装起义。

那么，我们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应以那种武装斗争方式作为我们抗日战争中主要的武装斗争方式？我们主要采取游击战为打日本的方法。这个道理有下面几个：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来讲，游击战争虽然不是主要的，但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其极重要的作用，成为相持阶段中抗日的主要方式。

为什么我党要采取打游击战？

（一）游击战争的重要。

（二）我们共产党会打游击，我党已有十年游击战的历史，所以我们长于打游击。

（三）在游击战争中，便利于我党自己的发展。因为游击战散得开、占得远，影响很大，便于我们发展，建立政权。

（四）游击战是一种很困难的斗争方式，是站在抗日的最前线，成为抗日中最困难的任务，我们共产党应站的岗位。如果我们不去担负这种艰苦的任务，别人是担负不起的。

（五）游击战争成为国民党军队所轻视的，他们以为自己有强大的装备，不愿意去打游击，至少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是不重视的。

（六）游击战能在长期斗争中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最大的消耗和打击，现在事实上在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所受的打击和痛苦，并不是蒋介石正面给它的打击和消耗，最大的还是在敌后方的游击战争。由于这许多的原因，所以我党应采取游击战作为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最主要的方式。

抗日的游击战，是在什么地方打呢？应该在敌人后方，在敌占区，才是我们打游击的地方。因此，在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大后方，就不能打游击。同样，在敌人占领的城市，如上海、北平，也不是我们打游击的地方。只能在敌人占领的后方乡村里打游击，不管是湖沼地带、山地都可以。因此，在抗战发生以后，我党确定党的工作中心地区，应突击的方向就是在敌人的后方乡村里。但在我们的大后方是不是要进行工作，当然也需要。那么，在这个地区内，党的工作主要原则是援助前线、援助敌后游击战争；同时，还应该组织群众、准备力量、反对投降，以及准备力量在反攻的时候起义暴动，配合整个战略的反攻。这是我们中心的任务，使各方面的工作配合这个总的任务，把这方面打开，共产党才能被全国人民所尊重，提高共产党的地位，并保证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巩固。

对敌后情况的认识，有人讲：敌后有各种各色的特点，特别是皖南的项、袁，就是一个特点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各个敌后有各种不同的特点，并没有把华中看为华北。但事情不仅有差别性，而且还有同一性。那么，在华中的敌后与华南或者华北有什么相同呢？这些相同点是多得很，特别中央公开指出，我们应该强调同一性，而不应该强调其差别性。各个特殊性，对于那些最主要的与我们工作有特殊关系的特点，我们应该注意。那么我们首先把那些特点讲一讲：

（一）有国民党军队与政权和没有国民党军队与政权的地方不同；

（二）有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和没有共产党军队与政权的地方不同；

（三）有的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能和我们合作和有的国民党军队与政权不能与我们合作，这也是不同。

这些是敌后的差别。除了这些特点以外，还有许多共同点：

（一）凡是敌后，都有两种势力斗争。抗日势力与日寇和汉奸的斗争以外，还有两面派，那不是主要的。

（二）在敌后有两种军队和两种政权的斗争。

（三）各个敌后都是战争的环境。

（四）在敌后国民党统治的力量比较薄弱，甚至于有的地方国民党力量统治不到的，国民党军队很少，有的也是地方武装，国民党统治与日本帝国主义有严重的矛盾。

（五）敌后的民众受日寇的蹂躏，所以群众有武装自卫的要求，抗日成为神圣的事业，打汉奸人人都赞成的。

（六）敌后情况变化迅速，不要呆板看法。

在一切敌人后方都有这些共同的特点。所以，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就可以在敌人后方，拿起枪杆子打日本，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新的抗日武装。这种可能性，就产生了不要经过国民党正式的允许。这种情况，在各个敌后都存在，没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华北可以搞，华中也可以搞。但有些人说，在华北可以建立政权，华中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对，现在各个敌后都有这种可能性，共产党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在一切敌人后方利用这种可能性，干起来。华南、华中一样可以造成华北的局面。因为，这里和华北同样的，国民党政权被敌人推翻，那么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把它恢复起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合乎民族利益的，对抗日、对统一战线有帮助的。有人说：国民党没有允许我们建立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怎么可以搞呢？虽然他不批准，但我们还是搞，我们还是可以存在，也不会破坏统一战线。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这是全世界历史上千载难逢的事。这种可能性，只有现在中国抗日阶段才会产生。这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如果历史再往前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这种可能性也许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共产党的领袖、革命家、政治家应该看重这种机会，即刻抓住这种机会，尽可能利用它，不要放过了；否则，你要受着历史给你的惩罚。错过了这个历史给你的机会，再来挽救已来不及，必须要经过一个长的时间，你才能挽救过来，而且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一次皖南事变就是历史的惩罚。

这是在抗战后，我们应确定的工作方式。过去，我们党中央都是这样来确定的，而且是这样做的，但还有些党内同志，以至于我们党内的负责同志，他们对这问题就没有全部的了解，也没有这样去做。

这就是我的绪论。

第二部分　抗战前后华北工作经验基本总结

我在华北工作三年。一九三五年冬天受命到华北，那时正当一二九运动后，即抗战爆发，我党召开六中全会，一直到武汉失守。我分两部分来讲。

一、抗战前

（一）抗战前，华北是白色区，我们共产党在白色区的环境中，进行了十年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失败的。做了十年的白色区的党，大部分破坏了，只保存华北一部分的组织，还有河北一个省委存在，以及若干的党组织和若干的干部保存。但有没有成绩呢？十年白区工作，坚持了党的旗帜，同时保存了共产党光荣的革命传统，共产党员英勇的坚决的为党奋斗，这些都是白区党的成绩。党的组织主要是保存在红军里，比如，今天在坐的同志，也多半是红军中出来的。当然，白区党组织是应当保存的，但没有保存。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我们在白区党工作，没有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清楚，过左的错误，也就是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我到华北去的时候，党的组织中、干部中，还保存了严重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这是我到华北时候的一般情况。

（二）一九三五年，我到华北，正当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学生的抗日运动以北平为主导，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情形很迫切，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学生，发生了广泛的抗日运动。那时，在全国人民中，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保卫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迫近，华北有被占领的危险，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特殊化。当此时中国共产党正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党的八一宣言以及十二月决议，都前后发表了。那时候，我就带了统一战线这个东西，到华北去执行，开始到天津。当时阻碍统一战线的政策执行是什么呢？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党内的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的最坏的表现。在全党与一切人都是抱定不合作的，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否认策略的退却与防御，更否认马列主义内没有合作的字眼，这就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如果当时不在党内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那么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不能执行的。这是当我到华北后的情形。

（三）那时党在华北应提出什么任务与方针呢？

1、准备建立群众武装，保卫华北（北平、天津）。

2、达到保卫平津的任务，必须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要建立统一战线，首先要在党内肃清立三路线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残余。

4、当时党处在秘密的环境下进行工作，但又要与人家进行合作。因此必须正确的配合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以及正确的配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同时必须在群众工作中以及军队工作中，进行顽强执拗的工作。

当时党的工作方针这样确定了，而且正确的做了这些工作，正确的进行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在刊物上写文章，各方面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号召保卫华北的斗争。在党内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残余斗争，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划分，在军队中也进行了一些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了一年多这样的工作，获得了一些成绩，组织了学生联合会以及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联合会，同时各地建立党的组织。在这些工作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华北的空前成绩。

二、在抗战以后

（一）芦沟桥事变发生了以后，我党的方针和口号是怎样？

党在那时提出，为保卫平津而流最后一点血的口号，并与平津军政当局共同协商保卫平津问题，提议组织城防委员会，这是抗战后我党的方针和口号。

（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平津，当时中国军队在平津附近还有几十万，所以看形势还有反攻平津的可能。因此我党的方针和口号，由保卫平津变成为收复平津而流最后的一点

血，立即我党进行武装斗争，以武装暴动来配合反攻平津的军事行动。因此，我党确定以武装起义为中心任务，而且确定武装起义的时期是在中国军队反攻取得胜利的时候，否则是不成功的。因为我们收复平津主要的力量，不是平津起义的力量，而是反攻平津的军队，因此必须在中国军队决定胜负的关头，才能暴动。以后这个方针没有实现，平津被日寇占领，平津不能立足，即迅速的撤退。当然，在撤退时秩序很混乱，但统统都走出来了。那时，我党内发生一种反逃跑的口号，这是错误的。我们在那种情况下，不但不能反对逃跑，而且应该领导逃跑，组织逃跑。所以有些人讲，这是由于他不懂得辩证法。的确的，他不懂得逃跑在当时是正确的行动。

这是在全国抗战还没有确定，但平津已被敌人占领时我党的方针。

（三）日寇开始向中国进攻，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全国确定了抗战形势，收复平津的可能性也没有了。这时我党的方针和口号是什么？

坚持平津的长期秘密工作，保存自己的力量，等待时机，将来收复平津时，进行武装起义，以响应全国的反攻。同时，确定平津党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乡村的游击战，城市党要服从乡村的武装斗争，平津城市的干部撤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打游击，建立游击根据地。

在华北其他地方敌人未占领地区，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同时准备游击战。在保定、太原、平汉路、正太路工业区这些地方，有被敌人占领的可能。因此党确定短期工作任务，只作二、三月的工作计划，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中，工人们尽量放手活动，反正二、三月后敌人就要占领，在这个时候也不怕开除，所以在二、三月中，我们获得很大的成绩。

这是在日寇开始向中国进攻时，我党的工作方针和口号。

（四）敌人占领了保定、平型关、雁门关后，太原危急，那时我们提出保卫太原的口号，但在保卫太原的口号上发生了争论。首先说到我们提出保卫太原的口号是怎样提出的呢？

1、保卫太原很重要；

2、我们也告诉群众太原是保不住的，一定要被敌人占领。

太原既保不住为什么要保卫太原呢？当时争论就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答复，太原保不住也要保卫。从什么观点上来保卫呢？

（1）延长时间，在我们手中，使敌人不马上占领，这对于我们抗战是有帮助的，同时对我们发展游击战也是有好处。

（2）为了消耗敌人。

（3）为了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准备游击战。

（4）为了发扬民族的精神。

我们站在这个观点上来保卫太原，即使保不住也要保卫，所以我们也不是死守。

3、我们共产党不在太原来保卫太原，在太原乡村附近打游击来保卫太原。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又有许多人反对，共产党既然要号召群众保卫太原，那么共产党就应该自己在城市中来进行保卫，否则不是说风凉话吗？但有许多人不了解，当时我们在太原没有兵，那么我们只能在城里做慰劳工作，当伕子；如果我们在太原乡村附近发动游击战，真正能控制敌人，这个意义不是更大吗？所以我们共产党不在太原城里来保卫太原。

4、华北最后一个城市太原也失守了，整个华北将沦陷在敌手。在这个时期，我党的方针和口号是什么？

太原失守后，华北走上游击战阶段，确定了我们中心的任务是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与组织游击战，党员军事化，党员到游击队中去。在这个时期，那一个人逃避了这个任务，就不是共产党员。

决定游击战不是简单的问题，首先在原则上来决定：

（1）游击战争在战略上、战术上怎样打法，当时我们出版游击战的小册子，公开讲解游击战，每次总有上千人来听讲。

（2）游击战的政策问题，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建立根据地以及财政经济劳动政策，这些都出版小册子。

（3）游击队组织问题，人民武装及人民自卫队的组织问题，我们颁布了游击队的编制和自卫队的条例。

（4）干部问题。由八路军的干部参加一部分，同时我们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5）部队区分问题。太原失守后，国民党走了，那么我们八路军在那地区自己分配部队，担负那地区的游击战的任务。

由于我们在领导上、计划上、原则上各方面都准备好了，所以我们全党当然都知道怎样办法，共产党员都有把握，所以工作进行得很快。冀察晋那地区，很快就成立边区政府，县长也委任了。同时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的枪杆子到处掉，县长逃跑，因此国民党威信大降低，于是全华北的人民认为救他的命的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大家都找来了，到处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去，所以干部太感缺乏，不够分配，那时我们就迅速的训练干部，同时党的领导机关华北局，所有技术工作同志，都放出去，只剩我们几个负责的人。并且我们在城市里——保定、石家庄动员了许多抗日的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要他们到家乡组织游击队，虽然他们不会打游击，只要他们把人组织好，枪杆子集中，等八路军来把人和枪送给它，就完事。同时，有些工人积极组织工人自卫队，在同蒲路、正太路都有工人自卫队。当时广大的学生工人，这些人都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华北失守没有很久，八路军就发展了二、三十万。

除此以外我党主要干部北方局的负责人，都分开每一个区。那时建立地方党，建立群众团体，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就组织一个县委，首先搞头，慢慢的再去发展党员，成立支部。组织群众团体也是同样，找十几个学生，找一个房子，贴一个招牌，某某县农民救国会。因此，在很短时间内，群众团体有了，党的组织也有了，游击队也有，政府也有了，整套都齐备了。有了这些东西，老百姓惊慌的情绪，就可以把它收拾起来。

最后，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退守黄河以南，县长走了，山西的旧派也走了，新派从此活跃起来。当时我们的工作抓住了中心，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方式，因此工作得到迅速的发展，八路军不久就成为华北抗日主力，抗日民主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不到三、四月的时间，造成了一个新的华北。

在几个月后，国民党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大大的搞起来，它知道华北这地方还可以去，后来有鹿钟麟去了，但群众不赞成他，顽固派一定要去，于是就发生磨擦，以至于他派了军队来进攻我们。

当时我们为什么能获得那样的成绩？当然完全由于我们抢先了。这就是在历史发生了特殊机会的时候，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有人说这是混水摸鱼，为什么有鱼摸还不去摸呢？这些英雄好汉不要在混水里摸鱼，但他在清水里又没有本事摸到，结果还是挨饿。（全场大笑）

到六中全会以至武汉失守以后，华北发展的任务全部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巩固工作，另一方面开始发展华中，因此华北党不仅要巩固自己，而且还要援助华中的发展。

这是在抗战发生后一直到武汉失守，华北的整个工作情形。当时华北的形势发展很快，我党工作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方式，所以能跟上历史的发展，得到了一个伟大的成绩，造成一个新的华北。这完全是我们工作的创造成功，并不是它自己会生长起来。同样，在华南、华中一切敌后照这样去做，一定也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华南和华中。

华北还有一个工作，在历史上来讲，也是一个经验，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山西的新派与旧派的斗争。

在全国有好几个地方都进行过新派与旧派的斗争，但最后新派总遭受失败，只有山西的新派在斗争中得到胜利，因此值得我们来讲一讲。

（一）山西的新派是怎样形成起来的？

在山西有一部分自首分子，抗战后他们表现得很好，在那里活动，阎锡山他也知道自首分子共产党是不会要的，所以他就要来了。那么除这些人外，还有部分的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组成了新派。当绥远抗战时，山西吃紧，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学习共产党的办法，但不要共产党直接去做。当时新派工作很活跃，旧派表现毫无能力，以致在山西失守后，旧派逃走，阎锡山不得不更加信任新派。后来看见新派发展太快，不大好，心里恐慌起来，他又利用旧派打新派，结果旧派打垮，新派成功。

（二）阎锡山的本质以及我们的方针：

阎锡山的封建性很重，本质不太好，他所表现得进步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的，所以这种进步是暂时的一种假象。但暂时的进步，对抗战还是有帮助的。我们认为，新派与山西群众运动的发展，要发展到超过阎锡山所允许的程度。因为他有限度的进步，他并不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他也不能真正独立抗战到底。因此我们的方针：

1、与阎锡山合作抗日，进行群众运动中，必须随时警惕他们的反动。

2、他赞成群众运动，但有限度的，因此我决不能为他所限制，一定要有决心超过他的限制，有我们独立的方针，独立的办法、口号，尽可能的利用他合法的形式，避免去刺激他，但实质上要超过他的限制。

3、我党八路军在山西援助新派的发展，同时参加新派。新派对共产党是可靠的同盟者。

4、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之下，同旧派斗争。新派开始同旧派打，最后把旧派一下子打下去，旧派力量大大削弱，但新派还是拥护阎锡山，一直到现在。所以阎锡山有苦说不出，投降也不可能，而且受到国民党的处罚。

由于我们当时采取了这些方针，同时又有八路军的援助，所以新派最后成功。

现在山西的新派武装中，有一部分党的工作，但还是用他们的番号，如果我们把新派的武装改编为八路军，这是不对的。这是华北工作经验基本的总结。

第三部分　华中工作经验基本总结

当六中全会以及武汉失守后，中原局组织起来了，至今已经有两年零七个月。中原局以

前是长江局，现在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

我是在六中全会上接受了来华中的任务，正当中原局成立的时候，所以我到华中已有二年零七个月。在这个时间当中，我曾回延安一次，住了半年，实际上我只做了一年多的工作。

一、抗战前华中的工作

抗战前，党的秘密组织大部分被破坏，仅留下河南省委有几个党员，徐州有一个特委，竹沟还保存了党的组织，有一部分武装就是五支队的前身。鄂东有一个游击队由高敬亭领导，为四支队前身，当时已多年脱离党，独立搞一套。此外，上海还有党组织，以及汉口也有党的支部和学生青年的组织。同时，最值得注意的在上海、汉口这些地方党的外围组织很多，比如文化界工作就很好。另一方面，在南方有老苏区是自己的阵地。从这个基础上组织了新四军。

这是抗战前我所知道的一般情形。

二、抗战以后到武汉失守

从抗战后，华中党在长江局以及东南局指导之下，一般的是执行了党的总方针。在这里抗日，搞统一战线，发展群众运动，因此得到了一些成绩。但在执行总的路线中，我认为有些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个别的，而是有原则性的。因此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所要求的以至于客观上所能达到的成绩。

抗战发生，接着上海战争也爆发了，南京失守，以至于武汉失守。这时候，国共两党已进行合作，党取得合法的地位，群众有广泛的发动，国民党军队都溃散了，枪支掉得到处都是，我们八路军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拾起这些枪。在这时期党的工作方针，所采取的工作方式，有许多地方是不明确的，或者是犯了总的路线的错误。

那些地方没有搞明白呢？

（一）没有了解在抗战以后，我们要取得地位，就要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有些地方党部没有大的变动，工作方针还是和以前一样，写文章、慰劳伤兵、出刊物、援助其他部队为满足，不知道自己独立组织队伍，领导抗战。因此也不重视敌后的工作，仍旧重视城市，突击工作方向不是放在敌后乡村中，大部分都是在武汉、九江、上海大城市里面。所以广大的敌后没有工作基础。同时，在城市以及工业地区，也没有象华北一样，定出短期突击工作计划，仍旧是作长久打算，所以当时工作计划离开了时间性。

对武装斗争认识不够，认为人家不赞成的事就不敢做，甚至于怕承认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自己不敢建立独立的武装，以为这样一来就破坏了统一战线；并且强调华中的特殊条件，认为在华北可以这样做，在华中、华南不可能这样做。但他就不知道，只有建立了独立的根据地及武装，统一战线才有保证。也没有了解，在芦沟桥事件以后，必须用枪杆子去抵抗日本的进攻，游行示威、写文章已不发生效用。

有人说华中、华南不能搞根据地、搞自己的武装，因为这里没有八路军，只有新四军。新四军没有八路军大，这是事实；但并不一定要有八路军或新四军才能建立我党的独立武装。比如在山东八路军没有去一个兵，还是可以创造出八路军。当时只有一些民族先锋队员在那里组织，搞了几个支部，后来徐向前去那里当司令。所以哪个人说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地方，就不能组织八路军、新四军，这完全是不对的。

一般人懂得，在抗战以后，党的工作任务、工作方针、中国斗争形势改变了。但是在我们主观上思想上还没有了解，反应不清楚，更没有把它贯彻到工作中去。因此在工作中发生

了错误，以至于不能达到一定的工作成绩。

（二）工作中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不能以历史发展的快慢来改变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说，当历史发展得快的时候，不能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来解决在革命中已经成熟的各种任务，以至于丧失时机，让历史急速的发展，他自己落在历史的后面。有的他仅满足于他现有的成绩，保持秘密时代的工作作风。

我到华中后，在四支队这地方发现当时四支队的同志中，有一种挨打的观念。时时刻刻准备人家来打我们，但我们就没有想到怎样打人家。那时期，时局逆转，磨擦来了，国民党有投降的可能，国内发生投降的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知道怎样办，也没有想到人家打我，我怎样办，我怎样站在主动去推动人家克服投降。他总想在人家打的时候，他就要往那个山上一钻，打游击。他不想打游击，是迫不得已的，可以不打游击为什么一定要打游击？能够搞几个根据地，安安稳稳住起来，为什么不好呢？假使投降发生，我们仅仅提出坚持游击战的任务，但我们的力量不高于投降派，那么你不但不能克服投降派，相反投降派要克服你。那么，你打游击，投降派还是克服不了，又有什么游击可打？从这里表现出，某些地方没有全面的观点，他想搞了武装为什么又要搞政权？他认为搞一样就够了。这种挨打的观点也是表现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没有认识清楚。

（三）在统一战线中不了解保存自己的独立性。

在统一战线中，忘记自己的发展、建立武装、政权、根据地，忘记了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对同盟者的害怕，将就国民党蒋介石，害怕蒋介石、国民党不高兴。但国民党又是一个最不能满足的，他要你什么事都不做。如果跟他的意思来做，那么什么事都不能做，最后还是非投降不可，别无办法。蒋介石就是希望你们共产党取消，他是最高兴的。所以愈退让，他的神气愈足，结果无原则的退让到连自己的根据地也要退出来了，不能发展或做他的苦力，这是国民党高兴的事。过去我们许多同志不善于用各种不同的办法、不同的态度，对付各种不同的同盟者。

同盟者有几种，有的拥护我们，真正与我合作；有的不愿与我合作，打我们，同我们发生磨擦；有的相互利用。那么，我们的态度，也要用各种不同的态度。现在他们即使不愿跟我们合作，但在他没有公开投敌前，还是同盟者。人家不诚心诚意，我们也要不诚心诚意；人家要利用我们，我们也要利用他；人家给我们磨擦，我们也要给他反磨擦。如果对一切都是同样态度，都表示诚心诚意，那么这就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华中的工作，正是犯了这个错误，所以不能获得华北那样大的成绩，并不是华中不是华北，就搞不出那套，主要是自己工作中犯了错误，使华中的敌后发展上受到阻碍。

谈一谈过去对桂军的方针：

桂系与阎锡山是相类似的东西，也是资产阶级里面最落后的一部分，本质很坏，进步的表现是暂时的，一种假象，本质的反面。但在当时对于这一点没有认识清楚，以为桂系的进步是真实的表现，因此在大别山我们不坚持自己的根据地，去帮助桂系坚持大别山的工作。结果在时局逆转时，他就反动了，暴露了他的本质，最后使我们工作瓦解，自己才认为上了当，做了尾巴，还不了解为什么上了当，做了人家的苦力。所以，当时对桂系的办法，没有照着对山西的新派的办法一样，自己搞独立军队，超过他的限度，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他反动。如果是这样去做，一定不会上当。

过去，在华中的工作中，对同盟者的态度不明确，甚至于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人家不允

许的事就不敢去做，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人家不允许我做，是不是可以做呢？可以的，而且干了以后，并不一定就破坏统一战线；相反的，去一味迁就人家，结果还是破坏了统一战线，影响到工作不能发展。

此外，对华中、华南工作团与工作队的问题：

在华中、华南到处都有工作队与工作团这东西，把这个工作作为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主要方式，一切工作都交给工作团去做，干部也都集中在工作团里面，这种方式是不对的。在某种情况下，为了取得合法的地位，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但决不能把一切工作都经过工作团、政工队来进行。

这是武汉失守以前的情况下，工作中一些经验教训。

三、武汉失守后一直到现在

中共六中全会检查了全国的工作，规定了创造华中敌后根据地的任务，武汉失守时，组织了中原局（注：原文为华中局），当时以发展为中心工作任务。

为什么要发展呢？在武汉失守以前，我们没有在敌人后方发展，工作很弱；同时，在失守以后，各种情况与华北不相同。国民党在华北有了经验，当敌人占领后，他们也没有完全退出。因此在敌后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外，还有许多地方基本上被国民党所统治，而且我们力量很薄弱，到后来敌后秩序相当恢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来发展，各种条件与华北已不相同。所谓华中、华南不是华北，基本不同地方就是在这里。

当中原局（注：原文为华中局）成立，我刚到华中的时候，也有一个地方失着，以至于后来影响到工作的发展。在武汉失守后，估计到敌人马上要进攻洛阳、西安，在河南我们作准备敌人进攻的工作，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切都准备好。但等了一年多的时候，敌人还不来，后来才发现敌人在最近不会进攻洛阳的可能。因此即刻转变计划，把主力放在敌后去发展，于是确定到苏北、到皖东去发展工作。当然，到这个时候来发展苏北，已经相当迟了。但还没有把这个机会最后丧失，后来仍旧挽救过来了。这些事实有很多的，如盐城群众工作的成绩。当然这些工作，应该在抗战第一年就要搞好，但等到抗战第四年才来做，力气一定要化费很大，不能达到应有的成绩，时间又慢。这完全由于在应该把工作做好的时候而没有做。

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一般的采取什么办法，现在我们发现有三种具体的方式：

（一）冀察晋那种办法，由上而下的方式：

在敌人占领太原后，国民党都走了，只剩下两个县长。当时我们到那里去，他们要求我们帮助他。因此我们就要利用这两个县长召集了党政军人二十七个大讨论，在这个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组织冀察晋边区政府，并打电报给蒋介石、阎锡山马上批准。这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方式。

（二）山西式：在阎锡山的地方与阎合作，特别是跟阎锡山的新派合作，利用他进步的一面，与他商量建立根据地。

（三）华中、华南的方式：这地方顽固派占优势，要它来建立根据地它不来，最后就只有斗争。那么，我们就是在长期和敌人与顽固派的斗争磨擦中发展自己，最后把根据地建立。这种办法，就是二句话：独立自主的实行三民主义，抵抗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华中、华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原来在华中、华南我们力量不大，只有四、五支队，但只要有队伍，多少有些作用，在有队伍的地方，我们就占优势，那怕是一个团，住一个村子，这一个村子就是归我们统治，

那么我们就可以独立自主的实行三民主义。比如，开始的时候，有些队伍在皖东，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这个地方实行三民主义，组织我们的群众团体，搞我们抗日的一套，减租减息。那些自称为三民主义者不赞成，他要来干涉，我们同他们讲道理，因为我们做的是合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理的遗嘱，是有道理的。我们并不因为他们的干涉而不敢做，相反的我们大胆的放手搞我们的。结果，他没有办法，只好让我们搞，或者是他不允许我们搞，派兵来干涉我们，那么就实行自卫，抵抗他们武装干涉，把他打垮。比如黄桥战斗就是这样的情形。在皖东，李先念那里都是同样的。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有利有节的磨擦，把顽固派打垮，最后我们获得成功，创造了华中的根据地。所以我们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胜利的。我们的武装发展了，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党发展了，民众运动也发展了，干部的斗争经验能力也提高了。现在可以说，华中、华南的敌人后方不受国民党的势力所控制了，形势已经改变，我们的势力转为优势；同时在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已取得联系，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一般来讲，六中全会给我们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发展，我们准备在几年中间，至少要组织三、四百万基本群众，一、二百万的武装自卫队，巩固我们的根据地。

最近，敌人又有向西安、洛阳、云南进攻的可能，华中还有新形势的到来，但我们的任务不会怎样改变。

今天，一般讲我们在敌后虽然没有最后站稳我们的足，但有人说，把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赶出去，这件事还是不容易的。汤恩伯三十万大军想到华中来赶走我们，走到门口就打转身。因此，现在可以确定，最后立稳足的还是我们。

现在各方面还没有统一，只要一个统一的军部，群众团体、政府都不统一，最近要做这几个工作。

（一）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机关。

（二）建立一个教育部，发展文化事业。

（三）统一的财政经济部。

除这些工作以外，扩大部队，整训部队，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从各方面都搞好，把这个地区变成一个抗日民主地区，对全国的抗日民主化的建设将有伟大的推动作用。也可以说，这个地方巩固了并且与华北联系起来，那么一定可以克服投降，保证将来中国革命的胜利。

总之，从华北、华中的工作经验中告诉我们，到任何一个工作环境中去担负任何一个工作，你一定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能具体确定党的工作方针、口号以及斗争方式，否则你就不能独立的工作。

第四部分　项袁两同志的错误

项袁两个同志在统一战线中丧失了独立性，对武装斗争不了解，以后华中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把这个错误纠正，所以当武汉失守后，发展华中的任务完成了。

项袁两个同志一直坚持错误不改变，所以皖南部队没有发展，以至于到最后受到很大的损失。

项袁两同志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们在政治原则上，基本方针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

义的错误，并且发展到离开党的路线，和党中央对抗，以致于遭受到这样的损失。

皖南事变为什么发生的？

（一）亲日派和反共派的阴谋消灭新四军。

（二）项袁领导的错误。假使仅仅是亲日派和反共派的阴谋，我们有正确的领导，那么皖南事变也不至于发生。

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指导有这几点：

（一）他不敢于向敌后发展，因为那地方有敌人，他害怕日本人。本来，在二年多以前，六中全会的时候，中央指示皖南新四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后来，周恩来同志到皖南，也是确定了这个方针。但他们不赞成，另外有一个南进的方针，黄山、天目山的计划，他一贯来强调华中的特点，不能建立根据地，不能独立的实行三民主义。在抗战以后，他们在一切问题上都犯了错误。

（二）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对国民党无原则的退让，特别在政治工作中，对部队的教育，拿国民党的理论、国民党的领袖讲演辞来教育部队，失掉共产党的独立性，共产主义的教育在部队中偷偷摸摸的进行。

（三）项袁有意违抗中央指示和路线，对中央不尊重，后来发展到完全不正常的程度。再加上这个人的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很厉害，对叶挺同志不尊重，对中央派去的饶漱石同志不尊重，甚至于把东南局属于在政治部民运部下面。他要领导人家，但他自己不受中央领导。对下级干部压制，有不对就骂得一踏糊涂。对于最好干部，扣留在皖南，没有事做；在江北，事情多，没有人做，他完全不管，干部看为他的人。

对中央采取两面派的办法，实际上他不愿意北移，尽可能拖延时间，在路上犹疑不决，向南走，实行他的南进政策。

（四）在北移中错误。一年多以前与顽固派磨擦的时候要北移，他老是不愿意，不移，结果在北移中找着歧路，走到茂林，不前进，自己犹疑不决，又不听叶挺同志的指挥，自己又不能指挥，到最危险的时候自己溜之乎也，开了小差，最后暴露了他的真象，一直到皖南事变以后，至今不报告消息。如果他想脱离党打游击，那么他最后一定会失败，以至于他自己被消灭。

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新四军问题有一个通告（从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三年以来，项英同志一直与中央发生争论，在他刚下山的时候，到南昌省党部纪念周上的演辞中，中央就觉得他开始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来经中央指出批评，他虽接受了，但他用两面派的办法对付中央。

皖南事变后，我们受了损失，另方面使我们在全国反共的高潮造成了我们向顽固派在政治上进攻的条件。皖南事变后，党中央以及我全党以强硬的态度提出抗议，把皖南事变成为打击顽固派、孤立资产阶级一个充分的理由，向它进攻，因此引起了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的变化，而且使资产阶级更孤立起来了。最近形势的发展，敌人进攻洛阳、西安，可能影响到国内形势的好转。

在这次事件中，皖南干部一般表现很英勇，最后突围到我们这里。皖南事件对我们的干部正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这个事件发生后，虽然在皖南的部队受到一部分损失，但并没有引起其他地方更多的损失，由于我党已相当的坚强，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党。

皖南事变给我们的教训：

（一）要学习在复杂的情况之下，根据形势的变化能具体的确定工作的方针，抓住中心。

（二）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保存，是统一性和斗争性两方面的统一。要懂得在统一战线中与同盟者的斗争，但不是斗争到不要统一战线。

（三）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学习。个人英雄主义，不执行党的方针，最后走上失败。在我们部队中，有些同志把队伍看成是他自己的队伍，干部也认为是他的。项英在最后就是发展到这样的情形，把一切都看为是他个人的，不执行党的决议。

（四）要严肃党的阵容，反对那些不服从党的分配，自己以为了不起的人，把党的指示随意不尊重。

在这次事变中，一般干部表现很好。但有些同志在政治上动摇，甚至于投降国民党；也有的回家去了；有的干部中相互帮助的精神很差；有些人钱比较多，在皖南山中饿了几天肚子，到了上海就大吃大喝，这完全表现我们同志到富贵的环境下，不能自主，真正做到贫穷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这种人还很少。这一次有些同志用钱过多，几十块钱、几百块以至于几千块的都有，这也是一种不好现象，我们应该批评的。

还有些同志跟项英一同走的，当然这一次离开部队走，由他们来负责，走了一、二天后知道离开部队这是不对的，但并没有表示反对。共产党员应该在任何环境之下是拥护真理的，决不能因为项英要你走，你就走了，如果项英要离开革命，你也离开革命吗？在这里也说明了我们一个同志，应该在任何环境下有独立自主的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都是从皖南事变中得出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学习这些教训，使我们不再重复犯这种错误。

陈毅在皖南事变问题高干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

我过去是新四军军分会的副会记，但不常到皖南去，实际上我只负责领导整个苏南工作。不过我对皖南事变所造成的原因和项袁错误的经过，我知道更多，我想分四部分来讲。

一、我对刘少奇，饶漱石两同志的报告讲几句话。

二、以实际的材料补充这两位同志的报告。

三、皖南部队出动之后。

四、我们应该认识的经验教训。

第一部分　对于刘少奇、饶漱石两同志的报告讲几句话

在我个人来说，对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有这样的了解：从抗战爆发的整个历史时期，在华北灵活的估计了形势，而且估计都是很正确的，能够把整个历史行程的转捩点抓住。我想，这完全是一种革命领导的艺术，也是马列主义实际运用最精彩的一页，应该成为抗战历史上以及我党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页。

我们有许多同志，在他个人担负独立的领导时，他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对时机估计不正确。现在已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与共产党、日本人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斗争，已到停滞状态，相持阶段。华中是已经巩固起来，国民党对于华中的进攻被迫停止。当然我们不能讲历史会照样重复，可是历史有新的大的飞跃，突然事变将来还有可能发生，必需要正确的执行中央的方针，深刻研究这两个报告，我们能够理解这些问题，对于以后应付时局的办法有很大的意义。现在我们拿地图翻开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太原、风陵渡这一线全部占领以外，华中来说敌人占领了津浦路地区，华南沿海地区以及在苏南泠欣所有地区，一直都可通到重庆，这一线还是在中国人手中，在华中淮南以西，津浦路以西还是中国的。如果敌人战略上有新的大规模的进展，以后仍在顽固派压迫之下，在这地区有没有办法建立大的游击区，组织地方武装，就看这地方党和军队领导的同志能不能利用这种机会，就看他对这形势的估计是不是能正确的估计，是不是能提出任务，过早过迟都是损失自己，过早不能把力量组织起来，过迟丧失时机，也难挽救过来，虽然立即纠正，也可以挽救，比如华中的发展就是没有抓住时机发展，以至于最后才挽救过来，成绩赶不上华北。我想，在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就是要体会这一点，同时说明项袁在新四军和东南局的领导，就可以从这个观点上了解他们的错误的根源，以及他们机会主义的生长，以至于形成最后三军复灭。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工作中的最大教训。

对饶漱石同志的报告我想到这几点：

一、表现他们到新四军以后对中央路线的执行的坚决性，同项袁作了最残酷的思想斗争。

二、值得我们注意，在包围中表示镇静不乱的坚定精神，最后给军长的指导帮助。

三、需要指出在他的报告中没有讲的。在他脱危以后，逃命中，到徽州屯溪找到党关系，到金华也找到党的关系，独立自主的布置工作，正确的估计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要采用强迫的手段进攻我东南局的党部；同时在皖变中，必然有叛变分子泄漏我们的秘密。如果没有这种布置，当时必然要受到一些损失，因为在新四军领导机关及东南局分散后，整个华南党失掉了领导中心，所以饶漱石同志这种行动有很大的作用。

饶漱石同志进行自我批评，觉得在当时进行公开斗争可能挽救。但我们认为他已经移动了，总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思想斗争没有最后展开，假使他没有行动，这个思想斗争一定公开，所以这仅仅是时间问题。

两位同志的报告，基本的精神在整个历史的时期党的路线上，党的组织原则上，检查项袁同志。他们在新四军领导东南局时期，不善于估计形势，不善于提出任务，不善于决定自己的方针，表现呆板性，机械性；同时中央指出后，他们不但坚持自己的意见，发展到以后成为一种右倾的行动，以至最后走到反党的程度。假使开始的时候，发现了错误，接受中央的劝告，以致纠正过来，我想他不会到这个地步，以致于危害党和军队。

在胡服同志到大别山以后，与项英原则的对立的非常尖锐，经过一个时期，采取不能容忍态度对付胡服同志。但中央以及胡服同志我们几个人，一再提出劝告，但他不纠正，以至最后必然的失败。所以项英机会主义的形成，经过三年的时间，但一开始中央就发觉了。在他下山时，南昌政府纪念周的演说，中央即指出项英对统一战线政策错误认识，虽然他接受中央的意见，但实际是反抗中央的意见，采取两面派的方式，对付中央反抗中央，以至遭受这样大的损失。这完全要他们负责。只要稍微有党的意识，都能够反省，能接受人家的批评，事情不会错误到这地步。

第二部分　以实际材料补充这两位同志的报告

准备成立的时候，分两个时期，南昌和岩寺集中的时期。

一、南昌时期　就是在芦沟桥爆发以后，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这时准备成立新四军，把南方游击队集中起来，出发抗战，那时国民党在十月十二日发表叶挺同志为军长的命令，一月成立军部。

南昌准备成立军部的时候，在第一个时期中有这几个问题：

（一）项英反抗谈判。当我们还住在山上时，一天，我看到一份新知识报，有朱庆引毛泽东同志关于国共合作三个条件的话，同时党的八一宣言也发表了，我们并不知道，仅仅是从这个文章上感到抗日的爆发，我党应该注意，但没有实际材料，不能明了统一战线怎样形成，苏维埃运动已结束。后来我会见项英时，我告诉他，我党的政策已变了，而且现在国民党军队也有欢迎我们下山的表示，在全国人民都有抗日的迫切要求，我们也可能派人去接头。当时项英不相信，他坚决反对。到芦沟桥事件还没有爆发前，五月底六月初，我马上就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党军队，表示我们可以谈判，但立即要停止进攻，是不是你们有诚意决定

撤兵，如决定，我们可以进行谈判。把这封信寄出后，项英知道了，他说这完全是机会主义，完全是个人活动，同我大闹了一下，他甚至于说我是无组织的行动。后来，过了几天，他们终于把兵撤了，于是项英又说，信还是可以写，但你不要这样说，称他勋鉴，称他兄弟，你这样写，完全是个人活动。最后谈判成功。

（二）项直到南昌继续谈判，他到南昌后发表著名机会主义演说，国民党用他这篇演说辞到外宣传，内容都是一套国共合作，共产党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拥护政府。中央看到这篇演辞，即刻就要他到延安讨论工作，指出他这完全是投降主义的论调，也就是他的投降主义的开端。本来在他未走前，我和他已经商议，我的意见，希望他们在南方各省停止进攻，我们停止打土豪，其他问题由延安解决，这次项拿着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去作宣传，不要多说什么话，因为我们对西北合作的问题还不清楚。可是项英到南昌后，在省政府扩大纪念周上的演说，并没有讲共产党的代表，声明共产党的立场。以后中央调他回延安，查明这问题，他还是不了解他的错误，并说中央不了解实际情况。

（三）害怕发展。南方各省以江西为中心进行谈判，他们答应我们统一游击队，并有经费给我们，允许在各地设立办事处，不进我们游击区捣乱，但事实上没有这样做。有一次，我亲自到省政府去吵了一下，表示我们的抗议，质问他合作的诚意是什么东西，我们所答应的都实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啦，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还是上山打游击去，你把我逮捕起来好了，他们实在太没道理。后来，项回南昌，他对我这种抗议的态度反对，又说我过左，易冲动，还是要我回到部队里去，不要到外面去接头。于是他在南昌弄了一部汽车，到处拜访，一直到后来，为南京失守，南昌吃紧，熊式辉很恐慌，因此他们对我们的要求都承认了。新四军成立，当时有许多青年学生要参加我们，但他又顾及到统一战线，不敢吸收这部分青年，并且一定说这些人是做特务工作的C.C，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大多数的青年都赶走了。

二、岩寺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也发生了两个争执的问题：

（一）发展问题：最初我到岩寺做了一些对外统一战线工作，并吸收了一部分青年做工作，立即成立了皖南特委。当时三战区就写信来干涉我们，以后任何宣传工作一定要得他们同意后才能进行，否则找陈毅责问。但我们的工作是不是不合乎建国纲领的原则，这种阻止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当时我想比较客气的复一个快邮代电，但项无论如何不要我复。他说：不要理这事算了吧。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新四军发展有严重的影响，然而项不敢提出提议。

（二）进军敌后发展问题：军队在岩寺集中后，项主张在岩寺整训二、三个月，他不愿立即进军敌后，并且他又顾及许多问题，没有决心部队深入敌后。当时有许多同志的意见，对部队立即出动到敌后，认为能够发展，而且毛泽东同志也明确提出只要大胆出去，正确利用统一战线政策，灵活使用游击战术，一定有发展。因为中央的指示来了，他没有办法坚持他个人意见，于是首先派一个先遣部队，组织四个连出击看一下再来。所以部队从三月初开始集中起，到四月完全集中好，一直到七月底才进入江南。首先是第一支队，十一月二支队才出动，实际上只有二个团进入敌后作战，二支队把傅秋涛、叶飞两部相合一个营。这完全表现他恐日病，不能正确估计政治力量，对部队出动没有把握，为此，失掉机会，假使三月份能迅速出去，整个发展的情形又不同，那么也可以赶上华北发展的情形。这就是第二时期岩寺集中表现出他的机会主义恐日病。

（三）苏南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七月间至八月战绩很大，九月就发现丹阳营梅游击队，并与这些小游击队统一。当时军部打算移高淳，一支队移扬中，但军部不愿移，于是第二支队与第一支队统一指挥。在那个时候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论江南抗战，与其驳斥对我们乱造谣言以及一些欺骗的宣传。这篇文章好久没有登，结果摘下一段最重要的，后来我质问编辑部为什么要删我的文章，朱镜我同志他告诉我，这不是他的意见，是项个人的主张，因此我与项吵了一次，质问他为什么个人任意把我的文章删去？如果不能登拿到军分会讨论也可以，项没有话讲。这完全表示他害怕磨擦，对内部自己的同志采取压迫手段，对外迁就。他完全与我们相反，我们对内在同志中很虚心，对党要服从，对同志尊重，但对外完全表示顽强性的态度，决不迁就人家。

在第一时期，新四军还是一般的发展，所以国民党对我们还不怎样注意我们。

第二时期形势紧张，华北磨擦又开展了，平江惨案发生，项英在这个时候提倡精兵主义，他对严重的时局毫无办法，口口声声只讲精兵主义，建军建军，优良传统，实际上是逃避。建军的大缺点是：

1、不在整个政治形势下以大发展来建军。

2、三战区张超是一个反共老手，他一针见血的说，新四军是“以质代量”。其实，不发展怎么会得到质的精，我当时即去信反对，向中央的建议……。

冷欣要我们新四军作阵地战，不作游击战。我与之争论三日三夜，公开指出这是要消灭新四军。冷最后还说，三天后要我们接受任务，我仍严辞拒绝。冷欣最后只好屈服，来电说这任务已交五十二师，请勿误会。而项来电说我不对，命令怎好不接受。我以冷欣回电拍给他，他没有答复。

以上是新四军军分会内的争论。后来叶飞来了，我们与中央直接通报，才不得不把中央指示给我们看了，以前是看不到的。后袁到苏南开干部会议，说到“不发展只有灭亡”。我指出不磨擦无以发展，非把冷欣、韩德勤，顾祝同、李品仙四顽磨倒二个不成，袁说“苏南方针不明确，我不同意”。

四月间，中央对新四军指示指出目前统一战线中不应再强调团结，而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特殊性，而应强调同一性。并尖锐指出，如果照新四军这样搞下去，会重复一九二七年机会主义的错误。我当时即指出，当时是要我传达苏南，我们在苏南遂执行坚决转变，项提出辞职，中央为爱护干部，只批评了他一顿，仍留职。

在这以前，我和项只进行了个别的争论，而没有进行有系统的，这是弱点。

这指示到后，我即向中央提出如何在苏南执行的问题，我即指出，向北发展。此后即与少奇直接通报了，此后方针上就没有什么大错误了。但过江以后，还丧失了一下时机。即在黄桥战斗后，没有放手做群众运动，放手扩大部队，放松了那时的秋收时机。其次是对外围军问题，手面不宽，还是很快就把他们改编了。这两点也相当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局面。这是江苏的工作。

大别山方面这里有一个特点，即是我们曾在那里有过十年内战，是我们的苏区。这个优良条件也因项的机会主义不曾抓住，以致到今天大别山还不是我们的地区。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搞掉的。我在一个会议上表扬他，项不赞成。对叶他是始终搞不好的。叶的问题、对卫生部与知识分子的问题，都是宗派观点，拒人于千里之外。

对东南局我参加会议很少，很少原则上的讨论。如果我们懂得华北的经验，随着敌人前进，那就局面不同。在江南失去时机。

在江北打了黄桥以后，项来几电要我分兵，分一部份到启东、海门。中央指示全国反共高潮可以终结，但仍指出不能放松警惕。因此，我坚不主分兵，还是要确保黄桥，准备作战。

总结起来项袁的机会主义错误有如下几点：

（一）对形势估计不对，坚持南进政策，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 西 计 划。这些计划，统统是建筑在敌人向安徽进攻的基础上的。结果就成了守株待兔，机械不灵活。少奇同志报告中指出华北的灵活，跟随形势提出口号。在河南曾等了半年，但日本不来，马上改变突击方向。而项袁则在皖南死等三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与机会主义的领导不同在此。项后来曾说，国民党逼来时他说突出去打游击，不承认①打游击是不得已；②到国民党后方打游击没有这条件，空想、唯心。

（二）提出口号是坚持江南，不向敌后去发展。要我去开会，说我身在江南心在江北，应该安心在江南；说中央要我们往北是准备，不是立刻去，所以要我不过江。我指出，中央原则上已确定我们往北，至于什么时候去，是看形势，灵活决定。

（三）活动方针不对——①所谓水鸟政策，两手在下抓东西，表面上看不出；②隐蔽政策——不拿共产党出来；③以民众团体代政权，创造国民党军队；④民运式的地方工作，不真正从组织上巩固。

所谓隐蔽政策，即是丧失党的独立性，掩盖党的面目。民运工作与地方工作混淆起来，以民运工作代替地方工作，这是江南工作不能大大发展的原因。民众组织和政权完全是两件事。

（四）对统一战线的了解是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失掉自己的立场，害怕磨擦。最基本的表现是把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不了解磨擦与统一战线的矛盾的统一。我那时是对冷欣采守势，对韩采攻势。他回电说，中央要我们有理有利有节与自卫。我指出这不能机械，在江北我如不占先着，一定会处失利地位，那时什么理、利、节都谈不到。在这里他一贯表示怕磨擦、迁就。

（五）对毛的三阶段的意见，认为毛是半失败主义，是不对的。这是项的名堂，这是项的谣言。

（六）个人英雄主义。项袁对个人地位的考虑最要紧。项是个伪君子，粉饰自己，他临事毫无决断，犹豫不定，胆小、害怕，“六神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这样把个人地位与面子看得重，及时接受中央与刘、饶的批评与斗争，还可挽救最后，他在皖南失败后不肯归队，也是怕丢面子。

这样思想意识是：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必然走上组织上反党。

袁国平同志特别是两面派，一方面与项英的机会主义狼狈为奸；一方面对中央采取两面派办法，结果，还是暴露了。不论如何粉饰，革命的发展会最后把他暴露出来。少奇同志指出的，有的对党忠实的同志，即使一时被误会，日久会被发现的。逃跑回来后，袁、周还企图向中央说明一切责任归项，这只是更显得丑。

机会主义的路线，不经过公开的斗争，是无法转变的。我是军分会副书记，虽然有过许多局部的争论，但没有系统的进行斗争，没有把它认识是一个路线的斗争，这是我理论修养不够，同时也是因为他是领导同志、副军长，不故意闹翻，这有些调和气味。如果很早就进

行原则上的斗争，也可以早些挽救，这对于个人是很大教训。

三、皖南撤退行动中的错误：

（一）无论如何不应走茂林，或走铜繁或走敌顽接合点，走茂林完全是自寻绝路。

（二）决心上的错误——皖南这样严重的局势下，根本不能依靠统一战线，只能依靠英勇冲击，而他在被围后，还讲交涉，不能下决心，以致大牺牲来冲。

（三）退回来完全是错误——这样多的人，这样大的兵团，根本不能往后转的。这是游击的方法，战略上完全错误。尤其是在这样严重的被包围的形势下，更是极大的错误。参谋处应该以这一次皖南的行军仔细研究，得出经验教训。

四、皖变对于我们新四军全体的教训：

（一）党性的问题——项违反中央，对中央诬蔑造谣，不服从中央，压制下面，因此造成失败。一师有文章讨论党性。

我以为，党性是一个共产党员在长期斗争中，表示其对党的忠实服从坚定性。革命有时低潮，有各种艰苦……在多变的环境中，保持不变，始终坚定，这就需要有极强的组织观念，始终把党放在第一位，在各种环境下，坚持共产主义的立场，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值得我们大家自我检查。

项有极大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对中央反抗，对下压制，对袁之类则收买。

（二）项历来常常造中央负责同志的谣言——三师皖变会议中指出，项坚持过去成见派别斗争，中伤中央负责同志的威信。中国革命的……

毛是例外天才，他在井岗山上就已有现在他的一套政治军事战略战术的理论轮廓，而后来，经过革命的实践，更加丰富。毛是找到中国革命的方向与道路的。项的造谣诬蔑，完全是不可容许的。中央对这事情的决议，是要服从中央，服从军委指挥。

（三）政委制度——皖变中项的逃跑，有的幼稚同志认为政委制度不对，应该一切由大家来讨论。这是错的。项是一个不好的政委，辜负了中央的重任。今天的新四军恰恰是要加强政委制度，政委是代表党，保证党的路线在军队中的执行的。项过去是家长制度，个人专断，是他个人的错误。今天新四军的政委少奇同志，采取了最大的民主，但仍须……

（四）还有一些同志以功臣自居，自高自大，自居特殊地位。我们应该尊重老干部，新干部应该向老干部学习。但老干部不应因此自居于特殊地位，相反应更加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

（五）项袁在这次行动中，对反扫荡反磨擦的战术的不同，不了解。

在我们黄桥战斗以后，告诉他们江南磨擦已不可免，他回电说他们在泾县。

胡服在干部会议上的总结*

（一九四一年五月）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开了四、五天，同志们发表了很多意见。这许多意见，一般来讲我都是同意的。在同志们的发言中间，没有一个人同情项袁两位的思想，大家一致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拥护中央的意见，在这个中间没有什么争论。因此，我的结论也就没有很多问题特别是要谈的。同时，同志们在发言中间，指出更多的事实证明中央的决定对项袁两位错误的指出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更多更充分的揭发了项袁的错误，教育了我们大家，教育了我们党，使我们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会议中间得到很多的帮助，使我们对于党的策略、路线，党的工作方针，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想这个会议一般进行得很好，可以说是很成功。不过在同志们讨论中间，在联系到我们本身，来改进我们今后工作的许多具体事实的联系还不很充分，所以我的结论也就想在这一方面多讲一些。

其次是项袁的错误总结和归纳起来有那几点呢？

一、我所了解的是这样：就是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对中国资产阶级认识不清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头的资产阶级，而这资产阶级是中国现社会的主人，它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它的革命性；同时也有它的动摇性、反动性。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不清楚的，而这个问题正是中国革命问题中间最重要的一个。中国共产党二十年来犯过许多错误，其中最主要的都是认识中国资产阶级以及应对它采取政策的失当。过去的陈独秀、李立三皆如是。正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就不了解中国的统一战线。从项袁的错误中间，完全可以证明他们对统一战线根本一窍不通。他们不了解中国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是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相矛盾相对抗的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建立的统一战线，不仅是正确的估计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同时还要正确估计除开这两个以外的许多中间阶层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影响。假如这些问题不研究清楚，不切实了解的话，那么在中国就没有法子正确的进行统一战线。项袁两位错误的基本点，也就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们正是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的重演（当然有它一九四〇年的特点，有时代的不同，但基本上是一样的）。依照项袁两位错误的了解，对国民党对资产阶级合作就等于投降，一切服从它。要末就不合作，打倒国民党，反对国民党。合作团结几个字，在项袁头脑中和投降的意义差不多是一样。他们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统一战线的方针虽然和国民党合作，同时还要保持自己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保持我们无产阶级，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正因为项袁所了解的公式是那样，所以在他们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前后事实贯串起来看，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事实。我记得在西安事变后，我们把蒋介石放了，全国搞起统一战线的消息从项英知道的时候起，他就

* 胡服即刘少奇同志。

表示怀疑，不相信，后来陈毅同志和国民党谈判，他就反对，根本不相信会有这回事，反对和国民党合作。因为他了解统一战线就是投降。后来他赞成合作了，他也就投降了，下山在南昌第一次讲演中间，就表示自己什么都不要了，一切服从于国民党，帮助国民党。他不知道，这个合作是我们党的一种政策，在合作中间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这样我们可以发展，还可以赚钱。他右倾的表现，还表现在不要党的旗帜。他无须乎要人要求，自己老老实实的把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旗帜收起来了。认为现在是国民党的旗帜，一打起共产党的旗帜，那就和国民党闹翻了。他不知道，共产党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抛弃自己的旗帜。过去我们红军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任何情况下我们旗帜是不放下的。又如过去白色区域，数十万党员被屠杀了，至死还是把共产党的旗帜打起来。为什么？老子是共产党呀！信仰共产主义，老子有独立的旗帜，独立的政治主张，有独立的路线，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共产党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放下这个旗帜，放弃这个旗帜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所谓不放弃我们党的旗帜，决不是李立三那样了解，党包括一切，混淆党和群众团体的区别性，不知道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独立性。群众团体也同样有它的独立性，因此也就把党的工作方式拿到群众团体使用，结果就行不通，象剃头一样干干净净。这毛病，一直到现在，我们群众工作同志还有不了解的。比如在政府工作，就跟在我们党内工作一样，这一套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这我们叫做公式主义，同一化，但这是错误的机械的。我们所讲的党的旗帜必须坚持，无论在任何时候，即使我们是秘密党员隐藏在各种机关，但是名义还是用党的名义，出版报纸、发表宣言还要保持我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决不是项英那样一答应跟国民党合作，一成立新四军时候起，就把党的旗帜自然放下了。这是重大的基本的错误。皖南搞了三、四年，新四军到底是什么军队，现在来讨论一下，叫了人家三、四年爸爸，我们到底是谁的儿子？项英讲，新四军是统一战线的队伍，统一战线就是新四军的爸爸。那我们说不是的，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共产党是我们的爸爸。现在为爸爸问题，到底那一个是我们的爸爸，还要讨论一下，当然是笑话。另方面在我们这里来讲，有个统一战线政府。在这个政府中间，我们是和其他各抗日阶级平分政权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样一个统一战线政府的领导权，必须保证一部分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很基本的问题。所以说政府虽然是统一战线政府，但是八路军新四军是党军，不能说是统一战线军队。当然军队是政权的一部分，但是新四军八路军这一部分恰恰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共产党才有资格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一部分，才能保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政府中间的一部分政权。同时，参加抗日民主政权不只是新四军八路军，也许还有其他抗日军队的参加，但是这些军队也不是统一战线的军队，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以我们说，新四军八路军虽是党军，是工农的队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部队，不管名义上有什么变更，但这一点是永远不变的。又有些人讲，我们新四军军长叶挺是非党员，所以我们是统一战线的军队。这样讲，也同样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当中有多数是非党员在工作，最近中央又来了一个指示，指出必须吸收多数的军事专家到我党军中工作，但是并不因他们都是非党员，就说我们不是党军了。一般来讲，我们新四军八路军里头党员到底占多少呢？我们说最高只有30％到40％，其余60％、七十、八十都是非党员，但是这30％的党员是我们部队的骨干，是我们部队里头的干部，是保证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以及命令等等的绝对执行者，所以叶军长是非党员，是不会影响我们党军的。很明白的，叶军长到新四军来不是做统一战线的，而我们对待叶军长也不能用统一战线的方式。我们认为，叶军长到新四军来任军长，他也一定想

保证这个军队执行共产党的命令，执行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决不会因叶军长来有任何妨碍，相反的叶军长是想尽一切方法来加强我们这军队的党化，一直到今天，他对共产党的一切没有不同意的地方。所以不应该只看事物的形式，不看实质；只看到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的非党员，而没有看到我们这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党员在八路军新四军是起着何等的作用，他起着决定的主导的作用。凡是起决定和主导作用的方面，就决定这事物的实质。质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质也是矛盾的一面，而是由矛盾主要方面决定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质，譬如我们拿苏联来讲，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社会中间资产阶级占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但是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无产阶级就成了决定和主导作用，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了。但是资产阶级并没有消灭，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也并没有消灭。新四军的实质，是由于里头有共产党员，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作用就是靠这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党员，而这些党员虽然在数量上来讲占少数，但是占重要的地位，因为确定新四军质的是共产党，是党员的实质，不是什么统一战线。

其次，有的同志讲，项袁在统一战线中间强调团结，放弃斗争的话，也许还有些毛病的地方。我想，统一战线这东西一方面是统一性，另一方面是斗争性，统一性与斗争性连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个的东西，就是统一战线。项袁就认为进行统一战线的时候，不需要进行斗争，在统一战线内部，是没有斗争的，斗争愈少，统一战线或者更好，斗争对统一战线是有害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如果要达到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保持、巩固、扩大和发展，非要经过斗争不可，没有斗争就没有统一战线。所以统一战线与斗争是分不开的，从它开始一直到最后的整个过程，都非有斗争不可。为什么？因为除开和国民党统一外，还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不斗争，就没有独立性。因为它是这几个阶级的包含。当然两个东西合并一起，就有磨擦，不磨擦不能称其为统一战线，所以这斗争是绝对的，不同的就是在统一战线发展阶段当中，某一时期应该强调统一性，而在另外一时期则应该强调斗争性，所以并不能说强调统一性统统是错的。中央指示项袁错误是说，他们在反共高潮时期仍强调统一性。我记得中央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时期，我们应该在统一战线中间强调斗争性，不应强调统一性，如果强调统一性就会造成重大的错误，就会成为二七年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个指示是发表了一个条件，就是“当着现在反共高潮这个时期应该强调斗争性”；相反的，不是反共高潮，而是反共低潮，那就要强调团结，强调统一性了。最近中央又有一个指示，指明日本现正向西安进攻，我们现在要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日本。所以，不能说在现时期共同抗日时期，强调团结是错误的。项袁的错误，中央指出：“目前反共高潮时期，不去强调斗争性，而去强调统一性，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错误的”。我们要弄清楚，要区别开来，统一战线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以时期的不同来确定应该强调那一面。为什么强调团结呀，因为共同抗日强调团结是对的。项袁的错误在于反共时期，他还是强调统一性而不强调斗争性，因此在统一战线中间变成右倾了。同志们，最后又讲，项袁在新四军强调进行统一战线教育，而不进行阶级教育，一直到后来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句话对不对呢？我想是有毛病的，讲得不对。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统一战线教育，应不应该强调，应不应该进行呢？应该的。在皖南那个时期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应该进行这种教育，特别是项袁需要学习的，因为他不了解统一战线，他没有受到统一战线的教育，所以他搞错了。这是第一。

其次，同志们讲项袁只进行统一战线教育，没有进行阶级教育。这样就把统一战线教育

和阶级教育对抗起来，好象不应该进行统一战线教育，而应该进行阶级教育，这也是错误的。阶级教育与统一战线教育不是对抗的东西，统一战线的教育，即是阶级教育的一部分，阶级教育同样包含统一战线教育。拿阶级教育来讲，在今天必须着重教育我们党员、无产阶级如何进行统一战线。所以，进行阶级教育也一定要进行统一战线教育。目前，中央指示要进行策略的教育，也就是统一战线教育。我们全党，整个阶级，必需根据这一指示着重讲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这一个统一战线，并不是别的统一战线，而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一种政策，是对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一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就是我们党我们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第二。

第三、关于统一战线教育问题，同志们提出反对项袁在政治工作中间向我们新四军部队进行那一套教育，反对在我们教材上面用蒋介石的话来教育我们的部队，指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教育我们部队，这是对的。但是，同志们错误的地方，是把名词安错了。拿袁国平的教育，叫统一战线的教育，是不对的。袁国平所进行的那一套，不叫统一战线教育，叫资产阶级教育，叫蒋介石的教育，那叫一塌糊涂，什么名字都可以，但决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教育，也可以把它叫作资产阶级麻痹群众的欺骗教育，因为蒋介石的话就是欺骗群众，真正统一战线教育，就是我们阶级教育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在执行和进行统一战线中间，采取什么方法、什么立场、什么态度，来与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各阶级合作，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样一个问题，才叫统一战线教育。统一战线教育包括我们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不变成投降。所以有许多同志发言中间，我发现这一点是错误的。假使这里有皖南同志，现在在抗大教统一战线，或者把皖南那一套统一战线的东西搬来的话，那要小心，重新审查，因为那一套完全不对，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非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没有独立性。有同志讲，项英、袁国平是资产阶级影响在我们新四军的传播者。蒋介石的一套就是如何欺骗群众，而袁国平就欺骗我们的新四军，欺骗我们的党，他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教育在我们部队里头、在我们党里头的执行者和散布者。

其次，项袁右倾的表现，他不了解发展进步势力，尤其是不发展我们新四军八路军共产党的势力；他不懂得要建立根据地，以及如何建立根据地。中央有许多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他也不传达，他认为建立根据地，发展进步势力，建立政权，就要破坏统一战线。他不了解进步势力的发展，根据地的建立，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对统一战线是有帮助的，而成为统一战线发展和巩固的保证。他们照蒋介石、李宗仁一样说法，统一战线为什么搞不好，就是因为共产党搞得太大了，所以要国共不磨擦，那只有八路军新四军不发展，如果合作更好些的话，取消更好。项袁也是这样的认识，共产党的势力一发展，就要吓退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就搞不好，就要破坏。他只看见一面，没有看到进步势力的发展，革命势力的发展，恰恰会使破坏统一战线的人不敢破坏统一战线，非跟我们合作不可。比如新四军八路军发展到华中，统一战线发展了，参政会、工会等等我们都开了。假使你打一个败仗，统一战线就搞不好，也不会有今天的形势，士绅也不会来拜会你。但是今天你不拜会我，老子就不会拜会你，统一战线还不是发展了。这里就证明着，自己没有力量就不能讲统一战线。项袁不懂得共产国际的指示"国民党和我们讲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来说是带强迫性质的"。就是说，不是自由恋爱，而是强迫的买卖婚姻。它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但是必须强迫它非跟我们合作不可。所以现在要巩固和国民党的合作，那你必须想法子强迫蒋介石、强迫国民党非跟老子合作不可，否则，是不可能的。怎样强迫它呢？首先，发展自己，老子把八路军、新四

军搞得大大的，你破坏不了；政治理由、政治口号都在我们这方面，孤立你，老子群众多，办法多，进步派统统赞成我们，甚至于你蒋介石的部队都赞成我们，赞成国共合作，不赞成剿共，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蒋就是心里不愿意合作，但结果他的行动会违背他自己的意旨。所以国共合作是带强迫性的，原来如此，以后还是如此。依照项袁了解，不发展自己，不发展进步势力，不建立根据地，就可以保持统一战线，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这样证明着。项英曾讲，皖南是统一战线模范区，全国都磨擦了，他那里没有起磨擦，但是最后破坏统一战线的是皖南。华北那样搞，没有把国共合作破坏，我们华中搞这样大的磨擦，没有破坏统一战线，独皖南一直让步的结果，把新四军的番号都取消了，使国共合作有了一个大的裂痕，搞得我们连参政会都不好参加了。所以，破坏统一战线恰恰是皖南，是由于让步投降的结果。老子华中把韩德勤打得一塌糊涂，但是国民党没有敢和我们分裂。所以说，破坏统一战线有两种：一种是过左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过分的斗争，可以破坏统一战线；另一种是过右的，这次皖南就是由于右倾的结果。因为你让步，所以国民党敢与你破裂，敢把你消灭。右倾同样会破坏统一战线（当然我们过分的搞放手磨擦也是不对的）。项袁的错误在于不发展自己，不要根据地。但是也不能说他不要，他在皖南建设的很多印刷厂、兵工厂、澡堂、花园搞得很好。但是他不要政权，他这种建设跟张学良一样，把满州铁路建设得很好，结果送给日本了。项袁的建设，是建设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里，他不知道要建设在我们根据地里，我们才能支配，才能指挥。

再次，项袁一切的事要合法，非法的事情不能做，而这个法律，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法律，是蒋介石手里的法律，他随意可以取消或增添。你要合法就是合国民党的法，就是服从蒋介石的意志，其中没有独立性，变成合法主义了。我们是反对合法主义的，但不是说合法的机会不利用，新四军是合法的，好不好呢？这合法对我们革命有帮助，我们要争取，要利用，但是不能让资产阶级法律限制我们的行动。如果你要把新四军八路军的行动限制在资产阶级法律范围内，那你就叫合法主义。合法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中的一种。我们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统治者的法律所限制，即是在反动地区，亦皆如此。有些时候我们要争取合法，使它能合法，因为合法对于我们有帮助。所以有合法运动与非法运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就是说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联系，就是整个的东西。一切要合法，就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就是没有独立性，就是取消革命。

再次项袁还强调这一点，他为什么要合法呢？他有几个道理，一个是皖南特点，一个是国共合作是不平等的，因为这不平等所以要服从国民党，因此不要独立性。这是他自己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因为国共合作在力量上不平等，历史地位上不平等，合法权利的不平等，所以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在这种不平等的具体情况下去跟资产阶级合作，去进行统一战线，那就更应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使这合法变成投降；否则，这独立性就不能保持，就很容易变成机会主义。所以这不平等的合法，非但不减弱我们对保持独立性的注意，相反的要更加加强我们的警惕性，来保持这合法中间的独立性。因为它有一个威力压制你放弃你的旗帜，如果不坚定，如果没有顽强性，独立性就坚持不了。也因为这合作的不平等，如果我们力量强过他，那个时候不独立也要独立。项英利用这不平等的合法来辩护他一切要合法、要做国民党的尾巴，这理由完全没有道理。如果在哲学上来讲，是机械论。我想这是讲项袁机会主义错误中间需要解释的几点。

还有同志讲，项袁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左倾。这是对的，左倾机会主义

和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就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不是两个东西。例如，右倾是这面，那左倾就是那一面，是两相矛盾的表现，但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项袁他在许多事实上虽然表现的是右倾；但在另外事情上面表现他完全是左倾的，这也恰恰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本质。比如，在开始谈判的时候，他不赞成合作，这是左倾的表现，但本质上是右倾的，因为他了解这个合作是投降，他有一个右倾的了解，所以他不赞成谈判。在其次，项袁一贯坚持一个右倾的东西，就是他坚持在皖南打游击。他就不懂得在目前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后方打游击的不可能。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后方打，在四川、在湖南、在黄山打游击都是不对的，是右倾，是不要统一战线，不要国共合作。而且在那个地方打游击，也一定要失败。因为，现在国民党是抗日的，在四川把游击打起来，那它就不能抗日，而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自然国共合作不可能了。另外，项袁有个南进政策，往国民党后方钻，打国民党的游击，这完全是左的。他企图把四、五支队调回皖南，做什么？准备跟国民党大磨擦，准备打大仗，准备不要统一战线，要么服从国民党，要么破裂，在国民党后方打游击。但是我们说在国民党后方打游击，必须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把国民党提起来，采取向他进攻的行动，而且还要有道理，否则就不好搞。项英一贯的一个思想完全是左的。他一下子完全服从国民党，一反过去就完全反对国民党，这是一个东西两面的表现。项英狭隘的关门主义多得很，同志们在报告中讲得很多，这都是“左”的东西，和他那些“右”的东西是两种相反的表现，一个东西的两种形式，某些事物上表现出来我们就叫左倾，另外一方面我们叫右倾，实质上是机会主义。项英说皖南有特点，皖南是有特点，那个地方是不是能建立根据地呢？不能建立根据地，不能象我们这地方一样搞，敌人后方是一条线，是难搞。同志们发言中间说，皖南没有特点，这也不对，皖南是有特点的，皖南是不能大发展的，不能搞很大群众，扩大军队，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坚持在那里搞，就要跟国民党起磨擦，否则就要过江北，第三条路是没有的。所以项英说皖南不能搞大名堂，华北、华中的一套不能实行，这是对的。不过他一贯是搞他那一套，什么都不管，连个区公所都不建立，让步一直让到人家杀我们的人都不管，这是错误的。我们中央的方针指出在皖南向国民党后方发展完全不可能，要破坏统一战线，南进也要不得，南进一定遭到失败，只有向北或是到苏南这两个地方走。屡次的电报都没有用，他还是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但这都是跟国民党破裂的东西，还有就是做到不发展，守兔守了三年，没有守到，结果守了个老虎来，把自己吃掉了。所以我们说，只有北进，只有向敌人后方发展的方针，才是正确的。同志们在发言中间好象是说，在皖南可以搞大名堂，可以大发展，这倒不是这样。问题的中心，是发展方向问题，在那种情况下，南进不可能就要北进。“守”对统一战线有基本原则上的错误，正因为不了解，所以结果弄得我们很孤立。孤立这个东西有两种，一个是光荣的孤立，另一种是可耻的孤立。光荣的孤立是拥护真理的，不同流合污，坚持自己的正气，虽然这个时候有几千几万人不赞成我，老子还是要拥护真理，这种是光荣的，有个时期，特别是共产党员需要有这种精神。我觉得，有些地方要提倡，因为常常一个真理出来，首先是由少数人发现的，而大多数人是在错误影响错误认识之下的。马克思开始出来的时期，没有什么人赞成，大家一致反对他，但是他坚持了他的独立的旗帜。列宁也是这样的，很久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占优势，列宁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是孤立的，但是不调和，就是这样办。这证明常常有些东西大多数是错误的，发现真理的只有几个人，这时候是孤立的，但是这种孤立是应该的，必须的，光荣的。他不怕孤立，他告诉群众以真理，不害怕真理，即使坚持真理要受到大的痛苦，宁可忍受不违背真理，这是一

种光荣的孤立。还有一种是可耻的孤立，就是自己错了，搞得乌七八糟，没有人睬你而孤立起来，这是可耻的。可耻的孤立，在政治上还有两种，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孤立，大家反对你，比如项英今天要来参加这个会，他一定是孤立的，这个孤立就不光荣，是机会主义的孤立。

其次，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有它的根源，今天在我们党内也许不会再有项英这样的错误，但是我们要警惕，今天表现在华中的是左的倾向，因此在目前反对项袁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间，在我们实际工作中间，特别要注意到反对左的。中央也这样指示出来，“目前在我们工作中间左倾危险是主要的，左倾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因为我们现在政权在手，枪杆在手，现在要怎样办就可以怎样办，有些同志以为自己了不起，不懂得这个中间包含着大的危险，就是自己孤立的危险，人家都反对我们，离开我们新四军八路军这几支枪杆子孤立起来，最后要受到人家的打击。现在在我们群众运动中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以及其他各种政策上，左的东西很多。这同样是不了解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目前抗战时期要进行统一战线，要很好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然后才能使我们无产阶级胜利发展。但进行统一战线与加强我们觉悟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共产党劳动者群众，要明白了解自己阶级的地位、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前途，要懂得如何和资产阶级及其他各阶级去进行统一战线。只有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才能前进，否则就不能前进，就要变成项英第二。也只有阶级立场站得更清楚，更明白，然后才能有更大的伸缩余地，来进行统一战线，才不会把自己的阶级性丧失。当然让点步也不要紧，比如农民减租问题，减得多是可以提高阶级觉悟，提高抗战积极性，能够更好进行统一战线，但是在统一战线环境中间，不能说少减一点，农民的积极性就丧失了，这是过左的东西。当然，不是说要我们对无产阶级、对劳苦群众进行阶级调和教育，相反的我们必须进行阶级教育，才可以正确的进行统一战线，才可以使过左的纠正，不然你纠正过左的，可以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我想这是项袁错误的第一点。

二、项袁的错误就是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是不正确的。

项袁第二个错误，就是对中国革命形势，抗战发展的革命形势，估计的是不正确的。正因为他们不能估计和判断时局，所以也就不能确定方针、提出任务、提出口号，不能根据马列主义原则来做这些事情，而搞的一塌糊涂。另外他们对中央的指示也不了确，自己坚持着错误。有人讲项英有恐日病，不敢向敌后发展，这是事实。他不相信敌人后方能够建立根据地，他更不懂得在目前抗日时期，当着国民党蒋介石还抗日的时候，国民党后方不能打游击。他以为目前的抗战和过去十年内战一样，国民党后方也一样打游击。他不懂得在国民党还没有投降以前，蒋介石还没有投降以前，反蒋的游击战争就不正确，就不能打。如果照项袁那样做，当然要提不同口号。也许将来有一天蒋介石投降了，在蒋介石的统治地区可以打游击了，但那也是反蒋的游击战争，而不是反国民党的，还是国共合作。不过现在蒋介石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实，还很难讲。准备反国民党的游击战争，是完全不对的。总而言之，目前要在国民党后方打游击，就是对形势的估计不了解不正确。正因为他估计的错误，所以他也不可能懂得在目前抗日战争时期，在目前的形势下面的革命斗争方式问题。我记得项英有一套东西，所谓第三种武装，民运式的地方工作，水鸟式的……在皖东地区他反对招兵买马，这话谁也不懂得，有钱买马为什么不买，有马不好吗？为什么要反对呢？拿马列主义来讲，完全是不科学的，我们看起来都要不得。有人讲，他用马克思的词句，但是我在马克思主义中间找不出这个东西，只有日本有一种水鸟式的外交，不是马克思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他根本不懂形势的转变、战略的转变，口号方式也都要随着转变。他不估计情况，皖南是否

能坚持？为什么要坚持，坚持的具体方法怎样，坚持的任务、坚持的前途如何，他不讲这些具体的东西，到后来皖南不坚持就什么都不要了，最后连一排人都带起走，也许项英把队伍看成是他自己的，所以自私自利。中央对这问题曾经指示过，我们也打了电报去要军部北移，留少数部队坚持皖南。但是他不相信，搞得干干净净。他说人家不了解皖南特点，实际上他对皖南特点就不了解。同志们看，皖南还有小游击队在那里坚持，曾希圣在那里搞，还不是搞政权，搞根据地。所以“皖南特点”这是项英反抗中央反党的一个主要借口，很多反党的人最初都是借口你不了解情况、特点等等为理由。李立三反共产国际，也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形。任何一个反党的人，他这一套总是有的，项英也不出例外。再所谓第三种武装，到底是什么第三种武装？我莫明其妙。也许他把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的部队叫做第三种武装，假如国民党部队叫第一种，那他新四军是统一战线部队是第二种，也许我们八路军是第三种武装了。假如统一战线部队叫第三种，那新四军也是统一战线部队，这就很难解释了。他具体的内容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武装也不是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的，但是以后又是共产党的，又是国民党。因此所谓第三种武装，实际上是拿这个口号来反对在敌人后方建立新四军，反对新四军扩大，反对新四军组织新的部队，反对使用新四军的名义去组织部队，就是说反对共产党组织自己独立的革命队伍，进行抗战，那第三种武装主要的作用，就是这个东西。所谓真正第三种武装的内容，我想，我不了解，项英也不会了解。可是，一般的讲第三种武装就是中间派，中间武装，这是我的了解。总之项英的错误，在于他对形势估计错误，建立武装的主要方式实际上没有做，这是他第二个错误。

三、项袁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

项袁的错误就是反党反中央，在基本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上与中央有原则上的分歧。他在组织上由反党反中央发展到小组织的派别的活动。项袁虽然没有建立一个什么正式小组织，还没有在思想上组织上具体的形成，但是小组织的派别活动已经有了。大家同志知道，项英这次参加了六中全会，在会议当中，特别讨论了党内团结问题，严格的定出党规党法，特别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党规党法，规定某一个中央委员对另一个中央委员如果有意见，只能向中央提出，不准许向中央委员会以外任何一个人去说，说了就是破坏党中央的威信，就要受到组织上的制裁。六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党内团结及中央内部的团结。项英同志是知道的，但是他并没有遵守六中全会的规定，许多地方违犯了组织纪律，违犯了党规。他可以造谣说六中全会讨论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半失败主义。我也是参加六中全会的一个，我没有听见这样一个名词。我担保六中全会绝对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他完全是造谣，他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别的人都不行，他什么都行，但是他的一套是感情拉，同意他的就拉拢，跟他不和的就打击，中央的指示他不传达，这是犯法的，组织上是犯纪律的。党的指示你为什么不传达，把他隐瞒起来？陈毅同志讲，很多指示没有看到，陈毅同志是新四军负重要责任的人，为什么不给他看？陈毅同志的许多报告是转到中央去的，你为什么不传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项英在那里，他要在党内进行一种派别的斗争，派别的活动，有这样的企图，当然要造谣，要进行两面派的活动，因此也就不赞成中央指示，反对中央命令，使他那一套达到目的。这是破坏党内的团结，破坏党的纪律，六中全会曾这样指出“在目前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托派正运用一切阴谋手段，用尽一切力量来挑拨共产党内部团结的时候，每个共产党员谁要来破坏党内团结，挑拨党内的团结，谁就是最大的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谁要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谁就要受到组织上的制裁”。这

几句话，很明显指出党内团结的严重性，但是项英是破坏了。

其次，是项英家长制度的问题。我想，项英在政策上要反党，那在组织上也就要进行他的活动，他对他自己的统治，就不能不用家长制度，不能采取民主，不能不采取愚民政策，不能让这些人懂得中央的指示。要不然他那一套就行不通，如果大家看到了中央指示，都聪明起来，他水鸟式的一套不是要破产吗？过去张国焘的一套，今天项英都具备了，如果他仍坚持着他的错误，那结果一定也走到脱离党、脱离革命的道路上去。这是过去几次事实的证明，没有什么例外，这是机会主义的共同性，不同的仅是时间、地点的差别而已。我想，这是一个真理。另外项英对中央的指示不传达，有意的隐藏起来，这是犯纪律的。任何上级党部的指示，下级党部一定传达，必须传达，即使你不赞成你反对，也一定要传达，不然就是犯了纪律。刚才有同志讲到越级控告问题，我想是可以的，完全允许的。共产党党规党法里头就有这一条，地方党、军队党都可以，那一个人阻止人报告，阻止的人就犯法、犯纪律。比如陈毅同志有些报告转给中央的，项英没有转达，他就是犯了纪律呀！所以向上而越级报告毫无不好的地方，完全允许。项英就是怕人家告他的状，所以不给转达。但是你不想想，你有状人家为什么不告，为什么你怕告状，怕告状的一定不是好人。我就不怕人家告状，假使我有错误，你们完全可以越级报告。如果你有电报给中央，我可以给你转，一定给你转。你跟毛泽东同志熟悉，直接给他写信，我也可以给你转。因为什么？这是党规呀！你非转达不可，不然就是犯法。以后我们这里制度就这样规定，那个阻止越级报告就要受处罚，当然，这也有原则的。关于政治原则问题，或者工作问题有意见可以越级报告，一直可以报告到中央。那些不是原则性的，而仅仅是一般的带实际性的问题，也用不着越级，没有越级的必要。这是中央党规党法所规定的，项英是参加过六中全会的，这些事情他都懂得，但是他没有执行。他知道你不晓得，所以搞他那一套，这是他家长制度的标准。一直到今天来讲，有一个问题我还怀疑的，这就是北移问题。中央对北移的指示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他总是以特点借口，不执行北移的方针，一直到最后还是向南走，向茂林走。对这问题我们曾讨论了几天，谁也想不出道理来。据我的估计和推测，他向南走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道理，只有项自己来讲才清楚，不过项英今天即使来，恐怕也不会讲了。据说，向南走是他们的计划，向南走一下是让敌人注意，迷惑敌人的判断，然后再向东转，钻空隙间突出来。我想，项英虽然不怎么懂得军事，但是这一点常识还是有的，不懂军事的人也不会这样作，自己是做大将的人，为什么不走青弋江？这是顾祝同指定的路线，完全合法的，可以不经过战斗，他为什么不走？我想项英、袁国平都不会这样蠢，真正是赵麻子搞鬼吗？即然是被包围了，就应该突击出来呀！为什么撤回来，我听说在紧急的时候，李志高要求带一营人去夺口子，而且拿头担保的，夺不下来就杀头，但是他不相信，以后还是撤回来了，所以这些地方，是值得我怀疑的。证明他一直到最后还是不北移，还是要在皖南打游击，还是实行他的所谓黄山、天目山计划，不过是采取了在北移的口号下来进行的。这样来违抗中央的北移命令，实行他的南进方针，我很怀疑是这样做的。这是很可能的。另外，要么就是有奸细与蒋介石特务机关有联系做起来的，或者与特务机关没有联系只是执行南进计划。不过这是他最大的阴谋，他认为这部队是他自己的，北移就不能统治了，就要送给人家，就没有职务了。这种思想行动，完全是反党反中央的，是两面派小组织派别发展的最后结果。假如没有这种东西，不是组织上反中央，不是家长制度，而只是暂时形势估计的错误，那只要他服从中央的意见，他的错误大体上是可以纠正的。由于有政治上原则上的错误，再加上反党反中央，

那错误就相当彻底了。所以要克服这样的错误，纠正这些错误，那只有跟他斗争，最坚决的和他斗争，这时已无所谓要顾到团结，顾到他个人威信了，因为他离开了中央路线，就没有团结可说了，要用我们党的政治组织原则来克服家长制度。这是第三。

四、项袁个人主义的错误：

项袁的个人主义是非常清楚的。一贯的就是把皖南部队看成自己的。没有把这些武装看做是党的武装，而在违背党的方针下来支配这个队伍。本来，中央很久就不要项英作工作了，要他到延安去，政治委员也弄掉了；但是他调皮，他非干不可，把队伍抓到手里不放。我们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里头绝对不允许这个事情，要你做什么工作，你就能做，不要你做，你就是满意，你也不能做。（当然在党内也要反对辞职的事情）从同志们的发言当中，完全可以看到项英一切都是为他个人打算，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以个人出风头，以个人成功，以个人生命为第一位；党的利益，在他看起来是次要的地位。他不北移，也是为了他个人；他破坏中央及其他同志的威信，也是为个人；他最后敌人围攻危险的时候逃跑了，也是为了他个人，回来是以为冲出了包围圈，所以才回来。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他个人主义的错误。不过他在某种情形下，隐藏得很好。所谓没有党性，没有组织行动，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发的。我想，这是项袁错误主要的四个问题。

另外，在检讨项袁的错误的时候，我还要讲几句话，特别对新的，或者党龄不长的，或者经过党内斗争很少的同志讲几句话。我想在这些同志中间，一定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同志讲，项英未做过好事，过去领导群工都是失败，老早就知道他不行，知道他要犯错误的，但是为什么不向他斗争，不撤他的职呢？一直到发生皖南事变才来斗争，这不是迟了吗？如果没有皖南事变，也许没有今天这样一个会开，这样不好的人，又为什么在党内有这样高的威信？我想事情是这样的。项英是一个老同志，是工人出身的同志，同时在他个人生活上很刻苦，在我们党内做过一些事情，虽然做得不很好，但是我们党内工人干部特别提拔，尤其目前抗战时期，在我们党内有威信的同志，都要保持他的威信。有些人虽然不大行，但是他有威信，我想在我们党内，没有道理把一个有威信的同志，在没有必要的时候，把他的威信拿下来。今天，我们党内有威信的同志太少了，还需要有更多有威信的同志，所以，项英的威信能保持着。但是，在很久以前，从南昌纪念周的讲话，就与中央的指示有原则上的分歧，中央曾批评他，要他改正，他也答应了。但是他并没有改正，仍是他那一套。那时候，中央已经知道项英在皖南新四军搞不好，一定要把他调走，要撤职，不过总是希望他改正，在不必要的时候，不想用斗争方法，用正式的命令撤他的职。但是，他用两面派的态度，一直到最后事实上已经撤职了，发表了叶挺做总指挥，要他北移，要他到延安去。然而他不去，我们想，他不去也好办，只要你答应北移，叶挺同志也在那里，北移也不一定发生问题。那晓得搬家都搬不好呢？皖南事变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假如好好的搬过来，会到项英同志，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不对的要批评，要他服从，那也许今天这个会就不公开了。这样不是更好吗？假使他坚持他的错误，那我们还要开大会斗争，看赞成那一个。所以一直到今天才召集这个会，公布他的错误，也只有到今天才可以。另外，上面已经讲过，他在南昌纪念周的讲话作了他的结论，说明这是投降，并没有向他让步，而且向他作了斗争。就是饶漱石同志也是一直向他斗争着。我想，这是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

其次，还有同志这样讲："假如没有皖南事变，或者搬家搬好了，那项英也不是机会主义了。"说这话的也不对。项英是机会主义，这在南昌讲话中就提到了，就批评他的不对，他

接受了错误，那就不能说他是机会主义呀！但是，他另外搞一套，那时候中央指出他强调统一性、不强调斗争性，有重复二七年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危险，而不是皖南事件之后才说到的。（不过今天更清楚更完整罢了）对于他的错误，一向就是斗争的，原则上决不会让步。他今天如活的过来，也要斗争，去中央也要斗争，只是斗争公开的程度不同而已。有时候是在中央内部公开，象这个问题今天还只是在你们中间公开，其他的干部还不晓得，所以不能这样讲："假如没有皖南事变项英就不是机会主义。"这样讲，有大的错误。好象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是无原则的，否认了它的重大意义，是闹架子，还有什么马列主义的原则性呀！如果这样了解，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绝对禁止这样讲。谁要这样讲了，不但犯了纪律，而且要受处分。这是我解释的又一问题。

第三、又有些人讲，项袁二位在某些地方有些长处，在皖南有些好的东西。我想，这样说法，没有多大毛病。不过，一个东西，就是被顽固派打败消灭了。这东西不好，一切东西都不好了。在我们华中来说，也有许多错误，有些不如皖南，但是我们有一个东西，这一点做得还不错，在这些磨擦中间，我们没有被顽固派打败，我们胜利了，所以，总的方面我们是对的。不好的地方也有，比如我们集中力量打曹甸，遭受了一些损失，今天检讨起来是错误的。那时候，如果我们集中力量搞群众运动，组织地方武装，那今天发展更大，外围军组织得更多，所以有些地方我们有错误的。但是这些错误不是原则的，跟项英的错误完全不同，一经我们自己检查，一发现这个错误，就纠正了。我们现在已经集中力量搞群众运动，而且没有失掉时机了，今天群众运动还不是搞起来了。所以不是原则的错误，容易纠正，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容易纠正。而任何一个错误，他有一面是真理，比如项袁的错误，也有他的真理，不过这真理只是一面，没有抓到全盘真理，结果还是错误的。这是关于项袁错误以外，我还需要解释的三个问题。

在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我们应该得到教训：

（一）加强党性的学习和教育，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必须要执行中央这个指示。党性的学习与教育，在我们部队里工作的同志特别要注意，因为在部队里面工作的人，有枪杆子在手，容易形成他党性的薄弱。决不容许党性不好，必须要党性强，加强党性的教育学习。一般人感到，做地方工作的同志的党性比做部队工作同志的党性要强一些，正由于部队工作同志有枪在手。比如，项袁这些人的事实，不免在我们部队里还有相似的这种错误存在。因此，我们要在反对项袁的错误中，不留情的开展斗争。

什么是党性？

党性的具体内容，就是他一切服从党，他的一切打算都是为了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来打算，不能以个人的打算妨碍到党的利益。如果这样做，对于我们党是不应该的。党员服从党，应该成为党员一种天性。我们要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儿子，党的儿子。把它成为每个党员的一种本能。

党性强的同志，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面或许要犯错误，但这种错误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有的文化政治水平低的同志，被人欺骗，但他还是为了党，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做事，这样犯的错误，只要他很好的服从组织，党内受的处罚较轻。所以这两种错误，与那些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不服从党的利益、党的组织，基本上不同的。

凡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参加了共产党以后，他终身不变的永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要一切服从党的利益，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奋斗到底。如果变了一下，就是叛变动摇，叫作动摇分

子。什么东西可以变呢？党的战略、策略、工作的方法都可以变，而且愈变愈好，愈灵活，不要呆板公式的做什么事只有一套。所以，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他有坚定的党的立场，阶级的立场，而且他的工作方式、战略、策略都富有灵活性，同时战略战术工作方式的变动也是从"不变"来的。这就是说，变不可无原则的变，违反无产阶级战斗利益的变，是不对的。

所谓党性，就是一切为党为无产阶级利益打算。这个基本点，每个共产党员要把它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任何党员，没有例外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如此。所谓共产党员要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不过是一句抽象的话，要把它具体化，就是在于每个党员在一切时间、空间内，用他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比如，在皖南事变这种情况下，每个共产党员应该贯彻他为无产阶级为党的利益而牺牲的精神。这样，才叫做党性强，表现他在任何条件下，不离开党，不离开党的组织。在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离开组织的行动。比如，在饶漱石同志的报告中，讲到叶军长在他最后要跑出的时候，他得到饶同志的同意才走的，他最后一句话是"我走，你是同意的。"这完全表现在他的党性强，不离开组织行动，最后还是有组织的行动。比如，我们党的领袖，彭湃同志，被国民党捉去，在枪毙前的最后几分钟，他要和几个同志一起喊几句口号，他们也是经过共同的商量，有组织的行动，决定那几个口号。这种行动，完全表现他们在死的前几分钟，还是不离开党的组织行动。所以，一个共产党员，他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忘记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不忘记党交给他的任务，他永远是为保护党的利益而努力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即使在最困难最危险的环境下，他都不忘记他是共产党员，不离开组织，作个人打算。共产党员病了，要养病，使他身体健康，这也是为了党的利益。共产党员来学习，并不是为了他要提高地位，可以吓住人家，同样也是为了党的利益。所以在一切言论上，一切行动上，都表现他是为了党的利益，而且是经过党的组织，不是个人行动，不是为了他个人打算。永不要忘记，我们是党的儿子，在党内教育出来的。

每个党员，从这方面来学习，加强教育，必须反对那些表现党性不强的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党，但实际行动上是表现他离开了党，忘记党交给他的任务，那么我们应该斗争、批评、教育，不应该让步。比如，某些同志用钱用得很多，他就忘记了这是党交给他的钱，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不爱惜党的钱，这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对于地方党不尊重，同志友爱差。有些同志对党表示不满，以为他自己革命多年，老子是老资格，党应该把他特别看待，甚至于怪党对他不起，即使党对他个人有对不起的地方，也不应该从这里妨碍党的利益。而且，当着一些新党员讲一些不满意的话，这完全是不应该的。还有些同志，无原则闹的一塌糊涂，以至于妨碍工作，妨碍党的原则利益，有的同志，把他带的队伍看为是他的，比如项袁就是这样作个人打算，部队是他的，人枪是他的，干部也是他的。当然，搞队伍，搞群众运动，一定要用你的努力才搞得起来，没有你的努力就搞不起来。党的一切成绩，都必然要用我们党员个人的努力。所以，党的工作，没有什么抽象的工作，打仗、搞钱、写字、看病、记录、读书都是具体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由一个人一个人去做，党就是由一个一个党员集中起来的。党的工作，就是具体的工作。党的工作成绩，完全是你的成绩，但没有党，就没有成绩。比如，你打了胜仗，缴了许多枪，这些枪是经过你的努力缴来的；但，如果你没有党，就没有这些胜利。有些同志，就不了解这一点，他以为这完全是他的本领，所以向他要枪，调干部，他都不答应。这就表现他的党性不强。我们必需要知道，任何个人工作上的成绩，必须全党的配合，没有党，什么事你都不可能做好。你所以能够做得好，因为有马列主义在世界上一百多年的历史，有强大的苏联影响帮助，有奋斗了二十年

的中国共产党，有八路军新四军。你有了这些东西，代表着共产党的旗帜，所以你能获得这样的成绩；否则，你就搞不成功。在六中全会上，我记得林伯渠同志讲过这样的话："假使没有共产党，朱德至多不过是唐××"。朱德同志后来他这样讲："假使没有中国共产党，朱德一定什么都搞不成，一定不如唐××"。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朱德那里会在全世界闻名?！正因为他代表共产党的旗帜。同样，现在有许多人，要到这里来，并不是那一个人的功劳，完全是党的影响，马列主义的力量，所谓靠马列主义在天之灵。项英说，没有钱不能养兵，但我们没有钱，还是可以养兵。因为我们用马列主义去向老百姓要钱，老百姓还打锣打鼓给我们送钱、送粮来。朱部长在搞钱，搞到很多，是不是完全由于朱部长的努力？那不见得。如果朱部长没有共产党，他就收不到钱。有些同志不爱惜公物，公家的东西不觉得可惜，自己的东西弄坏了就可惜。听说有一个同志，把金戒指弄掉了，他急得不安，假使这东西是党的，他就不会这样着急。这表现把个人的东西与党的东西用两种态度看待。这些，都是表现党性不强。现在，要从这方面求加强锻炼与学习教育。

党员在个别事实上离开党的利益与基本上离开党的利益都是不行的。基本上是好的，可是在个别问题上离开党，在思想上离开了，最后行动上也要脱离党的。所以，我们许多事业，党员个人成功，都是党的成功。党员要想求得个人的发展，一定要求得党的发展。如果你只求得个人的发展，党没有发展，那么这种个人的发展，就是离开党的发展，你就是剥削者压迫者，共产党就不会要你，以至于最后你成为党的罪人，所以，你的一切，应归功于党。在我们这里，功臣把党的事业看为是他个人的成功，在党内自命为了不起的人物，他可以把自己特殊化，处处表现他的功劳。这些事实，都是表现与党的利益相冲突的。

党员不仅自己不妨碍党的利益，而且不允许人家妨碍党的利益。有任何党员，看见其他任何人妨碍我们党的利益，不尊重我们党的利益，那么你就应该表示你自己的态度，不可以不管，否则，你就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没有党性。所以一个党性强的党员，他看见其他人妨碍了党的利益，他不管这个人对我个人好不好，他也不怕得罪人，站在党的立场反对他。所以，我们在党内一定要加强斗争性；否则，党性就不能锻炼得更强。

关于党内团结问题。要加强党内的团结，必须开展斗争，但斗争的时间、方法要慎重的考虑，同时，应该经过有系统的组织。党内团结是布尔什维克的团结，在党中央路线之下团结起来。如果他离开了党中央路线，走到反党反中央的道路上去，那么我们就不跟他团结了。要破裂，就破裂，那有什么办法，我们不能拿党内团结这东西来放弃党内斗争。如果他有反党反中央的行为，我们也要跟他团结，那么就变成了无原则的团结，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团结，是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不需要感情的团结，不能使感情超过党的原则，党的利益。

对原则的错误，要斗争，但斗争的方法、时期要慎重考虑。比如对项袁机会主义的错误的斗争，我们到底今天反对，还是明天反对？到底召集很多人反对，还是召集很少数人反对？到底是写文章反对，还是作报告讨论来反对？这些问题要善于妥协，要善于保存自己的意见，我们不能为了一点问题而争得一塌糊涂，这也是没有法子团结。但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的意见，我们要善于同不同意见的人作妥协，但原则又不放松，这样才能团结得好。任何一件事，有两种办法以上，有上策、中策、下策，都可以达到目的。这是具体问题，但应该经常的善于在任何复杂情况下区别那些是对党有利益，那些对党暂时利益，或全部利益，再决定自己的方式、言论、行动。

从党性上加强学习锻炼，才使得我党更强大。如果我党有几十万党性很强的党员，我党

一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且，把这几十万党员团结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下，为党的事业奋斗，党一定可以战胜一切。团结是力量，团结可以战胜一切，这问题是绝大的问题。党性不强，对原则的错误让步，那么就可能使皖南事变继续重复；同时，我们希望在党内再没有象项英这种人存在。但如果不加强党性的锻炼、教育，再出几个项英，也是可能的，特别在游击战争环境下，独立自主的主持一面，成为山大王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性不强，很可能离开党的路线，离开党的组织，反抗党，反抗组织，自己搞一套，走上项英的道路。

（二）加强党内统一战线的教育：

在反对项袁的错误中，加强同志们的策略教育，统一战线的教育，中央老早指出。如象皖南的统一战线教育，袁国平的统一战线教育，是要不得的。我们讲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对待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一种政策。而这种政策，是为了达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现在，这方面的教育材料很少，一般同志，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中的独立性，怎样保持独立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关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问题等，都不能搞清楚、讲得很彻底，因此，对国民党、资产阶级认识不正确，统一战线就搞不好，革命也就难得成功。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成功要有三个东西，（1）好的党，（2）好的武器，（3）好的统一战线，有这三个好东西天下就可以变成我们的。

统一战线的教育，就是马列主义的教育。马列主义在具体环境之下，具体的运用。统一战线，在今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许多同志不善于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之下，使用策略，也就是说，策略运用的灵活性不够，另方面，党性也不够强。

今天，要加强党员的策略教育，就是要使我们同志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之下，去对待各种不同的人们，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正确的实施党的策略，达到党的任务。

（三）在反对项袁的错误斗争中，必须要提高党的纪律，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团结。我们在反对项袁错误中，决不允许党内有任何不团结的事，使党的组织有任何损害，相反，要提高。如果有同志这样想，过去他在项袁领导下工作受气很多，过去没有反抗，以后我可以调皮了，也不管纪律这一套，就随便闹起来，这也是不对的。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破坏纪律的行为。过去项英用家长制的手段来对待我们同志，我们同志虽然不高兴，也不敢同他闹起来，还是拼命工作，在这方面是很好的；但另方面，看见项英真正犯了错误，原则上不对，就应该报告，和他斗争，而你们没有和他斗争，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反对。同时我们不应该因为项英原则上有了错误，违害了党的组织纪律，我们也不要了组织纪律，这同样是不对的。我们不要学习他，受他的影响。这是党的纪律应该服从，党的纪律在任何情况下是不变的，同时，在这里要了解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要扩大党的民主，民主的扩大，不但不损害党的纪律，而且可使纪律提高，这是不矛盾的，组织上的服从，同时对政治上、工作上、原则上的分歧要作斗争，这是不矛盾的，原则上的斗争，不是破坏纪律，而是巩固纪律。

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有他的具体岗位，是上级或下级，但他在服从党的组织纪律上，是一样的，下级对上级应该讲服从，但原则上的分歧不应抹煞，上级对下级要讲民主，不应该什么事都听你的意见，不要那样家长制的。项英就是相反的，他对中央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他做他不服从，对下级要人家服从，我们不要学习项英这种态度。我们要把它翻过来，对下面注意民主，不应该以官僚主义，压制主义对待下级，下面要服从上级。如果上级是项英怎样办呢？当然在项英没有撤职以前，还应该服从，如果你了解项英原则上存在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你就要向他斗争，而且可以越级控告。民主集中是矛盾的统一，上级对下级民主

一些，下级对上级服从一些，这样成为一个整体。虽然，这问题本身是矛盾的，但我们要把矛盾统一起来。我们对资产阶级矛盾，要搞远一些；对党内的上级与下级的矛盾，要拉拢一些。这种问题，要这样来看。在部队里面的党，应该在不妨害部队的战斗的利益，不妨碍指挥员的威信上，要发扬民主，党的民主的发扬，不是妨碍命令的实行，而且保证这种命令彻底的实行。只有民主，才能建立威信，有些同志靠威不靠信，我是你的上级，你就一定要服从我，信任我。他靠威来建立他的信仰，没有威就办不通。威是从人家的信任上建立起来的，而且要从政治上原则上取得人家的信任。关于这问题，我们也要纠正的。

党的纪律，不管是新党员老党员，都要遵守。不能说我参加革命很久了，我是老干部，就可以不服从纪律，或者说，我是写决议案的人，我可以不服从。这完全是不对的。如果说，老干部或写决议案的人，他可以不执行纪律，那么新干部更加不服从了。所以老干部他不但要服从，而且教育人家来服从，做人家的模范。新干部参加时间不久，如果他有违犯纪律的地方，还可以原谅一下，现在有些老党员，他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他高于一切人，有一种特权家的思想。他不懂得党内的民主，没有党内平等的精神，他不懂得在我们这里做总司令与做战斗员是一样的位置，不同的任务，不能因为职务不同，就可以比人家高一些。这种问题在我们部队里常发生。

关于部队与地方党关系不好的问题，这方面主要还是批评部队同志，过去常发生部队同志不尊重地方党，甚至于发展到把县委书记关在牛栏里，这完全不对的。部队要尊重地方党，尊重地方群众团体，特别在建立根据地，发展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地方党与群众团体的威信提高。在皖南因为部队不尊重地方党和地方群众团体，老百姓也不会服从你，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结果到最危险的时候，没东西吃，找不着人带路，后来找一个张麻子，这有什么办法，所以尊重地方政府、地方党对于部队有好处。

现在，华中局有地方政府，部队用不着去管地方上的工作。比如，我们捉到一个人，要不要杀，这完全由地方政府来决定。袁国平的民运式的地方党的工作也是国民党的一套方式，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在我们部队里，民运科取消了，一切与部队无关的地方工作，都交给地方党、地方政府去搞，对于过去那些办法，我们应该纠正的。以后，如果再发生有部队同志把地方党的同志关在牛栏里，我们要撤他的职，开展斗争。我们是人民的队伍，党的军队，如果采取这种态度对待地方党的干部，这也表现他的党性不强。

关于集中原则的问题。破坏了集中原则，破坏了民主，也是犯纪律的。中央决定应该传达全党，就应该传达全党；应该讨论的，就应该讨论。皖南东南局党务委员会的委员，也要服从党务委员会的决议，少数服从多数。同样，现在的华中局，经我们几个人来组织，我们也要服从华中局的决议案，这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不服从的，否则，这是违犯纪律，破坏集中原则的。

这些都是关于纪律的问题。我们今后要加强纪律的教育。

最后一个问题，学习问题：

我想很多同志提出学习问题，这是很对的。学习可以解决问题，不学习，什么是机会主义我们都看不清楚。你反对机会主义，但是不知道什么叫机会主义，糊里糊涂，自己搞了两年，不知道搞的什么东西。这是由于自己政治理论水平不高，看不清楚机会主义，不认识什么是正确的，不能辨别是非。因为机会主义很聪明，它自己不叫自己是机会主义，它跟我们一样叫列宁主义，它叫中央路线。它以这一套名词出现，它的本质你看不出来，它一切以党

的中央的面孔出现，所以你要没有相当的政治理论水平，你就不能看出他的本质，就不能辨别是非，认识真理，认识错误的本领。项英的错误，就是由于我们党内干部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不够高，使机会主义者达到它的相当的成功，甚至于在某些部队、个别组织中，成为统治党的一种工具。所以，项英常讲民主是有限度的，恰恰这限度是官僚主义家长制度的避逃处，是党内机会主义生长的地方。假使民主限度把它弃掉，那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就逃避不了，就要受到打击。假使我们同志很聪明，政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除非机会主义不要出来，一出来我就晓得，你想统治我，那就不行。所以，你要反对机会主义，你就要学习，把自己文化政治理论水平提高起来。学习，是反对机会主义最根本的办法。那么，现在应该学习什么呢？学习党性，学习党的理论，学习策略，对目前时局的判断，什么情况下有什么党的任务，确定方向，提出方针，提出口号。你如果熟悉这些东西，那你就晓得怎么样做，在皖南怎样做，晓得为什么要北移，你可以确定方向，可以提任务，这是学习的一方面。另外还要学习军事。懂得军事，因为中国是武装斗争的国家，仗不知道打了多少年，所以不懂军事的，一定要学习，一定学得到。项英把军事神秘化，说这东西没有经验不成功，这完全不对的。军事是平常的东西，不是学不到的东西，而且人人都可以学到，只要你去学。军事也跟普通事情一样，就是事情适当的处理，你只要分清楚情况，知彼知己，那一定可以处理问题。你能处理统一战线问题，你就会处理军事。要懂得一些规律性，规律性是比较呆板的，比如我们毛泽东同志，他军事上也不很行，但是战略问题，游击战争问题，写了很多本，他不是跟你一样。所以，如果你学习，保管比项英学得高妙些，决不会比他差。当然，不能说要学得到家，你能说一个好将军不打败仗，到家成师傅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每个同志必须要努力学习，特别要学习军事，因为我们常在敌人后方穿来穿去，不懂军事不好做工作。我想，以后抗大要开办特别班，每个礼拜讲两次军事课，什么人都可以听，有机会还可以演习一下。这样，再看几本书，就马马虎虎了。在目前有些作文化工作的同志，到我们部队里来，感觉到部队里的同志轻视他们。当然某些个别事实上是这样的，因为你不懂得军队里头的事情，不懂得纪律，所以引起对你的轻视，看不起你，说你是外行。因此，我们学习军事，加强军事生活锻炼，是必要的。

总结起来讲，学习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学习理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策略，学习党性，学习军事，这都是最基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决定的作用。这里有什么决定的作用呢？是不是讲英雄造时势，个人有本事，学习好的人，可以创造历史？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个人的力量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这次皖南事变，是因为有项英在那里指挥错了，所以个别事情是有作用，甚至于有时有头等的作用。比如，俄国十月革命，没有列宁也是不会胜利的。如果中国有个列宁，那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也许不会失败了。所以个人本事的增加，对革命有决定作用的，个人领导的力量也就在这里。所以毛泽东同志讲，我们党内如果有二百个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那就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我们要学习，要认真的学习，刻苦的学习。虽然有皖南事变，项袁的错误，但使我们党内的水平提高，党更巩固，部队巩固好，纪律也提高了，这是我们党的福气。

（此材料是按抄自原华东局保存的《华中局高干会议讨论皖南事变的文件汇集》付印的，其中刘少奇同志的两个报告又以赖传珠同志所保存的记录加以对照校正。——原编者）

党内对时局错误意见之来源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

泽东同志：

（一）××五月三日电，因系致军委，我们即未予以最大注意，亦未答复，原稿现已烧毁，大概是说国民党业已完全反革命，请苏联帮助等，他对目前我军所处情况非常没有自信心，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二）目前党内对时局，据判断的确非常复杂，有许多错误意见，这些错误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下列来源：

1、单就中国革命（不说他国革命）来说，目前我们的战略计划，目前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与汪精卫在中国的统治，求得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与农民，主要的准备是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及日本的工人农民，朝鲜、台湾解放运动。基本打击的方向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孤立这些顽固派，想抓得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并想利用与日本帝国主义及汪精卫妥协的方法去结束抗战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

2、现在许多同志把基本打击的方向使顽固派孤立，当作革命目标，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实行打倒政策，在刊物标语歌曲戏剧中常常发现打倒顽固派，消灭顽固派等语句。将敌伪顽匪写在一起，许多机关的国旗及孙中山照片不挂了，认为对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完全不要联合了。只有斗争与打倒而不是一打一拉，这种左的错误确是相当普遍的发生，曾就在这种左的错误中产生对目前形势悲观的右倾情绪，他们认为今后的时局是黑暗的，敌伪匪顽一齐向我进攻，我们只有失败。对目前的斗争没有信心。

（三）在皖南事变后，这里也有个别同志认为是新四·一二事变，并有一部分同志提出组织新的中央政府，及开入大后方，这是政治情绪，但这里的同志还是在策略意义上提出这些意见，想用此吓一吓顽固派，结果弄得不策略！但这一点在思想上还容易纠正，最近盐城第一次参议会已聘请所有大地主大资本家及刚从韩德勤部下回家的职员来参加，结果很好。

（四）最近我正在写文章来说明这些问题，来加强干部的党性教育（部队老干部贪污腐化逃跑不安心工作、进行无原则纠纷的现象非常严重）并进行军队的建设与广泛的组织群众等，但雪枫地区的斗争已经失败，吴芝圃已到路东，在路西缓飞有我们部队及电台，我们已严全雪枫派一个团带电台过路西去圃村，路西还有许多党员，雪枫部队现有八千人，他的领导在原则上是有错误的，待他来军部检讨。

（五）以上意见你有何指示望告。

（六）又谭震林地区国民党的进攻已很严重，正计划打破之，如有必要还需要从江北派一部分队伍过江南。

少　奇

六月十二日

刘少奇在军分会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四一年六月）

我们今天是来讨论新四军本身的部队工作。

第一个问题　我想讲一讲在我们新四军本身工作上面应该提出什么任务的问题

第一、我们新四军是党军，党军是执行党的政策任务的工具。在目前，党的政治任务总的方针就是要求得中华民族完全的独立，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

为了要达到这样的政治任务，就必须克服投降，必须要进行统一战线，也必须和非产共党的军队（所谓我们的友军）共同奋斗。今天我们党所领导的一部分军队——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很强大了，但是为了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要克服投降，要领导友军，使他们服从我们的指挥，保证统一战线的正确执行。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那依照今天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还不够得很。我们现在克服投降的力量，也许不够；也许顽固派的力量在某种时候要超过我们，因此就必须提高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然后我们党才能够依靠这个武装来完成我们的政治任务，否则我们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就不能完成。这是一个中心的问题。我们要反对那些保守主义，反对那些满足的人，以为这一数量就够了，以为新四军、八路军有今天这样大就够好了。同志们！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有这种观点的人，就是不了解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今天所要担负我们党的那样严重而伟大的任务。同时还有些非共产主义思想，以为我们作了一个旅长、一个团长，那这旅或者这团人就是我的。项、袁就是这种保守观念的代表，只满足皖南这一数，谁也不能来管江北的新四军，他不一定管，没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眼光的魄力，坐井观天是保守主义的来源之一。

今天象项、袁这样的保守观念还很多，也许比项英同志更少，三、五百人就满足了，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力量在今天还不够，还要发展，还要提高。目前投降危险很严重（远东慕尼黑危险力量的支持），今天的问题就是要看到底，是顽固派打垮我们，还是我们克服顽固派。所以在目前严重的形势下，我们要防止一些动摇害怕的心理，要巩固我们的部队，稳定我们的队伍，经得起这样艰苦斗争，经得起革命长期性的锻炼，不然就会发生一些事情，使我们受到损失。同志们！我们的政治任务是严重的，艰苦的。这个任务要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党的独立领导，是要共产党来实现的。我们要加强我们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作用，这无论是在完成目前的政治任务，或者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实行革命的转变，都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共产党除开和许多友军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目前的政治

任务外，为了实现共产党独立的领导，那建设、加强和扩大我们自己的党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毛泽东曾这样讲“搞好中国革命要三个东西，一个共产党、一个军队、还有一个是统一战线。”目前我们来讨论建设真正能够很好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能争取和团结友军抗战的党军，我们才不会失败，我们才会胜利。但是依照我们现在的基础和情况，要达我们所希望的程度是可能的。而我们要分成步骤，今天在数量和质量只把我们新四军、八路军提高一步是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使投降妥协危险发生不了，能保持和锻炼我们的力量。某些好的情况下我们要放手发展。今天还只能做这样的计划。这里要求我们新四军、八路军各级领导干部大大的提高自己，否则党的任务就不能完成。现在我们党内须有更多的能统帅和指挥几千几万人部队的干部。现在我们部队扩大到这样好象已搞不下了，在他的思想上装不了，或者老子搞得这样大骄傲起来。这是不成功的，现在还小得很，还要弄得更大。

第二、我们要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来独立的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克服投降的危险。

在目前这样一个任务下面来建设我们的军队，我们必须根据我们新四军现有的部队、现有的状况，提高一步。干部也必须提高，质量上、数量上也必须提高，不提高任务就完不成了。所以那种主观主义、太平观念都要不得，具体的我们要整训我们的部队，加强我们部队的建设工作。我们部队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我们的部队两三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扩大了，新的成分进来了。从前我们工农红军时代的成分是土地革命里头出来的，现在呢？是民族斗争中间来的成分，有一部分是收编来的游击队成分，和以前不同了，不是土地革命的质量了。因此我们在质量上还很低，还没有完全把它巩固起来。一般的说，土地革命的质量要好些，因此如果我们不把今天新的成分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加强他的党性，那么它是不是能在共产党领导下来担负起艰苦斗争的任务呢？我想是很成问题的。由此看来必须提高和加强我们部队的建设工作。如果忽视这点，就可能使我们部队变质，因为我们部队的实质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变更。所以我们部队越扩大，我们也要越提醒，不能因为部队的扩大来减弱我们掌握部队的能力。比如说，以前的连长、营长现在当了团长，以前的团长现在当了旅长、当了师长，一般的说现在的团长、旅长比工农红军的团长、旅长要弱些，政治干部也弱些，所以必须要把这些干部提高，我们的部队才能掌握得住，才能达到以前工农红军那样的水平。今天在统一战线中间我们的某些干部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有贪污逃跑的事件发生，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党性教育，不加强就不行。现在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强大了，但是还存在着这些弱点。

此外在军事上面我们也没有教育好，组织上也没有完全组织好，制度上也没有完全建立好，太不统一了。所以，为了要把我们部队教育好，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好，各种制度都建立好，使得我们新四军能更进一步提高、巩固和扩大，能更有组织性和纪律性，而能成为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在这样一个目的下，来确定我们今天头一步的工作——建军工作计划，这是根据我们党的政治任务所提出的建军任务。我想这个任务很重要，如果不好好的加强我们部队的建设工作，那我们连现在都维持不下去，保持现在的程度都很难保持下去。

其次，在这样的任务下面，我们具体的任务开始是提总的口号的问题，正规军与党军的这个口号我们还在讨论中间，我觉得是要很好的考虑一下子。今天我们在军事上已经是正规军党军了，为什么还要建设正规的党军呢？所以政治口号上已经不是这个东西了，而是更进一步的加强我们部队的正规化，加强我们部队的党化的程度。我想总的口号应该这样提出来，但是我并没有完全想好用二个什么名词讲好，所以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另一面目下我们

在军事上还没有达到正规军党军这样一个程度，提出的口号就是游击兵团机械化、正规化，这是口号的分别，这样更具体一些，我想也是好的。

另外在军长报告中、参谋长及许多同志发言提出建设党军的具体条件，我想这些条件都很好，都同意。但是为了提得更具体些，更可以分别提。因为现在我们部队不一样，某些部队还可另外加一些，某些部队可以减少几条，某些是共同的，都要提出来。目前共同的可以分为几条：

（一）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完全执行党的政策和命令，来完成党的任务。这些东西是最要紧的了，为了提高我们部队的党性，我想这一条非加进去不可。本来党性有个人和集团的，我们部队有党性，因为我们部队是共产党组织和教育出来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来执行党的任务的，人民一看这部队就知道是共产党公开的代表。它的所做所为，它的作风，它对待帝国主义、对待友军、对待人民各方面的态度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是说，这部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部队，有它的特性，所谓优良传统，就是这特性的本质。今天这个特质有些要保持的，有些要发扬提高，好的我们要保持发扬，不好的要去掉，这是我们的特点。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的人，共产党员有他共产党的特性，这是他个人党性问题。另一方面个人党性与部队党性特别是领导部队干部的党性与部队的党性是分不开的，所以要提高部队的党性首先要提高干部的党性才有办法，这是最基本的。我们领导干部要能够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对党的路线、政策、方针掌握不住，他就要犯错误，一犯错误党性就没有了，或者削弱了，所以我们领导干部党性的提高是最要紧的了。

（二）我们军事上的提高：现在我们要有高度的军事技术，至少要做到不能比中国其他军队落后。我们现在想法子要达到这一点，要想法子超过他们。当然我们在军事上讲，某些地方已经超过他们，特别是勇敢作战、英勇冲锋、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大运动战等这些地方是超过他们。我们所说不如他们的是军事理论、干部的指挥能力比国民党的军官某些地方还差一些，所以我们要提高。

（三）要严肃我们的纪律：纪律有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在这方面特别要比中国其他军队更严肃一些。军队没有纪律就不能有战斗力。其他的政治纪律、群众纪律，我们比中国任何其他军队要好。可是讲起军事纪律我们有些地方是松懈的，虽然我们不赞成国民党的纪律是建立在压制上面，我们虽然主张自觉的纪律，但是我们的纪律应该比他更严肃些。你不能说不压制就可以随随便便，就没有纪律了，这是纪律问题，要特别提高。

（四）要有统一的编制、统一的供给、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纪律。这些东西都要统一起来。拿供给工作来说，虽然各个地方有特殊的情况不同，但是大体上总应该一样。现在我们部队有这样一个缺点，好的好一些，苦的苦一些，困难的任务没有人担负，怕负责任。干部分配工作的时候负责的工作大家要去，要到艰苦的地方大家就不去了，这种表现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以后能平均一点，统一一些。

另外一点，高度的革命热情，很活跃，很有朝气的作风，这是我们部队中间的一个特点。我们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是很活泼很前进团结的，那种热情的表现特别在团结问题上面我们要反对某些干部中间无原则的纠纷。现在我们部队中间特别是干部中间，无原则的纠纷比较红军时代要多。这一方面是退步了，比如连长和指导员搞不好，或者指导员和排长搞不好，几个人搞就会影响整个工作，表现了军政的纠纷。另外军队与地方纠纷也很多。这些纠

纷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有很原则上的分歧，据我们所知道很少原则性的问题，不是什么大原则的对立，当然那种太太平平、和平相处，或调和主义，或者是无原则的纠纷，我们都要反对。另外还有分配工作好讲价钱，在他的领导下我不去，这些问题在今天是退步了，发展起来了，我想这很会影响到部队中间不团结的现象。这些就是目前我们建军中间所要求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些问题还须酌斟一下，因为还没有想好。

其次，我想为了要达到这些任务，使我们能够在质量上提高，那就要依靠我们大家全军的学习。大家要求进步，大家要学，不只是干部学，兵也要学，大家要进步，就要学。对宣教工作同志来说，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学习提高起来，要不然建军就搞不好。所以在建军任务前面，首先要有一个很艰苦、很长期的、深入的组织工作、教育工作与学习工作，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讲各种工作

第一、就是要加强我们党在部队中间的领导

因此在这里要提高军队党在部队中的威信，提高组织的威信。一切离党的、非党的以及反党的这些倾向，在我们部队中间都不能允许。在这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的斗争，在为了加强我们党在部队中间的领导作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因为现在正有这许多不好的倾向在发展着，或者是各人甚至于某些干部影响整个部队，所以我们要向这些离开党的倾向作必要的斗争。在这里我们要提高干部的党性，向我们干部进行党的教育，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最近写一篇文章，现在还没有开始。我想为了把这工作作好，我们提议是这样：在我们部队干部中间应健全我们干部小组，我们干部每个人都要过党的生活。在我们一个团里头有军政委员会，但是除开这个以外，还有许多党的小组，我们干部也要过党的小组生活，无论是师长、旅长、团长都没有例外。如果没有什么问题讨论，我想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自我批评，进行党性教育，讨论党性问题；一个是对党性的理解进行检查，你的党性怎么样，我的党性怎么样。这样搞它一年看看，在华中局由我开始作起，关在房子里大家互相批评，什么都可以讲出来，反正不搞到部队里头去。同时，干部小组会有向上级政治机关作报告的必要，所以以后每个干部他的品性、他的思想、言论、行动一不大好，想离开党一点，就要批评他，告诉他你为什么背向着党呢？这是我们要加强的些东西。

第二、干部工作问题

干部要加强学习，加强理论上的研究，这问题更要紧。刚才我们讲要掌握党的理论政策，那没有学习不行，不然就会做错，除开这些办法，我想还应该加些新的人进去，有些党性不好、工作做不好的应该调换，应该调换一些好的进去。我想组织上应该有这些变更，特别今天我们部队大了，领导这样大的部队如果政治上面不开展，一点理论不懂得，那对于这几千人上万人的部队就搞不开，搞一个地区也搞不好。所以现在这些干部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当然一下子学不好，我想再加些新的理论比较强的干部进去，党性比较好的在地方上工作很老的到我们部队中来工作，即使他不懂军事，但这是学会的。我们让他当政治部主任、当政治委员是可以的。比如四、五支队的张××、何韦这些同志他们开始加入新四军的头一天就做政治部主任，而且做得不坏，因为他们理论很强，有些实际工作经验，他能把握住原

则，可以供给一些办法，一样会搞得好，而且对于我们老的干部加强了。到今天来说，这些同志党性很强，没有犯错误，到部队几年间打仗也有经验了，而且锻炼教育了他自己。新旧交互来用，各人有一门长处，合起来搞，这是必要的。

另外还有些新干部要提拔。从抗战以来加入我们部队的新干部在部队也搞了几年了，这些干部中间有很好的，我们要大胆的提拔他们到负责的地位来，做一些负责的工作。当然指挥作战还比较困难，但是做政治工作是可以的，阻碍他们的提拔是不对的。这是关于干部问题上我提出的办法。在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发生了，有些老干部搞了十几年了，他看到这情形就眼红。他会这样说"我加入红军当兵十几年了，到今天还是搞搞团长、营长或是一个团政治部主任；怎样他一来到新四军头一天就拉到我头上当我旅的政治部主任、旅的政治委员，"有点不甘心。所谓资格论、资格主义这是要不得的。当然资格要讲，资格是斗争历史，这是决定他推动他的一个条件，不是他的全部。你有七、八年斗争的经验，这是一个好的条件，但是其他的地方你还有弱点。我们要全面的观察问题，不要片面的观察问题，不是只看到一个人的长处，而是要看到他的弱点，只看到一面是不对的。总的说，就是要看他的本质，从本质上来考查干部。有些斗争历史比较短的他有他的弱点，没有否认，但他也有他的长处。我们要多方面来看，什么资格主义、资格中心论。观察新干部只看他的弱点，没有看见他的长处就给他调了，这叫片面观察问题，片面估计自己、估计人家。所以处理上一不对就会发生错误，恐怕新干部一提拔起来，我自己的位置就站不稳了，这是私人立场出发，这叫占了茅房不屙屎。所以我们部队中好的知识分子要勇敢的提拔。现在有些部队抹煞了一些知识分子。关于一二九师曾有这样一个通知，中央转来的，过去当过县长、当过游击支队司令到我八路军工作了三年，结果在一二九师俱乐部当文化教员，以后这个同志在某一个地方打死。因此中央发了一个通知，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这样好的知识分子反倒在这个地方抹煞了。

因此有些新干部应该提拔，有些差的干部应该调换，特别一些政治工作人员。政治委员是代表党在部队中间执行党的任务的，结果他党性不强，犯了错误，对于这些人要执行纪律，要调换，要提高政治纪律的严格性。为了要建军，为了要克服我们部队中间的许多弱点，就要阻止一些坏的倾向的发展，要开展斗争，要发扬自我批评，这样才能提高部队的质量。现在我们部队中间的自我批评精神不够。刚才第二师同志讲话当中自我批评精神很好，进步了，以前我们在皖东时，四支队要自己批评自己是很难的事情。三旅同志的自我批评就不够，只解释我们钱用多了的原因，这对你三旅有什么帮助，只解释你的误会而已。当然需要解释，但这不是误会，问题是浪费了一些。现在的问题是设法检讨我们那些有浪费，以及研究以后怎样改正，要这样讲话，这样发言，对我们的事情才有帮助。如果只讲我部队有弱点就不愿意，那怎么行呢？当然我们批评的方式也许不好，但是恰当的批评，不害怕批评，这是必须的，也是共产党的特点，共产党员所以进步，就是不害怕批评，而且自己要批评自己。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一个集团，如果他害怕批评，那这个人或者这个集团就不能进步。现在我们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很不够，要反对那些调和的倾向，那些错误的东西不讲不说的调和态度。今天我们提高党性，强化部队党的领导，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这斗争包括思想上的、组织上的，没有这个斗争那事情就做不好。我们要进行斗争，最好自己进行斗争，自己批评自己，同时也能够批评人家。但是不反对调和主义、自由主义，自我批评就不能发扬，斗争也不能开展。如果不开展组织上的斗争，不提高我们干部的党性教育，那强化党的领导

就不可能。但另一面我们也要反对无原则的互相攻击，我说你不好、你说我不好的无原则纠纷。我们要提高干部服从党、服从组织的观念，强化服从组织的绝对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的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等等东西是绝对的，我们要强调它的绝对性。比如你是个团长，你当然要服从旅长，某些党的问题要服从多数，要服从组织。今天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我们全华中局服从中央是绝对，又如我是华中局的书记，华中局是个组织，到底是我服从华中局呢，还是华中局服从我？那我们说这书记要服从组织，要服从华中局，这也是绝对的。同志们！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造人，但是列宁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是不服从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不服从组织的。现在我们新四军有这样的人，官大了一点，负责了，那就可以不服从组织，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个人服从组织是绝对的，没有条件讲的，绝没有这一条说我们是负责人，因为有这个条件就可以不服从组织。家长制度的根源就是在这个地方，项、袁对于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就搞不清楚，他给弄翻转了。我们说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可以不服从组织的现象，一切的共产党员都是组织之内的，所以我们党的领导是总的一致——民主集中制。这不同于国民党，不同于孙中山。我们要提高这个观念，提高个人服从组织的绝对性，要尊重党的各种组织。现在某些同志还有这个观念，认为部队可以不尊重地方党，可以不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我们要怎么样干就怎么样干，对它横加干涉。在部队中不服从制度，如象制度是我写的，我可以不服从，这种观点完全要不得，你不尊重他他就没有法子工作。在我部队中的比如供给机关，他有他的权利，你的钱怎么用的、应该发给你多少钱、预算上没有的不支给你等等他可以决定。又如卫生机关，他可以决定这个人是否应该休息，这个人不能当兵，体格很坏，这是他的权利。我们大家要服从，不服从就搞不好，不提高它的威信，它就不能执行它的职务。地方党也是这样，对地方党尊重不够，犯了许多错误。所谓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等这些东西都要反对。我们有些时期大帽子加得很多，但最近时期真正的主义来了他又不讲了。当然乱加大帽子要不得，但是这个帽子不大不小，对他恰恰好，也要给他加，这样才能警觉他。所以我们必须要反对这些东西。为了建设党军，在部队中要注意这些问题，要加强部队中间党的工作。

其次，刚才黄师长所讲的，我们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区别的问题是很好的。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党在部队中间的工作叫政治工作。比如部队里头的支部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政治工作里头的党的工作叫支部工作、组织工作。所以，党的组织工作、支部工作是政治工作里头的一部分，也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整个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这样解释很对。现在我们部队党的工作就是发展党员，加强党性教育，实际上就是组织工作。所以这种工作要加强，支部工作也要加强。现在我们提倡反对本位主义，提倡要识大体、顾大局，某些地方要提高自我牺牲的精神，要克己不要那样小气。假使我们党性强，我们做一个忠实于党、党性很好的党员，的确某些地方要吃些亏。在我们党内有一些人钻空隙钻进去了，于是手把子长了，什么都可以拿到，享受得好一些。那些精忠报国老老实实为了党的利益而吃亏了，什么东西也拿不到，我们看得很清楚，当然这种现象不好，应该去掉，但一下子消灭不可能，看到使人生气，但是如果我们以共产党员的精神看起来，我们说这是小气钻空子的人，我们当然要反对。但是有二种立场要反对，一种是眼红了，自己生气，就是说什么东西他都有，我没有，所以我反对，所以我生气，假如他有，我也有了，那就用不着反对了，这种立场是不正确的。我们说有那同志在党内某些享受是过分的，不应当有，我们要反

对，决不是说我没有享受到我反对，而是根本上不应该有这种现象，不应该浪费。你这样搞是错误的，我自己不搞，就是你给我我也不要，因为无论谁这样搞都是错误的。这所谓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反对是正确的，但是你站在党的立场总还是反对不了，他不讲党的立场，宁可以拿到了东西，自己舒服，讨到了便宜，而我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什么也不搞，实在吃了这个亏。同志们这个亏吃了不要紧，因为我们当共产党也不是几年，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在长期斗争中间大家会了解，只要你维护党，你就能获得全体党员的信仰，受党信任，这样的同志就会提拔他，他在我们党内就不会吃亏。相反的，那些手把子长的钻空子就不会取得党的信任，大家都反对他、批评他、斗争他，最后搞得不好才真正叫吃亏。所以那些有正气的有道理讲的在我党内要生长起来。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一部分同志跟人家弄不到一路，好的不学，坏的学，这也是不好的东西。总之我们现在要号召我们党员提高党性，什么事情要顾大局、识大体，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不要骄里骄气，这种本位主义就去掉了，个人主义就没有了。这个精神在我们党内要提倡，应该加强我们干部的党性，提高我们为党的事业及革命的事业牺牲，努力奋斗。为了达到这一点，要组织有办法，要健全我们党的生活，要有严格的学习制度，这样去进行一些工作。另外黄师长讲的短期训练班这个办法很好。另外现在看书我感觉有这样的现象，看多了就更杂了。我想应该这样：文化程度不高的指定几本给他看，一本是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是共产党宣言，要多读，一遍二遍三遍，乃至于七、八遍，读得每个字都认得，这样才有办法。一本共产党宣言有六、七千字，你如果都能认识不是很好吗？这样两年以后不是认识很多字了吗？同时要精读，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懂得，都记得，我想文化程度低的应该这样读法。我相信时间长了，文化、政治水平都可以提高。其次，除上面讲的干部教育外，作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以及一般的战士的教育也要加强，这样才能够使我们整个部队提高一步。

第三、关于我们政治工作的加强：

政治委员制度的强化我想是需要的。关于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问题，最近中央有这样的决定：在作战指挥上是军事指挥员的决定权，除此以外，政治委员均有最后决定权。比如这个仗要不要打，走那个方向打，我们整个战略战术计划等问题，都有最后的决定权。因此目前情况下政治工作更要加强，政治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纪律要严格，如有不适合做政治工作的要调换一下。

政治工作的深入性一般讲都很差，工作不能深入到连队中去。关于政治工作领导方式问题我想只有三个办法来实现我们具体的领导：（一）打电报、写信，用书信指示告诉他做；（二）用会议方式做报告，或谈话当面告诉他怎样做；（三）用刊物写文章。

不管军部领导或华中局领导，只有这三个办法实行我们的领导，旅团级的领导主要是靠开会检查督促，写信、用刊物的领导也可以运用，但不是主要的，师级的领导以书信、刊物指导更多，但不能完全放弃派人下去、叫人上来。这几个办法在军部的领导主要是靠刊物、打电报，有些同志就不知道利用这个办法。比如供给、卫生机关他不打电报，下面也没有人上来，因此上面的问题传达不下去，下面的问题反映不上来，就不能实行具体的领导，不能深入下去。

同时我想政治工作领导要领导得好，并不是什么干部问题。如果是指导员、文化教员不好，开几个会告诉他们几个办法就可以搞好，主要是依靠上面，领导要具体，多检查督促，多教育，多批评，下面的干部你告诉他怎样做他就懂得怎样去做，而且可以单独去做，这是

关于领导的方式。

战时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不容易做好，有些政治工作人员平时可以做的很好，但到战时他自己就慌张起来，不能灵机应变。在战斗环境中变化最多，而且又快，有时几分钟就有一个变化，那时政治工作人员就需要按照各个不同的情况，提出口号，进行鼓动宣传教育工作。如果政治工作人员他自己不沉着，首先自己慌张起来，那么什么工作都做不好。

第四、关于锄奸工作与敌伪军工作及友军工作：

对这个问题发言的同志不多，我想这些工作很重要，现在我们部队要加强锄奸这部门的工作，要注意敌伪军及友军工作。一般人都忽视这些工作，特别是我们干部注意不够，这是不对的。战斗有二种：一种是公开拿枪进行战斗；另一种是秘密的派人到敌人的内部做破坏工作，收集情报的工作。敌人也会同样派人到我们这里来，所谓做特务工作。在世界上的间谍工作在战争中占着最重要的地位，甚至于最大的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他们不惜用大量的金钱来进行这个秘密的战斗，而我们在这方面大大的落后。在目前我们要战胜敌人，克服投降，那么这个部门的工作完全不能忽视，要能够加强我们的注意力。将来在某一个时候要把敌伪军工作成为最重要的工作。现在华北八路军已经是这样，他们经常把经验教训用电报打来。因此，现在我们的锄奸工作部门、敌伪军工作部门就要开始注意加强研究这工作。

政治工作就是这些东西，革命军队正因为有这些强固的政治工作，善于利用我们政治上的优势，来战胜在力量上占优势的反革命。现在我们同反革命的力量来比较当然我们的力量要小于反革命，但我们政治上是进步的，我们是真理，我们政治上占了优势。敌人虽然军事上占优势，但他的行动主张是野蛮的，欺骗人的。因此我们可以用政治上的优势，强固的政治工作，来克服我们的弱点，增强我们，这样去战胜反革命。

第五、关于纪律的问题：

我们部队有军事、政治纪律，如果有一个人他把我们军队的纪律减弱，那么就等于削弱我们的战斗力，帮助了反革命。因此我们纪律要严肃起来，提高起来。

我们的纪律与压迫者的纪律不同。我们是带着自动性的自觉的，但并不是我们的纪律就可以随便一些，相反的，我们的纪律比反革命的纪律有更高度的纪律，更要严格一些。对违反纪律的人处罚是否是需要？要的！因为现在我们部队中间一般觉悟程度不同，有些坏分子做错的事是故意做的，他明晓得做的事是不对的，但为了个人而做坏的事，这种人当然要处罚。处罚的方式不是感情的由个人感情来决定他的处罚轻重，这种处罚的方式对我们部队是没有利益的。我们应该根据纪律的条例、根据组织、根据问题客观事物实际的情况，处罚其某些个别的坏分子，或者坏的党员，对我们整个革命有帮助的，对整个部队有教育意义的。我们要不留情的来处罚他。不能说由于我们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就可以减低我们纪律的严格性，甚至于完全可以取消或对纪律采取随便的态度。所谓自觉的纪律，需要我们战斗员干部自动的来尊重，了解纪律。同时我们不可了解纪律的处罚是对某些人的，也不能用纪律去吓倒他、控制他，主要是使他自觉的做。因此我们要加强部队纪律的教育，使每个人能自觉的遵守纪律，服从纪律。

对命令的执行还不够，以后对命令不执行的现象要严格批评。凡是一个命令应想法子如何去执行，但有些并不是这样想，他总想如何可以逃避这个命令，这样想是不对的。困难当然可以提出来，但命令还是要执行的，不能根据他的意见来行动。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在对

项、表错误的决定中特别提到，不能容许在我们部队里面有反抗上级命令、违反中央命令这种事发生。如果有这种事，他一定要失败。现在有许多人因为这一点不了解，他把个人利益看得很重，结果还是搞不好的。只有在中央、华中局领导之下，他的事才可以干得好，否则他不管总的利益，想自己搞一套，这是不行的。

同时还要谈到一个问题，我们除提高军事、政治纪律外，群众纪律也要提高。违反党的政治原则，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要执行纪律，但违反群众纪律也要纠正的。现在干部中真正能代表群众的利益、为群众谋解放这种观念很薄弱，不如过去红军时代的情形。这因为我们部队成分有些变动，同时在我们部队中的干部战斗员以及共产党员中工农分子出身的他们已离开了自己的工农阶级，使群众的要求、群众的利益以及群众的各方面的情绪都反映不到；表示出他们群众的观念很薄弱，侵犯群众的利益，违犯了群众的纪律。最近有一部队到地方上去征粮，老百姓没有粮食他吓老百姓说"不给粮食把你的风车、房子都拆掉。"这样一来，非但拿不到粮食，相反使老百姓生恶感，即使有粮食他也不愿拿出来，这也是违反了群众的纪律。

第六、关于军事方面：

现在我们要提高军事的技术、战术的素养，才能够提高战斗力。我们要学会打正规战又不要把游击战抛掉，而且还要发展的。

参谋人员的见习制可以采用，比如文参谋可派到部队里面去见习一个时期，然后做工作要好得多了。部队工作同志、地方工作同志要学习军事，只有去实际的见习一个时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见习制度，我们过去很少，我想以后可以用这种方式。我们学习军事的实际的见习是很重要的。

战斗员制式教练问题：我想我们当然不赞成把制式教练当作教育的中心，把我们部队士兵训练得呆板的。以我们部队今天的情况来讲，制式教练当然重要，但军风纪更值得我们注意。

关于制式教练的注意提高这是需要的，在我们部队中这方面都很不够。比如我们要求一个战士跑步能跑多远，跑多少时间，怎样抛手榴弹、瞄准，这些要求虽然一时不会做得怎样好，也不是我们唯一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我们首先还值得注意的。同时对于我们部队中勇敢旺盛的战斗情绪、攻击的精神等这些东西虽不把它当作唯一的要求，但还需要适当的把它加强起来。关于体力的锻炼也很重要，四旅这方面做得有些成绩。

关于各方面军事组织的健全：司令部与参谋处各种组织要给它健全起来，参谋人员地位是提高一些。在我们部队中一般人对技术工作人员不重视，不仅对参谋人员或对供给人员、卫生人员，都是如此。那种人是大家所尊重的，有三种人：①军事首长；②政治首长——团政治委员、团政治部主任；③组织科长。除这三种人外，其他人是不太尊重的。这种现象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了解，在我们部队里面不管担任那样工作，都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对每个工作都要尊重。以后我们对政治机关、军事机关，对参谋人员以及各个部门工作他们的权利都要提高。同时各机关各个同志他们应该实行他们自己的权利，担负他们的责任，这样做才可以使这些人安心工作，大家努力把事做好。如果这些部门的工作做不好，情绪不高，那么整个工作也做不好。我想这个工作首先应该军政首长来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军事经验的交换这工作做得少，八路军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他们经常把经验教训用写文章、打电报等方式传到各部队，教育各部队，以后我们要做这一项工作。

此外在游击战的环境中，工作上还存在有一种弱点，这个弱点过去我们在红军时代是没有的。这个弱点表现工作惯于在平时的环境中进行，如果转于战时环境，这些经常工作就要停止。过去的情形就不同，比如供给工作、卫生工作、油印工作在万里长征的路途中仍旧能够继续进行，现在工作中表现了很大的缺点，工作转入战斗环境中经常的工作就不能照常进行。因此也影响到部队的战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以后要纠正。

第七、关于供给、卫生工作以及各部门的工作：

供给工作很重要，如果没有供给工作，别的工作也不好进行。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每天最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吃饭、穿衣，假使没有饭吃，没衣穿，那么军事、政治工作就没有办法做。这个重要的部门的工作一般人就不十分注意，工作也搞不好，特别在一师供给工作总搞不好，政治、军事上的负责人对这个工作忽视，经济制度不严格。因此浪费很大，有些负责同志随便批钱，比如有一个团长他可以批准特务员八十块钱去诊病。这不但发生不好的影响，同时也不合经济手续。以后严格规定团级首长不能随便批人家的钱，自己用的钱一定要经过供给部长的批准才可以，自己没有权力批。

在一师他们供给工作搞不好，还想搞税收、财政工作。现在送钱给他们用还用不好，自己来管钱更搞不好；同时更助长贪污腐化逃跑的现象发展。

有些人讲，吃公粮妨碍地方工作，不吃公粮群众工作可以做好些。比如一师现在就是买粮食吃，但我们看八路军以及其他新四军部队所在的地区他们仍旧吃公粮，群众工作不见得做得比他们坏，他们不吃公粮群众工作也不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甚至于还不如其他地方。我想吃公粮对地方工作并不妨碍，因为这是马列主义的灵，老百姓送粮食给我们他也高兴，主要是粮食多了、钱多了，对部队干部的进步没有帮助，钱多会发生坏的现象，这是老实话。当然我们尽可能保证部队不在这个新的环境下发生新的坏现象，同时在经济制度上一定要严格，不得随便批钱用钱，以后特别要加强供给工作，如果大家真正用心思来搞一定可以搞得好的。

卫生工作：首先要健全卫生部门的领导，其次要有一些医生和药品，把医院组织好。至于用大量的钱去请专家到我们这里来，我想当然这不是办法，事实上那些专家到我们这里来并不是因为有钱才来，他们至少对新四军共产党有些认识，也不在乎多少钱，同时他们自己也觉得我们对他的优待总有一点不好。我想这种观点当然是很对的，表明他到新四军来工作并不是为了拿新四军这样多钱，而是为了国家民族，为抗战的事业服务。其次关于医院的设备我想在可能条件之下也可以搞一些，不过在这里有些困难，因为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日本鬼子常要来捣乱，不可以让我们很好的搞起来，所以我们的设备还是需要适应战斗的环境。

还有些同志没有科学的常识，做些反科学的事，自作聪明，总认为我一定比人家要高明一些。我们虽然是信仰科学的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有些研究，但不见得你懂得了这门科学，你什么科学都懂得的，这是不对的。在过去常常有一些同志对于自己的病不听医生话，要他吃这种药，他一定要吃别种药，不尊重医生、信任医生，对看护同志态度不好，骂人。这些现象我们都要反对，同时这也是违犯纪律的，以后医生有决定的权，什么人生什么病，应该吃什么药，都由医生决定，不得自己作主意，不然要卫生部干什么？过去卫生部门工作同志对于自己的职权也不很尊重，当然这方面也要改变的。

其次关于连队卫生经费的问题我想在以后考虑一下再决定。

一切工作在整个华中局、军部领导之下来进行，决不能离开这个领导。同时在领导方面一方面统一，一方面加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做得好，各干各的就做不好。

同时我们要很好的把打仗与整训部队的工作配合起来，如果配合不好，这些事就做不好。工作做好了，使我们新四军整个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更提高，才能担负很大的任务。

在这个时期我们中心工作是整训，到秋收时候我们要来一个大的扩军运动；同时还要明确提出加强敌伪工作的任务。把这些工作做好了，不论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也能够经得起锻炼，那么现在就是要大家去努力干，干出一些成绩，对我们部队、对我们党以及对你自己都有好处。

军委总政对新四军四师军政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

根据不完全材料，关于四师过去军事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1、在组织上有机关庞大和不合理的现象，如过去全师人数仅一万七千人，而师部及直属队就占了七千，单位太多，连队不充实，致使行动不便，工作不灵活，战斗力不强，因此对四师的编制，除同意陈刘巧电意见外，还应注意缩小机关充实下面。

2、在教育方面偏重形式，如大部时间放在刺枪上（没有刺刀）放松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以致对地形地物之利用很差，射击命中力弱，弹药不节省（如进攻少数地方反动武装也常用机枪火力吓走敌人的办法），有一次在阅兵时为了整齐而将枪支调换，又未调换子弹，致被敌袭时有枪不能射击，仓惶失措，而遭失败，这些都是被形式主义危害的结果。

3、在组织上工作制度上，我们要求正规化，反对游击习气，可是绝不反对游击战术。在目前条件下，战术的运用，基本上还是游击战术，此次顽军进攻，我受损失，在战术上的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利用游击战术，缺乏机动，主张硬拼，顽军采取宽正面的进攻，而我也采取宽正面的抵抗。如马彪一个骑兵团在五公里的正面上搜索进攻，我三十二团就在五公里的正面抵抗，而不会集中力量打击敌之一翼或敌后，也未能实行突出包围，且遭受很大损失。这样的战术当然是要吃亏的，因此对平原战骑兵战也自然无信心且必将失败。

在过去的政治工作方面，须向你们提出下列的问题：

（1）政治工作作风应当是艰苦的，认真的，踏实的作风，不应铺张与追求表面，实际上因铺张讲求表面得来的成绩，并不是真正可靠的成绩，我们感觉铺张的作风在四师是盛行着的，例如工作多重表面不重内容，注重形式不注重实效。政治机关庞大，与下级机关极不密切，计划多检查少，号召铺张的形式代替了精密的组织工作。因而在紧张环境机构不灵，部队时常发生混乱，这就是显明的例证。

（2）对根据地的各种政策掌握不紧，淮北地区的群众工作当形势顺利时不能抓住时机切实组织群众改善群众生活，使他们获得利益感觉有与我们共同坚持抗战反对日寇顽固分子的必要。你们过去多少为社会上层分子所麻痹，“万民伞”“德政碑”“天下文明第一军”之类的恭维歌颂，使你们忽略了对下层政权的改造和对基本群众的发动。因此在反敌斗争中群众的积极性难于发扬，军队得不到群众有力的配合与援助。

（3）关于对伪军伪组织的政策也是有错误的，这就是对伪军伪组织采取普遍打击的办法，不懂得利用矛盾，不认识斗争的长期性与严重性，不能依据环境分别对象去规定政策。而是在所有伪军伪组织面前赫赫显势，结果与他们结成生死冤仇，牢不可破。对于反正过来的伪军及收编的杂色部队因操之过急，也造成了不利的结局，虽然中间有过若干的转变，但

成绩仍然是微弱的。这些教训不应该轻易忘记。总政治部历次对敌伪军工作的指示希望你们好好的研究与讨论。

（4）应当在党内及干部中正确的发扬自我批评，不应文过饰非，不应一味责备下级而不从领导方面作任何检讨。凡是应当从领导方面检讨的，必须勇敢检讨，决不可向下推诿。对领导方面作虚心检讨，不但不会减弱领导，反而可改进领导及提高领导者的威信。否则单方面的责备，既不能改变问题本质，又不能使下面心悦诚服，而有损干部团结并在领导原则上也是不正确的。

（5）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培养干部独立自主的能力，使干部敢于负责与能够负责。同时加强干部党性，使他们在分散时尊重上级和坚持党的政治立场。四师干部的这种精神和素养较之其他地区是差的，应当注意培养，但不可因此不敢放手而养成他们依赖的习惯。

（6）最后，四师的创造与发展成绩是很大的，上述缺点的提出并没有减低成绩的估计，但掩盖这些弱点确实是有害的。希望你们对这个指示在中级干部中加以宣传并加以讨论，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向我们提出。

一致努力长期坚持江南抗战

——对江南参观团的讲话（记录稿）

（一九四一年七月五日）

刘少奇

一、江南的斗争任务

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江南要干些什么事，就是你们的任务；怎样干法，就是路线策略和办法的问题。

江南处在敌人后方。党和新四军在那里总的任务是要长期坚持敌后的抗战，一直到最后胜利。收回南京和上海，时间还是相当长的。所以，你们要在江南长期坚持，配合新四军其他部分，配合八路军，配合全国抗战，以达到取得全部胜利，这是你们的任务。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任务？

因为这个任务是重要的，而且是一时候不变动的，没有完成以前总是这个任务。抗战到什么时候才胜利呢？现在算不到。总之是相当长的。因此你们的眼睛看得远一点，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作长期打算，不要只顾目前搞得好。所谓长期打算，就是要作长期准备。短期内不见效而见效于将来的事你们要做；有些事，今天做来很好，很令人高兴，但影响不好，对长期坚持不利，就不要做。不要只看到目前能搞人、搞枪、搞钱、搞地方，而不顾及影响怎样。因为这样便会使长期坚持发生困难。这就是说，暂时的利益要服从长期的利益，我们的干部一定要有这个认识，要长期坚持工作，要安心工作，要晓得决不是一年半年就可完成，而且要负责任，不能“拆烂污”，“干不好屁股一扭”是不对的。

江南工作的胜利，在收回南京、上海而不决定在今天打个把胜仗，搞一点钱。如果在收回南京、上海时，你们不起劲，不能坚决的先进南京、上海起作用，那末今天搞得轰轰烈烈的是没有意义的。党要求在要你们起劲干的时候，你们有力量、有本领轰轰烈烈的干，即是要求你们现在能够在敌后坚持，将来要成为反攻力量，现在坚持的阵地，要成为反攻的阵地。所以，现在就要在城市、乡村、铁路上、据点里多做一点长期埋伏工作，比如现在不必去破坏铁路，而是在铁路线上普遍建立工作，将来反攻时，把这些准备好的力量一齐拿出来，一下子断绝敌人的交通，便利我们打到上海去。

对于你们和群众的关系方面，也要有长期的打算，多结交些老百姓做朋友，不要多结仇人。长期坚持这一点，要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使各项工作都能根据这个原则，时常联系到这个原则，如：为了完成长期坚持的任务，就要搞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搞财政经济，搞武装，组织群众……这些都是为了长期坚持。没有长期坚持的观点，这些任务，便无基础了。因为既不要长期坚持，那何必要根据地？何必要民主政治？何必要……？同时，没有这些东西，长期坚持的任务也不能完成。

这个任务是否能完成呢？

我们一定能完成，但是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敌人要反对你们，汉奸汪精卫要反对你们，他们还要收买一些自私自利的家伙和流氓地痞来反对你们。在全国范围内，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还没有搞好，所以顽固派还要向你们进攻，跑到敌人后方来跟你磨擦。因此你们要在和敌汪严重斗争中来坚持，而且要在和顽固派严重斗争中来坚持。如果你们能够粉碎敌人汉奸汪精卫对你们无数次的“扫荡”及顽固派对你们无数次的进攻，你们才能完成长期坚持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这点。无论敌汪怎样“扫荡”，你们紧紧的依靠群众，顽强的坚持，硬不走，打他不垮就避开，转到他背后去打他一家伙，要用聪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术，很蠢的打法就会吃亏，但不是一切都躲开。只管躲不打，也是不对的。给他们一家伙。表示你们自己有力量。打得他们又痛又怕，才不敢轻易的来反对你们。这就是说你们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自己内部要很巩固，强而有力，能够挨得起打；其次能够运用灵活的战术，要聪明有办法。

对于顽固派的进攻，也要粉碎。但现在顽固派还不可能大批来，因为敌顽还有矛盾。这一点要去扩大它、利用它。怎样扩大他们相互间的矛盾呢？就是使顽固派抗战，顽固派打敌人；敌人打顽固派。这个矛盾就扩大了。单只同顽固派讲道理是不行的。要迫他抗战，想很多办法使他非抗战不可。这就要靠聪明，要用灵活的策略，你们要尽可能和顽固派搞得好一些，矛盾减少一些，象对袁亚承、胡启汉，不要只讲打，而且要统。就是打起来了也还可以统。边打边统，打了再统，这就是聪明灵活的运用策略。不然敌人汉奸汪精卫、顽固派都来打你们，你们就吃不消了，就要逃之夭夭了。

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即是正确的适当的执行党的政策是最主要的条件，其他的条件我们不多讲，只要能使敌汪顽固派赶你们不走，你们能在江南站住脚，任务就能完成，所以要在与敌汪顽的严重斗争中来完成这个任务。江南的工作，要一切为了这个斗争。如果这个斗争不能胜利，那么你们只好从江南滚蛋，你们的任务便完成不了。

二、怎样干法：

怎样干法就是我们的方针、路线计划。

首先就要具备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强固的组织；第二要有顽强的战斗力；第三要灵活的运用策略。特别是第三个最为重要。在目前就是叫统一战线的策略，要达到朋友交得很多，而敌人很少的目的。如朋友不多，而敌人很多，这就是统一战线策略运用不灵活，就会吃亏。如果敌人的反共反新四军的统一战线成功了，我们就会失败；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成功了，敌人就很容易对付和打倒。所以你们要记住：“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凡是反对我们的，使他少反对一些，不同情我们的，使他中立，也是对我们有利的。因此公开叫打倒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其他都不“打倒”。反对我们的汉奸，也不必提“打倒”。只要他不来打我们，我们也不要去打他。对动摇的汉奸，更不能喊打，要去争取。对于顽固派不能喊“打倒”“消灭”，但对顽固派要提高警觉性，不存任何的妄想。他们来进攻，给他抵抗，但不放松争取，特别对中下层要好好宣传、解释。对于顽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不是“打倒”，而是采取一打一拉。拉是主要的，使他由打我们变成不打我们。打他只是辅助的，迫不得已的。打他也是为了拉他。“拉”是否可能呢？有希望没有呢？有，但不容易。因此要有耐心。例如他对德意绝交，证明拉他有希望；但他会搞皖南事

变，所以是不容易的，要提高警觉的。将来世界形势转变，顽固派可能是一部分或大部分跟我们走，这就要看我们自己搞得好不好，所以决不能急躁。一急便会出错乱。对于顽固派的战斗是自卫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必须遵守，这是很复杂的，必须好好学习，在斗争中去灵活运用。

在你们的报纸文章中，就有不策略，不聪明的地方，如“打倒顽固派”，“敌伪匪顽”平均看待。对顽固派只打不拉，把打看成主要的，结果就造成敌人反共、反新四军的统一战线。现在不仅对敌伪顽不能一律喊“打倒”，对于敌人也不宜一律叫“鬼子”，不宜一齐都打倒。不要喊杀尽东洋人、杀尽日本鬼子，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日本军阀；不要喊杀尽汉奸或当汉奸者杀无赦，而是打倒汉奸汪精卫。

在打敌人的时候，打过以后，写信给他们队长，死的用棺材装好埋掉，伤的给他医治送返，可以省掉许多麻烦。这并不是和敌人妥协，而是使他们向我们妥协。我们的抗战立场坚持了，动摇了敌人。这个工作要做得很秘密，不秘密就会受损失。

跟顽固派及其他阶层谈统一战线，不能动摇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只要自己的立场能够坚持，什么人都可联合，比如，我们这里昨天从韩德勤那里回来的，今天就请他当参议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今天还是要联合。他们反共一面无从联合，要反对、要斗争；抗战的一面要联合；我们要拉的就是这一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战的一面又分两面，有抗战的和动摇的两面，抗战的一面要联合，动摇的一面要斗争；反共一面中，一方面进行反共，一方面不敢与中共公开分裂。我们也采取两面政策，反共时要斗争，反共、动摇的、不坚决的要拉。只打不拉便是基本上的错误。不可性急，坚持我们的政策主张和态度。自然可以使人明白、感动。不要怕人家来同我们共事，正要他们来，但警觉性也特别要提高。不要以为是朋友了，便不会搞我们的鬼了。统一战线是党的策略，不能离开阶级的，是具体的，不能是超阶级的，但统一战线的组织，都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如政权参议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和新四军是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的，不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严密党和新四军，便不怕任何人来与我们共事。

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统一战线的组织不能混淆了。如果混淆了，便会产生过左过右的倾向。在政权中的共产党员，以统一战线的面目出现，以各阶层的全民代表的面目出现，但执行的是阶级的党的政策，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与地主、豪绅等同化。你们过去搞的自卫会，形成工农民主专政，这是不正确的。工农群众要组织好、教育好，我们才有依靠。这一点绝不能动摇、绝不能因为搞统一战线便不组织工农，不去教育，不去加强工农群众，不去改善工农生活、发动工农斗争。如果是这样便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样统一战线便会搞不好，相反正是要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发动起来，统一战线工作才能开展。只有过分的“左”的倾向，才会同地主统不成，因为今天他们懂得在抗日民主政权下过日子，比到顽固派、汪派那里去好得多。

所以要开展统一战线，就是要适当的开展阶级斗争。这些你们要好好研究。你在这点搞得好，便能完成长期坚持的任务。

你们必须公开承认过去在这方面的错误，由政府或有威信的首长（如谭师长）召集座谈会来讲，去掉地主、豪绅们的恐慌心理，很快的组织参议会。不要把参议会当成一块招牌，参议会通过的决议，可行的政府就要执行。政府要办的大事情，交给参议会去讨论通过，照他们的决议做。只要主要是执行我们的政策，有些地方要让步，不是全部执行我们的政策，

有些地方要照他们的意见做。在政府里面要有地主士绅。他们不会干事不要紧，影响是很大的，在政府里面的工作要讲些形式，即是要摆点“场面”，讲些“规矩”。这一套对于工农群众是不需要的。对工农群众是群众化，不要摆官僚架子。这些东西在不同情况下灵活变化，但有一样东西不能变，即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个立场一变便是变节。

这是你们回去要搞好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把群众运动搞好，把工农妇女、青年组织搞好。你们今后要吃公粮，买米吃的事，只有你们六师才有，花费太大了。整个新四军，如果都买米吃，一年便要几千万块钱，那就是二部、四部印刷机来印钞票也来不及。你们不要以为吃公粮，群众工作就不好做。我们在这里要收田赋，要吃公粮，群众工作不一定比你们那里坏些。你们搞得时间久，又不吃公粮，群众工作不见得比这里好得怎样，所以只要办法好，解释工作好，一定可以吃公粮，而且老百姓会欢迎，群众工作也可以做得好。只有吃公粮才能长期坚持。你们现在就要这样做。养成了吃公粮的习惯，困难到来才能应付。这一套便是马克思主义。你们要好好的去学习，才能解决经济困难。

江南的群众工作有一些，但不正规，组织基础不广泛、不健全。你们和群众的联系还不密切。江南群众工作中心问题在如何加强你们与群众的联系。什么叫与群众联系呢？就是取得群众的信仰与爱护，愿意为我们牺牲一切。那末，敌人、汉奸、顽固派就赶你们不开了。如若不是这样，现在“天下太平”，群众同你们搞不好，将来情况一紧张，群众便会离开你们。象这样联系不巩固，便不能坚持。便要使共产党员成为群众中所信服和心爱的领袖，在危险的时候，群众愿意与你们共患难，就是为你使自己吃亏也不抱怨。因为，同志们，要紧紧的靠着群众，不能对他们漠不关心，更不能欺骗他们或谋害他们一下，要多替群众做事情，无条件的不要报酬。你们深入群众，在长时期的工作中，群众一定会信仰你们的。

统一战线搞得好，群众搞得好，队伍搞得好，就能长期坚持。这是三个中心问题。

工作方式问题，“大刀阔斧”的方式有时也可以用，但一般并不适宜于江南，比较隐蔽一些好，不要大吹大擂。形式上不要轰轰烈烈，不要搞得太凶，以免引起敌汪注意，使你们自己吃亏。隐蔽一点搞，使敌人弄不清楚，更便利你们开展工作，为什么不好呢？大众报可不必改日报，能保持现在这样子到抗战胜利就好了。对于你们的民选政权的实际情形，我们还不大清楚。根据我们的了解，民选政权如果太草率，便会搞不好，倒不如委任的好，或由他们选几个再由我们圈定。委任和圈定的权在我们，不在国民党。实质上讲，比民选或许更要民主些。因为我们派的人是赞成民主的，是廉洁的。等到群众组织好了，支部建立起来了，民选就有把握了。目前你们把参议会搞得好也就好了。群众工作的开辟和经常领导，要建立群众工作独立的系统，“工作队”的方式不好。因为这样群众工作就变成附属的东西，威信无从提高。“工作队”取消，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去开辟和领导群众工作。我们首先要尊重群众团体，然后群众才能尊重你们的领导同志。必须详细去研究一个或二三个乡，根据在这几个乡的工作经验作出具体的决定和指示，才能把工作做得好。

部队方面（指六师）要建设正规党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军事技术，组织及制度正规起来。干部问题上，特别要加强党性。自师旅的干部起，来一次彻底的审查。什么叫党性强呢？就是一切服从组织，在自己的意见与组织意见不相同时，亦能服从组织的决定，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对抗时，能够牺牲个人利益；组织纪律对个人不利时，亦能遵守，即为党性强。工作上要有独立干的精神（组织上、政治上就不能独立干），把华中局的指示和帮助看

做“意外之财”。

干部问题，今天军部没有办法帮助各师，还要从各师抽一些人来，等到抗大和党校毕业时，当然就可以帮助各师，现在你们的干部问题，要靠自立更生。

枪支弹药问题，苏北也同样困难，还有千把条枪，修理好还不够地方武装的用，你们可以多造炸弹、梭标，有一把梭标，两个炸弹，配合一部分步枪，就有很大的战斗力。

今后要经常派交通员来联络，送报告，送信来，负责人可二三个月来一次，实行吃公粮后，钱多留一些，送部分到华中来。

论 建 军 工 作

陈 毅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十日华中局出版的《真理》创刊号

——编者

（一）建军工作的重要性

1　皖南事变以来的严重时局：日本帝国主义汪精卫亲日派反共势力，均集中力量向新四军进攻。本军处在极危险境地。皖南部队及军司令部既大部被解决，本军番号复被取消，接着我五师、四师、二师、六师又在鄂豫苏皖各战线上遭受反共大军三十万众的进攻。日寇汉奸伪军又不时出动袭击我军侧背，与反共大军作直接间接的配合。制造内战破坏抗战的阴谋家们，指望在几月内完全解决所谓新四军“残部”。抗战军民及国际间同情人士，莫不关怀新四军的现状和前途，慰问鼓励不遗余力。自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机立断，于一月十八日任命新四军军政首长后，新的军部于一月二十八日宣告成立。半年来的努力，本军突破了被包围的危境，取得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民主阵地的伟大胜利。本军本身反而更加壮大充实，完成了全军的铁的统一，由游击兵团提高到正规军团的阶段，由无数小块敌后游击区，形成了一片宽广的敌后游击根据地。华中敌后数千万同胞在本军掩护之下，享受了抗日民主的幸福。民生改善，民权发扬，民族正气之扶持，开始华中敌后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纪元。本军的力量和所保卫的国土，与全国友军比较：任何一个军，一个集团军，甚至一个战区，都不能与本军比拟。本军所牵掣的敌伪军，约占敌侵华总兵力六分之一强，这是皖变以来本军苦斗中的伟大收获。于是本军成了时局的中心，全国抗战军队除八路军而外，没有那个军队能有新四军那样：享受着空前的国际荣誉，和人民的同情。这证明着中共中央及其华中局领导的正确，证明着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联合反共的阴谋遭着惨败。本军在今天已成为中国抗战的支柱之一和坚持抗战的保证，是无疑义的事了。

2　本军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战武装，中共今天的总的政治任务：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本军在目前即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政治任务而奋斗到底。因此团结人民，争取友军，反对投降，驱逐日寇，乃本军的斗争内容和奋斗目标。抗战四年来的教训：是从抗战第一天起，中国内部即存在着抗日势力，与投降势力两者间的斗争。抗战坚持了四年，正是抗日势力不断克服投降势力的结果。但今天还未最终战胜日寇，亦即是投降危险仍然存在，这说明了抗日势力的发展和强大，尚未达到足以完全克服投降的地步。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在过去尽了坚持抗战克服投降的伟大作用，但为能适应时局的要求，尚需把今天的力量大大提高，因此，建军成为当前迫切的任务。

3　本军十多年来创造了强大的革命军队的基础，皖变以来的锻炼，更加巩固和增强了

本军的力量，这是一面。另一面本身仍然存在许多弱点和严重现象，这些弱点与现象不纠正是足以障碍本军的进步和执行其政治任务的。有些什么弱点呢？主要的是：（一）障碍部队正规化的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正规化的程度不够。（二）只看局部不顾全军总的利益的本位主义。（三）只顾私人利益忘记革命利益的个人主义。（四）对党的政策不能完整把握，只是片面的执行，甚至有违反党的政策的过左过右的现象。（五）留恋过去，回忆过去，对新事物毫无感觉，自满自足不求进步创造的保守主义。（六）长期脱离阶级，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后，使个人架空游离，接受外来的影响，冲淡了自己的革命意识，变成资本主义的思想追随者，于是形成生活上的腐化堕落，甚至干部开小差以及个别叛变的蜕化的严重现象。这说明干部的党性不够坚强，个别的业已另找出路，有的正在腐化中，有的正在动摇中，这是最严重的现象，只有依靠大批坚强干部在党领导之下提高党性力求自己进步并纠正上述严重现象，本军才能前进。（七）部队编制不充实，不整齐划一，执行命令不坚决，工作凌乱无计划性，行动配合不密切。（八）部队纪律要求不严格，仅仅重视群众纪律，对军事纪律经济纪律忽视的倾向。（九）军事技术落后，战术理论缺乏，军事教育及行政工作薄弱，某些干部提升很快，他的能力与工作担负不相称，掌握部队能力差。战斗任务不能绝对保证完成等。这些现象在全军各部队说来只有程度上的不同，绝无根本例外。这说明本军现有力量尚未达到组织得更好，教育得更好，训练得更强，必须要求更进一步来建设自己，改进自己。

4　本军的游击范围，包括了华中数省几百县的广大地区，数千万同胞的生命财产在敌伪的威胁蹂躏之下，均依靠本军强有力的掩护。因此本军今后的抗战任务，是更加重大了。如何牢固本军，扩大本军，是巩固华中阵地的前提。当去年亲日派何应钦等阴谋命令本军北移的时候，当皖变之后，日寇与反共大军以武力夹攻，压迫我们退出华中的时候；华中鄂豫苏皖四省的工农商学各界，均一致要求本军驻防原地，不得轻易移动。因为本军移动居民即失却保障，立即要受敌伪烧杀的痛苦，立即要失掉抗日民主生活，恢复黑暗专制的统治。本军与华中数千万同胞的血肉相联，正遭着敌寇的怀恨，随时均在设法来计算我们。本军只有努力建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扩充自己的编制，把人民的大多数组织起来，才能坚持华中阵地。华中的抗日民主政权拥有新四军这样进步的武装，是民主政权的标志之一，把新四军建设得很好，乃是抗日政权巩固的基本条件。同时中国革命历史指出：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在中国没有武装，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说明掌握武装，建立武装，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为着中国革命长远的利益，新四军本身之加强和努力建军，不仅必要而且是一个长期性的斗争。

5　我们今天建军是与皖南时代的建军有着下列原则上的区别：（一）建军是从政治上着手，首先保证党在本军中的绝对领导权，排斥一切非革命意识的侵蚀。皖南的建军主张，容许本军有两个领导，和降低本军成为统一战线的军队，是政治上的绝大错误。（二）建军目的是为了战胜日寇亲日派，及一切危害本军的阴谋。建军的办法便是集中全力，打开局面，改变环境。我党六中全会即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投降危险异常严重，随地随时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号召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充分准备，以应付突变。皖南的建军，没有清楚看见这一严重形势。一切建军工作离开克服投降的严重政治任务。在思想上组织上战斗方面缺乏准备。形成一种逃避现实，关起大门来，独善其身的技术建军的倾向。其强调反游击主义，是

弄错了打击方向。游击主义一直未纠正，反而取消并压制了本军灵活游击机动作战的革命传统。所以在突然事变爆发时，毫无准备手忙脚乱的陷于大败。反之，本军其他各部份，不仅在抗日方面有了准备，而且在克服投降抵抗摩擦方面也有了准备，其结果就与皖南相反，始终保持了胜利发展的局面。（三）建军是要求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皖南建军提出以质量代数量的精兵主义。不懂得数量质量互相转化互相依存的法则。所谓精兵主义，只在于自己限制自己，自己束缚自己，自己满足自己，发展中断，停滞不前，当然招致灭亡。

（二）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

6　本军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集合体，抗战以来吸收了成千整万的新成份；这些新成份，来自不同的地域，各有不同的历史，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其来本军又各有不同的动机；而部队又处在经常作战不断消耗不断扩大状态中；新的训练尚未成熟，而老的坚强的骨干业已部份伤亡，这些伤亡都是本军十年的精华，是短时期内所不能弥补的。特别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环境中，斗争极其复杂，外界的不良影响不断于无形中侵入本军。加上皖南建军的主张有了原则上的错误，更助长了这种外界侵蚀的形势。由此看来，本军在抗战中虽然日益扩大，某些方面较内战时代有了大的进步；但质量方面尚不够坚强，又在许多方面尚不及内战时代的水平；此时不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与教育，则将发生极大的危险，这是应特别警惕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乃是本军的特质，这一特质，是本军生存发展壮大的基础。保持发扬和加强这一特质，不仅可以保证本军能够日趋强大，且可以进而保证与加强本军对中国抗战的支柱作用。反之，如削弱这一特质，于本军及抗战前途危险性实大。党在本军的领导，就是本军特质的体现，几年来一切外来的反共阴谋，都企图在取消和削弱与破坏我党在本军中的领导，亦即是企图取消和削弱本军这一革命特质。同时本军的斗争也实际是在如何能保持和发扬这一特质。前面指出过本军质量比内战时代较差，同时本军内部现在存在着许多危险的倾向；如某些干部腐化堕落开小差，以及许多不良倾向之发生等。这就说明本军的少数分子已在蜕变。我们的建军正是以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来反对一切不良现象，来保持和发扬本军的革命特质。因此建军便从加强党在本军中的政治领导，保持与加强本军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下手。我们的建军不仅是单纯的技术建军，而且是强大的政治建设工作。不是轻视编制组织和技术训练，而是用强力的党的政治领导去保证一切部门的健全。因此我们的建军任务是加强党对本军的政治领导。我们的建军口号，是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

7　党军就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党依靠这个军队去完成政治任务，作为党遂行政治任务的工具。党军中必须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不断增强这个领导。党军与其他友军相比，虽同为抗战军队；但是保持着原则上意识上的不能混同的区别。党军是具有高度革命自觉性，排斥军队的雇佣性。党军是具有强固的工农革命的优良传统，扫除了脱离群众的混杂游离的社会习性。党军是能做到政策统一，行动统一和指挥统一，没有地方界限，浪漫习性及阶级成见。党军的团结是政治的铁的团结，没有官兵的阶级悬殊，没有军民的冲突隔阂，更没有部队间的矛盾和猜忌。党军不仅对友军不采取孤高自赏的宗派主义倾向，正相反，我们的党军还要善于去团结友军，进行一切抗日的合作。因此党军不仅限于能服从党的命令，完成一切战斗任务，而且还要善于运用和发挥党的政策，去引起人民和友军的共鸣。党军是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执行者。

8　党军的正规化是指军队的编制和组织，能保证实现党的政治领导而言。所以必须是

正规化的军队，才能担当党军的光荣称号。党军在党的政策领导之下，建立了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形成了组织上的一致。即是政治上铁的团结，造成了组织上铁的团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在军队的政治领导，是决定战略方针，发展方向，以及各种策略的，正规化的各种制度和具体工作，如政治工作制度，军事政治教育，技术训练，供给卫生文化的设备，均是从组织上去保证政治领导的实现的。仅有政治领导而无组织办法，则政治领导变成抽象的架空的，不能起改造现实的作用；仅从事于组织上的努力，脱离了政治领导，则是盲目的，单纯技术的，必致迷失方向，甚至会遭受失败。因此军队的党化和正规化是政治与组织的密切联系，是互相浸透的整体。

9 八路军新四军十多年来都在党领导之下奋斗，而且都完成了党给予的任务。八路军新四军之为正规化党军乃是已有的事实，即在皖变中，我皖南的部队虽由于亲日派的阴谋及领导上的错误而失败，但其作战之英勇顽强，亦表现其正规化党军的英雄气概。但为什么又重新提出正规化党军的口号呢？我们认为党化和正规化是无止境的，我们所要求的是党的政治领导，不断增强，军队干部的党性不断提高，军队的阶级性及其特质的充分保持和发扬，正规化的强度的继续提高。这样看来，本军任何一个师旅团都不能例外，都需要提高党性和正规化，乃是最实际迫切的要求。不过在建军进行中可以将建立正规化党军的口号，分别情形，作更具体的规定：在某些主力兵团提出建立模范党军和加强正规化的口号，对某些主力兵团，则仍一般提出建立正规化党军的口号，对地方游击兵团则提出学习主力，赶上主力，建立基干部队，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对人民自卫队则提出加入主力，出门打游击，配合主力作战的口号。总之口号应针对部队具体历史，现在基础去提出，不要自夸自大，部队进步是无止境的，一切取决于工作，老部队要继续前进，新部队要急起直追，建军乃是全军工作的大比赛，向最前进的看齐，反对停留在原位置，不迈步向前。

（三）正规化党军的条件及其最低限度的要求

10 正规化党军的第一个要求，是在政治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养成全军服从党的领导的天性，执行党的政策的完整性，执行命令的坚决性，强化并巩固政委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保持和发扬我军的革命的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就是本军阶级性党派性的表现，那种离开党的领导的绝对性，来说明什么一种另外的优良传统，是绝大的政治错误，我军的优良传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武装的革命特质的发扬；全体军人有最高度的政治觉悟，加强阶级教育和站在阶级立场上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教育，造成本军自己是抗战军队的模范，是抗战军队中最先进最觉悟的一部份，成为团结人民，争取友军，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模范。

11 正规化党军第二个要求，是在军事组织和技术的优越性，要求达到并超过现代中国军队的军事水平。本军富于作战经验，指挥上的灵活机动，战术战斗上的独特创造，临阵时的英勇牺牲，和坚强勇敢的精神，政治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坚强性和独创性，游击战术的伟大发挥和发明，这是本军的特色，超过中国其他军队，即日本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承认而引起畏惧。然而本军军事方面仍然存在着下列弱点：兵团指挥尚未深造，组织战斗的能力尚不充分，战略战术的理论素养尚未提高，军事教育尚无完整周密的系统，限于应付目前的战况，未能逐渐去接近现代的技术水平，长于实际缺乏理论是一般的弱点，我们一方面应吸收苏联红军的新战略战术原则，一方面应研究世界大战的新经验，最主要的是继承和发挥内战时代

及抗战以来的经验和传统，有系统的，批判的融化起来，造成理论与实践的更高级的统一，那种“老子只会打仗、只晓得冲锋，不爱听讲什么道理”，这种反对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应该去掉的。

12　正规化党军第三个要求，是在纪律上要求军事纪律群众纪律两者并重，提高自觉遵守纪律的热情，做到模范纪律的地步。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测量器，军事纪律的提高基于随时有敌情观念，群众纪律的保持基于全体军人具有群众观点，随时不忘本军是人民的军队，与一般雇佣性的军队完全不同。本军现在有只注重群众纪律忽视军事纪律的偏向，这就是等于削弱了本军的战斗力，本军某些部队保持着原始农民队伍的游击习气，证明军纪的薄弱，是经不起持久战斗的，没有军纪即无从保持战斗的胜利。本军某些部队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军阀残余，是要脱离群众孤立自己的，两个偏向均应纠正。同时纪律又是团结内部的轮带和锁钥，纪律严明，共同遵守，人人生活都愉快，能做到各尽所能，各负其责。纪律严明，对于守纪律的兵员，等于鱼水的不能分离，对于坏分子则是一种拘束和裁制，而这种拘束和裁制是完全必要的。另外纪律又是解决军民关系的桥梁，纪律好即是向人民说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人民根据军队的纪律，即可判断革命军队及革命政权的性质，来决定其拥护或反抗的态度，某种政权必具有某种军队，人民对政权和军队的性质，在开始接触的第一天，常常从纪律上来判决，同时军队也是以其纪律对人民作日常的切身接触，这乃是一个真理，是我们主张模范纪律的根据。

13　正规化的党军第四个要求，是在行政上编制上工作制度上事务处理上，都有计划有组织合乎规律的去进行工作，分工是严密的、科学的，同时是极负责任的。行政工作是集中指挥强力统率的敏捷机断的高度表现；编制工作是适当配置力量，适当使用力量，长期积蓄力量的表现：工作制度是把各部门的工作规律和要求，写成章程，便利万众共同遵守，并能妥善去解决各部门连系的最科学的办法，事务工作就是一切工作的不可少的实践的重要步骤。目前部队中存在着轻视行政工作，轻视事务工作，和随意解决编制，随意去取人马的游击主义现象，这是本军正规化程度不够的证据。实践即劳动，事务工作即实践，他是基源的，先行的，而理论和原则是随从的，是从实践中洗练出来的，人类实践愈多，因而理论也愈丰富，这样就从实践产生理论的阶段，转为理论指导实践的阶段，特别社会进化到劳心者统治劳力者的阶段后，重视理论轻视实践的错误现象逐以发生，特别那种鄙薄劳动的观点，乃是统治阶级的观点，我们应反对的，究其实，脱离了实践任何理论变成抽象，无关现实的东西。人们只要求党军会打仗，会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的任务，人们也以此自诩，可是细心研究，部队十几万人，要穿衣、要吃饭、要行军、要宿营、要药吃、要钱用，这些实际问题不先行解决，必然谈不到什么打仗分胜负的问题，所以妥善解决行政工作事务工作乃是一切工作执行的前提。人员马匹，辎重行李，弹药武器，都是军队战斗力的构成部份，用一定的制度，一定组织去贯串他，用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手续去处理它，这就是指挥艺术的基础。

14　正规化党军第五个要求，是在作风上充满革命热情，建立宏大的规模，具备雄伟的气派。我们军队是力求创造进步的军队，是与服从旧传统的保守主义不能并存的；我们军队是有远大理想的军队，是与庸俗猥琐的事务主义对立的；我们军队的生活训条：是严肃、活泼、紧张、团结、友爱、学习，对新事务有锐敏的感觉，对旧事物能不留恋能批判加以扬弃。我们主张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把新旧干部截长补短溶为整体，消除其对立，共同为党为革命服务，反对无原则的纠纷，即对无原则的纠纷亦应提到原则的高

点加以解决。锻炼全军十几万人都有远大的眼光，开阔的手面，丰富的学识，健全的体格，充分的学习精神，严格有规律的生活，这样来造成我军先声夺人威震四方的革命气派和工作作风。

（四）建军中的政治建设

15　政治建设是建军的中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五大项（一）提高干部的党性，（二）强化政委制度，（三）加强政治工作，（四）健全军队党的组织工作，（五）加强全军政治教育。这五大项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五个环节。政治建设必须从这五大项做起。

16　首先讲提高干部党性问题，军队是交给干部去指挥的，是主张坚决执行命令的，几万人的进退生死都决定于一个或几个干部之手，军队的干部是有枪在手的干部，是掌握兵权的干部，如其服从党拥护党，运用政策灵活，自己党性坚强时，于革命于党真是无价之宝。反之，如党性不强，打个人算盘，领导错误的时候，于革命于党的危险性最大，常常造成危害全局不可挽救的失败。在军队中不仅要重视一般干部的党性问题，而且更特别重视高级干部的党性问题。

17　本军今天掌握了一批优秀的负责的干部，能独立领导，掌握路线、于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为党奋斗，这是本军的骨干，是经过长期考验的人物，是不怕火烧的真金，是全党应该尊敬的人物。但确有一小部份干部尽管是老资格，尽管干革命很久，到今天对斗争感觉疲倦，感觉难以继续支持，残留在思想中的旧社会意识，并未肃清，在统一战线的新环境下，与外来的资本主义影响遇合，便立即起共鸣作用，这样的分子尽管资格老，地位高，而实际他的心事，早已不在继续革命，他是逐渐腐化，对党对革命正在起离心作用，其结果必然会走到离开党离开革命的危险道路，比如本军一个团长李忠民便是一个标本例子，他专讲资格，不讲工作，专藉口党的干部政策要求党去顺应他个人，而不讲他个人应该如何来为党工作，他造成个人的权威，讲究生活的舒适，以革命功臣自居，以革命贵族自视，他以为党的纪律军队的纪律都不是为他写的，他可以对党提出特殊待遇的要求，他甚至仇视党内的积极分子，仇视党所进行来的革命积极而优良的新成份，他利用党爱护老干部的心理，来达到个人的私欲，李忠民有了这样的表现，虽然经过党不断的斗争和教育，仍不愿改悔，终于走到开小差的可耻道路。李忠民仅仅是一个例子，这种人在本军各师团中并不止一个，值得大家拿来作一面镜子，当着自我检讨的参考，凡有程度上相似的地方，应该自觉的纠正，党是主张对这类障碍进步，党性不纯洁的分子，在原则上采取坚决的态度，要求其改正与无条件服从党，愈是资格老，愈是有功劳的，更应该作服从党的模范，如其中有不听教育，不愿改正的分子，错就错到底，这是他自绝于党，是应采用必要的组织办法的。

18　我党华中局在党中央指示之下，开始创办党校，大批重要干部纷纷要求入学，这是好的表现，但仍有个别分子固执不求进步，拿个人的唯心推测，来误解创办党校的意义，认为调训即是受处罚，即等于撤职，坚持其我个人无须受训的自高自大情绪，这正表示其党性尚很不健全。另一方面，一师某旅最近特别注意党性教育，亦开始了好的反映；许多把自己不应得的东西交还给党，并且向党写申明书，完全无遗漏的暴露自己不正确的阴私，这是好的表现，党对能彻底批评自己的党员，党是特别奖励的，纵使他过去犯过大的错误，并不妨害他今天纠正后努力去做一个好干部好党员，党之信任他是不成问题的。

19　同时得指出有更大数目的新党员新干部加入了我党我军，这同样是我党我军宝贵的财产，这些新成份有革命热情，有学习求进步的情绪，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接受新事物的

锐敏感觉，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党特别看重这一方面。特别鼓励他们努力服务。但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均不够用，党性不强，没有经过锻炼，党是望他们在长期斗争中去锻炼自己的党性，但必须指出这些新成份当中，亦有一部份人存在着不正确的倾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不服从组织，强调个人自由，喜空谈不切实际，喜争地位不愿埋头工作，喜欢闹无原则纠纷挑拨是非，无组织的发表不负责的言论，自高自大不尊重老同志，自以为本领强，服从个人，不服从组织等。这都是小资产阶级习气，随处都与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发生矛盾。牺牲个人呢？还是服从革命服从组织呢？在他们仍然未能解决这一革命根本问题，甚至还有最坏的个别分子，表现他带着一种投机心理来参加革命，参加我党的，是因为我军我党在抗战中争取了优越的地位，革命胜利发展已为广大人民可以耳闻目睹，这种人是过渡同船，为争取个人的发展而来。他觉得在革命发展时代走反革命道路走不通，不如此时走革命道路反而可以一帆风顺，扶摇直上，这种基本为个人而不是为革命利益而来的，是真正的投机分子，他们隐藏在党内只是一时间的事，终久必被淘汰。我们应正告这样的人，今天共产党新四军有饱有经验，已具有充分的判别能力，显微镜下可烛照一切，我们希望他能够认识党，认识自己，重新定下自己的决心，能向好的方面转变，那仍就是好的，抗战四年来我党我军吸收了大批新干部，也依靠新成份，我军才能创造得有今天，任何排斥轻视新干部的倾向，党均反对的。可是四年来的实践，也逐渐发觉着像这种个别的投机分子，是必须注意不能放松的。最近某旅军医处长李子民和他的爱人邱剑辉，两夫妇共同拐款潜逃，两人都加入党，前一时期工作表现并不坏，这就是投机分子一流人物，这正是抗战吃紧，国内摩擦紧强，本军斗争更为艰苦的反映，他们到了紧急关头，不愿个人吃亏，所以逃跑。我感觉摆在新干部面前有这样一种区别：同样是努力学习，但一种是为党学习，学习好去努力实际工作的；一种是为了能够懂得辞句，便利在党内争取地位，把自己摆在又革命而且又安全的地位；同样是开展自我批评，一种为了党的利益，一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同样是尊重党的机关，一种是为了党的利益，一种却是为钻地位谋晋升之阶；同样是努力工作，但可能含着为党或自私的某种企图。这些分别是微细的，最初是看不见的，发展起来结果相反，所谓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因此我们认为党性锻炼是要求养成一种服从党服从革命利益的性格，并使之发展成为党员的天性，成为极其自然的，毫不做作的。我们处在小生产占优势的中国社会，每个同志入党之前，都有小生产者习性，他必须于入党之后，拿无产阶级的意识去克服和代替他的小生产者的意识，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不要说我一个人可以例外，我一个人在短期内就已解决这一问题，个别老党员十多年并未能解决这一基本问题乃是常有之事。

20　党性是什么？本军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回答得最明确就是"一切服从无产阶级的与革命的战斗利益，就是一切服从党、服从组织，牺牲个人"，而且这种服从是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变动的环境中，党的政策策略的灵活运用中，去表现和体认的。胜利环境，和平环境，短短时期不容易作一个同志的党性的结论，但在长期斗争中，任何人也不能掩饰的。根据上面的干部状况，所以我们主张本军政治建设以干部教育为中心，干部教育又以提高党性为重心，并应该采取下列步骤：（一）普遍建立和恢复干部小组会，专门讨论党性，牵引干部间相互批评，（二）干部轮流调党校受训，（三）重新教育新老干部，督促自我学习，（四）全党尊敬老同志，大胆提拔新干部，（五）对不称职或有坏倾向的干部，应该调换，（六）全军各旅团干部应设法对调工作，打破恋栈割据的观念，（七）责成各级政委，特别注意干部审查，和教育工作，（八）大胆培养非党干部，提高干部质量，对非党干部尚未成

熟时，不一定迅速介绍入党，应经过长期考查，（九）责成各级政治机关应在下层及角落里面，去发现那里被压抑，被排挤，受委屈而基本上很好的新老干部和非党干部，加以提拔，申张正气，（十）提倡引进大批作地方工作，群众工作，党性坚强、成绩卓著的老党员，加入军队，担负政治工作，（十一）强调政治工作人员作干部的模范，（十二）创造干部和干部应具备的条件：（1）绝对服从党，原则上的坚定明确，（2）学习的模范，（3）艰苦生活，（4）完成职务并协助其他同志，（5）有斗争精神和民主工作方式，（6）有独立领导工作的能力，这六条作为我们选拔干部与同志自我检讨的标准，我们要求干部同志都向才德兼备方向去修养，提高党性（即党德），更为目前要务，但不是主张可以不要才能。

21　我们不仅注意党内新老党员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而且还应用大力去培养和提拔非党的干部。目前在本军中党员与非党员之间，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其关系尚不够健全。然而非党干部及一切尚未取得党籍的同志，他们在本军中有极大数量在各种工作部门占着相当的地位，对本军有很大贡献。很显然本军如没有他们的帮助，一切事情便也不好办，或者办不成功。目前非党干部同志中有人颇有些不满情绪，工作关系，尚未做到完全互相信任，安心愉快的地步。我以为应从三方面来解决此一问题：第一，首先党员应了解协助非党干部非党同志，是每个党员的革命义务，任何轻视歧视都是不许可的。我们党员在未入党之前，羡慕党员的光荣称号，努力工作，积极取得党籍。可是取得党籍之后，便以先进分子自居，而以落后分子看待别人，这种自高自大的情绪便障碍着我党与一切非党同志的合作。党员应了解我们共产党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绝不仅是党本身的力量，我们共产党员之所以受人尊敬，绝不由于他的自高自大；共产党能完成一个革命，除依靠党本身力量而外，还要依靠千千万万的非党群众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奋斗。共产党本身是先锋队，任何革命只依靠先锋队是不可胜利的。先锋队的伟大处不仅在于他能冲锋陷阵，作英勇牺牲；而且在于他能领导千百万群众作自己的后备队，共同前进。先锋队脱离了与自己后备队的联系，自己必然失败，这是列宁留给我们党员最宝贵的指示之一，是不应忘记的。我们某些党员恰恰对这个原则是不够了解的。每一个党员应该常常想到自己未入党以前的情况，那时是如何彷徨歧途，如何没有依靠，那时完全因为接触了一个党员，经过他的提携扶腋，取得党籍，我才有今天，变为党员，在党领导之下行动的幸福。因此不仅不应对非党同志骄傲，而且应很谦虚很用心去帮助非党同志，如在未入党前党员来帮助我一样。对非党干部许多不够的地步，应加以体谅，和很诚恳去帮助。何况我们新党员与非党员之间，其思想意识上差别不大，则自高自大是完全应该纠正的事。再则在革命历史上常常有非党同志站在党外来帮助党帮助革命，其贡献远非若干普遍党员所能企及，这种非党布尔什维克，应该一样受着尊重，首先党员就应该尊敬他。第二，非党干部，和尚未取得党籍的同志也常常有一种偏向：因为看见共产党内尚有某些弱点，某几个党员落后行动，便因而对党对党员有着轻视的心理。同时又因为自己尚不能立即取得党籍，便误会党的组织对他歧视。特别在军队中，党的会议不能参加，便误会是不相信他。某些党员对他采取不正确态度，他以为是党也在怀疑他，这些情绪都是不正确的。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实，即他们对党和本军的认识和了解尚差。我们以为非党同志应该放弃急躁心理，应该努力自己的修养，充实自己的工作，不应该不管自己应做事而特别积极想以某种方法去取得党籍。党不仅不歧视非党同志而且随时想在非党同志中去选拔真才。只要你自己修养到家，工作够份，党一定能发现你的。遇着党内某些党员有不好表现，非党同志不应轻视不应因此不平，相反的应本着一贯的同情党爱护党的立场，去加以匡救。这种正确

态度，必然引起同情和鼓励，可以解除一切隔膜，并受到党和党员的尊重。再则我们虽然说明非党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地位，但在非党同志就不必因此企图长期留在党外，总以能加入党的组织为更好。第三，党领导机关为了健全党员与非党员间的关系，应依照下列原则：新老干部发生纠纷多责备老干部，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发生纠纷应多责备党的干部，党员与非党是员发生纠纷应多责备自己的党员。这里是强调党员的模范作用领导作用，所以是正确的。党的机关还应多注意非党干部的教育，本军的各种会议尽可能让非党干部参加，关于政治形势，任务的讨论会议等亦尽可能要非党同志参加。惟党内关于党的组织问题有关事项，特别是关于保持党的秘密方面，则应该严格，即非党同志亦不应去打听这一方面的事。因为共产党是一个斗争的党，担负了革命的历史任务，他要完成任务，必须与强大敌人作战，而各种敌人也特别设法专门对付党的组织，党为了自卫，为了进行胜利的斗争，所以必须保持组织上的秘密，即军队党亦不能例外，这是党员与非党员都应该共同认识清楚的。

22　政委是党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是执行党在军队中的政治方针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政委对军队中一切工作一切行动有督导之权，而且有最后决定之权，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虽然曾规定将战场指挥的决定赋予同级军事指挥员，但不能因此得到在军事作战方面，可以削弱政委权力，脱离领导的结论。政委人材应该严格挑选，首先是具有强固的党性，领导全般的能力，生活工作方面的模范，自己是团结同级下级的重心，对上级指示的坚决执行，不断学习理论，能够把握路线和理论，党对政委的权利给予最大，因此对政委的督促也要更严，而担负政委的干部的自处，也更要严格，政委不仅仅是以自己的职权从行政方面实现其领导，而且是以自己的远见，模范生活，民主方式，说服态度，坚定立场，英明指导，去建立自己的威信。本军政委制度一般已奠定了基础，但仍然有个别的局部的不能称职的情形，一方面是某些部队对政委制度尚无深入的正确的了解，不服从不尊重政委制度的现象，尚时有发生，特别一部份军事指挥员，尚时有不尊重政委制度的现象。军事指挥员应作尊重政委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的模范，只有如此才能使整个部队，对政委制度有正确和理解和观听。目前必须纠正皖南时代，历来把政委改为副职的错误办法，这个办法实质上等于取消政委制度，和削弱党的政治领导。另一方面还得特别检查各级政委人选：他的品质，他的能力，他的威望，特别是他的党性，是否能够称职，不称职的应该调换，再则担负政委的同志，应随时作自我检查，不负党的委托，不负下级的期望，这又是政委干部自己的事。

23　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就是党的工作机关。党对群众团体及政权的领导，是经过自己党员，经过自己党员所组成的党团作用，是间接的形式，民主提议的形式。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经过自己的党员，而且直接在军队设立党的领导机关，政治机关就是党部，而且特别赋予行政指挥的全权，党把自己的领导钳入行政和指挥命令之中，且作为核心，因此各级政治机关，他是以党的机关的地位，调动指挥所有军队的党员，督促其起模范作用；同时政治机关他又以军队指挥行政机关的地位，可以指挥调动和号召全体军人及全体居民。因此政治机关与政委必然应受到部队及全体军人的尊重。政治机关及其工作部署应该：（一）保证党的政策路线和上级命令的执行；（二）以党的政策路线教育全体军人；（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军、瓦解敌军；（四）政治机关及政工人员首先是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目前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已发生不执行命令，不能作模范，发生贪污以及脱离群众违反政策的现象，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虽然仅是个别的现象，我们应该警惕，如不立即纠正，必给我军以大的危害；（五）保证部队之巩固，保证战

斗之胜利，保证全体军人的精神状况物质状况的健全，保证其他军事供给卫生部门的健全；（六）政治工作方式要求适合情况，要求敏捷迅速，要求指导实际。旅团政治工作应该以巡视检查，实际帮助连队工作，口头指导为主要领导方式，旅团以上则一面依靠文件报纸和定期会议，一面抓住巡视和口头实际指导；（七）战时政治工作仍然是本军政治工作较弱的一点，其来源即由于战况吃紧，炮火猛烈，全军进入高度张紧，血液沸腾之际，每每政工人员处此时机，头脑不能冷静地继续考虑，不能于转瞬间反映事物，因此不能提口号，定任务，这是通常的弱点，这要求政工人员有沉着冷静的头脑，战前先有各种可能的准备，尤其临阵应表现政工人员的革命品质，忘记自己，去想到工作，想到战况；（八）新四军政治机关的威信，比八路军要差，因此其政治保证力量也较弱，应该向八路军学习。首先应坚决反对不尊重政治机关的反党倾向，某些部队（一师特别多）在参谋处副官处均有不尊重政治机关的行为，应立即纠正，特别是党员更不容许有不尊重政治机关的违反党纪的倾向，另一面本军某些政治机关也缺乏首先抓住自己的政治领导，从思想意识的教育上，去巩固全体军人对政治机关的威信，常常因为个别政治工作人员本身的毛病，也影响到整个政治工作的威信。同时还有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式把握不牢，特别对部队中非党成份的接待不好，也引起别人以特务工作看待我们的政治工作，这是政工人员应首先举行自我检查的。这种情形在各旅团中存在着，在新争取的部队中更应严加纠正。

24　党的工作在这里人所指的是党在军队中组织工作，如总支部工作，支部工作，党员的训练教育，发展党员，党内处分和批评等。党的组织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第三师在这方面成就最大，值得全军取法。我们应加强党的支部，在连队中起工作堡垒作用：第一、党的支部在连队中应有参与一切工作的权利，我们虽然不赞成恢复老红军时代支部管理一切的原则，但主张在不干涉行政决定权，及军队指挥的原则下，一切经过支部并由支部去保证，是合乎要求的；第二、要特别提高党员的模范作用；第三、要求小组为核心，适当分配党员到班排起积极的核心作用；第四、支书应该专人负责，不兼其他职务；第五、党员及支部应在连队公开，这种公开是为要加强党的威信，改善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第六、本军部队的生活应该适当的民主，才更能发动党员的积极性。一般应保持党员应占全部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数目。数目少于百分之四十，必致削弱党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第七、第三师连队许多工作制度，如巩固部队的看兵制度，流动查哨制度，连队经济卫生制度，连队的学习互助制度，连队补课制度，文化娱乐等，均能以连队为单位去进行，经过支部的独立自动的推动作用，这是值得全军学习的。

25　在全体军人中加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本军过去政治教育中曾把阶级教育与统一战线教育看成对立的东西，且争论不决，这是不正确的。我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我党在抗战时代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为了战胜日寇争取自己阶级解放的正确的唯一的阶级政策，我党用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就是教育他们要善于去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的一面，同时不放松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反动的另一面，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懂得运用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自己的阶级解放。因此，统一战线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即是阶级政策，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目前的建军要一面提高全军干部的党性，一面加强全体军人的阶级教育，并保持发扬工农武装的特质，这必须不能离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教育。因此凡党性强的干部，凡阶级意识强的干部，都必须懂得统一战线政策不违反他，且能灵活掌握他，运用

他。又全军指战员更要从本工农武装的特质上认识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不会过左过右，所以站在自己阶级的立场上加强全体军人的阶级觉悟和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是政治教育的中心。

26　要揭发皖南时代政治工作中的原则上的错误：其明目张胆承认本军政治工作可以容许异己党派的政治主张与党的主张平列，互争政长，并且引用其言论文告作为政治工作方针，编入政治教材，定为政治纲领，这完全抹煞了无产级级政党与友党中间原则上，政治上的区别，甘心放弃党的独立性，将党的领导转让于人，这是政治上绝大的错误；另一面借口说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应该随着抗战时代的新环境加以改变，因而削弱党的领导；我们承认抗日时代的政治工作是与内战时代不同：如以前是内战，现在是国际战，以前是以工农阶级为工作对象，现在是以全国人民为工作对象，以前只作敌军工作，现在要团结友军，同时与友军还有摩擦，大批专门家文化人友军军官加入本军，文化艺术水准提高等，这些都是内容上的不同，自然不宜墨守成规，应有大的改变，但这些新的添加，无论如何不能走到使党的领导削弱；恰恰相反，只有更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使本军能胜利的应付抗战环境，不致在五色迷目，万花撩乱的复杂社会环境中；迷失方向。保持本军阶级的革命的特质，加强本军的政治领导，这是不变的，以这个不变方能应付新环境中的万变，今天本军中当不致重复皖南时代的错误；但不尊重政治工作制度，不尊重政委制度，想以个人威信来代替党的领导，想以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对立，这些恶劣倾向则时有发现，另一面轻视文化工作，轻视新成份，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左的错误，也存在着，这些倾向都是从左右两方，企图来削弱党的领导的，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

27　政治建设中如敌伪工作，统一战线部工作，民运工作，文化工作诸部门，我们不想在此仔细讨论，在华中地方党政权业已建立，部队民运工作应相当缩小，方式应有改变，只宜站在协助地方工作的地位，再不需要军队党去干涉和直接指导地方党了，另一面要养成我军是尊重地方党尊重抗日民主政权的模范。

28　军队文化工作是军事政治工作的助手，不能混同文化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区别，不能拿政治工作来取消文化工作。文化工作他本身具有特点和其不同于军事政治的特殊规律。它在部队中仍有独特作用，特别对全体军人的启蒙作用，以及性情上精神上的陶铸作用。另一面文化工作是革命军队强有力的斗争武器，本军应掌握这个武器，去打击敌人，和保卫自己，但是又要承认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份，他有辅助军政工作的作用，但如强调为单独的系统也是不正确的。本军的文化工作，得着外来帮助，是有一般的开展，但仍未被人适当重视，甚至还被轻视。那种仅以识字课估量文化工作的价值的观点，是庸俗浅陋的观点。文化工作如其具备着反帝的民族内容，反封建迷信的科学内容，反特权阶级的大众内容，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本军在部队内外均应该提高，使其能配合军事政治工作完成战斗任务，除正式操课外，课外活动是文化工作的主要园地。应当尊重文化教员，提高其政治地位，对文化工作的时间应适当分配。对文化干部经常培养，相当保持一批比较专门的文化干部，不要流动性太大，和随意调动。

（五）建军中的军事建设

29　本军军事建设的最大的弱点在于没有健全的司令机关。本军各部队之指挥依然靠军政首长的一手包办，一面是军政首长忙不过来精力有限，而军政首长自己又不放心交给别人，仍然未脱离游击队式的口令指挥的作风；一面是历来不注意司令机关的健全，不愿安放

得力干部在里面；一面由于战斗频繁火线上干部伤亡大，把机关人员实际变成是一个候补指挥员；一面是将犯错误的同志大批塞在司令部机关内，不能称职工作，且不安心，又影响司令机关的威信；这就造成本军部队庞大，统率机关不健全，指挥难以统一，行动难以做到完全配合的严重现象，这是本军各部门过惯独立活动及小家庭生活的反映，下级存有不靠上级是自由自在的心理，上级除政治指导而外，也并不急迫要求指挥行动的统一。但是今天本军业已造成强大集团，担负更严重的作战任务，敌寇等和反共势力一刻不放松的向本军下攻击命令，全军力量统一起来，收如臂使指之效，这是提出军事建设问题的根据。

30 军事建设的重心在建立全军首脑部的参谋机关的工作，参谋工作是组织战斗指挥战斗的枢纽，参谋工作不得视为首长的幕僚工作，一个军部的指挥是由首长加上参谋工作构成的，参谋工作对于首长有其隶属性，绝对听首长的指挥，首长对他也有其依存性，他的生活一时刻不能脱离与首长的联系，可是还有其独立性，参谋工作与首长是一种分工，如果把参谋工作当成文武秘书，只听驱遣，无独立工作的可能，自然使首长变成万能人物，非恢复到自然经济时代，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境况不可，必然使首长变成忙人，毫无时间考虑大的问题，这种现象是不能再保持了。为今之计：（一）纠正对参谋工作轻视观念，军政首长大胆让参谋人员去独立负责，提高参谋处的威权，军政首长应有意识去加以培养；（二）参谋长是首长的代理人，部队的统率者，各级指挥员应以服从首长服从上级的精神和态度去服从参谋长，各级首长对自己的参谋长应尊重并设法发挥其指挥能力。参谋人员应长期在职培养，不能随意调动或改职；（三）将参谋人员与军事指挥员一元化实行互调工作；（四）鼓励参谋人员努力自己的修养，以实际工作建立威信，纠正轻视自己，对不尊重参谋工作的倾向不应让步，应该以实际工作成绩转变其错误观念。（五）普遍建立见习参谋和见习军官制度；（六）加强参谋人员的专门学习，每天作研究两小时军事的规定；（七）参谋人员的质量提高，采取宁缺勿滥的办法；（八）作一个好参谋应该是终身奋斗的光荣事业，党奖励同志从事此种不出风头埋头苦干的同志，每一个团有几个好参谋，比多几个连还要好；（九）参谋工作分作战教育侦查通讯后勤诸项，应以作战科为中心，但目前作战部门最低落应向这一部门突击；（十）确定参谋人员到部队巡视，在具体情况下赋予代表首长的权利，部队指挥员应听其指挥；（十一）为了建立参谋工作，团以上首长副职斟酌取消，即用以加强参谋工作；（十二）各级政委应特别重视参谋工作的健全，经常督促之并出席其会议；（十三）要养成每个司令机关都有几年在职的参谋，以积聚经验养成专家；（十四）参谋工作要能抓住大体，也要能明察秋毫，因此参谋人材的标准要求有军事经验，相当政治文化的素养，冷静聪明的头脑，坚强的识胆，军政首长应于平时留心去物色适当的人物，下决心培养参谋人员。

31 军事建设应提高部队的军事教育和战术研究，本军战术方面长于实战短于理论，存在着对军事技术的不正确理解，实际上军事技术有他的原理和规律，若不去理解其规律和原理，即无从得到优越的技术，何况如战斗动作刺枪打靶操作等固纯系动作，理论思考较少，但仍然是做易讲难，这是由于军事技术有他的特殊规律，距离常识较远的原故。我们强调学习军事技术，更要强调学习军事技术理论，从把握其规律性去了解，这个关键突破，即可一通百通，这是一；第二本军多年来的实战经验有最丰富的内容，即四年抗战的经验，亦何莫不然，但缺乏去深刻研究，用理论方式提起出来，这些实战经验，蕴藏最宝贵高深的原则，是古今中外兵学书上所没有的，目前应提倡把实战经验理论化；第三，我们的干部他善于个人口讲指画，个人闲谈，而不能长篇大论出诸于口，笔之于书，这由于文字程度差，也由于

头脑的分析和综合能力太差，这一工作应由司令机关帮助解决，用口讲记录方式，或用讨论方式去推进；第四，常常有人怕讲错，同时有人以为讲错也感觉是一件担心之事，我们主张大胆的多讲，愈多愈好，先求数量，数量多了造成风气，再进一步去求质量，不然便只有停止不前，永远打不开这片未开垦的沃土；第五，军事教育，本军长处在于抓住了应急的实用这一方面，所以三天新兵即能打仗，可是短于全般发展和面向全套武艺的发展，特别短于高级指挥的研究，这于本军转向大兵团作战前途不适合，所以目前一面加强班排教育，一面干部应注意到较高级的指挥之研究；第六，体魄锻炼非常重要，第二师在这方面很有成绩，值得表扬，我们的战士一般体格差，特别需要加强训练，造成雄纠纠气昂昂的威武姿势，准备同敌人格斗的本领；第七，军事教育着重做到战场纪律，课堂纪律，操场纪律，射击纪律之遵守，一律采取严格主义；第八，发动学习军事，研究军事，各级军事研究会，军政首长应作该会负责人之一，担负作报告，和读书指导；第九，部队应学会夜战、河川战、反骑兵战、平原战诸大项，多着重演习，多讲多做；第十，本军根据敌我情况，战术方针应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大兵团作战，在特殊情况下，才运用之，不到时候想过早跳到运动战，是脱离实际的妄想，会吃亏的，游击战的精髓，在于善于分散，善于集中，分散能作极小的散兵群的战斗，集中则视敌情地形，作较大的突击，总之以养成官兵独立作战，独立游击，就地游击，长期纠缠为主体，这个主张是根据四师二师六师方面的实战要求来说的，应成为全面的准绳。至于在苏北的部队，可以稍加变更，即是除游击战外增加运动战阵地战的项目；第十一，本军军部应创办军事杂志，作为全军对理论实际研究的领导，综合研究华中几年来战斗经验，编订教材，训练部队；第十二，本军各师应发扬自己特长，学习别人的特长，不要故步自封。战术方面，且应向敌人学习。

32　军事编制应有明确规定，才能妥善处理人员武器，和估计并储蓄战斗力，同时也才方便分配任务进行战斗。（一）编制应依照各部情况分订为大小几种；（二）编制应有固定性和伸缩性；（三）减少机关后方人员充实战斗连；（四）坚持多拿步枪，配以机枪和白刃，减少短枪；（五）订定保管武器的特殊纪律，对损害武器者予以最严厉处罚；（六）师旅建立主力团，团建立主力营连；（七）人员武器调动采取严格主义，不经批准，不得带走和私相授受；（八）收集子弹壳节省弹药。

33　建立后方勤务及兵站连络等工作，我们指挥员均有临阵勇敢作战的政治的优美的素质，这是革命军人的本色，可是常常于战斗前后即忘却后面还摆着一大堆，不去管他。另外任何战斗中均感觉各部通讯联络差，然而纠正的很少，要知道前后联络不好，即无从协同动作，而后方无人管理，必致影响前线陷于失败，并常常发生我军人员误落敌手的事实，比如今年三月泰州讨逆之战，即不止一次发生此种过失，这由于平时没有养成注意后勤和通讯联络工作的建设，临时自然手忙脚乱，应付不开。我们的参谋工作一般比内战时代差些，这是组织能力薄弱之证据，我又感觉通讯联络工作亦较过去为差，比如目前的电台电话材料的补充，比过去便利若干倍，人员的文化水准也较高，但我们使用时则感觉异常不顺畅，所以有很好的条件反得着很低的效果，完全是一个组织问题，我们部队的指挥传达法太简单，仅限于电讯和徒步两种，应尽量扩充部门，如使用骑兵，使用汽船，使用声响烟幕，使用旗语，利用有线电等等，内战时代在任何困难条件下可以进行工作的精神，今天应该保持发扬。目前各部队既然在一定地区，独立坚持，应有独立的后勤工作，各级司令部应有专人负责后勤，各根据地后方工作应有专门委员会，和专门机关去管理。

34　军事建设上应注意建设强有力的供给工作，本军供给工作部队并不一样，有的最好，已达到相当高度，有的造成了良好基础。然而有些部队，在这方面则十分落后，不仅浪费即贪污腐化现象也正在暗滋暗长，有些部队甚至相当严重，人们常常拿江苏财物较丰富优裕，所以部队就宽裕一些，华北地区贫瘠，所以部队生活艰苦一些来自宽自解，我们不同意这样说法，我们承认环境对于我们有影响这是事实，但我们革命军队不是完全受动于环境，我们还有改造环境和改造现实的作用，华北部队应作华中部队的模范，这证明我们领导在这方面太欠缺了，为了整顿供给工作：第一，各级政委应切实负起督促指导供给工作的职责；第二，供给工作本是一个专门工作，设法吸引专家参加并造成专家；第三，老的工作人员，工作是负责的努力的，但技术不够，应重新加以训练，其中坏的应严办；第四，大胆吸引新成份参加供给工作，提高技能；第五，对供给工作人员首先应有政治鉴定，不得把犯错误的人送去，滥竽充数；第六，严格执行预算决算，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全体的本位主义；第七，各级指挥员应知道自己应该遵守预算决算，超过预算决算去支配经济，特别假造预算决算，是违反纪律的；第八，各主力兵团应特别注意保护税源，注意开辟财源，应实行先报数后领钱的原则，纠正那种多领后报的助长贪污浪费的现象，这里一松手便会有几万几十万被乱花乱用；第九，提高并建立本军的经济纪律，本军是革命军队，在共产主义思想下行动，他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贪污腐化的思想行为是敌对的。抗日民主政治是廉洁的政治，本军在抗日民主政权之下是这样廉洁的模范，本军艰苦耐劳的生活，官兵平等的制度便是这种廉洁的奉公守法的革命精神的表现，但免不了有一部份旧社会余毒未除尽的人，寄生在本军中，图谋私利，以公家经费来填满私人的欲壑，这种化公为私的偷窃行为，与本军的根本精神相反，所以对这种人便不能再以同志的态度去对待，这是经济纪律应该特别严格的理论根据，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有原则的去分别处理大小轻重的案件，而且应该进行遵守经济纪律的教育。过去各部队对经济纪律很忽视，或者同等于其他纪律之处理，这是不对的；第十，各级供给机关应派遣政委加强政治领导，政治机关应提出健全供给工作的政治保证。

35　卫生工作在军事建设上应提到重要的地位，本军卫生工作抗战以来吸引一批专家参加领导和主持，业已使本军卫生工作较内战时代有所改进，那种设备简陋缺乏科学性的医务，已走向科学医学的新阶段，确定了采用科学新医学的原则，但由于人材不够，设备不全，环境流动，所以卫生工作，仍处在不健全的状态中，目前应采取下列办法：第一，确定卫生工作应以集中前线面向连队为主，则建立几个后方医院是必要的，但按照可能去建立；第二，确定保健在先，医疗在后的卫生工作原则；第三，对内战时代的卫生工作承认其技术落后已无再固执的必要，但那种无医无药的勉力救护精神，火线上与全体官兵并肩奋斗的精神，对伤病员的革命友爱，尽心抚慰调治的精神，独立收留落伍伤员利用民家边地保护伤员不畏强敌的精神，是革命精神的最高表现，这种精神是与一般人道主义的医学有革命非革命本质上的区别的，必须将这种革命精神与新的医学结合起来，建立全新的卫生工作；第四，承认医生与护士应该是分业的，不应该以强制手段，去破坏此种公认的科学规律，但对于资产阶级社会中把医生护士形成两个阶级，互相对立，此种习气必须克服抛弃，提高护士同志的政治地位，使其安于工作岗位，从护士转为医生，一般应经过医学学校的学习阶段；第五，确定本军对待专门家的正确态度，马列主义是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之建立是集合人类历史科学思想之大成，没有现代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马列主义决然不会有那

样丰富的内容，所以自然科学的规律是不断吸引在马列主义的宝库中成为马列主义的构成部分，马列主义是总括的去研究人类自然历史社会的总结，所以他有正确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抓住了具体，也了解全般，他包括自然科学的正确法则，因此凡是真正忠实于科学真理的科学家专门家，只要他真是深入具体地研究了一个部门（比如医学）他就能够深入了解其的辩证规律，将达到与马列主义吻合的结论，但专门家的缺点多半只看见树而不看见到森林，除本行以外便毫无知识，统治阶级为了发展生产，需要高度技术，就利用他们埋头苦干的专门化，不供给他以任何专门以外的知识，同时那些专门家在历史的社会环境中从事研究，他个人对自然的作用“专行”这一部份，虽努力求真理，而他所处的人对人的作用（社会关系）这一部份完全受阶级成见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剥削意识的支配，他每天吃饭消闲看报生活接触都由统治者供给他们，他在一种不自觉的情形受了成见熏染，所以专门家和科学家不可能超政治超阶级，所谓科学的中立性的夸耀，乃是统治者利用他们埋头服务，不管外事，免得多事的一种愚弄。但科学家因为努力求真理，发现真理后，其专门研究常常与其自己从统治阶级方面得来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矛盾；自己的专门部门是想努力求真实，日与马列主义接近，但其从统治阶级所陶铸的社会意识常常要求蒙蔽真理，而日益离开科学，这是科学家常常分两类：一种是替统治者服务的，一种是替革命服务的其原故在此。马列主义揭穿了统治阶级蒙蔽真理黑幕，不害怕真理，靠真理吃饭将历史社会自然各方真理贯通作总括的研究，解决其连锁，所以真正为真理奋斗的科学家专门家必不会反对革命，必会离开统治阶级蒙蔽而同情并接近马列主义，如达尔文与马克思的故事，如罗曼罗兰爱因斯坦之反对法西斯专政，同情苏联，同情真正的马列主义，必不会反对科学，并要提倡科学，给科学家专门家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帮助其作深刻的研究，因此现在资本主义各国为了进行战争之需要，不得不去发展技术科学外，一般科学艺术文化的发展，均被其窒息，停止呼吸，而在苏联反而各种科学均有飞跃进展，开始了人类文化的新时代，这就是只有在马列主义领导下科学才能充分发展的证明。有些专家们认为共产党是反对科学的，乃是一种误会，有些专家们忽视政治的倾向也不正确的，另一面某些同志想用行政手段，去干涉专家的专门业务，这也是非科学的态度，不知道从总的政治领导去说明和帮助专门家，不知道尊重他们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不知道在专门技术的内部，应服从他本身的特殊规律和习惯，而不应该强迫去改变，我们应这样正确的来反对这两个偏向，结束过去皖南时代的争论，开始新的工作，我们要求吸收大批专门家到本军来服务，如医学家，财政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军事专门家等，我们相信在我党正确领导之下，这些专门家一定能得到他自己的发展，本军亦可以取得大的帮助，对于专门家的待遇应有必要的生活改良，但我们不是拿什么优厚的俸金，来收买专门家，事实上能来本军的专门家，必然是同情革命的没有雇佣性的。

36　军事建设应该加强行政工作与事务工作的领导，纠正部队中轻视行政工作，事务工作，甚至有人以为强调行政工作，就是学资产阶级那一套，或者把事务工作，当成无足轻重粗俗劳动，是与革命无关的事情，这些说法是不对的，行政工作是解决上下级关系：军队直的指挥系统，和解决军队同级各部门横的系统的，协同动作的组织手段。他用命令通报训令呈报的方式，经过各部门的专管，与协同来处理全般工作。所以行政工作，在实施领导方面有极大的组织作用。行政工作是军队指挥和处理复杂问题的线索；拉动这条线索，就可以拉动全部，目前部队中习于个人指挥，一手包办，不讲程序，不讲手续，自由凌乱的现象，正要加强行政工作才能改变现状。部队每日行政会议应该开：一件呈报，一件训令，必须经过

首长核定，再转交各有关部门去办理，办妥善后再发出并追究其结果，这是一面，另一面这个待办或已办的文件，应有存根，应归入档案，工作人员应熟悉其内容，以备他日检查。军队里的一枝枪，一匹马，一个人，其来历，其工作分配，其分配工作后情形，和其移转介绍，均用行政工作的一定表格表示出来，一定章程去处理。行政工作弄得有条理，有系统，才便于首长的掌握和指挥，就是一件废物也有废物登记，指明其来龙去脉，这样严密的工作方法，就可以使得部队任何角落不能发霉生锈，不能掩藏任何坏事物，保证部队巩固和健全。现在部队中自由支配人员，自由支配武器，自由支配经费，一无报告，二不经过批准，三则无法查究，四则大家不负责任，正是无行政工作的结果。假使在友军有行政工作的话，正是其长处而不是其缺点，我们当然不要完全抄袭他，应去掉其等因奉此的繁重手续，采取简要明瞭更直接的方式。另外事务工作如部队副官处，管理科事务长勤务员饲养员等工作，所谓每人日食三餐，夜眠八尺，这是每个人在从事军事政治活动之前必不可少的，可见其重要性；但正因为太平常便一直被人忽视。事务工作中为接人待物，送往迎来，是对外团结人民，团结友军的桥梁，对内是处理宿食健全身体巩固战斗力的起点，这些工作仍带重要性原则性，这些工作是党应该去指导的，是各级军政首长应该去关心指导的，努力事务工作同志应该受到全军全党的重视，希望一切事务工作同志安心职务，放弃改调工作的思想，能把事务工作作好，正是一个革命家应有的锻炼。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风，就是高度的革命精神与高度的事务工作精神之结合。

37　最后军事建设应该特别强调执行命令，而且是坚决执行命令，本军集合各地区的力量，造成大的兵团，最初不合手，无共同工作共同作战的习惯，独立搅惯了，无执行上级命令的习惯，终觉得命令是一种拘束，甚至藉口实际情形来抵销命令，将命令打折扣，这是一种不能允许的坏现象；第二种以为军政机关命令与华中局党的命令是不同的，采取不同的态度，殊不知应该拿服从党的命令的精神来服从军政命令，乃是必要的。军政机关正是华中局信托的指挥机关，是委托他来指挥全军的，对立起来看是很大的错误。比如皖南部队即由于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而失败，所以中央特别在皖变教训中引伸服从军委命令重要性，在本军范围中明显违抗命令的事，可以说没有，但可以对命令不理，打折扣执行乃是常见的事。命令有关于发展方向作战方针整个工作布署方面，也有关于日常生活工作的方面，司令者是就全军情形及局部情形来下整个命令，是要求协同动作，某部不执行即会影响全部，造成失败，另一面还有一种自高自大，以为自己很对，很有本事，搅出一面局面，因此对命令指示，含着一种怀疑不信任的心理，以为未必比我强，这种现象不纠正，任其发展，必致走到违抗命令，陷于失败的前途。固然在指示中也有不适合的情形发生，这是可以容许商讨的，但这仅指训令及工作指示而言，所谓商讨是指准许请求改变和回训，在回训未到之前仍应执行，不得藉口拖延。但对命令则应坚决服从，坚决执行。

（六）建军中的地方武装建设

38　在华中建军必须首先确定地方武装政策，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广大地区上进行，敌前敌后，造成无数的大块小块，犬牙交错的游击地区，武装人民独立参战是我党的抗战主张的重要政策之一，这与某些集团剥夺人民武装抗日的权利，是根本相反的。

39　地方武装是不依赖主力来担负保卫家乡的任务的，这里确定了地方武装的独立性，地方武装须得到主力的帮助培养才能有所成就，主力须得到地方武装的协助，始不致孤立，

这里要确定了地方武装与主力互相依存性，地方武装是主力的外围和助手，是主力的追随者，地方武装的建军任务，是逐渐提高自己，变成主力。

40 地方武装虽是人民的武装抗日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只有真正抗日的民众才能够享受，一切靠抗日发财，一切藉抗日谋私利，拿着武装不参加抗日，转而压迫抗日人民，或者暗与敌伪土匪勾结，藉以达到拥兵自卫的人，则断断乎不能容许手拿武装，必须服从抗日政府抗日军队的改编和指挥，否则解除其武装。

41 人民自卫队与青年队是脱离生产的自卫武装。男女老少在一定的年龄均应参加自卫队、青年队、或妇女队。以旧武器为主，应该普遍成立，发挥其抗日锄奸，巩固治安的作用，数百万人民的自卫队与青年队，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雄厚基础，和后备队。

42 承认人民武装抗日的权利，是抗日民主政权的特色之一，但我们不赞成强迫抽壮丁的兵役法，我们赞成以自愿原则扩大部队的志愿兵制，因此承认人民自愿队，地方兵团主力兵团三个阶梯，首尾相联起来，是发动华中全区域人民尽兵役义务的正确办法。

43 华中人民武装在本军扶植之下，在几年来斗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许多部队已过渡成为新四军的主力之一，过去是在地方党部或军队直接领导之下遂行这一任务，目前斗争局面开展，许多独立区域的根据地业已形成，这里要求有独立的地方武装的指挥系统，即是斗争形势业已提出建立军区军分区及县区政府军事工作部门的新任务，这一任务能够做好，即可保持主力兵团的战略主动性，即可奠定根据地治安的基础。

44 地方武装人民自卫队的军区系统，仍然是与主力兵团一样保持党的绝对领导权，几年来的经验，各游击区域的地方武装凡没有党领导的部队，平时尚与新四军维持友谊，遵守抗日纪律，一到形势紧张，即转而危害抗日人民，向新四军进攻，并拖到敌伪方面，或者变成土匪；因此我们根据血的教训，必须坚决主张在地方武装人民自卫武装中党的领导权的应该保持，一切武装均应控制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坚持抗战的保证，自然还有一种同情我党的友军，或与我党协作的外围军一类，那是例外，我们当然不能强迫其接受党的领导和指挥，但主张建立密切联系，互相信任共同抗日。

45 在独立的大块游击区设立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统率全区武装，他是一个战略的独立作战单位，下面可根据实况如敌情地形交通等条件，设立分区，再下则设县自卫部队区大队乡保中队等，县区自卫队即可作为政府军事部负责领导武装工作。

46 地方武装的战术任务是配合主力作战，独立负责巩固边境和保卫后方，地方武装应首先组织基干部队作为骨干，来引导其他部队的前进，地方武装的建设一面应大胆收罗，一面应加强政治领导和成份洗刷，人民自卫队应组织脱离生产的模范队作为骨干。地方武装的战术上以游击战为中心，人民自卫队以破坏道路和桥梁，捉拿敌探，封锁消息，协助主力为战术任务，军区分区应特别着重边界工作，注意敌伪工作，着重锄奸工作及部队政治工作。

47 目前主力部队应以培养地方武装为主，地方武装编入主力应得军部批准，先建设了数万地方武装，及数十万人民自卫队，主力才有可靠的陆续的补充的基础，反对地方主义，因他不引导地方部队向主力转化，反对皖南时代主力对地方武装连根据拔除的编入主力政策。

（七）建军是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斗争

48 建军是全党全军的伟大运动，必须首先克服现存部队中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各级政治机关应领导各部队的思想上的严格检查，党的政策和党对军队建设的主张是测量一切的

尺度，对建军的各种障碍必须扫除，全体军人都动员起来都努力建军工作，才能保证建军工作的进行，应该以师为单位独立进行建军工作，开各种会议，订定具体计划，决定到本年底为第一期工作计划，可首先进行全部队的点验工作，指定主力旅团作建军的推动模范，采用竞赛突击方式，逐渐转为经常工作，以建军运动去推动扩大部队，巩固部队，去保证反扫荡的胜利。

49　建军是伟大的组织工作，建军是全体的政治动员，动员后不应放松的是经常的组织工作，督促检查汇报总结均必须每周每月按期举行，按期上报，并在各部队互相交换经验，制定各种工作条例和章程，本军在创造过程中，决心在第一期建军运动，综合各部队的经验，来进一步解决编制和各种法规，及工作方针，战术方针，我们不以现有的为限，在建军运动中去深入理解和创造。

50　建军是伟大的学习运动，建军中心在进一步提高本军，进一步提高干部。因此发动伟大的学习运动，特别是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有决定意义。政治上学习马列主义与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军事上总结抗战经验，加紧战术理论学习和实战演习，行政上则强调实行八大制度，加紧事务工作，对干部则以提高党性锻炼与军事理论素养为中心，对全体军人则以服从我党绝对领导加强政治军事教育，坚决执行命令，尽忠职守完成任务为斗争目标。

51　本军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成立到现在，已经三年零十个月了。中间经过无数次的事变和艰苦奋斗。皖南事变是本军完成大兵团的转捩点。在中央及华中局军分委领导之下，全体军人应认识新时代的需要，以新的眼光，新的精神，来进行建军运动。团结全军像一个人一样，立即开始工作。

（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共二十周年纪念）

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二月）

一、在残酷和紧张的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面前，革命的一切敌人（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对与革命政党与革命群众，不仅采取公开的逮捕破坏，而且还采取暗杀的手段，派遣暗害份子，混入组织，伪装革命，利用党内某些弱点，来实行暗害，以遂其借刀杀人的毒计。这种暗害手段是极其阴谋毒辣的。它不仅可以达到其屠杀革命者的反动目的，而且可以蒙蔽与欺骗群众，使一般群众对革命政党发生恶劣影响，丧失革命政党的威信。我党在这一方面，由于十年的斗争经验，对于这种暗害手段，虽然亦有深刻的认识与高度的警惕，但在抗战以来，许多地方新发展起来的党，由于斗争经验的缺少，干部幼稚，没有了解锄奸政策。便给了暗害分子以可乘之机，来实行其借刀杀人的毒计。湖西肃托事件，便是这种暗害行为的一个证明。

二、一九三九年八月湖西地区（山东微山湖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曾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的阴谋之下，采取非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的等诬陷手段，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乱打乱杀的恐怖，而且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受到极大的损失，地方党在该地区内，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悉被摧毁，忠实的党员和群众，遭受无辜的牺牲；我党我军的政治威望，也受到极大的损害；同时反共分子和日寇，则乘机造谣，挑拨我党我军与群众的关系，煽动群众组织杆子言，以反对八路军。这一悲痛的事件，虽在同年十一月，即为党的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所制止，但直到现在，该地区的工作尚未完全恢复起来。群众的疑惧尚未完全消逝。无辜牺牲者的冤屈，尚未昭雪。对于为王须仁所利用的负责干部（如西支队的政治委员王凤鸣、区党委委员白子明），还未予以应得的处分。因此，中央认为有将这次事件，向全党公布，而引起全党严重警惕的必要。

三、反革命暗害分子这种阴谋，非常毒辣、非常危险。但是，如果我党在各地的组织能够正确认识问题，正确把握政策，仍然是可以避免的。可惜湖西区没有能避免这种暗害，而上了敌人的当。因此，中央认为必须指出，当地党的组织的错误，将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全党，提高警惕性，免受敌人的暗害。

甲、中央认为此次错误的基本原因，是在于当地党与军队的领导人员，对于中国托派的反革命力量，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主观的夸大了托派的力量，一方面不相信已有相当斗争历史的干部，不估计他们工作的表现，给以客观的事实的估计。另一方面则简单化、扩大化，把一切在工作上表现不好、意识较差、生活上倾向腐化的分子、都看成是托派。单凭口供，任意拘捕。而隐蔽在党内的暗害分子，如王须仁，则得乘机活动，伪装忠实，用一切方法，扩大事态，以售其借刀杀人的毒计。

乙、湖西事件的另一原因，是湖西地区党的组织在大量发展中，忽视了吸收党员的基本原则，忽视了严密党的组织，犯了拉夫主义的错误。因而混入了个别的托派分子和一些暗害分子，混入到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如王须仁混入湖边特委任组织部长）。这些人在平时便吹牛拍马，阿谀逢迎，以便取得一些幼稚的领导者的信任，获得暗害革命党员与革命群众的机会。湖西边区党的负责人和军队的领导者都没有警惕到这一方面，军队的政治委员王凤鸣，把这些关系人命的大事，完全推托在一个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王须仁的身上，任其胡作乱为，对于该地区忠实的干部，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如王文彬、张如、马霄鹏等），则勒逼口供故意陷害。这恰恰是中了暗害分子的诡计。

丙、军队领导者与地方党负责人，缺少政治原则的团结，甚至因为工作关系，没有明确了解，而造成彼此的不满，又不以党的方式提出解决。因此暗害分子也就利用这种空隙来进行其挑拨离间，进行暗害的阴谋，军队政委代替了和包办了地方党的锄奸工作，不信任当地党的组织，超越党的组织系统，任意妄为，是完全帮助了敌人，削弱了革命的力量。

丁、同时必须指出：湖西事件发生后，区党委和四支队始终没有向上级的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报告，这是极不允许的现象。而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在接到通知后，没有即时采取直接步骤，去解决这次事件，因而不能使这一事件立即停止扩大，也是使党受到损失的一个原因。这种处理迟缓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对自己的忠实干部信心不够，对反革命的陷害手段估计不足。

四、对于这一事件的善后办法，中央有下列决定：

甲、四支队政委王凤鸣，受暗害分子的利用，竟然假冒中央名义，乱杀胡为，既不报告分局，又不接受分局及一一五师的制止，应即撤消工作，开除党籍，送交军法处判处徒刑。白子明受王凤鸣威胁，随声附和，应撤消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

乙、彻底调查登记并审查此次被杀诸人。对于真托匪及暗害分子，应公布其罪状，对于无辜牺牲者，应在党内刊物上公布他们是被托派及暗害分子陷害的无辜牺牲者，并在党内召开可能范围的追悼会，以示昭雪。

丙、对于被难者的家属的处理：第一、分别派人安慰抚恤；第二、关于处罚王凤鸣、白子明的决定，应通知各被难家属并公布；第三、公布被难烈士之文件，应送给被难者家属阅读，召开被难烈士之追悼会，应请其家属参加。

丁、对于被诬同志，因严刑拷打而表示自首者，基本上应当原谅他们的幼稚，不能当成党内叛徒看待，不能一律开除党籍，应按情节的轻重，给以分别适当处分。估计到他们湖西信仰已经失掉，应调到别处担任工作。

戊、在湖西党内应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审查干部，清洗内奸分子，保证党的巩固。首先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掌握在经过考验的可靠的党员手里，但严防借此大批清洗或造成清洗运动，引起党内的不安现象。更不能把一时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犯了错误的同志，看成反革命和内奸分子。

己、中央责成山东分局，将此事件的经验教训，根据此决定，写成简明的党内文件，教育全党，并责分局派专人去解决上述诸问题，抽派之人应向党内及被难家属申明，系受中央和分局命令来处理善后问题，中央这一决定希望全党传达讨论。在传达讨论时，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一方面要反对右的麻木不仁，忽视反敌探奸细及暗害分子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反对左的扩大反革命力量，引起自己的惊惶失措，这两种倾向都是有害的。

对苏中今后工作方针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陈 毅　刘少奇　饶漱石　赖传珠

苏中党政军首长：

陈对于南部工作布置同意。请着重下列各点：

一、南部工作反磨擦已总结，应特别强调抗日，在人民中进行民族教育，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游击战在人民间作普遍宣传，在学校间作为课本，务使人民家喻户晓。坚决反对投敌分子与敌常驻据点，主持维持会一定要得到我们许可（秘密的），否则一律以汉奸论罪，开始应坚决杀伤及镇压之，以转变和提高抗战空气。

二、地方群众工作应列为党政军的工作中心。军队派赴地方民运工作的同志，即应拨归地方党指挥，只有如此，才能深入工作。由军队协助，要说服部队同志，拨枪拨人归地方党去建立根据地，并不会蚀本，只有把地方工作深入，根据地建立，部队才能更有深厚的巩固与扩大的基础。

三、部队各旅团营的工作应加强抗日的教育，战术改进，克服新成份中的恐日病，加强审查干部，防止叛变开小差现象，以不断小战防碍敌建立交通，打击敌运输，破坏敌交通应列为目前战术的主要行动。

四、对李明扬、陈太运、詹畏佑继续用抗敌合作去争取他们，不仅注意上层，而特别注意下层，可进一步与之谈判政治、军事合作条件，我们应不吝惜一切帮助，只有如此，才能使他们转向我们，特别在他们将要坍台以后，更可全部为我吸收。

五、两李、逸峰、陈玉生等或已为党员，或已可争取入党，则应特别加强政治教育，克服其个人主义意识，大胆信任他们，利用其长处，特别是苏北人，要他们出来领导抗战和反投降运动，对俞福基、邱冠生等则应于可能时歼灭之。

中央军委对反共军与友军政策及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四月）

一、这次皖南事变及反共高潮中，事实说明国民党系统下的军队，可能分为下述不同的四类。即：

1、已与日寇勾结好了而坚决反共的（荫藏的汉奸队伍）。

2、未与日寇勾结好但亦坚决反共的（真正的顽固派队伍）。

3、对反共暂时守中立的。

4、对我同情的。

二、我们对国民党军队的总方针是：联合同情者，争取中立者，剥夺顽固者，消灭隐藏的汉奸队伍。以求得争取多数军队坚持抗战到底。

三、为此目的，必须：

1、慎重的分别上列四种军队。但是这种区别的判断，应根据其一般本质，而不应据据其一时的个别现象，不分对象一概打倒的过左政策（这是目前主要的错误）及不分对象一概让步一概帮助的过右政策，都是不对的。

2、注意各种军队的相互转化、抓紧时机采取适当政策。如果情况已变，就不能拘守已经过时了的政策。

3、利用日寇与顽固派的矛盾（这仍然是主要矛盾），利用中央军与地方军的矛盾，利用各军保存实力害怕削弱的心理。

4、分别长官与士兵，分别上层与下层。

四、对上述四类应采取不同政策，以达到总目的。

五、对隐藏的汉奸队伍实行下列政策：

1、在宣传上，动员舆论公开揭露其汉奸事实，使群众不为蒙蔽，但目标必须集中于汉奸头子一人身上，不要多树敌人。

2、军事上，给以打击直到消灭之。但已被俘虏者，不论头子与部属，一概不杀（除战场上不得已外）。对一般俘虏一律优待，部分放回，对其头子可长期优待之。

3、建立或恢复秘密党的组织，以长期埋伏取得地位为基本方针。

4、除了汉奸头子外，仍与其他军官进行联络工作。

5、动员其官长与士兵家属，以某种方式瓦解其部队。但须绝对保护该家属的安全，不得有没收财产、虐待杀戮等行为。

6、动员汉奸头子的家属亲友等谆谆劝告，做到仁至义尽的争取回头。

六、对顽固派部队，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

1、一方面赞助其与日寇作战，制造其与日寇作战的机会。在其与日寇作战时加以赞扬，我则乘机发展，但无在此时进攻顽军。在其有被歼灭危险时，则给以少许帮助，免其被歼灭而引敌向我。另方面反对其反共，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斗争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及优待俘虏官兵的原则。

2、一方面公开揭露他的反共行为，指出反共必然走到投降。另方面继续联络工作，加以劝告。对杂牌军则着重指出反共必中蒋介石渔人之利，并订立各种书面或口头的协定条约等。

3、建立党的秘密工作，在共反共或投降时拖出队伍，保存原有番号进行抗日工作。一般的以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为方针。如党员已经太红不能长期埋伏的不应勉强，应掩护其逃来我军。

4、凡拖出的队伍，虽然保留原有番号，但必须迅速开出靠近我军加以改组，但仍为外围军。对旧军官须坚决撤换，其中绝对不可靠者给以其他工作或礼送回籍，对可靠的军官则须坚决留用。必须建立起我党与进步分子在该部队中巩固的组织上的领导，然后让他独立活动。否则，会前功尽弃。山东某军某师的教训再不能重复。

七、对中立部队争取其继续抗日及成为我之外围军。

1、照顾中立部队的利益。在防地给养等问题上实行互让，在对日作战中实行互助，在对顽作战中勿侵犯其中立地位，在言论上互相尊重。

2、双方不进行破坏工作，互相帮助巩固部队。

3、不在中立部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已有组织的停止活动，只发生个人关系。

4、在中立部队被迫进行反共战争时，相约互通情报、互相避战或打假仗及缴还俘虏人枪。

5、在反顽战争中所获人枪，设法以退还人枪名义，送一部给该顽军中的中立部队。

6、如中立部队愿受我指挥时，依照对外围军办法处理。

八、对进步军队，是保持其进步，保护其不为日寇顽军所消灭，帮助其巩固与发展。

1、给以经济上物质上人力上之帮助，使其发展。

2、帮助改造部队，使进步分子掌握组织上的领导权，并改造其制度，但此种改造必须在其领导者同意之下进行，不可勉强。同时避免将其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避免形式与内容上过分的红（例如不必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不必有政委名义等）。

3、帮助其对敌作战及抵抗顽固派的进攻与瓦解阴谋。

九、加强对友军的联络工作及充实联络部门的组织与工作。对于各种武装（友军、伪军、土匪、红学、会门等）有影响的人物，只要品行端正，就应以师旅名义聘请他为我军参议，给以优厚的月薪，以影响这些武装部队及进行争取工作。一切以为友军工作已告终止或几乎终止的想法（这在皖南事变后可能成为普遍观念），必须坚决反对与克服。以真实工作来实现中央争取二百万友军的重大号召。

中央关于准备应付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七日）

有各种材料指明，蒋及国民党现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人民，适当的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极大困难。高潮到来时必须表现沉着态度，不可随便发表意见，必须向干部指明，要认识困难的严重性，方能有步骤的克服困难。同时应指明困难的性质，乃是破晓前的黑暗，整个国际国内条件都和十年内战时不同，克服困难之后，就有我们与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彭德怀对冀热边支持长期战争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

肖克同志并告聂贺关：

（一）冀热边游击战争正在向前发展，冀东尤为活跃，这不仅对平西冀中抗日根据地有实际配合作用，而且对东北人民与义勇军给予很大的鼓舞，同时也给了平津及东北敌伪以威胁，当会引起敌伪以严重的注意。

（二）发展并巩固必须密切的联系起来，巩固武装加强其战斗力是主要的，但不应放松党群众政权各方面的巩固工作以及根据地的建立工作，对于政策的正确掌握深入的进行教育与建立根据地是有决定意义的。

（三）要足够的估计冀热边环境的艰苦与战争的长期性，因此：

1、一切应作长期打算。

2、注意集蓄力量，隐蔽自己的力量，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引起敌人限制我们发展的注意是不妥的。

3、在军事行动方面对敌之主要交通线及城市不作过多的威胁，但对敌之扫荡与在我游击区内修筑铁路汽路则应顽强的给以打击。

4、对一切动摇的伪军伪组织应多注意争取。

5、要防止要枪要钱等乱抓一把现象的发生，军队的给养要由建立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制度去求得合理的解决，上述意见希望考虑，并转告冀东领导同志，并希将冀察热边具体情形在八月以前向聂分局及总部作一次详细书面报告。

彭德怀

八日

中央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

（一）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两交通线。对豫陕两方，调动兵力在四个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

（二）判断经此战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苏联援华不变，近到飞机百余架，炮二百门，中苏关系亦有改善可能。汤恩伯、胡宗南均准备对敌。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决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

（三）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努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在战事发生时，应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

（四）中央已电恩来同志，对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时提出：（1）速解决新四问题；（2）速发饷弹；（3）停止反共；（4）派机送周回延开会等项。

（五）我八路新四两军望按上述方针沉着地部署一切。

中央军委关于粉碎敌之蚕食政策及发展地方武装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

（一）敌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若不予以打击，则我在平原将困难立足。

（二）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

---

* 这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等同志给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首长的指示。文件是毛泽东同志拟稿。

** 这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同志给刘伯承、邓小平和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同志的指示。

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

（三）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上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相反，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我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我党我军应帮助民众想出这些办法应付敌人，只有如此才不致使群众脱离我们，打破敌人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计。

（四）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

（五）在这些地区的党，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隐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不能与根据地一样。总之，愈能保存自己、团结人民、孤立日寇，就愈能长久坚持，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道转弯的办法都是有害的。

（六）加强由当地干部率领与地方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是坚持平原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这种三角地带其作用更为重大，若无此种地方武装，单靠把主力分散去进行游击是困难的。

（七）你们的精神应该改变，同时希望你们严格检查在平原地区内这方面的政策，我们觉得在平原某些部队中最近发生的不断叛变情形与此是有关系的，必须引起你们的严重的注意。

中央军委关于青纱帐起整休部队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

估计到华北现状，敌后游击战争特别是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应该是长期坚持熬时间的过程。因此，在今年青纱帐中，部队以不过于消耗为原则，尽量争取部队休息整理训练，除此次配合国民党作战的战役外，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但须派遣小部队四出活动，加强政治攻势与居民中的工作，而非利用青纱帐大举进攻。因此，在青纱帐起的游击战，只在争取大部队休整与顾及群众情绪有利于长期坚持根据地之原则下，小规模的进行，大部设法实行休整。

* 这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等同志给华北各部队的指示。

中央关于老苏区老游击区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六月七日）

国民党正用武装进攻、胁迫自首等等方法向老苏区老游击区进攻，这些地区党要实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则必须：

（一）隐蔽组织避免打击，一切仅仅有利于国民党的抗战动员不再起模范作用，应于大多数民众取同样态度，对新四军家属之互相救济，则在不妨害秘密工作情况下可以暗中进行。

（二）对于不反对我党而反对国民党的土匪不再帮助国民党剿匪，如果上述的土匪要求我们帮助时可以给以适当的帮助。

（三）目前在大后方的老苏区老游击区一般的不应当与国民党作武装斗争，但如果国民党武装进攻时在必要与可能武装自卫并能坚持的条件下，可以武装自卫，并应有不怕武装斗争扩大的决心。但武装自卫的目的仍在求得和平和保存党的力量，因此自卫斗争必要遵守下列的原则：

1、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有理、有利、有节。

（四）武装自卫只有在迫不得已而且可能坚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决不是任何老苏区老游击区都可武装斗争，因此何处应当武装自卫须由南委及华中局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不能武装自卫的区域，应保存枪支并迅速撤退已经暴露的干部。

（五）利用社会上厌恶内战的情绪发动当地绅商、军政各界人士，制止国民党的内战，分化和孤立顽固反共分子。

（六）当国民党强迫党员和群众办理自首手续时，可以允许党员和群众一起假自首，那些不能假自首的干部应迅速调开，但假自首的党员绝不准破坏机关和人员，破坏机关和人员者即是叛徒。

（七）党内一般的不要采取小组、支部、区委、县委等等的组织形式，不要开会，只用个别联系，选择当地能够立脚和在职干部任联络员、工作员、特派员，形成只有党员，而无组织形式。

（八）改变党的组织形式决不是取消党，党员不作突出的活动也不是取消工作，每个党员应该：一方面识字读书自我学习；另一方面以普通社会人士面目去赞助公益事业，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培养自己在群众中的信仰。

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

朱、陈、罗、黎、罗①：

据报：我一一五D六八六R②及东进队一部曾于号日③向仁和庄一带之张师王团进攻，我某某二团及沂蒙支队约二千，皓日④向青沙湖唐家林一带常师蒙旅进攻，又一部约三千敬日⑤向阵庄某家城新三十六D⑥进攻，我许、鱼、彭⑦等部约五千分向开城某山屋基一带赵师进攻等情。是否有此等事，请查复。目前我党方针在拉蒋抗战。我军应坚持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的原则。如有此种进攻行动，希即停止。并告彭、左、陈、刘⑧。

毛、朱、王、叶⑨

六月　文

冀南形势与坚持平原根据地的方针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

聂肖程并报军委：

冀南敌据点堡垒汽路挖沟之严重性并不亚于冀中，且经常遭敌合击冀南冀鲁边基本上已变成游击区，冀南只有巨鹿广宗小块根据地生活极难维持，其极大的区域已是两面负担，冀南其他所有平原根据地，均应认真变为游击区斗争方式，必须采取合法的和平斗争与非法的武装斗争两面政策的掌握复杂的交错着，但非法斗争是主要的，只要政策是正确的游击战能

---

①指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罗舜初。

②即一一五师六八六团。

③指二十日。

④指十九日。

⑤指二十四日。

⑥指新三十六师。

⑦许，指许世友。鱼，不知是指谁，疑原抄件有误。彭，指彭嘉庆。

⑧指彭德怀、左权、陈毅、刘少奇。

⑨指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

够坚持山区根据地斗争仍然是继续的而且可能的，也是必须坚持的，但游击性与困难大大增多，山区根据地之人口补充将要进到严重的困难，为长期坚持山区根据地着想，战争预备队的蓄积是十分必要的，除直接爱护节约山区人力外，适当的将平原正规军部分转入山地，在平原根据地坚持时勿使过早过大被迫消耗主力，减少将来坚持山区的人力困难，冀中转移冀南及冀鲁豫之兵团宜继续南移，与赵谭支队靠近（直鲁豫区）准备在青纱帐期从安阳境（封锁沟尚不严重）转入太行山区，集平汉路之四一师团，将不使用于豫西，而将使用扫荡冀南，我冀南主力亦须部分向鲁西转移，本区之方针扫荡东阳关武安以北已结束扫荡，在四五分区即平顺安阳及黎涉武线以南地区又已开始该地实中断。

彭 德 怀

六月十二日二十四时

毛泽东关于对蒋方针致刘少奇电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

（一）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

（二）但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三）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苏之数百万后备军目前刚刚用上，或在数日内有一决战，制止德军攻势，则大局最有利，如列宁格勒莫斯科两城不守，则日必攻苏，苏之困难加重，将变为长期战争，但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

（四）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

（五）你前电所提以共产党宣言和新民主主义论两书作老干部文化课本，似不适宜，因太深读不懂，还宜重新编课本，中宣部在着手。

（六）你的两篇文章望从香港寄来，以资快者见。

对蒋、何斗争与联合的方针*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两电均妥，此次反共宣传是蒋密使何应钦干的，但为郭泰琪、王世杰等英美派所反对，经恩来反击后已暂停止。蒋何用意不外准备舆论，便于日攻苏时，有理由迫我开黄河以北，但只要苏能胜德（两星期来德军已无进展），日必不敢反苏，只要英美苏合作（英苏已订同盟，美苏日益接近），蒋必不敢大举反共，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假如日冒险攻苏，蒋迫我北上，我之方针亦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未改变前，仍是与敌人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期的游击战争。华中山东部队决不北上，对蒋之进迫则取自卫政策，对国民党每一反共宣传与反共行动，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对蒋何是何犯我我亦反何，何停我亦停，此种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不为一时一事所冲动，盼望注意。

中 央 军 委 指 示

——一一五师建军小册子结论有错误

（一九四一年七月）

接四军陈刘赖俭电称：

看了一一五师建军问题小册子系在旅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的，对坚持敌后抗战战术问题结论，第一条总起来说，敌后抗日军队的战略指导原则，目前应该逐渐走上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百团大战就是敌后抗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表现。第四条交通战应提到战略地位，百团大战以交通线被破坏是模范的例子，在山东我们同样要开展此种更有战略意义的交通战。认为目前在敌后作战是处在敌我力量悬殊条件下武装不及敌人，我们对敌战略方针，仍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运动战的机会，打击敌人，同时如无战略配合任务，经常进击敌人交通干线，造成敌寇大举扫荡，增强据点封锁等亦是值不得的等语。查一一五师建军问题小册子军委未曾收到，如确有此种结论，是不正确的，陈刘赖的意见是完全对的。望加以纠正。

军 委

七月

---

*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黄克诚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

中央书记处对大青山工作的意见

（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

听了姚喆同志报告，对大青山工作有以下意见：大青山游击区是我坚持抗战在日苏战争时援助苏联的一个重要地区，其战略意义甚大。今后党政军工作方针应注意：

（一）求得长期生存，不要过分刺激敌人，应麻痹敌人，减少敌人注意，避免引起敌人报复扫荡，不要使我基本游击区人力、物力枯竭。只有在扩大我地区的条件下，才应扩大我军队，对大青山游击区不应在报纸上宣传。

（二）应保持大青山为游击区，不要企图变成为巩固的根据地。在蒙民地带应加强对蒙民统战工作和秘密工作，我汉人军队不应去活动，以免引起敌人注意及蒙民误会。

（三）加紧侦察大青山，军政党应尽一切力量负责侦察平绥路一带的情况，侦察详目由军委参谋部规定之。

（四）须动员做地方工作特别注意提拔本地干部，应纠正过左错误，指某县乱打、乱杀汉奸是极端有害的，基本游击区应有抗日自卫队。对改善民生问题，应以调剂各阶层的利益为出发点，减租减息不应实行，只应从税收政策上去改善贫苦人民的生活。

（五）对敌伪尤其伪军工作应加紧进行，中央最近所发对敌伪工作的专门决定。

（六）统战工作是努力与傅作义，应注意对荀团的联络。

在组织方面，有以下改变：

（一）大青山区党委改为绥远工作委员会，党政军负责人均应增加，（过去无政府人员参加是不妥当的），以这个委员会统一大青山党政军民工作之领导。工作委员会、行署、大青山党政、支队部应在一个游击区活动，以便于联系。

（二）绥远工作委员会属晋西北区领导，军事上大政方针指挥属一二〇师。

（三）工委书记可兼支队政委，分委、县委书记可兼团营之政委，以收党政军领导一元化之效能。

（四）同意贺龙意见，调白如冰同志到晋西北分配工作。绥远工作委员会书记由林枫、贺、关另派人去担任。指出过去×××不愿受贺关领导而声言听于中央，中央过去无此决定。

（五）大青山我武装部队应统一起来，不应有两个系统，不应再有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分，这不是说把一切武装都集中起来，一切武装均应分散活动，在指挥方面可建立分区下属几个游击区，指挥部由姚喆及各地首长兼任之。

最后中央特向大青山军政党民各工作同志致慰问之意，你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斗争，获得了成绩。但应指出过去党政军领导上的团结是不够的，中央特号召今后各领导同志亲密团结起来，以便各种工作亲密配合起来，对付艰苦的斗争。

中央书记处

八月九日

中央对晋西南工作方针指示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关于晋西南工作方针我们有如下意见：

（一）目前阎锡山之一切努力在求得自己的存在，国民党正采取一些方法来限制和削弱他，因此阎与中央有很大矛盾，在这种情形下阎鉴于过去自己反共的失败（山西新旧军冲突），深感自己力量不够，不愿再作反共的牺牲品，所以最近表示愿与我们友好，借以对抗中央。其部下各要人如赵承绶、杨爱源、李冠洋、梁化之等与王世英谈话时都特别强调双方的团结，至于阎与日本之间确实暗中勾搭互不侵犯，其目的在求生存，便借此迫蒋向他让步。在全国继续抗战的局面下，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已进一步的巩固的情形下，阎要公开当汉奸在目前还是困难的，所以阎在今天基本上还是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斗争中起着缓冲的作用，他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对阎的方针仍然是继续争取他，求得维持友好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他的存在给以某些支持（如过去不侵犯晋西南最近卖盐给它等），而不是削弱破坏其力量，如果我们威胁其存在，其结果不是降日便是降蒋，这对于整个抗战和国共斗争都是不利的。

（二）根据上述估计与方针，党在晋西南阎的统治地区内其具体政策应该是：

1、党的组织基本方针正如来电所说应该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组织要短小精干重质不重量。

2、在旧军中的党员一般不再发展党员，原有党员应进行交朋友工作，以忠于阎锡山的面前求得巩固自己的地位，取得较高的位置。

3、地方上有活动能力的同志，应该参加到各种公开合法的组织中去（如精建会），收集情报，了解内情，多交朋友，树立自己的信仰和地位，而不是大吹大雷宣传我党政策，他们必须力避突出，否则便不适合党的隐蔽精干的政策。

4、晋西南群众现处于极重剥削之下，反抗这些剥削与要求减轻负担的斗争是可能发生的，但对于这些斗争的态度是以合法方式求得合理解决，适可而止力戒突出与过分。

5、在西南基本地区内停止我之武装动员与游击战争，这是很对的，已有的游击队应调到敌占区去活动，派干部去整理这些游击队，加强其组织性与纪律，在与敌伪斗争中求得生存与继续壮大。

（三）据我们所得消息，洪洞赵城一带在党员领导之下对于地主士绅的暗杀还时常发生，造成了地方上的恐怖，党的威信也受影响，望责成晋西南工委加以检查设法纠正。

新军党委关于新军党政组织及工作变更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

（一）新军在最近一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已踏入了质的新阶段，它不仅与顽固分子斗争前有基本的区别，而且亦与已过一年之情形大有不同，在目前新军实质上已无保留的成为党军，而仅仅在对外的关系上方才是统一战线的队伍。不仅如此，而且新军在组织上制度上、工作上作风上等等方面已差不多完全摆脱了旧习气的影响，而形成了新的一整套部队的指挥，领导上不论在形式上实质上均已与山西当局隔绝关系，在这样的新的内容的基础上，部队党政的组织形式与工作亦须适应之而有所变更。这在一年来的工作过程中可得到明显的证验与教训，一年来部队在逐渐进步发展，但部队的党政组织形式却未随之而有适当的转变，于是使我们在工作上感到不少与不应有的困难，在各方面关系的协调上受到好多障碍，这就说明部队党政组织形式及工作的变更，乃系客观的需要及发展的必然了。

（二）关于新军党政组织及工作的变更具体决定如下：

（1）纵队及团的党委会改为军政委员会，其组织与工作完全依照中央军委所颁布之军政委员会条例之规定执行（各级军政委员会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2）纵队党工作委员会一律改为党务委员会，其组织职权与工作完全依照党务委员会工作条例执行，党务委员会只负责审查批准新党员与处分党员及解决党内纠纷等组织工作，党务委员会之人选原则上可由原党工作委员会之各委员充任，但必要调动增补时亦可更换增补。

（3）各级政治委员对党内正式宣布为党的代表，对党外则只宣称为部队之政治首长并正式实行政治委员制度。

（4）各级政治机关对党内正式确定为党的工作机关，其工作除依照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执行外并特规定：

1、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由宣教科供给材料并协助督促检查总结工作，但具体实施则由总支、支部负责，不是由各级政治干部公开负责进行。

2、党内调查统计工作合并于组织科，但必须与一般的公开的调查统计分开。

3、党的工作的总结报告计划合并于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计划中，但凡用“党”字时，即以“×”代替。

（5）由于新军在实质上已成为党军，所以只有党以公开的面目出现，在部队中方能更加有利的有力的进行工作，也只有如此，才更能扩大党在部队中的政治影响，保证党的政策及主张的实现，加强与提高党对部队的领导。其次，以晋西北目前的环境来说，也需要党在部队中公开，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加密切新军与地方党政民的关系，才能更好的与地方党政

民商讨一切问题。最后党只有在新军中以公开面目出现，才更加符合于统一战线的原则，才会在对外的关系上更加有理更好说话，但是党又不能完全公开，因为新军在今天究竟还存在有统一战线的形式，党还需要估计到中间分子及无党无派人士的争取，这样便决定了党在部队中必须与只能做到部分的公开，过之或不及均会有不良的作用。

（6）公开党员必须依据下列几个原则：

1、由八路军派来者。

2、过去色彩较红者。

3、活动能力强群众中威信较高者。

4、直接负责党的领导工作者。

（7）党员的公开决不是说将所有党员完全对外公开，（亦不必要）而只是在新军成立四周年纪念大会后说到部队的创造发展及巩固时，说到部队是统一战线的武装时，公开一部分。自后亦只有经党的组织决定之党员才能在大会上或对外出头讲话。

（8）党员的公开在部队内不必强调，公开党员的比例以三分之一为准。但亦无需向下级宣布及固守不移，只由领导者注意及之即可。

（9）公开党员与秘密党员混编小组过组织生活及进行教育，均不必分开，但在技术上应力求讲究，勿因此而使全部党员暴露。

（10）公开党员应以公开方式宣传党的主张政策口号，扩大党的影响，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其次，则应更进一步顾计统一战线，灵活的运用策略，以争取与团结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干部；最后公开党员应了解自己的言行直接影响于党的威信，因此应以身作则为群众模范，并因此而团结影响与领导群众。

（11）公开党员在犯了严重错误须受党开除党籍的处分时，不仅应在党内而且在群众中均应公开宣布。

（12）各级党委在部队中不得以党的面目公开发表文件，必要发表时，须经过纵队军政委员会讨论通过及上级党批准。

（三）本决定从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新军成立四周年纪念日正式宣布执行。

配合湘洛作战的方针

（一九四一年十月九日）

彭左罗并陈刘陈罗：

敌攻湘北，进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新四军部队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同时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攻击时取防御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所有上述方针，其目的都为争取时局好转。

毛朱王叶

九日

周恩来对南委工作的意见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中央书记处：

一、根据南方工委方面来电，我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已处在一个严重的情况其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对他们工作具体意见，另电告）主要问题为：

1、闽西南是作战时最好的成果，但运用这成果是要隐蔽组织，深入社会，而不是上山和武装斗争，根据大后方各地经验证明，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去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而不能同时取得武装斗争路线，对此问题应有所取舍，即采取隐蔽组织而暂时舍弃武装斗争，且武装斗争的干部，不能同时领导秘密组织做秘 密 工 作的干部，更不能同时领导武装斗争，如两者同时进行，必会牺牲一种因两者在大后方的政策是相矛盾的，只能勉强支持于一时，而不能保存在永久，而且必致破坏秘密组织损失力量。

2、大后方的党所以不能采取武装斗争，是因为没有可能建立独立的大的军事区域，进行武装，没有能动员群众的口号，不能对外宣传，且易有害统战政策，目标大国党一定会欺侮而且容易深入内线牵连秘密组织影响破坏，同时引起干部不满意秘密工作而上山的观念。

3、要在大后方保存武装根据过去项英陈毅经验，只有采取流动的方式，不集中，不拿出武装面目，除非是到了大动乱的时候，才能动，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不平衡性，又决定了现在一般的还不是在大后方实行武装斗争的方法，特殊地方也只能采取完全非法的特殊办法，但这只是特殊的工作方式，而不是大后方党的工作路线。

4、如不采取武装斗争，损失是会有的，但为着保持更大的党的秘密力量，受武装的小的损失，或者保持秘密组织和干部，且实行起来分散武装去群众中或将武器埋起，其损失既小，而将来一旦变起作用反会更大，目前亦不致受到大损失，以上几点是整个大后方工作的一个教训，过去我曾经在中央提到一些和在浙江湘赣实行，但根据现在大后方的，尤其是闽西闽南的情况，认为应尖锐提出而加以确定中央是否同意请即示复以便给南委指示（如中央已给他们指示，请并告我们）。

二、张文彬仍在港，我们拟要其来渝专门讨论一项南方工作如何也请示复。

周恩来

感渝

华中局对反清乡斗争指示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敌寇在多次军事扫荡中不能摧毁我之主力和我之根据地，乃体验着我军与抗日人民的联系，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力量，强大清乡办法由汪逆精卫发动，采用内战时代巢共中清巢的故知，敌伪配合下乡搜查，专力搜捕群众团体负责人，包围全乡全村勒迫自首，逼迫反共，其企图是以残酷的屠杀手段割断人民与我军的联系，造成我军之孤立，以进到歼灭我军夺取我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二、清乡政治部署：

（一）由于敌伪兵力不够和分散及我地区宽广，故不能不分区清乡。

（二）分区清乡首先打击我之中心地区高级机关驻地，群众运动深入地区。

（三）利用流氓逃亡地主或勾结当地不满意的地主，作为清乡内应。

（四）逮捕我工作人员及人民中著名抗战分子，逼迫或指名带路，搜捕抄查我后方之储物品，破坏我埋伏之机关和团体。

三、清乡军事部署：

在指定清乡地区先行在四面控制相当兵力，建立据点与严密封锁阻止漏网，然后派兵分路向各中心点挨户搜查，寻我部队作战，打击我之单枪，消灭我之小游击队等。如系水网地区，则以兵力控制交×河口，另以汽艇来往巡查河道，阻我转移，然后派兵登陆的中心点，四面包抄搜捕，此种办法可续举一周时间，并来往巡搜查，可能与第一次搜巢后，复于拂晓或黑夜间出我不意突然回头予我打击。

四、反清乡斗争首先在群众中作政治动员，将敌在清乡作法及办法告诉人民，指示具体应付办法，坚决表示我军坚持抗战的决心，敌伪清乡不可能持久。坚决表示镇压一切投敌害我分子，一切带路进攻的分子，一切指名暗害的分子，一切暗中内应的分子，此种分子卖国求荣必受斩全家的处分。对反清乡中受牺牲的人民，则抚恤其家属，为了应付敌军经过可派人与敌人应付，但不得有一切破坏抗日军民的利益行为，要向人民指示，此种办法依然会遭受屠杀，不会得到恶兽的宽恕的，一般不采取此方法，以坚决斗争为上策。

五、在反清乡的组织部署中，目前应撤退红色干部到邻区域，一切抗日文化和政权民众中脱离生产之干部，亦应大部分撤退，当地只留极少数坚强干部埋伏偏僻村庄，紧急时在城内水港打埋伏，不住人家，经过灰色的党员和同情分子保持人民的联系，继续指导反清乡斗争，组织锄奸队，对清乡时当地出面害己的汉奸分子暴露（其罪恶）予以警告打击，杀伤时作广大鼓动宣传。造情报散传单进行骚扰敌军等工作，工作人员全部撤退是不妥当的，在民受难之际，我们必须有人主持才能保持斗争情绪，才不致伪化，万一全部撤退必须迅速设法派回主持。

六、军事部署上主力与事前转移敌清乡地区，以积极引动袭击敌人侧背及后方，以错乱敌之清乡部署，今其不可能坚持清乡地区，只留少数游击队穿便衣白天潜伏晚跳出清乡区边

界，如晚容入原地大肆活动，打击敌伪军击杀叛徒破坏敌伪联络，袭击敌伪驻地。

七、清乡斗争是敌伪进攻我根据地的最后手段，我党我军必须有战胜敌伪的决心，依据人民中的民族的抗日热情和仇恨，依据敌兵力分散兵力不足清乡不能长期坚持的弱点，依据伪军内的动摇情绪配合我党我军主力坚强领导，必须完成反清乡斗争胜利的任务。反清乡斗争需要好的统一战线，争取一切阶层参加反清乡行动，由于过去民众工作等是有某些过左的毛病，造成某些不满情绪，事前应估计到作各种联络各种布置防止事变。

八、反清乡中特别注意伪军工作，散标语喊话释放俘虏，散日文标语利用敌伪矛盾策动反正，利用敌伪区的同情村庄造成抗日的两面派，便利我们的暂时埋伏（八字不明）。

论扫荡与反扫荡

（一九四一年九月）

陈　毅

一、正面与敌后的配合，是坚持抗战的保证

正面能够抵挡日寇的进攻，敌后能够坚持游击根据地，这是我们民族抗战在现时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战略方针，也是相持阶段的战局特点。正面与敌后之密切配合，造成对日寇的夹击，这种夹击包围，使得日本帝国主义进退维谷，有逼迫日寇停止进攻并向后撤的前途，我们论到两年来的抗日战局至少我们看出下列几个特点：

1、华北华中全部及华南一部敌后抗战任务是完全由共产党负责，而国民党则负责正面的责任：即是八路军新四军担负了敌后抗战的全部任务，而中央军及其他抗战友军则位置在正面，这两者之配合才造成中日战争的相持的局面，缺乏任何方面中日相持都不可能。

2、正面相持依靠了大后方尚可进退自如，而敌后相持则处在敌寇包围中，仅能在敌寇间隙中周旋，所以敌后相持是极艰苦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后退一步，乃是一个铁的事实。

3、皖南事变后，使江南的敌后的新四军力量减弱，（即皖南铜繁一带苏南南京芜湖镇江武进一带）便利日寇之南进，从此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即屡次在正面引退不能抵挡日寇之进攻，这正是敌后动作为正面相持的不可或缺的证明。

4、去年秋季华北八路军的百团大战，予当时日寇正面西进计划以牵制，最终迫其改变计划。今年五月日寇计划以二十个师团准备进攻西安冲入陕甘，除中央军在中条山及黄河南岸抵挡外；八路军立即在平汉，平绥，石太，白晋，同蒲各路举行战役反攻，又予敌以牵制，又逼迫日寇不能不放弃其进攻计划，这又是正面相持依赖敌后动作的证据。四年来的抗战若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坚持，则正面相持是不可能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抗战的贡献及其在抗战中支柱作用于此可见。

5、几年来的战局，由于敌后部队毫无补充，连最低度的待遇亦没有，这样不重视敌后部队，陷敌后作战军于极其困苦的环境，加上敌寇扫荡敌后时，正面作战部队从不予以支援和协助，甚至象皖南事变，摧残抗战有功的部队的事情也居然发生，这就造成了正面敌后不能很好配合，不仅予敌后八路军新四军以极大困难，而且更予全国战局以极大不利，我们认为要改变战局，应从解决正面敌后之战略战役的配合做起，更应从提高对敌后抗战重要性的认识做起，更应从放弃对敌后部队的不利活动，改善其待遇做起，这是检讨近年的战局所有的结论。

二、反扫荡的胜利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保证

敌后抗战能够坚持，乃是依靠反扫荡的胜利，没有这一胜利，敌后坚持是不可能的，八

路军新四军几年来在敌后的历史，是一部反扫荡胜利的历史，敌寇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扫荡，是不断的疯狂进行；在两个扫荡之间，争取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之建设，乃是敌后工作的特点，第一个扫荡，被我们打破了，于是给我们以各种工作的机会，且替下次反扫荡准备了力量。于是敌寇第二次扫荡又来了，在血战中粉碎了敌寇，又争取再度深入工作的机会。这种扫荡与反扫荡的连续，使得八路军新四军坚强壮大起来，造成在敌后敌我形势的改变，因此反扫荡的领导和准备乃是坚持敌后工作的中心，自然也有局部情形，在准备反扫荡时，用力不够，部署不周，竟至受着损失甚至放弃一些阵地，使某一地区不能坚持，这种事实不止一次发生过，这足证明反扫荡乃是敌后军民一刻不能放松的事。比如前年冬天忠救军在淞沪地区上保持了强大力量和宽广地区，敌人扫荡一来即一半投敌，一半向大后方撤退，原有阵地，完全伪化。又如苏北省军在兴化高邮宝应一带，于今年春李长江投敌后，敌寇扫荡，兴化沦陷，该地宽大国土遂落敌手，至今未能恢复。新四军地区也发生过敌寇大举扫荡时，主力暂时转移，但无论如何有地方党部及武装坚持，不久主力即返回原地，恢复原状，敌寇要根本驱逐新四军乃是不可能的。

三、敌寇扫荡的一般性质及其特点

敌寇在敌后占据了中心城市和重要交通线，由于其兵力不足，空隙甚多，造成我们依靠乡村对抗城市的战局特点，乡村乃是敌后抗战的一切力量的泉源，敌寇扫荡乃是向我们争夺乡村，这种扫荡是以进攻乡村，达到其巩固城市之目的，因此敌之扫荡便与战略的正面进攻含义是不相同的，我们研究敌寇几年来的扫荡行动，便可明白看出其一般性质及特点：

1、政略性的扫荡，每当国内政局吃紧，投降妥协运动抬头，反共活动高涨之际，敌寇必然向八路军新四军地区进行大举扫荡，其用意不外乎以自己的实际反共扫荡成绩作为对我国内的反共的投降，引诱，当反共活动被压退以后，敌之扫荡即暂时停止，去年秋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代，敌人大举扫荡新四军即是一例。

2、一打一拉的逼降扫荡，敌后地区存在有素质不良的部队，没有决心坚持抗战，没有正确抗战政策坚持抗战，专赖与敌寇伪方成立某种妥协，保持其实力。敌寇对这样的部队，通常用扫荡威逼以“打”达到“拉”的目的，因而造成投降，今年春苏北泰县驻的李长江投敌，即由于该部历来与敌汪有秘密联系，敌进一步以扫荡逼其投降。淞沪地区忠救军总指挥何行健亦由于先与敌汪秘密联络，继在敌汪扫荡之下，终于投降，敌寇这些办法不仅不能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即对八路军新四军所领导的地方游击队亦不可能，因为依靠坚强的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依靠对部队中的兵员不仅鉴定和审查，使一切敌汪阴谋危害分子不可能潜入，同时又在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之下与敌汪造成绝对对立，只能变成敌寇的扫荡的目标，所以敌寇认为八路军新四军乃是其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障碍，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3、经济性季候性的扫荡，在敌寇以战养战的战略下，必须尽量设法夺取我方资源和抢夺粮食，因此选择经济资源粟棉盐蚕麻出产地，及夏秋收之际青纱帐起之前后进行扫荡，在本军地带差不多成了一种规律，可以举出众多例子来说明，敌之中下级军官亦常常策动此种扫荡，或在伪军请求之下作临时的举行。

4、扩大伪化深入伪化的扫荡，敌寇扫荡通常逼迫伪化区居民协同进军，进入我方地区进行普遍的抢掠，造成敌伪区与我方地区民间仇恨，以便其深入伪区工作，能依靠伪化之深

入取得其侵略的人为的社会基础；此种扫荡通常是在敌伪据点附近举行，作逐步的波状式的扩张，企图割据我中心地区，或我之交通联络路线。

5、对我军政权机关后方机关的挺袭扫荡，此种扫荡完全在乘我方不防备，以捣毁我之部署和各种民主政治的建设工作，通常是朝出夜归，更带临时的短期的性质。

6、军事报复性的扫荡，每当敌寇遭受我军打击以后，或交通线和据点被我破坏歼灭之后，敌寇即出动兵力用烧光杀绝的手段，冲入我军地区向人民报复以泄其愤。敌寇兽性，充分发泄，极人间惨毒，结果只能更煽动我军民反抗的决心。

以上各点已可包括敌寇举行扫荡的各种企图，这说明敌后战争是在敌我相持不下的情况中连续举行的。在这一种互相消耗的情况，谁消耗得少就是胜利，我军在此种消耗战中能向敌求得成绩和补充，乃是指导反扫荡战役的主旨此其一。不论敌寇如何疯狂扫荡，战局如何艰危，均需要我军能大胆耐心的去坚持，坚持斗争，乃能改变形势，敌之扫荡是受一定时间地区的限制的此其二。扫荡与反扫荡，表面上是互相争取地区（城市或乡村），实际是争取人民。敌寇是侵入国土的外敌，这个残酷的民族敌人，不可能争取全民的大多数，而全民大多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这在基本上决定了反扫荡能够胜利此其三。

四、敌寇扫荡的战术特点

敌寇扫荡战术不是一成不变的，近年业有显著的变化，可就其大者指出：第一，敌寇正力图扫荡兵力之统一指挥，和灵活机动，这是针对我军之灵活转移的特点所定的对策。第二在华中派遣军对新四军作战的任务上，又分为各种系统：如徐海系统，江都泰县系统，南通警备系统，浦口蚌埠系统，巢湖系统，淞沪系统，兴常系统，京镇系统，芜湖宣城系统，每一个系统构成独立作战单位，最大兵力控制一个师团，其次是一个混成旅团，至小亦派遣一个联队。这些都是专力对新四军作战的，我们指出新四军担负了敌侵华全兵力六分之一强，即根据敌军各独立作战系统的兵力总计来计算，决不是虚言。第三，敌寇对新四军作战的屡屡失利，已感觉开战之初，那种步骑炮工辎之联合兵种的编制不大适用，业已根据对付游击兵团的需要，加以重新改编，在淮河以北敌大量使用骑兵和装甲汽车，在淮河南及长江两岸则大量使用汽艇，敌寇扫荡部队都采取轻便办法而且携带乾粮特别增加部队的运动性能，而且是以步兵为主，并且配合兵舰及海军陆战队。第四，敌寇苦心焦虑来对付新四军，他想学得新四军的游击战术，来对付游击队。“对于攻击敌匪不能用大部队攻击正规兵团的老一套战术，如果见到敌人不用新的智巧，而仍照原来的老办法，实行正面攻击，没有奇巧转变，不但得不到效果，而且是很危险的”，（见敌军司令部颁布的关于肃清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又在同一文件另一处说“对于敌匪，必须抓住其特性，随时应用战理，假使一贯采取对付一般正规军的办法，不惟无益，甚至自己要受很大危险”这两段说法，正是敌寇挨打后的自供，同时敌寇也在力求改进自己，想从我们游击战法中学会一点东西转以对付我们，根据大江南北近年来敌寇之扫荡经过，敌寇在这方面是有进步。敌寇常用谣言攻势，声东击西，随时准备出动，一见不妙又转移方向，放弃其部署，这是一种进步，我们不可忽略的。第五，敌寇扫荡是充分带着袭击性质，就是先利用伪军和暗探查明我方部署，选定攻击目标，秘密运用兵力，突然进行攻击，企图一举而歼灭我之实力。这一套战法，今年春夏季敌寇每次都采用，如五月底袭击我津浦路东二师地区，如三月初袭击东台小海我一师地区，以及最近在黄桥地

区，在兴常我六师地区均采取同样办法，但军事行动断难做到神出鬼没，麻雀飞过也有一个影子，敌寇部队运动，断难秘密，所以一面应加强我们的侦察，另一面我军又应该设法严密封锁自己方面不让军情泄露。第六，敌寇扫荡在出动后，仍然千篇一律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其行动线不依靠公路，即依靠河道，这差不多是敌寇扫荡的轨迹。所以反扫荡首先要求如何对付他们的分进合击，如何在敌寇扫荡的轨迹上，讲求对策，这就是敌我扫荡反扫荡的争夺中心，一切战术和战斗的变化，都在其中去探讨，离开这个中心，是要吃亏的。第七，敌寇扫荡军之组成，通常是敌伪各半，或者敌一伪二来组成，这证明敌寇兵力不足，证明敌寇把以华制华的政略，实施在军事战术上，敌伪不能完全协合，存在着矛盾，是敌寇扫荡力量薄弱的证据之一。第八，敌寇鉴于我军在敌后已生根落脚，屡次扫荡均不能达到其作战目的，因此对我军作战常常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敌寇怕硬壁，怕在敌后战线大量消耗其主力，乃是其做贼心虚的明证。因此我们对敌寇这种心理应该抓住，并选择机会予以严重打击，打击其几次，使他尝着滋味，他是会承认事实的。他是会承认力量的。八路军在华北能够巍然独立，也是由血战得来，新四军各地区能够成立发展也逃不出这个规律，我们在江苏三年来的抗战，也常常使日寇体味着这一真理。

以上说明敌扫荡战术上之一般现象，自然敌还有许多优点，如士兵作战顽强，下级指挥周密，战场纪律严格，善于死守并炮击等，我们现在来研究对策，即是如何来反扫荡的问题。

五、如何反扫荡

我们研究最近各种反扫荡战役后，在此提供下列意见：第一，反扫荡应该需要完整的战役战术一大套，如单纯看成是一个军事问题那就错了！军事力量是战斗展开后决定胜负的，围绕着军事部署必须动员一切人一切力量来参加，这是十分必要的，主力兵团，地方武装，人民自卫队三者配合，乃是反扫荡胜利的保证。让敌寇扫荡军深入我地区，用主力，地方武装，广大人民把他包围起来，四面围困，到处喊打，这是最好的战法，在作战上敌寇扫荡军是以主动姿式，挺入我地区，我是被动的，经过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的初战，敌寇转入被动，我主力从被动地位取得转入主动的余裕，因而能立在主动地位，去选择十分有把握可以战胜的机会，因此主力不下手则已，一下手，敌寇即被粉碎。第二，我们作战方针是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机会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最近有人误解，以为过时了，应该改变，应该改成以运动战为主，这种意见我们不能赞同，其绝大错误即在于把游击战与运动战对立去了解，而去掉了其联系性不了解。即使我们在具体作战任务上决定以大兵团突击，主动向敌求得运动战时，亦不应该排斥游击战，相反的亦更要发扬游击战去创造运动战的机会。由主力部队派出游击队去作各种战斗侦察，乃是运动战不可少的法门，这是不应该忘记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相互为用，普遍游击战才能替运动战创造机会。自然如果不在敌后的地区，如果我军不在敌囚笼政策以内活动，有了广大的机动范围，那时才能提出以运动战为主要方针，目前将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运用，是每个指挥员应该研究的事。第三，反扫荡应该首先作下列各种准备：作战地区的选择（根据时间地形兵力去选择），部队机动地区和隐蔽地区的选择，部队后方地区的选择。凡对这三方面选择得适当，部署得适当，可以决定在反扫荡中的胜败，这些地区的选择完全是灵活的，要求便于机动，因为一切准备是为了应付意外事变，但此种准备虽决定好，亦只能应付一面或几面，总有遗漏或应付不周到的地方。所以多选择几个地

区，选择二个以上的地区，准备应付几种以上的情况，有备无患乃是最妥治的。第四，现在各兵团首长，团级以上首长，应该于自己担任的作战正面，于敌情不紧急之前，应有事先的充分的准备，侦察地形，熟悉民情，了解地方党政情形，对破坏道路，封锁河面，运动部队道路，作战地区，驻宿部队地方先弄明白，成竹在胸，敌情来了，如按图捉骥一样，这是十分可靠的事。两军作战本是主动权与被动权之争，敌寇向我地区扫荡，我争取主动权益较大，好象关门捉贼一样，然而一切决定于自己的预先预备。第五，反扫荡切忌疏忽，十九反扫荡之失事，都由于疏忽，敌来不来，由敌人决定，敌来了失不失败则由我自己决定。通常的毛病是把自己的事放在期待敌人上面，敌来才着慌，敌不来即置之不理。应该一切准备好，一切应抢先着，不自落在敌情后面，我们指挥员常常凭一已临阵不慌的心理，懒于作各种准备，这最坏事，或者已有敌进攻征候而不注意把敌人进攻之可能性，估计太低，不了解军事上对一切可能性，都应估计为实现性，才不会吃亏，这是一个力求自己安全的要诀，比如四月间某连知道敌人要来，因为疏忽一下，以为敌人不会来。即被包围而损失一部乃是血的教训，游击战争提倡警觉性与机动性，警觉性是事前能观照一切，估计到各种可能，不放松任何时机，要走就走，要移就移，不留恋胶滞，些微的征兆，都不忽略，机动性是临战不乱，临战不失事机，遇有不利，或事先即感觉不妥，即行机动转移力避此一不利，去争取第二种有利时机，乃是讲机动的秘诀。目前在边界行动的部队最需要的是警觉性与机动性的锻炼，在中心区久停的部队，每每少这样锻炼的机会，不可不随时注意的。

六、地方党政及人民的反扫荡问题

平常以为地方党政人民只有反扫荡的配合作战任务，以为自己并无独立应敌的任务，我以为这不妥当，必须首先解决独立应敌问题，正因为能独立应敌，才能达到配合作战的任务。

地方党政人民独立应敌的任务，不是去正面作战，去打退敌人，去围缴敌人武器，而是说尽己力量与敌人以骚扰、妨害、不方便，纵然是极微小的，一张标语也罢，响几声土枪也罢，挣一面旗帜也罢，破坏一座桥一丈路也罢，这些行动聚合数千人去做，积少成多，将予敌人以更大的妨害，这种作用比较死几个几十个敌人还要大，敌人在这种妨害之下消耗了精力，自然抵不住我大军的突击，从这样了解便提出地方的独立应敌人的可能问题。

地方独立应敌的任务，是破坏桥梁破坏公路，阻塞河面，捉拿敌探，封锁消息，空舍清野，对敌伪宣传，黑夜狙击摸哨，向敌放冷枪，迷惑敌人，扰乱敌人，捉拿敌伪落伍兵，凡对敌人有妨害的事，均可以去作，而且黑夜仍是人民应敌最好时机，真可以做到使敌人防不胜防，敌人防我主力易，防人民难，其理由即在我主力军有目标是摆开来打的，而我们人民则随处可以予敌人以冷不提防的袭击。

地方党政人民的配合任务，上面说的独立应敌便是最大最好的配合了，但此外还应做一些事情，如主力部队需要粮草给养，需要了解敌情，需要带路送信，需要担架运输，需要救护伤病兵及落伍兵，需要驻房子过水过桥等，这些由地方帮助，则可解决主力的困难，增强主力的运动能力和突击能力。地方党政尽可能想到这些事，是使主力一到即得着解决，把一切妨害敌人的事办好，把一切帮助主力的事弄妥，敌我双方相较，其优劣形势已判然有别，这足以决定战争的成败。

地方党政人民的参战，和独立应敌均需要有一种专门组织和指定专人负责去办。破坏桥

梁有专门的破坏队，指定破坏那一条路那几座桥，事先弄妥，临战即将破坏队控制在那个地方的很准确做到。障塞河道有阻塞队，指定队长编好队员，收集了阻塞器材，阻塞那几段，事先弄好，命令一下即就地完成，不落空，不受敌情影响，闻风逃跑，其他各种工作都有人负责，有人检查，样样都负责完成，这样几十万人动员起来配合我主力去打垮几千敌伪，我想这断无不成功的道理，目前苏北的抗日民主运动，业已在政治上实行了初步的民权运动，在经济上经过减租减息初步扫除了半封建的制度，人民已开始了自觉的组织，和初步生活改善，在文化上已开始走大众文化的自觉道路，这样的政治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号召几十万人起来同敌人作战，可能把握反扫荡的伟大的胜利，比如今年三月黄桥地方人民即独立捉获日兵两名，即是一个光辉的先例。问题在于如何去领导与组织问题，这便是地方党政该担负的任务。

人民的参战组织，要求普遍组织，更要求每一种组织都有几个干部支持，“蛇无头而不行”一切离开干部是不行的，最好每一个组织，每一个队，都有一个到两个外地干部去领导，每一队人不要太多，以十名至二十名为限，农民队伍太多太大，不好指挥，容易一哄而散，人少好照呼，好指挥，好行动好转移，真能起作用。

不应该把反扫荡的军事问题，神秘化，这是人人可以参加，一样可以去取得胜利的，我不懂军事，我不干，这种说法不好，不懂军事的人，应该在反扫荡中去学习，今天没有军事知识，参加一次行动，即多一次经验，渐渐就懂得，如破坏道路桥梁等工作，如捉拿敌探工作，空舍清野等工作，指挥人民埋藏粮食等工作，这是军事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工作问题，这是无人可以不学而能的，到军事学校去学也学不到手的。军事科学是专门技术，需要长期学习，实战经验原则只有从实践中去获得，地方工作人员应从反扫荡中去实际锻炼，学习群众游击战术，这种战术书本上是没有的。

人民独立应敌和地方参战，应该以地方武装为中心，目前应该大量组织地方武装作反扫荡的准备，比如盐城边区还有许多匪患，这种匪患肃清亦需要地方武装来担任，地方党政机关，应就各区乡保把地方武装成立起来，把人民自卫队成立起来，在各大小路口担任放哨守卫打锣盘问行人等事，人民武装有了几十万的组织，这一伟大的力量是抗日民主政权的雄厚基础，目前应从反扫荡的动员而去开始建立，地方武装一面配合主力一面拥护人民，地方党政有了地方武装，自己才有反扫荡的本钱，才敢于走上战场。

七、反扫荡要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投降

当敌寇扫荡进军之际，敌人仅用军事力量来镇压我们，还想利用我们地区的某些民族败类来进行内应和破坏。不管这些人是少数，或是由于怕敌寇烧杀不得已而欢迎敌人，我们均应该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敌寇扫荡之际，我全体军民均一致抵抗，作拚死的决斗，为了民族大义，任何人均应抱定牺牲小我，以保全大义的精神，这些××投敌的分子，站在个人利益出卖全体，出卖社会，出卖民族，当然不能宽待，对这种自私自利，甘心投敌出卖的人，不采取坚决镇压的态度，即无异帮助敌人来摧毁抗日民主政权，陷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境地，因此当敌寇进军之际，应动员全体人民一致抗敌，同时毫不放松，镇压叛变乃是争取反扫荡胜利中的重要工作。

敌寇对苏北，从本月初，即开始调兵遣将，计划大规模扫荡行动。敌寇一一二旅团长南

浦进驻泰州，并到东台兴化巡视，即在计划进攻，图谋不轨。我苏中第一师苏南第六师已连日与敌之扫荡军激战中，且不断获得战果，我皖南突围的部队，业已编成本军第七师，近在长江中部皖南皖北各地有了反扫荡的胜利。证明我新四军部队的抗战坚强，百战百胜，我苏北军民不要松解，要密切注视敌寇初步扫荡的企图，一切作充分准备，张开天罗地网，让敌寇作扫荡进军，我们即作反扫荡的出击，一切取决于力量胜利就在面前，努力吧！

（《军事杂志》第九期）

华中局对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日七日）

1、敌伪在江南的清乡已部分收效，我已受部分损失，苏常太及澄西锡虞区我已暂时退出，这是汪精卫（他有统治中国的一些办法）亲自出马与敌人流氓结合反对我们的一种新办法，然我六师主力与江南根据地仍然存在，我们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来打破敌伪的清乡或使清乡失效。

2、敌伪清乡的长处就是能集结优势兵力封锁一个小地区，给我以彻底打击或清剿，能威胁我相当的组织民众，但是敌伪兵力不足，兵力分散的弱点仍然存在，敌伪无法在各个地区同时实行清乡，而且在清乡之前必须有长期的准备，敌人与伪军伪组织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各派伪军及各派流氓之间的矛盾亦在，敌伪与顽军及忠救之矛盾更未减弱，因此只需我军我党能运用正确的灵活的策略与战术，我们是能使敌伪清乡失其效力的。

3、我们在清乡斗争受到部分损失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下列几点：

（一）在江南京沪地区为敌伪必争之地，敌伪力量强大，企图长期统治。

（二）顽固派及忠救配合敌伪夹击我们。

（三）地形条件不好，平原多，交通方便，封锁严密。

（四）我们反清乡斗争没有经验，还是第一次反清乡，精神上组织上我之准备均不充分。

（五）过去我们的工作方式太突出，太张扬，毫不掩蔽，吸引敌人注意。

（六）过去我们在收编别人部队上，在地方工作上，在对伪军为组织关系上，未能完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树立不少的反对我们的人。

（七）我们地方党与群众工作还不够深入，部队与群众联系不够密切。

（八）我们在军事部署及指挥上亦有缺点。

因为上述主观原因，所以我们受到暂时的部分的损失，现在敌汪仍在各地积极准备清乡，如办训练班、建立封锁线等，我们必须检讨江南的经验来建立我之对策。

4、对付敌伪清乡办法，我们提出下列各项望讨论。

（一）如有可能在敌人准备清乡建立封锁时先发制人，集中力量打破敌人的封锁。

（二）如不能打破敌伪封锁及清乡，我们的部队及地方干部甚至已经暴露的地方党员，均须全部暂时离开该区，转移到新地区活动或隐蔽，绝不要再留部队及干部在该区，只留少数之全灰色可以与敌伪敷衍及少数便衣武装，在该区秘密活动。

（三）待敌伪清乡过后，我们地方同志首先设法回去恢复秘密工作，可能时，我们武装部队再秘密回到原来地区活动，但再不要大吹大擂，并可不用新四军番号，只要能争取群众并能对付危害我之坚决汉奸即可以，政权及群众组织等均可以伪组织面目出现，不必组织公开抗日政权。

（四）切实整顿部队纪律，切实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对于某些动摇

的党外分子均以礼待之以礼送之。

（五）切实深入地方党与群众工作，一律采取隐蔽政策精干政策，切实进行与深入伪军伪组织工作，打入敌伪之清乡训练班及其组织，扩大敌伪敌顽矛盾及各派伪军流氓之间的矛盾，而打击坚决反我者。

（六）对已失败之部队及干部要多加解释，研究经验与办法，稳定其情绪并鼓励他们继续斗争或回原地坚持。

（七）敌伪在清乡中建立的各种组织，我们回去不要立即取消或反对，而要利用之打入进去，使敌伪的反共组织成为我之组织。

（八）上述各项望根据实际经验切实讨论并确实深入执行之。

五年来敌扫荡华北的情况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自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底止，日寇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内，已经扫荡了整整五年，根据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初步统计，五年来千人以上的扫荡，共计一五二次，至于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共计三七次，就扫荡的时间来说：从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各根据地遭受扫荡的日数，为晋察冀（包括平西在内）三〇八日，冀东二五九日，鲁北一三二日，冀中一四三日，晋西北二七〇日，冀南一〇〇日。冀鲁边（清河区在内）八五日，太行三〇三日，冀鲁豫二二九日，太岳三九八日，鲁南（滨海区在内）一三一日，鲁中一二四日，胶东四八日（驻每一区内同期扫荡，只算一个时间），敌千人以下小股合击及时之出击作战时间未列入，五年华北根据地遭受扫荡期间，合计为二四三〇日，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底止，也就是说：五年来平均每两天扫荡三块根据地，但五年来敌扫荡频繁程度，又是逐渐增加的，今以各区（扫荡）的时间与全年三六五日作百分比，则每年各区平均扫荡频繁程度如下：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二·七五，一九三九年为百分之七·七五，一九四〇年为百分之九·三五，一九四一年为百分之十一·三八，一九四二年为百分之一四·四二，在一九四二年一年内，全华北所有之根据地，平均被（扫荡）了五十二日有余，亦即平均每一天有两块根据地处在扫荡中。

这里所谓扫荡的频繁程度，并不等于作战的频繁程度，如把敌人的小股出犯和我们的主动出击都算在内，则冀中、冀南、冀东三块根据地，每天都有大小战斗几次，以至几十次，同样的山区内的战争频繁程度，亦比（扫荡）的频繁程度远为巨大。就扫荡的全力来说，以五年来，敌每次“扫荡”的兵力人数平均计，则晋察冀二〇，四〇〇，平北三，七〇〇，晋西北六，〇〇〇，太行一〇，五〇〇，太岳一三，三〇〇，鲁中五，〇〇〇，冀东一四，五〇〇，冀中一六，八〇〇，冀南四，七〇〇，冀鲁边三，一〇〇，冀鲁豫六，一〇〇，鲁南一，九〇〇，胶东五，一〇〇，五年来全华北敌人每次扫荡一块根据地兵力的总平均数是九，八〇〇人，一九四二年各区平时扫荡三块根据地的频繁程度来算，则在五年内，敌人为了扫荡根据地，每天需用的兵员，即达一四，七〇〇余人，单一九四二年一年内，则每天使用了二〇，四〇〇兵员，倘与全华北日军总数相较，则五年来每个日本兵平均在二十天内，就要参加一次“扫荡”，在一九四二年一年内，则平均半个月就要参加一次“扫荡”。

就扫荡的方式来说：在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以前，敌人“扫荡”的方式是：用大批兵力沿主要道路追击，敌人回师华北以后，即采取开始“清剿”某某大施杀掠、烧毁，百团大战以后，尤其一九四一年秋季，对晋察冀区的大“扫荡”以后，敌人逐渐地提出并实行其“囚笼政策”，“三光政策”总力战，“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企图彻底摧毁根据地的毒辣方针，把“扫荡”的组织性、紧张性、均连性、残酷性，逐渐发挥到最高程度。

以上述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敌人是如何努力扫荡了，如敌酋所僭称："不顾一切全力'迈进'"，敌人扫荡的收获是什么呢？

（一）日本华北派遣军少三，在一九四二年十月间发表五年来日军在华北建立了七，七〇〇余碉堡，筑成了一一，八六〇余公里长的封锁沟（比中国万里长城全长的六倍，相当于绕地球一周之四分之一），平均每三里长的封锁线上有一座碉堡。

但是，敌人这种封锁与割裂，不完全是从扫荡中得来的，敌人的蚕食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些巨大数量的点线，又处在我军昼夜的攻击、破袭之下，并不是无因的。

（二）上述的点线，敌完成了局部的地带，占领了部分的面积的控制，主要的是沿平汉、津浦、同浦等铁路干线的两侧地区。

但是以上的敌占区及敌控制区内，我们的抗日游击战争，仍活跃的进行着炸车、破路、袭攻、伏击，仍是威胁敌人"保安区"，仍然是破坏了敌人的梦想。

（三）凭着巨大兵力的频繁"扫荡"，敌人取得了"赫赫战果"这就是敌人这次所发表的巨大屠杀及掠夺数字。

但是这些数字，是日本军阀所任意制造的，把抗日军民的伤亡数目，不知扩大了多少倍，把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都放在自己的战果帐上，实际上日寇"赫赫战果"正是自己所写出的，欠中国人民的血债，敌人坚持五年扫荡的基本企图，如消灭八路军，消灭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意识，变华北为"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等等，很明显地是完全破产了。

五年来，敌人每天使用一五，〇〇〇兵力，从事"扫荡"付出了伤亡几十万精锐兵员的代价，但其收获只有上述的一些点线与面积的占领，另一方面则更加促进了自己的死亡，这就是日寇"扫荡"五年的基本总结。

敌人"扫荡"一失败，就是我们反扫荡的胜利，五年来我们能在敌人疯狂"扫荡"下，取得胜利，完全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英明的领导，八路军艰苦奋斗的坚持和敌后抗日人民顽强的坚持了抗战，今年是敌人垂死挣扎的一年，它必将进行更频繁、更残酷、更严重的"扫荡"，但即使如此，而结果只有碰壁。

（延安二十八日电：通讯稿）

战 争 指 导 问 题

（一九四一年）

左　　权

一、战争指导问题

甲　基本任务

现阶段坚持华北抗战之基本任务，就是巩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这里包含着击退敌人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进攻，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创立华北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基础，推动全国的进步和积蓄力量，准备进入反攻。

完成这一任务是以军事斗争为主的配合着其他各种的斗争形式。因为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一切均无从说起，同样没有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的配合，军事斗争也难于推进，和不能巩固军事斗争获得的成果。

乙　战略方针

服务于这一军事斗争之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之运动战。确定这一方针之具体条件：（1）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2）敌强我弱，敌优我劣；（3）敌后特殊与军事任务之性质与本质。

在目前阶段中，敌强我弱的形势，仍未获得基本的变化（如敌人兵力兵器仍优势于我，敌人控制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有利阵地，我被迫分散于僻野与乡村），在整个战略性质来说，仍是防御性的。

丙　指导方法

1、但由于华北地大，我根据地之众多与巩固，敌人兵力之不足，敌我杂处，我占面，敌占点线之特点存在，又使我战略上之防御性与一般的战略上之防御性发生差异。而包含着更多的更积极的向敌进攻的成分。把基本的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运动战之战略方针在作战上基本的从破击与反扫荡战两方面表现出来。

破击战是进攻性质的，作战或以破坏敌人的点线为目的，或为开辟某一地域工作为目的，或以策应某一根据地反扫荡作战为目的。

反扫荡战是防御性质的，是反对敌人的扫荡，而发起的作战。

因此这两种作战形式，都是很重要的。没有反扫荡作战的胜利，便不能把扫荡的敌人打出去。巩固根据地，没有破击战的向敌人进攻，就不能把敌人束缚于点线之上，陷于防御地位，就不能减少敌人对我各根据地之连续扫荡。就不能给我根据地巩固的向前发展。因为只有能巩固的向前发展的根据地，才能算是真正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在作战指导上只懂得积极向敌进攻，不准备及时转入准备反扫荡作战，进行反扫荡作战是不对的，同样只是停留着根

据地里等待着敌人扫荡的来到，而不敢或不积极向敌作各样的小的大的进攻，或一味退缩让敌蚕食，老是向根据地中退缩，都是不对的。前者是冒险主义，后者是保守主义，两者都是错误的，其结果同是不能巩固根据地。但这两种错误，都在华北存在过或存在着，特别是后一种更来得严重一些。

2、由于敌人基本的采分区扫荡，就使得全华北范围内进攻性的防御性的，两种作战形式同时存在。就是说，敌人扫荡此一根据地时，这根据地是处在防御性的反扫荡作战，别的地区在敌人扫荡已过去或扫荡尚未来到以前，他是处在向敌进攻的时候，这就反映着在作战指导上反围攻与围攻的统一的重要性。也是反映着华北战局的复杂性的一方面。协同作战的重要，不要使反扫荡作战者孤军奋斗。

3、反扫荡作战是以内线作战为指导原则的。即当分进合击之敌，在其分进而未达到合击点以前，各个击破之消灭其分进部队之一路或两路。如不能各个击破时，就应灵活的及时转移至外线，但这一转移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及时的，不逃跑主义，而是离开不利的作战地区转入有利的作战地区，以便进行有利的机动，这就要掌握着正确的内线的外线作战。向敌进攻的破击战，则可按其兵力之大小，作战之目的，作战的对象，而有不同。但不管前者或后者，作战的指导精神都应是主动的最富雄图的向敌作战，在战术上应该是灵活的，积极的，进攻的，并且发挥极大的突然性与速决性，一切防御战斗，一切持久战斗，在我们的战术中，除直接的或间接的帮助进攻战斗和某种特殊必需外，是毫无地位的。

4、进攻性的战斗应积极发扬，特别是应由地方军担负这种任务。不管是大的小的不管那种方式的战斗，总要经常的自动的去寻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击退蚕食政策才能消除敌进我退的现象，也只有如此，才能集合许多小的胜利成为大的胜利，大规模之战役进攻战（如百团大战）只能在一定情况之下才能举行的，在今天说来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打击敌人，不使敌人变点线的占领为面的占领，另方面又要积蓄我之力量，以适应政治任务之需要，这就要求采用更多的巧妙的有效的方法，以最小的代价，即是说以最小的兵力而能取得最大的收获，缩小敌占区，扩大与巩固我之占领区，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从加强地方军民兵方面，加强我之技术能力方面着手。

5、对于敌人的一切的大小扫荡我必须击退之，对敌之蚕食政策逐步推进必须拒止之，今天在某些区域存在着的敌进我退的现象必须纠正，但反扫荡亦不是拚命主义，就各种条件说来敌在扫荡中，一般的是敌处优势我处劣势。敌是主动进攻我是被迫防御。在这种情况下我之目的，一方面是以各种方法击破敌人之扫荡企图，使之劳而无功，和在有利条件下（特别在山地）力求消灭其一部。使敌不敢轻易向我扫荡，但另一方面又应善于保持持续的力量，以便应付敌人之连续扫荡。或乘机扫荡完毕敌疲乏与分散之际，我转入反攻。恢复失地或开辟新区。这就要求指导人员，不为敌人疯狂进攻所骇倒，不迷于复杂的情况，不留恋于无把握和局部侥幸的胜利，而要确切的主动的掌握自己的方针。没有到达完全不能继续存在的情况，各个区域的军队是不应该离开他的本区域的。

6、就整个华北说来，无论进攻性的或防御性的战役与战斗，基本上是依赖各个区域自动进行的。由最高机关统一的在一个计划下之行动，只是在一定情况下才有的，就各个区域说来，对本区野战军的行动，应在该区指挥机关有计划之下动作的。对地方军特别是地方游击队一般的应发挥其自动性，不要给以过多的限制，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中，过分的集中指挥严格的计划性与组织性，不仅妨碍下级的机动，还有取消游击战争的危险。这种情况是由

于地方广大，被敌隔绝，敌我杂处，情况复杂，各处具体情况极不一致，而我基本是游击战所产生的。因此便反映出各个区域分区作战的特点，要求各个区域都能有分区独立作战独立坚持的能力。这不仅各大战略单位如此，各分区亦应如此，各被隔绝的县区亦莫不如此。

7、不管大的或小的，不管是进攻的或防御的军事行动，都必须与民众的抗日斗争有密切的联系。三年多敌后战争的经验，充分的证明了民众是最痛恨日寇的，要与日寇作死活斗争的，我们的一切斗争行为是最能教育与组织民众的，有民众的积极配合就给战争战斗胜利以极大的保障。否之则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重要的交通破击，更需要有广泛的民众参加，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胜利，否则单靠军队破击，其结果必是劳而无功的。指导群众战争是一件最难的事，必须有高度指挥艺术。这样的原则就是要有广泛的群众的参战，又不浪费民力；要有集中的指挥与组织，又不要违背群众的志愿与民主的精神；要领导进行英勇斗争取得胜利，又不要给群众过多的损失与牺牲。为着完成这样的任务与工作，军队与地方党政民机关密切结合是非常必要的。也只有党政军民结合起来，共同的发挥力量，一致向着敌人，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8、军事行动与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的密切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单靠枪杆子打天下的英雄主义这不是我们的观点，各种斗争形式的开展与胜利，直接补助了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更便于各种斗争形式的开展，因此他们之间是密切的相互依从着的，军队中同志的单纯的军事主义是不对的，但这一结合之至高原则，必须是“以一切服从于战争”“一切为着战争胜利”为依归的。

9、最后积蓄力量是持久战争中，战略上之重要问题，没有力量的积蓄就不能持久，就取消持久战的胜利，因此长期战争中一方面不断的进行着战斗，同时又应不断的进行组织军队的工作，不能以积蓄力量为借口，而不打仗，或少打仗，怕牺牲等等，也不能只顾打仗不进行积蓄力量的工作，两者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在使用力量上必须善于保存力量，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能借口英勇牺牲，不顾主客观条件乱干一顿，以牺牲愈多愈大作为光荣作为测量战绩之尺度，这不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思想，我们需要的是进行有胜利把握的战斗，以少的牺牲取得大的胜利。这就要求战争的指导者善于掌握战局，一方面不放弃一切有利的机会进行战役战斗，争取战争的胜利，另方面又要避免一切可能避免的损失。

二、军队组织问题

执行基本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之运动战之战略方针，必须有适合此方针之军队组织形式之保证，正如组织任务保证政治任务之执行一样。

一种战略战术必须有适合执行此种战略战术的军队形式，不能是战略战术的内容是这样，而军队的组织是那样的。这就是军队组织形式与战略战术之必须的一致性。

为适合我们今天战略战术基本方针，所以在武装政策中把武装力量之组织形式分为下列三种：

1、野战军——脱离地方性的机动兵团。

2、地方军——不脱离地方性 坚持地方斗争，机动范围较小的。

3、民兵——不脱离生产广泛群众之武装组织。

但由于具体环境之不同，野战军与地方军之比例又有差异，如平原地方军占三分之二，

山地则反之。民兵在任何地区都应普遍发展起来的。

在华北各区，执行这一武装政策过程中，有的作得很好，有的则很差，甚至犯出原则性的严重错误，这主要的表现在保守主义与单纯的军事主义两方面。

保守主义是不使地方军等发展升级，成为野战军之广大源泉。

单纯的军事主义是不了解地方军存在之重要与各种斗争形式配合之重要。

两者都是错误，其结果是取消了野战军又取消了地方军，而遭受严重之恶果。因此两者都要反对。

但为什么发生这种错误，是由于：

（1）不了解战争的具体环境。

（2）不了解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没有武装就是不能坚持与存在。

（3）对战略方针了解不够，一般性的了解不够，老是从战术的观点，观察游击战争。

由于这一武装政策执行的错误，所以在某区域马上表现出许多严重情况，区域缩小，地方军长不起来，野战军无补充而削弱，各种工作都受到危害。

这类现象必须迅速纠正，确切的正确的执行武装政策，因为这是一切斗争的中心。

武装政策中另一新的问题，就是新兵役制的施行问题，这在冀察晋开始试办，即以志愿制再加上义务制两者混合的新兵役制。这是过渡到征兵制的过渡办法。

这种征兵制的执行是很困难的，但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所以先在群众工作各种工作较深入的地方开始试办，并采用一切过渡办法开始试办。

三、战术问题

我军的战术是一种独创的战术。是从长期游击战争中发展脱胎出来的战术。

独创这一战术，对于我们是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因为我们是工农的军队，革命的军队是最具创造性的，我们有长期战争历史，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中国和国际没有现成的适合我军斗争环境的战术。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一条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是件非常大的事件。

我们的战术是以游击战术为其基本的组成部分的，要采用游击战术中许多优良的战斗方式，和战术的基本精神。因此就是进行正规的运动战也是以游击运动战的形式出现的，亦即是中国式之正规战。

我们的战术的基本精神是"速决的进攻"这是我军战术艺术之所在，因为在这样的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敌我力量还不相称的环境中。只有速决，才能各个击破敌人，才能连续作战，才能使敌优点不能发扬。只有进攻才能消灭敌人，才能创造敌之弱点与抓住敌之弱点，才能避免自己弱点，发扬自己优点，取得战争的胜利。

战略上之持久作战与战术上的防御战斗，离开了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

"速决的进攻"的战术，内容主要包含着主动性突然性与顽强性，离开了这些速决的进攻战不会有成功的。

主动行动是要意识的去求得，从正确的情况估计与正确的处理情况中去求得，不是现成的东西，因此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必须虚心研究与寻求的。

突然性是指部队行动要有计划有准备，和行动中的迅速与秘密。这是从组织战斗开始直

到战斗发起止之重要事项，突然性愈大，战斗胜利就愈有保证。

顽强性是指战斗中英勇杀敌毫不犹豫，坚决与敌人白刃肉搏。

"速决的进攻"战斗方式，又应从近战中表现出来，因此条令中规定进攻战斗中的三个阶段，机械的搬来应用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是秘密的突然的接近敌人，直接展开进攻或冲锋，小的部队还可以省去进攻阶段一直进到冲锋出发地，即投入白刃格斗。这有许多好处，可以避免过长火力战斗，避免敌人之优点，发扬我之优点。因此在战斗组织上白刃与火力战斗的关系也应相适合起来，我们各种步兵火器的射程，一般的规定是：步枪200—300米达，轻机枪400—500米达，重机枪600—800米达，开始发射。手榴弹刺刀是白刃战斗的森严的武器。

这些火器射程愈能缩短则愈好，火力准备愈少愈好。把战斗过程主要的成为白刃格斗的过程则更好。

因此，加强部队的近战教育、射击技术、打手榴弹、刺杀等教育，及锻炼指战员的体力等非常重要。

（二野战史编辑室翻印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

对国际形势的估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周：

（一）香港、泰国、马来、缅甸、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婆罗州、荷印、澳洲、新西兰均有被日军在冬季内占领之可能，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星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

（二）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如若在数月后欧洲出现第二条战线，便可较快决定德国，这是真正有利的方针，但不知惰性甚深的英美军政人员有此毅力否？

（三）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已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就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英是海陆空主力美是空军与资源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四）太平洋战争对中苏两国其利有六：第一、华北华中的敌军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个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条战线之可能。以上是在八号政治局会议上的一种估计（内部的，不发表的）你的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对于我国战争是有利的，使侵略营垒与反侵略的营垒最后分明，从经济的（战争资源）政治的（正义与非正义）及军事的（潜在力）各方面看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反侵略国家的，日本与中国战争四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南洋等二十余国为敌，而德意侵略国经过六个月的反苏战争及苏军的反攻其锐气亦非昔比，苏联已经开始进入反攻阶段，因此日本到中国侵略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日本困难大大增加，目前是中国与英美荷配合作战，积极准备反攻的时机。

（二）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在华的军事布置，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的主要战争已经是太平洋战争，在华空军抽调太平洋作战，在华陆军，亦可能抽调一部分（抽调华东与华中的可能性较多，但苏联未参战前大部陆军不致调动），对华军队的物质及人员的补充与供给将减弱，因此日军的情绪将更感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形恐慌而我军民战胜日寇的信心亦会增长，亲日派亲德派分裂派的气焰将被压低，中英美荷的合作将更亲密，以上这些都是有利正面与敌后抗战的。

（三）然而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形式是暂时有利于日本，加之日本又占领海南越南，整个太平洋局势均处于日军之攻击与威胁之中，日本可集中海陆空军作战，路途近捷，而英美集中兵力困难路途遥远，因之战争初期英美荷可能受到一些挫折，日本可能取得一些战争资源，缅滇路可能被切断，太平洋战争一般说是长期战争，日本闪击速决战是不可能的，而英美要反攻战胜日本亦非短期的事，国民党现时的兴高彩烈，到那时悲观情绪又将发生，加之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心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经济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加彻底，与此同时敌人必更加紧控制伪军伪政权，增强其特务活动与破坏工作，这些压制我军活动。

（四）根据上述估计，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应当仍旧是坚持敌后长期的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应当说明太平洋战争的有利形势，说明胜利前途更加接近，要克服右的悲观失望情绪，要坚定胜利的信心，同时说明敌后的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难的残酷的，以免懈怠现象的可能产生。

（五）军事方针仍旧，敌进行扫荡应坚决粉碎之，如不扫荡，则除进行必要的游击战争以外，应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但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应广为宣传，应当加强军事建设，仍旧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主力缩编后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于山地，并送一部来中央加以长期训练。

（六）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应当加强，太平洋战争，使我对敌伪工作有了更有利的环境，

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向敌伪军伪政权宣传日本必败，中英美必胜的前途，以瓦解日军，争取伪军，伪政权转向抗日，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向根据地特别是游击区居民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组织他们参加抗日斗争，加强薄弱区域的工作，恢复一切失地，开辟一些新的区域（关于加强对敌伪工作总政另有指示。）

（七）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长期抗战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的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都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关于精兵问题，军委指示地方党脱离生产的人数，亦应减少，要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根据地的财政政策，量出而入，量入而出的配合一切工作，应求质量，坚决反对浪费铺张，不节省民力的现象，严厉惩办党政民系统内贪污腐化敲诈民财的恶根，我党政军应该了解假若民力很快的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末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八）“精兵简政”政策实现之后干部还有多余，同时为准备将来还应抽调一部干部加以训练，除各根据地自已极端注意训练干部外，中央准备办一高级学校训练几百个真正高级的干部。

（九）全世界正处在空前的大变乱中，斯大林同志说“几个月或半年也许一年，希特勒必会被击败”。我们可以说希特勒被击败后再过一个相当的时期，中英美再加苏联也可战胜日寇。中央号召在敌后艰苦困难条件下，英勇奋斗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的最艰苦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训练干部，加强学习等）迎接反法西斯的胜利。

中　央
十二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应取的政策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太平洋战争是长期战争，日寇将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目前正从华北华中抽兵南进，将来还有抽调一部可能，重庆政策是仅用游击队对敌，不用主力与敌对峙，让敌人撤走，我军亦应取此政策。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十三日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的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收复敌撤退地区，对深入我区之据点，尽可能使之陷于孤立，自动撤去，对某一些最必要的地方，可以个别地采取强攻收复手段，但不可采取大规模攻势，反而抑留敌人，引起报复扫荡，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部队中及地方上可能发生的冒险精神，必须防止。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急躁。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止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弊。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务望各同志研究实行之。

我党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

（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

周：

（一）卅电（分析九中）已悉，甚好，即分发各方；

（二）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

（三）今年内德意会向下，日本还会向上，英美会削弱，国民党会分化。

毛 泽 东

齐

〔附〕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施行要点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

帝国鉴于当前紧迫的形势，特别是美、英、荷等各国所采取的对日攻势和苏联的形势，以及帝国国力的灵活机动性等等，根据下列各点，贯彻《适应局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中规定的关于南方的措施：

一、帝国为了完成自存自卫，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下，拟以十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

二、与此同时，帝国对美、英尽量采取各种外交手段，努力贯彻帝国的要求。

帝国在对美（英）谈判中应该达到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事项和帝国对此可以允诺的限度，如附件。

三、上一条规定的外交谈判到十月上旬尚未达到我方要求的情况下，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对南方以外的政策措施，根据既定的国策，应特别努力，不使美、苏结成对日的联合战线。

附件

在对美(英)谈判中，帝国应该达到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事项和帝国对此可以允诺的限度：

第一，在对美（英）谈判中，帝国应该达到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事项：

一、（关于中国事变的事项）

美、英不插手，不阻挠帝国对中国事变的处理。

（一）不阻挠帝国根据《日华基本条约》和《日满华共同宣言》的方针解决事变的企图。

（二）封闭滇缅公路，不使通过它对蒋政权作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

注：以上条款并不妨碍N工作中帝国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一贯主张，特别坚持日本和中国之间根据新规定的有关驻扎帝国军队的事项。

但是，不妨明确说明，除了上述驻军以外，随着中国事变的解决，在原则上准备撤退为贯彻中国事变而派到中国去的军队。

并且，对于美、英在华权益，不妨这样明确说明：在美、英对新东亚有所理解而作出相应的行动时，没有加以限制的意图。

二、（确保帝国国防安全的事项）

美、英不在远东采取威胁帝国国防的行动。

（一）承认以日本和法国的约定为基础的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特殊关系。

（二）在泰国、荷属东印度、中国和远东苏联领土内，不占取军事权益。

（三）远东兵备维持现状，不再增加。

三、（关于帝国取得所必需的物资的事项）

美、英应在帝国取得所必需的物资方面给予合作。

（一）恢复与帝国的通商关系。并且，两国在西南太平洋上的领土，应向帝国供给帝国

生存所急需的物资。

（二）对于帝国与泰国、荷属东印度之间的经济合作，应友好进行协助。

第二，帝国可以允许的限度

如果答应第一条中帝国的要求，则：

一、除中国外，帝国不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用武力进入其邻近地区。

二、在远东确立公正的和平后，帝国准备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兵。

三、帝国准备保证菲律宾的中立。

注：

一、如问到帝国对于三国同盟的态度时，明确说明：帝国对于贯彻三国条约中的义务，没有任何变更；但我方不进而讨论帝国对三国条约的态度和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

二、如问到帝国对于苏联的态度时，应这样应付：在苏联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并且对日本和满洲国不采取威胁以及其他违反该条约精神的行动时，我方不进而采取武力行动。

（译自〔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544—545页）

〔附〕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一　方针

一、帝国认为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下同）的参战是打开日本和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

二、对照世界战局的演变，在美、英方面的反攻到达最高潮之前，先根据上述方针，设法使对华的各种措施获得成果。

第二　要点

一、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

（一）帝国对于国民政府尽量避免干涉，极力促进它的自发活动。

（二）极力调整占领地区内的地方特殊性，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

（三）对于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殊的各种形态，应以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的精神为基础，设法尽速予以撤销，或者予以调整。关于九龙租借地的处理，和香港一起另行规定。

（四）使国民政府以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在各方面讲求自强之道，广收人心，特别是为了完成战争，设法确实地实现增进必要的生产，普及官民对战争目的的教育，以及加强维持治安等各项工作，不遗余力地在战争方面与帝国彻底合作。

（五）帝国将来斟酌国民政府的充实加强及其对日合作的具体表现等等，及时考虑对《日华基本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加以必要的修改。

二、经济政策

（一）当前的对华经济措施，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主要目标；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并积极取得重要的敌方物资。

（二）实行经济措施时，一面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一面利用中国方面官民的责任心和创造精神，实现积极的对日合作。

三、对重庆的策略

（一）帝国不进行一切以重庆为对手的和平工作。

形势变化，需要进行和平工作时，另作决定。

（二）使国民政府采取跟随帝国的态度。

四、战略政策

帝国的对华战略政策，根据既定方针。

（译自〔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580—581页）

〔附〕日汪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

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及大日本帝国政府

依据本日所订之关于协力完遂战争之共同宣言之本旨，本尊重中华民国主权之旨趣，协定如下：

第一章　专　管　租　界

第一条　日本政府应将日本国在中华民国之内现今所有之专管租界行政权，交还中华民国政府。

第二条　两国政府，应各任命同数之委员，使协议决定关于前条实施之细目。

第三条　中华民国政府于依据前二条租界交还实施后，在该地域内施政时，关于日本臣民之居住营业及福祉等，至少应维持向来之程度。

第二章　公共租界及公使馆区域

第四条　日本国政府依据另行协议所定，应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尽速收回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行政权。

第五条　日本国政府应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迅速收回北京公使馆区域行政权。

第三章　治　外　法　权

第六条　日本国政府对于日本国在中华民国国内现今所有之治外法权，业经决定速行撤废，两国政府应各任命同数之委员，设置专门委员会，使审议拟订关于上述之具体方案。

第七条　中华民国政府应随日本国之撤废治外法权而开放其领域，使日本臣民得居住营业，且对于日本国臣民不予以较中华民国国民为不利益之待遇。前条之专门委员会并应讲求关于前项之具体方案。

第八条　本协定自签定之日起实施之。

下列签字者，各奉本国政府正当之委任，将本协定签定盖印，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九日

订于南京

昭和十八年一月九日

以中日文各缮本协定二份。

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汪兆铭

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　重光葵

（申报社编辑：1944年度《申报年鉴》，1944年7月初版，第500—501页）

〔附〕　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

（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

第一、方针

对重庆的政治工作的重点，在于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使重庆政权迅速停止对日抗战。为此，首先要制造彼此直接会谈的机会，以此为第一目标。

第二、要点

一、当前的工作目标

使〔汪伪〕国民政府进行活动，制造彼此之间直接会谈的机会。为此，如果可能，使国民政府派遣适当人员到重庆去。

二、和平条件的草案

和平条件，以完全的平等条件为原则，大体拟定如下：

（一）全面和平后，中国与美、英的关系

只要中国采取善意的中立，即可满足。

还要使中国方面自发地使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

（二）汪蒋关系

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

但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

（三）日华条约的处理问题

废除《日华同盟条约》，重新签订全面和平后日、华永久和平的友好条约。

现在，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

延安政权和共产军的处理，也照上条。

（四）撤兵问题

如果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

其实行办法，则根据停战协定。

（五）满洲国问题

满洲国，不改变现状。

（六）蒙疆问题

作为中国的内政问题处理。

（七）香港及其他南方地区的处理

把香港让给中国。

关于南方权益，另行考虑。

（八）将来的保障安全问题

中国方面对帝国所提出的保障安全的要求，要尽量答应。帝国对中国提出的保障安全的要求，就是：为了反对美、英军队再度侵入中国，使中国承认派遣必要的军队。

三、利用苏联

（一）有效地运用由于日、苏邦交的迅速好转而造成的政治压力，设法促进这项工作。

（二）随着日、苏谈判的进展，如果需要，使苏联成为这项工作的居间人。

四、与这项工作同时并进，讲求一切手段，助长日、华和平思想，并贯彻宣传：重庆依靠美、英，终于会招致中国民族的被奴役，造成东亚的灭亡。

五、实施本工作方案时应注意之点：

（一）关于提示和平条件的范围和方法，另行规定。

（二）本工作方案应竭尽一切手段，坚决执行。

（三）实施本工作方案时，关于涉及影响对苏关系的事项，要特别慎重。并要严密注意，不致被美、英利用为离间日、苏关系的工具。

（译自〔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605—606页）

〔附〕 打通粤汉铁路南部作战计划概要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中国派遣军第六方面军制订

方针

一、方面军于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以第二十军及第二十三军奇袭粤汉铁路南部，加以占领和固守，同时，以有实力的一个兵团消灭遂（川）赣（州）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

二、本作战的要点在于使毫无损失地占领粤汉铁路的重点技术工程，而以击灭敌野战军为次要目的。

三、作战时间大致预定两个月。

指导要点

四、第二十军

（一）以第四十师团集结于道县、零陵附近，以有实力的一部份部队集结于耒阳附近，并以第二十七师团集结于攸县、茶陵附近，准备作战，并不使其发生损失。

（二）一月中旬，开始行动，奇袭并占领韶关以北的粤汉铁路。要善于利用为此而训练

的挺进队，努力占领其重点技术工程。

（三）以第二十七师团进入遂川、赣州地区，消灭该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

（四）与第二十三军策应，消灭南雄（韶关东北、东一百公里）地区的敌航空基地，并且扫荡该地的敌人。

（五）战事结束后，固守广东省界附近以北的粤汉铁路沿线地区，并将第二十七师团、第四十师团划归第二十三军。

五、第二十三军

（一）以有实力的一个兵团集结于清远（广州北、西北七〇公里）附近，准备作战。

（二）一月中旬，开始作战，与第二十军策应，奇袭并占领韶关以南的粤汉铁路。

（三）占领韶关后，消灭南雄附近的航空基地，并扫荡消灭附近的敌人。

（四）战事结束后，恢复广东省界以南的粤汉铁路。并为加强对美战备，将第二十七师团与第四十师团划归该军指挥。

六、铁路部队

第二野战铁路部队，与第二十军合作，担任铁路线上技术方面的占领工作，并恢复韶关以北的粤汉铁路。为占领铁路技术工程，配备第二十军所需要的人员。

〔日〕《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1）至三月为止》（《战史丛书》第42卷），1971年朝云新闻社版，第36—38页。

〔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

美国及中国政府宣告：两国现联合其他抱有同志愿之国家及民族，从事共同之努力，以期奠定公正、永久和平之基础，俾其本身及一切国家获得法律秩序。

又，美国及中国政府为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联合国宣言之签字者，以是而承受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国大总统及英国首相所为之联合宣言，即称为大西洋宪章者中所包含之宗旨及原则之共同纲领。

又，美国总统已依照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美国国会法案决定：中华民国之防御及抵抗侵略对于美国之防御关系至为重要。

又，美国已给予并正继续给予中华民国以援助，以抵抗侵略。

又，中国政府转变此项援助及美国以酬答此项援助而获得之利益之条件，宜延缓以待局势之进展，使能更了然何种条件与利益能对于美国及中国有相互利益及促进世界和平之建立与维持后，再作最后之决定。

又，美国及中国政府，俱愿对于防御援助之供应，及决定此项条件应顾及之若干事项，在目前成立初步协定。

又，此项协定之订立案经正式核准，举凡按美国及中国之法律，在订立此项协定以前应完成或执行之手续条件，均已依法完成或执行。

后列签字人，经其本国政府为此目的正式授权议定如下：

第一条 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

第二条 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

第三条 未经美国大总统之同意，中国政府不以任何根据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美国国会法案而转移之防卫用品或防卫情报，转移其所有或持有，或允许任何非中国政府官员、雇员或代理人之使用。

第四条 如以将任何防卫用品或防卫情报转移于中国政府之结果，而中国应采取任何办法，或给付款项，以充分保护对此项用品或情报有专利之美国人民之权利时，则中国政府经美国大总统之要求，当采取此项办法或付给此项款项。

第五条 依美国大总统之决定，此次紧急状态终了时，中国政府当以未曾毁坏、遗失或消耗及美国大总统决定为对于美国或西半球之防卫或对美国其他方面为有用之用品，返还美国。

第六条 在最后决定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国之利益之时，对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后，中华民国政府所供给及经大总统代表美国接受之一切财产、兵力、情报、便利或其他利益或事项，应加以充分之考虑。

第七条 在与美国会商以后，中国政府为报酬根据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国会法案而为之援助，应给予之利益之最后规定中，其条件应不致影响两国间之贸易，而应促进两国间相互有利之经济关系及改善世界经济关系。为此目的，上述规定中，应包括载有美国及中华民国同意之行动，并公开使其他具有相同志愿之国家参加，借国际的及国内的适当办法，以增加为全世界人类自由、幸福、物质基础之物品之生产、使用、交换与消费，并取消国际贸易间一切歧视待遇、减低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一般而论，即应实现美国大总统及英国首相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共同宣言内所列之经济目标。两国间应于迅速便利之日期开始谈判，以期参酌主要经济状况，决定以其本身之协意行动达到上述目的之最佳方法，并谋其他具有相同志愿之政府之协意行动。

第八条 本协定自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起生效，在双方政府所议定之日期以前，应继续有效。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作成两份，签订于华盛顿

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外交部长 宋子文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国务卿 赫 尔

附 注

本协定原称为“中美两国政府关于适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美国国会法案所认可及规定之互相援助以执行抵抗侵略战争之原则之协定”，又简称为“中美互助协定”或“租借协定”，英文本又简称为“租借主体协定”。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48—1251页）

〔附〕 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节录）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

第一条　现行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之条约与协定，凡授权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或其代表实行管辖在中华民国领土内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之一切条款，兹特撤销作废。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土内，应依照国际公法之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之管辖。

第二条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中国政府与他国政府，包括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之议定书应行取消，并同意，该议定书及其附件所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一切权利应予终止。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协助中华民国政府与其他有关政府成立必要之协定，将北平使馆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华民国政府，并相互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于接收使馆界行政与管理时，应厘定办法，担任并履行使馆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

在北平使馆界内已划与美利坚合众国之土地，其上建有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房屋，中华民国政府允许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为公务上之目的，有继续使用之权。

第三条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应归还中华民国政府，并同意，凡关于上述租界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权利应予终止。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协助中华民国政府与其他有关政府成立必要之协定，将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上述租界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华民国政府，并相互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于接收上述租界行政管理时，应厘定办法，担任并履行上述租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

第四条　为免除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包括公司及社团）或政府在中华民国领土内现有关于不动产之权利发生任何问题，尤为免除各条约及协定之各条款因本约第一条规定废止而可能发生之问题起见，双方同意，上述现有之权利不得取消作废，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追究，依照法律手续提出证据，证明此项权利系以诈欺或类似诈欺或其他不正当之手段所取得者不在此限。同时相互了解，此项权利取得时所根据之官厅手续，如日后有任何变更之处，该项权利不得因之作废。双方并同意，此项权利应受中华民国关于征收捐税、征用土地及有关国防各项法令之约束，非经中华民国政府之明白许可，并不得移转于第三国政府或人民（包括公司及社团）。

双方并同意，中华民国政府对于美利坚合众国人民或政府持有之不动产永租契或其他证据，如欲另行换发新所有权状时，中国官厅当不征收任何费用。此项新所有权状应充分保障上述租契或其他证据之持有人与其合法之继承人及受让人，并不得减损其原来权益，包括转让权在内。双方并同意，中国官厅不得向美利坚合众国人民或政府要求缴纳涉及本约发生效力以前有关土地移转之任何费用。

第五条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人民在美利坚合众国全境内，早已予以旅行、居住及经商之权利，中华民国政府同意，对于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土内，予以相同之权利。两国政府在各该国管辖所及之领土内，尽力给予对方国人民关于各项法律手续、司法事件之处理及各种租税之征收与其有关事项，不低于所给本国人民之待遇。

第六条　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相互同意，彼此领事官经对方给予执行职务证书后，得在对方国双方同意之口岸、地方与城市驻扎。两国之领事官在其领事区内应有与其本国人民会晤、通讯以及指示之权。倘其本国人民在其领事区内被拘留、逮捕、监禁或听候审判时，应立即通知该领事官，该领事官于通知主管官厅后，得探视此等人民。总之，两国之领事官应享有现代国际惯例所给予之权利、特权与豁免。

双方并同意，对方人民在此国领土内者，有随时与其领事官通讯之权。对方人民在此国之领土内被拘留、逮捕、监禁或听候审判者，其与领事官之通讯，地方官厅应予转递。

第七条　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相互同意，经一方之请求，或于现在抵抗共同敌国之战事停止后，至迟六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一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此项条约将以近代国际程序与中华民国政府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近年来与他国政府所缔结之近代条约中所表现之国际公法原则与国际惯例为根据。

前项广泛条约未经订立以前，倘日后遇有涉及中华民国领土内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包括公司及社团）或政府权利之任何问题发生，而不在本约范围内，或不在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现行而未经本约废止，或与本约不相抵触之条约、专约及协定之范围内者，应由两国政府代表会商，依照普通承认之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第八条　本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约应予批准，批准书应于华盛顿迅速互换。

本约于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在华盛顿签字、盖印。中文及英文各两份，中文、英文有同等之效力。

魏道明
赫　尔

换　　文

（一）

本代表奉本国政府之命，兹特声明：关于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本日签订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放弃在中国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之条约，中华民国政府认为关于通商口岸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特区法院之制度，以及中国领土内各口岸外籍引水人之雇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及人民所享有各权利一并放弃。鉴于此项通商口岸制度之废止，彼此了解，中华民国领土内，凡平时对美国海外商运已开放之沿海口岸，于本约及所附换文发生效力后，对于此项商运，仍继续开放。

双方同意，此国之商船，许其自由驶至彼国对于海外商运业已或将来开放之口岸地方及领水；并同意，在该口岸地方及领水内，给予此等船舶之待遇，不得低于所给予各该本国船

舶之待遇，且应与所给予任何第三国船舶之待遇同样优厚。

双方了解，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放弃给予美利坚合众国船舶在中华民国领水内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特权。中华民国政府准备以公平价格收购美方现时用以经营此项事业之一切产业；如任何一方以内河航行或沿海贸易权给予第三国船舶时，则应给予彼方船舶以同样之权利。缔约国任何一方在他方之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依照他方有关法律之规定办理，不得要求他方之本国待遇。惟双方同意，一方之船舶在他方境内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所享受之待遇，应与任何第三国船舶之待遇同样优厚。

双方了解，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放弃给予其军舰在中华民国领水内之特权；并相互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于彼此军舰之访问，应依照国际惯例及仪式，相互给予优礼。

双方了解，凡本约及换文未涉及之问题，如有影响中华民国主权时，应由两国政府代表会商，依照普通承认之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关于本约之第四条，中华民国政府兹声明：该条内所指关于现有不动产权利之转让权所受之限制，中国官厅当秉公办理。如中国政府对于所提出之转让拒绝同意，而美方利益关系人希望中国政府收购该项权利时，中国政府本公平之精神及为避免该利益关系人之损失起见，当以适当之代价收购之。

双方了解，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之法院及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之领事法庭之命令、宣告判决、决定及其他处分，应认为确定案件，于必要时，中国官厅应予以执行。双方并了解，当本约效力发生时，凡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之法院及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之领事法庭之任何未结案件，如原告或告诉人希望移交于中华民国政府之主管法院时，该法院应从速进行处理之，并于可能范围内适用美国法律。

双方了解，此种同意与谅解，如荷贵国政府证实，即作为本日所签订条约内容之一部分，并自该约生效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代表应请贵代表证实上述之了解，为荷。

本代表顺向贵代表重表敬意。此致

美利坚合众国外交部部长赫尔

魏道明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56—1260页）

〔附〕 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节录）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

第一条

（一）本约所适用之缔约双方领土，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阁下方面，为中华民国之

一切领土；在英王陛下方面，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印度、一切殖民地、海外领土、英王陛下之保护国、及在英王保护或宗主权下之一切疆土、以及联合王国政府所执行委任统治之一切委任统治地。本约以下各条所称缔约此方或彼方之领土，即系指本约所适用之各该方领土。

（二）本约所称“缔约此方（或彼方）人民”字样，在中华民国方面，为一切中华民国人民；在英王陛下方面，为本约所适用之领土内之一切不列颠臣民及受保护之人民。

（三）“缔约此方（或彼方）公司”字样，在本约适用上，应解释为依照本约所适用之各该方领土之法律而组成之有限公司及其他公司、合伙暨社团。

第二条　现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阁下与英王陛下间之条约与协定，凡授权英王陛下或其代表实行管辖在中华民国领土内英王陛下之人民或公司之一切条款，兹特撤销作废。英王陛下之人民及公司，在中华民国领土内，应依照国际公法之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之管辖。

第三条

（一）英王陛下认为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中国政府与他国政府，包括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之议定书应行取消，并同意，该议定书及其附件所给予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之一切权利应予终止。

（二）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愿协助中华民国政府与其他有关政府成立必要之协定，将北平使馆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华民国政府，并相互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于接收使馆界行政与管理时，应厘订办法，担任并履行使馆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

（三）在北平使馆界内已划与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之土地，其上建有属于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之房屋，中华民国政府允许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为公务上之目的，有继续使用之权。

第四条

（一）英王陛下认为，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应归还中华民国政府，并同意，凡关于上述租界给予英王陛下之权利应予终止。

（二）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愿协助中华民国政府与其他有关政府成立必要之协定，将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上述租界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华民国政府，并相互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于接收上述租界行政与管理时，应厘订办法，担任并履行上述租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

（三）英王陛下同意将天津英租界（包括英方工部局所管全部区域）及广州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归还中华民国政府，并同意，凡关于上述两租界给予英王陛下之权利应予终止。

（四）天津英租界（包括英方工部局所管全部区域）及广州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应移交于中华民国政府，并相互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于接收该两租界行政与管理时，应厘订办法，担任并履行该两租界之官有义务及债务，并承认及保护该两租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

第五条

（一）为免除英王陛下之人民及公司或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在中华民国领土内现有关于不动产之权利发生任何问题，尤为免除各条约及协定各条款因本约第二条规定废止而可能

发生之问题起见，双方同意，上述现有之权利不得取消作废，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追究，但依照法律手续提出证据，证明此项权利系以诈欺或类似诈欺或其他不正当之手段所取得者不在此限。同时相互了解，此项权利取得时所根据之原来手续，如日后有任何变更之处，该项权利不得因之作废。双方并同意，此项权利之行使应受中华民国关于征收捐税、征用土地及有关国防各项法令之约束，非经中华民国政府之明白许可，并不得移转于第三国政府或人民（包括公司）。

（二）双方并同意，中华民国政府对于英王陛下之人民或公司或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持有之不动产永租契或其他证据，如欲另行换发新所有权状时，中国官厅当不征收任何费用。此项新所有权状应充分保障上述租契或其他证据之持有人与其合法之继承人及受让人，并不得减损其原来权益，包括转让权在内。

（三）双方并同意，中国官厅不得向英王陛下之人民或公司或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要求缴纳涉及本约发生效力以前有关土地移转之任何费用。

第六条　英王陛下对于中华民国人民在英王陛下各领土内，早予以旅行、居住及经商之权利，中华民国同意，对于英王陛下之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土内，予以相同之权利。缔约双方在各该方之领土内，尽力给予对方之人民及公司关于各项法律手续、司法事件之处理及各种租税之征收与其有关事项，不低于所给予本国人民与公司之待遇。

第七条　缔约此方之领事官经彼方给予执行职务证书后，得在彼方领土内双方所同意之口岸、地方与城市驻扎。彼方领土内之缔约此方领事官在其领事区内，应有与其本国人民及公司会晤、通讯以及指示之权，而缔约此方之人民及公司在彼方领土之内，亦随时有与其本国领事官通讯之权。遇有缔约此方之任何人民在彼方领土内，被地方官厅逮捕或拘留时，该地方主管官厅应立即通知在该地领事区内之彼方领事官。该领事官于其管辖范围以内，有权探视其任何被逮捕或在狱候审之本国人民。缔约此方之人民在彼方领土内被监禁者，其与本国领事官之通信，地方官厅应转递与其主管之领事官。缔约此方之领事官在彼方领土内，应享有现代国际惯例所给予之权利、特权与豁免。

第八条

（一）缔约双方经一方之请求，或于现在抵抗共同敌国之战事停止后，至迟六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此项条约将以近代国际程序与缔约双方近年来与他国政府所缔结之近代条约中所表现之国际公法原则与国际惯例为根据。

（二）前项广泛条约未经订立以前，倘日后遇有涉及中华民国领土内英王陛下之人民或公司或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或印度政府权利之任何问题发生，而不在本约及换文范围内，或不在缔约双方间现行而未经本约及换文废止或与本约及换文不相抵触之条约、专约及协定之范围内者，应由缔约双方代表会商，依照普通承认之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第九条　本约应予批准，批准书应于重庆迅速互换。本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发生效力。

上开全权代表爰于本约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本约用中、英文各缮两份。中文、英文均有同等之效力。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即西历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订于重庆。

宋子文

薛　穆

黎吉生

附　　件

（一）关于本约第二条及第八条第二项，双方了解：

（甲）英王陛下放弃关于在中国通商口岸制度之一切现行条约权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与英王陛下相互同意，缔约一方之商船许其自由驶至缔约彼方领土内对于海外商运业已或将来开放之口岸、地方及领水，并同意，在该口岸、地方及领水内，给予此等船舶之待遇不得低于所给予各该本国船舶之待遇，且应与所给予任何第三国船舶之待遇同样优厚。缔约一方之"船舶"字样，指依照本约所适用该方领土内之法律登记者。

（乙）英王陛下放弃关于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特别法院一切现行条约权利。

（丙）英王陛下放弃关于在中华民国领土内各口岸雇用外籍引水人之一切现行权利。

（丁）英王陛下放弃关于其军舰驶入中华民国领水之一切现行条约权利。中华民国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缔约一方军舰访问彼方口岸，应依照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戊）英王陛下放弃要求任用英籍臣民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任何权利。

（己）所有现在中华民国领土内设置之英王陛下一切法院，既经依照本约第二条之规定予以停闭，该项法院之命令、宣告、判决及其他处分应认为确定案件，于必要时，中国官厅应予以执行。又，当本约发生效力时，凡在中国之英王陛下法院任何未结案件，如原告或告诉人希望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之主管法院时，应即交由该法院从速进行处理，并于可能范围内，适用英王陛下法庭所适用之法律。

（庚）英王陛下放弃给予其船舶在中华民国领水内关于沿海贸易或内河航行之特权。英王陛下之人民或公司用以经营此项事业之产业，如业主愿意出卖时，中华民国政府准备以公平价格收购之。中华民国政府放弃一八九四年三月一日在伦敦签订之专约第十二条所给予中国船舶在伊洛瓦底江关于航行之特权。如缔约一方在其任何领土内以沿海贸易或内河航行之权利给予任何第三国之船舶，则此项权利亦应同样给予缔约彼方之船舶，但以缔约彼方准许缔约此方之船舶在彼方领土内经营沿海贸易或内河航行为条件。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依照彼方有关法律之规定办理，不得要求彼方之本国待遇。惟双方同意，缔约一方之船舶在缔约彼方之领土内，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所享受之待遇，应与任何第三国船舶之待遇同样优厚，惟须遵守上述但书之规定。

（二）关于本约第五条第一节最末句，中华民国政府兹声明，该条内所指现有不动产权利之转让权所受之限制，中国官厅当秉公办理。如中国政府对于所提出之转让拒绝同意，而被拒绝转让之英王陛下之人民或公司请求收购时，中国政府本公平之精神及为避免使英王陛下之利益关系人民或公司损失起见，当以适当之代价收购该项权利。

（三）双方了解，通商口岸制度之废止不得影响现有之财产权，并了解，缔约一方之人民在缔约彼方之领土全境，得依照缔约彼方之法令所规定之条件，享受取得并置有不动产之权利。

（四）双方并同意，凡本约及本照会未涉及之问题，如有影响中华民国主权时，应由中华民国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之代表会商，依照普通承认之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63—1269页）

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

（一九四二年三月）

刘　少　奇

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

扩大会议在经过讨论之后，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关于“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并着各级党的组织将此报告向全党全军传达，作为今后的奋斗目标与行动路线。

一九四二年三月五日通过

一　（略）

二　（略）

三　我党我军在华中各根据地今后的任务

根据以上国际形势的分析，及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总结，那末我们在华中各根据地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

因为在我这个报告之后，还有关于军事的、政府的及党与群众工作的专门报告，我不能过分在这里侵犯以上各个报告的范围，同时又因为我在前一部分的报告中，已经简单的提出了各个根据地今后的特殊任务，故我在这里只简单的提出各根据地今后一般的任务，即是各根据地今后均须切实执行与完成的共同的任务。

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今后一般的总的任务，就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这就是我党我军今后一切工作的总方针，奋斗的总目标。

而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根据地，与加强聚集力量以准备反攻敌人，这几个任务，是互相联系的，三位一体的，而不能互相孤立起来看。其中任何一个任务的完成，都能帮助其他两个任务的完成；其中任何一个任务如不能完成，则使其他两个任务亦不能或难以完成。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条件之下，应该着重其中之某一个任务，然而一般的来说，则完全巩固各根据地。为今后应该特别着重的一个任务。因为只有各根据地的完全巩固，才能在敌伪严重扫荡与反共派阴谋进攻之下胜利的长期的坚持敌后抗战，才能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反攻敌人；而粉碎敌伪扫荡与反共派的阴谋进攻，则为巩固各根据地的先决条件。

这就是以上三个任务的相互关系。

为了彻底完成上述任务，我党我军在各根据地就必需切实进行各项工作，完成下列各项

具体任务：

有那些具体任务呢？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坚决粉碎敌伪的一切扫荡，加强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加强对敌伪的工作，团结一切抗日阶层的人民，为保卫根据地，保卫家乡而战斗到底。

只有这个任务的完成，才能使我各根据地顺利进行巩固工作与建设工作；否则，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很困难的。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各根据地各部队必须经常有反扫荡的准备，并且动员与训练人民，改造地形，以便共同粉碎敌伪的大小扫荡。加强警戒侦察，以防敌伪偷袭，严格反对太平观念及一切不适合于反扫荡与敌后游击的组织形式。同时必须用一切方法派遣适当的部队与干部到敌伪区及敌伪据点附近去开辟工作，进行游击。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必须进入敌伪区及逼近敌伪据点附近去活动，反对大家驻在中心区远离敌伪据点的现象。

敌伪如果向我进行大小扫荡，必须以灵活的顽强的游击战彻底粉碎之。敌伪如集中一二地区清乡，则应进行比较大的机动，同时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群众与必需的干部和武装，使敌伪的清乡归于无效。敌伪如集中一二地区扫荡与清乡，其他地区我军必需在军部统一指挥下进行有力的战略配合。

我们必须告诉华中敌后各阶层的人民，并以各种实际行动给人民看，我军我党是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各根据地的，无论如何与人民一起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到最后胜利为止的，无论如何要为保卫各根据地而流最后的一滴血的，并要求各阶层人民和我军我党团结一起坚持敌后抗战到底。我们要严格反对在敌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不经上级允许，即随便撤退，随便离开本地，离开职守，及抛弃地区与根据地的现象。要为坚持每一个地区而斗争，要在敌情严重情况下锻炼我们一切组织用各种办法坚持斗争的能力。

对于敌伪破坏我根据地各种建设及物质生产的进攻，掠夺我根据地人力物力的强盗行为，伪化敌后地区的“强化治安运动”与“清乡”运动，以及敌之特务活动、经济封锁、经济统制等，必须坚决的打击之，必须详细的调查，研究对策，以打破之，必须为保护根据地的每一种建设与人力物力而战斗，必须针对敌之“强化治安运动”与“清乡”，而加强我之政治上的以至经济上的攻势。

关于瓦解敌伪军工作，各根据地各部队应根据总政治部屡次的指示及各地经验与具体情况，切实的去进行。首先应该使干部及党员彻底了解敌伪工作的重要性——对于我在敌后长期坚持抗战，巩固根据地，与争取最后胜利，均有极端重要的作用与关系。我们决不可忽略或放弃从这一方面向敌伪进行斗争。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寻求一切机会，务必在这方面获得大的成绩。目前各级干部中仍有忽视这项工作的，应切实加以纠正。

应派出必要的干部来加强敌伪工作机关（采用适当的名称），成立各地敌伪工作委员会，以统一工作的领导与计划，在各个接近敌人的方向成立工作站，切实调查敌伪情况，并注意总结经验，训练干部，严格遵守一定的秘密工作的规则。

对敌军俘虏，应严格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不准杀害，多加释放。同时应纠正我们队伍中狭义民族主义的倾向，及侮辱日本民族的行为。提倡中日两大民族革命的平等的联合。

应切实执行中央关于敌占城市及敌伪区人民中工作的指示，切实去建立这些地区的工作。对于接近我根据地的某些伪化地区，可以创造同情区。在这种同情区中，是一律不用我党我军的公开名义进行活动的，只在十分必要时，才以这种同情区作为我们某些部队及组织

之掩护。但在这种地区，党可用灰色的名义建立党所领导的武装或其他组织。现在江高及其他我军游击队公开活动的地区，则应建立我之游击根据地。在敌强我弱的游击区比在我强敌弱的游击区，各种组织的形式应有不同。

只有在敌伪工作上获得大的成绩，只有扩大敌伪与伪伪之间的矛盾，以争取更多的同情，孤立敌人及最坏的汉奸，我们才能更顺利的粉碎敌伪的进攻与扫荡，打击最坏的汉奸，长期坚持敌后抗战与巩固根据地。也只有坚决的胜利的粉碎敌人的进攻与打击最坏的汉奸，才能使我们在敌伪工作方面获得更大的成绩。

关于敌伪工作另有报告，我这里不多说。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根据党的一贯的统一战线方针进行各种工作，以便联合一切抗日的友军友党与抗日的各阶层人民和团体及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在我根据地内之人民与团体共同抗日，同时应警戒亲日反共派对我之进攻阴谋，并准备击退这种进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在我之各种具体政策上，切实执行上述方针，如保护友军友党人士在我根据地内的家属的生命财产，并帮助其解决困难，和照顾各阶层人民各党派团体的利益等，同时还必须尽一切可能和我根据地附近之友军友党及各界领袖团体进行各种接洽，以便在组织上及具体行动上达到共同坚持敌后抗战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之目的。

在（一）抗日；（二）不反共（不破坏抗日根据地与我军）；（三）实行民主。这三个条件之下，我军我党不拒绝与任何党派军队及个人团体合作，共同建设根据地。这种态度我们不只应在口头上文件上宣布，而且应在一切实际行动与政策法律上昭信于各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孤立敌人，否则，必陷自己于孤立，以至增加自己的困难，造成自己的危险与失败。

由于敌寇灭亡全中国的坚决的方针不变，由于敌伪对于敌占区人民残酷野蛮的掠夺与压迫，因此，敌人与中国一般地主及资产阶级之间，甚至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此，他们仍有抗日的要求，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并善于处理，我们是仍然能够和他们保持合作，或改善关系以共同抗日的，因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与中小地主及中等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此，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并善于处理（缩小我们与中等阶级的一些矛盾），我们是能争取这些阶级站在我们方面或守善意中立的。一切阶级的政治动向，是由其特殊的阶级地位，及其与各方面的矛盾的情形来决定的。

对于那些至今仍坚持反共成见，并仍企图向我军及根据地进攻之友军友党，应用一切方法解消其成见，并停止其向我进攻，解消某种僵持局面，共同抗日。然而其中如果还有坚持其成见。并仍在亲日派指使下无理向我进攻者，则我仍应实行坚决的自卫政策，坚决击退其进攻。因为只有坚决击退这种进攻，我才能在敌后坚持抗战并巩固根据地。否则，是不可能的。现在亲日派仍在活动，进攻与消灭我军的阴谋，仍未放弃，因此我们仍应时时警戒，并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作必要的布置，以防其突然的阴谋袭击，及皖南事变重演。

对于在我根据地附近之一切友军，应切实的依照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不能容许忽视。我们除开公开反对投降反共及磨擦之外，不应挑拨与破坏友军。我们某些报纸的宣传，以后在对友军问题上应特别注意。各地组织及各部队应抽调一切能作友军工作的干部与人员，去加强和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并切实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为了真正实现正确的团结所有各抗日阶层的人民及友军友党共同抗日与建设根据地起见，必须加强我们的调查工作，研究各阶层人民各党派军队与各方面的矛盾及其政治动向。

必须加强党内关于战略策略的教育，统一战线的教育，使我们的同志和干部真正懂得党的战略策略及其在各种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同时还必须加强党内关于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及民主政治的教育与训练。要使共产党员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及民主作风，同时又能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在民主政治之下，和其他的阶级进行合法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能够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达到上述目的。否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任务，就是要切实依照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指示，来继续提高主力军，加强与扩大地方军，广大的建立与训练人民武装，建设与提高兵工生产，及正确的指挥各种战斗。

只有建设强大而精干的军事力量，并培养很多很好的指挥人材，才是我们坚持抗战与争取胜利最可靠的力量基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下列各项：

（一）主力军除以一部地方化加强地方军之外，应力求精干。实行必要的缩编，减少机关，充实连队，裁撤老弱，并抽出大批干部来加以训练提高与加强地方军。主力军各部应寻求机会继续加以整训、在整训时应预先规定切实的训练目标与计划，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应密切配合，进行深入的解释与动员（可能时应召集团或旅的党代表会等）。应切实发动指战员学习的自动性与积极性，避免或减少采用强制与惩罚的方法。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亲自去进行整训和检阅。

（二）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应努力设法补充主力军的兵员。这种兵员除随时个别扩大及争取俘虏而外，在可能时可进行扩兵运动，并设法从地方部队及人民武装中动员一部分兵员。关于新兵的训练，各根据地可设立补充团或新兵训练处，专司训练新兵及新成立的地方部队之责，以便系统的总结关于训练新兵及新部队的经验。

（三）在华中各根据地今后均须集中力量来扩大与加强地方军。务必使地方军达到与主力军同样多的人枪数目，有的地方还可超过主力军。这须各地订出切实的计划按期完成。但地方军同样须力求精干，以免浪费人力物力，地方军应掌握在地方党及最可靠的地方干部手中，并加强军区与军分区的工作能力。凡由主力军派到地方军去工作的干部，应经过一定的训练，因地方军须采用比主力军相当不同的工作方式，不可将主力军的一套机械搬到地方军去使用。一切地方军均须提高其战斗力、提高其群众纪律，提高其中党的作用。

（四）在苏南苏中及巢无地区，一般不应有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分，不是将地方军编入主力军，相反，应使主力更进一步地方化，将主力编入地方军。师部旅部即成为军区军分区司令部。为使地方党与军队有密切的结合，地方区党委及地委县委的负责人，可兼军区军分区及地方兵团的政委。

（五）必须为建立广大的人民武装而斗争。部队及党与政府和群众团体，必须切实配合，用极大的努力来进行，真正组织最大多数的男女壮丁到自卫队中去，必须在民主的方式下，发动广大人民抗日保家防匪的积极性来进行。否则，建立广大人民武装的任务，必不能真正的完成。关于各种人民武装的编制、任务、职责及训练等，各根据地应有明确的规定与教育，并通令一切部队机关和团体遵守执行。

（六）建设与提高各地兵工生产，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各根据地及各部队对此重视，仍极不够。以后应切实加以注意，并普遍建立。不要怕经费不够，不要怕材料及工人困难，而应尽一切努力去进行。生产应集中在手榴弹地雷及马刀的制造。

部队的供给工作，部队吃饭穿衣及休息等问题，是部队中最重要的问题，如弄不好，则

一切无从作好，以后各级干部必须经常给以最大的注意，绝不可稍稍忽视。

（七）今后的战斗形式。主要的仍然是对敌的分散游击战争，以及在必要时进行大规模的反磨擦战斗。军事指挥原则，仍然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因此各部队在战略行动上，必须服从与遵守上级统一战略指挥与战略计划，而在战斗上，则须各地区各部队独立自主的去布置与进行，不要坚持与希望上级的指挥与命令。而上级指挥机关亦不要在游击的战斗动作上去过分干涉下级，而只应在一定时期去检查。由于过去无数战斗的经验，凡无充分准备布置的战斗，及仓卒应战，是打不好的，或很难打好。因此今后各种战斗之前，均应尽一切可能进行充分的侦察动员及各种准备，力避仓卒应战，务求每战必胜，每战必求彻底消灭敌人，彻底完成任务，扩张战果。要正确把握我军积蓄和保持有生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基本的战术原则，一面反对轻率冒险，切戒浪战，免致得不偿失，造成对自己的过分消耗；一面反对迟疑犹豫虎头蛇尾，以致丧失战斗时机，贻患将来。

（八）各种军事政治干部的训练，今后更增加其重要性，应扩大教育机关，提高教育的水准与质量，延长学习期间，并抽调最好的干部来加以训练。对各级干部（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应即举行一次公开的鉴定，并大体规定其资格。

（九）部队政治工作，须切实加强并提高其作用。应切实研究与改进连队的政治工作（各师可召集专门的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切实克服干部中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加强他们的党性锻炼，审查每一个干部的思想，加以批评鉴定与勉励。对于那些革命立场业已动摇的干部，则须调动其工作，加以较严格的训练。所有政治工作干部则须严整政治纪律，务必在政治上党性上作一切指战员的模范。同时须提高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与必要的军事知识，因为我们的政治工作干部，很多还不能从原则上理解与透彻解释部队中干部中的各种问题与各种现象，说服干部，并鼓动部队的积极性，又还有许多政治干部缺乏必要的军事知识，因而不能使政治工作配合军事上的要求与行动。

第四个任务，就是要普遍深入的发动和组织根据地内的基本群众，普遍切实的改善群众生活，建立真正广大的群众团体。

这个任务的完成，是巩固根据地最基本的条件，是坚持敌后抗战与聚集力量的源泉，没有根据地内基本群众普遍深入的发动和强固的组织，巩固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一切任务的执行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的依靠群众，必须根据中央各种原则的指示，迅速完成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任务，打破目前根据地内群众运动落后的现象。

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切实普遍的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的待遇，为真正改善人民生活，解除人民疾苦而奋斗。在目前因为华中除个别地区外，减租减息及改善生活的办法，均未真正的彻底的实行。因此，在中央决定的一定限度（如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及交租交息等）之内，我们目前应强调改善群众生活及于群众有利的一方面，以便真正的（而不是假的形式的）改善群众生活，减轻封建剥削，而大大的发动与组织群众，提高群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一切共产党员，不论他站在任何工作岗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均必须经常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每一个实际利益（即使是最小的利益并关系人数不多的）而奋斗。不代表群众利益，不爱护群众的利益，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不为解除群众疾苦而服务，用漠不关心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切身利益与疾苦的问题，那就不是共产党员。

当着群众业已发动起来，为了满足群众合理的要求，而向地主资本家进行适当的一定限

度的斗争的时候，应该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地主资本家千百年来的优势，即不能打破，群众即不能确定的发动。但必须正确执行这种斗争的策略，必须注意其适当与不超过一定的限度，我们的干部，必须留心，不要使群众行动走到过份的左倾，妨害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战，如在发动群众中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一些左倾，我们要能适当说服群众。并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办法，来调解这种斗争。而在调解的时候，党与政府的态度，一方面不要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并保障群众的利益，鼓励群众前进；另一方面又要能使地主资本家悦服、安心，不要过分的伤害地主资本家。所谓进行适当的一定限度的斗争，就是：第一，要能经过群众的行动与要求，切实打破地主对改善人民生活与实行民主的反对和阻碍，使其在经济上政治上作重大的让步；第二，不要提出时间空间所不能允许的过高的要求；第三、不要采用超出抗日民主政府法律所允许以外的手段；第四，注意争取社会的同情并多说道理；第五，在群众要求达到之后，应设法解消地主资本家在斗争中所记下的某些仇恨。总之一句，即是要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在可能的一定限度之内，切实的改善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的要求，并大大发动群众；但是不要妨害团结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共同抗日的总的战略方针，要更少的引起地主资本家与党和政府之间的裂痕。所谓在群众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发生一些过左的现象，这是客观的现象，是主观所不能控编的现象，这不是主观上故意要去左一些。如果农村中的基本群众真正的广大的发动与组织起来，如果我们执行了正确的策略，是绝不会妨害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的；相反，将大有助于团结一般的地主资本家共同抗日，并可能促进一些地主资本家走向开明，使他们发现救中国的可靠力量与新中国的曙光。

各根据地的党，必须在党内很好的研究与总结群众斗争的策略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

根据地中群众团体的本身任务，就是：（一）保护群众切身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文化上的利益；（二）组织与团结广大（全体）群众到群众团体中来；（三）教育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根据地内的群众团体，是抗日民主政权主要的社会支柱。它应在保护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并引导广大的群众去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部队的建设。应该派遣自己最好的干部与积极分子到民主政府及部队中去负责，积极参加政府与部队的工作，反对政府中的官僚主义与贪污腐化。积极提高根据地内的生产……。只有这样，它才是抗日民主政府所倚靠的不可时刻离开的主要的社会支柱，并提高自己的地位与运用政府来保护群众的利益。

要建立根据地内强大的真正拥有数十百万会员——雄厚社会力量的群众团体。因此，必须更加提高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建立从上至下群众团体的组织系统，培养各根据地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很多的领袖，派遣一批专门的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到群众团体去工作，提高群众团体在社会上法律上政治上的地位，准备群众团体相当雄厚的基金，由群众团体举办多项对群众有利的社会事业，大规模的进行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的教育……。一切机关部队，必须注意培养这样有威望的强大的群众团体，然后才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帮助。

群众团体有群众团体特殊的工作方式与作风，不可把党的政府的部队的工作方式与作风，搬到群众团体去使用。共产党员，特别群众工作者，应该很好的来学习与研究这种特殊的群众工作方式与作风。

对于根据地内之工人雇农，应切实注意建立其独立组织，并特别注意训练工人干部。对于青年妇女儿童的组织，今后不能再容许忽视，必须分配必要的干部建立各根据地青年妇女儿童团体，大规模争取与组织青年妇女儿童群众。

对于游击区的群众，亦根据各地特殊的情况，采取特殊的方法与策略，去组织他们。

第五个任务，就是要彻底改造根据地内的政权机构，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成为包括所有各抗日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权。

这个任务的完成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本质，是意味着以下的事实：

（一）改变千百年来地主封建势力的专政，在经济上削弱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减租减息），在政治上打破地主阶级的垄断与优势；但又不是彻底推翻与消灭封建势力。

（二）提高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到统治地位，使政权具有广大的深厚的群众性（而不是与群众对抗或脱离群众）；但又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所有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阶级（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对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两点就是改造政权的真实意义。因此，根据地内政权的改造，不只是调换几个人，而且是政权机构各种制度的改造，而且是国体与政体的改造。即是要将千百年来便利封建阶级统治人民的政权机构，加以彻底的改造，使之便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来管理与掌握的政权机构。

因此，根据地内政权的彻底改造，是意味着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对封建地主阶级一个严重的斗争——经济的、政治的严重斗争。（这种斗争在今天我们是要用改良的“和平”的方式）。因为地主阶级绝不会自愿的在政治上让出自己的优势，以及在经济上对工农作重大的让步（过去国民党几次宣布二五减租均不能实行，以及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法令至今还有许多未能实行的原因，即在地主阶级的坚强抵抗）。如果没有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系统的有计划的斗争，把自己上升为根据地内的统治阶级，政权的彻底改造，是决定的不可能的。

因此，彻底改造根据地内政权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发动与组织根据地内的广大群众来积极管理政权的问题，是如何团结根据地内所有各抗日阶层的人民来积极参加政权管理的问题。

一般的来说，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改造，是经过两个步骤来完成的。第一个步骤，是我军在敌后反扫荡反磨擦的胜利，造成了抗日民主势力在各根据地内一定的优势，建立了根据地内现在这样的政权机构（没有完成的统一战线政权）；因此就造成了执行第二个步骤的可能；这第二个步骤，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广大深入的发动和参加政权的管理，以彻底完成政权的改造，建立完成的统一战线政权。第一个步骤早已过去，第二个步骤则正待我们执行。完成这第二个步骤，即是巩固了第一个步骤的胜利。

现在各根据地内的政权，基本上已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但还是带临时性质的、在形式上没有完成、在内容上尚有缺陷的统一战线政权。即是一种尚未完成的过渡的统一战线政权。它的根本的缺陷，表现在上层是共产党员占绝对优势，而下层则是封建势力的操纵，基本群众尚未参加政权的管理，民主制度完全未建立。在基本群众尚未发动前，这样过渡政权是必要的。用命令（完全非民主的形式）委派许多共产党员到政权机关中去负责，这就造成了政权走向完全民主化的有力条件和保障。现在就是要利用这种条件，

把没有完成的临时的统一战线政权，改造成为正式的完成形式的统一战线政权，合乎三三制的政权。即上层既不是我们包办，下层也不是封建势力的操纵，而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统一战线政权。

根据地内的政权，本身应该就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是最高的组织形式。民主政权的本身，也应该同时就是群众组织的一种形式。人民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因此，它必须带有广泛的群众性，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不是与人民对抗，与人民生活隔离。

那末，我们怎样来进行政权的彻底改造呢？

首先，我们同志所应了解的，就是这种改造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创造的伟大的组织工作，而且是一个包括数十百万人民的严重的斗争。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与伟大的组织工作。这个斗争开始从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对地主资本家要求减租减息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起，发动群众，一直提高发展到改造政权的斗争，与坚持敌后抗战的斗争，以达到在经济上改善群众生活，在政治上打破地主阶级的优势，来保障群众在经济上已取得的胜利。改造政权的斗争，要与广大群众切身的经济利益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这种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中，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教育群众、从群众中生长出新的干部，锻炼出新的人民，建立起新的组织与制度，然后才能达成政权的彻底改造。

我们要特别注意下层（区、乡）政权的改造，并使下层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与进步份子手中，可靠的群众积极份子手中，然后才能打破封建势力对下层政权的操纵。至少在最初一个时期，应该这样。虽然在下层政权中，基本上也应实行三三制，但在最初一个时期，如果不将下层政权掌握在可靠的民主势力手中，真正的三三制即无法实行。也只有在下层政权中切实打破封建势力的操纵，然后才能吸引更多的党外人士参加上层政权中的工作。

其次，对基层政权的改造，我们要进行以下的一些必须的工作：

第一，确定公民独立的政治权利，取消家长在政治上法律上的特权。保障任何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公民个人有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之自由，享有公民一切的权利，并对自己的活动在法律上负完全的责任，不联累其家长及任何亲属。同时也不允许任何人妨害其他任何公民的权利，连自己直系与非直系的亲属（父母叔伯等），亦无权利妨害其子侄在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各种政治活动之自由。这就是说，在政治上法律上取消家长的特权，打破家长在政治上统治其家人的特殊权利。

中国社会中的家长制，家长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是封建专政与个人独裁的社会基础。目前我们一下子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固然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必需确定任何公民个人有独立活动的政治权利，不能承认任何家长限制其家人子侄的政治经济活动为合法。民主政治，必须确定以公民个人为政治活动的单位，也由公民个人对政府负责。而不以家族或户口为政治活动的单位，也不由家长或族长对其家人在政治上法律上负责。世界一切国家的民主政治，均是如此的。

因此，政府应即举行公民登记，发给公民证，进行必要的公民教育……。

第二，确定以乡（镇市）为人民自治单位，代替保甲制。保甲制，是个人独裁政治的基本形式。它是从家长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与家长制是同类的东西。在保甲制之下，没有人民的自治，而只有人民的被治。保甲制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东西，而不是为人民所支配的东西，只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所以这种保甲制，是实行民主政治的障碍。民主政府在乡村人民自治筹备妥善之后，应即宣布保甲制的废除。

政府应即依照自然的条件（以及敌情条件），来重新划分行政区，一般应该划小些，以便人民能更直接的管理政府（是为了人民能更便利的管理政府，而不是首先为了政府能更便利的去管理人民）。乡村自治的基本组织形式，应确定为乡政府。市镇人民自治的基本组织形式。为镇或市政府。每乡公民组织乡民会议，并由公民选举代表若干人，组织乡民代表会。由乡民代表会选举乡政委员会及乡长，组织乡政府（在乡村自治实行至一定的时间，公民有更多的民主训练之后，乡镇委员会及乡长即由全乡公民会议选举，而不由乡民代表会选举）。市镇亦为人民自治单位，有市民会议，市民代表会，市政委员会及市长选举，是一个直接的“和平的”政治斗争。党在选举之前，必须有很好的准备组织，在公民尚无实施民主政治的经验之时，我们现在暂时还不能不实行复选制（即间接选举），即只由公民直接选举乡民代表，其他乡政委员会及区县政府，暂时均由各级代表会选举。待人民有相当民主政治的经验之时，应即将复选制，改为各级政府直接由公民选举的制度，即所谓直接的选举制。

公民的选举权，不应有任何的限制（除开汉奸及法庭剥夺公权者外），各种机关、部队及外地来人，只要以后在本地活动、居住、营业或工作者，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在选举前，要公布选举法，组织选举委员会，及其事务所，并严禁收买及受贿与操纵强迫公民投票等行为。

第三，改组各级政府为合于三三制的与民主集中制的政府。即就是说，在乡村自治政府组织好以后，即应召集区民代表会，县参议会，以及各根据地的参议会。这种代表会与参议会是有全权的，有选举各级政府（区政委员会，县政委员会及各根据地行政委员会）与撤换各级政府之权。各级政府均实行委员制，少数服从多数，行政首长服从委员会的制度。

在各级政府的委员会中，各级党与农会的负责人，应尽可能被选进去，取消各级政府的指导员督导员等。

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下，不是什么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而是三权合一或五权合一。立法、行政、司法，均集中于各级代表会，参议会及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之下。

为了建立新的政权机构，新的民主制度与作风，须要根据敌后抗战的实际情形及全国的大势制订各种法律、条例等等，并且要切实实行法治，建立法律的高度威信。首先应在各根据地颁布一个临时的基本法律——敌后抗战的基本宪章，在这个基本法律之上，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各级政府的组织大纲，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形式（三权合一等），及土地劳资与男女的基本关系，和根据地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基本态度等。这个基本法律，为其他一切法律条例的根据。这个基本法律，则根据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敌后的实际情况来制订，适用于抗战建国的阶段。各种法律的制订，须要各根据地用极大的注意力来进行，并须吸收许多专家等工作。

关于三三制，是我党在一定的革命阶段中，与一定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政治的规定，而不是一种法律的规定。因此，在任何法律上，不应该有三三制的规定。三三制在敌后根据地政权中实行，是民主的，然而，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在任何政府机关中，规定共产党员要占三分之一。在民主制度之下，这种特权，任何人及任何党派都是不能有的。在法律上，对于一切的公民，一切的党派、团体，都不能有任何特权，都是完全平等的，都只能给以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自然在各级民意机关中，依照会员人数的比例，规定各种职业团体、民众团体及部队一定数量的代表，是可以的。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不能有这个规定。同样，在法律上，也不能规定任何人在政府中的优势，及其领导地位。共产党及工农在政府中优势与领导

地位，不能依靠任何法律或强力去实现，而只能依靠真理，依靠政策的正确性，党员模范的工作，及人民对于它的拥护等来实现。否则，共产党即不能在民主制度的政府之下有领导地位，封建势力仍将在政治上占着优势。

三三制在根据地内实行，当然是我们对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个重大的让步，这个让步，为了团结一切阶级共同抗战，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少的。然而，这个让步从全局上来看，却又是进攻的。

第四，共产党员特别政府工作的党员，要学习法律，养成法治的精神，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的合作的作风，反对关门主义及包办垄断的作风。没有这一点，政权的民主化，三三制的实行，是不可能的。在敌后根据地中政权的民主化，我们负有极大的责任。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这方面严格检查自己。我们同志在这方面是有极大的缺点。同时，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用心的来研究与学习合法斗争的策略，在三三制实行后，政权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只是改变了形式，共产党员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只有经过合法斗争来保持与巩固，否则，即没有我们的领导地位。而我们同志对于合法斗争的知识是十分缺乏的。至于党外人士在政府中的薪水公粮津贴制度，亦容许有特别的规定。

第六个任务，就是要在财政经济及食粮方面作极大努力，来保障人民的需要，部队的给养，以与敌伪在经济上作斗争。

各根据地的财政与粮食，均须努力做到自给，不要依靠外面的帮助；但在经济情况较好的地区，则除自给之外，应努力帮助全国及其他各根据地。各根据地之财政，均应统筹统支，严格实行金库制及预决算。并须向人民公布，向上级报告。

各根据地对敌伪的经济统治与封锁，绝不可忽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寇完全封锁中国各敌后根据地是可能的。因此，应迅速准备对策。否则，将受极大的窘迫。

今后各根据地在财政经济粮食方面，应执行以下各项：

A.努力动员与帮助人民进行春耕夏耕，真正作到提高农业生产，多种自己需要的东西，少种资敌物品。各机关部队须切实进行生产，以补助自己的粮食菜蔬，可成立专门的生产部门来负责进行。提高农业生产，是解决根据地内财政经济问题基本的主要的办法。

B.动员与帮助人民纺纱、织布、熬盐、熬硝、造纸。

C.将税收政策由进出口税转移到依靠土地税——田赋——及其他营业税统税等为主要来源。因此应即切实登记田亩，整理田赋。并努力开辟盐税及向敌伪争得税源。

D.尽可能发行纸币，以抵制伪币及敌伪对法币的操纵。必要时可发行一定数量的公债。

E.严格征收保管公粮的制度。动员人民收藏粮食、调节民粮，严禁粮食资敌(粮食运输一律要护照）。各根据地并可征收一定数量的公草与油粮，以供给部队之消费。

F.在较巩固的根据地中，实行对外贸易的一定的统制，以抵制敌之统制，进出口货一律应在政府贸易局领取护照。相当限制输入输出。

G.发展合作社，调节物价。

H.最后，实行精兵简政，节省人力物力。严格反对浪费贪污，禁止任意向人民募捐慰劳等。

第七个任务，就是要发展根据地内的文化教育，办理各种学校，训练人民成为新的公民。

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反对汉奸的奴化教育，反对封建的愚昧教育，提倡科学

等，奖励一切私人办学。各乡学校及民众学校应即办起来，各县中学亦须从速办理。各根据地之高中及专门班应加扩大。应使这些一般的学校与我们的训练班区别开来，不要采用一样的办法去办理。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应给予保障，所有学产收入，一律拨交学校。教员的训练，应加紧进行，教员的待遇，应加以确定，给予相当的保障。课本的编番与印刷，须迅速进行，对于民众教育，则须在群众运动发动的基础上，去广泛的大规模的进行。根据地的青年儿童运动，应与文教工作密切配合的进行。

第八个任务，就是要健全各根据地保安处与除奸部门的工作和组织，加紧对敌探奸细及破坏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特务进行秘密斗争。

在根据地保障一切人民政治活动的自由，因此，不能允许任何秘密组织的存在。对于瞒藏在根据地内的敌探汉奸及破坏分子、土匪，应加以肃清、驱逐。但不能因此株连任何好人。保安处对于案件的破获，应交法院处理，执行一定的司法手续，并须向人民公布。各根据地之除奸机关应切实加强，方能建立与保障人民抗日的秩序。

第九个任务，就是要建设根据地内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

根据目前根据地内党的组织状况，对于地方党及部队党的建设，应即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A.在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发展，有相当数量党员的地方（乡、区、县），党的组织任务，主要是巩固党的组织，教育党员，审查党员，整理支部，建立支部工作。发展党员，只是个别的审慎的介绍。

农村中党的支部工作的建立（以及部队中机关中亦一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各根据地必须有最负责的人去实地考察，并召集专门的支部工作会议，来加以研究和讨论。在获得一定的经验之后，应即对所有支部书记及委员，进行普遍的训练。

B.在尚无党的组织或党员数量太少的地方（乡、区、县），则主要任务，是建立这些地方党的组织，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但必需是审慎的个别的发展。

C.在全党应根据中央的指示与经验，进行普遍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对一切干部及党员作一负责的鉴定，指出他的优点缺点，特别在思想上的缺点，以勉励党员和干部继续前进。这应首先作充分的准备与解释，以免引起党内的不安。这种审查鉴定的目的，是要清查混入党内的敌探奸细，发现投机分子，落后分子，克服干部党员中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教育干部党员，以巩固党。应使每一个党员了解：被党审查是光荣，只有以党所审查与考验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而这种审查与鉴定，每一年两年必须进行一次。

D.扩大训练党的干部，根据中央关于党校的决定，各根据地与华中局党校，必须进行改组，并扩大大学生数量，期限亦可稍加延长。除开学习必需要的马列主义理论之外，要加强党性的学习，及根据各种政策与中央指示和时事问题的研究与学习。教材应根据现有的各种文件及经验来编辑，教员除开一定的专门教员之外，各负责人必须亲自上课。

E.培养更多更高级的地方干部。特别注意坚定地方干部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因为地方干部在本地，易受封建势力的包围，能在本地与封建势力进行不动摇的斗争，是很困难的，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各级党校应多注意吸收地方干部，并须采用许多其他的方法来教育地方干部。

F.正确建立党与其他各种组织的关系，使干部及党员区别清楚党、政、军、民、各种组

织的特殊任务，特殊作用，特殊的工作方式，斗争方式等，是一件很重大很复杂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干部就是一切组织不分，——党政不分、党民不分，……党、政、军、民、学、混淆一起，互相代替，互相干涉，互相对抗，因此，妨害工作甚大。必须使各个组织在任务、职权、工作方式……上区别开来，而又结合在党的指导之下，使党成为最高的组织形式。这是结合各种斗争形式的先决条件。在这里，对于干部和党员除开使其具有一般的党的知识（党的方针政策等）之外，还应有特殊的专门的知识，应精通本行，具备自己职业范围内的知识。在这里，应适当提倡党员的事业精神。

C.加紧调查研究，以反对主观主义。这须各根据地根据中央的决定，有系统有计划的由党政军民各方面分工去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只是一种工作，而应该成为我们共产党员一种作风，是我们的思想方法。即是说一切要根据事实，拿事实出来，并从各种事实的互相关系中来得出结论；而不是根据空想，根据死的书本及决议的条文。应该考察实情，不应该随便相信人家的报告与谣言，随便怀疑猜测，随便感情用事，随便根据片面的个别事实……。一切错误，是由于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不一致，主观不合事实。把事实弄清了，再根据我们一定的立场——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利益来处理问题，就不会有错了。在事实未弄清楚以前，去弄清事实，如一下弄不清楚事实，就不要妄下结论，不要固执，注意考虑事实的发展，一直到有事实的根据之后再下结论。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不是这样。应该从加紧调查研究中来加以改正。

H.反对宗派主义，团结全党，为党的光荣任务而战斗到底。一切党员，应该站在党的整个利益上来考虑问题，处理问题。而不应该站在个人的派别的利益上来考虑与处理问题。应该反对那些闹个人成见，记个人仇恨，在处理问题时分出地方界线、部队界线、新老界线、等等的宗派观点。要全党团结起来，上下团结、全军各部队团结、新老干部团结、本地与外地干部团结、党、政、军、民、学、一致团结，严防破坏分子的挑拨离间……，全党团结在党的中央、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一定能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

以上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各项具体任务。

如果我们能够完成上述各项任务，能够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与清乡，能够团结抗日的友党友军及抗日各阶层的人民共同抗战，并阻止反共派的进攻，能够建设强有力的抗日军队与抗日人民武装，能够普遍深入发动与组织数十百万群众，能够彻底改造政权机构成为完全的民主政权，能够在财政经济粮食上保障部队与人民的需要，能够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能够肃清敌探奸细及反动分子，又能够建设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那我们就能够胜利的坚持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并聚集我之反攻力量，以反攻敌人，迎接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反法西斯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所谓争取时间，是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用一切方法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两年的时间迅速完成上述各项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它无疑的又要多少改变敌后的形势，以及在全局上加强我党我军的影响。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咬紧牙关，为百分之百的完成上述各项任务而奋斗！胜利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这就是我的全部报告。

是否有当？请扩大会议的同志们批评、讨论和公决！

对山东工作意见的报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胡　　服

我到山东后，分局扩大会业已开过，在这个会议上许多同志对分局及山东工作存在很久的一些意见都发表出来，及对几个负责同志彼此间的关系有些改善，隔膜有些消除，但他并没有总结山东几年来的工作，也没有解决具体问题。在批评流露一些意气，强调指责某些部门的缺点与错误。

扩大会基本上没有解决山东问题。在扩大会后，召集了一次军政委员会，讨论山东地方军及一一五师关系诸问题时，只决定由山纵抽一个团补充一一五师，其余问题仍未解决。对于中央指定由山纵拨一个主力旅归一一五师建制命令未予执行，隔膜尚未最后消灭。

在与诸同志谈话中，发现分局同志对山东敌友我三方情况格外的不了解，不深入，不切实，无系统，空泛与肤浅，分局没有一个人了解山东全盘情况，都只了解一部分。

根据谈话结果，我召集了山东分局委与军政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山东战略方针与部署及主要干部配备，并决定了以下事项：

一、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分局，下设一军政委员会。

二、师部、山纵司令部及分局合并办公，三个机关直属队原有万余人，这在山东目前敌情下极不适宜，决定缩藏至三千五百人（连抗大、特务团、党校），如此才能机动。所有工厂、医院、学校及后方勤务机关均拨归各战略区或裁撤，分局、师部只保留领导机关，两个学校。山纵司令部及黎玉一部人员来师部，其余人员机关均交罗舜初改为鲁中军区司令部，加强各战略单位的工作与领导能力。师部、山纵、分局干部统一分配，一些得力干部名单另报。

三、决定山纵一旅拨归一一五师建制，胶东五旅亦成为机动部队，将来亦拨归一一五师。山纵其余各旅均拨归各军区并将大部分散插入各地方独立团营。

四、为此，还决定黎玉、朱瑞均驻师部与陈罗一块办公。扩大会将山东政府改为鲁中主任公署等。

以上各项，在团结力求原谅下一致通过了并在执行中。

夏收后，分局决定召集全山东的高级干部会，发表关于山东五年来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决定。并立即召集直属队及滨海区地委以上及县书干部作报告。我并准备作下列几个讲演：1、群众运动；2、党内斗争；3、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4、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5、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山东敌友我的大概情况

（一）山东共有敌据点五百三十九个，敌军三万三千人。伪军据点五百零九个，伪军八万零一百五十七人，内会门据点八十三，会门武装七千人，依敌与我作对。敌伪共有据点一

按：胡服即刘少奇同志。

千零四十八个，敌伪军十一万人，但山东无正规伪军。敌伪占交通要道，政经中心，并严密封锁津浦胶济两路，我之大部队已不能通过。在旧黄河下游及津浦路两边敌伪已是面的占领，据点很密，并积极向我之中心区推进。

台潍公路敌已修通并企图修台潍铁路，我之中心地区已被隔断。

（二）山东友顽军一百零六股，十三万零八百四十人（内反共者五十九股，八万五千七百四十人，中立者与态度不明者四十七股，四万四千一百六十人）。正规军有东北军二万余人，其余有七个纵队，×个暂编师，新编师，保安队若干。友顽内部及地方势力内部不统一，战斗力不强，大部与敌伪密切关系并分布于山东全境，控制了鲁中主要山区，各根据地与我形成对立相持局面。不时派小部队向我根据地侵扰扑杀我之地方人员与抗属。但友顽军与大后方的交通亦已被我所隔断。

（三）山东我军共有十万一千五百人，内主力五万五千，战斗人员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我之主要根据地在胶济路以南博山沂水县以下，莒县日照以南成为一个狭长地带，中间还有敌伪顽军据点与公路隔断，我已只有三块完整的据点。即滨海区（临沂赣榆之间）纵横约二百里。鲁中区（费县以北沂水蒙阴新泰莱芜地区）纵八十余里横六十余里。胶东区（莱阳平度以北地区）横三百里纵百余里，中间据点很少。此外均为敌伪顽军与我之间的游击区。据分局报告，我区有九十二个县，面积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八百万，但绝大部分均不完整分散的游击区，且因每个地区因有相当强大的顽军与我对峙，并有敌顽县区的政权，在我游击区内征收民伕要粮税，三面交错，故山东各地区均为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因此，我之主力完全被散处于对敌对顽两面作战之中，陷于被动完全无法机动，并使人民观望不敢坚定靠我。根据地极不巩固，根据各地情况判断在山东三角斗争中，力量对比敌占优势，顽次之，而我则居于第三的劣势地位。

但敌人在山东区，今仍无社会基础，兵力不足与分散，伪军动摇，敌伪间矛盾均重。而顽军内极不统一，与大后方交通断绝，但顽军占着比我有利之地形。有合法的地位，有全国的优势，有较好之伪军工作。而我军则战斗力较顽军强，内部比较统一，但我各地区被敌顽隔断，干部经验不够，在政策上常犯错误。

目前山东敌友我是极复杂的长期斗争的三角局面中，谁亦不能快解决问题，但我如果善于应付，可能争取若干好转，如应付不善并犯错误则我将发生更大的困难，并要频于危险。

五年来山东基本总结及经验教训

（一）五年来工作主要成绩，建立发展与锻炼党的武装（约十万人），打了许多胜仗，给了敌人以大的打击，在反磨擦中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打击反共派损失万人），并建立了我军在山东的根据地与游击区，实行民主改革，收入了大批粮食与税款，发展了党的组织（十一万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一些基本群众并派兵增援了华中新四军。由于这些成绩之获得，就使我们在山东立了脚，并造成长期坚持山东的条件，使我华中华北两战略区联系。

（二）但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有严重的缺点，就是我们在山东本来可以取得某种一般的优势，但没有取得，使今天处于劣势被动的两面作战的困难，我们根据地极不巩固，最近还有些缩小与隔断。在去年反扫荡中受着较大的损失（失踪与伤亡二千人，逃跑地方武装约四千人）。基本群众没有普遍深入的发动组织起来与改善其生活。地主绅士一部分反我逃亡，大

部对我观望与心怀不满，诚心与我合作者少。友军工作成绩亦小，伪军工作成绩亦不多。政权还没有彻底改造，成为真正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上层党员包办，下层地主操纵，党的组织不够健全，干部不甚团结，与群众联系甚差，掌握政策亦很差。

（三）产生上述缺点原因，除客观上敌伪顽军的阻碍与破坏之外，主观上是有其严重的错误与缺点。我们过去山东五年失掉对根据地争取战略优势的先机。在抗战发生后在于学忠来以前及以后，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来争取鲁南以至整个山东，建立许多抗日根据地，使自己站稳脚跟。但我们同志没有这样认识，在这方面采取消极，甚至将战略最关重要的山区让给友顽军，把中央发到山东的命令未执行，并听信与友顽军共同建立根据地的口号，因此，失去最好的机会。一一五师主力东征过津浦路很迟，过路后又未与山纵密切合作，迅速争取优势。同时在反磨擦斗争中无坚定明确的方针与切实战役部署，因此，反磨擦常是无计划的被动的，在反磨擦斗争中，虽消灭了很多敌人，但全部没有打得彻底，在战略上没有完成任务，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很好地利用有利有理有节的原则。在争取中立友军方面做得也很差。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原则性之错误，某些负责人最初就没有独立自主的团结山东一切抗日力量，来坚持山东抗日根据地，他们总觉得山东抗战是国民党人来作主要领导的。因此，在领导上就右倾，并对中间势力之动摇性估计不足，信任中间势力，帮助中间势力的发展。在另一方面下级在行动中、在政策上则又过左。对山东形势的估计常是陷于过分乐观，以为自己已有优势，已有领导权，对形势可能的恶化与困难则估计不足。在党内及干部阶级观念群众观念非常薄弱，不知道依靠广大群众，不重视群众工作，轻视工农分子，把群众团体干部看成第四等人，要他们作通讯员、马伕，甚至只发给他们几成的津贴与伙食。减租减息群众斗争策略组织方式等，根本没有任何研究与总结，群众的代表会议亦很少开。

在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的作风，党内的家长制，机关重迭，从分局起长篇大论的文章报告与大会内容空泛。

在党内斗争有严重的倾向，乱开斗争会，甚至在非党的群众团体及政府机关中亦开斗争会，打击同志与非党干部，但无原则的自由主义及无原则的斗争仍严重存在着。在军事上无统一的明确坚定的战略方针与战斗部署，多为被动的。整个对地方武装收编太多，人民武装未普遍组织，但又给一个带国民党性质的团体——抗协可在我根据地内组织武装的权利（已组织的约四千），因而与我发生许多不协调，他们甚至要求成立抗协单独的军区系统。

由于上述错误就产生目前的困难与严重的形势，这个责任是应由分局来担负，因为分局就根本没有形成为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不团结，没有形成集体领导，且发生了原则性的错误。一方面他们经验不够，另一方面又不民主，不相互商量，不切实调查研究，不细心研究中央指示，对中央指示命令服从不够，而自以为是英雄主义，创造许多新花样，造出另“一套”，因此就不能领导山东的党与军队。

党、军今后在山东任务

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各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迎接国际国内伟大的大事变。为此，必须：

（一）粉碎敌伪扫荡，加强对敌政治攻势，进行敌伪工作据点中工作，敌占区工作。

（二）争取友党友军共同抗战，改善关系，但对反共进攻者仍须坚决打击之。在战略上

关系重大之坚决反共的顽固者，在有理条件下求得消灭数股，适当进行一打一拉。

（三）统一军事政治的指挥与领导，扩大加强地方军，使我军主力能够进行机动，主力实行精兵，扩大组织人民武装，训练干部。

（四）普遍改善人民生活，减税减租，改善雇工待遇，广泛组织群众，总结群众工作与斗争策略。

（五）改造政权，成为真正抗日各阶层联合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争取中间阶层。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检查锄奸工作，加强党的建设，改造作风，正确进行思想斗争，审查鉴定与训练干部。反对无原则的纠纷与宗派主义。

北方局军分会关于对付敌人大规模清乡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二九师太北区党委太行太岳区党委并报各分局各党委各战略区并报中央军委 告 新 四军：

（一）四二年二月一号，敌人开始向我华北各个根据地，实行比较大规模的清剿扫荡以来，整个华北正处在严重情况目前敌仍在继续某些地区虽然尚未开始，如冀察晋但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敌人对我华北各个主要之任何一个地区是不会放松的，北局军分会特就将太行太岳的反扫荡斗争作如下的指示两个区党委及一二九师太岳纵队立即执行，并望其他地区的党和军队把这一指示，作为自己反扫荡斗争的重要参考：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虽曾一再指示敌人对我敌后根据地绝不会放松斗争，且更加残酷扫荡，仍将到来的，各根据地应对这一指示的实际意义了解尚不深刻，有不少同志甚至重要领导同志，某种程度的轻敌心理是存在着的，在敌人开始扫荡时，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十分不够的，在战争过程中我们的高级领导机关，对敌人此次扫荡的特点及其残酷性。虽然还是有了足够的认识，但在一般干部中仍然缺乏正确的了解与认识上的某些糊涂现象，直至今天还严重的存在着，除了军事指导方面直到今天不论太行及太岳区，还缺乏一全盘的指导方法与有效的粉碎敌人的清剿扫荡，还缺乏一套新的适当的扫荡作战环境下的更紧张的工作方式，许多侥幸与等待战争很快结束的心理也仍然很严重的存在着，因此在一般干部中重新引起更大的注意，重新研究讨论中央十二月十七日的指示，重新联系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来认识这一次敌人对我华北各个地区的扫荡清剿，还是特别重要的。

（三）从各方面所得材料证明，敌此次对我各个地区的扫荡，是有其整个计划的，敌人抽出一定的机动兵力，向我各个地区进行反复的清剿扫荡，提出所谓“消灭我之生存条件”为目的的作战方针。这与过去任何一次扫荡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在所得材料，敌人此次扫荡我太行太岳之时间是两个月，估计这是可能的，我们应作足够准备，应以积极的反 扫 荡 斗争，来迅速粉碎敌人的扫荡，减少我们不必要的损失。

（四）在敌人长期反复扫荡清剿情况下，在干部中在群众中可能发生许多不应 有 的 偏向，必须及时注意及时克服否则会更增加我们的困难和损失，及在敌人残酷的烧杀摧残下，只顾到局部的现象，缺乏对全局的了解，缺乏对目前有利的政治攻势的了解，因而发生怀疑与悲观的偏向，对于接近胜利的两年的艰苦斗争表示怀疑，对于苏德战争中，苏必 胜 德 必败，表示怀疑，对于敌人世界战争的冒险中，今后必然失败表示怀疑等等，这些偏向，如不及时坚决反对是会妨碍坚持斗争的胜利的信心，可能产生逃跑主义的危险偏向。敌人给我们的损害可能是很大的，但只要我们正确的坚持斗争，敌人想以消灭我们的生存条件，赶跑共

产党八路军是不可能的，党应动员各种组织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提高群众的斗争勇气坚决反对悲观情绪与逃跑主义。

（五）在敌人的严重的摧残下，可能产生对于我们坚持华北敌后斗争的伟大政治意义的认识不足的倾向，但要了解在我最后胜利之前，在敌人崩溃可能性前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敌人绝对不会放松我们的，我们的斗争已接近胜利，敌人对我们的仇恨也更会增加，我们的斗争，阻碍敌人灭亡我国的企图牵制着敌人对世界作更大的冒险，威胁着敌人对苏联的进攻，凡此等等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决不能因敌人一时的猖狂而降低了我们斗争的政治意义，党必须在对敌残酷斗争中对群众作充分的解释，我们坚持斗争的重要意义。

（六）当着我们准备不够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时可能发生张惶失措的现象，可能不少干部特别是一般群众不了解敌人在五年来扫荡失败的教训，了解到过去一般的扫荡消灭我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敌人采取更卑鄙的办法，采取更毒辣的分区清剿，企图彻底摧毁我生存条件，这是必然的。党应以过去我们斗争的成绩，正确的政策中来解释敌人为什么会采取如此凶恶的方法，应当充分说明，只有本着我们过去一贯的英勇斗争传统，才能打退敌人的凶狠进攻，才能准备迎接将来增加艰苦的斗争。

（七）在新的长期反复清剿扫荡中，我党政军民各方面可能发生互相埋怨的现象，可能发生小的报复主义，可能发生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等偏向，在困难中愈易引起这些现象。军队怨地方帮助不够，地方怨军队不打仗，在地方游击队及民众中，看见自己家乡被毁父母妻子被杀，更易产生拼命主义，党必须正确的掌握群众的斗争情绪，以广泛的游击战争去打击敌人，反对单纯的拼命，必须向群众解释简单的拼命是不能战胜敌人，而且是敌人所欢迎的。严重扫荡中，可能产生对积蓄力量的曲解，可能把积蓄力量和消弱敌人对立起来，机械的了解积蓄力量不会用一切机会去打击敌人，杀伤敌人，疲劳敌人，应当把积蓄力量和消弱敌人联系起来，消弱敌人，也就是生息自己，要积蓄力量，就必须积极的展开对敌斗争，今日要想与敌人和平共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党必须向党政军民及一切群众作深切的解释。

（八）在敌人严重的扫荡大杀大抢之下，群众情绪可能发生心理的变化和不满，党必须加以严密的注意，并确实去掌握，否则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将会使部份群众脱离我们特别是支部和分区委更须随时留心群众心理的变化给以具体的解释和正确的处理。估计群众情绪可能产生极端的恐惧与震慑，这正是敌人企图在群众中所要造成的绝望心理，党必须用一切方法去巩固群众的斗争意志，防止敌人的引诱进行汉奸的挑拨，防止群众在绝望中不管明天的生活，只顾今天吃喝，防止群众过一天算一天的失望心理，防止群众敌来则紧张敌去则松懈的不正常状态。

（九）在反扫荡斗争中必须立即进行以下的具体工作：

1、山岳地区的党，过去一般的是大机关主义不习惯于轻装，在严重游击战争中仍能更紧张的进行工作，这在今天敌人长期的扫荡中，如果不立即改正将会使工作受到莫大的损失，将会失去领导机关的作用。应当根据对战争的估计定出一定的反扫荡斗争计划，将主要负责同志及机关工作人员作必要的分散到各个地区帮助下级党去进行工作，反对拖着机关跑扫荡的现象。反对等待扫荡过后再去进行敌后工作的现象，必须使一切党及政府群众团体的机构，在战争环境下，仍能坚持工作仍能紧张的进行工作。

2、除正规部队根据真申电的军事指导进行工作外，各级党委和军区军分区必须立即以

最大的力量争取一批干部去加强民兵的工作，在敌人此次扫荡中由于我们准备不够民兵的作用表现出极大的弱点甚至有些地方的民兵，有埋枪逃散的现象，必须立即派得力干部下去帮助这一工作，只有加强民兵的工作，利用民兵的地方性，积极活动，才能使敌人行动不安全不稳，才能打击敌人分散搜山捉人，才能造成主力打击敌人的机会，才能更多的疲惫敌人，减少我们人力物力的损失。同时必须加强地方游击队的活动应当和民兵一起积极的有效的去袭击敌人，去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去封锁消息捉拿汉奸，我们号召全华北的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以自己的灵活英勇行动寻求一切机会去杀伤敌人。我们全华北一千二百五十多个县，假使每个县的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每天能杀害一个多人一个月就能消灭敌人一个旅团，这是长期削弱敌人的有效办法。

3、必须立即根据北局一月会议的决定派选武装工作队携带大批宣传品到敌区及各铁路公路沿线去工作，对这一工作表示迟缓的执行×××××十必须密切军队和地方党的联系，军队的政治工作，必须把帮助群众工作，帮助民兵工作当做自己主要工作，克服军队中对群众纪律不良的现象，纠正军队和群众的纠纷，群众必须协助军队带路报告敌情解决粮食等问题，地方党应做到自动的去找军队的政治机关以及政治委员与司令机关以便协助一切。

4、应当在群众中发扬高度的互助精神，被清剿区的群众，转移到邻区时，应帮助解决粮食住所等问题，并进行克服群众中封建的地区界限，打破历史的成见，更应普遍的深入的宣传敌人的残暴，以生动的实际事实，暴露敌人无人性的屠杀与抢掠，号召避难群众组织复仇队，号召群众和进步的伪军与八路军抗日政府团结奋斗，指出只有对敌展开坚决的斗争。才能生存，才能减少敌人的危害，克服群众的失败情绪与某些现象，并反对于坚持斗争作机械的了解，只知死守一地不懂得作灵活的必要的转移是错误的，反对依赖狭小的经验固守沟坑和空洞如敌人扫荡在石门村被敌杀死群众，村干部全部被杀死将是最惨痛的血的教训，应切实的进行空舍清野的工作反对在这些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反对小偷对清舍空野工作的破坏和阻碍；政府对于屡诫不改的小偷，应予以严厉的治罪，姑息与放任是不对的，至于避难群众救饥必须者而不得同小偷同样处理，应加以劝戒和适当安置，凡被烧光的区村群众无法立脚分散其到其他区村时，其原因有的各种组织被拆散必须要设法恢复组织，以便减少损害及提高其斗争情绪，在严重的斗争环境中，我们的工作更应高度的紧张起来，任何松懈和散慢都是极端有害的。目前的工作中心应当放在用一切方法去团结群众，十分认真的拥护群众利益，减少群众的损害增加敌人的困难，战胜敌人削弱敌人配合加强粉碎敌人的扫荡，必须了解在战争中，在群众困难中谁能够替群众想办法，谁能够为群众解决问题，谁就是最好的群众领袖，这正是培养群众领袖的最好时机，全党全军必须紧张起来，为粉碎敌人的扫荡而斗争。

北方局军分会

二月二十五日

北方局军分会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

（一）蚕食政策是目前敌人向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这是在敌人困难日益增加兵力更感不足摧残我根据地的一切方法遭受失败的条件下由“治安肃正”与治安强化发布以来，我各方面给敌以有利的打击不够，就造成了目前全华北敌寇蚕食我根据地的嚣张，某些根据地敌进我退的形式异常严重，这个严重的形式在平原地区（如冀南）表现的更为显明，并不立刻展开坚决的有系统的全面反蚕食斗争，则不仅不能停止这严重形式的发展。且将造成更严重困难的局面，这是首先必须引起我们华北全党政军万分注意的。

（二）敌人蚕食政策的进攻似乎不象敌军事大扫荡的猛烈与显著，它是缓步的隐蔽的零星的给我的震荡轰动，因此许多地方的对敌人这一恶毒的阴谋，过去及现在都表现了不容许的忽视与麻痹，表现了消极退却与单纯应付，至今除少数地区外还没有一套有效的具体办法来停止与粉碎敌人的蚕食进攻。有的地区已经在蚕食过程中被蚕食到心腹地带来了。几年来敌占区广大根据地的缩小，由于敌人的蚕食所造成者十之七八。敌人蚕食政策给我们的危害，较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无不及，这是必须有足够认识的。

（三）敌人蚕食政策的实施是十分具体与灵活的。但根据各地的经验，一般的可以分作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主要的是进行各种准备，进行秘密活动。进行这些准备与活动的方法，是准备向蚕食的地区进行深入严密的调查与研究，寻求扩大×制造并利用我们的弱点，寻求可以利用之对象，主要是流氓、食门、国特以及不满分子，建立（？）秘密的特务工作及情报组织，发展暗维持，制造种种谣言、动摇人心、挑拨离间。为了配合这些活动，敌人还不断的进行军事扫荡清剿，无可形容的残酷，镇压与进攻，造成人人自危的严重恐怖，镇压人心，破坏我们的一切抗日干部的地位，追使我们武装力量难以公开存在，给了奸细造成有利的活动条件。

2、第二阶段主要是在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秘密工作完全公开起来。其方法是：首先依托原来的据点，向正面或侧面迂回三十里至四十里。建设新的据点。将被蚕食的地区变成方格，然后：实行种种活动，驱除我之武装力量，破坏我民兵，捕捉我抗日干部，制造群众与我对立，建立公开维持会，严厉镇压下，施以小惠达到其统治目的。在追使维持会公开时，条件很低，只要上钩就行，要求便一步一步的加紧起来。有个别小的地区，也有不依靠军事力量，经过政治压力，就达到蚕食的目的。这要看敌人准备工作作的如何，要看我之反蚕食斗争作的如何来决定。一般的说来这一阶段斗争是异常残酷的。

3、第三个阶段要看第二个阶段的结果，如何来决定，或者被我完全粉碎，敌人未能达到蚕食目的，退而进行新的准备与活动，或者敌之蚕食目的已达，进一步的进行深入与巩固

工作，使这些地区完全成为被敌人统治的敌占区。我的抗日活动与组织，受到总的摧残，一时不易恢复。

（四）敌人蚕食政策的步骤与方法是相当毒辣的。但只要我们正确的掌握党的政策，各方面工作配合的好，坚决的执行反蚕食斗争；敌人这一阴谋，经验证明是可以粉碎的。敌人蚕食政策的实施，固然是所谓全面的“总力战”，固我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其极严密的配合，但是空隙仍甚多。尤其是因敌人武力不足，前进则后空，而且不能不更多利用伪组织予我以更多的机会，采取广泛的游击活动与政治进攻的办法，确实掌握民族矛盾，使敌人顾此失彼。在目前敌我斗争中，军事上的敌强我弱，仍未改变。但政治上的我优敌劣，是确定了的。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政治上的优势，配合武装斗争，（主要的是游击战争）争取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是有可能的，但这种胜利的可能，是要经过艰苦斗争与各方面工作密切配合才能求得。

（五）反蚕食斗争：基本方针应该是停止敌占区的继续扩大，组织我们全面的力量，彻底粉碎敌人对我们的蚕食政策。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针对着敌人每一步骤给以及时有效的打击。

1、如敌人在准备阶段（敌人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则应运用我军之抗日政权（我们是合法的）给敌人一切秘密活动以坚决的打击。给敌人一切点线与秘密特务以彻底的破坏，并使之不能再建立，使暗维持不能存在。而两面派的政策，亦应有严格的限度。两面政策，一般用在敌占区，不应任意运用于根据地内。应当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充分的发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从反对奸细斗争去争取国民党，争取与瓦解会门，争取一切知识分子；杜绝一切可供敌人运用空隙对国特流氓及会门中之破坏分子，应给以必要的注意与限制。为敌利用正确的执行锄奸政策，党五月六日北局野政的指示，灵活的坚持武装斗争，给敌人的扫荡以必要的打击，争取武装斗争的胜利，经验一再证明，如属游击斗争坚强的区域，敌之蚕食政策遇到更多困难，如属忽视游击斗争区域，敌最易成功。提高斗争情绪，深切的研究政策，迅速的解决问题亦是争取反蚕食斗争胜利，领导上应当注意的。

2、如在第二阶段，敌人的蚕食阴谋已经实现，则应以武装斗争为主，扫除敌武装便衣队，乘机立足未稳不断袭扰，在可能条件下，集中适当的主力给以有效的打击，并取得其他一切工作的密切配合，使敌不能轻易建立据点。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公开的与秘密间谍组织，必须给彻底肃清，对死心汉奸，则应给以严厉的镇压，争取斗争的胜利，表示我们的力量，揭破敌人一切欺骗宣传口号，决心保卫群众利益。充分的发挥反维持，反汉奸的斗争。应将没收之死心汉奸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及抗属。

3、如在第三阶段敌人已达到蚕食目的。估计一时不易击退时，我应灵活的转变斗争方式。深入我各方面的秘密工作，确实掌握一切伪组织，撤退公开不能立足的干部，则准备合法斗争，积蓄力量，建立恢复另一方面对深入根据地之点线，则给以坚决袭扰与敌之出扰部队，停止敌续向两侧扩张。

（六）在反蚕食斗争中，必须正确掌握武装斗争，轻易放弃武装斗争是错误的。如果是没有坚强武装斗争的核心，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将是不可能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只有在敌占区，才是主要的，在敌人向我根据地接敌区（即游击区）进行蚕食时至今以合法斗争为主，而放弃武装斗争，是非常错误的。但在游击区及一时不能击退敌之蚕食的新占领区，并不是完全放弃合法斗争，而是说合法斗争是次要的。在这些区域有合法斗争的存在，但更便于武

装斗争的存在与发展。有基础与群众，有武装斗争亦便利于合法斗争，这就必需与合法斗争联系起来，才能争取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在反蚕食斗争中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必须坚持阵地，不轻易放弃阵地。但机械的了解坚持阵地斗争，单纯军事的正面对持是会失败的，单纯的以军事对军事，政治对政治以及合法与非法斗争互不配合，不联结等观点，都是不对的。因为斗争的配合，把密切合法的斗争任意公开，也是不对的。应当以非法的游击战争及可能与必须的部分的运动，去对敌人的蚕食进攻以打击，是必要的。否则要想积极的坚持敌后坚苦斗争是不可能的。为此特决定：

1、各地正规军，特别是平原地区，应准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部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深入到敌后去活动。其余正规部队，应相当集中整训（轮流调换之）。这种办法在地方武装不够坚强的根据地，尤为重要。

2、分散活动之连营，应将加强党的领导，其任务为：

（1）以与地方党来取得工作上的密切联系，灵活的游击战争，破坏和扰乱敌人所谓治安区（敌占区）配合打退敌人的蚕食进攻。

（2）帮助与培养地方武装。

（3）捕捉汉奸，交地方政府处理。

（4）为着完成上述任务，须特别严格部队中的群众纪律，执行党的领导，在扩大政治影响下，可以吸收精壮群众参加部队，以补充自己的消耗。

3、在反蚕食斗争中，必须更进一步的改善武装工作队的工作，必须使其在反蚕食斗争中，起更大的作用。必须给武装工作队以政策的及必要的技术训练，如锄奸、反奸细、破路、爆炸等。

4、加紧培养地方武装。加紧发展民兵，加强游击小组的活动与建设。这是打击敌人，粉碎蚕食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只有坚强的地方武装与广泛的民兵活动，才能使敌人不易放手向我区蚕食的进攻，才能使敌不易扩张与保持其点的占领。

（七）在反蚕食斗争中，必须正确的掌握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联系问题，机械的了解以政治斗争为主，或以军事斗争为主，都是不对的。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决定两种斗争的重点，应放在那一面，应当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有机的联系起来，绝不是以这一个为主，就是放弃那一个。比如：当敌人向我进攻扫荡时，应以军事为主，向敌人展开坚决的反扫荡武装斗争。当扫荡已转向我进行政治阴谋那时（特务谣言等），则应以政治为主，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政治攻势。当敌人向我根据地，进行蚕食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应以政治为主，去根绝敌人一切可能利用的因素。当蚕食进行第二阶段时，我军事的比重也就随之加强了。

（八）坚决的展开反蚕食斗争，是目前华北全党、全军的一个最紧要的任务。只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才能使我们渡过这一段黎明前黑暗的艰苦路程。任何相互埋怨、任何步调的不一致，都是最有害的，我党我军必须亲密团结，为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而斗争，这一指示，在地方发到区委，军队发到营为止。此外，望根据实际去分别讨论，并将执行的结果及新的意见，随时电告我们及中央为盼。

北局分会

五月四日

中央北方局　集总野政治部关于展开全华北全面对敌政治攻势的指令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华北各地方党部及各团军区军分区政治机关：

抗战五年敌寇困难空前增加则处于廿六国为敌之战略包围内则民凋蔽政治不稳，军队士气大为衰落，我们必须加强对敌政治攻势，以加速日寇的败亡，特决定由“七七”起以两个月为限展开全华北全面的政治攻势，务求在政治上给敌寇以沉重打击，粉碎其“确实掌握华北”“使华北成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阴谋，粉碎其利用伪军伪组织作伪统治工具的阴谋，大大提高敌占区人民胜利信心，依照这一方面，此次政治攻势的工作重心为：

（一）强化对敌伪军伪组织敌占区民众之宣传工作：

甲、宣传苏英美新协定之成立，以说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日益强大与巩固。日本在反日同盟国战略包围下的困难，处境太平洋战争中日寇的损失（如珊瑚岛海战、中途岛海战等）以及敌国内部的困难与政治不安，宣传敌人要作更大冒险，但南进北进西进都困难重重终必招致失败死亡。

乙、打击日寇到处叫嚣已消灭八路军共产党毁灭抗日根据地的谣言，宣传华北敌后十余境抗日根据地之战略形势与建设情形，我军在反扫荡中无数次的胜利，以及敌人损失的具体事例，说明共产党与八路军及华北抗日根据地是不能摧毁的。

丙、宣传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生死坚持华北抗战直到收复华北一切失地，号召敌占区人民咬紧牙关再熬过二年克服悲观情绪，宣传两年胜利之根据及其理由。

丁、驳斥敌寇开化“大东亚战争”“东亚民族共存亡”等欺骗宣传与反共谬论，宣传六十年来日寇侵华历史，使人民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二）反对敌寇的强化治安运动，揭露治安运动为日寇奴役与掠夺华北人民的本质，为敌人蚕食我根据地的毒辣阴谋，各地领导机关对当地治安强化运动的实施情形必须作深入的研究，订出政策，指示下级在敌占区要动员人民，大大展开不合作运动，不替敌寇宣传，不参加伪军不参加新民会，不参加伪政权，不让敌人维持治安，不让敌人抓壮丁，不服从配给制度，不替敌人增加生产，不为敌收破铜烂铁，不送粮食，不让替敌人挖沟修路，不用鬼子票，不信伪报，不进新民小学，鼓动伪军伪组织消极敷衍治安工作，假意对敌人，真心保同胞“身在曹营心在汉”精神，劝告知识分子要学“苏武留胡节不辱”的民族气节暗中进行抗日工作。

（三）加紧瓦解敌军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日寇五年侵华战争不但没有灭亡中国，战争反而日益扩大，日兵士气大为降低，日兵本身及其家属的生活日益恶化，对战争日表厌烦，对战争目的及胜利前途日表逐渐发生怀疑，伪军伪组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加动摇，敌寇如进行更大的冒险，必激起敌伪军更尖锐的矛盾，在此时机我必须动员党政军民掀起瓦

解敌伪军与争取伪军的群众运动，党的组织政府机关军队的敌工小组宣传队及群众团体，学校文化艺术团体都要动员作到经常的涂写中日标语及扫荡时张贴散发对敌伪宣传品，而且要通过敌占区民众及小学教员商人伪政权伪军人员等都向日兵日侨进行口头宣传号召群众与伪军中个别的旧有的关系进行工作，劝其国家或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如宣传团结伪军抗日，劝告其欺骗敌人掩护抗日人员，为自己留后路等，要一切抗日人民都积极自动的与自己相熟的伪军伪组织伪军家属介绍关系给一定的敌军工作机关帮助觉醒联盟支部加紧活动，广泛宣传我优待俘虏政策，大量散发觉醒联盟通行证及集总保护日军逃避之人员的命令，争取敌兵来归及展开反汉奸反维持运动，坚决打击与摧毁伪组织与特务机关、捕捉与处决少数死心汉奸，并应注意打击侵入我根据地与边线地区的敌探特务，尽力斩断敌人进攻与蚕食我根据地的爪牙，在群众中广泛进行除奸教育，经常揭露敌寇特务活动、阴谋，对于敌人利用迷信会门团体破坏抗日，亦应抓紧具体事实，对民众解释维持敌人之无出路，孤立主张维持敌人的坏分子，应发动群众与之斗争，同时宣传、组织民兵保卫家乡，在荒旱成灾区，我可没收死心汉奸粮食分给灾民，但在反维持斗争中绝对禁止乱打乱杀，一切汉奸案件的处理且应慎重，严格遵照政府法令，取得广大群众的赞同与拥护。

这次政治攻势党政军必须密切配合一齐进行，务求发扬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之相互配合之威力，政府军队抗日团体学校民兵都应迅速动员起来，组织许多武装宣传队工作队突击队向敌占区游击区广泛出动猛烈进攻，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亲身到下面督促检查帮助工作。各地区进行这次攻势时：

第一必须切合自己当地具体情况环境根据敌我当时之实际情形进行工作，不放松每一可能抓住群众工作的时机与事件，严密注视敌伪之间的每一矛盾，以争取伪军孤立日寇，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具备了优势的条件，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政军民一致努力与切实执行此指令则一定能胜利完成此次攻势的任务。

此　令

中央北方局

集总野政治部

论　　军　　事　　建　　设*

陈　　毅

（扩大会军建报告的第一部分）

一、论华中情况及其战略动向

一、敌军的情况

甲、敌军兵力，敌在华作战军除满洲的六个军团外计分：

A　蒙疆驻屯军，辖二个师团、一个独立旅、一个骑兵旅，共约四万五千人，与我八路军直接对抗的有二万人。

B　华北派遣军，辖九个师团、十一个混成旅团、一个骑兵旅团，约二十三万人，与我八路军新四军直接对抗的有二十万人左右。

C　华中派遣军，辖十四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约二十七万人，与我新四军直接对抗的有十一万人。

D　华南派遣军，现已取消，并入越南派遣军，现在中国境内的兵力约合三个师团，四万五千人。

总计敌在华作战兵力计有二十八个师团、十八个混成旅团、二个骑兵旅团，约合三十七个师团，估计有六十万人以上。与我新四军八路军直接对抗的敌人总数约三十三万人，我八路军新四军牵制了敌侵华兵力的半数以上。就华中而言我新四军亦牵制了华中敌人的半数弱，三分之一强。

乙、敌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设南京，总司令畑俊六，华中总司令由畑俊六兼任，参谋长后宫淳。华北派遣军驻北平，总司令岗村宁次，参谋长安达。

丙、敌军的编制：敌人现行的编制与抗战之初有了大的改变。抗战以前是一个师团辖二个旅团四个特种联队，即骑兵联队、轻重联队、装甲车队、炮兵连队，由一个师团长率领。到抗战达到相持阶段，敌人集中力量扫荡敌后与八路军新四军纠缠的结果，感觉那样笨重的编制不适用，所以有了改变。现在敌军的编制采用三种：

甲种正规师团与战前一样是二旅团四联队制。一个师团统率两个步兵旅团，一个旅团两个联队、四个特种联队直属师团，一个联队辖三个大队，一个大队三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中队四个小队，一个小队四个分队，一个分队有一挺轻机关枪一个掷弹筒，一个小队有一挺重机关枪。

乙种是应付敌后地区，对付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部队，求得轻便快速，指挥灵活，即所谓快速部队。每师团部统率三个步兵联队，废旅团，有一个步兵联队指挥官，指挥三个步兵联队，专任前方作战。另有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骑兵队，直属师团部。必要时派赴前线。

*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华中局出版的《真理》第八期。　　——编者

丙种是独立混成旅团的编制，比乙种师团更小。旅团直接指挥五个步兵大队，废除联队部，像苏北南浦囊吉旅团就是一个例子。再统率一些直属炮兵通讯队等，在平原地作战时则附一点骑兵，在水网地区作战时则附以汽划子。

另外还有一种附属编制就是警备队的组织，像陇海铁道的履奇警备队，以前在南通有一个专任的苏北警备队，又如在盐城之陈家洋有日本海军派遣的一个警备部队，闻现已撤走。这些警备队的编制通常比旅团更小，仅等于联队的力量，有时亦由旅团兼任铁道警备任务。

从敌军的编制上可以证明敌人由于实际作战的教训编制是有了改变，但近代式的正规师团还仍然保存，在华中的几个师团多数都是正规师团。这对敌人的战略动向战术可以判断出来。

乙等师团的配备编制并不怎样强大，机枪步枪的火力配备，与国民党军队比较起来差不多，只是炮兵、飞机、骑兵、装甲车较多一些。

（上略）从敌人这些配备中我们看出：

（一）敌人重兵是摆在武汉、信阳、岳阳、大冶这一带，因为这是他的最前线，便于退守和进击。

（二）敌对华中与华北的联系很注意，平汉津浦道上均为其兵力配置的重点之一。

（三）敌人的分布状况使我们看到敌人华中派遣军与华南派遣军在陆地上是没有联系的。大江以南除太湖以东全沦陷外，太湖以西一直到重庆没有沦陷过。因此造成国民党在大江以南的前线在江苏溧阳，离南京只二百里，能与重庆直接通电话通汽车。敌寇在长江以北的联系都是确实的，汉水到襄樊是一路，汉口到信阳是一路，淮南路是一路，津浦路与徐州是衔接的，运河沿线及黄海沿岸华北与华中是衔接的，所以长江以北的空隙很少。一般说在大江以南是点和线的占领，而在江北则是面的占领。

二、伪军的情况：

1、伪军的兵力：正规军大概有六万人。李长江、杨仲华、任援道、叶蓬等为中心差不多全部对我作战，其他杂牌伪军估计有十万人。一般估计是太大了点。当然也没有甚么害处。

2、伪军的内部系统：

A 最大的系统是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兼苏浙皖绥靖总司令，他是老牌汉奸比汪精卫先投降。号称九个师实际上辖七个师，五个暂编师，三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师，约三万余人，分驻南京、镇江、苏州、杭州、扬州、天长、兴化、实应、蚌埠、合肥、芜湖等地。部队成份是收编流氓溃军，特别是浙江、江苏、安徽的衙门警察、司法警察、保安团队、土匪青红帮最多，他们的军官是旧军人多，国民党叛军也有一部份在里面。

B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部，有一万二千人，都是海匪溃军青红帮，如陈才福、颜秀五都是海匪头子，驻泰川各据点。

C 杨仲华现改编为伪第二集团军，辖四个师一个独立旅共约一万多人，原是省韩的保安第八旅投降的。并搜集盐、阜、通、如、海、启的海匪。里头的干部都是江苏保安系统出身的多，而且是本地人多，分驻东台、盐城、通、如、海、启一带。

D 伪武汉绥靖军叶蓬，辖三个师，约六七千人，分驻武汉、信阳随应一带，力量更小尚不是集团军。

E 长江沿岸有任援道、杨仲华、李长江、叶蓬四部，组织了十几万伪军，使日寇减轻

了许多负担，这是日寇的伪化政策傀儡政策的成功。日寇正继续利用此种伎俩扩大伪军，我们应采取坚强的对策使其计划不能扩大不能实现。

F 特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伪军发生反正投诚的事，如杨仲华的一师二旅二团及补充团全部投韩德勤。苏南伪一方面军杨珍亭部第十团全部投入忠救。伪警备师四旅六十余人及剑南安部百三十余投诚我六师。还有待机反正者很多。

G 要注意我们新四军对汪逆伪军作战任务特别加重了。全国任何战区包括国民党及八路军地区，伪军之多，莫过于新四军的当面地区。汪精卫在江苏、安徽提出建立模范和平区，靠伪军来直接与我们作战，所以和汪伪斗争进行伪军工作是我们新四军在全民族抗战中特有的直接的最严重的任务。

H 伪军构成的不外以下几种：

（一）敌人有计划的策动收买，特别南京、徐州沦陷以后，将许多溃军土匪收起来集合成军。

（二）地方上民团帮匪土匪地方绅士，在接敌区域逐渐伪化而组织起来，所以伪军常是本地人多，在指挥作战及政治策略上是不能忽视的。

（三）是顽固派有计划的派人去当伪军，许多地方敌人封锁严密但又是顽方必须经过的地方，因此派一部份人去当伪军，来掩护自己。

（四）国民党作战军被俘虏的官兵改编而成，如去岁宫秉藩被俘投敌最近出任伪军职务。

（五）国民党军队集团投敌改编的，如李长江、杨仲华等。

（六）一部经我新四军改编的游击部队，过不惯我军艰苦的生活，受不惯纪律的约束，因而开小差加入伪方的。

3、伪军的编制：

伪军的编制是很复杂的。汪精卫极力整顿，但是没有甚么效果。互相之间不一致，如陈公博周佛海大家都要抓实力，互相争夺。常常一个伪军同时接到几方面的委任。最近汪精卫又提出了整编口号派人巡视，要把杂牌伪军求得比较能控制起来。同时在这一方面与日本人的冲突也很深。如杨仲华等每一个集团军里有一个日本顾问，南京设有日本顾问部，专门管伪军。钩心斗角的事很多。

三、友军的情况：

据我们调查华中友军兵力正规兵团共约五十个步兵师，四个骑兵师，四个独立旅。内属第一战区的有十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两个独立旅。属第五战区的有二十七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属三战区的在苏南我知道的有个三师，一个独立旅，一个由地方游击队编成的挺进队。在皖南川军有三个军。顾祝同在浙江南昌附近方面多少兵力不清楚。属苏鲁战区在苏北部队有三个师，一个独立旅。总数是三十二万人以上。（中略）

另外友方地方武装我们估计苏北李明扬、陈太运、张星炳等部约数有五千多。皖东北有五千人。皖中有三万人。鄂东有二万五千人。鄂中约一万五千人。豫东约二万。鄂豫边约一万五千人。苏南约五千人。合计有十万人左右。华中友方正规军与地方武装合起来有四十二万人。（中略）

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友军的内部，不都是顽固。比如唐式遵、王钻绪、孙震是川军，他们从四川调出来抗战，是不愿内战的；其次是西北军孙连仲部，某方企图把他中央化，派遣人员在部队中作特务工作，双方矛盾也极大。东北军何柱国，回军马彪，杂牌军商震， 陈太

运。李明扬及挂系军队都与中央系有矛盾。就是中央嫡系军队中他们上中下级均有许多不赞成内战的，与我们建立很好关系。在某些地区冲突上某些部队与我们有矛盾，但在全国事情上，在抗战作战上与我们仍是合作的，特别他们对反共命令仍抱敷衍的态度。因此在整个友军中有经过特种训练对我成见甚深的，有与我冲突不大对反共保持中立的，有政治进步对我表同情的，有本身受某方迫害企图靠我们援助的，我们必须一一分别清楚。再拿韩德勤来讲，部队完全是在敌后收编游击队组织起来的。韩德勤本来是二十四集团副总司令，当徐州沦陷以后，他只带着一个特务营把苏北的游击队一下收编成立八十九军，十个保安旅，部队里很多地方人，顽固教育是不深刻的，干部大都是保安训练班出身，特别是一部人的家属都在我们根据地内，只要我们有很好的友军工作可以取得他们对我们同情的。因此，我们对友军一律以团结抗战的态度对待他们，只作必要的自卫。

四、战略动向

1、关于敌伪的战略动向，分两个时期来讲：

A　新四军没有到敌后以前和到了以后。

新四军没有进入敌后以前，那时候敌后情况非常混乱，土匪遍地伪军很少。顽固派在华中敌后的力量如韩德勤、冷欣、李品仙都没有组织起来，杂色部队非常多。这时候敌人正大举西进对敌后顾不了，所以那时在敌后很和平，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大的扫荡。

新四军来敌后以后，那个时候整个战争形势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敌人的战略中心，是转而扫荡敌后以加强敌后的控制。所以这时期敌后扫荡频繁，各种扫荡形式在敌后都表现了出来。

这里我所看到的敌人的分布情形，可以说明敌人常常是这样的：首先是占领交通要道，控制战略重镇，打通各兵团间的联系，第二是看那个地方有资源就派兵实行占领，比如淮南路本在战略上不重要，因为那里有铁矿所以被其控制，再如苏浙边境之长兴有煤矿，苏北盐城陈家洋合德公司一带有盐，海门、启东、东台出棉花出盐，所以敌人也须要控制着，但都是战略相持阶段形成以后的事。第三有伪军，苏北为甚么由点线变成面的占领，显然是因为有着大量的伪军如杨仲华李长江等，否则是不可能的，最近在徐州组织苏淮特区也将表示出他这特点。敌人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不同的战略动向，我们应该判别清楚，才能正确决定我们自己的战略战术。（中略）当敌人战略中心还是向西，这时候敌后空隙很多，利用这时候大量的发展，我们把力量组织起来，站稳脚跟，直到敌人转入扫荡敌后时，则我们自己力量业已增强足可应付。否则便是丧失时机，造成今后发展与坚持的各种困难。

B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和爆发以后

去年一年特别是秋季冬季敌寇用强大力量扫荡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其目的在巩固其占领地区，摧毁我之力量，便于敌寇南进后使我无力反攻。其扫荡办法是实行最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建立所谓无人区，消失我军生存的条件，从摧毁物力人力财力地区诸方面来达到根本削弱和歼灭我军的目的。其具体办法在华北便是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在华中便是清乡运动。其扫荡方法都充分利用内战时代统治阶级的剿共手段，在华中且由汪精卫为前导，敌寇这种疯狂的大举扫荡计划，显然与战略相持阶段初期的扫荡敌后的部署大大不同。手段更毒辣，规模更广大，时间更持久，地区更普遍，乃是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对苏作战的重要的准备步骤之一。

敌寇实施这种扫荡，现在来总结可指出如下：第一，一九四一年敌寇扫荡计划不管如何

毒辣残酷，其战略目的并未达到，基本上被我粉碎。证明了我党我军的坚持能力。特别华北某些地区予敌寇以严重的回击，这是全民族全党的光荣模范。第二、敌寇企图根本消灭我军及我根据地的目的，虽然宣告失败，但其部份的成功我们应该承认。换句话说在一九四一年反扫荡中我军及我根据地是受着一部份的损失，这乃是事实，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但我必须严正指出，这一部份损失的原因多半由于我们主观上的疏忽；比如对扫荡的严重性估计不够，仅仅根据过去反扫荡一般经验，没有看见敌寇扫荡中其新的战略动向和新的部署，因此便没有充分的准备和新的对象。特别在组织民兵参战，组织地方军与主力配合方面不够，动员地方各阶层进行反扫荡斗争的政治工作不充分、主力部队在作战方式上的硬拼与消极倾向，还有不能正确使用兵力，诸如对进攻转移隐蔽分散集中等问题处理不适当等等。尤其直属机关及后方工作人员如何应付情况问题，缺乏准备缺乏教育，缺乏经验，这是通常的毛病。我们华中如苏南反清乡斗争，苏北反扫荡斗争中及其他地区反扫荡中可找出具体的例证。

在去年秋末冬初一般估计敌寇大举扫荡敌后，将有国际的新冒险，并估计可能抽调兵力，减少对我之压力，一般倾向于加强伪军的守备力量，这种估计今天看来仍然是对的。事实上去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敌寇兵力是愈分散了，兵力是愈不够了，加强伪军的办法还未达到日寇之所期望，敌寇对我之压力是减轻了。我华北华中之根据地是有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但当敌寇在香港菲律宾迅速告捷及新加坡获胜之际，中间仅有一个多月的安定期，敌寇对华北扫荡又继续进行，对苏南的清乡又第三期举行，对华中根据地各地的出动骚扰又开始了。这种不断变化的情势，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着，否则必犯错误。第一、当敌寇扫荡严重之际，容易发生悲观失望情绪。甚至怀疑敌后我军坚持的可能。第二、当敌寇扫荡结束撤走之际，我根据地获得一时期安全，又产生轻敌太平观念。第三、当敌寇兵力减轻之际或国际新事变发生于敌寇不利时，常发生冒险轻进超过可能性去突击的不沉着不冷静的情绪，同时在另一面又发生不寻求机会去开辟新区的保守主义现象，事实上这种机会在敌情变化中随时可以产生，我们应眼明手快去争取的。第四、华中敌后敌情的变化常常引起友方的情况变化，在开展地区上开展抗战上，我们必须尽可能争取先着，至少不落在友方后面，这也是应付情况时的特点之一。目前敌寇正在西南太平洋进行开拓战，同时又在华北进行扫荡，华中的战术扫荡也时有所闻，这绝不是敌寇力量的强化，目前时期的敌寇扫荡已带着以攻为守的性质，我们应明白认识的。

五、友方的战略动向

A　过去反共派总想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在新四军刚改编的时候，某方坚持要把新四军开到华北去，我党中央坚持新四军无论如何要使用在华中才于抗战有利，经过很久争执才勉强执行我党的意见。在一九四〇年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某方感觉新四军力量微弱，想把新四军各个击破，定出分路解决新四军计划，并阻碍八路军南下援助，这个计划经过胡服同志南下领导反抗，最后黄桥决战挽救了危局，使反共派计划失败。（中略）现在我们周围的友军其中反共成见甚深，并向我挑战的不下十五万人。他们对新四军的进攻方针是相机东进，随时随地没有忘记华中这个阵地，经常与我们斗争着。在去年一年中某方天天都是在准备东进，终于没有能实现是由于中途发生变化，敌后环境使他们不能不有所顾虑，但是他们东进的任务，是时刻没有取消的。以抗日之名实行东进反共，是他们的总的战略动向。也是他们最得意的就汤下面一箭射双雕的传统政策。

B　其次援助韩德勤继续反共也是其东进计划的重要内容。韩德勤所以能在这里坚持正

是因为他还有这样的希望。其援助路线有三条：一条是经过运河淮北，利用敌伪区输送，打通东西联系。第二条是经过淮宝打通东西联系。第三条是经过镇江高邮利用伪军掩护通过敌区沿运河打通大江南北联系。（中略）

C 韩德勤的办法，我们说韩德勤固守曹甸在外围打游击，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在军事上是消极的，无独立进攻能力。可是在政治上就非常积极。比如淮海区去年整个下半年就是与他斗争。我们去年反扫荡，韩德勤对我们的破坏牵制特别他组织了外围游击战，外围特工政治破坏，以各种破坏手段来达到他固守曹甸迎接反共军东进的目的。

D 顽固派常常是用各种方法把伪军工作做好，在敌伪区建立根据地，与我们斗争。比如这次陈道口战役，离众兴集只有十二三里，离洋河三四里，当我们追击的时候，这些小顽固派就躲避到伪军里面去。平时也常是挂起伪军符号。反共军在津浦路的两侧到处委官，要伪军援助东进。他们要伪军待机反正协助反共。因此我们对顽固派进攻采取自卫手段，还要依靠我们争取伪军工作做到某种程度。

六、斗争的形势和我们下决心的基础：

华中地区为敌我必争，基本上还是敌我相持局面，敌寇的优势是：占据重要战略地带，掌握了经济人口的中心，握着强大兵力，其政治基本弱点是异民族侵华战争，其军事基本弱点是兵力分散兵力不足。友方在华中屯集了强大力量。我在华中敌后农村中存在着我之普遍的军事政治的优势，我们应保持和加强我之优势联合友军友党去削弱敌寇打破敌我相持局面直达到完全战胜敌人。

华中我军行动于敌后地区，于极小力量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强大。其生存发展的历史，指明敌后斗争具备了极大的优点，同时也具备了极大的劣点。敌后的宽广农村，敌伪间的矛盾，敌寇兵力分散，兵力不足，形成极大的空隙。这一空隙便利我们力量的生长和强大，这是一种极大的优点，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优点，这是抗日民族战争中创造出的优点，我党我军利用了这一优点所以把自已发展了。另一面由于敌后环境，地区被切断，联系不能确定保持，根据地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又是落后的农村，这又是使我力量难以集中，使我之发展受着一定条件的限制，这又是极大的劣点。此种优劣并存的形势，便决定了斗争的长期性。根据上述优点，敌寇不可能一下把我们扫光，我具备了长期坚持的条件，任何方面也不可能因一举而根本危害我之生存；我仍可利用种种条件进行持久斗争。同时根据上述的劣点，又说明我军仍然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这两种形势的错综指明了斗争的长期性。必须在长期斗争中，我们主观指导的正确。配合国际国内的形势的变化，才能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和强弱的阵势。懂得这一点才不会被敌人的疯狂扫荡所吓倒，才不会因为逆流高涨而使自已手足无措。同样也才更能于某一时期环境安定时，不致有胜利冲昏头脑，自己麻痹自己的想法，而能够沉着坚定的去作实际工作，善于积蓄力量，和善于适当的去使用自已的力量。

几年来的华中斗争，某些同志和部队是善于利用敌后斗争的优点，去争取机会，积蓄力量，获得伟大成绩。可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善于在情况变化时转移中心，未认识到敌后斗争的困难方面，这样曾经做出错误乃至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另一面又有个别地区对自已已经组织起来的力量不善于保持，和继续积蓄，于形势变化时，曾发生过冒险轻进，造成对有生力量的无谓消耗的现象。这均来源于不能正确判断敌我力量对比，不懂得在长期斗争中去改变敌我形势，只片面的根据一时一地的局部情形，或主观愿望来决定方针，这是极不正确而应力求避免的。这就是我们对华中情况和一般战略动向的应有的判断。

二　实战的经验教训

我在报告了华中情况及各方战略动向之后，现在来略谈实战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敌后工作与反扫荡的经验教训：

敌后斗争的特点是在两个反扫荡之间进行工作，正如内战时期在两个反围剿之间进行工作一样。一切工作受着反扫荡的影响，且为其服务。

我军从连续不断的反扫荡战斗中，强大自己，壮大自己。军事建设工作，地方建设工作，全部都要受反扫荡的检验。我们的干部的指挥能力，我们根据地的抗战能力，乃至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战政治面目，也同样受反扫荡的检验。故经常研究反扫荡经验和教训，经常有反扫荡的准备，是我军在敌后的生活规律。故我们要谈几年来的实战经验，首先从反扫荡的经验谈起。

华中我军于民国二十七年夏季挺进敌后，迄今将满四年。本军对敌伪战斗不下数千余次。大小规模反扫荡战斗不下数百余次。本军地区党政军民在民族抗战中所表现的英勇，产生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有极伟大、极悲壮、极复杂、极残酷的战斗场面，非笔墨可以形容。不身处敌后，不亲历战斗的人，是不能体味其艰苦的。我党政军民几年来对国家民族，是尽了他应尽的义务，我军的战绩为敌后地区人民所赞许，为敌伪方面所警惕，较之全国各抗日友军的战绩并无逊色；且有其本身毫无补充接济、又要忍受着反共摩擦的痛苦的特殊情形。完全依靠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靠全军指战员的政治的铁的团结，依靠人民的帮助，尤其依靠几万名指战员在前线的流血的英勇牺牲。这样去奠定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坚固基础。使敌伪的多次扫荡归于无效，其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很好的总结起来。今天我只提出下列几点，作扩大会讨论时的参考。

反扫荡斗争的具体形势是：在军事上敌强我弱，在政治上我强敌弱。敌占城市，我占乡村，事实上是地域上的一种城乡的斗争。敌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的集中的优势，我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分散的优势。我身在敌后处在敌之大包围中，故我分散才能坚持和生存。敌据点密布，又处在我之分散的反包围中间，故敌要集中才能扫荡。分散以巩固其占领区，集中以扫荡其攻击目标，是敌之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分散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以突击敌分散的弱点，是我军反扫荡的作战的有效战法。这是历年来不断反扫荡指出的真理，此其一。

扫荡与反扫荡是连续不断的进行着。此种情势决定了根据地巩固中的流动性，决定了部队正规化的游击性，决定了一切工作的集中领导的分散性。根据地几年来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但其流动的形态是仍然存在着的。我们的部队力求正规化，但游击任务仍然是自己的主要任务。故在主力军说是以集团正规部队担任分散游击任务。在地方军说是以分散的游击部队要求走向必要的正规化。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工作，在部署上，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持久的布置；但又必须以分散方式付诸实施，一切工作打算应该是长期的打算；但每一阶段其任务之完成，则要善于争取时间，善于抓住可能机会去进行突击。时间稍纵即逝，乃至不能挽回。要求有相当健全的后方，但反对大后方主义。要求有必要的工作机关，但机关应严格依照游击环境去建设。超过此限度的大机关，必受损失和挫败。每年夏收秋收是最好组织群众的时机，错过此时机，则一年光阴等于白费，必得推迟，等待第二年。扫荡未来前，

一切应作反扫荡的打算，扫荡到来时，一切又应估计到扫荡终了的可能去部署。这是敌后环境的工作的规律，此其二。

反扫荡的战役战术原则是：发展广泛游击战，但要反对轻率浪战。主张积极行动，但反对盲目硬拼。主张突然袭击，但反对毫无准备及毫无计划。主张保持有生力量，但不疼惜应有的牺牲。主张进攻，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主张转移，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主张防御，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要学会隐蔽埋伏，而隐蔽埋伏是为了创造突击的机会，而不是埋枪卖马式的散伙收队。不取消攻坚，但攻坚最好用偷袭和长围，轻率从事，乃其切戒。自己处在敌之包围中，对敌系内线作战，但力求转到敌人侧翼，争取内线的外线。对敌进攻，采用外线包围，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集中的突破，争取外线的内线。主张分散作战，但不忘记争取有利的集中突击的机会。主张集中突击，但随时具有能迅速分散的打算和处置。必须分散兵力进行对根据地的防卫，但反对分兵把口，以及平均使用兵力。必须独立自主，机断专行，但不得脱离统一的战略意志。主张战略意志的统一，但又不得防害实施时的机断专行，相反的，更奖励不脱离上级意图的发挥和创造。这是以我军的兵种，对强大敌人，当着敌后农村环境，为了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般的军事原则。每一个原则都有他的几个侧面，由几个侧面构成全面。侧面与全面常常构成矛盾，但不能一个取消一个，而是要统一去理解他，去运用他。这就是历年来实战中指证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原则，此其三。

扫荡未到之前，迷惑于一时的安定现象，容易产生太平观念，不重视敌伪动态，对敌伪进攻的轻视，忘记了敌后斗争的艰苦。此时领导方面，应提倡敌情观念，纠正松懈、麻木不仁的现象。不忌讳说明危险及困难，并估计着一切而指出克服的方法。当扫荡严重之际，受了损失和牺牲，这个时候兵慌马乱，容易产生悲观失望心理，甚至根本怀疑敌后抗战坚持的可能，根本怀疑中胜日败、苏胜德败的真理。此时领导方法，就要坚定不移，鼓励前进，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扫荡未来前单凭主观愿望，想轰轰烈烈建设一切，布置一切，一切大城市的办法，都想搬到敌后农村中。你不答应他，他即感觉无事可做，无用武之地，以致失望消极不想再干。扫荡一来，又神经过敏，单凭主观的恐惧心理，便又取消一切，最好一个光人走路，或打埋伏去。太平时忘记了敌情严重的到来。敌情严重时，不了解敌之进攻受一定的时间地点的限制，不能沉着勇敢去维护自己的工作基础。这是敌后工作经常发生的偏向，此其四。

敌后斗争以及反扫荡斗争中，均应了解上面的各种偏向，加以预防和制止。上面各种倾向，都由于不能具体的正确的估计斗争形势。所以不左就右或不右就左。几乎成为一种工作规律。善于预见事变预作纠正和补救，或使其不致发生，乃是领导方面的事情。

第二、苏南反清乡斗争的初步总结：

敌人集中了两个师团及六、七个师的伪军，于去年七月对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江渭清同志已经报告了我六师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我想这样的清乡办法，敌伪还会继续采用。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应该接受苏南反清乡的经验教训，并懂得应付他的办法。我们将有专门的总结文件发表，现在只提到更大的方面。

1、清乡运动最大的特点：敌人不仅是靠他的情况清楚，军事力量强大，特别是在政治上的布置，组织上的动员；各种守备队、清乡队、调查队、封锁队、特务组、保甲组的专门训练，费了三四个月的准备；拨出清乡经费六千万等。这些部署与一般扫荡是不同的，特别更不同的，是经过汪精卫出面所主持的。他们有十几年剿共的经验，敌寇加以利用。比如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他是个叛徒，直接到前线协助清乡。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壁

君等也亲自到苏州助威。南京伪政府把清乡运动视为和平建国运动的试金石。如说："清乡运动的成败即和平运动的成败，即中日合作的成败"。这说明敌伪眼中清乡运动的政治作用。同时强调所谓和平清乡，不流血清乡，在失败后又提出长期清乡和机动清乡，更看出其政治欺骗作用。更看出敌寇汪伪在清乡运动上的配合作用。

因此，我们反清乡运动首重政治动员。着重在反清乡运动中，组织各阶层一致反对敌伪清乡的统一战线。失掉任何抗日方面的同情，丢弃任何方面抗日力量而不动用，想单纯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或仅仅依靠主力部队的力量，必致失败无疑。我六师在反清乡运动中吃亏的原因，就是把这次敌人的清乡看为一般性的战术扫荡，看成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忽略其政治作用，这是自己受损失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苏南的顽固派及地方顽固分子，顽化土匪，和顽化伪军，以及其他杂牌军，把敌寇清乡认为是只打新四军，与自己无关。甚至推波助澜，趁混水摸鱼，不愿与我们共同对敌，他们也一样遭受了损失。敌寇也是毫无分别的予以打击，这又是对顽固派的极好教训。

2、敌寇清乡的军事部署，是以敌军担任进攻，伪军担任守备和搜查。敌主力于开始时找我决战，且在极狭小地区突然包围，及实行彻底肃清。此种情况不是正面应战能够阻止的。因此，我们在此种情况应懂得转移自己的主力，凡不懂得转移，必中敌人奸计，使自己失败。敌人集中对我某一地区进行残酷清乡，其他方面必然形成兵力薄弱，因此我主力应转到敌寇之薄弱处进行突击，或分散进行开辟新区工作。但突击必须极得力，始能影响敌人，并调动敌人，甚至迫其改变清乡部署。在某种时候，敌可能不理会我在其外围侧翼的突击，而仍然主动的专力的进行原定清乡计划，但我藉此可以开展新区，以我之所得，偿我之所失。使敌得于此而失于彼，两两相较，仍为我之成功，敌之失败。这应该是主力部队在反清乡斗争中主要的机动的原则。同时指明所谓突击必须有力，仍须按照一定的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

3、地方武装及党政军民诸方面的部署，须适应主力机动的部署，及敌伪清乡情况来决定。主力转移或转换突击方向，党政军民之机关亦应事先跳出包围，于此点犹疑不决者必受损失。但跳出包围之时，必预先在当地留下一部可以秘密或灰色存在的工作人员，及一部精干武装，留原地坚持。其任务是镇压叛变分子，稳定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击杀敌伪分散下乡的搜查分子。做各种政治鼓动，继续指导斗争，表示我党我军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对敌伪主力则以避战为原则，对人民则以取得其掩护为满足。对敌寇各种残酷、镇压、屠杀办法，一面领导人民反抗，一面亦应指导人民以灵活办法去麻痹敌伪。在不损害抗战根本利益的条件下，必要的忍耐和以退为进的妥协，是可以采用而且应该学会的。此时切忌硬拼，和不讲究策略。对叛变分子与不得已而附敌但不害我的分子，应有区别。前者应镇压之，后者应争取之。留原地坚持之同志和部队，以分散、藏躲、隐伏为主要行动办法。不住村落，进行露营。白天埋伏，夜间活动。选择敌人疏忽处所，去隐蔽自己。造成敌去我来，敌来我去的打圈形势。必要时在敌伪认为其统治业已安定的地方，恰恰可以以秘密工作的方式取得自己之存在。因而可以继续进行指导的工作。假如说敌寇采用内战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则我们亦可以采取内战经验去回答敌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是一部反清剿的历史。我们能战胜对方的残酷进攻（其残酷程度在某些方面还较敌寇清乡更为剧烈）。由于我们把握着以地下党的斗争方式，配合着灵活的游击战术，这样就使对方无可如何。因此，游击战术与秘密斗争的综合运用，是反清乡斗争留原地坚持的主要办法。

4、根据上述的情况，在反对敌寇大举扫荡清乡之际，已提出我根据地应有主力部队与

地方部队的区分；应有坚持部份与转移部份的区分；应有分散工作与隐蔽工作的部署；应有秘密工作和半公开工作的准备；应有撤退、转移和随时可以转回原地恢复工作的布置。凡是靠一种估计，一种办法，一种手段，而不知道灵活改变方式和策略以应付当面具体情况的人，必致失败无疑。

5、反清乡斗争提出了组织民兵的严重任务，华中各地的游击小组，和自卫队是民兵的先声。我们的任务是就原有基础普遍扩大。苏南反清乡斗争没有广大人民武装参加，是自己斗争中最大弱点之一。

6、根据上述办法，只要我们应付得宜，指导上不犯大的错误，即有错误能迅速察觉改变，则敌寇清乡，我们仍然可以战胜的。苏南敌寇清乡，在苏常太取得局部的成功，还由于我军的经验缺乏。今后能根据苏南经验采取正确对策，敌寇必无如我何。因此我们应批评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错误估计，即对敌寇的任何行动，都认为清乡又开始了。不知道敌寇清乡办法，只是敌寇对我进攻的一种，此种办法不是能轻易举行。他受着一定条件的限制，过分估计与估计不足，均要自食其果。

第三、水上战斗问题

我三师九旅肃清洪泽湖湖匪的经验，六师在洋澄湖及苏常太坚持的经验，一师二旅在兴化水网地区作战的经验，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于我军战术上有很大用处，于坚持华中河川地带的斗争有极大帮助。我指出以下几点：

1、河川水网以及江湖地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地形地物，使我们生长在山谷平原，不熟悉水性的人，每每望而生畏。其实是由于无经验，只要我们去研究，把握着其中的特点与一般规律，则河川江湖以及海面仍是可以利用的极好的地形地物。于坚持斗争上具有极大的战略战术价值。我们在华中坚持抗战必须适合这种特殊环境，只要我们肯学、肯研究。

2、苏北某些海匪常常拿下海的办法企图与我们做长期斗争，由于他欺我不识水性。实际上有陆地的凭藉，才能有海上的活动。水之四围都被别人掌握，则水上必不能生存。这是水上活动的基本规律。洪泽湖的湖匪，由于湖之四围被我控制，所以根本覆没，便是一个铁证。今天华中沿海沿湖沿江的陆地优势，均一部或大部掌握在我手上，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组织水上游击，这是必然的道理。

3、水上渔民船夫及靠岸的居民工作，是我们水上游击和坚持的基本条件。特别渔民船夫，他们识水性，是水上地形的响导，是我们的教师。我们要在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上，与他们合作，取得他们的帮助。

4、教导我们全体指战员学会游泳，学会撑船，在团营部队，登记有这样专门技术的人，平时组织部队进行演习，一回生，二回熟，便不致临时仓惶失措。

5、指挥几十支民船，载着部队，无论行军作战，指挥员的船支应放在先头，即前卫之后，本队之前。至少河的一岸，应有陆上掩护部队，有较远的瞭望设置。遇着紧急，舍舟登陆，切忌慌乱，否则会自行淹毙。

6、研究水雷以阻止敌之汽艇，研究阻塞河道、开坝、打坝等以阻敌之运输，对防害居民水利的堤岸和坝口，不应无条件进行破坏或阻塞。

7、船夫及船支均按民兵编制，进行编组。并进行专门政治工作。使他们受相当军事训练，才能达到与我军动作协同。

8、辎重行李船支应有专门部队掩护，控制在战斗部队比较远的距离。情况未定不轻易

令其前进或后退。

9、河川分岔处，应派人坐守，指示进退方向。

10、水上活动部队，任何时候均应掌握船支，掌握桥梁，及自备渡河器材。

11、部队使用船支，应特别爱惜。船夫与战斗员住所分开。一个靠左，一个靠右。船支上应设置必要的步兵掩体，便利抵抗和防御。

第四、对敌伪配合作战的对策：

1、华中敌伪配合作战是经常现象，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敌寇加上集体伪军配合，如李长江杨仲华等部，证明敌寇的力量变化。他们利用伪军取得许多便利，去制造适合于侵略者的社会基础。敌无伪军帮助，敌寇只是一个外国人，异常孤立，有伪军做前导时，则军事政治作用均起了变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不仅假手于当地反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且常常假手于流氓成份。差不多在侵略初期几乎成一种规律，因此在政治上我们应懂得扩大敌伪矛盾，争取伪军，改造流氓，纠正对敌伪配合轻视的情绪。

2、在军政作用上，固然有因敌伪配合而敌力加强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因敌伪配合而更暴露敌方弱点，便于我打击的另一面。比如敌伪互相猜忌，民族仇恨在伪军部队中并不能完全泯灭；刺激暴发之机会异常之多。军事上敌伪驻扎均隔着相当距离，彼此应援很差。作战部署上，敌伪配合是极困难的。伪军战斗力弱，便于突击，伪军方面的崩溃，常影响敌方全盘战局。把敌伪配合的配备，给以各个击破，或分段截击，是我们对敌伪混成部队作战的有效战法。某些部队经常只打伪军的办法，增加了伪军流氓性的仇恨心理，逼其专心致志，替敌服务，这是不妥当的。首先应制服敌人，打击敌人，以慑服伪军。同时又要争取并打击伪军，以孤立敌寇。两者应适当的配合处理之。

第五、反扫荡中的部队配合与地区配合问题：

1、反扫荡中部队间的配合，党政军民的配合，属于各战略单位的部署和计划，其重点在协同动作，这是每个战略单位应经常留心的事。但敌人的扫荡常带突然性，常有使我准备不及的事情发生。敌人早出晚归，或声东击西，如此类临时扫荡，则对我危险不大。此时需要的部队间之配合，完全靠各部队首长的机断。来不及等待上级命令。一般原则是应认清敌情，于敌突然前进时，予以可能的阻止，而我军比较大的反袭则应放在反扫荡的末期。

2、如果敌之扫荡不是临时的，而是大规模的，比较持久的，扫荡范围包括到某一整个地区，则不仅需要该地区部队间的战术协同，还要靠比邻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战略协同。比如去年敌寇大举扫荡晋察冀，我一二九师出动援助，获得改变甚至停止敌寇扫荡的伟大效果，便是好例。去秋苏北扫荡，敌寇北进攻陷盐城阜宁，我在南发动反攻，迫使敌寇南调。当敌寇南调，我北面发动追击，使敌寇首尾不能相顾，使我由被动转为主动，收着挽救战局的伟大效果。事实上去岁敌七月初开始在苏南清乡，七月下旬即在苏北发动扫荡。扫荡范围包括了整个苏南、苏中及苏北之一部。对付这样大规模的进攻，便提出我军两个地区以上的战略协同问题。敌寇惯技，常于大江南北互相抽调兵力。故我军应乘间蹈隙，以迎击敌人。在敌扫荡地区以避免决战为主。敌兵力抽空地区，则应有较大之突击。敌前进之际，予敌以骚扰。敌退去，予敌以突击。敌之翼侧及归路则派得力部队挺进，予以打击。包括几个地区以上的配合，才能发挥我军伟大的力量。这要依靠我各战略单位首长有照顾华中全局的战略头脑。熟悉具体实在的情况。勇于驰援和互救。才能补救我各根据地分散不完整的弱点。

3、今后华中情况说明对敌运动战的可能性不大，一般的作战应采取分散作战的方式。

但运动战的准备仍不可少。在敌人疯狂扫荡之际，予敌以大的打击。是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必要条件，这也是要清楚认识的。

第六、民兵战术问题：

1、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配合主力担任各种战时勤务，如担架、运输、警戒、侦察工作；一种是直接拿武装反抗敌伪扫荡。凡主力到达或有主力驻扎才开辟工作之地，人民参战的表现属于前者。凡在主力未到达之前，由地方党部开辟工作，或主力转移之际，人民即独立的自动的拿武器进行战斗，是属于后者。不断的农民暴动，反抗暴政，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历史的特点。这样使中国人有了武装斗争的传统和实战经验。我们应以研究学习的态度，去发掘这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应根据人民保卫乡土的革命热情，根据敌伪进攻情况，帮助人民能单独的进行自卫。不拒绝任何古旧的战斗方式，只要他能打击敌人。不拒绝使用任何旧式武器，只要他能实行自卫。我们有这种态度，必然能发挥华中人民武装抗日自卫的伟大力量。过去在淮海区、在淮南、在路西、路东、在苏南苏中，以及在盐城沦陷后的盐城地区，先后均有无数人民游击歼敌的光荣前例。我们应该加以研究总结。一般说来，现在还未得到普遍发扬，这是战术上的新园地，急待我们去耕种和动用。

2、淮海区人民在抗日防匪自卫战中，采取坚守围寨，以外壕地道及铁丝网做防御物，以土炮土枪配合钢枪手榴弹做防御火器，用土泥改装房屋，以防止敌人的火攻，房屋内外布置暗藏地道以备固守无望时，便于自己夜间退出战斗，同时又配合着各乡各村的外围游击的驰援和互救，这是顽强的地道围寨战术的最好发明。津浦路东、来安、嘉山及其他某些地区边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对敌伪采取顽强的自卫游击，背靠我中心区，向敌伪区进击，逐步前进，灵活回旋，终于使敌伪军不敢轻易下乡，陷于完全的防守地位，而我方则取得了巩固和发展边区的胜利。这是属于人民游击进攻的最好例子。在苏中苏南及盐城地区，人民武装以个别袭击及群众集团围攻的力量，不断予下乡敌寇以打击，不断予镇市上的汉奸首领及敌酋以击杀，这是人民义愤和反抗最直接的表示。同时也是使敌寇方面不可能防范的最好战术。津浦路西定远凤怀一带，有四万至五万人民武装，参加自卫战斗。使一切进攻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恶势力，受着不断打击。予我主力军以极大帮助。这是人民参战工作、人民独立防卫工作的范例。

3、中国革命几十年来的历史指出人民武装斗争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除那种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方式，不属于本题的范围，可以不讲外，一般可大略指出有下列十余种。一、麻雀阵。二、回旋打圈。三、地雷战术。四、化零为整化整为零、零整互化。五、狙击战术。六、空舍清野。七、布毒断绝粮食水源。八、破坏桥梁道路，阻塞河道，改造地形。九、埋伏袭击。十、截尾子，捉落伍人员。十一、摸索。十二、群众混战和围袭。十三、诱敌深入，待机袭击。十四、围寨和地道斗争。以上等办法是从单个人民的反抗，到有组织的反抗，一直到广大群众的地方起义和暴动，这中间有广大群众的雄伟的创造力量。在华中地区我党政军民应从这方面去研究、去组织、去创造、去发挥。这不仅可以配合主力作战，而且可以在斗争中创造新的主力，担任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今天的各个主力部队，差不多都经过这样的锻炼过程，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第七、应付夹击与反摩擦的自卫战斗问题：

1、在十年内战中，我军有充分的反围剿的经验。今天的敌后斗争，基本上是以反扫荡对付敌之扫荡。十年内战史是一部反围剿的历史，几年抗战史是一部反扫荡的历史。过去的

反围剿与现在的反扫荡，两相比较，有许多地方相同，也有许多不相同。其中一个最特殊的东西就是现在的应付夹击的问题，此地夹击不是敌伪分兵向我包围夹攻的意义，而是指敌顽对我的夹击而言，我们应分别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即敌顽双方订定共同对我之作战计划，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未全部投降敌寇之前，此种夹击是不可能的。如其公然投降，则等于一般敌伪对我之进攻，更无所谓夹击了。

第二种情况，是敌向我扫荡，顽方不顾大义，出兵击我侧背，企图收渔人之利。或者是顽方向我进攻，我进行不得已的自卫，敌方出兵对我，企图讨便宜。此种夹击形势则经常存在，也是抗战时代最不同于内战时代的地方。这种夹击仅系政治上三角斗争的一种规定。在战役战术上的战场夹击，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但在战略上我们则应随时照顾此种夹击情形。

2、我们几年来有如下的例子：一九四〇年夏天，苏南友军某部向我进攻，敌寇出动击我侧背，事实上陷我于夹击的危险情况。因我方早有准备，明白情况，在同一早晨敌顽向我南北夹击时，我早一小时从夹击中间安全走脱，结果变成敌顽双方剧战，这是一种偶然涌现的局面，因我方应付得宜而出险，予进攻的双方以痛楚的教训。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顽方向我进攻，我失败，敌寇出兵截击我突围部队，使我大受损失，这是由于我方事先仅只畏惧夹击，不懂得利用敌顽间隙处，以遂行自己的战略转移，企图逃避夹击，而走入顽方包围中。这种错误的军事方针，使自己遭受惨败。一九四一年秋季，苏北反扫荡时，敌占东沟，我留守益林。韩德勤以六团之众进至管计沟附近。敌我相距七里，顽我相距十里，我处在敌顽中间。因我坚决抗敌，逼敌撤退，顽方见无利可图，亦自怯引退。一九四〇年黄桥战斗，李守维大军向我进攻，兵临城下。泰兴敌寇亦以数百人驰至黄桥西关十五里处，见我有备，又因当天见李之覆败，敌亦行退。一九四一年夏，某方大举向我进攻，我在淮上应战。宿县敌寇即出兵击我侧背，我两面应战而致失败。这些例子说明华中抗战的特点是：要求我军在作战部署上，应有两面作战，不怕夹击的本领。要求我军应学习应付夹击，和具备应付夹击的战斗精神。其指导原则是抓住主要方面，把其他方面视为次要。当我们在主要方面取得胜利时，即有了全局的胜利。切忌东张西望，进退失据，顾此失彼，造成全盘的失败。

最后，我们对友军一律以民族大义争取其共同抗战。我们应向附近友军号召共同分担抗战任务，互相援救。当敌伪向友方进攻，我们决不乘人之危，且自动加以援助。当我们与友军共同配合抗战，分担抗战任务时，在总的战斗任务之下，我们独任一面。如若混合担任一面是不适宜的。当敌伪向我进攻，我们不拒绝友军的援助，但绝不期待友军的援助。

全军任何指挥员，均不得擅自向友军挑战，应严格遵守党中央的团结友军共同抗战的政策。当某部友军不顾大义向我军进攻时，我军应用各种有效办法去促其觉悟，使其翻然改图。只有在他们毫不觉悟仍然进逼时，我们才站在坚持抗战保持抗战实力的立场进行严肃的自卫，直到停止其进攻为止。一到其反共进攻被打破，我军应不咎既往仍本一贯的团结政策力求再度合作言归于好。这样去表示我党我军主张团结主张抗战的光明正大的态度。这种办法，是谦退的，但绝不是示弱，而是维护民族抗战利益的最严正负责的手段。全军同志应共同遵守这一原则，任何反共进攻，都会失效的。

第八、梅花战术问题：

我二师地区提出的分段点式的梅花形的纠缠战术，一名梅花战术。这个战术的特点是：

1、将部队分成若干小组，对前进敌人予以分段的前后左右的纠缠和袭击。

2、将敌人疲劳、杀伤，造成敌人阵容混乱后，我以主力予敌人以突击。

3、全部战局带有袭击，伏击及发扬近战格斗的诸种特性。

4、要求各指战员有高度的机动性，和密切的配合。

此种战术，对预期前进之敌，我选择有利地形，有利时间，有适当部署和指挥，则是一种很好的战术。因此不能在原则上予以抹煞。而且这种战法正是十年来我军常用的战法，因此还不能说他是特别的新颖的创造。

二师某些同志提出梅花战术，是经过若干实战经验，加以总结研究，更进一步整理，写成文件，又在部队中演习，付诸实施，此种研究战术的实际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二师两年来战斗中常有个别同志易于出三种错误：一分散兵力或平均使用兵力。二逐次增兵的补巴战术。三打滑头战，想贪小利，自己不愿意担任艰苦的战斗任务。因此配合友邻差。协同动作差。这三种毛病常常失掉歼灭敌人的机会。我认为这些毛病的产生，由于部队在长期游击战争中习惯了打小仗，习惯了独立活动，故于集团会战时易于发生上述三种毛病，但这仅是客观原因。而在主观上过分强调梅花战术，把梅花战术为战术的指导思想，以致某些同志养成了分散作战的习惯，这不能不是产生上述三种毛病的根源之一。一般说来这几种毛病不仅二师某些同志不能免掉，即其他各师旅团中，亦常有害同样病症的人，故全军指战员应引为深戒。

我们的基本战术思想，在指挥正规战时，应该是集中兵力突击敌人弱点，切忌分散兵力遭受敌人各个击破；强调协同动作，协助友邻；坚决执行任务；牺牲一部，保存大多数；牺牲自己保存别人。在指挥游击战时，应该是分散作战，独立自主；切忌呆板、迟滞和不灵活。同时我军的指挥员应学会善于指挥正规战。应学会善于指挥游击战。两者能正确的分别掌握、综合运用乃我军战法的上乘。如果把梅花战术片面的强调，或全般的否认，均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

陈　　毅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统一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目前我们的组织战役和部署战斗的指导原则，仍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之下的运动战。

我们的战斗方式则强调近战、夜间战、白刃战、袭击战、埋伏战等。这是我们主要的战斗手段。一切战斗动作，均围绕着此一中心。

对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种战法，我军均应学习和研究。在主力部队应该能全盘掌握。在地方部队与民兵应该特别强调游击战。我军不拒绝采用任何战斗方式，而且应做到能使用和掌握所有战斗方式。从分散的游击战，到集团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到持久的城塞战，均应列在我军研究训练和试用的范围内。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打击敌寇的胜利，均依靠广泛的游击战辅以必要的运动战。对克服反共逆流的进攻，均依靠强有力的运动战，辅以广泛的游击战及必要的阵地战。对匪伪交通施行破坏战。对敌伪推进据点施行阻击争夺战。对潜伏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土匪和危害分子施行清剿战。对近代新式的高、重、热诸种兵器应努力研究，设法逐渐添加，以改良自己的装备。对旧式的短、轻、冷诸种近乎原始的兵器，则乃不拒绝采用。敌后的复杂的战局，使我们不能不采取又简单又复杂的战法。积蓄力量，强大自己，经常保持自己编制和装饰，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积聚有生力量以待有利时机。以上就是我们应采取的整套的军事方针。

对于这一整套的军事方针，德国陆大学生、日本士官学生必鄙薄我们为简单固陋，不懂得世界战争原则。黄埔、保定军官必讥笑我们为乌合之众，不符合中国的正规战术。他们必共同预言我们不能战胜拥有近代高度技术的敌人。一个熟读苏联战术的教条主义者，必根据其满腹教条，斥我们为庸俗，为狭隘经验，不能登诸世界革命的大雅之堂。

这一片喧嚷声，在于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不懂得在今天敌后的战争的特殊规律。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世界战争原则，但不能拿来同中国战争原则等量齐观。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世界革命战争原则，但不能拿来同中国革命战争原则等量齐观。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中国革命战争一般原则，但不能对敌后战争的环境毫无研究毫无出入去照抄老套。一般战争与革命战争在原则上具有其同为战争的同一性，可也有其差别性。一般革命战争与中国革命战争在原则上具有同为革命战争的同一性，可也具有其本身特点的差别性。一般中国革命战争的原则，无疑义的是我们今天抗战军事原则的指导理论，可是运用到当前的敌后环境，又要因我、敌、地形、任务之不同，要求灵活变动，不能划地以自限。教条主义者多半只抓住了战争的同一性方面，故于实践不仅无用且要打败仗；我们十多年曾经吃过亏的。如

---

* 本文是陈军长在华中局扩大会军建报告的第三部份，原载于一九四二年七月新四军司令部出版的《军事建设》创刊号。　　——编者

果真有所谓狭隘经验的话，则这个狭隘经验应该严格限制在那一类仅固执自己局部经验坐井观天的人；凡主张认识同一性又认识差别性，主张理论与实践联系，主张以世界革命理论指导实践，又主张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洗练上升成为一般革命理论的人，那就不是狭隘经验，而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创造和发展，则教条主义者无反对的权利。

世界战争原理是从解决两个势均力敌互有长短的国家间的战争问题出发的；故与我们革命战争任务中以弱敌强的斗争长期性根本不同。世界革命战争的原理，如马列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科学加上在苏联的伟大实践，无疑问可以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指导，可供中国革命的采取和参考。但"大将能以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这就是说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极艰苦的创造过程，不是背书本，抄条文，画符退鬼那样轻便的事情啊。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以来又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向全殖民地的地位前进了一步。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以弱敌强以被动对主动的不利状况中。一切战略战术的课题，离不开解决此一基本问题。要从一切战争原理中学乖弄巧来解决此一不利形势。绝不是说一切原理中业已具体的替我们订有便宜办法，可以一索即得。拿今天敌后环境来说，敌比我强，我之强处仅依靠政治上的真理与人民的帮助。我处在敌之包围中，主动权长期掌握在敌人手上，我们长期处在被动地位。以弱敌强，以被动对主动，以分散对集中，不仅在书本上没有人替我们预备了锦囊妙计，即过去十年战争也没有样样相同可以完全重复的致胜的旧经验。毛泽东同志天才的著作《论持久战》，替我们指示了以弱敌强、转被动为主动、以分散对集中的正确路线。这是得力于廿年来的中国革命实践，得力于对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战争理论的研究；更得力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与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原理的统一的理解。业已把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中最本质的东西揭发了出来，我们应仔细研究的。

我们已驳斥了党外的意见，但在我们党的军队内部是不是都无异议呢？我们以为是存在不同的意见，至少说在执行上、了解上的偏见则异常之多。我们来研究一下，究竟有那些偏向呢？

第一种偏向是不了解统一的战略意志的领导，对今天敌后环境分散作战的重要性。常常拿地方的特殊情况与上级的战略指导对立。或者强调游击战争应该独立自主的一面，来削弱上级的集中领导。比如在整个发展方向上这是全军应该统一的问题。可是过去在某一时期某几个部队中确存在着全军向北而他偏要向南，全党东进而他偏要西进的现象。这就是破坏了全党全军的战略意志应有的统一。意志不统一必造成行动的不统一。行动不统一必遭受各个击破的命运。战略意志的统一是表示政治方针军事方针的领导上的集中性，这方面的集中是分散在敌后环境求生存的起码条件。游击战争的独立自主是表示在上级军政方针之下，应根据实际情况去灵活实现上级给予的任务。游击战争的独立自主是为了实施战略意志的统一的。离开了统一战略意志的独立自主必致失败无疑。战略意志要求统一，而游击行动要求独立自主；两者在事实上构成一个矛盾，但后者服从前者，绝不应把决定方向颠倒过来。自然在事实上也会发生过个别单位有过份干涉下级工作，使下级感觉指示太多，要求过苛，太无伸缩余地，缚手缚足，大度削弱了指挥上的机断性，这一过度集中现象亦应反对。因此在上级负责的，于保持战略意志的统一时，应多注意启发下级的创造性和机断性；下级工作同志在机动灵活执行工作任务时随时不忘记上级统一的战略意图，两者互相顾全，才能正确掌握战略方针。关于战略方针、发展方向、制度订定、政策实施和决定、用人行政的大政方针，一般应该属于统一的范围；全军服从军部，军部服从中央军委。关于工作细则、办法、工作实施过程、战场指挥、部队整训、人马调动等，属于纯粹的组织问题、行政问题、战场问

题，则应该在不脱离上级的总的意图下机动的去灵活执行，而且奖励有决断有魄力有新颖的创造。三年来的艰苦斗争造成了全军铁的统一。今天在政治方针军事方针上，明目张胆公开与上级意图对立的现象，是在基本上消除了。但不切实具体执行上级指示，不仔细研究中央指示；借口客观环境困难延缓对上级企图的执行，或者于执行时不坚决，仅就自己部队的局部情况来了解任务、执行任务；不能从华中全局或全国战局来了解任务执行任务；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这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都会妨害党的战略方针的实施，是应该纠正的。

第二种偏向是主观主义的了解，只就部队的一时的顺利发展情况，空喊向运动战发展。只根据主观的愿望、想以主观的几个大的突击来改变敌后客观环境。不了解敌我条件对比，要转变强弱形势是长期斗争过程，还要配合着国际国内的诸条件。这一空喊运动战的错误认识，如不纠正，必然走到轻易放弃游击战争，走上过度消耗自己实力的盲动冒险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向运动战发展的英明指示是有条件的，是指示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是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三阶段论，在初期的游击战争逐渐加强、到第二期以至第三期反攻时期到来，适当时期才能把向运动战发展的口号变为实行的口号。在目前敌伪扫荡频繁，且日益残酷，分散作战的要求更多，过早提出运动战方针是错误的。

第三种偏向是机械的把游击战与运动战对立起来。运动战与游击战均为一种战斗方式。在长大战线与宽广地区上进行对敌的外线速决进攻，便谓之为运动战。在敌之侧后进行机动袭击扰乱，便谓之为游击战。在固定战线上进行持久防御以待机反攻，谓之为阵地战。几种战斗方式完全因敌我兵种、地形条件、任务来决定；不能死板认为大部队打大仗即为运动战，小部队打小仗即为游击战。事实上部队编制大小只是决定战斗方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其全部。游击战的部署常常是运动战部署的一部份。同样，阵地战的持久防御常常是争取运动战的一个手段。同样，阵地战部署中亦应讲求配以外围的游击战，以阻止敌之围攻，而争取战局之能转到完全进攻的地位。同样，游击战仍不拒绝采取集中全力的突击与局部的阵地控制。各种战斗方式均由进攻与防御两种基本战斗方式所演化而来。而且进攻与防御两种基本战斗方式又互相浸透不能完全分开毫无联系。比如遭遇战两方企图以进攻方式争取先机而压倒一面以结束战斗。事实上两军相接立即便转为固守的一方面或包抄的一方面，仍就逃不出进攻与防御两种基本战斗方式的推演范围。明白这个道理，便不能机械把游击战运动战分开，而取消其中的联系性。目前我们是以正规军担负游击任务，应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诸种方式联合运用。目前以游击战为主，将来反攻时期以运动战为主，这是可以断定的。

第四种偏向是把保持有生力量绝对化。由于认识到敌后的斗争的长期性，认识到敌我强弱的对比，认识到环境的艰苦和力量的培养和保持之不易，因而把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绝对化起来，应该打的仗不打，应该付的代价不付，造成惧怕牺牲的消极保守的现象。以致丧失时机，错过能够解决以及应该解决问题的机会。结果是图一时苟安贻将来之大患。不了解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的保持固是坚持长期斗争积聚力量的根源；但若不经过战斗，根据地是无法保持的。从战斗中去解决一切问题是十多年来的宝贵经验。不进行必要的战斗，有生力量之保持是不可能的。今日贪图眼前的小节省，会造成将来加倍的大牺牲的祸患。以一部有生力量去取得胜利，才有可能更大的发展和保持有生力量。所谓“舍得宝掉宝，舍得珍珠换玛瑙”便是这个意思。自然反对又把这一观念绝对化一变而为盲动硬拚的冒险主义亦是不正确的。但今天之患在前者不在后者。

第五种偏向对坚持阵地的战略战术意义了解不够，有轻易放弃阵地的现象。目前的某些阵地某些地区的坚持，在今天或许无重大意义，即或放弃也许不会影响全局。可是从远大战

略眼光看来，则其价值则异常之大，今天的失着会造成将来的极大不利，这是一方面；另一面对某些地区和支点今天不坚持立即影响全局的事亦常常发生。所以从远大的战略眼光看到将来必须有坚持阵地的决心；从目前全局着眼对敌后阵地的坚持亦更要提高坚持的勇气。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不出让阵地。党政军民共同坚持现阵地这种教育应深刻进行。主力部队应成为坚持的模范。阵地即或丧失应设法去恢复，这样来表示坚持阵地的决心。内战时代常用诱敌深入的战略退却以吸引敌人，我们首先出让许多地区，把敌人引到适当地点再进行反攻，战胜敌人后，再重新恢复阵地。这种战略退却的方针，在我之广大的根据地内进行，其退却仅系一种进攻手段，故是正确的有效的方针。但今天敌后犬牙相错的环境，临敌而举行战略退却是不可能的，或无利的。阵地一出让即有不能收复的危险。故坚持阵地应列为第一义，不能机械运用内战的战略退却方针。但所谓坚持不是死守的意义，而是就地游击就地坚持，以争取最后战胜敌人的意义。华中几年来斗争证明游击坚持无往不能，党政军民全体应深刻领会这一教训。

第六种偏向关于攻坚问题亦存在着不正确了解。我军技术条件落后，特别装备上无重兵器，如大炮；无高兵器，如飞机；又加我军弹药补充接济困难，故根本上不具备攻坚的条件。这本是一般革命军队对反革命统治阶级作战的共同的现象。因此在革命军队的装备不全以前，战术上不提倡攻坚这是正确的。可是因而得出在原则上拒绝采取攻坚战术的结论亦是不正确的。今天敌后环境在我根据地巩固条件之下，在我握着农村优势的条件下，对侵入我区的敌伪孤立据点应采取适当的可能的攻坚办法，我方对敌伪进攻亦可同样采取有效的顽强围寨防御的手段。地区是我们的，周围人民是我们的，邻近区域是我们的，某方面发生战斗坚持一定时期让各路援军赶到即可歼灭敌人，这是应采取持久防御以及采取坚守战术的理由。

第七种偏向是某些部队中存在着的行动不积极。经常停留中心区，不愿到边区行动。对掩护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的战斗，视为地方的事情不视为自己应尽的天职。进行对敌游击时常有游而不击的现象。进行对敌人交通破坏时，常常有破而不坏毫不得力的现象。进行对敌人扰乱时常有扰而不乱敌人并不理会的现象。这些现象常常在边区发现。在某些地方武装中则更严重。对战斗任务之执行，采取敷衍不积极的态度。同时边区部队又时有受袭击的事件发生，由于侦察警戒疏忽，行动不积极，经常停留原地，致为敌人所乘等。

以上七种便是现存的一般不正确的倾向，这是与党的军事方针不能并存的。反对分散主义对全军的统一集中领导的削弱。反对独立主义对总的战略方针的割裂和曲解。反对教条主义对实战经验的轻视和隔离。反对对具体经验的固定化和绝对化。反对组织战役指挥战斗中，不脚踏实地，不正确分析情况的主观主义。这才能保持我党的战略战术方针的正确的实行。

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

（一九四二年八月）

罗 荣 桓

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如果以为这只是今后两年甚至是一年半载的转瞬间事而视为有关重要毫不在意，那将会造成自己的麻痹，帮助了敌人的凶暴。

整个华北的形势，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各个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山东自然也没有例外。敌人对我各个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蚕食，由来已久，而目前犹在加紧进行中，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如鲁南太山区几乎已全部变为游击区；鲁中沂蒙区亦已被封锁割裂，在交通联系及工作指导上深感困难；冀鲁边与鲁西，情况更形紧张，同时因为工作基础一般还薄弱，群众在长期战争中忍受着过重的负担和损失，而我们对群众生活的改善又是今天才开始注意，才开始深入发掘出并且还要继续发掘出不少严重复杂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非常细心谨慎的去解决，而不是没有困难的。

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边缘和游击区的斗争是更严重复杂的。在我们工作不甚好的基础上，如不很好很警惕的注意和转变工作，那就很可能继续沦为敌占区或退化成游击区。这一点，决不能因为我们主观上不愿意承认而可以马虎过去。敌人第四次治安运动是有了某些收获的，首先是从其自己占领区以内给我们以肃清的打击，并转向对我们游击区与边缘地带，推进其纵深封锁和面的占领，形成雄厚的包围与紧缩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而且这种包围和紧缩，正在加速发展着。鲁南狭窄的山区，已没有我们可以联系的平原地，也没有可以成为我们可靠的结合纽带。随着敌人紧缩的推进，不是各种工作塌台，便是往后向比较基本地区的退却。地方武装的溃散及个别的叛变，仍是异常严重。致使我们久已存在的某种战略基点遭到全部被暴露的挫折，这是值得严加警惕和注视的。

检讨上述这种严重局面的形式，一方面同国内外形势不可分割，但另一方面也有我们的缺点与错误存在。

第一，不认识我们是在敌后建设抗日根据地，是在敌人点线之间建设抗日根据地，而且又有经济政治文化地理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总之，没有大量的发展游击区，不会有我们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没有很好的坚持的游击区的工作，亦不会有我们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不仅是军事的任务，特别在后一阶段上，更是政治的任务。如果说"战争愈不象战争愈象政治"的话，那么我们的游击战就是愈象政治的战争。当中央指出和警告我们要把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这不仅要求游击战要有坚固抗日根据地的支撑，还要求我们如何达到有坚固抗日根据地的支撑，同时亦必须解决从具体情况出发，究竟用什么形式获得坚固抗日根据地的

存在。因此在建设抗日根据地上，我们没有明确的观念与长期的打算，还表现在我们对抗日根据地边缘与游击区的坚持工作的忽视。

第二，满足于一般公开武装斗争与民主运动的外表形式而不去分析具体环境及其所有的条件。在有些游击区已变为或可能变为敌占区，在有些基本区已退化成或可能退化成游击区，是须要我们立即或准备着改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然而，我们有的地方仍在坚持自己一套公式，甚至剩下几个仅仅安置我们的机关还感到狭小的村庄，他们对于精兵简政的执行仍然是采忽视态度的。

第三，“大量开辟发展敌区工作与缩小敌占区”，已不是今天的口号。今天的口号，是普遍的巩固精干，并根据我们基本区同边缘游击区、或者敌占区各个不同条件，作某些方面的隐蔽或准备隐蔽，或全部转为隐蔽，以保持自已势力与机动上的可能。因此，这不仅是一种消极的应付，而且有其积极的意义，为了粉碎敌人任何扫荡与迎接总反攻的到来，这样一种转变，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那种张扬旗鼓大吹大擂一套公式的机关作风，是特别有害的。这一点，过去并没有为领导所重视，以至在某些地区造成了对我们存在之损失。

第四，对敌伪军工作是有了我们最大的热情，并获得了一些显著成效。但决不能认为可以自满的。过分暴露的政治攻势，急躁的拉伪军反正，不是没有损害的。短促突击的方式，宣传鼓动的一般化，反给了敌人特务宪兵以猎取破坏我们的间隙，削弱了敌伪军同情的增涨。

第五，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地方武装，无论在数质上与灵活分散动作上都不够要求，对他们的党政工作，是异常薄弱或根本没有。尤以对争取反正过来的伪军与收容编制起来的土匪，只有我们给予他们的保证，他们是可以不执行我们任何条件的。并且往往把他们摆到边缘游击区而获得勒索抢掠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造成我们在严重三角斗争相持的地带上遭到失败。

第六，不睁着眼睛向着敌人看来势和细察情况是不会有我们的政治攻势的。虽然我们最近也调查了一些材料和作了一些汇报通报，但一般的说，这工作还做得非常不够，距离真正的了解敌人还差得很远。这就必然形成我们对敌斗争的空泛无力。

这些缺点与错误的存在，是会使我们边缘游击区愈益陷于严重地位，对敌斗争上亦招来了破坏与打击，对我们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将要形成最大的危机。敌人的蚕食，我们自己的后退，不是不可想到的事情，因此必须转变和加强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工作。

目前一般的应该是采取麻痹松懈敌人，精干的保存自己力量，并争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有我们机动的条件不丧失坚持相持的信念，这是完全可能而且必要的方针。敌人全部殖民地化的政策，即是发展很凶恶的奴役掠夺，广大的中国人民是已经饱受或愈益严重的受到无限的苦情，存在着民族基本仇视的。敌人宣传“解放东亚”，巧妙的修改日本同中国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历史关系，事实上就不可能掩饰的。宣传“剿共自卫”强调出“互相救救人自救”一套迷语，无非为了要中国老百姓牺牲良田沃土，大批劳力壮丁，去替皇军修筑护路，封锁道沟，服从其残酷的奴役制。宣传“勤俭增产”，调查土地产量，更不外乎为夺取广大农民最后一口救命粮食以加强其饿死中国老百姓的经济配给制。敌人特务活动的镇压，伪化治安的紧缩，而且已使得伪军伪组织同样怀着不安。敌人经常利用“杀鸡吓猴”的办法，以强迫调整伪军，编制伪组织，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更加扩大了对我们的同情。这都是对我们有利的，但决不会因此而造成了我们的一切好转与反攻胜利的到来，这只是一些便利

于我们的条件，使我们有渡过难关克服黑暗迎接好转与胜利的可能。中心环节要看我们能否正确的执行方针。因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作为一般研究的参考。

（一）必须加强群众性的分散游击战，以配合着党和群众工作的深入隐蔽。首先求得立稳自己脚跟，打击敌人特务活动，而使我有可能迟滞敌人的推进与面的控制。尤以破坏敌人齐一线圈的向我们紧缩，展开对敌人作残缺不全彼虚此实的斗争。要发展必要的革命的两面派，多争取交伪军朋友，而不是要求轻易的反正工作，以达到破坏敌人伪化组织体系去挖苦敌人自己。总之，要把机动性与高度原则性结合起来。

（二）排除狭隘公式化的一套，大量减掉我们的机关与人员，散布到下层组织中去作坚强深入隐蔽的工作。但应注意将无法存留或不健全的动摇成份送到基本点地区分配工作，或可能给予不重要的任务，个别派遣以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某些重要基点上安放得力的干部，使其可能掌握具体斗争组织形式，这是非常必要的。

（三）特别值得重视的要把我们某些不可靠的地方武装坏成份切实清理。有的给以改造，有的欢迎他们在另一种方式下去生存和作一定程度内有利于抗战的活动，有的设法使其枪支转交给支部所团结的群众手里去。并调取比较坚强的成份（最好由基干兵团中抽出并且是当地的人）去加强游击基干队小组，生根隐蔽在群众中，建立坚强的情报转递和联络站。各地主要干部，应成为这一游击战直接的组织——领导者，经常以游击基干的突起行动，配合着游击小组的分布潜伏，只打击敌人的宣抚班、保甲巡查与公指导班，打击敌人少数出动抢粮及捕拿壮丁牵走牲口部队；而又要善于打击敌人尾背、不打击敌人来头；要善于埋伏打击敌人，不对抗打击敌人；要善于暗中打击敌人，不张扬旗鼓打击敌人；还必须相当的遵守没有情况不乱击，避免引起暴露的破坏，有了情况要善于袭击，积极配合主力的作战，这一切在今天要成为全党普遍熟习的课目。

（四）没有同群众的联系与适合于群众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是不会有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坚持。因此必须制止在临到困难便去加重群众负担而产生自流的发展殖民地观念。要广泛深入的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反对敌人统一封锁的配给制，帮助群众对准敌人这一殖民机构组织与管理方法实行舞弊泄漏走私暗藏等办法，甚至成立群众性质之类的斗争小集团，并同小贩商人与敌占区人民订立有彼此交换利益的条件；而且应该使其在民主法令下有这种自由。今后对敌人强迫群众修筑道沟围寨在无法抗拒而且可能增加群众不能忍受的痛苦时，我们只有赞助群众积极的去应付敌人，配合着我们伪军工作的普遍以造成敌人疏忽和松懈。这一切，是会使我们获得更切实的利益，获得最广大群众同情和提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与依靠。同时也就有了我们教育与组织群众的基本条件。

坚持着我们边缘游击区，使其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张线，活动的跳板，以打破敌人紧缩政策，建设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这对我们克服最艰巨的一段过程是有特殊意义的。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很好的体会研究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原载《斗争生活》第十六期，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

（一九四二年八月）

刘 伯 承

这次反“扫荡”的军事总结，我是根据当时反“扫荡”的作战指导，对战场所获得敌人文件的研究，和各军分区、各野战旅报来的总结写出来的。凡经验教训与二月份反“扫荡”中相同者，都不重复写入，以省篇幅。

第一部分 对敌人夏季“扫荡”的观察

一 经常的边地蚕食的压缩，与间时的腹地“扫荡”的摧毁相配合

日寇对抗日的游击战争，曾实行所谓“广大广大地开展，缩紧缩紧地消灭”的鲸吞的办法；也曾实行“分散地配置，灵活地进剿”的普遍压制的办法；也曾实行“边地蚕食与腹地扫荡相辅相助”的办法。这些办法都是在逐步演变中摘取其适当者而发展的。就太行地区之敌而论，它为缩短其确实控制占领区之时间起见，边地的蚕食，由逐步的发展而为跳跃的。如平汉线沿铁路边沿有了第一道封锁线，至去年五月，跳跃三十里至五十里，在北起获鹿，经南佐、赞皇、柳林、三王村、赵店、营井、和村、彭城，南到观台、水冶，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现在又跳跃二十至四十里，在南起武安西北之任家岭、功德旺、西坚固、神头、台峪、院头镇、北正村，北至元氏西北之仙官寨，构筑第三道封锁线。至于腹地“扫荡”，二月来的一万五千人，这次来的二万五千人，兵力逐渐增大，合击圈的数目与面积都随之增加。今年四月间构筑了割裂腹地的武（乡）榆（社）辽（县）路，成为“扫荡”腹地的经常补给线。敌人的用意不外乎是在发展“广大广大地开展，缩紧缩紧地消灭”的办法，使经常的边地蚕食的压缩，与间时的腹地“扫荡”的摧毁，更有机地配合起来。这种配合办法，或者此地“扫荡”，他地蚕食，或者在某一地区同时实行。但是敌人控制地面愈宽，使用守备兵力愈多，而“扫荡”兵力愈感不够，特别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为尤然。于是强调“封锁为着扫荡”，到处抽调守备兵力，辗转集结一区，逐次进行全面的“扫荡”。此次敌人不单如往次抽空敌占区基干线上的机动兵力，甚至抽空其他地区的守备部队，如第三混成旅团由雁门调来，第四混成旅团由正太线调来，都在平汉线西侧作战，这也说明敌人顾此失彼的窘状。我们应该就其抽兵空隙中，尽量打开自己的局面，帮助邻区。

二 此次敌人对晋东南的辗转“扫荡”

敌人要使华北成为征服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而确实占领之。在今年五、六两月，曾集中河北部队“扫荡”冀中，集中山西部队“扫荡”晋东南。山西敌人第一军长筱冢义男，原来在太行、太岳、晋西北三个军区同时“扫荡”，他的那次所谓“驻晋日军总攻击”，终因兵少地宽没有成果。于是他这次又来一个“驻晋日军总攻击”，乃对晋东南举行了一种辗转

"扫荡"的作战。其作战计划是分成四期，辗转实施，其中第二期成为它"扫荡"的重点。第一期的"扫荡"太岳的南部，以第三十六师团、第四十一师团和第十六混成旅团的八个大队共约七千余人，自五月十四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才结束了太岳南部的"扫荡"。第二期是"扫荡"太行北部，以第三十六师团主力，第一混成旅团一部，第三混成旅团一部，第四混成旅团主力，第八混成旅团一部和第一一〇师团之一部等共约二万五千人，自五月二十日起，至六月八日止，才结束了太行北部的"扫荡"。第三期以第三十六师团主力，第三混成旅团，第四混成旅团和第一混成旅团等部队，计日军一万二千余人，另有地方伪军约三千余人，自六月八日起至二十日，才结束了太行南部的"扫荡"。第四期是"扫荡"陵川、林县、辉县地区的友军，以第三十六师团主力，第三十五师团，第三混成旅团，第四混成旅团等部队，计日军一万二千人，自六月二十一日起至七月八日，才结束了陵、林、辉地区的"扫荡"。就敌人对晋东南连续四期"扫荡"看来，它是为要对每一地区，特别对其重点的太行北部，集结优势兵力，求得"扫荡"面积更扩大更周密些。而总的时间是五十五天。在一个地区持续如此之久，又在我们空舍清野与破袭交通状况之下，其大军粮弹也是无法补给的。特别要指出的就是敌人兵力疲惫，除各地区守备队外，没有哪一个敌人不参加两期以上的"扫荡"，而第三十六师团部队已成为车轮的轴心，更是自始至终参加了四期全部的"扫荡"。这无怪该师团被俘的士兵都是疲惫得要死，都深刻认识到侵华战争徒然损兵折将没有出路而宁愿被俘。该师团这样长期的疲惫，在事实上也是难以持久的。

三　敌人特务机关在根据地内张牙舞爪

日寇第一军对太行区"扫荡"的指导方针，是消灭我集团军统率机关、一二九师部队，毁灭根据地与劫夺资财。它的特务机关"扫荡"前即依据此方针进行侦察，对于间谍、叛徒和民族败类，都尽量使用和勾结，故能在其要图上标出我们各机关、各部队的位置及其可能的动向，甚至把主要干部的相片、履历也印出来，成为"扫荡"作战的根据。在各要点并设有情报机关，如合漳在被合击以前，也曾发现无线电台，谣传敌将攻击彼处，不"扫荡"此处，或以虚虚实实的办法来松懈我之备战意志，驱使土匪骚动，以造成人心浮动，或偷割电线，以便于敌人奇袭。这些，都比往回的"扫荡"前夕来得厉害些。当"扫荡"时，日军各联队设有便衣中队，例如高木联队的益子中队，经常乔装，甚至面涂黑色，在本队前半日乃至一日行进，带有电台，担任奔袭我集总(1)与搜集其他指挥中枢情报的任务。各大队则有特务工作队为其伸出的爪牙。此次搜山，或居高临下诈呼"我看见了"，以代替搜索，或者潜伏路旁、麦地，捕捉通信人员，或者假装妇女喊叫、儿童啼哭、驴叫牛鸣，都无非是想诱致我隐藏中或者行进中的军民而捕捉之，并压迫被捕者指出资财之所在。或者假装八路军帮助民众耕种，或者假装政府人员接近民众，或者窃听电话，或者持假路条直趋要点，以侦察我军队与政府之所在。或者直接出面以散发食盐、准许割麦等利益相引诱，以烧房、黥臂、捉人相威胁，迫使群众当密探。发展会门、青红帮和维持会，以及散布各种谣言，造成失败情绪。长治特务机关长深尾，曾亲自率新民会、宪兵、警察和离卦道头子杨书奎等，到黎城推动特务工作，散布灭亡人心的恐日病菌。敌人所谓"七分政治"的阴谋，在这次"扫荡"中的花样特别多，也特别出力，这也是冈村宁次历年奴役朝鲜与我国东北经验的发扬，应引起我们十分警觉。

四　敌人所谓铁桶封锁阵的"扫荡"

这次敌人对每一区域的"扫荡"，都可以分成三个步骤来看：第一是各方面且进且击地

齐向腹地作大合击；第二是各部队分散配置，进行抉剔“扫荡”；第三是各方面分道撤出，转入另一区域“扫荡”，或归还原巢。

各方面敌人都是依托铁路向腹地某点前进，先在前进道路上各自进行局部的合击，然后齐向腹地某点作向心的共同的合击。每方面的敌人在局部合击时，在太北多以大队为单位，在太南多以中队为单位进行之。各方面敌人都如此进行，想把我军各部队都向腹地中心压缩，使我们越发缩到中心，越发钻进它集团所预定的共同合击圈之内（在太北的共同合击圈以姚门口为中心，直径约五十到六十华里）。这还不够，还要防止我军遗漏出圈，于是各路部队在前进中尚未构成合击圈之前，即在我们可能转移的要路上，残置一个小队或一个中队，构筑临时的封锁点——这就是敌人所谓的残置封锁部队（它为要扩大“扫荡”正面不能不减小纵深配置）。这些残置封锁部队，或附以无线电台，或附以军鸽，以便于传达情报，日间上山，夜间下山，多方进行佯动，意在将我们部队压进圈内，特别是威胁我们，堵击我们，使我们不敢向圈外转移。这种残置封锁部队是要起那种吓鱼入网的响子（持之入水发响声赶鱼者）的作用。在构成每一合击圈时，两翼多系有力部队进得很快，正面多系直属小部队进得很慢。在进行每一较大的合击时，都有飞机三至六架进行轰炸、侦察和通信联络，特别在发现我军时，即以飞机抑留我军，并将我军位置指示给地面构成合击圈的部队，一致进行所谓立体的合击。这就是敌人所谓要构成逐步缩紧的“铁桶封锁阵”，也是我所说的第一步骤——各方面且进且击，齐向腹地作大合击。

敌人首先是以面的态势的合击，求得摧毁我军的集团战力，然后追求分散小部队随地消灭之，同时要毁灭根据地，劫夺资财。因此，敌人在大合击之后，就不能不分散配置，进行抉剔“扫荡”。“抉剔”是挑开剔除的意思，这就是对我分散潜伏的人员、资财进行搜索挖掘的“扫荡”。敌人通常以大队为单位，各在划定地域将主力隐蔽控置于要点，待机策应，再派出若干以二、三十人起码的搜索部队，向各方搜索挖掘。此时特务工作队卖力较多，其指挥官常在山上观察指挥，各队在山头与谷底分头活动，夜间则分入各村。所捕壮丁则抽送东北作苦工；所挖资财则后送“扫荡”基地，如有不能运出者，则毁灭之；对于抗战区的麦子则尽量烧毁。这就是执行日寇第一军颁布关于枯竭抗战区人力资财的指示，也就是第二步骤——各部队分散配置进行抉剔“扫荡”。

敌人自己的计划，在抉剔“扫荡”之后，自然要后送赃物，要转到另一区域。这样会同时遭到我们各地的打击，特别是遭到我与腹地游击战相配合的、对敌占区、补给线的打击。它也不能不撤退，而且还要分道向铁路靠近撤退，以求得粮弹充分地补充。此时各方面的敌人是同时撤退的。但是各部队是离心运动的，意志松懈，队列不振。这就是第三步骤——各方面分道撤出，转入另一区域“扫荡”，或归还原巢。

我们把敌人每一区域的“扫荡”综合来看，它有三个特点：

（一）大军合击，协同进退——这由于敌人是异族正规军，且要防止扑空，或被各个击破之所致。但大军远调，人马转送，粮弹补给，以及防备我军对交通的破袭，都很困难，特别各路协同动作，限时限地的进退，战斗分界线的严格划分，束缚了各路的机动。

（二）敌人集结腹地的合击，边地空虚——这由于它抓住了我诱敌深入作战的老规律，迫我陷入纵深交错的大合击圈以内，使我不易出入，但其兵力越深入到我腹地，边地乃至敌占区越是薄弱，是可以容我们机动的。然而这也不可陷入公式主义。假如我们永久留恋山西某边地活动，而成为不变的老规律时，则敌人也可以把大合击圈靠近某一边地，而这次第

三、第四混成旅团也就用不着弯到平汉线来合击了。紧箍套是孙悟空自己戴上的。

（三）敌人阵势的严整与松懈——敌人大军布成严整的阵势，是根据其对我军侦察与判断的结果而确定的。如果我军行动出其预料之外，则其阵势必错乱，特别是“扫荡”的后半截，兵力疲惫，意志松懈，暴露弱点更多，这是要我们集中注意力的。

五　敌占区空虚，交通补给线延长，警备困难

敌人抽兵“扫荡”的规律，是由邻区抽来本区，由纵深抽到前沿，这是挖肉补疮的做法。正说明抽出“扫荡”的兵力，不能在“扫荡”区停留两月之久。其被抽兵之处，则以据点的小部队积极活动，由基本段到前锋段之兵，早出晚归，加强间谍活动，广布谣言，以掩饰其弱点。延长的交通线更无法警备，如这次第四混成旅团抽调的吉田大队，它在五月初就把各县的伪警备队、宪兵队、特务工作队、伪灭共自卫团都调到阳泉演习。五月十七日吉田大队长才由寿阳到阳泉，连这些伪军共编了五个中队来“扫荡”。这五个中队除吉田带的一个纯粹的日本中队约一百余人外，其他四个中队的编制是：每个中队有一个日本小队约二、三十人，另外有三个小队每个小队也是二、三十人，都是伪军编成的，只有小队长、分队长才是日本人。这些中队都是百人左右，除带若干步枪外，有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两个。这是抽兵的例子之一。其他地方类似此种的抽兵，必然不少。我们突击部队在奇袭长治、潞城、壶关时，亲见长治重镇只有五百人，并且大部都是辎重部队，壶关只有七十人，潞城与微子镇共有一百多人。这些地方在我奇袭之后，演成风声鹤唳的局面。据我在白晋路、平汉路主要交通线活动的部队报告，敌占区城市大都守备空虚，敌伪组织机关庞大，缺乏掩护，破坏铁路尤属容易。至于敌人前送粮弹后送赃物、伤兵的补给线，如武安到沙河、临洺关的补给线，我们没有队伍去摧击；武乡、榆社、辽县的补给线虽有摧击也是很少的。这些补给线，敌人当然不用很多兵警卫，但这也是例外的事。其他补给线，都在我们不断摧击之下，是无法维护的。例如潞城、黎城补给线，是敌人第二、第三两期作战轴心的补给线，因为常遭有力的摧击，损失甚大，汽车每到一站，就要这站派兵护送，那站派兵接护，中间要点还要派兵掩护。高木联队自辽县经栗城到黄漳的补给线，从五月三十日在苏亭被伏击重创之后，视为畏途，非重兵掩护便不敢通行。铃木中队在六月六日回辽县还是兢兢业业的。白晋线掩护部队不够，在太行与太岳夹路破袭之下，火车很难通行。敌人这一幅外强中干的画象，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

第二部分　我们反“扫荡”作战的要旨

一　我们干部先要足够认识敌后战争的残酷性复杂性，才能有适切的战斗准备与战斗动作

我们始终要坚持华北抗战，争取两年胜利的反攻；敌人要确保华北，以华北为征服东亚民族的兵站基地，想一年半消灭八路军。敌我斗争的方针如此尖锐地对立，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各种斗争。我们首先要把党中央“七七”告将士书(2)的指示贯彻到全军，以坚定斗争胜利的信心。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处在敌后，必须从紧张的游击战争中去发挥各种斗争的威力，首先是政治攻势。因此我们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战争来设想，而且是经常处在战斗环境中，尤其是在敌人的阴谋中警惕与紧张地去进行，绝不是在太平无事的景象中雍容不迫地去进行。无论是战斗动作或政治工作，凡可以削弱敌人与积蓄力量的工作，都要抓紧时机统一

进行，切不可把两者对立起来，而尤应以政治工作提高我们的胜利信心，防止敌人灭亡人心的恐日病菌的袭击。我们有些干部在这次反“扫荡”中，由于对战争的残酷性、复杂性认识不够，特别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带着麻痹病状，于是放松了深入的政治动员、适切的战斗准备与战斗动作，以致一受损害就仓惶失措，甚至有悲观失望者。我们统率机关，尤其后勤部门在精兵简政之后，还没有做到组织轻捷化，行动战斗化，因而损失较重。对于敌情的估计有些没有做到恰如其分，而是大事视为小事，有主观侥幸的心理。故战斗准备不充分，甚至分明遭到敌人射击，还自己安慰说是友邻部队的误会，一受到袭击之后，连胜利战斗的机会也因无信心去争取而放过了。情报工作很差，对于敌人间谍的猖獗，没有从组织上给以摧毁的打击，甚至对共瓦解抗战的恐日谣言采取自由主义，听其流传为害。有些县、区、村指挥部，对于敌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还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未遵照指示经常进行工作（上级也未严格督促进行）。甚至某县还借口整顿政风，未急切接受军队帮助做备战工作，结果在反“扫荡”中大多数民众还未动员起来。有些县份在敌人经常蚕食之时长期开会，在敌人突然“扫荡”之时，逃避战争，使民众斗争失去指导，基干部队作战没得帮助。这些坏的现象，只有先对敌后战争的残酷性、复杂性有了足够的认识，从组织中行动中负起责任，才能转变过来。

二　每一区域本身与友邻区域，都要把反“扫荡”与反蚕食的斗争密切结合和协同起来

敌人以总力战蚕食边地以压缩我们，“扫荡”腹地以摧毁我们，两者是相辅而行的。同时它因为兵少防宽控制困难，故一面依托交通线进行蚕食，推广其外强中干的占领面，以期隔绝我与友邻区域的配合行动，一面抽集各地兵力辗转“扫荡”各区域，以期各个击破我们。这样一来，抗战区与敌占区的游击性同时增大，需要我们把反蚕食与反“扫荡”的斗争，结合成为相辅相助而不可分离的工作。这是因为反蚕食对于反“扫荡”的作用，可以渗入敌封锁线的后方，在其外强中干的痛痒处，繁殖了釜底抽薪的游击战，不但可以制止蚕食，扩大反“扫荡”的回旋地面，并且能取得敌人“扫荡”基地的情报，使敌人无法遂行远距离的奇袭。同样，反“扫荡”对于反蚕食的作用，不但可以强固反蚕食的支援基地，而且打击了蚕食的主力。所以每一区域的本身和友邻区域，都要把反蚕食与反“扫荡”的斗争密切结合和协同起来。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获得空间与时间的自由，使敌人顾此失彼，顾前失后。如它不在集结“扫荡”中被我消耗，即在分散配置中被我消灭。现在日寇在北平流行的一句话：“皇军大大的去了，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了，八路军大大的有。”这确是日寇在军事上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在敌占区的武装工作队、明与暗的游击队，在掩护民众反捕壮丁、反配给和反特务的合法斗争中，获得了初步成绩。今后我们还要培养他们，并加派武装便衣队，强化情报工作与破路工作（爆破铁路以使敌人“扫荡”部队及粮弹输送困难），使之在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中起更大的作用。这次太岳军区和太行军区第一、第二两军分区在配合太行腹地的反“扫荡”与他们本身反蚕食的斗争都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单以第二军分区而论，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的协同动作，曾将辽县西部和沾尚、马坊一带伪组织全部打掉，恢复了边地组织；同时接连袭击昔阳城、平定城、辽县之石匣、七里店、下棋子的据点，获得相当战果，尤其是对敌交通的破袭，曾在平（定）辽（县）线上之寒王镇伏击运输队，消灭了敌人一个小队。至于武装工作队及在敌占区生根的游击队，捕捉敌人特务队，拔除敌人秘密爪牙，配合敌占区民众的合法斗争，也都有了成绩。这些帮助友邻反“扫荡”同时强固自己阵地的战例，今后应在各区域发扬。

三　对付敌人铁桶封锁阵的反“扫荡”作战

我们回头检查二月反“扫荡”总结，来看这次敌我两方的战役组成，都在旧的基础上各有新的发展，下次将更有发展。我们必须把握敌人“扫荡”的规律与步骤，推进我们的侦察研究工作，才能使今后的作战得到正确指导。兹就这次经验教训提出下述四个作战指导问题：

（一）诸基干军队的机动

诸基干军队应保持在边地与合击的间隙地机动。这种机动，必须出敌不意，而其目的不只要消极地脱离压缩的合击，而且还要积极地奇袭敌占区要点，摧击敌人的补给线，尤其是背击敌人残置封锁部队以策应腹地游击集团活动及其反抉剔“扫荡”的动作，造成敌人腹背受击的环境。

（二）腹地游击集团的活动

县区基干队在被合击的腹地领导游击集团活动时，如有必要应由基干军队派遣部队与干部加强之。如把跨于合击圈内外的武装归属于一个指挥系统或联防系统，则在内外呼应动作上，尤其在侦察、通信工作上实在重要。在反抉剔“扫荡”时，以基干队打击敌人分散队伍，并与麻雀战、地雷战相配合收效最大。

（三）全体武装着重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们在反“扫荡”全部过程中，时刻不要放松敌人弱点，争取战斗胜利。但敌人表现的弱点，通常是自行抉剔“扫荡”之时起就阵势错乱，特别是其作离心的撤退时，尤属萎靡不振。这正是我全体武装痛击敌人，夺回人赃的好时机。我们必须使在敌占区活动的部队、摧击补给线的部队和腹地反抉剔“扫荡”的部队，各就现势协同动作，以争取最后的胜利。他们迎击、侧击和尾击的收效，完全决定于其干部把握先机专断行事和顽强紧张。这种由被动转到主动的行为尤属贵重。

（四）用兵的分遣集结，重在发挥其固有的能力

我们有现成的分遣集结，也有临时的分遣集结，但现成的分遣集结必须强调。就一个军分区说来，县、区基干游击队领导周围的人民武装，分布于各地游击，这是现成的分遣，只有在必须集中突击力时，才作临时集结的使用。因为这种部队，灵活游击的力量较强，故使用时应以“分遣为主，集结为辅”。如军分区的基干团，野战旅的团，是现成的集结，只有在必须灵活游击时，才作临时分遣的使用。因为这种部队的突击力量较强，故使用时应以“集结为主，分遣为辅”（就现时山地的说法）。这样用法，在遇分成小股之敌时，则我可有把握地发挥固有的突击力量消灭之，以使敌人不敢分散如网的“扫荡”；在遇集成大股之敌时，则我可有把握地发挥固有的灵动游击力量消耗之，以使敌人突击扑空。这样武装组成的使用，正如人使用躯干与手足之功用似的。

四　情报工作

日寇特务机关、宪兵队、间谍、叛徒，以极大努力，做了长期阴谋的各种准备工作，也做了“扫荡”中、“扫荡”后衔接发展的工作。我们军事政治的情报工作远不如敌人，还没有实现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所以有许多问题都是雾中取宝，甚至无的放矢。漫道我们对于敌军组成与部署，对于敌占区地形、民众、政治、经济情形不及敌人清楚，就是对于自己本身某些事物也不及敌人清楚。例如敌人印出抗战干部的履历相片、我们机关部队所在地点和腹地某些险要地形等，都比我们某些干部清楚得多。因此，切实建立我们的情报工

作，应认为是对敌斗争（尤其是防谍除奸）与争取反“扫荡”胜利的最重要环节。

现在我们各分区、各旅的首长，应领导并从组织上检查、整理所属的侦察工作，与其他部门交换情报的工作，尤要检查整理县、区、村指挥部的情报通信、抗日戒严、检查路条与户口工作。同时，由分区和旅在作战要线上（由敌占区到腹地）加强情报人员，建立秘密的情报通信所（或叫侦察联络所），并把这些要线上的县、区干队、民兵也强化起来。这样，在平时有了组织工作，才能在反“扫荡”斗争中负起提供下决心的情报、战斗保障与通信联络的责任（在反“扫荡”时，分区也可以武装便衣队人员加强要线情报工作）。要遵照师关于编撰兵要地志的指示，定期分配干部到各地考查地形、地理。要检查各部队保守秘密与防止间谍的工作。对于日寇间谍机关及其勾结民族败类破坏抗战的组织，应予以摧毁。要在战斗中捕讯敌兵，夺取文件，询问民夫。某旅在这次反“扫荡”中，夺取敌人文件，特别是在厕所中搜出重要文件，是值得各部学习与发扬的。各分区、各旅司令部，应每半月把所得一切情报研究整理，出通报一次。

第三部分　我们反“扫荡”的战斗活动

一　在合击圈外的战斗活动

敌人在其外强中干的布防、分进合击“扫荡”之基础上，进行了预定的各路齐向腹地构成“铁桶封锁阵”的大合击。敌人这种合击阵势的到来，形成了腹地兵多、边地兵少和敌占区空虚的画图。我们基干部队原在边地活动者和由合击间隙地转出圈外者，曾抓住这一特点，奇袭了敌占区要点，破袭了铁路及其延长的补给线，跟着合击者的足踵打击其残置封锁部队，尾击了敌人，以与腹地游击相配合。敌人在撤退时，又遭到我们在敌占区活动部队的回击，在补给线活动部队的侧击，在腹地部队的追击。这些在合击圈外的战斗活动，是我们这次反“扫荡”战役主动而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战斗，应在今后发扬者。其中较显著的，如某部队奇袭长治重镇，烧了飞机三架、汽车十四辆、汽油库一座、营房二座，也摧击了潞（城）、黎（城）公路补给线，并抓住合击者的侧背，伏击了经排行、东流前进之敌，特别是伏击了由石城撤经阳高归潞城之敌，由达城撤经东岗归观台之敌，又如某部队拊着敌人侧背，经常破袭沁县、长治段铁路，并由摧击潞（城）、黎（城）补给线而收复黎城、涉县，扫清了黎、涉路上的残置封锁部队，还尾击了由涉县南下西达城之敌。这一部队最好的伏击战例，就是在辽县、黄漳补给线上之苏亭，领导民兵毙伤了归巢之敌一百四十余人。其他各军分区在武安、固义伏击汽车的战斗，在壶关河口的袭击战斗，在辽县寒王镇与七里店的战斗，在榆（社）武（乡）路杜余沟的战斗，这些也是在敌人合击圈外，在敌占区与补给线活动的战例。就上述战例中，我们找出的经验教训如次：

（一）干部对战斗的思想准备

我们以主力在合击圈外作战，以一部在合击地域作战，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无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要干部了解我们基干军队主力应如何主动地保持在边地机动，或由合击间隙跳出圈外机动。主力必须做到不在合击者的正面被迫作战，即能出其侧背主动作战。只有干部能够经常察明敌情，隐蔽我军，平时对地形熟悉，预有战斗腹案，才能使自己主力做到在小部队佯动掩护之下，作适切的机动。

（二）基干部队与敌占区、接敌区（边地）的武装

基干部队的接敌侦察与敌占区生根的游击队、边地的游击队活动所得的敌情，应作经常的交换和参证。基干部队到敌占区与边地活动时，应就近指挥他们配合行动，并与边地县、区、村指挥部工作取得协同。

（三）在合击圈外需要突击力量

在合击圈外活动的部队，应有相当的突击力量。有了相当的突击力，无论是在敌占区或补给线上活动，或袭击敌人残置封锁部队，尾击合击之敌，特别在敌归巢混乱时，才能抓住弱点进行有力的突击，我们这次在襄垣五阳、潞城黄碾的袭击战斗，如有一营的兵力就可以打几个好仗。在合击圈外，每一地域的突击力量都是宝贵的，只有在非常必要时才得分遣活动，但分遣了又要能重新集结起来，以便于突击。这次某部队在西井、南委泉地带，集结了突击力量进行机动是对的。

（四）对敌占区奇袭的准备

这次奇袭长治的成功，在于摧毁了飞机、汽车、营房、汽车库等重要目标。今后对于敌人的军械、粮食、被服、仓库及其交通机关，军事、政治统率机关，配给机关，特务宪兵机关等的情形，在平时就该作周详的侦察研究，同时对于民众痛恨敌人活的事实，也要侦察研究。我们不但要准备奇袭所需要的器材与宣传品，而且还要组织使用这些物品的人，预行秘密的图上演习或沙盘作业。只有如此，才能在奇袭中取得军事、政治的奇效。指挥员的刚胆精明，机断专行，就是奇袭胜利的保障。

（五）在补给线上的活动

敌人在临时补给线，开始是前送粮弹，后送伤兵人员，最后多是后送其掠夺的壮丁、赃物，这是规律。因为太行地区是南北伸长的地形，敌人需要从东、西、北三面外补给，而以邯长公路（有时由沁县到武乡公路延伸）为“扫荡”太行南北轴心的临时补给线。但不管哪条临时补给线，都是依靠铁路的，而铁路又是敌人的基本补给线。我们在补给线活动，必须抓住这种规律与特点。

其次，摧击补给线的部队，在开始之时必须出敌不意，集结相当力量给敌人以伏击和袭击，以后则可以按各段之主要与次要，分配大小部队在各段分头破袭。不但如此，还要能集结大的部队机动突击某一段，而且有时还要更能集结一切大小部队突击某一段，甚至集结大小部队转到另外地方进行突击。集结的突击，特别在出敌不意之开始打中了敌人的弱点，是能取得奇效的。一般基干部队都要派出若干个五人至十人的便衣队沿路活动，尤以在两头担任侦报敌人来往与警戒者作用更大。对本地武装也要作适切指挥，配合动作。

再次，对铁路和公路补给线的摧击，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树林、高苗、滚石之类），要善于抓住敌人规律（如在休息、行军中，特别在归巢的运输队形非常混乱时），尤要善于使用武器。苏亭的伏击可说是兼而有之。特别是它预设的集团地雷、滚石，正适合于敌人此炸彼躲的规律，故收效很大。这是要发扬的。又如白晋线守备兵力不多，我们爆炸铁路要害，如炸官道铁桥是对的。对于一般铁轨可以容我拆走藏用的就不要炸掉，但偏有随便炸它而浪费炸药的。炸与不炸这要我们工兵预有计划与临时机断行事。对敌人的资财必须鼓最后一把劲去收集起来。如系民众失的财物应交还原主，特别是我们曾以此号召民众复仇，去追击敌人夺回人财。如属于敌人者，我们也要把生活用品着重分发给民众。民众帮助夺的军用品、文件，也要马上发奖。这些都是要事先宣布的事。

（六）跟着敌人的后面给以打击

从一方来合击的敌人，且进且击，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与各方来的敌人在腹地中心来一个共同的大合击。所以它是限时限地前进，不能随便在途中耽搁。它的残置封锁部队，除了封锁以外，还要警戒那合击者背后的安全，以免重演去年十一月长畛背中伏的惨剧。我们从敌人背后活动者要抓住敌人的这个规律与弱点，必须尽量跟踪扭击，使他无心恋战，把“且进且击转变为且进且挨打”。这次我们对于由潞城、黎城地带向阳高、马塔合击之敌，不但进行了跟踪尾击，而且在敌人回窜时也给之以沉重的侧击。这样配合腹地东西蛟、黄北坪、黄岩游击部队的反抉剔“扫荡”，形成了内外夹击敌人的态势。不过我们尾击敌人的部队是扇面的，还没有组成一个中心的突击力量，以致不能有力地扩张战果。对于敌人的残置封锁部队，应抓住它佯动的规律，突然袭击，一鼓而消灭之。如其坚守工事打不下时，则以小部队附以地雷、手榴弹扼要封锁之。我们主力不可被其抑留而放松了在运动中跟踪尾击那合击者的机会。

二　在合击地域的战斗活动

这次，敌人假定我们主力是缩入腹地中心作战，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规律，故从各方齐向腹地中心来了一个铁桶大合击。我们基干军队主力如能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能出合击圈外如上项所述者背击敌人，这是上策。如不可能时，则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即转出合击圈外，进行上述的作战，这是中策。如被敌人越压越缩，陷入四面八方来的大合击圈心，不管我们如何打法，是很难打得出好的结果来的。然而不管在任何场合，小部队必须到处与合击者接战。这种小部队的接战可以掩护主力真实行动的所在，尤其是在敌人闻枪声而集结的规律的条件下必须如此。有些人主张不留小部队在合击圈内活动，这是不对的。在敌人这样向腹地合击时，正是需要基干军队之一部，分遣活动于合击圈内外地域，领导腹地地方武装斗争，经过反抉剔“扫荡”以至追击敌人，这样才能与我圈外主力共收夹击之效。现在把我们在合击地域的战斗活动分述如次：

（一）反合围战斗

我们基干军队接敌侦察，无论何时都是必要的，特别在反“扫荡”开始之前，从“扫荡”基地侦报敌人动向尤为必要。当“扫荡”的敌人开始出动时，我军主力在小部队佯动迷惑之下，必须审核空间、时间，变更原来态势，进行机动，不作被迫的战斗。必须计算敌人一路局部的合击，服从于各路共同的合击，一路是不能单独变更总的路线和时日的。必须计算敌人各路共同合击圈直径较大，如在腹地只作近距离的移动是不易改善态势的。如果敌人业已接近，须作战斗的突围时，则应按当时敌我态势，以一路或数路从其接合部或薄弱部突围。假如不按实际情况而机械规定一定从敌后方，或我后方或侧方突围，那都是不妥当的。如果既已审慎决定从某方突围时，则应坚决实行之。这次太南部队在突围中遇到敌人少数残置封锁部队时，有畏缩转入敌大合击圈心而遭受过分损失者，有坚决突出毫无损失者。如果在日间突围而有飞机抑留之时，则我们应以疏开队形继续突围，以免坠入地上敌人的重围，遭到立体的合击。

另有一种战斗突围法是，在敌人从一方前进尚未构成合击圈之前，我们即靠近薄弱之敌（太南敌有小至一二百人一路者），以小部队接敌侦察牵引敌人，以主力在有利地形布置侧面阵地而伏击之，先给以短兵火力的痛击，然后乘其混乱之际分遣撤出转至外线。此时如再有外线部队夹敌作战，则可以收得各个击破之效。这次我们在太北和太南作战，曾将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地进行，一般是收到了成效的。总之，不管如何反合围，都必须以基

干军队一部（带若干干部）跨在合击圈内外地域，领导腹地游击集团与敌人夹杂相处，进行游击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地方武装的战斗活动与情报通信强化起来，也才能使合击之敌腹背受击，饿困不安。这次敌人以二万五千人在姚门口构成了大合击圈之后，我某基干部队留下的小部队，还是跨着清漳河岸伸入合围圈心，进行了有效的宽大的游击。不过，当时地方武装还未能普遍地开展游击与之配合行动，应成为今后加强之处。

（二）反抉剔“扫荡”

我们的反抉剔“扫荡”斗争，曾在辽县之麻田、梁沟，武北之西沟寨、青塔地区进行了，也曾在涉县之东西达城、东西蛟，林县之任村，平顺之侯壁、杏城地域进行了，也曾在赞皇之黄北坪进行了。这些反抉剔“扫荡”的斗争，即是基干部队的连排小部队、便衣队、地方武装与民众结合，在被合击地域进行的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当时敌我夹杂相处的斗争情形，甚至出现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条路敌我相混。战斗则采取机动的急袭、伏击、袭击、麻雀战及其分遣与集结交互实施之。这种斗争要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有时也可以在接合部袭扰，以造成两敌误会，自相厮杀；要善于使用地雷、手榴弹、土枪、土炮、滚石配合短兵火力的袭击；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开辟小路，缘索升降，夜间动作与封锁消息；要善于强化侦察通信与敌我识别符号。游击队的粮食要靠干粮、靠民众粮食与煮饭。这里边许多事，非基干部队、地方武装与民众结合一致斗争是做不通的。我在赞皇黄北坪附近铺设的地雷，炸死了鬼子小队长以下三人，于是敌人停止了抉剔。涉县东、西达城周围民兵与部队结合战斗，用地雷、滚石打死日伪军十余名，并缴获掷弹筒、步枪，而本身未受大的损失。徘徊鬼子兵也在我地雷爆炸威胁之下，每次前进时先令汉奸在前面用棍敲地而行，演成风声鹤唳的景象。其他地方反抉剔的好例子也很多。不过黄北坪、东西达城是敌人合击圈心，只要我们反抉剔“扫荡”得力，还能减少损害以至不受损害，其他地方也可想而知。即以梁沟地带而论，它是敌人二万五千人合击集中之处，抉剔力量是最大的，然而也并不是密如蛛网的。同时由于我们的反抉剔与空舍清野潜藏资财配合有力，损失也并不大。然而，也有基干部队由于没有与地方武装、民众联系，也没有研究敌情、考察地形，也不善于分遣、机断作战，特别是其干部缺乏坚强的意志，不富于游击进攻的精神，以致在反抉剔“扫荡”中受到了过分的损失。

（三）追　击

敌人通常是向各方同时作离心的撤退，时间与路线都是极易判明的。现在的问题是，要如何使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情报能够适时传送，如何使腹地的追击配合敌后补给线的截击，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例如：某部队于六月七日至八日在西井、三十亩、长畛背三次伏击南退之敌，某部队六月十七日在平顺伏击西退之敌，某部队六月十七日在东岗伏击东退之敌，某部队六月十七日在五里河伏击东退之敌，这些战斗都是追击。各路追击都有或多或少的地方武装和民众参加了尾击、截击，为的是要报仇，要夺回人口、财物，因而使疲惫的敌人遭到的伤亡损失也比前一段多。这时期，我们的兵力越追越集结，故沿途伏击与尾击也容易取得配合。不过也要注意防止敌人的诱伏、回击的搜索，但不可因此停滞追击。追击常送敌人回到老巢，子弹也常打到敌人所谓的“祝捷会”中，故政治攻势也须有一番准备。

三　我们需要提高射击技术和战斗手段

（一）射击与投弹

根据这次黎城、平顺、磁武民兵的统计：三十七发子弹或三个半手榴弹打中一个敌人，比二月反“扫荡”一百多发子弹才打中一个敌人，当然是有了进步。再根据某军分区报告：在寒王镇战斗，一百发子弹打中一个敌人。最后根据一个基干部队的报告：十三发子弹打中一个敌人，但其中还消耗了一些手榴弹和枪榴弹，未算入这个数目之内。

我把这三个报告公布出来证明，干部要认真提高技术，部队技术才会进步，并且我们的射击技术还不高明。今后战斗频繁而我军弹药无处可领，还望遵照师的指示，平时加强射击教练，在每一战斗结束时，具体检查成绩——这必须写在今后的战斗详告中。我在这次反“扫荡”中看到一篇日本军事论文，其中说：“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我们从精兵意义来看，应该说：“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名，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名”。特别在响应“每县每天打中一个鬼子”的号召下，越发需要如此。

（二）战斗手段

根据一个基干部队的报告，敌我伤亡对比，在伏击战斗中为六点六比一（即毙伤敌寇六点六人，我军伤亡一人）；在袭击战斗中为二点九四比一；在麻雀战斗中，为五十三比一。

我们在游击战争中的战斗手段，一般可归纳为伏击、袭击、急袭三种。究竟要使用那一种，当然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但在可能时，则以用伏击为好，麻雀战也应多以伏击手段实行之。如运用这些手段于空间来说，则打敌人的头部就叫做阻击（又叫迎击），打敌人的尾部就叫尾击（又叫背击），打敌人的侧部就叫侧击。我们要从哪一方去打，也是看其具体情况来决定的。不过尾击、侧击比阻击好，而尾击尤好。因为敌人眼睛在前，侧部与尾部的注意力差。但不管用哪种打法都要出敌不意，才能在游击战争中达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

我们在战斗无胜利把握时，必须避免战斗，但避免战斗必须准备战斗，否则在不意中遭到敌人袭击与急袭是危险的

四　侦察警戒

这次反“扫荡”中，有些部队干部配备警戒严密，在侦察研究敌情时，虽片纸只字也不放松，这是好的干部。但这种好的干部并不多，相反地，麻木而对新事物欠知觉性者并不少。从反“扫荡”起直到完时，懵懵懂懂还不知道打的对手是谁，对手是用什么手段来打的。于是，有的侦察员被敌人骗去了，有的在驻止时也不设警戒，或设警戒也不周密，步哨员也被敌人捉去了，或者擅自撤走也不报告，甚至有的县基干队在敌人到了其驻地宿营时还不知道，还照常吹起床号，惊动了敌人，致遭袭击。这些严重现象，指挥员光是“惊觉到了要转变”还非常不够，而是需要在教育组织尤其是在检查工作上，具体实行师历次关于侦察警戒的指示。对于经过教育仍不转变的干部要处罚。关于现在要做的具体工作，在前面已经说了的不重说，此地只讲指挥员立刻要做的事：

（一）健全侦察机构——检查所属明的、暗的各种侦察组织，建立经常收集与交换情报的工作，首先要求侦察领导者是“能考虑能实干的干部”。

（二）整理地方情报——各军分区应同县、区、村指挥部，整理情报通信网，首先从作战要线开始并定出其工作纲要。

（三）整理便衣侦察——基干军队的便衣侦察的组织，如连中有班，营、团中都有排，旅中有连，军分区有武装便衣队等，应作有计划的整理（有的是建立）与训练，着重抓紧现实问题，提高侦察技术，首先要以多捉俘虏，夺取文件，来代替那些道听途说的现象。

（四）建立情报整理工作——这就是把我们侦察得来的材料，经过分析研究，制出成品的工作。这首先要从军分区、野战旅司令部做起。只做二种：一种是敌情登记，另一种是敌情通报。敌情登记是根据敌人的师团、旅团的系统来整理材料，以便找出它所属兵种如何，番号如何，单位如何（从中队、大队了解起），组成如何（敌国何地人，或伪军何地人），隶属何人指挥，装备如何，战斗力如何，现在对付我们那个部队，如何行动。同时我们要把材料在何时、何地、用何手段取来的，可信的程度如何，都要附带注明。至于敌情通报，就是根据敌情登记，将其必要事项通报于相关部队。在通报时或用文字，或用标示要图，或用统计表格。总之以较易述明内容者而用之。至于兵要地志的整理法，师曾有专门指示。

（五）警戒——指挥员在演习尖兵、侦察、小哨、军士哨和步哨时都应该说明，如要掩护被警戒部队的动作安全，就要发生两种作用：一种是观察敌情的作用，另一种是抗击敌人的作用。指挥员要按敌情的缓急来决定警戒的兵力和范围。如在紧急时，应从九分之一扩大到三分之一的兵力设置周围的警戒，甚至在外层警戒之外还要前出侦察。另外还要派出直接警戒。无论何时何地，各警戒都要能“隐蔽自已，观察敌情”。而驻军警戒更要构筑工事。这些都是一般的军队的警戒规则。我们的小游击队对于本身的游击，不但要当作战斗手段，而且还要当作侦察与警戒的手段，因为游击可以察明敌情，可以避免敌人的袭击（游击无定使敌人无从捕捉、袭击）。游击队本身的警戒，必须在近距离内派出便衣侦探、潜伏哨，告以简明的警报就够了，它在游击区域依靠的是民众普遍设置的情报通信所，这也就是它的总的侦察机构。

五 通 信 联 络

我们是处在敌人突然奔袭、铁桶封锁、抉剔“扫荡”与敌我夹杂混战的环境，只有强化通信联络，才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斗争。除以前所说的旗语通信与递步哨仍需实行外，现在我们要做的：

（一）加强秘密情报通信所——这要军分区与县、区、村指挥部负责建立，首先就要把敌占区到腹地的作战要线上的情报通信所建立起来。这在前面已说过。野战军队对于相关的情报通信所，应经过军分区与它取得联系。如认为必要，并应以武装便衣队和通信工具加强之。情报通信所应向作战军队自动送达情报，同时作战军队也可向它收取情报。通信的记号、交付方法，都由军分区适时规定之。

（二）加强便衣通信——便衣通信员应选择偏僻小路送达文件。文件的交付如不能直达时，则可以通过情报通信所传达，或投入野外的临时信箱，由受件人去取。

（三）保护电话通信——电话线应架设在不易破坏的偏僻悬崖间，各局、所也要有潜藏的预备线，这是平时要做的工作。在反“扫荡”中，如认为线路有被人破坏的危险时，则由各局、所适时自行撤收，一有可能即可重架起来。各县、区、村指挥部要把保护电线的任务交人民武装担任起来，并实行惩奖规则。对于破坏电线者必须严办，并赔偿电线。

（四）敌我识别的符号——在反“扫荡”中应使用特定的口令、信号、标记、旗帜，作为敌我的识别符号。兹规定：县指挥部规定其与所属区村指挥部、县区两基干队、人民武装相互之间使用的；军分区规定其与所属基干团、县指挥部及县基干队相互之间使用的；军区规定其与野战军与军分区及基干团相互之间使用的。此外，地方与地方之间建立的联防制度，军队与地方之间建立的联系制度，彼此都应多用“熟人联络”的方法。

第四部分　民众性游击战争的组织和指挥

一　县、区、村指挥部是民众性游击战争直接的组织指挥机关

县、区、村指挥部是在军分区直接的军事指挥系统之下，组织和指挥所属地方部队、人民武装进行民众性游击战争的机关，同时也是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而成立的党、政、军、民联合办事处。各级指挥部，尤其是县区指挥部，有地方部队的县区基干游击队，也有人民武装的一般自卫队和民兵。这些队伍大半就是散居农村的老百姓。如果各级指挥部平时没有强大的组织训练工作，就不能指挥其进行全面的游击战争，而在配合正规的基干部队（军分区基干团、野战旅）作战上，又非有各指挥部的联系不行。所以各指挥部必须依托武委会来进行参谋与政治工作，而武委会主任除是人民武装的指挥者外，同时就是各该指挥部的指挥或主任，组织与指挥所属全部游击战争的助手。着重地说，各指挥部要有经常的武装建设工作，才能实施全面的全力的游击战争，否则临渴掘井，无济于事。边地反蚕食斗争之所以强，腹地反“扫荡”斗争之所以弱，就是地方武装建设强弱的表现。的确，腹地某些指挥部并未遵令经常成立起来，不只放松了经常的地方武装建设工作，而且也放松了民众游击战争的指挥责任，甚至有的在反“扫荡”中找不到人，民众无靠，基干部队“裸体跳舞”，连救护伤病员与粮食柴水也无着落。当然军分区疏于督促检查是其中原因之一。所以我们曾指示腹地各该指挥与主任，应以其平素三分之一的精力做经常的武装建设工作，在反“扫荡”中亲自指挥游击战争，反对以“挂名”两字卸责。经验曾屡次告诉我们，各级指挥与主任在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不认真培养与指挥所属军民武装斗争，则日寇汉奸就不许抗日民主政权存在，民众生命财产就没有保障，民众就要鄙弃你，敌人要摧毁抗日民主政权，成立维持会，没有一次不是首先摧毁游击队和民兵的。这证明抗日民主政权有了武装才可以得到支持，也才可以对日寇、汉奸实行专政。例如这次涉县西辽城有了好的民兵，而维持会就不敢发生；白干水的民兵也很有力量，配合营兵摧毁了索堡的维持会；下温村、长乐的民兵就无力，一到维持会成立时就垮台了。如果是政府干部领导民众作武装斗争以保护其生命财产，那民众是坚决拥护的。南庄村民兵听到村副王守廷被敌捉去刺伤了，就马上夜袭寨上，把他抢救出来。

二　县区基干游击队与人民武装的组织与装备

现在无论是什么武装组织，基干游击队也罢，自卫队、民兵及其武委会也罢，它们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干部问题。“干部决定一切”，武装是森严的斗争工具，而武装组织比其他组织干部的作用更有森严的意义。这次武委会在反“扫荡”的总结上说“民兵干部的改造应当是坚持游击战争的关键”，我是完全同意的。我认为干部（不只民兵）的选拔，一方面应由基干游击队和基干军队（军分区基干团及其所联系的野战旅）供给以锻炼过的本地的优秀干部；另一方面主要的还在于每一民众组织，尤其是武装组织，在斗争中认识干部、提拔干部，这是一个最科学的知人善任的办法。这次在执行政府法令、反维持与反“扫荡”的实际斗争中，确实发现了与群众血肉相连、忠于抗日民主的英雄。我们一定要提拔这些经过考验的英雄，去代替那些高其身价、脱离群众、避战偷生的角色。即使这些英雄的文化、军事知识少一点，也绝不可轻视他们，而需要耐心地培养他们。由于分散的游击战争，村的武装干部及其他排、连干部，都需有独立斗争的技能。或以巡回教育与轮番训练，或以就近的残

废、退伍军人帮助训练，以培养他们的技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们太行区提拔培养本地干部的工作是不够的，今后不要再放松了。

其次，就是武器装备问题。县区基干队、民兵、自卫队如有现代步枪者，应好好掌握在忠勇可靠的人们手中，不要丧失给敌人来打自己。这是目前一个要紧的问题。武委会已有专门的指示，而军分区也应实现师规定的负起人民武装的武器管理的责任。我们对于那些没有现代步枪者，除借用那些藏在根据地的枪枝以外，还应照党中央的指示，收用土炮、土枪、刀矛、弩箭等旧式武器，罐子抬枪、马子前膛枪，还可以自己计划制造一点。这些土枪可特别用于火力袭击和箝制敌人。弹药到处可造。特别现在弹药缺乏，而在重庆[3]三年不发我们一粒子弹的状况下，是必要的。且利用这些土枪，可以夺取敌人的快枪。我们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就是菜刀和撅把子起家的，这是活的榜样。现在我们是如何使参加武装的民众都有武器使用，不致徒手奋呼。对那些说“坏的武器不顶事”的，就应该拿这两个师起家的历史，以及在敌后抗战也曾以矛子夺得日寇枪炮而发展了许多部队的事实说服他。这首先要克服某些干部唯武器论的取消主义的观点，揭破日寇汉奸等维持其反动统治的狂言。夜间动作以白刃格斗为常，大刀便于在碉堡内使用，矛子便于在野外使用。就是白天，这些白刃与地雷、手榴弹、土枪、现代化的火力配合，收效也大。苏联红军有了高度的技术兵器，现在还提倡白刃格斗，并不是奇怪的事。南委泉口喊没有武器使用，反把土枪毁做铁器使用，是不对的。手榴弹、地雷效力较大，制造也容易，应该有组织地大量制造，而使用之于打击敌人真正有效的地方上去。某军分区的手榴弹、地雷以及步枪等并未适时发给游击队、民兵使用，而被敌人搜去，这是错误的。总之，不管使用怎样的火器或刀矛，个人都要熟练到自信能杀敌人时，才有用处。而且每一个武装组织，都要根据它的战斗任务把各种武器作适当的分配，使其能利用地形在短距离之间突然战斗，一齐发挥火力与劈杀的作用。

三　分工与备战

通常自卫队着重担任一般抗战勤务，如抗日戒严，一般的情报、警戒、联络、除奸、防谍，以及救护伤病员和掩护老弱民众转移之类。民兵主要担任战斗，其次才担任一般抗战勤务。至于县区基干游击队，当然是担任战斗的。平时的教育应该适应于这种分工而进行之。

现在的备战，因为敌人之扫荡频繁，如戒严、防谍、联防互助、空室清野、潜藏物资、储备柴水用粮之类，几乎都应做经常的初步工作，只需在“扫荡”征候形成时，去完成而检查之。至于担任战斗的队伍，则应在反“扫荡”前到实地考察地形，预料敌人如何来，我们如何打，测量距离，设置标帜，开辟机动小路，准备缘索升降地点，堆积滚石，安置地雷。这一工作特别在敌人可能合击的地域更要做好，必要时还要演习一番。在备战时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事就是：分工担任转移老弱者，要在敌人到达村之附近等处时，才开始向预定地点分散转移；而分工担任战斗者，就要去扭住敌人战斗，不要消极避战，其他一般抗战勤务，特别是情报工作，还要适应新的情况继续实施，当我任何营兵到来时，更要自动去配合作战。总之，不让敌人任意摧残，不让抗日军队独战无助。那些光做老弱转移工作，而不积极向敌人游击者，结果只有纵容敌人摧残。“无角绵羊被欺压，有蛮的蜂不可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四　指挥部的指挥

县、区、村指挥部对于民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分割指挥的，而且是用训令的方式。由于所

属武装，特别是村的武装，散布在宽大地面独立游击，所以县、区指挥与主任必须亲率自己的基干队辗转到各区各村作突击的游击，同时指导他们作军事政治的斗争。为要不断地与上级、下级、友邻各方联络，为要不断地侦察敌情，必须在自己地域内的几个要点上，设置相当固定的秘密的情报通信所。该所是由一至三人组成的。通信联络方法，相关双方应事前规定之，以免被敌人捕捉陷害。

凡各处分遣到各县的干部，或略等于一连以下的部队和机关，都要接受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其能力强的干部则参加县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其活动区域与方法，由县指挥部指示之，不得违误。这些干部和部队，最好是与该县联系之干部和部队，平时就应取得工作互助的联系。

军分区基干团长与野战军营长以上的干部，率队到该县境内活动时，可以指挥县属一切武装配合作战，但应经过县指挥部令行之，并由县指挥部派出随军代表，以便保障配合作战和军队生活问题。

这里附带要说的就是，基干军队要经常到联系县帮助地方武装的建设工作和民众工作，如此才便于在战斗时协同作战，才易于打破日寇、汉奸和民族败类离间军民团结抗战的阴谋。

第五部分　统率机关与资材

敌人对于任何抗战的统率机关，都是奇袭捕捉，从来没放松过的。这次我们统率机关又成为敌人合击的主要目标。为要发挥指导作用而便于分遣游击起见，我们的统率机关必须做到短小精干，成为战斗的组织，马匹还要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免累赘。本身的组织应分为前、后两梯队，前梯队是限于战斗指导必要的组织，其中一部分是指导人员，另一部分是警卫队。警卫队能战斗，而指导人员也能战斗。后梯队是分遣活动的组织，其中一部分是独立游击的单位，另一部分是到地方参加游击或做工作的人员。这些分遣活动的组织，平时就应与相关地方机关建立联系制度，做联系工作，以免临时凿枘不入工作不合手或累赘地方。后勤部门除往前梯队派代表外，本身是属于后梯队的组织，力求民众化。

资材应分散潜藏于使用者的附近，规定取用手续，并要绝对秘密，每处只限上层二三人知道。

无论前梯队或后梯队，对于战斗警戒、侦察联络等必须练习，对于活动地域的地形、道路和民情必须研究，对于战斗生活的装备必须预备。某些同志生活于敌后抗战的环境中，口喊党员军事化，而不懂军事，也不参加军事活动，是不应该的，是要实际改正的。

最后一言：

我们打仗是一件胆大心细的工作，对于敌情要不断地侦察、研究和判断，才能适时定下正确的决心。决心定下之后，就要坚决实现之。这样才能成为有勇有谋的指挥员，我们要把这次反“扫荡”中那些善于搜集、研究与判断敌情和坚决实现正确决心的作风发扬起来，反对主观主义的作风！

〔注释〕

（1）集总，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亦称八路军总部。

（2）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3）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曾经迁往重庆。这里的重庆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关于太行区反蚕食斗争的总结报告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二九师政治部

一、太行区敌寇的蚕食状况：

由于太行区敌我力量对比在各个地区间之不平衡，又由于各个地区的工作发展之不平衡，因之敌人在太行区的蚕食，表现于地区时间上的，也是不平衡的。

1、在一分区。平汉线方面，敌为报复去冬的平汉大破击，于是在我破击后将井陉变为无人区，并开始准备筑第三条封锁沟。总计从一月开始到六月为止，敌在一分区接头扩大维持的主村，有三四十村。形成北至元氏仙翁寨，经赞皇南北潘，再南至临城之魏家碑，以迄至内邱之神头的一条线。又在三东方面，如昔东，自今春迄六月，维持者达十八个村子，皋落敌能经常活动，我已处于秘密状态，于此亦可窥见三北的危机。

2、在二分区。到五月为止，我始终处在敌进我退的状况下，特别是榆社打下钉子后，二分区可以作为根据地者，仅只纵横四、五十里，甚至离石拐仅八里之横岭一带亦形维持。

3、在三分区，以二月扫荡后为最严重时期。襄垣维持至西营，全县仅只六个自然村未维持，而此六个自然村，实际有四个也已经暗中维持。其次，又因榆武、榆辽线的打通，影响讲堂区，二十一个编村，除郭郊疙瘩滩等五个村子未维持外，全部维持。在武西在今年一二月间亦几全部维持。

4、在四分区。主要的是在今年二月扫荡中，一度酝酿了严重的维持空气。到五月扫荡时，除长治方面，全部维持无我政权外，平顺五区（为敌我相争区）计公开维持十一个，半公开五个，暗维持一个，占全部村庄四十五个之三分之一。壶关一区有自然村七十二个，维持者达四十余村。但其中我白天能去工作的有二十八个，完全达不到的十余个，有二个还能去工作。潞城则情况最为严重，县府经常被袭，我们所剩之根据地，仅靠近山之李庄一带，大部皆形维持。

5、在五分区方面。亦以二月扫荡后蚕食空气最为严重。如武南方面，因该次扫荡而进行维持者达十八个村。三月，敌人为了更进一步的蚕食我根据地，在崔炉建立了据点，发展维持村达二十七村（二月时十八个村在内）。到五月扫荡时，因敌威胁加大，这时武南在五十八个自然村里，仅有三四个村没有维持。至于磁县方面，由于工作较好，故敌发动维持困难，但在二月扫荡后，亦一度推进至贾壁。安阳则因环境特殊，目前还在进行局子统治工作，还未达到如其他地区之逐步蚕食的境地。

6、在六分区。于平汉大破击后，敌即积极在暗中加强蚕食政策，如组织柴关暴动等。及至四月十三日，敌以雄厚之兵力强占全呼、功德旺、御路、九庄等后，建筑了第三道封锁线，使沙河全县沦为游击区，大部进行维持。至于武北，在五月扫荡时，亦几全部维持。

根据以上的情形看来，我太行区在北局反蚕食斗争指示发下的前后，其局面是相当地严

重。除三、四分区及五分区磁县、安阳较形和缓，极少的个别地方在好转外；诚如指示中所指出的，存在有“目前全华北敌寇蚕食我根据地的严重局面，与某些根据地敌进我退异常严重的局势”。

这种形势的造成，除指示中所提出的，是由于“我各方面给敌以有效的打击不够”外，另外亦是由于我们过去工作的不深入，特别是没有发动基本的群众，但其他亦还有主观上的原因：

1、我们在执行去年中央提出的两面派政策上，发生了严重的偏向，把两面派政策是放在敌占区的这个方针，却引用到游击区和根据地上来。例如昔东反蚕食斗争中逮捕维持分子七十七名，而其中四十四名皆为抗日干部允许其维持者。又如×县县长公开在群众大会上讲××可以接头。×县在群众多数不愿维持下，却由领导者去接头。因此，群众悲叹，声言“县长不要我们了，抗战五年又当汉奸”。使维持局面，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这些就都是对执行两面派政策发生偏向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2、党政军民，特别是政权的下级还存在着关门建设的思想，一切工作还不能和对敌斗争联系起来（如今年简政时，武东政府光做简政，到根据地就去开了半个月以上的会前方无人办公，弄得武东局面日益严重）。因此平时既缺乏对敌斗争的思想准备，一到局势严重就变成悲观失望，到处都充满右倾情绪。襄垣在三月时，就是右倾情绪高涨的时节。甚之如目前之六分区，除武装还敢到敌占区去以外，政权就根本不敢去，更不用说到封锁沟东面去了。这种事先麻木不仁，事后悲观失望，对我们工作给了很大的危害。

上面二点，我们在主观上所犯的对敌右倾情绪，错误的两面派政策之执行，其危害于工作是非常重大的。因此，不认识主观上所犯的错误，一味强调客观原因，那么其结果将得到工作上更严重的损失，而且事实上亦证明了我们一旦纠正了这种错误（详第二章，我们反蚕食的收获），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因此我们在这里特别来强调提出我们在主观上的错误，这是真正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二、我们怎样执行反蚕食政策的指示？得到了些什么收获？

1、在北局、野政反蚕食斗争指示发下之前，由于太行区已存在着严重的维持局面，因此，各分区在不统一的步骤下，或者以临时的布置，都也在或多或少的进行着反蚕食的斗争。诸如四分区在五旅、一旅配合下，于二月扫荡后对平顺五区进行反维持的斗争；五分区对贾壁维持的镇压；一分区对二月扫荡后元氏、内邱方面维持的镇压等。这种反蚕食斗争主要的是临时救急性的，没有在观念上完成一系列的反蚕食的具体政策，更提不到有计划性和统一力量与步骤了。只是三分区襄垣的反蚕食斗争，才是在上级领导机关敲醒了警钟以后，并是在上级领导干部直接的领导下，进行全面反蚕食斗争（当时曾摧毁了维持村六十个，将二、三、四、五区首要汉奸均行捉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反蚕食斗争指示发下前，我们反蚕食的斗争，主要的是临时性、应急性的，是在观念上还未确立一个明确的工作范畴，而因之也就无更实际的一系列的具体政策。

2、当北局、野政发下反蚕食斗争指示后，我们曾召集了党政军委员会进行讨论。讨论的中心是我们区应怎样来进行反蚕食斗争，特别对政治与军事的有机联系。指出敌后抗战政治斗争为主要战略的方针，而在策略上，军事与政治孰为主要须视具体情形才能决定。特别决定了我们之反蚕食斗争，必须走群众路线，与中央新决定的土地政策问题联系起来。最后是，特别强调党政军民的团结，克服过去存在着某些互相埋怨及各自为政的现象。这些新的

补充，我们拟写成为补充指示与北局的指示一并发到下面。

根据目前的检查，各分区在接到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以后，也都进行了党政军委员会的讨论。军队方面甚至也有单个的关于反蚕食斗争的军事指示及锄奸指示等发下去，并且也派一定的专人去到下面主持斗争（如一二三四分区一旅等）。但另一方面，缺点也是有的。诸如有些分区级的讨论、还偏于指示的研究，没有作出何处该打断维持，何处应该掌握，在锄奸上又该如何等的具体规定——而这些具体规定，大半是依靠地方党在县委决定的，因此在动用力量上，军队配合就不够。主要的是武工队参加，甚至有独立营力量都未动用的（如五分区）。又如一旅在潞西的反蚕食，未和分区级交换意见。他如动员传达的不深入，未完成到营的现象还是有的（如六分区）。但总的说起来，我们太行区对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是已掀起了全体的注意。并且确立了对这一政策的一系列的认识以及具体的实施策略，以至在各分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蚕食斗争。

３、我们在太行区所展开的反蚕食斗争究竟收获了些什么成绩呢？根据已有的报告，可以得出如下的统计：

一军分区：锄奸二百零一名（内汉奸四十一，密探八，叛徒一，伪村长七十三，情报员二十二，伪组织二十八，主动维持四，伪代表四，伪自卫团长十，伪先锋队长一，伪自卫团员二，其他七），此二百零一名中在敌占区者一百一十九名，其余为接头区，而昔东之七十一名中全为接头区。

打断了接头村三十个（内计内邱四，临城四，赞皇二，元氏七，平东二、昔东二，唯其中元氏打断后又重新接上）。

争取两面派之村子三十一个（内元赞二十，昔和四，井平七）——经敌工站系统者不列在内。

建立内邱、元氏敌占区秘密游击小组×个。

二军分区：锄奸五十六（和西五十，辽西三，昔东三）取消维持村四十（和西三十，辽西七——八）发展群众武装，马坊区干队新增二十，在寒王组织青年便衣队。

三军分区：锄奸九十（襄垣二十，二、三、四、五区首要汉奸都捉到了。榆社十，武西五十三，武东五）。取消维持村计：襄垣六十（自然村在内），榆社七十八，武西十编村。并有七、八个村转入秘密状态。甚至在榆武公路上，亦有一小半村子多半出自自愿的，不维持敌人。解决土地问题，襄垣达千余件，武西三百余件。

四军分区：锄奸三（潞城县枪决三）摧毁伪组织三十五（潞城三十一，平顺四）掌握敌占区伪组织二十一，参加武装自卫队四十。

五军分区：锄奸：枪决主动犯六十五人，辑获有政治背景土匪十一名（枪决五名），有四个土匪自首，有二百一十维持主动犯自首，缉获敌探奸细二十四名。摧毁维持会三十九（主要是武南，包括游击区、根据地）没收维持犯土地三十八亩，牛三头，罚款十万五千零四十元。

六军分区：发展地方武装，三区区干队发展三十名，二区发展十八名，册井民兵始终在维持下不退却。

从上面的工作统计看来，我们反蚕食斗争的成绩，最显着的表现在反维持斗争上。这是由于敌人的蚕食政策，其基本目的是“变点线占领成为面的占领”。为此，敌人的蚕食政策不论其手段方法若何，其最基本的方式即是怎样巩固与扩大伪组织，并经过它来实行统治与

维持。因此，在我们反蚕食斗争中，就必须以反维持与掌握维持成为这一斗争的基本焦点。其他的斗争都是环绕它来进行，或者通过这一斗争而开展的。那么反维持斗争究竟怎样来进行呢？

（1）首先确定一个划分地区的原则，就是确定何处不得已须允许维持，这当然主要的是依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及工作深入与否为原则。但大体上，在我们太行区有几个大同小异的分类。首先在一分区由于有敌人封锁沟的建筑，故敌我局面比较清廓，一般封锁沟内我无法取消维持。对封锁沟外，估计被我取消维持会后能够巩固，特别是根据全区斗争形势判断，在地势上的重要性，是否关系全局为敌我必争之重要村镇，以之来确立取消或掌握的规定。

在三分区一般的确定：据点十五里到二十里地以外，一律打断维持。但也有例外，如祁县则依据平川与山地来分，又可在工作好的地方则仅只六七里如××据点。但在敌占区与我新收复根据地之间的游击区，有些地方设立缓冲地带，采用断续维持，暗维持的形式。

在四分区潞城方面，大致与三分区同，而在平顺则几打断到离据点十里至十五里。在六分区是规定据点外八里一概不准维持，八里外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断续维持以及用“五步措置”（详三节）对待之。

（2）根据上面划分地区的原则，我们就应召集当地之党政军民机关，共同讨论确定在何时何地集合力量配备各色干部，进行动作。首先1、应把先动手打断的村子确立适当，先动手打断的应是主村，（在当地能影响其他自然村及编村），特别是能立即发动起群众进行斗争，不然目标确定得不洽当，打了又暗地里去维持，可以影响整个的斗争情绪；2、进行对该村的详细调查，谁是该村的维持者，谁是背后唆使者，谁是坚决的汉奸，谁是被胁从者，并须调查村内民众的情绪，伪干部之间的矛盾；3、在村内派去工作人员进行鼓动制造舆论，指出维持下去也是活不了，我们从维持起出粮出款，差多少？吃了多少？使群众同情不维持，有了思想准备。同时除这种地下宣传以外，还可以经过可靠关系请村中有地位者吃饭，解释取消后政府准予悔过，以之分化其团结。但不能因此提出“争取维持会，团结中国人”的口号，（如四分区）应提出政府是“反对维持会，但团结中国人”，把具体的策略与原则对立起来也是不妥当的。其次，应争取曾被敌人殴辱的伪政权人员，使他也不愿维持。如土坡村长曾被敌人殴打二次，我经过其丈人，说服他回心不维持。另外还可以临时组织灰色团体，团结一部分进步的人，如四分区平顺五区曾组织忠心保国组，在群众中起了核心作用（襄垣亦有此种灰色团体）。这些都是为了在村内潜伏我之力量，以作发动时的内应，并使坏分子崩离瓦解无以应战；4、进行了以上的布置后，就集中力量同时进行逮捕，发动自首，必须捉到真正的主谋者。根据经验，各县所捕者，很多都是自己抗日干部受坏人唆使登台，而坏人则逍遥法外（昔东所捕者三分之二左右为我抗日政府允许维持者，有些逮捕来后，不知何罪，要求快受训，快放回，说：村公所公债还没有人保存等）。对主犯必须枪决，没收财产，如武西枪决一个真正作恶的汉奸，五里内村子群众都到，十余里外村子亦到代表，人人称快。又如五旅在武东枪毙了一个汉奸，人心大快，群众说“干坏事总没好下场，该报应”。至于自首应视其情节轻重，分为向县、区、村三级政权出头，但释放时应经过群众路线，取保释放，特别注意这些人在过去反维持斗争时，曾经自首过没有，如曾经自首过则这次应加惩办；不然自首就毫无意义了。最好能办一短期训练班，加以训练后再释放。（四分区曾进行过）对那些无辜被误抓的自己抗日干部（昔东有十四个）就应很好说服，劝慰，并对他说是某某（可以指定村内坏人）陷害，使其不恨政府仇视坏人。对那些被

敌人关在据点办公的维持村长，可命其家属限定一定时间通知他回来自首，不然亦依法懲戒。实际上只要这个村子已经脱离维持，他在据点里就不起作用，并因害怕我政府法办自然多能乘机逃来自首；5、村内坏分子既然镇压，但这绝不能认为反维持工作已告完结。如昔东以为捕了人就算完事，结果群众逃避一空，村子变成死村，稍经敌人压迫，又恢复了原来的维持局面。因此捕了人仅是工作的一个初步段落，这时在武装斗争上，我武装力量应积极在该地区或向前积极活动，以之安定人心，镇压敌人爪牙，与防备敌之报仇反扑。如我在三分区襄垣反维持时，除独立营外，并以一旅一个营，及武工队等长期在当地支持。在四分区平顺五区反维持时，亦以三十二团一个连，一旅一部并独立营武工队、区干队等在当地支持，由于在军事上接连打胜仗，大大提高了人民情绪，并随之组织扩复民兵，而以民兵单独击敌，曾将敌击退六次，这样就掩护了我们的政治斗争。此时，我方党政军民干部应当在村住下，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第一、是恢复各种抗日组织，特别是政权及民兵，政权在有把握的场合下，可用民主大会产生之。第二、发动清算过去维持的账目，从事实里去得出维持的害处，并将没收汉奸主动犯之财产及罚款偿还群众。第三、建立哨岗情报，实行空室清野，与同时取消维持的他村建立联防。第四、随时注意搜集群众反映，揭发坏分子从中的破坏与谣言，深入两年胜利的宣传，坚定信心。第五、积极乘胜利时机向前推进掌握前面敌占区的伪组织，以之掩护与巩固已得之阵地。第六、在反维持斗争中，一定要保守一定限度的秘密工作，不要使支部同志及坚决的抗日分子全部暴露，引起坏分子集中力量来进攻他们，特别是为了避免在此后情况恶化时，不能隐藏遭受损失。

以上是打断维持村的步骤与作法。

（3）打断村前面的游击区内接敌占区的村子，这些村子，过去是敌我互相往来，维持既公开，抗日亦公开，敌我比重，或降或升，看谁掌握得紧工作做得多。为此，对这些村子，我们的方针，一般把它作为缓冲地带，争夺其成为秘密维持，时断时续。争夺的意义，是在于使他对后边的切断维持的村子起屏障作用，如一条堤防，以防维持之洪水泛滥后方，另方面是为了拖住前面维持村的尾巴，使它有所顾虑，并容易进行合法斗争（因为后方既是游击区，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他就可以借口说抗日政权时来"捣乱"，因此对"皇军"不能尽心对待），特别是这些缓冲地区，如一旦公开替敌人出力，则前面的村子就非更替敌人出力不可，不然敌人绝不答应。最后是为了维持既是秘密的，则抗日变成合法，对我大大有利。所以在敌占区，必须争夺到这种秘密维持地带的村子，以起上述的三种作用。

当然，这种缓冲地带（各分区都有）的发展前途有两个，一种是逐渐走向公开维持，一种是走上完全切断维持，这须视我们的工作得宜与否来决定，在三分区对于这一地带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处理办法。

1、维持是不合法的，秘密的不得有任何形式，政治上我公开反对维持，维持会是汉奸机关。

2、反对任何伪化，同时不太抗日化，村里不准有反共或抗日的标语及汉奸文告，我们一般也不在街上写大标语，只贴布告，不准专设伪村公所，但抗日村公所也不讲究"抗日摆设"。

3、居住证、身分证明书予以没收。

4、不允许村内去人到敌方受训；不准设立伪群众团体。

5、会门予以解散自首。

6、汉奸票子一般的不得在群众间行使，按村中贸易情况，有些地方没收，有些地方限

期预换冀钞。

7、财粮、情报、民夫，不得公然资敌，我武装截回的粮顶公粮（已缴公粮的则发还）民夫放回。

8、新民小学准设立，但不教授伪课本。

9、维持会由抗日村干部掌握，开支应有规定。并得清算。

除了以上消极方面以外，并从积极方面进行：

1、加强民兵与游击小组，打击汉奸便衣，设立岗哨；

2、加强情报，与前面维持村约定供给我方情报，防范敌之突袭；

3、发动群众，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只有经过上述方针，并积极提高这些地区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一面克服批评其落后的一面，这样才能使暗维持，不致走向公开维持而走向切断维持，由于这些地区是争夺其成为如此，因此对上述方针的实施，也是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力求全部实现。

以上是对于秘密维持的一般作法与步骤。

（4）对敌占区的伪组织，我们施用革命两面派的控制掌握政策，但这种政策的具体实施，在各分区也是不同的，一般可分作对据点伪组织掌握与据点外伪组织的掌握二种，并且应善于去利用其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各个维持会自身的矛盾来进行掌握，且使之融为一体来对付敌人，根据六分区群众的创造，曾有这样的经验。

1、首先对付村内之本身矛盾——对旧势力与恶势力的斗争。亦即旧的封建势力及国特分子企图霸占政权，驱逐抗日分子，到处散布空气要抓抗日干部，向敌报告民兵。于是民兵与该村干部则亦扬言威吓说："谁愿意拼，老子没几亩地，没几间房，穷小子比不上你老财，你能靠老日子，但老子能自己干，反正还有条枪，拼就拼吧！"接着民兵就抓了一个维持的，吓得旧势力立刻分化，并找抗日政府调解，这时政府就出面调停，要求双方协同对付日寇，自家莫起纠纷，于是那些最顽固事敌的人就孤立无援，结果跑了，而村里进步分子及其家属未受损害。这个事实是说明要怎样掌握与调剂其内部矛盾，与如何的发展进步势力，以这来进行掌握。其次据点伪组织与据点外的伪组织，他们之间也时起斗争。因为据点外的出款等皆由据点内派出，并且派得多，如果外边不出，他就向敌人胡报告。外面对付的办法，就是出得拖延迟缓，叫敌人责罚他。另一方面则报告抗日政府带人去抓（在沙河曾抓过几次）。这样就能使他摊派有分寸，并且须将里面情形也向外村传。这就是具体运用掌握其矛盾，调和之，使其一致对敌的一些办法。再次对这二种伪组织的掌握，根据经验，应首先把据点的维持会掌握起来，因为外面属他管，并且经过他可以了解外面的坐探便衣及暗维持会等的动向。掌握的办法，除自己打入干部，原先未沦陷时布置等外，并应在据点内表现我们的力量，如沙河政府曾在八里庙枪毙了一个汉奸，吓得功德旺、全呼的伪组织都派人来联络。其他并应掌握该据点之所有便衣密探，限制其活动，以封锁敌人耳目，这就是一般的掌握控制的办法。但另外我们工作好的地区，如三分区还有一套具体的办法——而且是有组织保障的办法。这即是设立联合村长制和联合校长制。亦即在敌占区，其接近之几个编村，我们编成为联合村设一联合村长，设一联合校长，同时各村内，亦设有数目不一的不脱离生产的抗日副村长，协助联合村长工作，这些工作人员之进行工作，一律通过伪组织的小学之形式来进行，但他们自己不兼伪职（伪干部我们亦不给抗日名义）。联合村长的三大任务是：1、掌握维持会定期清算账目，保障抗日人权财权，对敌进行合法斗争。2、完成上边规定

之任务。3、解决人民纠纷如土地、婚姻、租息等问题，特别是过去曾是根据地的村子，一定要保证过去抗日政府的定案，如合理负担，已清理之债务土地问题等，不得因为敌占区而翻案。而抗日联合校长之三大任务是：（1）掌握新民小学，（2）展开对敌思想战，搜集敌文件散发我文件，宣传我主张，（3）团结知识分子及文化人。这种设施在三分区已收成效。东村、段村、王家、柴家三个联合村已开始作为抗日政权而活动了。

另外在四分区还有一种作法，即敌占区维持会长每月须换人，财政不由会长保存，由书记处理起粮款，亦于月初按合理负担取齐。每月换一人算一次账，以防止贪污并不使伪村长与敌人建立密切关系，现也收到一部成效。

当然以上各种做法，是对新沦陷为敌占区的伪组织及我有相当工作基础的地带之作法，如过去未给我洗礼，及我工作薄弱地区，那只有采用我们过去曾在敌伪军工作内总结过的一套办法了。

（5）当敌寇蚕食进入第三阶段，我作退却时，我们的反蚕食办法又该怎样呢？这在六分区曾创造一套“五步措置”的对付办法：第一步是不管敌人采取什么方式引诱维持，应置之不理，但暗中进行布置工作：如将来谁出来维持，敌人真来了怎么应付；并把国民誓约给群众看，立下思想准备。第二步是写信给敌人，说明不能维持的苦衷——抗日政府不许，军队不准，群众穷苦。第三步，派人送些小礼物去诉说困难。第四步，正式维持给敌人送东西时，派队伍去截夺。第五，捕捉主动坏分子，求得又重新打断。打断后又用上面办法。对于群众的教育，与节省民力、财物有很大益处。如安河距敌五里（有二百五十户）册井距敌三里（八百余户）前者由于掌握不紧至今资敌九万余元，后者因施用上面策略则只用去七万余元足可证明了。

以上是我们太行区反蚕食反维持中对各种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所施用不同作法，及其收得的成绩。至于在反蚕食斗争中其他方面的工作，由于我们这一时期主要的是反维持，因此还不能作出全面的总结。

三、反蚕食斗争中几个主要的经验教训。

1、在反蚕食斗争中，必须首先肃清干部中的悲观失望情绪，认为敌人力量远强于自己（不估计到我们在政治上的优势）。因此，万事感到束手无策，而敌人就更显疯狂，襄垣与沙河初期的严重局面就是这样地造成的。同时这种右倾情绪，表现有二个方面，一个是认为无法支持，不分皂白，立刻发动维持，以为就此来进行合法斗争。殊不知我们之采用革命两面派政策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才实行的，一旦公开维持，我们就变成非法，对我们利少害大。且这种很快出现的维持，能大大的减少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无法从实际斗争中教育群众，要想此后做出很好的合法斗争也是不可能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另一种表现是反正这块地方支持不下去了，不如索性痛快的干一场，无计划无步骤，不考虑敌我力量的乱捉乱打一起。结果，今天打了明天又恢复，弄得群众怨声载道，相率逃奔（在昔东就如此，群众都逃往和顺、河北）而我们干部亦因此而更加束手无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又一面。为此正确的估计敌我力量，认清我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把握反蚕食政策的武器，才是改变敌我形势的转折点。这次太行区反蚕食斗争的普遍开展与胜利，主要的是正确的掌握了北局、野政和师的指示，转变了过去的右倾情绪所获得的。

2、反蚕食斗争必须经过群众路线，不能单单视作群众问题，认为捕杀几个维持犯，即等于取消了维持。过去我们反维持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如一分区去年曾捕人达千余，但反维持局面仍未好转。而今年反蚕食斗争能够巩固下来，就是由于我们的斗争已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而是有群众作为我们的依据，并成为我们的力量了。不过这种发动群众来参加反蚕食斗争，则必须从解决群众切身问题里去造成，如襄垣在这次反蚕食斗争过程中，解决群众问题达一千余件，与去年三十件相较，何止天壤。因此襄垣的反蚕食取得胜利（虽经这次五月扫荡仍能向前发展），就是这个道理。相反的，不能很好的经过群众路线，自上而下的强制来做（如武南等地），结果群众既不能自动参与这一斗争，并且还口出怨言，甚至认为：我们"政策变了，从前政府不管我们，现在又来捉人罚款，真没法。"有的坏分子甚至造谣说："看吧，我们都得挨收拾"。如此的反蚕食斗争，是不会得到好效果的。当然，在反蚕食斗争中，锄奸问题是个很紧要的工作，正当的逮捕主犯，经群众公审枪决，则能大大提高群众的情绪，显示抗日力量，并可镇压坏人及敌之爪牙。但是必须做得适当，不冤杀好人，不多捕、不多杀，象武西就显得杀多了（有一次要杀八人，实际只应杀三人），引起群众惶惶，应引为警戒。

3、反蚕食斗争需有详细的调查，很好的步骤，不能任意冲动来做，特别是当群众觉悟程度不高时，更须耐心的教育，和及时根据调查所得而进行解释。这种教育，一方面是指出前途的二年胜利，及对抗日力量之信心。（如有些地方经耐心教育后群众说："反正二年能胜利，咱熬也熬过去""抗日政府替咱顶事，咱们还维持干什么"）一方面就是从发动算账等实际斗争中，使他们切身了解维持的害处。另外，就是反对、揭发国特及坏分子封建势力的造谣破坏，使他们无计可逞，使群众逐渐从思想上转变来依赖我们，则我们的斗争就更为有力。

4、反蚕食斗争，必须在领导上取得统一，使党政军民相互配合。但这种统一应以地方党为核心，而政权则作为这四种力量的结合体而表现。军队则用武装斗争去扩张掩护政治斗争的开展。结合得好，政权的威信提得高，反蚕食斗争胜利就多一分。象有些地方让政权单干，甚至如磁武县政权中仅以十余个公安干部去搞，区长等都不过问，这就无法发挥斗争的力量。特别是党政军民取得统一布置后，应同时发动斗争，这样更有威力，更能给敌人、坏分子以严重打击。

5、为保持巩固反蚕食斗争的胜利，除深入群众工作外，应始终采取对敌人的攻势，不满足现状，在既得阵地之村继续前进。这样使敌人无暇来报复摧残，一方面掩护了已得阵地，有深入工作之余裕，这也就是"以攻为守"，并使之逐步推进。当然，对敌人之进攻，主要的是指结合民兵与以武工队为主体的政治攻势之经常发动。平顺五区收复了三十余村，几近一年而未失掉，得力于历次之政治攻势者非少。襄垣武工队之活跃，也成为今年襄垣反蚕食斗争胜利后的一支有生力量。

6、在敌进行大扫荡时，是我们积极展开反蚕食斗争的有利时机，同时是配合反扫荡的有力武器。因为当时敌大军深入，后方空虚，便于我之工作，且我与敌占区的斗争，一旦变得如火如荼，亦能吸收敌军之早日回头。此次二分区的反蚕食斗争之胜利记录，几乎大部是在五月大扫荡时乘机取得的。可足楷模。

总起来说，太行区的反蚕食斗争是已经普遍展开了，并且已取得了或多或少的胜利。因此今后迫切的问题，就是怎样来取得胜利的巩固。为此怎样把目前的七七政治攻势与反蚕食斗争联系起来，就有很大的意义。我们之所以在这次政治攻势中强调这一工作，也是根据这一需要而进行的。

一九四二年华北形势大纲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

相持阶段华北形势的特点

一、现实力量的对比，不但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没有变化，并且敌人的相对增强，我们的相对削弱，然而这特点首先是与中央所指示的相持阶段的整个规律相反，而是从属的部分规律，其次是潜伏力量的对比，却与现实力量的对比相反，并发生着相反的变化；又次是在总形势下的现实力量的对比，也与华北的现实力量的对比相反，并发生着相反的变化。

二、统治地区的对比，不但敌优我劣的基本形势没有变化，并且敌人的在相对扩大，我们的在相对缩小，然而这特点首先是与中央所指示的相持阶段的整个规律相反而从属的部分规律；其次是敌人的统治地区的扩大，祇能正比地扩大自己的分散和支解，但并不能等比地扩大奴役的群众和掠夺的资源；又次是我们的统治地区的相对缩小，只妨碍群众的合法领导，和资财的正面运用，但并不是群众和资财的丧失。

三、由于上述两个特点，华北虽然存在着完全殖民地化的可能，但这可能只有在敌人及其盟友的世界基本殖民地化的范围内才能实现，因为集中力量经管华北的时机已经过去，若从现存力量经管华北，则华北完全殖民地化的发展迅速，并不存在着大于世界基本殖民地化的发展速度的客观条件，致于世界基本殖民地化的前途，历史应在作出否定的答复。

四、国民党的现实力量，大部已经渐次退出华北，随着现实力量的退出，而发展其潜伏力量于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于伪军和伪组织，因之华北的阵容，基本上已由三个壁垒转变为两条战线；虽然对国民党的特务斗争仍是极重要的，在国民党没有恢复龙海路以前，任何凭藉军事反共以重整华北三个壁垒的企图都是幻想。

一九四二年提出了的新问题：

五、相持阶段敌我现实力量和统治区的对比的变化，到1942年发展得比较显著和迅速，主要是在平原区。

六、敌我对比的变化在平原区提出了一些什么新问题呢？第一个是平原区会不会变质的问题，由于敌我对比的变化和我们积累力量长期埋伏的战略方针，一方面要肯定这变质的必然性，并适时适切地把握，准备和指导变质，同时要尽量减少变质的平原区及延缓每个平原区的变质。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发生一些什么不正确的观点呢？首先是否定变质的机械坚持论；论者认为敌我的对比并非不利的变化，平原区的变质纯粹是主观上的原因；只要主观上不犯错误，是可能以根据地或游击区的一套坚持到底的，我们的战略方针也要求以这一套坚持到底。其次是放弃坚持的单纯退却论；论者认为敌我的对比确是不利的变化，然而根据地或游击区是坚持游击战争的唯一的凭藉，根据地或游击区的一套，是坚持游击战争的唯一方

式方法、根据地或游击区变了质，根据地或游击区的一套破了产，就再没有坚持游击战争的凭藉和方式方法，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彻底清算。又次是此起彼落的平衡发展论；论者不在本质上从敌我对比的变化入手，只迷于此起彼落的表面现象，而昧于此起彼落的主要方向，认为华北目前是平衡发展的，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维持这平衡发展的规律。

七、第二个是平原区能不能恢复的问题。由于同一根据，一面要肯定长期的和彻底的恢复之不可能，同时要尽量争取暂时的或部分的恢复。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发生一些什么不正确的观点呢？主要是由机械发展的长期的和彻底的恢复，及由单纯退却论发展的长期的和彻底的放弃，前者当引第一阶段冀东区和冀鲁边的长期的和彻底的恢复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根据，殊不知这事实的引证，是在恰恰相反的具体条件下的形式的引证。

八、第三个是平原区变质后的基本形势问题，游击区的基本形势是：（一）敌我的现实力量近似平衡，敌我的统治区成为细碎的和表面的犬牙交错；（二)敌人具备了全部或大部区级以上的及大部或一部村级以上的统治机构，我们保持了全部或大部县级以上的，及大部或一部区级以下的一面的和流动的统治机构，大部或一部区级以下的两面的和固定的统治机构；（三）群众的全部或大部在政治上，及大部或一部在行动上，拥护我们。敌占区的基本形势是：（一）敌人的现实力量占优势，敌人的统治地区成为或差不多成为整的面的；（二）敌人具备了或差不多具备了全部各级的统治机构，我们保持着全部或大部县级以上的一面的和飘忽的统治机构，及全部或大部区级以下的两面的和固定的统治机构；（三）群众的大部在政治上及一部在行动上拥护我们。

九、第四个是平原区变质后的基本方针问题，在变质后的严重形势下，我们之所以相信可能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是依靠于绝对有利的政治条件，主要是群众条件。然而怎样运用这绝对有利的政治条件呢？——究竟撙节运用以隐蔽的（和秘密的）和平斗争为主呢？还是充分运用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根据敌我对比的变化，在敌占区只能以隐蔽的（和秘密的）和平斗争为主，又根据我们的战略方针，在游击区也只应以隐蔽的（和秘密的）和平斗争为主，虽然各类的武装斗争，在敌占区，尤其在游击区仍极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发生一些什么不正确的观点呢？首先是不应以隐蔽的（和秘密的）和平的斗争为主。论者认为游击战争主要内容，不但可以是并且一定是公开的武装斗争，若以隐蔽的（和秘密的）和平斗争为主，就是放弃游击战争，就是违反党的坚持游击战争的路线。其次是不能以隐蔽的（和秘密的）和平斗争为主论；论者认为游击区，尤其是敌占区是黑漆一团的，我们的政治条件已经随着变质，敌人的统治的机构已经天衣无缝，任何隐蔽的（和秘密的）和平斗争，都不能长期的和彻底的坚持，若以隐蔽的（和秘密的）和平斗争为主，终将放弃游击战争，终将放弃党的坚持游击战争的路线，又次是不必以隐蔽的（和秘密的）和平斗争为主论；论者认为一切隐蔽的（和秘密的）和平斗争都是曲折的和点滴的斗争，工作现极艰苦，效力又很微薄，与其以这花大资本撑空门的斗争为主，维持游击区，尤其是敌占区的名存实亡，不若放弃游击战争，不若放弃党的坚持游击战争的路线。

十、第五个是平原区变质后的力量部署问题。随着平原区的变质，原来的力量部署，无论在资财供给上和斗争需要上，都不适应于新形势，尤其是达到饱和状态的和平原区，首先要从华北的力量部署的统筹上，决定转用现实力量的大小和地区，主要是向比较薄弱，未尽开辟或可能发展的山岳区。其次要从本区的力量部署的调整上，决定转变现实力量为潜伏力量，及公开力量为隐蔽力量（和秘密力量）的比例和步骤。又次要从敌人力量部署的矛盾

上，加强两面的力量的培植不但是现成的一面力量的争取，尤其是将成一面力量的渗透。

十一、第六个是平原区变质后组织形式问题。随着平原区的变质，原来的组织形式应有的变更是：（一）整个组织形式的一元化和多样化。什么叫作一元化呢，就是工作范围相同和工作性质类似的平行机构的精简裁并，好象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县级以上的党政军民，及区级以下的党和秘密群众武装、游击区的大部或一部区级以下的政民和隐蔽群众武装，分别采取一元化的组织形式，什么叫作多样化呢？就是在不能或不应以我们的组织形式出现的条件下，利用一切敌人的或旧有统治机构，好象游击区的一大部或一部，及敌占区的全部或大部的区级以下的军政民，应该利用敌人的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又象一切宗教团体和封建武装，也应利用旧有的多样化的组织形式；（二）各种组织形式的比重变化、公开的、固定的，一面的和庞大的组织形式的比重降低，而隐蔽的（和秘密的）、流动的（和飘忽的），两面的和外小的组织形式的比重提高，尤其在敌占区这比重变化的程度更大，好象县级以上的党政军民，在游击区只能采取隐蔽的和流动的组织形式，在敌占区只能采取秘密的和飘忽的组织形式，区级以下的军政民，在游击区的大部或一部，及在敌占区的全部或大部只能采取两面的组织形式，又象一切机构，在不过于妨碍工作的条件下，尽量采取短小的组织形式；（三）精简或裁并上级的，及充实或增加下级的组织形式，如象武装部门，应该精简团级的及裁并军区级的和分区级的组织形式，充实游击区的区级以下的隐蔽群众武装，增加游击区，尤其是敌占区的区级以下的秘密群众武装。

十二、第七个是平原区变质后的斗争方式问题。随着平原区的变质，原来的斗争方式应有的变更是：（一）整个斗争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以复杂的，点滴的、侧面的和曲线的斗争方式代替简单的、完整的、正面的和直线斗争方式，如象对于伪军伪组织的斗争，在游击区尤其是在敌占区，主要不是消灭或瓦解，而是一个动摇、中立、争取和稳定的艰苦的过程，又象对于配给制度的斗争，主要的不是粉碎或拒绝，而是在游击区帮助群众阻滞其推行，在敌占区帮助群众减轻其剥削；（二）各种斗争方式的比重变化，公开的、武装的和非法的斗争方式的比重降低，而隐蔽的（和秘密的）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方式的比重提高，尤其在敌占区，这比重变化的过程更大，好象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阵线的斗争，主要的不是公开的和武装的斗争，并且应该利用所有的合法机会；（三）正确的选择和灵活的运用斗争方式，这选择和运用之是否正确和灵活，过去在根据地影响比较小，比较缓，然而在游击区，尤其是在敌占区，却是一针见血，一着输棋的，所以在变更斗争方式的同时，要增进掌握斗争方式的艺术。

十三、第八个是平原区的力量部署，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变更时机问题。这力量部署，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变更，虽是为了变质后适应于新形势，然而清算旧的一套和建立新的一套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等到变质后再来变更，就会遭受被迫的失时的损失，若要争取主动的先机的利益，就非于变质前或变质中完成变更不可，并且在变质前都是一个渐变过程，只要不麻痹主动的先机的掌握变更是可能的。

十四、敌我对比的变化，在山岳提出了一些什么新的问题呢？第一个是山岳区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在平原区没有发生重大错误，致使山岳区陷于完全孤立，及在山岳区没有发生重大错误，因之遭受重大损失以前，敌人的实力和时间，还不可能完成变质前的准备和维持变质后的统治，山岳区还不存在变质的问题，但在敌人集中力量进攻一个或几个主要山岳区的条件下，暂时的变质是可能的，如在山岳区的平原带和接近平原带，一般已变质为游击区部

分或敌占区部分。

十五、第二个是山岳区的基本形势问题，山岳区的基本形势是：（一）主要由于补充困难，次要由于斗争频繁，现实力量以较平原区和缓的速度削弱；（二）主要由于边缘压缩，次要由于内部割裂，统治地区以较平原区和缓的速度缩小；（三）山岳带的资财需要和平原带的资财供给的经济矛盾，更加深刻；（四）固定性和安全性降低，生产建设遭受妨碍，尤其是高级的兵工生产建设，几乎陷于不可能。

十六、第三个是各部分的比重变化问题，在第一阶段，根据地部分是整的面的，游击区部分是不很明显的，敌占区部分是围绕根据地部分的点线，这期间后，二者在山岳区的比重很小，某些山岳区曾经对后二者采取闭关政策或殖民政策，也不发生严重问题，现在后二者已占整个平原带和接近平原带，比重已经提高到很高，为根据地部分生存所系，必需掌握基本政策，充实工作质量，才能保证山岳区的坚持。

十七、第四个是力量部署，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变更程度问题。这个问题之在山岳区，虽然不象在平原区那么尖锐的、迫切的提了出来，但是为了适应于新形势，尤其是新形势的继续发展，也要随着部分变质而部分变更，尤其是力量部署，不但受平原区的力量部署的影响，并且为整个力量部署所左右，还要作较重大的变更。

十八、敌我对比的变化，在整个内在关系上提出了一些什么新的问题呢？第一是各地区的比重变化问题。（一）在山岳区和平原区之间，自从抗战开始，中央虽已明确的指出了前者是基本根据地，但在第一阶段，后者曾在各方面起过主要作用。然而这比重已随着敌我对比的变化而变化了，前者不但在本质上，并且在现象上也负担着，并增进着基本根据地的任务；（二）在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之间，是仍起着主要作用的前者的比重降低，仍起着次要作用的后二者的比重提高，这比重变化，类似于山岳区的根据地部分，游击区部分和敌占区部分的比重变化而甚于那比重变化。

十九、第二个是各地区的力量部署问题：（一）在山岳区和平原之间，是前者积蓄并运用主要的现实力量，后者积蓄并运用次要的现实力量，前者较小地较精简现实力量和公开力量，也较小地发展潜伏力量和隐蔽力量（和秘密力量）并仍以现实力量和公开力量为主，后者较大的精简现实力量和公开力量，也较大地发展潜伏力量和隐蔽力量（和秘密力量），并改以潜伏力量和隐蔽力量（和秘密力量）为主，（二）在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之间是前者的力量部署类似于山岳区而较小于山岳区，后二者的力量部署类似于平原区而较大于平原区。

二十、第三个是各地区的作战协助问题。（一）关于山岳区和平原区之间，或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之间的一般协助，是战术的直接的协助的比重降低，战略的间接的协助的比重提高；（二）关于山岳区对平原区，或根据地对游击区和敌占区的特殊协助，是后者或后二者的主力军只有在任务要求情况许可的期间，才全部留在后者或后二者作战，否则就要大部或一部向前者转移，并待机归还，这转移和归还，前者应该给予特殊协助，虽然这特殊协助的需要和困难是相对增加的。

二十一。第四个是各地区的资财调济问题。（一）关于山岳区和平区之间，或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之间的一般调济，已因交通的阻隔和经济的封锁而降低，这一般调济的形式，已不容许或不适宜采取实物或本币，只能采取现金伪钞；（二）关于平原区对山岳区，或游击区或敌占区对根据地的特殊调济，虽然前者或前二者的供给力降低了，但后者的需要量

的撙节仍不能或不易自给自足，因之前者或前二者对后者的特殊的调济，仍要按目前的供需情况继续维持。

一九四二年的作战

二十二、敌人作战的基本矛盾，由于岗村对华北的再认识，以"大东亚战争的一方面"的口号代替了"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的口号，这就是提高了华北的绝对重要性，这就产生了增加力量经营华北的可能。但是其他三个已开或未开的战场，同时在敌人的总参谋部更提高了绝对的重要性，这就降低了华北的相对重要性，这就产生了增加力量经营华北的限制，幻想一年半确保华北，而又不能增加决定力量的根源，正是产生于这基本矛盾。

二十三、敌人的作战方针，要确保华北，首先是确保平原区，尤其是河北平原区，由平原区的确保，以枯竭晋冀山岳区的资财，并阻绝晋、鲁山岳区的联系，使山岳区的资财和联系陷于孤立后，进而解决山岳区，同时为大东战争建立河北平原区的仓库。这方针是敌人在上期所采取的，是表现基本矛盾的中庸主义，然而为了粉碎中心环节以解决全局计，下期有集中力量进攻一个或几个主要山岳区的可能。

二十四、敌人的作战内容：（一）蚕食是经常的低潮，扫荡是间断的高潮，在蚕食已为扫荡完成准备，或其本身不能继续发展时，就以扫荡破坏蚕食的障碍，再以蚕食消化扫荡的成果；（二）蚕食以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为主，扫荡以军事力量为主，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只能从属于军事力量，所以蚕食只能从属于扫荡；（三）蚕食的具体形式，在平原区以内部割裂为主，在山岳区以边缘压缩为主，这蚕食的具体形式重大的影响扫荡的具体形式，在平原区以分区扫荡或全面扫荡内的分区扫荡为主，在山岳区以全面扫荡为主。

二十五、敌人的战役的组织，由于过去采取一般外线作战原则的失败，敌人的战役组织有两个可能发展前途：假若敌人作战计划的重点是指向我们薄弱部分，而以有限的力量和时间在各个地区进行较多较小的战役时，那么战役组织就可能采取装甲和乘马快速部队，徒步轻便部队和空军配合的远程奔袭（单独的或系列的）期于我们的机关和主力军还没有转移和分散以前，捕捉或连续捕捉我们的主力军，反之敌人作战计划的重点是指向我们的坚固部分，而以同等的力量和时间在一个或几个地区进行较少较大的战役时，那么战役组织形式就可以采取连接正面的和强大纵深的密围稳打，期使我们的机关和主力军不易透过正面，更难逃脱纵深，即使转移到和分散到外线，无论积极的破袭或消极的保存，都没有充分的空隙，这两个可能的战役组织，前者适合于完成内部割裂的平原区，及分区扫荡或全面扫荡内的分区扫荡，后者适合于只有边缘压缩的山岳区，及全面扫荡，然而敌人在上期却普遍的采取了前者。

二十六、我们作战的基本原则，只要不丧失我们的政治影响和生存条件，在相持阶段的前期，我们掌握了"打不了就拖"的基本原则，到相持阶段后期，单是掌握这个基本原则已经不够，它的新发展是"拖不了就让"假若前者不知"包含打的拖"，后者不知"包含拖的让"都是在该拖该让的情况下不知运用可拖可让的政治资本，都是作战策略上的直线论和拚命论。

二十七、我们的作战方针，在已经变质的平原区，肯定变质，并组织变质后的坚持，在尚未变质的平原区，延缓变质，并准备变质后的坚持，就各种基本形势继续坚持平原区，以

继续保证晋冀山岳区的资财供给，及晋鲁山岳区的作战连系，而免山岳区陷于孤立，这方针是我们在上期应该采取的，假若敌人集中力量，进攻一个或几个主要山岳区时，我们就要运用暂时的变质去坚持争取不变质，以保证根据地的性能。

二十八、我们的作战内容：（一）反蚕食是我们的坚强部分，针对敌人的薄弱部分，反扫荡是我们的薄弱部分，针对敌人的坚强部分，反蚕食的发展，就各地区说，虽会减少反扫荡的困难，但是可能增加反扫荡的次数，就全华北说，却会同时减少反扫荡的困难和次数；（二）反蚕食和反扫荡都是追随敌人的作战内容，假若对这追随敌人的作战内容的部署，进而追随敌人以反蚕食为次要的，反扫荡为主要的，就会遭受敌人的完全支配，然而我们是可能并且应该增加反蚕食的质量而以之为主要的内容；（三）反蚕食之是否发展为面的斗争，重大的影响反扫荡之是否发展为面的斗争，现在是前者的发展还停留于点线斗争状态，以致后者的发展虽然超过前者，但是也还停留于局部的面的斗争；也还没有把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构成一个反扫荡的整面。

二十九、我们的战役组织：（一）敌人在平原区采取全面的扫荡内的分区扫荡的远程奔袭时，我们应采取的战役组织：首先是主力军在内线作战部分的情况变化了，应将内线的作战任务交给群众武装，而与战役发起时就转移外线，以避免任何被追的内线作战，其次是转移到外线的和原来在外线的主力军，应做连排以下的分散，完全融化于群众武装，以避免系列的奔袭合击的捕捉。又次是主力军达到饱和状态的平原区，建制的分散，会形成区区的密集，应转移大部或一部于邻区，以避免群众武装保持过大的浓度。总之以转移邻区的让，来帮助全面游击战争的拖，以全面游击战争的拖，来减少被追的和集中的打；（二）敌人在主要山岳区采取全面的扫荡密围的稳打时，我们应采取的战役组织：首先是以小机动路线转移为大机动路线，因为敌人越是在本区控制强大的纵深，不给我们在战役纵深地带留下充分的空隙，便会越加减小邻区的力量，削弱战略纵深，而给我们在战略纵深地带造成更大更多的空隙，所以过去本区的力量在战役纵深地带拖垮本区敌人的小机动路线已不适用，应该采取以本区的主力军配合邻区的力量在战略纵深地带拖垮本区敌人的大机动路线。其次是以打垮邻区敌人来拖垮本区敌人，要想以本区的主力军配合邻区的力量在战略纵深地带拖垮本区敌人，单象第一种战役组织，以本区的主力军转移邻区隐蔽是不一定达到目的的；必需打垮邻区敌人，才能拖垮本区敌人，为什么两种战役组织下的转移邻区的任务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呢？因为一面在主观上前者肯定平原区必要时的变质，就不一定要以打垮邻区敌人来拖垮本本区敌人，然而后者否定山岳区的变质，就非以打垮邻区敌人来拖垮本区敌人不可；同时在客观上，前者的邻区的敌人是未必非常薄弱的，然而后者的邻区敌人却一定非常薄弱的缘故，又次是运用以反蚕食打垮邻区敌人的手段来达到以反扫荡拖垮本区敌人的目的，虽然邻区薄弱，虽然战略纵深地带造成更多更大的空隙，但是目前所谓打垮，还只能也只应以打垮敌人的统治机构为主，而不是点线的大批恢复，就是还只能也只应以反蚕食击之，敌人的统治机构的崩溃和我们统治机构的撤销的影响是悬殊的，有了一个或几个邻区的敌人的崩溃，就是以拖垮本区的敌人。

三十、冀中战役不但是上期的作战核心，而且是上期的作战典型，它明确地并严整的表现了平原区变质的一般规律，应叫做变质扫荡战役。

三十一、冀中战役，敌人不但标准的采取了并且基本上完成了第一种战役组织，我们的战役组织，首先是因袭了在本区坚持本区的老一套，中途才转变为第一种战役组织的。

三十二、冀中变质的渐变过程，也就是变质扫荡战役的准备过程，无论在碉堡交通修筑的密度上，在统治机构建立的广度上，及在从属于前二者特务奸细的活动上四月下旬都已成熟，随着这过程的成熟结束这过程的变质的形势，也就是变质扫荡战役的形势，便紧接而来，并于五月初旬爆发，这是客观发展的过程，致于主观的认识过程呢？集总首先五月初旬把握在这形势，但延至五月中旬才有统一认识，并建议给军区，而军区的接受和执行，直到一月以后，要想主动的先机的指导冀中的变质，无论力量部署，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变更，应于四月下旬实施完毕，尤其是遇缓散漫的地方工作的变质，非随春季的到来就开始不可。又主力军的大部或一部的转用，最理想的是冀东，因为冀东不但是一个比较薄弱，未尽开辟和可能发展的地区，并且是一个优良的外翼，然而丧失了主动和先机，中途只好被迫地失时的向东南转移。

三十三、冀中战役后的前途究竟由根据地循序变质为游击区呢？还是超过游击区直接变质为敌占区？决定于青纱帐期的收容和整理，本来主动的先机的指导冀中变质的话，是有足够条件以游击区基本形势再拖一个过程的，然而不是如此，所以发生了“游击区和敌占区”的问题，好在这是一个部分的原则问题，决定那个前途都没有重大关系，集总当时是决定第一个前途的。

三十四、冀东战役的规模在上期仅次于冀中战役，其形势的严重且过之，然而为什么取获完全不同的成果呢？由于：（一）冀东是一个半平原半山岳的地区，并且幅员辽阔，适于大部转移，不象冀中的狭窄平原，没有旋迴余地；（二）冀东的现实力量不足，适合于严重形势下的拖，不象冀中的现实力量过剩在严重形势下，非让就拖不了。

三十五、冀东战役后，就整个冀东说，虽仍是根据地，就平原地带说，似已变为敌占区，然而经过五、六月，我们在七月间得到重大的恢复，这是另一种平原区变质的特殊规律。

三十六、太行战役在上期原极平凡，然而为什么遭受相当重大的损失呢？由于：（一）集总机构的庞大，具备了遭受损失的必然性；（二）过于集中注意于冀中，对本区情况麻痹；（三）两次转移的方向和时间，恰中敌人的合击。

三十七、敌人在太行采取第一战役组织，并不象在冀中采取同样的战役组织之适合具体条件，然而得到侥幸的成功和胜利。这侥幸的成功和胜利，可能冲昏敌人的头脑，以致下期在一切地区继续采取这一种战役组织。

结　　语

三十八、华北不存在客观上能否坚持的问题，只存在主观上怎样坚持的问题，怎样坚持的基本的路线，中央虽已明确的指示，但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及待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之与否适当，是会左右客观的发展规律的。总之，目前既不是万事大吉的第一阶段，也不是一路小康的相持阶段前期，而是十分严重的相持阶段的末期，坚持华北的全面过程，只有在这相持阶段末期才给我们提出了真正的考虑。

三十九、为了响应中央在百团大战时粉粹投降危机的政治攻势，华北组织了全面出击，

注：“集总”可能是十八集团军总部之简称——抄者。

为了响应中央在皖南事变时粉碎反共危机的政治攻势，华北进行了全体动员，由于过高的估计投降和反共，所以把中央的政治攻势发展为军事实践，这对我们坚持华北和敌人应付华北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振动是很大的，这样的振动，在当时虽尚无关大体，但在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是会发生问题的。中央在本年度差不多完全停止了这类的政治攻势是正确的，因为它在华北只会伤害自己，尤其是发展为军事实践之后，即使五月反共危机爆发，似乎仍应也仍能限制于西北部分，转移华北的主要方向或把华北陷于两面作战的歧途，都是值得考虑的。

四十、华北的1943年，可能还是接近胜利、更加严重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应有的考虑是：（一）在最后保持主力于华中和西北的方针下，更进一步的转用和时间华北过剩的现实力量，尤其是干部，以准备第三阶段对人的资本的空前需要；（二）有限的开放华北与中原的门户，有限的开放龙海平汉和同蒲的交通，从转移战争为合理负担，并诱导战争于陕豫边境，这转变和诱导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华北的肚皮小硬挺在平原区就行了。（三）准备某些主要山岳区的变质。

四十一、华北的1943年，即使还是接近胜利，更加严重的一年但仍然存在着和缓敌我对比的变化的两种可能性，就是随着敌人的西进我们的西进发展，及随着敌人的北进我们的北进发展，在统筹华北、华中和西北的力量部署时，对这两种可能情况我们应有必要的准备。

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罗 荣 桓

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的转为正规战。这是由于敌人还强大，占领城市及交通运输便利；而我们则是愈益处于被分割封锁之农村中，装备亦极低下，弹药不易补充，虽然依靠在全人民身上，建立了根据地，但仍是没有巩固后方的作战，更无法解决技术上之贫困。尤因为敌人频繁残酷的进行扫荡，摧毁洗劫我根据地，蚕食紧缩我根据地，使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损失，机动回旋地区狭小，更加紧张了。那么我们有什么可能过早的转为正规战呢？如我们不从具体情况联系上出发，而迷惑于曾有过、现在还有的某种战例，妄自以为有了过早的转为正规战的可能，会造成有害的行为：当着胜利发生拚命主义，遇到困难失掉信心。在我们对攻围寨战上，不是表现了这两方面的倾向吗？夸大攻围寨某些成功而认为正规战的战功，遇到伤亡过大，即灰心丧气。这是没有明了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游击战同样容许我们有攻围寨战。把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关系，只从片面孤立的一些现象上去加以机械区别，或混淆起来，都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攻围寨战、运动战，在游击战中是存在的。这首先由于我们游击战的普遍积极活动，不仅是军事的，而且是政治的；不仅是军队的，而且是人民的；是容易被我们找到敌人弱点，暴露敌人弱点，制造敌人弱点；使我们能从运动中打击敌人，乘着敌人立足未稳，防守松懈，攻破围寨也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只限于局部战斗的获得。一般的方法是采取伏击偷袭敌人，完成于短促时间以内；或者还由于敌人兵力少，伸入我们占优势地区，一时又增援来不及，而地形群众条件均于我有利，我们可以使用一切方法，予以歼灭；甚至包括阵地战、运动战的性质。如简易的坑道爆炸，强攻围寨，打击援兵等，并不是不允许的。但仍不能算是完全的正规，而仍是以游击战为前提的。事实上这种战法，往往施之于伪军，及据守一般民间加修过的围寨为多。而我们有些部队错认为有了对敌人的正规战、阵地战，这是不对的。师在连队军事工作会议上，是指正过了的。因为没有把攻围寨战一些成功方面予以发扬，更具体地引导大家学习游击战，也就使得某些干部无原则的否定了攻围寨战，抛弃攻围寨战，这对于我们当前反敌人蚕食，必须拔除及可能拔除之据点，反丧失了勇气，这是应该纠正的。

敌人更加残酷的进行扫荡，是配合他的伪化治安与蚕食政策，而从远距离调集优势兵力，向我们四周伸入合击，奔袭我们指挥后方机关，实行重叠的合围，并以林立的临时据点，占据我们中心地区，清剿我们中心地区，再转移其主力打击我们内外线之互相策应之行动部队。因此使我们一般求得运动战的可能是更少了，而攻围寨战是大大增多了，并且成为必要了。否则便无法制止和击退敌人蚕食政策，打击敌人清剿部署，而求得存在的。这又是

有条件的：敌人大量使用伪军，战斗力极弱，依靠一般民间加修过的围寨作为防守，亦不那样坚固；同时伪军与敌人及其自己内部均有利害冲突，在我们广泛展开政治攻势配合之下，采取灵活游击战法，是能够获得攻围寨战的成功，但必须避实乘虚，扰强打弱。而更为重要的，还决定于我们游击战的普遍积极活动，不仅是军事的，而且是政治的；不仅是军队的，而且是全人民的；大量牵制敌人，错乱敌人，折磨敌人；使敌人开始扫荡不易调集兵力，使敌人兵力不够分布之弱点，更加暴露在我们前面。尤因为我们这一行动的成功，会给敌人找不到或达不到合击奔袭和合围的显著目标，束缚着敌人不敢夜间运动，这对我们攻围寨战和击退敌人蚕食政策，打击敌人清剿部署，更有了条件。敌人是无法以更多的兵力，投入每一地区村落，和到处筑有坚固防守的，甚至不可能保证其后方纵深内不遭受我们逆袭的打击。我们今天应该创造出以飞行（飞行即突击）爆炸，配合着攻围寨战，这是游击战必须有的手段。

游击战的普遍和积极活动，必须展开成为分散性地方性，而且是群众性的。我们主力军，地方基干武装，都要有必要的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更应成为这一游击战组成的重大因素。因为我们主力甚至地方基干武装，在建设自己上，高度强调正规化，忽视对民兵游击小组的推动，这对游击战一般指导方针是有害的。现在还不能有我们过早的转为正规战，那末又有什么可能希求高度的强调正规化？但我们并不反对主力在许可条件下要有必要的与逐渐的提高正规化。而高度的强调正规，以至拒绝执行分散地方化的任务，这是错误的。相反的，今天主力的正规化，应该在必要的分散地方化过程中，表示自己有更坚强的组织性，及在统一集中指挥之下，有独立自主的作战能力，特别善于各种游击战法，不仅在分散地方化上，能够完成独立的战斗任务，而且要有更高度的灵活机动，不失时机的、自主的争取配合作战，能够完成更大的、更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这一水准的提高，我们的正规化是经不起考验的。只讲求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总嫌集中整训不够，规模不大，模范不多，比赛项目太少，制度名目太简，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地方武装就是基干化，更带地方性分散性的，升级成为主力，一般的已不是他们当前的任务，这会走上在正规化上的平均主义，不是使地方基干武装自身遭受损害，停滞壮大，即是使主力要有必要的正规化，相当集中使用力量也不可能。

在敌人后方，我们这是游击战，并且是愈益趋于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一切违背这一指导方针的东西，都要去掉。实行学习整顿三风的精神来检讨我们军事问题，已成非常必要。

（原载一一五师政治部《战士》第八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程　子　华

绪　　言

中日战争已进行五年了，在这五年当中，冀中抗日根据地，作为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堡垒，对于全国抗战，特别是对于华北抗战，曾起了极其伟大的配合作用。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敌占主要城市，掌握交通干线，冀中是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然而我据广大乡村，拥有人力物力，敌人又是处在我们的威胁之下。这一对立的形势，就决定了敌我在冀中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

然而仅只一般的指出，敌占城市，我据乡村云云，仍不足以说明，冀中敌我斗争的特殊尖锐性与残酷性。因此必须充分的认识，敌所占之主要城市，包括着华北乃至全国的重镇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而敌所掌握之交通干线，却包括着与全国交通相联系的平汉、津浦、北宁以及石德等四大铁路，这些主要城市与交通干线，无论在军事、政治、交通、经济等各方面，显然都是具有他的特殊意义的。同样必须充分认识，我所据之广大乡村，乃是平原沃野，为华北乃至全国最富强之区，而我所拥有之人力物力、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成为一切力量的源泉。这些广大乡村及人力物力，本来是敌我必争之所，今天却为我所据，依以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且造成对敌占之主要城市与交通干线的威胁。冀中敌我斗争的特殊尖锐性与残酷性，他的根据也就表现在这里。

五年来，无论敌我斗争如何日益尖锐与残酷，冀中平原游击战争是胜利的坚持了，而且今后必然要胜利的继续坚持着。究竟我们凭借一些什么东西呢？这不仅一般的因为我据广大乡村，拥有人力物力。而且更特殊的（或基本的），因为我们能够利用这些资本，尽了组织与领导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论“兵民是胜利之本”，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之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好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一声叫唤也得把他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假如这个指示的正确，至今在全国还不会（或不肯）完全证实，那么在敌后却已普遍的证实了，假如在敌后还只是一般的证实了，那么在冀中却已特殊的生动的证实了。

五年来冀中民兵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曾经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伟绩，在全部抗战史中，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幅。这不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敌后

抗战进入更加艰苦之时，将冀中民兵五年来的斗争，作一初步的总结，无论对于冀中本身经验教训的检讨，或对于其他抗日根据地经验教训的交换，都是有意义的。因此特搜集些基本材料，分三个时期来叙述。

一、第一时期（自七七事变至一九三八年冬）

（一）当时的环境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保定等主要城市，相继失守，平汉、北宁、津浦等主要铁路干线，先后为敌所控制，于是冀中广大乡村乃至一般的县城，显然处于被包围的形势之下。因此过去的军队与政权，都有大祸临头朝不保夕之感。在敌人急于向正面进攻，长驱直下之际，国军便纷纷南退。而一般专员、县长、公安局长、保安队长等人物，则更携带武装及财产，狼狈逃窜。这样就造成了冀中的无政府状态。

在无政府状态之下，日寇则大肆抢掠烧杀，汉奸托派则横行无忌，对人民威胁利诱，武断宣传，酝酿组织维持会，以求甘心事敌。散兵游勇，则与土匪合流，某些豪绅则与敌伪勾结。降日的旗帜到处树立，而投敌的活动也到处酝酿。一般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实已陷入于恐怖状态之中。这时所暴露的基本弱点，即是由于历史错误的积累，致使人民迷失了政治方向，缺乏组织力量。这便是敌寇汉奸仅有的凭借。

然而混乱的局面只是暂时的，由于敌人急于向正面作战略的进攻，便不得不使他的后方比较空虚。因此就给了冀中发展游击战争以客观上的有利条件。异民族的疯狂侵略及其残暴行为，渐渐促成广大人民的仇恨与觉醒。加以共产党的积极领导，八路军平型关等战争的伟大胜利，八路军部分武装在冀中的活动，以及人民自卫军的北上，很快的给了冀中人民以极大的兴奋，悲观失望的情绪渐行消沉，而代之以高涨的抗日斗争的浪潮。

（二）民兵的斗争

这一时期冀中是处在比较不剧烈的斗争环境，民兵的发展，也就是广泛的动员与组织的过程。

1、组织与领导——冀中首先成立了动委会，这是政权群众团体及地方武装联合的组织形式；下设组织、宣传、青年、妇女、武装等部、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便是由动委会动员与组织起来的。一九三八年春，随着冀中主任公署的成立，很快的就组织起来分指挥部（直属边区的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各级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专署设支队部，县设总队部，区设大队部，村设中队部，这就构成冀中人民武装的一套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

组织自卫队时的中心口号，是不抗日活不成，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武装起来，保卫家乡，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等。同时有动委会的武装部到各村进行宣传和组织自卫队。有些县则开始由各村挑选干部予以训练，受训完毕的干部，马上带着政府的委任，回到村中负责组织自卫队。当时政府规定是凡十八岁至五十五岁的男子，都应参加自卫队（关于年龄的规定，各县并不统一）。自卫队的建立，最初是混合编制的，后来经过改组，这才把老年、壮年、青年分别编队。

在政权工作方面，民主政治的推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已开始逐步施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取消苛捐杂税等。虽然在某些方面执行的非常不彻底，但对于广大人民的参加抗日的

热潮，已经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当时地方豪绅对组织自卫队问题，抱着公开冷笑的态度。他们的意思是说：堂堂的国军都逃走了，一般老百姓何能为力？但他们对各种联庄会门，则积极操纵，竟以抗日相标榜，并不进行抗日斗争，仅是维持少数人的利益，而其耗费之巨资，则加诸广大人民之肩上。在自卫队的组织过程中，各种不抗日的联庄会门，失掉了群众的基础，渐渐趋于垮台。这样不仅解除人民繁重的经济负担，而且真正把人民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广大人民在斗争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组织力量的伟大。所以在自卫队改组以后，就可以很容易的由青年队中，动员出来积极分子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这一时期在自卫队中尚未产生民兵的组织。

不可否认的，在这一时期冀中虽然处在比较不剧烈的斗争环境，但绝不是处在比较简单的环境。由于敌探奸细的到处活动，由于地主豪绅的操纵把持，由于失意官僚军人的混水捉鱼，更由于冀中广大人民的觉悟程度不够，及一般群众工作尚属薄弱，结果就给这一时期自卫队的发展，增加了非常大的困难。而在组织成份上，也表现了极端的复杂，特别是在这方面之无经验，就使地痞流氓、旧军人，旧警官等，都曾混入了自卫队的各级领导机关里去。这就是初期自卫队组织不健全，各方多磨擦，乃至领导上的贪污浪费军阀习气现象的根源。

２、如何进行斗争——这一时期敌人攻下天津、保定等重要城市后，乃长驱直下，从事于正面的战略进攻。而我们的作战方针，则是在主动的，袭扰敌人，破坏铁路、钳制敌人，配合正面的积极防御，停止敌人战略进攻。这一艰巨任务之执行，首先必须依靠于抗日武装，可是这样抗日武装，是在开始广泛的建立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人民自卫队，一方面协助着正规军作战，另一方面建立与健全自己的组织，如通信运输、作响导、抬担架等，但这在初期游击战争中，也确起了相当的作用。

当政权建立的开始，冀中许多地区社会秩序还未走上正轨，敌探奸细不断混入，土匪流寇出没无常，在落后人民中间，竟散布些淆乱听闻的歌谣说："你问我，我问谁，中华民国净大贼，我想得到太平年，还得贼打贼"。在这种社会秩序混乱，政治方向模糊的环境中，当时的自卫队，虽然只是持红缨枪，轮流站岗放哨，有些村庄，或持土枪在房顶上瞭望，但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确曾使敌探奸细不敢明目张胆的活动，却曾使小股土匪渐渐有所警惕。而在自卫队掩护之下，地方政权干部能够深入乡村开展工作，更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由于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估计到不剧烈的斗争环境是不会持久的。因此一九三八年秋季，即对自卫队提出两大任务：（１）拆毁冀中廿四个县城，以免敌人资为堡垒之用。（２）改造冀中平原地形（即将道路挖成道沟，将公路给予平毁）。使地形地物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以为我开始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在人民自卫队奋勇努力之下，这两大任务就胜利的完成了。特别是在交通方面，我们在纵横贯通每个村庄的大路上，都挖成深四五尺，宽五六尺，只能走大车，不能走汽车与坦克车的道沟，使敌之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上减少了作用，而且对我们行动荫蔽与秘密上，都是非常有利的。在敌人向村庄前进时，人民可以不受敌之射杀，即由道沟从容荫蔽撤走。假如说：交通站是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就应该说人民自卫队在初期已经善于完成它的基本任务了。

（三）小　结

在抗战的时期，虽则由于敌人的急于在正面作战的进攻，使冀中暂时处于比较不剧烈的

斗争环境，但由于我们历史上长期积累的错误与罪恶（内政与外交），冀中确是处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所以冀中人民武装在初期的动员与组织的过程，乃是极其复杂的严重的斗争过程。

可以这样假设，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初步实施，如果没有人民生活的初步改善，冀中人民武装的发展，将成为不可想象的。当冀中陷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广大人民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五光十彩的旗帜到处树立着，如果没有共产党唯一正确的路线，则不能想象冀中人民会武装起来，擎起抗日的大旗，并且完成了许多伟大的任务。

冀中人民自卫队的时期，在组织上不甚健全，在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弱点，特别是生长在此不激烈的斗争环境，缺乏实际战斗的锻炼，加以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基础的薄弱，经验的缺乏，也必然影响到自卫队的工作。所以他虽在基本上完成了当时能够担负的任务，却不可能避免当时那些弱点。

二、第二时期（自一九三九年春至一九四〇年秋）

（一）当时的环境

自武汉失守以后，敌人便开始在正面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在敌后举行不断的扫荡，以期达到所谓确保占领地之目的。

敌人扫荡冀中开始在一九三八年冬，敌人扫荡冀中的方针，是占领城市为据点，并积极修筑公路，以缩小与分割我抗日根据地，由点线发展到面的占领，以求达到确保占领地的目的。

一九四〇年春，由于敌人依靠城市向面扩张的企图的失败，于是改变以前的方针，将过去以城市为扫荡中心，进而以乡村为扫荡中心，这就是冀中敌我斗争进入更加尖锐与残酷的新时期。

在这一时期，冀中已由比较不剧烈的斗争环境，急剧的进入紧张斗争的环境。一方面在敌人连续扫荡中，不断的检讨经验教训，改善其方针与手段，另一方面我们在连续的反扫荡中，也不断的锻炼了自己。因而不能不把斗争的方式方法，随着客观的环境变化而变化。

（二）民兵的斗争

敌人开始对冀中的扫荡，乃是对各方面工作的一种试金石，对冀中民兵也毫无例外。人民悲观失望的情绪滋长着，部分对敌屈服以求苟活的现象发生了。这就是促成抗日与降日的斗争，在变化多端的斗争过程中，民兵得到了发展与巩固。

1、组织与领导

（1）一九三九年春，由于各种工作已有基础，为了使组织形式，适合于斗争形式，遂由各种独立的群众组织代替动委会的组织。冀中人民武装便开始建立了独立领导系统。凡县级以上都设有武装科，直接领导各级人民武装，县以下各级人民武装，则由各该同级政府直接领导。

（2）人民自卫队组织系统的上层并无变更，其在区级以下，则每区设大队部，内有大队长，政治指导员及军政干事各一人。中心村则设中队部，村设分队部，中队部与分队部亦均有中队区分队长及政治指导员等干部的配备。所以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均系吃公粮领津贴。中队长三元四元不等，干事二元三元不等，分队长由一元至三元（按村之大小而定），

大队长五元，区级干事四元。

（3）当时的干部，都是自上而下委派的，选择干部的标准，多以长于军事为主。因此凡过去旧军人、旧警官往往爬上人民武装的领导地位，其在领导上，就表现老一套的形式主义的教育，强迫命令的打骂方式，而平时的生活腐化，战时的动摇逃跑等现象，也就不时的发生了。这就说明了当时仍缺乏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自己的武装人材。

（4）在五次战役的中间及其以后，由于敌人的点线加多和残酷的扫荡，到处烧杀抢掠，加以武装便衣汉奸的四出活动，公开乘火打劫。过去没有经过战斗锻炼的自卫队，在敌伪的袭击进攻下，站岗放哨是普遍的停止了，冀中的广大乡村，由此失掉了直接护卫，而陷于恐慌不安。在适应×的斗争环境下，首先由少数先进村庄的自发，组织青抗先、游击小组，以担负战斗的任务，及后将这一经验，推动于全区，遂形成人民武装中的骨干，成为保卫村庄的武装力量。

（5）游击小组是怎样产生的呢？深泽县民兵发展的实例，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如在许多村庄，最初敌人来时，自卫队无能应付，谁也不敢打，只有协同人民一跑了之。有一次敌人来到某村庄，老百姓未跑开，青抗先被迫打了两枪，掩护人民退去。后来百姓回到家便说："幸亏有青抗先，不然咱们就被围着了"。当时参加战斗的，不过三五人，在远距离就开枪。又一次敌人来到另一村庄，游击小组都在村中，作初次的抵抗，结果把敌人吓跑了。百姓看见自己的东西未被抢去，房屋未被烧掉，就更加对青抗先感激了。于是募捐买枪械，拆庙换武器，造成了武装斗争的热潮。青抗先中的优秀分子，更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游击小组就这样的产生了。因此就推动了许多的村庄，纷纷组织起游击小组。

一九三九年五次战役之后，敌人以开始由安国据点伸展到明光店五仁桥等处。当时汉奸极为活跃，时常协同一两个敌人到流昌逞凶。在威迫之下，流昌竟不得不建立联络员，于是抗日工作顿形消沉。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支部负责人乃提出建立游击小组的号召。首先抽出一部份党员作骨干，随即动员了农救会、青救会等团体中的积极分子，踊跃参加游击小组。这样，一个很健全的游击小组就建立起来了。它的组织共分三班，每班十人，并有班长。游击小组由农救会公开领导，但实际上是在支部领导之下，游击小组建立之后，将流昌与敌勾结的汉奸杜老段枪决了，虽然某些地主颇有反感，但一般人民情绪为之一振。同时游击小组开始破坏明光店与五仁桥间的汽车路，并不断袭扰敌之据点。后来由于各方面的配合，将工作深入到五仁桥据点之内。敌人在我不断打击的恐慌之下，乃于一九四〇年秋撤走。这一事实不仅教育了流昌人民而且也教育了冀中广大人民，只有对敌作顽强的斗争，才有活路。

安平黄城的实例，给我们又一次的教训。原来在一九三九年秋季以前，黄城在敌威迫之下，曾经建立了联络员，并不断的资敌，以求得一时的苟安。在这种情形之下，公开斗争都荫蔽起来，而黄城村民乃日渐麻痹，以为这样可以长期混下去了。然而敌人并不以为满足，于是对黄城大举烧杀，以迫使村民，更进一步的屈服。其知这样一来，却深刻的教育了黄城村民，他们恍然觉悟的说："原来敌人是喂不饱的狼啊"！在敌人烧杀之后，人民望着倒塌的房屋，抚着满身的创痛，他们以愤恨代替了悲伤，马上召集全村村民大会，一致通过誓死反抗，永不资敌的决议。于是人们拿起土炮火枪，开始向敌人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威胁利诱的阴谋。黄城至今不仅赫然站在滹沱河畔，而且成为冀中平原上战斗的模范村。这就是游击小组所以产生的又一实例。

（6）由于我之工作更加深入，加以敌人的日益残暴，冀中妇女的民族觉悟大大提高

了。所以部份的妇女，提出参加八路军的要求。而且许多地区，由于青抗先与游击小组对敌斗争的活跃，刺激了妇女开始组织自卫队，成为妇救会领导下的一支妇女武装。她们从此积极的参加了交通战。

（7）民兵与自卫队有了具体的分工，自卫队的任务，即是站岗放哨，送信及一般的抗战勤务等。民兵则以战斗为中心任务。而夜间岗哨及其它对敌封锁的主要警戒任务，由民兵担负。人民武装在斗争中日益健壮起来。而各种制度亦日益走上轨道。但人民武装在内部领导上，仍存在着打骂方式，对群众关系上，仍存在着强迫命令的现象，而大部干部都吃公粮，领津贴，影响干部与队员间的关系。游击小组组员也都脱离生产，每月领受大批公粮，增加村民的负担。所有这些，都必然障碍了民兵的广泛发展，及其对群众的关系。某些地区游击小组内混入了地痞流氓，借以横行霸道。平时则乘机抓人罚款，战时则借故逃之夭夭。这些现象引起群众极大不满。而一些顽固分子则更引为反对整个游击小组的口实。因此当时民兵仍不能为人民自己最健全的武装。

2、如何进行斗争

（1）军事方面：敌人在冀中占领了城市与某些市镇以后，很快即依靠这些据点，向广大乡村作面的扩张。五次战役的围攻，是其最初采取的步骤。接着就是连续不断的大小扫荡，由分进合击进而为面的搜剿。由以城市为扫荡中心，进而以乡村为扫荡中心。据点则由一百多个，增加到四百三十多个。这一发展的趋势，不仅日益增加了我大兵团分散活动之必要，而且也日益促进了我人民武装广泛开展的运动。

所以民兵不能不由站岗放哨走向更进一步的对敌斗争。因此各个村庄的民兵，开始对据点布置警戒。但敌人几次吃亏之后，采取了迂回包围的办法。单个村庄感到不能应付，于是乃有各村联合对据点封锁的办法，就是将敌人据点周围，分成了许多相联的段，每段指定几个游击小组，日夜轮流监视敌探奸细的活动。汉奸出动立即捕捉，我们内部暗藏的奸细，也不使与敌人据点联络。最初当敌出动时，单个村庄的游击小组便可以火枪土炮打击敌人，但遇敌人兵力大时，便要吃亏。因此乃由少数民兵扩成为数十人的土枪队，及各村民兵联合战斗，用麻雀战术打击敌人。但这时仍不能操必胜之权，所以不能不更进一步与我游击队及正规军配合进行战斗。这一套斗争的办法，乃是综合许多实际经验教训的结果。

对敌袭扰乃是初期民兵的特长，随便跑到敌人据点附近，打上几枪，甚至放几声纸炮，也就可以弄得敌人惊慌失措，乱放几枪，消耗子弹。如藁无县的马村游击小组，分几路向北苏据点袭扰，距一里多地时，即打了一阵抬枪土炮，结果敌人慌张的打起机枪来。游击小组悄悄的从道沟回到家里时，敌人岗楼的机枪还在哒哒的响呢！马村的游击小组曾袭击过南焦的岗楼，事先派员侦察清楚，便在夜间拉队而去。他们分三路包围岗楼，首先就由东面开枪，敌人也对着东面打起来。游击小组又在西面响了两枪，敌人又把机枪转向西面。后来东西南北同时打起来了，于是敌人便向四面八方的乱射其枪。游击小组见这一袭扰任务已经达成，便带着胜利的愉快转回来了。

一九四一年夏，敌人在安博路（安国至博野）修筑两个岗楼，安国青抗先发起一块砖运动。他们以一部武装攻西边的岗楼，以吸引东面岗楼之敌伪前往增援。在东边岗楼空虚之际，青抗先即开始拆毁工作，每人背回一块砖，终于把敌之堡垒完全破坏，连一块败瓦残砖都不会留下。流昌游击小组、青抗先等配合三十三团及其他民兵，不断袭扰敌人之五仁桥据点，在周围把据点封锁起来，并深入到敌据点内打击汉奸，敌人在完全陷于孤立状态时，不

得已于一九四〇年撤出五仁桥。

正因民兵不断的围困敌人，袭扰敌人，保护了人民利益，所以人民对民兵则多方的拥护与掩护。而敌人则时时企图消灭民兵。如一九三九年秋，敌人初次在安平县建立据点，黄城的民兵大肆活跃，敌人感到极大的威胁，几次围村搜索民兵，终未达到目的。最后敌伪装一二〇师，在黄昏时到黄城，找自卫队游击小组号房子，在这种欺骗阴谋之下，捉住了一个自卫队长及三个游击小组的组员，结果给以枪杀。但其余民兵的斗争情绪反而愈加高涨。他们接受了血的教训以后，便用行踪秘密，流动无常的方式，向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生活方面，则依靠扣留奸商与资敌的物品，来维持他们的艰苦生活。

（2）交通方面：敌占领城市之后，首先在点与点之间，积极修筑公路，以便于敌之联络与运输，加重对我地区之分割，但由于我之不断破坏与袭击，敌人的企图宣告失败了。因此敌人乃进一步加紧构筑公路网，加强干线公路，增修平行公路。而其最毒辣的手段，则有所谓环城公路，在城之周围修筑一圈套一圈的公路，一圈完成之后，即进行圈内扫荡，摧毁我地方组织，建立伪组织与特务工作。

我们的办法，对敌之一般公路，则不断由民兵掩护民众去破，在主要公路与大据点附近由于敌人较强，则协同游击队与正规军，掩护广大人民，予以大量破坏。此时的分工是民兵直接掩护破路人民，游击队与正规军则警戒据点。例如有一次在一个地区中，曾发动了两万三千余人，在仅仅两小时内，破坏了一百六十余里公路。敌人强抓人民修路，但人民白天修起晚间则予以加倍破坏。所以敌之修路平沟与我之破坏挖沟，成为经常抓紧的拉锯式的苦战。

在严重的斗争中，我们在交通站方面，积累些经验，有了很大的进步。人民内缺乏组织性与经常性，进到按村分设，按班换替，能够不间断的实施。由破坏敌人公路之后，不积极打击敌人修复公路，进到切实继以袭扰敌人修复公路，以便继续的扩大破坏效果。不限于人力的破坏，并动员了牲口和犁以耕地方式，配合人力。由零碎的进到大的战役破坏。不但在陆上并扩大到河流方面。人民破路和武装掩护的密切配合，则进入有统一组织和指挥的严密计划时期。如一九四〇年春，敌人准备修筑沧石路，拟定在六月间完成，我们在全线上分工段进行反复不断的破坏，有一次在某段百里以内距离，就发动人民三万余人，进行了一星期的大破坏。

进行交通战，成为经常重要工作之一，区村各级均组织破路委员会。村破路委员会由工、农、青、妇等团体各一人，村长自卫队长青抗先队长等共同组成。其分工办法，支部书记或支部军委及工会农会主任负责动员人民，准备器具等，自卫队长或青抗先队长，担任行动与破路指挥。如以区为破路单位时，则另组区破路委员会，其组织与村破路委员会相同。各委员会则分工到各村帮助工作。而区独立小队，则担任警戒任务。发动人民多少，以破路任务之大小为决定，但动员人民，不能超过四十里地以内的范围（即是往返不超过八十里）以免人民过于疲劳。

由于我之不断破路和打击敌人小据点，因交通断绝，陷于孤立之苦境，结果不打自走。如通五仁桥据点之公路，因流昌民兵经常配合人民给以破坏。公路破坏之后，民兵即向该据点进行不断的袭扰，敌人感到孤立无援的危险，便于一九四〇年春，张慌的退出五仁桥。

（3）经济方面：武汉失守以后，敌人对敌后扫荡特点之一，就是在经济方面的大肆摧毁与掠夺，这就是所谓“以战养战”的阴谋。特别是在一九四〇年春季扫荡中，敌人由以城

市为扫荡中心，进而以乡村为扫荡中心。便企图改变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从乡村在经济中的优势变为城市的优势，改变乡村包围与孤立城市的形势，而由城市统治乡村。即从我之优势，变为敌之优势。在这一企图下，其主要办法是：每逢乡村集市，则出而抢掠，使人民不能买卖东西，同时诱迫人民到城市赶集，谓可以保证安全。敌人抢掠更加凶暴，任何东西都要抢掠破坏，甚至将民众锅盆器具完全砸毁，并准备大量芦席与麻袋企图抢麦。

为了对付敌人这一毒辣阴谋，冀中民兵首先进行空舍清野的运动。另一方面则努力春耕，扩大生产以至保护麦收。一九四〇年夏，在保护麦收方面，提出早割早打，快割快打，分割分打分藏的口号。民兵协同游击队与正规军，到处袭击与阻止敌人的抢掠。这一年麦秋的丰收，为冀中历史上所少见，在我军民协力保护之下，敌人的掠夺阴谋，终于宣告失败了。

在保护物质资源方面，冀中民兵的斗争，表现了极其英勇而果敢。曾经无数次的夺回被敌抢去的东西。如藁无县的马庄，在一九三九年夏，民兵配合区游击队在东侯村，伏击由无极城内出动准备抢掠的敌伪军三十余人（伪军占多数），结果打死了敌伪十一名。在战斗中间，敌人曾用机枪掩护一班人企图冲锋，但在民兵坚决打击之下，终于退却了。参加这次战斗的，有马村游击小组，及青抗先的“坦克队”，并有附近村庄的民兵，与区游击队的配合。战斗胜利了，人民热烈的慰劳，成堆的粽子与鸡蛋，都代表了人民兴奋的情绪，也更鼓励了民兵的胜利信心。

这同一的民兵，带着胜利的心情，在一九四〇年秋，又配合了独立营参加北焦的战斗，打击了北苏出动抢麦的敌人。原来有一次，敌人在后北焦抢了麦子，正向北苏据点运输的时候，我某团闻讯，即驰往追击敌人。这时区游击队绕向敌退路杨家庄设伏，马村民兵便飞跑到敌后李家庄。敌人被追击后，即逃到李家庄南边，被我民兵突然一打，敌人便把大车麦子及捕去的人，一齐丢掉了，拚命奔向北苏。刚走到杨家庄，又遭我区游击队的截击。敌人乃丢下自行车两辆，太阳旗两面而逃。在检讨经验教训当中，民兵深恨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杀伤。原因是我们原始的武器效力太小。这就是马村民兵后来购置火枪的先声。

经常的改变集市的时间与地点，以武装掩护我之集市，并袭击敌据点之集市。这是民兵配合游击队的一般任务，至于防止走私，查获资敌等事，民兵都曾经起了，而且继续起着伟大的作用。

（4）政治方面：敌之反复扫荡，在政治方面，主要是摧毁我地方工作，逮捕与屠杀工作人员。对人民则兼施威胁利诱与挑拨离间之毒计。一九四〇年双十纲领之颁布与实施，乃是我抗日根据地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他直接粉碎敌之各种政治阴谋。所以敌人也就大肆造谣破坏，特别对于我们随着双十纲领颁布后的宪政运动，敌人更极尽其阻挠与扰乱之能事。

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我民兵如何进行斗争呢？

首先就是一九四〇年秋，空前热烈的民主选举运动。根据定南、深极、饶阳、博野、清苑、蠡县等处的统计，村选中公民数为七十六万九千三百八十五人，参选公民数为六十四万六千〇五人，即是说参选人数占公民数百分之八十三点九。区选公民数增为七十七万四千六百一十五人，县选时公民数增为七十八万〇九百一十三人。公民人数递增的现象，表示了在直接的平等普选秘密投票下，发扬了民主精神，掀起了民主普选的人民运动，把一切抗日阶层的人民广泛的动员起来。

可是这次民选，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据点周围的村庄，在敌人不断的扰乱破坏之下，如果没有民兵的保卫与掩护，则民选如此的胜利完成，将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我们知道，在选举之日，近敌区的民兵，都是组成几道封锁线，以防敌之扰乱破坏，如在藁无县马庄郭庄一带，为了选举的胜利进行，民兵布置了两道封锁线。第一道是爆炸封锁线。第二道是武装封锁线。另外还有“节节哨”（即×步哨），达敌之据点，敌人出动时，则鸣枪一响，敌人来的多时，则鸣枪两响，飞机来时，则击锣鼓。有一次敌在选举之日出动，直奔马村而来。游击小组予以痛击，结果敌人吓跑了。选举的进行，丝毫未曾受到影响。献县六七区保卫选举时，民兵也布置了两道封锁线。一为内线，负责岗哨警戒与情报工作，每天供给选委会以各方面的情报。另一为外线，即是民兵不仅对敌据点予以封锁，而且不断进行袭扰。蠡县大曲堤村距离据点仅四里，中间并不隔村，在进行选举时，由于对敌警戒封锁的严密，连续演剧三天，才胜利的结束了选举。

在许多近敌区的民选，都是在这民兵保卫之下，胜利完成的。此外广大人民的武装，维持了抗日秩序，巩固了抗日政权。不断的捕捉敌探奸细，不断的打击投降的活动，他们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不能估计在内的。

（三）小　　结

在这一时期，冀中由比较不剧烈的斗争环境，急剧转到紧张战斗的环境。而且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与残酷。因此冀中民兵，便不能不产生与锻炼了自己，成为日益巩固与壮大的人民武装之核心。因为不如此，便将不能保卫村庄。

假如说第一时期，奠定了民兵发展的基础，那么这第二期，却发展了民兵，并成为保卫村庄的武装力量。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由于各方面工作基础日趋巩固，也推动了民兵工作的进步。而由于民兵与各种斗争配合的更加密切，也就保证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

当然在这一时期，民兵的组织还未走上健全之路，而在领导上还存在着乱打乱骂乱罚的严重现象。对人民关系方面，强迫命令代替说服教育，也到处传播着恶劣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民兵的领导干部，仍多是历史上所留下的遗产，他本身就是凭借官式的命令而来担任工作，所以也就凭借官式的命令而推动工作。然而经过这一时期实际斗争的锻炼，冀中民兵已经创造出自己的人才来了，旧军人旧警官之类的角色，已经快到让位的时候了。

三、第三时期（自一九四〇年秋至一九四二年夏）

（一）当时的环境

一九四〇年的春夏两季，我们曾经粉碎了敌之扫荡，胜利的保卫了我之麦收，这不仅打破了日寇“迅速肃清平原”的迷梦，推翻了日寇“以战养战”的企图，而且百倍的提高了我军民的胜利信心，奠定我主动的向敌进攻的基础。所以在百团大战开始之后，我们能够连续的进行了交通的破击战役，×河大肃战役，以及冬季进攻战役。

敌人接受了痛苦的经验教训，对其在冀中“确保占领地”的计划，不能不作重新的考虑，这就是一九四一年春季开始，敌对冀中采取新花样的由来。新花样的基本精神何在？那就是敌寇在冀中两年多的扫荡，以“速战速决”来达到“确保占领地”的企图，已证明其为不可能。因此它便不能不由“鲸吞政策”转为“蚕食主义”，这也就是所谓“持久战”的决定。

持久蚕食政策的具体实行，有如下的方式：

1、由点线向面的发展（主要的点）

每个据点预计在一定时期内，将周围一定地区范围内的村庄，变为爱护村，首先以据点的敌伪军反复的连续扫荡，实行抢掠烧杀的残暴破坏，并配合以欺骗利诱，使人民屈服，派连络员以至建立爱护村。由此即结束“以军事为主”的阶段。

此后即将军事重点推向新的地区。在已建立的爱护村，将军事放在次要地位，以少数敌伪军及宪兵警察的不断出动，以防我工作人员及小部队的伸入，以便于破坏我党政民的各种组织，并捕捉我工作人员，以从事其所谓军事政治交通等的建设，而达到巩固的确保。

2、由其占领区向我区发展

第一种办法是把我某区用相连之线分离成两块，将点线内之块，作为其清剿区、以点线封锁与切断我军及党政民工作人员之进入，以便对清剿区之确保。第二种办法，是将其占领区的我之某一地，计划为清剿区，将这块周围之边沿，建立据点岗楼，或在此块建立据点群，以便于其进一步的巩固与确保。第三种办法即是有计划的扫荡，特别是大扫荡。

前二种办法（特别是一二两种办法），只能实行于近敌区，不能实行于我之基本区，并因我之基本区的存在，妨碍其蚕食，包围与孤立其点线，就使敌人不能不进行定期的大小扫荡，一方面企图消灭或打击我之主力及对我区实行“三光政策”之毁灭，同时也是积极的配合其蚕食之进行。

敌人这些花样的翻新，手段的毒辣，无疑的给我们增加了新的困难，使斗争更加尖锐与残酷。然而我们应该认识这乃是我们胜利与敌人失败的结果。我们的任务，还在于使敌人走向束手无策，日暮途穷的命运。

（二）民兵的斗争

新的斗争形势，要求人民游击战争更加广泛的开展，民兵的组织领导更加健全，斗争方式更加灵活而有新的创造，各种斗争形式更加有力的配合。历史的车轮，正在这种轨道上前进着。

1、组织与领导

（1）武委会的产生

长期的斗争教育了冀中广大人民，并且锻炼出大批优秀干部。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实基础。在人民武装方面，更是毫无例外的。假如说前时期，由于这些条件的缺乏，曾不得不采取自上而下的委派方式，而且不得不指望旧军人旧警官等。因为民主的缺乏，曾影响到人民武装之广泛开展。那么在这一时期却已具备了新的条件与新的经验，因而不能不采取自下而上的举选方式，而且不能不依靠于人民自己的优秀干部了。武委会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一九四〇年秋，冀中各县首先成立临时武委会，其领导干部仍是委派的。但这乃是走向民选的过渡性质，临时武委会的任务，基本是为了进行动员工作。民选问题在人民中进行深入的教育以后，乃正式着手选举武委会。一般的选举方式，村自卫队队员大会选出村武委会，由本村武委会代表选出区分会，由区分会代表选出区武委会，由区武委会选出县武委会。其余均如此按级选举。

民选武委会产生以后，冀中人民武装有了更健全统一的领导机关了。这不仅是组织形式的改变，而且由于大批优秀干部的当选，代替了许多旧式的人物，在领导方式及工作作风上，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当选的干部，在年龄上说，多是青壮年，在成分上说，则贫农占大

多数，中农次之，富农等又次之，过去乱打乱罚强迫命令等现象，逐渐的克服下去了。在战斗环境中，动摇逃跑变节投敌的事情，差不多是很少发生的。而且日常工作上，按级的督促检查会议汇报等制度，也开始走向了正轨。前武委会的组织系统表（略）

这一组织系统是经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改组后的组织形式。由于民兵的成员都是参加各团体过生活与进行学习（如青年参加青救会，农民参加农救会等），党的生活，干部调动，民兵亦无独自系统，因此原来的宣传部与组织部都取消了。而县以上的妇女部，亦因不切合实际而取消了。为了适合斗争的需要，就增设作战部，爆炸部与训练部（军事教育）。

2、人民武装的整训

（1）人民武装的编制

武委会成立以后，冀中各地人民武装，一般的都经过了整训，现在自卫队的编制如下：

子，模范班——即是游击小组，由青抗先与模范队中的优秀分子组成。因秘密问题，不成立单独组织，仍属于原队籍，按规定小村十人中村二十人大村不超过三十人。不吃公粮，不脱离生产。其任务主要是，作武装斗争，即闻枪炮声则弃事而参战。

丑，青抗先——由十八至二十四岁的男子组成。其战斗力强者，发给步枪，次者决枪，火枪，一般可与模范班执行同样任务。

寅，模范队——由二十五至三十五岁的男子组成。其任务是，担任一般的站岗放哨，参战勤务及交通斗争的任务。

卯，混合自卫队——由三十五至五十五岁的男子组成。其任务主要是后方战时勤务，如抬担架、街头站岗、破路、运输、送信及作响导等。

辰，妇女自卫队——又分青年壮年老年等队。其中优秀分子，也有组成妇女模范队的。妇女自卫队的任务，主要是站岗放哨送信、缝洗军衣，制造军鞋军袜等。其中积极而身体强壮份子也有参加破路斗争的。

巳，少年队——是青抗先的组成部份，构成一个小队，由青抗先领导，由十六七岁的男子组成。其任务即是站岗送信，发动慰劳，进行宣传鼓动等。

（2）整训的经过及其结果

在整训的过程中，许多地区，对模范队曾决定必须是自动参加，如有不合条件者，则予以清洗。参加模范队者，应有一定手续。强迫送入模范队，甚至趁此机会，过渡到正规军去，这种办法，造成一些不良影响。现在由于模范队的整理，逐渐克服了这一倾向。

游击小组曾经发生过这种倾向：

子，脱离生产，吃公粮，绝对不摊抗战勤务，在各方面特殊化（有一时期，全冀中民兵吃公粮，超过三纵队的数目）。

丑，在发展组员时，把青抗先模范队的干部与积极队员，过多的参加了游击小组，使人民武装的质量大为减低。

寅，在收枪时，用不民主的方式，将青抗先模范队较好的武器，全部集中在游击小组，使人民武装不易作战。

卯，在作战指挥上，未能统一于武委会，忽略与其它人民武装的配合，变成光杆的先锋主义。

上述的现象，相当普遍发生，影响到一般人民武装的发展，与青抗先的消沉，致放松了

对青抗先模范队的领导。促成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乃是由于某些支部对游击小组作用的过高估计，而对武装政策了解片面性所致，支部注意了这一方面，认为只有游击小组，才能消耗与打击敌人，把广泛的开展人民游击战争了解为仅限于发展游击小组，而忽视了对整个人民武装的领导。这一现象正在积极克服中。

人民武装的整训，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如在基本区，则多以区为单位，将各种武装，（如青抗先模范队等），分期进行集体整训。在近敌区则多以村为单位，由区干部领导，在战斗姿态下，进行集体整训。整训的内容，除进行一般政治教材如自卫队员课本，双十纲领，政治形势，青抗先的工作及文化课本等外。在军事方面，则多进行游击战术及实际教育，如野外演习，防空防毒演习，及实际作战经验教训的检讨等。整训的结果，民兵的质量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加强了组织观念与纪律生活。同时发扬了民主主义的作风。

应该指出，在武装科时期，只看到军事上的要求，不看到群众性的特点，在领导上产生过于集中，加之当时干部成份不好，在人民武装中造成了强迫命令乱打乱骂，轻视与打击青抗先现象。在武委会成立后，为了纠正过于集中，发扬民主，则又矫枉过正。因为确定了青抗先的独立性，指挥青抗先必须经过青抗先系统，虽将青抗先队部转设武委会组织之内，但各级青抗先队部，未接到上级青抗先队部命令指示时，虽有上级或同级武委会的命令指示，仍不执行。指挥游击小组更加困难。因游击小组是支部领导的秘密武装，（组织上）村武委会主任如果是军委，则可指挥之，如不是军委，则不能指挥之。对青抗先的指挥，也是这样，如主任是军委，在青抗先不听指挥时，则以党团决定处理之，青抗先的独立性也就实际上不存在了。这一方面表现了党对民兵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人民武装系统的不正常状态。武委会对于游击小组青抗先不能指挥，则武委会成了一个无力的组织，人民游击战争必不能发挥更有计划的威力。因此根据人民武装民主与集中的原则，决定支部军委，为村武委会主任，但须经过人民选举产生之，以统一党内党外对游击小组青抗先的指挥。各级武委会之青抗先队部，在青年运动上，则对青救会负责，青救会对于青抗先的青年运动，则经过青抗先队部去作。在军事行动上则受同级武委会的指挥，武委会关于青抗先的军事行动，则经过青抗先队部去作。这样就解决了过于民主的偏向，而又不是恢复武装科时的过于集中的偏向。

这还应该指出，游击小组与青抗先何者成为民兵中心核心问题，有一时期因过于重视游击小组而放松了对青抗先模范队的领导，而在部分青抗先同志中，又因不满过度抽调青抗先的好人好枪发生了青抗先第一或与游击小组平行的倾向。这显然都是不正确的。青抗先的积极勇敢富于朝气，是其特长，可是他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在成份上政治质量上，是不如游击小组的，而游击小组则是党员中之勇敢坚决优秀者，故游击小组应成为民兵的核心，应成为在支部领导下以保卫村庄的武装。

３、党的领导及对人民的关系

（１）支部与游击小组

在整个人民武装的组织系统中，党是领导的核心。离开了党的领导，而谈冀中民兵，是不可想象的事。特别是游击小组，是支部领导的武装。可以这样说：冀中游击小组的普遍发展过程，也就是党在人民中威信日见提高的过程之一。没有支部的村庄，就没有健全的游击小组。而支部最健全的地方，注意对游击小组的领导，即使在近敌区，甚至在敌据点之内，也有游击小组的活动，因而各种工作也就坚持着发展着。如深县某某村，被敌人占领后，该

村游击小组搬到邻村，经常回到本村活动。经常给外边探消息，并千方百计打击汉奸的活动。

（2）党员所起的作用

游击小组在最初建立时，由于某些支部，领导薄弱，常使地痞流氓混入其中，结果造成一种坏影响。但在后期，支部对游击小组的成份，非常注意审查，一般的都是雇农贫农，占绝对优势，中农次之，其他成份则不多见，较好的武器都在党员及优秀份子手里。所以在个别游击小组内，曾有敌探混入，企图破坏枪支，很快就被发觉。

在党的认真领导下，游击小组保证了政治上的纯洁及其战斗力的坚强，因此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如在藁无安国等县，因见与民兵作战，影响自己生产，曾发起节约一顿饭的运动，以解决民兵生活问题。在过旧历年时，人民集合慰劳游击小组，有的老百姓亲切地说："保卫了一年了，应该好好的过个年吧"。对于民兵的牺牲者，人民即开追悼大会，如在郭庄开追悼大会时，区干部亲往慰问家属，老百姓便兴奋的说："这多么光荣啊，咱村叫大炮打死的那些人，谁来追悼啊！还是模范班好"。在会场上立刻报名参加模范班的有四十多个人。

在斗争最残酷的地区，参加民兵的大部份是青年党员。如在献县的某村，游击小组二十三个组员，只有两个不是党员。党员在战斗中，一般的都能作到作战在前，退却在后，如对三乡团据点袭击中，党员最能起英勇的模范作用。在破坏交通时，党员在据点附近砍电线，收回的电线，还要分给人民（每斤电线可卖八角）。有一次在破坏平大公路时，敌人发觉即行开枪，在子弹密集的情况之下，有一个民兵吓得不能走动了，于是两个党员冒着危险，把他抬到安全地带。由此可见，党在民兵中所以成为团结与领导人民的核心，绝不是偶然的。

（3）党在领导上的缺点

支部工作强，游击小组的政治质量也好，这是一般的现象。但不注意或不正确的领导，则游击小组不但不能起应有的作用，人民反认为多余的负担。如安国流昌游击小组，曲解其实际上脱离生产，自己租种地耕种，成天穿上好衣服，吃饱了饭背着枪，在街上蹓来蹓去，也不找机会打击敌人，如同旧时的保卫团一样。因此非常引起人民的反感。游击小组在人民心目中，甚至不如村剧团的值得重视。象这样的游击小组，发展下去，必然完全脱离人民，而走向危险的前途。

另一种倾向就是游击小组完全取消吃公粮以后，因而造成工作上的严重损失。如在斗争较残酷的近敌区或敌占区，民兵的战斗任务特别频繁，事实上不能不影响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不适当的解决民兵吃饭问题，则必然影响到对敌的斗争。深北县某某村（已建立据点）老百姓在取消吃公粮后，自愿捐粮供给游击小组吃饭，游击小组始终坚持对敌斗争。任邱某些地区，民兵在停止吃公粮后，由于经常作战，影响生产，而未能适当的解决吃饭问题，许多村庄游击小组把枪枝坚壁起来，也有因不能站脚而逃走的，结果游击小组终于垮台了。失去民兵保卫的村庄，不能不资敌，而资敌却是填不满的洞。有些民兵配合正规军游击队送公粮，正规军游击队有饭吃，而民兵就挨饿。如大城二区，实际上只要游击小组真正积极活动，有效的打击敌人，保卫了村庄掩护了抗日工作，人民是乐于负担游击小组的有限粮食的。因为这比较资敌数目要少得太多了，所以这一吃饭问题，要按具体情形，予以适当的处理。现在规定游击小组一律不吃公粮饭，但在作战时，凡作战一天者，都吃一两顿饭。

（下略）

同意陈饶之分散计划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

陈饶：

来电悉，同意你们分散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目前国共已接近一步，但要具体解决悬案，恐尚须拖一时期。在远东慕尼黑危险即国民党投降危险存在时期，我们向江南、浙东发展是不必要的，在此种危险已不存在，我们须准备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这是总方针。

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即击溃德意罗军四十余师，包围德军二十二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廿一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

少奇同志已安抵延安，并告。

毛　泽　东

一月五日

北方局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一九四三年，是国际上两条阵线进入决战之年，反法西斯阵线力量在日益增长，而法西斯阵线则败局已成。在我国内部，自国民党十中全会后，民族团结已较前进步。国际国内形势都在向我有利方发展。同时，敌寇为挽救其垂死命运，必将加紧对我国正面的进攻与敌后的扫荡；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必将进入空前紧张空前艰苦的局面，华北党的基本任务，在于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替反进及战后作准备，以便准备迎接伟大新时期之到来。

（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一环，在于彻底实现民主政治，为此目的，必须：（甲）在根据地内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民主民生斗争。把民主斗争与民生斗争联系起来，把减

租减息、增加工资、反贪污浪费等等群众的经济斗争逐渐提高到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摧毁残余的封建统治，以巩固党在斗争中既得的阵地。（乙）有步骤的改造各级政权机关，特别着重改造区村两级政权机关，吸收广大人民直接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真正自上而下的实行民主，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示范于全国，使之与敌、伪、顽占地区有基本上的区别。（丙）在党、政、民系统中更加发扬民主精神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在干部中应进行普遍的民主教育，肃清干部思想上违反民主的残余封建影响。全党同志必须深刻了解民主自由不仅是基本群众的要求，而且也是团结各阶层的旗帜，不仅是大多数人民今日的愿望，而且也是战后全国人民的政治动向，党必须负责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胜利完成历史任务。

（三）依据各地区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继续发动与深入群众运动：（甲）在群众尚未发动地区，迅即根据当地情况实行土地法、劳动法等等保护群众利益的法令，发动群众争取经济政治权利的斗争，从斗争中大量发展群众组织，不应畏首畏尾延误时机。（乙）在群众虽已发动，但工作尚未深入的地区，应即继续深入群众斗争，深入检查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等等执行的程度，制止封建残余势力的任何翻案复辟的企图。同时加紧巩固群众组织，健全各个群众组织的内部生活。（丙）在群众工作已深入的地区，应特别着重民主建设、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使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提高一步。各个地区群众工作的基本方针，仍在建立与巩固基本群众的优势和加强党与群众的亲密联系；应以此二者作为鉴定群众工作成绩的标准。（丁）在碉堡林立，分割细碎之敌我争夺地区，由于我之活动主要依靠统战工作，以及人民两面乃至多面负担，主要从减轻群众对敌负担的斗争中发动，号召全村团结应付日寇。减租减息工作，应考虑当地环境，适当改变作法，务须局限在不妨害团结对敌的范围之内进行。

（四）军事指导原则在强化普遍的群众性质的游击战争：（甲）必须加强民兵建设工作，扩大民兵数量，提高民兵政治质量，以及民兵的军事技能。（乙）巩固现有的县区游击队，加强其政治军事教育，使之成为群众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一方面能独立担负战斗任务，另一方面成为民兵的模范，领导民兵作战。（丙）提高正规军的质量，加强正规军中游击战的教育，改善教育方式，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加强各种具体政策教育，至如文化教育在基本根据地亦须大力进行。

（五）认真加强民众教育工作。教育方针：以抗日必胜的民族教育，民主教育与启发劳动人民的阶级教育联系起来。必须改进各地学校教育工作与切实建立各地通俗的民众教育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形，教育经费在可能范围内应酌量增加，教员待遇适当改善，小学教员每年除吃饭外以五石小米为最高标准。各地党的组织，必须动员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去从事教育工作，并纠正各地文化团体文化机关中的宗派主义倾向，改善出版工作，以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

（六）为着巩固一九四二年对敌政治攻势斗争已得的阵地，除使政治攻势今后成为经常工作外，在游击区受我宣传较深之群众，应注意从各种形式组织民众（如抗日保家会、忠义救国会）。在伪军组织工作中，应加强争取与瓦解工作，对死心汉奸组织须给以有效打击，以制止伪军组织的扩大，加强对敌宣传，尤其重要的是应掌握各地日本反战同盟的活动，对台湾、朝鲜人的争取亦须加紧，以便反攻形势到来之时，得到他们的赞助，而迅速获得胜利。

晋察冀边区六年来的工作简报

（一九四三年）

第一部份：晋察冀边区概况

（一）晋察冀边区现在实际上是晋察冀热辽五省边区，处于平汉、津浦、同蒲三大铁路北端，其间包括正太、德石、北宁、平绥（东段）平古等路，平、津、石庄、大同、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等战略要点，伪满（热、辽境）伪蒙（察南、河北之涞源、山西之广灵、浑源、大同等地）伪华北（名义上虽属南京伪政权，实际上另成系统），政权及我之抗日民主政权等四种政权。

（二）敌军：河北境内为敌一一〇师团，第十五，第八，第九混成旅团。山西境内为第三，第四混成旅团。冀东一部关东军及伪满军，平北一部伪满军。伪军正规军即所谓治安军（现改为绥靖军）之主力在冀东，一部在平汉线。（最近敌兵力分布又有新的改编及部署）。伪蒙、伪满、伪军北均名为“国家”，其政策、军队、货币等各有建制和指挥。其军队指挥系统是伪满、伪蒙属关东军，其余归华北派遣军。其间指挥不统一，三七年到三八年初表现得最为明白。其后伪满、伪蒙建制，华北派遣军有权指挥。由为敌伪政权、军队不统一，包含着许多接合部与不一致，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另一方面，在对敌军事，政治各方面则又首当其冲。

（三）边区华北各根据地如晋西北、晋冀鲁豫、冀南、冀鲁边等，地域上都能衔接，战略上与战役上，都有协同可能。这里主要是我与敌伪的尖锐斗争局面，无顽（顽军）无友（友军）。

（四）边区在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区，冀中区及冀热边区。北岳区设一、二、三、四、五、十一等六个专署，〔平北归十一专署（平西）领导〕，人口三百八十万。冀中区设六、七、八、九、十等五个专署，人口五百五十万。冀热边区设五个专署，人口三百万。现全边区共有十六个专区，一百〇八个县，约一千二百三十万人。党的领导上，北岳、冀中区域，由分局直接指导地委，冀热边区设特委下再设地委。军事建制上，军区之下，北岳、冀中共分十个军分区（北岳区二专署没设军分区）冀东为一个军分区的编制。

全边区现有（冀中五一扫荡前）党员二十五万余。

抗联会员（只北岳区）九十六万余。民兵（只北岳区）十八万余。

军队除三纵队调出者外，六万六千余人。

第二部份：晋察冀边区略历

第一阶段：创造建设时期

（一）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会议，毛泽东同志提出：我军战略方针基本是游击战，实施

可能与有效是在敌之侧后方。当时国日两方正鏖战于南口，毛主席首提出：我军可出一部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我一一五师是最先出动时南口已失，何应钦要接到蔚县途中，蔚县又失，阎锡山要我赶到飞狐口（蔚县南）阻敌前进。迨我军先头部队赶到太原，敌人已进逼阎锡山之国防线——雁门关，平型关线，九月二十五日平型关战后，我一一五师回五台，正值忻口激战，娘子关危殆华北军分会决定，总部率一一五师主力南下，留一个团，骑兵营，总部特务团之两个不完整的连作基础，以五台山为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约在十月二十三日）。这个任务是很快的，很仓促的，（但并非突然的）放在我们身上。总部过正太线南下途中，娘子关，忻口先后失守，我区遂首先处于敌后。十一月七日宣布奉朱彭总付司令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此时友军金宪章一师留在五台山，原是阎拨归朱彭指挥者，主力南下后，金自请指挥，我亦给予一些帮助。

（二）当时创造五台山根据地的条件是：

1、日寇战略上速决南下，对我并不重视（因知我军主力都走）敌后空虚，利于我发展游击，打扫战场，收容散兵，逼进敌交通线，求得一些胜利，一方以武装自己，一方以提高军民作战信心。

2、国民党统治滚滚而去。徐州武汉未失守时，国民党需要我在敌后。

3、本区曾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虽不如南方如大革命和内战的轰轰烈烈，但基本群众是受到党的影响的，过去基础虽不甚大，且损失严重，但基本的组织和党员还保存着一些。同时本区历来处于民族斗争前线，有悠久的民族斗争历史，人民强悍，新的民族战争，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

4、总部留下一部武装，北局派来一批干部，给根据地的创造以一笔本钱。

（三）根据毛主席五月苏区党大会报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中强调领导权和民主的精神，根据北方局给我区及华北党关于党的任务（主要建立军区和边区政府）的指示，我们是这样着手工作的：

1、搞武装：分配原来留下的武装并组织游击队到各战场。打小仗，收集武器，发展武装。

2、同时分配干部到各村组织群众建立动委会（实际上是新政权，对旧政权说就是第二政权），与改革民生的号召联系起来，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如最初在阜平城南庄，过去吃树叶，老百姓都无权采地主的，当时即找地主谈判，许可群众采树叶，树枝归地主）并将负担放在有钱人身上，减轻群众负担。

3、政权问题：在晋东北：维持阎之原形，尽量保持秩序，暂时维持山西政权（实际上我可能控制），以便与阎锡山保持不破，使社会秩序不过于混乱。在当时，这一方针曾使我们人力物力的动员得到很多方便。在河北方面，旧政权逃之夭夭，我军就利用合法（八路军）实行放县长，建立新政权。

4、扩大地区：打通冀中平原：不局限于五台山求得最大回旋。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关键，由于这一方针我们很快的打通平原，和冀中党与吕正操部取得联系。

5、培养干部：建立军政学校及各种党内外训练班，教以游击战及各种政策（陶尚行著）十大纲领，解决当时要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

6、筹备边区政府成立：派代表到冀中北岳各地（主要到冀中）宣传筹备边区政府成立。诱自带股并利用武汉时期敌后需我，三八年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并迅速获得蒋及行政

院批准。

7、强调统一党、政、军、财，以便建立各种制度，实现各种政策，因而混乱较小且时间较短。

8、在各地建立与发展党：由军队派出工作团协同地方同志进行之，利用合法（八路军的名义）利用政权（动委会）由上而下大胆的放手干，以便达到由无到有由数到质。

9、三八年三月北局派彭真同志来边区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四月会议）王明路线（具体的是临汾会议的精神）对我们政治上的影响。

在群众的发动上，三八年五、六月间晋东北减租减息斗争曾一时消沉，但随即纠正，军事上强调正规——这还不完全是王明路线的影响，我本人亦有此思想。但王明路线所谓的正轨是依靠国民党，用飞机大炮与日本打，我的正规思想（八路军的正规）即是从内战的经验出发，其来路不同，但错误则一，在另一方面，则建设根据地的观点，领导机关开始就有，此时更进一步强调长期的革命根据地的口号，同时在讨论中央的指示时，亦特别强调了领导权问题。"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也都提出，并曾高嚷一时，但由于有我们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故没有过于吃亏。

10、此时阎派郭如嵩到五台企图把我二分区部队要过去遭我拒绝。又派杨澄源到晋东北统一指挥郭如嵩及金宪章三八年秋，敌围攻边区，郭如嵩大败而逃，只留金、杨 。

11、三八年五月，开始整理组织，洗刷一些投机分子及叛徒，破获肖一平（军政学校）汉奸案，接连又破获李晓初（吕正操部政治主任）白锡麟（吕部参谋处长）等案，因而达到游击军（孟部），人民自卫军（吕部）统一为三纵队，解决了吕孟之间的纠纷（新干部与老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冀中的统一。但在此时个别县分的肃反上，则有部分过左现象。

12、宋、邓支队挺进冀东、冀东爆发了十万人民的大爆动，但这一胜利没有巩固（详见冀东部分）。

* * *

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三八年九月底是边区由创立到极发展的时期，在我手中的县城有数十个，党员数目约七万左右，武装在十万以上（冀中有一部分不巩固）群众普遍起来，敌人进攻武汉同时扫荡敌后，五台与武汉相提并论，引起国内国外很大的重视。自此以后即开始下降，而进入建设与巩固时期。

第二阶段：深入巩固时期

（一）三九年一月彭真同志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发展华中巩固华北的方针，我区重要工作如下：

1、从组织机构上改选村政权：三八年反围攻后暴露了村政权基础不巩固，敌必改造村政权，建立村代表会。

2、整理：从游击队中产生主力，合编某些单位，调整武器战力，使各分区相当平衡，并加紧训练。

3、巩固党：从健全领导，整理支部，一直到提高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巩固党。

4、群运基本方针是：普遍发展，深入减租减息斗争，争取基本群众优势，保证党的领

导，依靠基本群众的优势以巩固统一战线。

5、120师到冀中，巩固冀中，吸收不巩固部队，扩大120师，并帮助巩固三纵队。

6、成立冀察热区党委。肖克同志成立挺进军进驻平西。巩固平西，继续发展平北冀东。

7、巩固的另一方面即是摩擦：首先行政院下令取消边区银行，抵抗之；接着阎锡山转来国府命令撤消边区政府，抵抗之；接着阎派白志沂到雁北，并兼专员；随着张荫梧实行三环政策（先束鹿、藁城、后平山、灵寿、行唐、再后博野、蠡县）其第二环被挡架，最后率军到冀中，鹿钟麟派邵鸿基到冀中，提出鹿委县长，拒绝之；国民党派杜生远到冀中提出群众团体的隶属问题，经严词驳斥，最后邵、杜被赶，其成立冀中国民党的活动，亦未得成。鹿钟麟勾结孟阁臣（孟是励志社员，在易、满、徐收集土匪流氓三、四千人，开始时我派代表去受我委编为一个分区）准备配合鹿张（荫梧）进攻，三九年春首先解决之，将孟阁臣正法，张荫梧一部被解决，大部投我。随后有国民党指示柴恩波在冀中北部叛变，亦被解决。这样，抵抗银行解散，拒绝边府撤消，扑灭孟党，打败张荫梧，反对鹿钟麟，驱逐白志沂，粉碎冀中国民党的活动，逼走夏继礼（原孙殿英部，在行唐，二千余人，被追南下，与孙会合）。通过这样摩擦与坚决反摩擦斗争，边区才在地区上统一并巩固起来，国民党的据点，武装被肃清，冀中半土匪半抗日的武装被消灭（大部为一二〇师改编）从此以后，无友无顽（顽军）。党、军队、群众在坚决反摩擦斗争中，抗战初期对国民党的幻想大受打击，对党与军队思想上的巩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四〇年继续巩固方针的几个中心工作：

1、全区民主大选举：改选村代表会，建立县议会，选举边区参议员，初步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治。

2、整理财政，准备实行统累税（调查研究，拟定税则，准备在四一年开征）救灾修地〔进行大水灾后（三九年）的经济恢复工作，沿河滩地差不多都恢复起来〕抽地换约。（但救灾及抽地换约中，发生某些过左的毛病）。

3、继续整军及巩固党的工作：军中加强政治工作，地方党继续整理支部，洗刷投机分子及阶级异己分子。党得到进一步巩固。

4、发布双十纲领：由于群众取得确定优势，而且巩固了这个优势，转到由于群众反顽固斗争中发生“左”的倾向，因此，根据中央七七强调团结的指示，发布双十纲领更加在确保优势的基础上巩固统一战线。

5、百团大战，八月，执行总部指示，进行百团大战，向正太、平汉出击，主要在正太线上，担任重要一面。

* * *

从三九年到四〇年，深入巩固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对敌对顽，对边区内部的地主及奸细，异己分子的斗争中巩固阵地，打下以后更艰难的坚持对敌斗争的基础。此时党员十七万，军队约十一万，党与党军的质与战斗力均获提高，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这是执行中央、北局正确指示，并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政策之结果。但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这主要是“左”的偏向（如冀中除奸政策的执行中，北岳区抽地换约中，以及三三制执行中）干部思想上在反顽胜利和百团大战胜利后对未来极困难，极艰苦的形势，估计不足。

第三阶段：坚持对敌斗争

（一）三八——四〇年春的敌我斗争：

1、敌开始对我轻视，迨我壮大而说威其心脏，乃又视我为心腹大患。但开始还无经验。对我战术仍是老一套的正轨战术。如三八年春，敌一个联队进入涞源，我军于紫荆关南北两翼交通线不断打击其运输及掩护部队，使敌孤困来源，被迫退走。又如三八年二月，为配合徐州之战，我军向保定，清风店，望都，定县，同时夜袭，除保定只攻入城关外，其他都打进城去。二月底敌一个旅团一路进入阜平，扑空，我以游击运动袭扰敌后，次晨便仓皇退去。三八年秋，敌正面进攻，武汉正在紧急之际，九月二十二日开始对我围攻，河北、山西、蒙疆互相配合，进占五台。

2、三九年中，敌以为我之游击战术只是敌进我退，老一套的"避战"因而常以一个大队的兵力向我巩固正挺进，寻求作战或袭我后方，在耿镇，高洪口一带屡被打垮，特别经过五台东北崇山峻岭间之上下细腰涧，陈庄，黄山岭（阿部中将授命之处）、大龙华等歼灭战及冀中齐会等战斗后，敌始不敢孤军深入。从而对我之游击战作历史的全面的研究，把内战时蒋介石对我战术及我公开出版的游击战术大量印发到部队研究。敌一一〇师团长桑木宗明采取了蒋介石的堡垒政策，主张"极端分散配备"。

3、三九年秋与四〇年秋，敌仍采取象三八年的全面扫荡（三九年秋是报复阿部中将之死，四〇年是报复百团大战之失）除进行大烧大杀外，开始进行堡垒政策。百团大战是我主动的战役进攻，攻占敌据点堡垒，正太被破，井陉新矿被毁，给敌更大威胁。但由此使我军的力量大大的暴露，使敌重新对我力量作新的估计，重新对我采取新的政策。

4、总结三八年到四〇年春敌对我斗争过程，三八年开始单独正面进攻，无效，三八年秋，以全面围攻，又无效，三九年中曾采取孤军挺进，失败。三九——四〇年春，开始建点，配以扫荡——即所谓"分散配备，联合扫荡"。

5、我之战术：在山地，基本上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如歼灭孤军深入之敌）这里所谓运动战，仍多属特种战术（袭击、诱袭、夜袭），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提高了的游击战。在平原，一般都是游击战（村落、地道、青纱帐的游击战）。

（二）四〇年以后的敌我斗争：

1、由于我区在地位上突出（直接威胁敌人心脏及伪满）、政治上突出（首先出现之根据地、边区政府的存在）和军事上的突出（百团大战为主角之一和我军进入冀东），敌便由特别轻视而转入特别重视，特别增加压力于我。

1、1941年大扫荡：自敌于春季扫荡中条山的所谓"铁壁合围"（即高度运动战）成功后，即将其机动部队转入我区平汉，德石路上（二个师团）。又抽集邻区兵力配合本区守备之敌，于九月二十一日大战围攻——所谓"铁壁包围"（即并列和纵深的持久围攻），其目的在歼灭我军。时达两月，未达目的而退。敌除过恢复了百团大战时被我克服之若干据点而外，采取吞食分割政策——不断的逐堡推进，建立封锁沟、封锁墙。特别分割冀中北岳的联系。四二年初，冀中的敌人由北而南，大块吞食，使十分区首先变质，五月，对冀中全面进攻，逼我主力转移，在平原又普遍筑堡建点，使整个冀中变为游击根据地。

2、四一年春敌提出治安强化运动。四一年对北岳，四二年对冀中的大扫荡，都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即提出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从此敌我斗争便进入更残酷复杂的阶段——即全面战争阶段。敌人除军事蚕食清剿之外，又配合

以以伪力为基干的治安强化运动（蒙疆叫施政跃进运动），敌治安强化运动共五次，每次无有重点，军事、政治、经济或文化思想，朱深上台之后，又号召新国民运动。敌人是企图以此达到其组织目的，因此，我除以军事外，必须针对敌之重点配合以各种斗争，以军事（游击战）为骨干，但不否认其他方面，相反，有的军事行动正是为着配合达到某种目的（春耕、秋收、征运、政治攻势等），如我于敌五次治运时开展政治攻势；开始以苏联冬季攻势的大胜及太平洋上美军的活跃，不断出捷报，并将敌五次治运的宣传中心加以总的驳斥，准备对付其太平洋战争的周年纪念。在组织上则把敌之纪念会变成我之群众大会，摧毁敌之伪组织，把伪人捉来或叫来，结果敌之纪念会普遍的没有开成，而我之政治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寇”）则普遍的深入人心。使敌之五次治运在思想上惨败，我广大军民抗战信心更高（有把握有时间）。使我在敌后之存在有了先决条件。同时又配合公粮征运的胜利完成——敌之封锁分割比任何时都严重，而我游击区征运则比任何时都快。

3、敌蚕食扫荡清剿仍然是主要手段，其目的在消灭我军毁灭我根据地，有时以扫荡形式达成其蚕食目标（大块蚕食），有时则以蚕食形式兹成其扫荡目的。有的以扫荡消灭我军为目的（如四一、四二年的扫荡与蚕食），有时则摧毁我人力物力为目的（如无人区政权和四三年对北岳的扫荡）。

4、我之对敌斗争方针：

平原反清剿：平原游击战的坚持是很艰苦的，除必须进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外，还要用地道掩护。敌人有时还实行以重兵紧密突然包围（如对定南）进行相当时间的反复清剿，捕捉人力，因此我之平原工作不能过于突出。

边缘反蚕食：四一年秋到四二年秋是最严重阶段：根据地大大缩小，军中党中严重的右倾，由正面向后撤退。四二年九月，经军区分局高干会，反蚕食问题，才得思想上一致，然后取得到敌后之敌后的行动上的一致，一武工队，支队等伸入敌后纵深，恢复、再建与开辟工作。由于敌人兵力分散，主动性小，我们遂得以小部队穿插于“格子”（堡垒、沟墙、道路、层层分割的狭小地区）之间，由于我工作主动，用大力开展伪军伪组织的工作，由于我与群众的密切结合，这些策略都行之有效。根据地反扫荡，游击战是唯一方式，特别三种武装（主力军、地方武装、民兵）的结合形成广泛游击战争，配合以根据地游击区的一致，也是行之有效的，由于我军灵活的分散与集中——当敌集中对我时，我分散游击，避免正面的战争，当敌分兵时，我常迅集力量，打击敌之一路或一部，特别其清剿部队或围剿部队。这一方针过去行之亦是有效的。反扫荡前必须充分准备，否则，应付严重而长期的扫荡是困难的。反扫荡中必须正确判断敌情，不受敌之欺骗（如造谣或由飞机上投下伪命令等），否则会受严重损失。

（三）对敌斗争的几个具体问题：

1、对敌两面政策及游击战结合问题——亦即所谓合法斗争，合法形式及非法斗争问题，这是我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出合法形式便认为是合法主义，或提出公开斗争便采取暴露政策。在敌后亦有不敢提出合法斗争，忌讳合法主义，或认为提出合法斗争，即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或因为对敌合法斗争的可能是很小的，便否认此极小的可能，因而认为只有武装斗争。

是的，合法可能是极小，但极小的可能亦必须利用。问题是这样的当敌人占领某个村庄成为据点，或某区被蚕食，我武装被迫退出，人民被镇压或相率逃避，群众希望把敌人打

走，或他们要回家去。不能打走敌人，又不让人民回去，又不能给人民想办法（暂时维持亦难持久），一定会脱离群众，这里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群众无组织被迫回去，一种是被汉奸利用，投敌反我。因此我们必须适时的主动的与敌暂时求得妥协：即是，环境变了，斗争形式要变，组织形式也要变——使群众有组织的回去，主动的与敌接洽，成立伪组织，而使真正的汉奸败类不能与敌接近。敌亦明知我之政策，但他需要维持一下：架个桥，群众需要回家，我们也需要改变斗争。

在群众中是否可能产生合法主义？初期为敌骗胁是必然的。但是一经“维持”，随之而来的便是敌人无厌的要求，要人要粮食要姑娘，群众就不能再合法下去了。只有某种合法形式与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如伪装八路“打截”送粮出伕，或与游击队联系，里应外合，对付抢粮抓人等），人粮才都能得救，群众便主动的多方的寻求合法与非法之结合，敌永远被孤立，点内我亦可进去，敌人就无法战胜我们。

因为有合法的伪组织，就可以掩护我游击队的深入；又因有游击队在那里，又造成群众合法斗争的可能。因之，某种合法形式是可能的，某种合法斗争也是可能的，合法与非法的结合更是可能的。

由于游击区的增大，这个问题如不得解决，就不能继续坚持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

２、反对敌人特务政策问题：

敌之特务有三个系统：一属军部二科，负责敌情搜集，一属军部特务机关，负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向我进攻，另一部即为宪兵，是防御的，也派遣侦察，三种特务在情报上有联系，但各有分工。

除隐蔽的暗探外，又常有以下群众性的活动：

第一，大批收买强迫利用各种男女老少乞丐残废，向我根据地派遣、侦探、放毒、造谣、恐怖，以迷惑我们掩护其秘密工作。

第二，利用会门在我边缘甚至根据地活动，组织群众（如佛教会，一心堂，红枪会等）这是有群众性的活动，我之政策时有偏“左”偏右的倾向，“左”的偏向是以武力打，这会使某些村子和我对立，右的偏向则认为是文化教育问题，而专予以破除迷信对付之。1940年敌在井陉搞红枪会，我以军事为后盾，而以政治解决之，1941年在盂县对佛教会则是先以教育入手，坐×长大，以后打了几个山堂（盘）加以政治工作，才得全部解决。40年阜平王快的佛教会则是用政治自首手段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军政并重，诛其首，服其众，迅速解决，不能牵延。

第三，敌针对我全民统一战线政策，专门挑拨我阶级斗争，过“左”的政策，常为敌造成机会，所以我们紧紧掌握民族矛盾是第一个矛盾，而不为敌乘。

第四，敌常驱使沟线外群众到根据地烧抢，企图造成“赤白对立”，我则用说服群众打破之。没有造成“赤白对立”，使我对敌斗争，深入敌后之敌后成为可能，内战时由于客观上阶级对立的原因，造成赤白对立，但主观上亦有错误，抗战中敌后由于客观上民族对立原因，没有造成“赤白对立”，但主观上政策之掌握亦有原因。

*　　　*　　　*

由于这几年艰苦坚持打破四二年秋季以前的严重局面，还得到新的发展（北岳、冀中，尤其冀热边发展最大，四二年秋到四三年春，共发展七千余村），经验中证明必须发展中坚持

——向敌后之敌后——否则，不能发展，亦不能坚持。

由于我区环境，不论反攻前与反攻时，都是处在对敌斗争的艰苦地区，没有也不能盲目的乐观。敌人是很厉害的，其对我之各种方法，均与日俱增，而我们在六年来斗争中，也打下克服困难的基础。我军民在新的斗争方法上亦与日俱增，党政军密切结合，长期斗争中更和群众密切结合。只要在政策上不犯大的错误，我们是能够坚持下去的，干部，军队和群众，也都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信心。

第三部分：三个区域的一般情形

北岳区

包括晋东北及平汉以西正太以北之冀西，平西，平北地区，为晋察冀三省边区，北岳恒山在其间，形成崇山峻岭的大部山区。

有党的悠久历史：大革命时部分地区已有党的工作，内战时有过暴动（灵寿、阜平等），这些暴动虽均失败，但群众有了武装斗争经验，并保存下一些组织和党员（定襄、平山、定、唐、阜平、灵寿、行唐等县），为晋察冀边区发源地，依其地形，工作至今为巩固区，是党的各种政策基本实行区，是冀中冀东的依托区，为分局、军区，边区政府所在地，冀中，冀东某些军需亦仰给于此地。

冀中区：

冀中平原人力物力丰富。党有长期历史，内战时有过暴动（如高蠡暴动），设保属特委，长期保持组织。根据地之开辟亦为最早的一个，三八年秋季以前之发展时期，开辟的地区很宽。三八年秋季以后，数城失掉，但我地区仍不小。敌人对我的方法，在初期没有驱我出平原，我之党、武装、群众，还在初期即已打下基础，并形成一块平原根据地。四二年五一扫荡以前，各种组织与政策之施行，基本上与北岳平行，地方武装，游击战争更比北岳开展些。

五一扫荡后变为游击根据地，主力遭一部损失，地方武装遭受更大的散失，群众受严酷摧残，党受严重损失，特别干部损失最大。但敌并未能彻底摧毁。地方武装仍在继续坚持游击战，党并未垮台，正因为党的各级组织存在，便能很快的整理武装，坚持游击根据地，特别加强伪组织工作，村实行两面政权，改善地洞，更复杂的洞式的对付敌之清剿。

现在地方武装有扩大，地区有开展，能征收公粮之地区不比五一扫荡以前小，党亦有新的发展，各种政策之执行，不能过于正规，但基本上是与边府法令及党的政策一致的。

这个地区始终是很艰苦的。

冀热边区

包括整个冀东和热南一部东达辽宁边界，人力物力丰富，大革命时即已有党的较好的组织，二七年即有大的暴动（玉田暴动）以后亦有暴动。

沦陷最早，但伪化并不强，三八年宋邓支队挺进冀东，冀东有将近十万武装的暴动，宋邓支队的任务是挺进冀东，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冀东根据地。这对华东以及全国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一暴动失败了，我们并没有获得其果实。其原因：客观上暴动部队很复杂，有各种动机和成分（党领导下的，失掉关系的党员、土匪、豪绅、国民党），我没有站稳脚敌即开始进攻。但主观的错误是更大的原因：思想上没有准备，没有估计到会有这样大的发动，暴动既起则如暴发户手足无措。没有明说的政策和方针。如果当时的领导决心不受复杂

环境的影响，不受暴动必然失败的影响，力图自己站稳，坚持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我们的收获会是很大的。

即使暴动失败后，继续收集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对敌，则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建立冀东根据地，也是可能的。而当时没有这样做，受爆动失败之影响，企图抓一把就跑，不是打算在那里安家，结果就抓得很少。同时领导上不团结，各不相下，亦为失败之重要原因。

三九年，区党委在分局方针下，使用小的多支的游击队，配合留存的游击队，依靠地方党、地方干部，继续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经过许多挫败，终于建立起冀东游击根据地。这是最后建立又是最艰苦的根据地。

游击战的开创如上述。群众是由积极抗日，由广泛的统一战线发动的。党的发展未经过大量发展而再巩固的过程，而是采取巩固的发展方针。因此，成分上不致过于复杂。根据地也是建立于平原上，但忽视山地，四二年敌扫荡时，始转入长城内外之山地，开辟山区的工作。

分局军区之方针：当敌压缩其平原根据地时，广泛地向四周发展，扯开游击圈，北越承德，东抵辽宁，南至于海，去年秋则进行巩固工作，群众工作上应于巩固区适当的解决民生（减租，但不一定二五），以求进一步依靠基本群众。发展基本群众的工作，来巩固统一战线。

政权上：设行署，下分五个专署。财政上自给。没发边币。人民对我负担较轻。

第四部分：四大建设

建党

（一）党的发展巩固

1、抗战前党有长期历史，并保存下一些组织和党员，但数量都很小。根据地之创造，成分不免有滥，方式有拉夫现象。三八年开始党的整理。三九年根据中央巩固党的方针提出全面巩固：发展大的，停止发展；发展不大的，相当发展，经过巩固后，是巩固的发展，成为经常状态。农村与产业集中的城市不同，党员有一定的数量，才能起一定的作用。

2、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发展普遍，是基础较大，有的则仍弱，冀中七分区发展较大，十分区较小。北岳三、四分区发展最大，雁北较小。三分区已消灭了白点（即没有工作的村子），不少县分每村都有党的组织，有支部村占行政村52.1％，有党员村占15.4％，配合计占67.5％，党员与人口的比例，北岳区有四分之一的数分超过了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标准，平均达人口2.4％，阜平最高，达8.9％，若以公民数量与党员数量来比，北岳区十个县的统计，起码占4.1％最高达16.6％（阜平），冀中目前支部占行政村43.9％，有个别关系而无支部者占10.2％，合计有党员之村占行政村54.1％。深南，定南最为普遍，达97％以上，而藁城只达行政村9.3％，冀中平均党员占人口0.91％，占公民2.5％，新乐、定南达3％以上，至党员成分可看下表：

北岳区党员成分（百分比）

工人3.57％，雇农2.36％，贫农61.86％。中农26.88％，知识分子3.41％，其他1.46％。

冀中区党员成分（家庭成分）

工人1.2%。贫农31.9%。中农63.3%。富农3.1%，商人0.3%。

冀东根据三个县十六个村，463个党员的调查，其成分如下：

雇农5.16%，贫农41.68%。中农43.23%。富农（多为富农分子弟）9.93%。

党员斗争历史，北岳区党员党龄在四年以上者占50.5%，三年以上者占69.8%。

3、三八年四月党大会后，开始进行党的巩固工作。是年夏整理支部，审查干部，部分支部重新登记。三九年后一年当中，巩固组织当做中心工作，审查与鉴定干部，全面的（党内外同时下手）整理支部，干部历史仍须继续清查，最大部分是本地干部，历史容易搞清楚，但没经过整风的审查干部，难免混入部分奸细，党的巩固是全面的经过几次整理及多年斗争的考验，一般说政治上，组织上相当巩固，思想上经几次反共高潮中的反顽斗争，时事教育及阶级斗争锻炼，党员阶级觉悟，一般是提高了，但从思想原则上巩固则很不够。

（一）组织领导：

1、开始：晋察冀，冀中各设省委，冀中省委实际上属晋察冀省委领导（带临时性质）。整个的则由北局委托聂荣臻领导，冀东归平津省委领导，开始时直属中央，后由彭真同志兼晋察冀省委书记，并代表北局领导冀中及平津省委（包括冀东）。军队则由军区统一指挥。六中全会后设三个区党委，北岳、冀中、冀察热。四二年春取消冀察热区党委，平西归北岳领导，冀热边设特委，下设五个地委，分局直接指挥地委及冀热特委。下设北岳、冀中两委员会，最近委员会亦取消，领导单位过多，领导机关住在北岳，领导上易失之偏重。此种方式仍需在试验中考虑。

2、开始时，实际上，工作上，党政军群运都是一元化的（思想上、政治上、精神上，工作步调上），部队与地方共同为完成一个任务而斗争，历来较好，三九年春分局及区党委成立后，部队中的工作放在军区，地方工作放在区党委，但分局本身实际上是一元化的。区党委以下不一元化，并发生一些不协调。初期对敌斗争不甚尖锐，总力战的需要不那么迫切，四一年后，斗争更加残酷，暴露了党政军工作步骤不一致，互相埋怨，大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势。中央一元化指示来到之前，实际上已酝酿一元化，中央一元化决定到达后，大家都欢迎，很快的付诸实施。但一元化在组织上虽解决了，思想上则没有很好的解决，因而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与“书记专政”等毛病都发生了。这不是一元化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一元化中加强教育，搞通思想的问题。

3、领导上组织性与纪律，历来亦比较好的，工作一经提出即能完成，不管困难多大，任务都可兑现（如去年严重的反扫荡中的抢收、抢种、抢征、抢运，都能完成任务），这说明组织领导是较好的。政治与政策的领导历来亦抓得较紧。但思想领导则很缺乏。许多问题组织上是解决了，思想上则未搞通，工作中经常发生一些偏向，其原因即在此。

4、领导上现在已经懂得进退——该坚持者坚持之，该撤退者撤退之，但是，这几年来，虽然比过去死碰好些，但仍有撤退不及时及干部过度损失现象，这是很大的缺点，又由于这个地区是在公开环境中搞起来的，秘密工作缺乏，一旦情况变化，转变颇难，虽开始即已注意，但今天仍然不够。1942年决定建立平行支部，今天在冀中与北岳都开始收到一些效果，但仍易出毛病，必须经常检查掌握。

5、城市中，平津老基础有危险性者，都已撤回准备重新建立。方针上是撒种子，派了一些人到产业中，学校中及敌伪机关中去，都是单线的，还没有组织的发展。城市工作是较

弱的。

（三）干部问题：

1、总的说来，高级领导是以老干部为骨干的，军中是红军中来的，地方上是长期做白区工作或坐过牢的。提拔和培养了大批新干部，主要在县以下及一部分地委。地县两级主要是本地干部，如北岳区，区级以上党政民负责干部，绝大部分有四到五年党龄。县委以上的党委中，36%是抗战以前的党员。党政民各系统中80.9%是本地干部。

2、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冀中曾一度发生对部分地方干部提拔不够的现象。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一般是好的，但更好的提拔，培养与教育本地干部则仍然不够。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的关系上，党与军队中都收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一般是团结的，但界线还存在。虽然工作中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一到思想反省时，其间隔膜即会暴露出来。在地方干部与部队干部的关系上其某些地方存在着不协调现象，主要是干部思想问题。

3、干部的使用与提拔一般是正确的，但有些使用得仍不适当。区党委一级干部，除个别外，是完全清楚的。地委大部分完全清楚，县以下大多数为本地干部，须待整风中去审查。

4、在干部的教育与处罚方面，几年处罚干部较少，没有打击政策。但部分的组织上揭发错误，做出结论并给以处分而思想上仍没搞通的现象，则是有的。

5、整个的话，干部政策是正派的，没有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之事，知识干部与工农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是团结的。不协调只是部分现象；对干部的处置，个别的不切当，是方式问题而不是宗派主义。部分干部中宗派主义是存在的。这主要是全局观念与群众观念不够。过去在这方面对干部思想上的教育很差。

（四）教育宣传工作：

1、一般说政治与政策的教育在党内外都是较普遍的。宣传亦有适当计划。党内、党外，对敌伪及游击区都有专门报纸：战线（北岳），火线（冀察热已停），工作往来（冀中），熔炉（军区政治部，后与战线合并）各分区另有党内小报（给支部看），公开的晋察冀日报（由油印到石印到铅印），冀中导报，平西挺进报，实话报，救国报（以上两种为对伪及游击区）及反战同盟的报纸（日文）等。但思想系统的教育则非常不够，党校与训练班中都看重政策教育，基本政策，党的建设，群众运动及新民主主义论等课，都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主要解决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但其他纯粹理论性的功课及在职干部的书本子学习，则有教条主义影响。三九年就曾着重提出反教条主义问题，整个的说，教条主义在宣教工作上不占统治地位。工作中有经验主义毛病，但不是经验主义。

2、整风运动在北岳区能按步进行，其他地区受战争影响，迟一年开始。分局与区党委对此认识不足，对此没有很好的领导。特别是负责干部亲自下手模范作用则很缺乏，故思想改造收效不大。

*　　　　*　　　　*

总之，在党的建设上，组织领导，政策领导，政治领导都抓得较紧，思想领导（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缺乏，学习毛主席思想，自觉掌握毛主席的思想是不够的。虽然过去党内路线分歧时（王明的投降路线与正确路线斗争时）我们是站在毛主席正确路线上的，但由于党内存在着两套思想，我们在思想上又比较模糊，因而对毛主席的思想，没有整个的系统的建

设起来。过去拥护毛主席是抽象的，因而也是形式的——即是说，没有具体掌握其思想。

建政

（一）建立根据地必须有一套政策。没有武装与政权，政策就无从实现。因而也就没有根据地。

（二）政权之巩固，以群众的组织、动员和觉悟为标准。没有政权也不能把统一战线下各阶层群众全面的组织起来。如冀中及其他沟线外地区除武装组织外，其他各种组织差不多都占次要地位，一则那里中心是对敌斗争，再则生活改善（经济斗争）问题大体解决，三则环境不允许庞大组织，因此各种群众差不多没有组织生活。但那里存在着政权，因而政权就成为最主要的组织群众的形式。

（三）一开始就认为政权是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权，故不仅积极建立政权，而且一开始即可以大力支持政权（拥政）。但是党初次拿到政权，初期有部分党员对政权认识不足，表现在不积极领导或与之对立——这一则是长期地下党经验的反映，再则，过去苏区党政传统，今天看到政权中还有一部分别人，看不惯。所以，对政权党团的领导上还有偏“左”（包办代替）偏右（放弃领导）的错误。

（四）开始时对政权认识，还有不够处。如主要干部放在党委，次要干部才拿到政权中去，后经毛主席指示，县长很重要，宁可使党部工作受点损失，也要把大批好干部去当县长，以后才改正。根据地政权如不能确保党的领导，是不能实现党的政策的。

（五）开始时是由上而下的改造政权，然而又由下而上的开展民主运动，全部改造政权。村政权三八年开始民主选举，六年六选。县政权四〇年开始（选举县议员及县长）已经两次选举。边区参议会四〇年选举，四三年开会。边区政府已经两次改选。现在整个政权已在党的领导之下，改选工作大体完成，三三制政权，基本上确立。

（六）经过几次改选与长期斗争，各级政权已能担负其任务，各种政策法令，已建设下一套。使边区统一战线更加广泛与巩固。

（七）游击区村政权采取两面形式。区以上是一面政权，存在着两个政权的对立（但加强对伪政权工作）。

财政经济与金融

（一）财政问题

1、40年以前实行合理负担（利用阎锡山的口号），其合理处只能在有钱出钱的方式下，把负担放在地主富农和中农（后期）身上，同时初期亦不能有更好的方法。不合理处则是负担面太小，地主富农负担过重，长期下去不能支持，不合统一战线政策。

2、即在初期，财政上也较统一，38年北岳、冀中各个统筹统支，三九年后则全边区统筹统支。财政上混乱时期很短。

3、40年开始统累税实施的筹备，调查研究，拟定税率，规定免征点及累进最高率，这些办法，一般说是科学的，四一年开始实行。土地财产的调查开始是很复杂的工作，用了极大的功夫，其所以成功，基本是依靠党及群众工作，调查结果一般是确实的，手续虽属笨重，但方法是科学的，实行起来，老百姓都会计算，（创造许多简便算法）证明其简易能行。执行中税则上有不断修改（有些特殊问题，如低租地，钱租地等），今天商业调查因战争关系还有些毛病，尚待研究。成问题的是调查产量根据常年（较好的年成）一遇荒旱，便不能合乎实际（所谓调查量与实产量脱节），但这也只能一般的做，目前已

征收三年，调查三次。一般的说，困难工程已成过去。三年执行结果，各阶层都较满意，合乎统一战线政策，又由于工业投资，付业、收畜业一律免税，土地超过常年产量不增税，有刺载生产发展的作用，各年统累税负担情形：1941年每人平均负担小米3.13市斗（每市斗十三斤半），平均占其收入17.25%，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小米2.86市斗，平均占收入15.157%，连其他负担（村开支，会粮，优抗）则占收入17.335%，43年每分负担量减为九市升小米，游击区则为二市升到八市升，根据工作基础而定（四二年每分负担量为1.5市斗），群众负担当可少减。负担面1941年度北岳区二十三个县的统计平均达74.49%最高达88.85%（行唐）最低66%（阜平）至各阶层的负担的比较可看下表（1941年度）。

贫农7%，中农15%，富农25%，地主66%。

4、四三年前，收支不能平衡，二八年度到三二年度合计收入二万万三千三百余万。支出二万万二千六百余万元，但因物价上涨及灾荒救济等临时拨款（六年来贷款四千七百余万元）收支万數达一万万二千六百余万元，由银行垫付，三十三年度预算估计收支可能平衡，严格规定预算决算制度，四二年成立审计委员会，严格实行审计制度。

5、财政开支最大部分为军费，北岳区自敌人蚕食后，军队与后方机关均集中在此，脱离生产人数占人口4.5%以上。财政困难一方由冀中调剂，一方则实行精简。四一年大扫荡后即缩减党政民机关及学校。目前已经过四次精简，党政机关一般说不算庞大。村级党政民均无脱离生产人员。虽然如此，由于战争的长期消耗，人民负担，还是很重。

（二）经济问题：

1、边区处于农业较发达区域、手工业、付业亦相当发展矿产丰富，但农村经济极不平衡，平汉两侧石庄到易为一带，富农经济较发展，北岳区，平原地区，富农占土地26.95%，地主占土地10.47%。（经营地主统计在富农内，孤寡不在内）山地及冀中某些地区则地主势力较大，如北岳区山地村子地主占土地16.43%，富农占21.93%，（喇嘛寺院土地尚未统计在内）。

2、经济政策主要是农业，其次是农村付业。党政军民尽了很大力量，部队机关帮助群众生产的劳动力很多（参看下列材料），生产运动上的缺点是：

第一，缺乏更有组织的生产运动，主要的是没有掌握长期战争中劳动力缺乏这一中心环节组织生产。

第二，部队与后方机关学校帮助群众生产很大，但是自已没有很好的进行生产（虽然小规模的进行了一些），结果虽然帮助了群众，还是向群众要：

附：（1）北岳区水利建设统计（1939——1943）整理旧渠2798道，浇地304,146.5亩。开新渠2320道。浇地412,641.6亩。打井5538眼，浇地35,163.0亩。修堤183道，护地55,277.6亩。修滩（主要是恢复39年大水破坏）153,279.3亩。

附：（2）冀中水利建设统计（38——42）修险工、筑堤、堵决口，浚河71处，643里，309处，173里。

附：（3）北岳区农村纺织业发展情形。在42年冬及43年春救灾运动中，43年一月份三、四、五专区纺织人数即达21,115人，到三月底仅四专区（即三分区）纺织人数即达22,304人。

3、贸易：过去虽已认识贸易的重要性，但很长时期没有搞通，近两年来才得到一些经验，由工商管理局及公营商店掌握出入口。对外贸易仍是入超。原因是过去大宗出口之山

货，现在锐减（一部我用，一部敌人封锁），而食盐、火柴及一部军需材料，医药用品则必须输入，公营商店之任务在管理对外贸易，平衡物价，巩固边币，刺激生产以及供给合作社以日用必须品，不是用以解决财政问题，也没有排斥小贩。在粮食政策上，由于第一，农村阶级关系两头向中间挤，地主富农手中余粮较抗战前大减。第二，工业品价高（抗战中虽许多物品依粮价为转移，但有一些工业品并不完全跟着粮价转移），粮价太低，农民吃亏（工人有半实物工资调济，小商人尚有一些投机生意可做），因此，青黄不接时，粮价不能太高，粮食初下来，又不能太低，工商管理局及公营商店主要的要起这种调节作用。

4、合作：公营商店与小贩可能解决境内外的货物流通问题，但不能全部解决，故必有合作社，冀中合作社搞得较早，而且搞好。北岳区合作社开始时起了相当的调剂经济、巩固边币的作用，但仍然带合股经营性质，没有成为群众的合作社。尤其是公家办的合作社更甚。四二年全面改造，四三年更大的发展（1943年七月统计，北岳区共有县社 25 个，村社2367个）。成为生产组织的力量，目前在公营商店帮助下，合作社得到更大的发展，去年反扫荡中给群众解决食盐及冬衣问题，威信甚高。

（三）金融

1、边币初发行时，没有基金，开始取慎重态度，用一切方法提高其信用。其步骤是：第一，边币本位，第二，禁止杂钞，其后法币亦不通行，第三，一切税收贸易都使用边币。第四、统制外汇，由于这些步骤及政治因素，边币一般是巩固的（冀中老百姓保存边币，即在敌人大扫荡时，边币亦未西流，反而大感不足），1938年到1943年八月，发行额达二万万二千八百余万元（销毁五百四十余万元），现在仍感不足。

2、边币对伪币比值不平衡（有时相差四、五元，现一般贴水三——四元），原因是入超及投机商人之操纵。

3、金融行政统一于党的指挥之下，没有公营公司投机操纵现象。

*　　　　*　　　　*

由于新民主主义下各种政策的实施（主要是减租减息，改善工人生活，扶助生产及财政税收政策），六年余来，在我政策能够贯彻实施地区（无论在巩固区及游击根据地），农村阶级关系已经起了显著的变化，地主阶级的封建经济，向下没落，土地处于分散过程，基本群众的经济上升，富农经济的变化尚不大，基本趋势则是两头向中间挤，举北岳区调查材料为例：

附：（1）抗战以来中农户数人口比重的变化（北岳区巩固区三十五个村的调查）。

一九三七年，户数35.42%。人口40.57%。

一九四一年，户数42.65%。人口43.04%。

一九四二年，户数44.31%。人口47.47%。

附：（2）抗战以来地主户数人口比重的变化（北岳区巩固区三十五个村的调查）。

一九三七年，户数2.42%。人口3.61%。

一九四一年，户数2.05%。人口2.85%。

一九四二年，户数1.91%。人口2.51%。

详见“北岳区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材料”。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的缺乏）及敌寇反复破坏的结果，

农村生产水平则是下降的。根据北岳区调查，抗战中劳动力比抗战前减少（42年与37年之比）7.34%——16%，畜力减少40%——70%，肥料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生产水平之下降如下表：

北岳区土地生产量指数表，基期1937

	游击区	巩固区	总指数
1937	100.09	100.00	100.00
1939	78.97.	70.75	77.34
1940	75.21	82.04	78.55
1941	81.89	71.91	80.48
1942	67.03	64.58	65.79

建军

（一）以一部分八路军正规军（一个团，总部特务团，两个不充实连和骑兵营）及吕正操部两个不完整的营为基础，扩大游击队，分散游击，扩大部队，开始时即提出组织自卫队（包括全体人民在内）。

（二）整军：从游击队中组织主力兵团。这样，主力军、地方军、自卫军，构成根据地的三个兵种。主力军经几次整训，战力加强，地方武装分区队，支队，游击队，自卫队中另组民兵。各级司令机关和政治机关，一般的还算健全，政治工作保存旧的传统，并有新的发挥，在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上，起决定作用，政治教育及文化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由于游击战争中高度分散的环境及历史上的残余和干部来源不同，军阀主义倾向及山头主义还须用大力克服。

（三）民兵建设分三个阶段：开始的自卫队由政府领导（县以上政府设武装科）多旧军人搞，北岳区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的，形式主义者居多。其后，成立群众性的武装委员会，各级干部均由队员民主选举，一九四一年反扫荡后，武委会改为人民武装部，区村仍保持民主选举，县（县长兼）以上为委派制归军区分区统一领导。民兵与一般自卫队分开，强调战斗训练，提高战斗力。民兵中另组游击小组，作其核心。经几年斗争，民兵战斗力已大大提高，成为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的基础。

（四）现整旧军区掌握三种武装。冀中自五一扫荡后，以地方武装为主，民兵采取游击小组的形式，北岳区游击部队与主力的对比亦日益增大，现已超过三分之一。北岳区有民兵十八万左右，其中游击小组五万余，冀东地方武装比主力多，主力亦采取分散的地方形式，整个军区分区的系统都是带地方性的，没有正规旅以上的编制。

（五）过去平原地区都有小的后方，现在则以北岳为后方。冀东在山地设小的后方。供给弹药，统一规定，分散经营。供不应求，相差很远，但尽量解决一点，（子弹、手榴弹、枪榴弹等）对坚持敌后斗争，仍起很大作用。

（六）志愿义务兵役制：从根据地创造到四〇年以前，都是志愿兵役制。由于长期战争的不断消耗，补充部队不管在山地和平原，都大感困难（人民供给物质较供给人力易）。日寇和国民党都造谣说，当八路是"辈子兵"这是一个问题。当时分局讨论解决办法，提出志愿义务兵役制（不是义务兵役制），这种兵役制与志愿兵役制相同者是，都依自愿入伍，所不同者是三年满期，满期后不愿入伍者听之，志愿入伍合入伍条件者先行登记，主管机关可调剂人力，尽量从平原地区先征调。这一制度提出时，曾报告中央，准予试办，经四〇年动员，证

明是容易多了。虽然动员方式上有许多缺点。其总结已报告中央。这一制度，从一个根据地的范围看，能入伍能退伍容易执行，但部队调动过大则增加了困难。志务兵役制的法令，去年边区参议会通过公布，入伍期即以此起算。这一制度的实施经过如此，提供中央考虑，为着比较合理的解决武装动员问题，这还是值得考虑的。

（七）干部培养：原扩大二分校培养连以上干部，设有高上科培养团营干部，附设陆中训练连级干部，另各区分办教导大队，作为经常补充连排干部。

最后的几句话

根据六年多敌后工作，根据中央正确路线，在执行工作中，某些方面又根据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在各个时期给予我们的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创造了党及军队，培养了大批干部，团结了广大群众。但在工作中仍有许多缺点及误缺，某些工作执行中仍然表现偏左偏右的错误，甚至在同一个工作中也表现这种错误，基本问题是思想问题，以上许多问题的检查，就都是由于思想方法没有得到改造所致——整风教育还没有深入进行，党内两条路线的学习与清算，在高级干部中也是不够或者还没有开始。

林平关于东江及南番、中顺两游击区及地方组织工作给南方局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三月）

我们现对东江及南番、中顺两游击区及地方组织工作决定如下原则：

由于敌伪对此地区扫荡与清剿加强和顽方对我进攻之残酷，本区斗争今后将愈益艰苦，因此一切工作布置必须从长期打算。组织力求掩蔽精干，准备在最严重环境下仍能继续坚持独立斗争。

（甲）当前组织工作重心应放在巩固方面，尤以东江为然。南、番、顺则因组织仍太薄弱，且全系敌后，实际工作仍着重发展（按惠阳县继续活动区域党员数目有百余人，东莞县五百余人，宝安县一百六十余人，香港新界十余人，增城继续工作区一百四十余人，博罗县继续工作区一百六十八人，中山县一百四十余人，南海县只有五人，番禺县二十五人，顺德县十八人）。

（一）彻底完成严格审查工作。

（二）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实行新的，完成采用单线形式，临工委员书记了解全面组织情况，县市设特派员个别联系，又设支部小组不过会议生活，必要地区设法使领导干部职业化。临工委以下各级干部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一切文件由领导干部管理减少关系，但须注意灵活周密地深入领导，禁止任何横的关系，应与部队关系严格分开，禁止一切横的关系（部队动员新战士、购买药品粮食、交通、发行等关系，自力解决，不准依赖地方党），禁止两方干部发生任何关系。

（三）加强全党教育，改造与培养干部，特别培养与提拔地方干部及群众中有威信干部，干部教育以党性、政策、业务为主，党员着重阶级、统线、秘密及纪律教育，与提高文化水平。方式着重在职教育与学习，并进行社会调查研究。

（乙）开展敌后广泛统战工作：

（一）使党完全隐蔽在各种职业部门的群众中，加强我党与各阶层密切联系，积蓄力量以支持长期残酷之斗争，渡过目前严重困难。须注意深入敌后工、商、学、军、政各界活动，以勤职勤学交朋友的精神稳定社会基础进行各种各样的团结工作。

（二）对沿海渔民工作须特别加紧组织，并培养专门干部。

（三）抓紧日益广泛的群众自卫的自发斗争（反敌伪、反土匪、抢掠屠杀等）。通过各阶层统战关系，克服其政治落后性与散漫性，加强其团结，引导到自觉抗日斗争道路上来。但须适应时机及环境，在有利有节的限度内逐渐发展其运动，提高其胜利信心，着重锻炼其斗争经验与培养群众干部。群众团体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平时工作以互助救济事业为主。

（丙）加强外围武装工作，要用多种多样形式去建立和争取从地方民众武装、地主武装到顽系地方武装、绿林武装，以至伪军都可以，应使其外表与我不相联系，但实际上掌握在我们周围，亦须注意长期培养力量独立坚持，非至时机成熟不能随便联合我党游击队作战或拖枪反正等行动。

（丁）本区地方党领导机构为适合新的情况，应重新调整东江前线，及南番、中、顺工作。两处均设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均属粤南临委领导。东江前线临工委由吕良（书记）、刘芹琼（或汶琳）、郑汉武组成，南番中顺临工委由严峰（正书记）、陈赖（付书记）、谢剑组成（严峰因工作重必在部队，对地方党工作只负责一般指导，日常实际工作均由付书记负责）。

林　平

对苏中反清乡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

一师、十六旅、浙东指挥部：

前数电均悉。敌伪正积极准备计划，调动兵力组织部署，对我苏中第四分区进行清乡。大约估计四月初即可开始。你们只提出对反清乡的部署，但整个对策及其他工作布置情形如何？尚未接到你们的报告，因此我们提供以下意见可供参考。

一、我们对此次苏中反清乡估计与认识：

（一）苏中地处长江下游，财源富饶，为南京、上海之接壤地区。我们在此地区之坚持与胜利，对敌伪威胁甚大。因此敌伪保障交通与确保长江两岸，为准备应付未来同盟国联合反攻，故必争这些地区，以巩固其战略基地。

（二）敌伪对苏中清乡是蹈苏南清乡之故智。我们估计南浦部队虽有部分参战，可能不全由南浦主持。因此增加了敌伪内部矛盾与我坚持有利。但敌伪仿效苏南清乡办法及参考苏南清乡经验，以政治清乡为中心，所有清乡人员及部队大部参加对苏南清乡的；敌伪对清乡很有信心，如佐通、后浦第一期实验清乡得到胜利完成，那更增其凶焰嚣张。所以第一期清乡之成败，对今后苏北及华中反清乡斗争，是有重大意义与影响的。

（三）敌伪对苏中清乡，不仅求得面的扩展，而且积极整理苏北行营机构与强化伪一二集团军，达到巩固其统治地位为目的。

（四）苏中反清乡斗争与苏南不同的特点：

1、从国际形势来看，苏南反清乡正在法西斯蒂凶焰向苏联攻击、皖南事变不久的时期进行的；而今日苏联冬季攻势的伟大胜利，同盟国力量增强，法西斯困难崩溃的趋势已奠定，国内国共关系好转，因此所处国际国内形势，均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

2、我们对敌伪在苏中清乡情况比较了解，在估计上不会犯大的错误，并允许我们进行反清乡的准备。

3、敌伪内部矛盾加深。据最近所得材料，苏北士绅及行营亦反对李士群反对清乡；敌酋南浦亦表示不满。

4、苏中有此苏南最好的党及群众基础有经过长期斗争反扫荡经验的部队。

5、苏中地形处于水网，交通不甚便利，要架设电网、篱笆均感困难。

6、敌伪有苏南清乡经验，我们亦有苏南反清乡失败之经验所谓失败则为成功之母。

7、伪苏省府主席李士群，为想争夺苏北地盘，不顾一切的积极策动，组织苏北清乡。所以苏中第一期实验清乡之成败与李士群争夺苏北及信仰有关。故李必为敌卖力，这是无疑问的。

基于上述材料观察，必须认真与估计到此次敌伪对苏中第四分区实行清乡，比过去敌伪对苏中已往的扫荡与清乡均有不同。形势虽较以前严重，但我确又具备了较以前更充分而有力的新条件。如国际形势好转，敌人内部矛盾；我根据地部队建设大有进步等等。因此我们应加强自己主观上的努力，有充足的勇气与信心来坚持苏中反清乡之斗争。

二、我们反清乡斗争应有准备和部署：

（一）在清乡区内党政军民中进行深入动员与教育工作，说明此次清乡与去年之清乡扫荡有基本上不同的特点，防止一种麻木不仁的现象。同时须认识自己有充分反清乡胜利条件。说明苏南反清乡之失败主要由于我方没有经验，但不久苏南仍恢复了工作；敌之成功是暂时的、局部的。我苏中的反清乡条件较苏南为优，故我能作胜利的坚持。

（二）在清乡地区内建立坚强统一的党政军民的指挥机构，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并将坚强的干部分散加强下层领导，就在敌人清乡期内交通联络线中断亦能独当一面的坚持斗争。

（三）清乡区域内部队与部队通讯，我应减少电台联络（电台指定部队掩护），以防敌侦察。同时要布置秘密交通站，保持通讯顺畅。

（四）敌人在清乡准备过程中，我须抓紧其措施未就绪之时机先发制人给以破坏。如敌集中篱笆等于某地，我则突然袭击而焚毁之，至少可延误其清乡，同时或竟使准备难于完成。

（五）军事上的对策：

1、在清乡区域内之党政军民，除了个别的少数的灰色隐蔽组织外，所有人员应实行全民武装。如敌入境，则处处喊打，变成草木皆兵，使敌无法应付。

2、加强民兵与便衣短枪队的组织与活动。他主要任务是捉拿和阻击汉奸、奸细、叛徒，组织破路，游击队进行全面破击战。

3、教育民兵与实行全面的破击战术，要求群众能了解和熟练地雷和手榴弹之使用法，使敌坐立不安，到处遭爆炸威胁，造成其恐慌状态。

4、加强伏击战术教育，普遍的使用伏击，给出扰之敌处处痛击，造成其恐惧现象。

5、在清乡区域内，我主力部队主要是分散周旋，坚持游击，尽可能避免与敌机动部队作战，专成伪军、伪组织清乡人员。

6、对付这种清乡战法，采用全面的战略与配合行动是不需要的。而且没有效果的。只有在清乡区外围部队，进行适当的组织计划，并适时的配合作战，破击敌交通封锁线，袭击外围据点，造成敌后极端恐怖状态，减轻敌伪对清乡区内的压力。

以上请研究参考，关于政治上的问题，另有指示。

陈　饶　　张　赖

三月十六日

新四军首长对苏中军区反清乡准备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

一、敌寇对苏中清乡，曾经作过较长期之准备和动员。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各方面，均作过相当充分部署，而且对内战剿共经验与苏南清乡经验作过综合的研究。因此，你们对此次空前严重与高度复杂的敌寇清乡，必须有明确的估计和充分的准备。

二、但敌寇此次清乡，内部困难和弱点甚多。如兵力疲劳、分散、不能持久；敌伪矛盾与伪伪矛盾甚深（如伪军动摇不可靠；南浦反对李士群领导江北清乡，及江北伪组织反对江南清乡队和江北清乡等）；从地形到人事，敌寇对苏中清乡，均将比过去在江南清乡要遭到更多更大的困难。苏中各阶层民众和地主士绅，经过苏南清乡痛苦经验，对我更加同情；我在苏中区有坚持艰苦斗争的军队与人民；有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并有各区弟兄兵团的配合作战与党的正确领导；同时目前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也是对我空前有利与对敌不利。所以敌寇对我残酷清乡和扫荡，并不证明敌寇的力量之强大，正证明敌人在我坚持长期斗争与国际形势日益对他不利条件下的绝望挣扎。所以我们对坚持敌后斗争与粉碎敌寇清乡，应具最坚强之信心。我们只要熬过今后两年，就是胜利。

三、清乡与扫荡是不同的。清乡不仅在于动员配备优势武力以打击驱逐我主力，而且在于动员配备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各方力量，彻底破坏我地方党政群众组织，摧毁我根据地，把我根据地彻底伪化、殖民地化。因此，我们也只有动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锄奸保卫等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反清乡斗争，才能粉碎敌寇的清乡。关于反清乡的军事部署已另有指示，现在进一步号召你们从下列各方面来动员准备反清乡的工作。

（一）在党、政、军、民中进行最普遍深入反清乡的政治动员与教育工作。说明敌寇清乡的严重性与我们可以争取反清乡胜利的条件，把前年敌寇在苏、常、太、澄、锡、虞各地清乡摧残地主，绅士、友党、友军与根据地全体民众的事实，把敌寇清乡的目的在于强夺我一切资源，在于捉拿我大批壮丁到南洋去当炮灰等事实，用文字口头会议等各种方法（如大批传单标语），广泛向根据地内各阶级各阶层民众宣传，打破敌伪欺骗，以动摇敌伪军心，激发群众对敌的仇恨与坚决反清乡的决心。只有在思想和政治上动员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界坚决进行反清乡斗争，把反清乡斗争变成根据地全民的斗争，才能彻底粉碎敌人清乡。

（二）一切党政群众团体，应作周密的组织部署。清乡地区各级党政机关和组织：必须力求短小精干。一切暴露与体弱的干部或妇女同志，应断然转移到非清乡地区，只留下部分灰色地方干部就地坚持。同时留下的灰色干部，除了个别有良好社会与职业关系作掩护者外，均应通过同情分子及伪军、伪组织关系，灵活运用两面派的办法，来保持与群众的联系或掌握民兵和游击小组，依靠群众就地游击，就地坚持。一切物资和公粮，应设法转移，必

时要以不落敌手为原则，可借给或发给贫苦群众，普遍告诉群众隐藏物资粮食之办法，如将粮食混土，使敌人不便搬运。对一切可能暂被敌伪占据构筑据点之市镇、村庄应立即完成由公开转入秘密的一切准备。可资敌人利用的军事建筑物，当说明群众摧毁之。普遍进行秘密工作与防谍之教育。彻底检查各地保存可被敌利用有关秘密文件和书报，当妥为处理或焚毁之，对一切精简人员应当妥善处理，免为敌人利用。

（三）加紧伪军、伪组织中工作，研究、制造、扩大、并利用敌伪与伪伪间的矛盾。在伪军、伪组织中指出敌寇清乡是想在打走新四军后，改编改组伪军或把大批伪军调到国外当炮灰。如果李士群在江北清乡胜利，江北伪组织都要滚蛋。指示在清乡总部下设对赤、对渝、对我（？）情报等科，明明是表示对苏北伪军、伪组织不信任。号召伪军、伪组织采取各种可能步骤，有计划破坏敌寇与李士群的清乡计划。发动伪军、伪组织进行反对调防、改编改组的斗争。在伪军伪组织中广泛宣传苏联胜利，德国失败，日本迟早要垮台，我们欢迎一切抱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伪军、伪组织的同胞，激发天良，不帮助敌人，不杀害中国同胞。抽调大批忠实可靠而且未暴露的干部，到伪军、伪组织加强工作和取得其掩护，争取伪军上层可靠军官与伪组织较高官吏对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作用极大，但同时当设法打入其中层与下层，以便控制其部队和必要时作可靠的掩护。在今天条件下，大批发动伪军反正似属不可能，但如果在清乡期内，能够发动部分与我关系不密的伪军反正，其作用是很大的。

（四）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与团结根据地内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进行反清乡。根据前年参加苏南清乡的日本宪兵报告，在清乡中应利用下列适当人物。如利用有罪的人及其家属被新四军杀害的或其房屋被新四军烧毁的；利用反共产党思想的人，利用维持本地风俗、民情的人；利用反对新四军的人等等。同时又如过去苏、常、大清乡时，部分地方人士因我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之某些过左行动，曾受敌伪利用。给我极大困难。必须引起你们万分警惕。我们必须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注意扩大交朋友与争取一切抗日地主、士绅进行反清乡之工作。对于春荒救济与改善民生的口号和方式，应适应清乡环境，不可过左。对那些过去被我斗翻而今天仍未投敌的地主士绅，应当通过各种关系，向他解释说明，最少做到争取他不附敌。

（五）加强锄奸保卫工作，开展群众性的锄奸运动，严格审查干部，不使敌探奸细混入我党我军。发动群众反奸细敌探斗争。组织群众锄奸小组，监视和阻击下乡捕杀摧毁群众的叛徒和特工。此种群众性锄奸小组，应短小精干，并保证党的坚强领导，一方面行动要机警隐蔽，另方面应严禁乱打、乱杀的行动。除了对少数忠敉之叛徒、汉奸敌探应坚决打击他外，对被俘后被逼参加清乡人员给以劝告和警告，或利用各种方法给以指示和安慰。应设法利用各种关系，派遣面目未经暴露的可靠人员，打入清乡机关与清乡训练班充当学员，以便将来转回原地参加清乡，便于坚持和掩护工作。

（六）对敌寇自首政策，应采取灵活对付方针。在清乡之前应广泛进行反敌伪自首政策与提高民族意识与革命气节的教育，造成人民对敌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与坚决奋斗的勇气。但对清乡到来与某些暂时显然很难坚持的地区，我们当允许人民按照敌伪自首规定去进行自首，并应当有计划的发动群众打入一切伪群众组织中，利用公开合法来积蓄力量和揭发敌人欺骗宣传。

（七）应加强敌后各市镇中的工作。在各清乡地区建立我党短小精干的组织，作为在任何艰苦条件下就地坚持的领导核心。秘密党的组织，应取消各级委员会制的形式与改变工作

作风，应采取特派员、工作员单线联络的办法，减少暴露和破坏的危险。应教育一切秘密党员和干部，独立坚持与独立工作的方法。

各地党政机关与团体，只有善于运用一切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方法，才能粉碎敌人清乡。同时如果上列各种准备工作做得好，即使有个别地区因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而我武装部队不得不作暂时的转移和撤退，但在敌寇清乡结束后，我们能迅速恢复阵地和工作。

对华中工作指示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

陈饶：

（一）关于特务问题，已数次电告，你们的意见如何望告。

（二）华中各根据地工作是经过如下的具体步骤进行的：第一年（一九四〇年）是以军事行动为主，打开华中各根据地局面，附带建立我们的秩序与进行群众工作。第二年（四一年）是以恢复各根据地秩序。建立各种组织为主，并初步进行群众工作。第三年（去年）是以进行群众工作为主；第四年（今年）是以改造政权及建立民兵为主，同时教育干部（整风）与发展生产。这些工作都是在坚持对敌斗争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也是为了更有效的坚持对敌斗争与达到保持骨干之目的。在第五年（明年）各根据地就应以组织与发展根据地生产为中心工作，以便打下将来坚持根据地的基础，为了这个目的你们现在应作一切准备，在今年生产中，创造经验，总结经验，使政府和农会工作人员熟习组织群众生产劳动的一切方法，以便在今冬能够定出明年发展生产的实际计划，农会在减租之后，应以组织群众生产及办理合作社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农会工作内容要有切实而适当的转变，不可老照过去一样，政府亦应制订比较固定的公粮，税收政策，保证农民在增加生产之后，不再增加负担，增产完全归农民自己所有。一切参议会及其他政府的会议，应以生产为主要内容，其他一切与人民关系很少的民主会议的形式少开，以便能动员群众的力量到生产上去。各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战斗与工作条件下，要实行广泛的生产运动，以便增加自给的百分比，而不加重农民的负担。

（三）在进行上述工作中，你们一方面要应付敌人的扫荡与开展反蚕食斗争与敌人争地盘。另一方面你们要在今年明年彻底完成整风与审查干部的任务。因此你们要好好总结对敌斗争的一切经验，我们亦准备将华北对敌斗争经验告诉你们，关于今年的整风你们的决定是好的，但必须加紧检查与督促，加强思想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才能贯彻整风，在整风初期与中期应注意学风（文风合在学风一起学习）是对的，但在后一阶段即应注意党风学习，深刻检查每个干部，尤其高级干部的党性，要每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以季米特洛夫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来反省自己作笔记（延安专对这四条学了两星期，作笔记至四五次，作好为至）各级学委应在整风中搜集可疑分子的材料（自传、笔记、工作表现、关系人报告等）加以研究，作为明年审查干部的准备，这种工

作是与生产及对敌斗争联系起来作。

（四）你们是在复杂的情况，复杂的任务与工作中前进，你们要善于利用时机，使各种工作联系起来进行，而不失去中心环节，要切实避免工作步骤的凌乱，才能按时完成你们的任务，领导要总其成，工作则应分途进行，比如生产，主要是动员群众，及战斗员杂务人员去进行，对敌斗争主要是指挥部队、武装工作队、民兵及敌工部门去作，但领导机关须总结经验，随时给予指导；而整风与审查干部则主要是由领导机关自己来作。

（五）各师首长会议的情形如何，你们的布置望告。

刘少奇

十八日

我们怎样坚持了华北六年的抗战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

彭德怀

今天是伟大的中华民国抗战六周年纪念日。在我未说到本题前，让我首先向全体同胞们，八路军战士们，在院伤病员们，游击队员们，荣誉抗属们，各参议员、政府长官、工作人员，以及一切抗日救国的同志们，共产党员同志们，谨致以无限亲爱的敬礼！

华北抗战六年以来，日寇无时不希望"征服"华北，以便进一步向我中原及大后方进攻，同时也企图利用华北丰富的资源与人力，补充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巨大消耗。因此，日寇使用大量兵力于华北，如今即有第十七、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五十九、六十九、百十等共十个师团，还有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及十五等共十个旅团，总共在华北有十五个师团。此外，伪治安军、伪和平救国军、伪剿共军及伪蒙军等，至少十六万人，虽其中大部民族意识尚未完全消失，且有不少同情抗日者，表现伪军中的动摇不巩固，然而被日寇与汉奸强制为敌服务，替日本法西斯屠杀中国人，增加敌后抗战不少困难。

但是过去几年来，日寇征服华北的阴谋却始终遭受华北军民顽强英勇的反抗，不仅没有实现，而且拖住了敌人进攻我大后方的后腿。这自然引起日寇极大焦虑，所以在六年抗战中，华北敌寇已四易统帅。

三八年初企图赶走或消灭八路军、镇压刚在发动的民众反抗，日本军部即任命寺内寿一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代替了原来的华北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但为时不久，于是年八月就又撤换了。其时正是华北游击战争蓬勃开展，抗日军不惟未被消灭，反大为增加，继任华

北方面军总司令官者乃杉山元。当时抗日民主政权与游击队已在各地发展与建立，到处翻车破路，伏击截击，予敌以极大威胁，敌寇认为是“击灭蒋政权的绊脚石”，故于占领武汉后，回师华北。当时的敌人超过二十个师团，占在华全部兵力一半以上。虽然如此，抗日根据地却未如杉山元所希望的被其消灭。敌已控制的铁路交通仍经常为我袭击而中断。如是又不能不在其上任周年纪念日（三九年九月）让位于多田骏。

多田到任不久，即提出所谓“囚笼政策”，沿铁路公路两侧挖成深沟高垒，实行严密封锁，隔绝我平原与山地交通，割裂我抗日根据地，敌寇依据这些占领之点线，向我各根据地压缩。当时敌我斗争已非常紧张，敌自以为得计，高叫“竭泽而渔”。我乃乘敌不意，隐蔽集结百数十个团兵力，突然指向平汉路、津浦路、北宁路、平绥路、正太路、同蒲路、白晋路同时进攻，击破其堡垒，并毁其沟墙，烧毁其车站、仓库，炸毁其铁路、桥梁，将多田得意之“囚笼政策”击得粉碎。八路军不仅占领了这些铁道，而且进逼平津。半年后敌始将铁路交通全部恢复。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回答了敌寇“肃清华北、确掌华北”的迷梦。多田在这一惨败的教训下，提出改变老套战法，实行所谓“牛刀子战术”，即“集结极优势兵力突击一点”之意，结果又被我神出鬼没分散之游击战所粉碎。敌寇复提所谓“分散配备、灵活进剿”，依然无效。华北八路军、游击队、民兵仍然驰骋山岳、平原，如鱼在大海，虎居深山，活动极为自若。

至此多田骏就不能不计竭事危，宣告退休，于四一年七月代以号称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郎。他是屠杀朝鲜民众及我东北同胞的血腥魔王。他到任时即提出交通建设，其办法就是深挖封锁沟，高筑封锁墙，强化堡垒政策，于是年秋集中十万以上大兵，指向我晋察冀边区，构成宽正面大纵深，进行所谓“铁壁合围”，企图以此表彰他上马威风。可是遭了我们晋察冀边区之人民子弟兵毫不留情面的打得他人滚马翻，焦头烂额而退出边区了。“铁壁”既被打碎，敌寇复于四二年五月以所谓“铁桶合围阵”用之于太行山，以“铁环封锁阵”用之于冀中及山东，均先后为我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及老百姓所粉碎了。

这一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冈村宁次郎在华北还提出了更加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以杀光、抢光、烧光的兽行来镇压我们的反抗。这不过表示黔驴技穷的狂妄幻想而已。我们虽有不少的美丽村庄被烧毁而成为废墟瓦砾了，虽有不少的男女同胞被屠杀了，然而我们华北军民并未被“征服”而更加英勇善战了。安达二十三（冈村宁次郎的参谋长）夸耀在华北有一万一千一百余公里之封锁沟（有如万里长城六倍，或地球外周四分之一），有近万的堡垒，但这并不能吓倒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与华北人民。

在敌人烧杀抢掠苛律暴行下，华北军民更加愤慨，英勇决斗。事实证明：自三九年起，黄河即被封锁，我军与大后方隔绝，孤悬敌后，粮弹两缺，靠着自己生产和民众协助，解决了粮食、被服，依靠指战员的英勇攻袭敌之据点堡垒以及反扫荡之胜利，夺取了敌人无数弹药武器，补充了自己。正因为如此，才能屹立敌后，坚持六年。这绝非偶然侥幸所获得，而是从六年来军民合作、共同努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英勇奋斗中获得来的。许多先烈尽忠职守，奋不顾身，创造了我中华民族光荣的史迹。我们为表扬先烈，鼓励来者，继续奋斗，略举数例，即可显示我大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英雄气概，也就是显示了共产党八路军对国家民族忠贞不二的事实。如：

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晋察冀边区涞源敌人分六路向狼牙山进攻，我某班长奉令率全班扼守险要，掩护主力完全转移。敌数千次大炮猛烈轰击，数度猛扑，该班至此尚有六人，

将其最后一粒子弹一颗手榴弹打完，将枪破坏，跳崖殉国。敌虽杀害了这一班英勇的模范战士，然而我这一班烈士不仅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而且给予敌人十倍以上的死伤。

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三日冀鲁豫边，我以一个排扼守马城村抗击千余之敌，被敌坦克装甲汽车四面围攻，激战半日，敌数度猛扑，死伤遍野，坦克被毁数辆，该排所剩数人，弹尽无援，亦无法突围，在其排长率领下，大声连呼“拚到底，誓死不做俘虏”，全排为之壮烈牺牲。使该村民众义愤突增，自动提出为勇士报仇，参加八路军者，倍于该排。民国三十一年正月，我特务团一部，保卫太行山黄烟洞工厂的模范战斗，造成敌我伤亡六与一之光辉战绩。其中有十二个共产党员，在冰天雪地中与数百之敌，在断崖血战三昼夜，最后只剩一名，始遵令撤出。

民国二十六年平型关大捷后，敌进犯忻州，与我友军激战。当时敌飞机二十余架从阳明堡起飞轰炸我友军阵地甚烈。我一二九师之一部，奉到八路军总部命令，用一切办法炸毁阳明堡的敌机，配合忻州友军作战。该部七六九团营长赵子德同志，将其口袋里仅存之三元法币摸出，交与公家，口中连称“阵亡了不为敌人所得”。如是即率队于黄昏出发，杀入敌阵，将阳明堡敌轰炸机二十四架全部烧毁。该营长赵同志亦光荣的壮烈殉国。这证明共产党人与八路军对国家民族之忠肝赤胆，与日月争光。

在共产党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民众中，也表现了至高无上的爱国热忱与民族气节。如冀中回民支队长马本斋同志的母亲（民众简称为我们的马母）。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回民支队在冀中经常的积极打击敌人，敌寇恨之入骨，企图以无耻的阴谋来破坏这一支队，敌寇以骑兵数百突然包围河间辛庄村，将所有男女老幼驱至广场，追索马母。全村男女均异口同声的说“不知”。敌以凶暴威胁，当场斩杀我同胞数人，然全村民众仍声色不动，毫不屈服，禁口不语，作消极抵抗。敌对该村民众即施以非刑拷打，灌冷水辣椒面，许多同胞被打得死去活来。环顾村人，含泪无语。马母见情不忍，挺身而出，毅然承认咱即“马母”。敌寇以为获得至宝，立即押解河间，软硬兼施，百倍威胁利诱马母写信劝子投降。马母坚称：“我是中国人，我的孩子参加八路军，一向不知道有投降两字，他现在带着队伍以及他三弟在一块，你们日本人有本事，就跟他去打。”贤良的马母，寥寥数语后，绝食而死。马母这种爱国精神，不仅是回族的光荣，妇女的光荣，而是我伟大中国民族无上光荣。

几年来，一般民众的壮烈表现实在太多了，即以此次太行区反扫荡战争中之辽县（现在民众自动改为左权县）一个区，就有：

后柴城村的财政委员吕振芳，敌以开水将他全身烫烂，仍守口如瓶，始终不肯供出公粮存放地方，最后被敌砸死。

上南会村的民兵王慕戌，被敌以针刺指甲，挖去两眼，最后被敌将其头击碎，仍不屈服，始终不报告出公物埋存地方及民众隐蔽在哪里。

大林口村的农会代表李福全、民事主任李倍嬗、财政主任赵光礼，因伤被俘，在敌严刑拷打之下，始终未说出半句有利敌人的话。

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已具有高度爱国热忱，还不仅是有这种爱国热情而且已经武装起来，组织民兵自卫队，造成了千千万万类似太行山的刘二堂神枪射手。刘二堂的枪是百发百中。当敌人“扫荡”时，每次都被刘二堂打死敌人的人马与指挥官。因此敌人恨之入骨，去年大“扫荡”时，敌以千数专门围山搜捉。刘二堂之弟假称刘二堂，当被敌残杀。当时辽县各地民兵尚不知真象，即自动为刘二堂报仇，亦有自称刘二堂者，一时到处

都是刘二堂的民兵，闹得敌人很奇怪。为什么杀了一个“刘二堂”，反而会产生这样多的刘二堂。

民众英勇杀敌的类似事实，在其他各战略地区，亦不可胜数。如在鲁南南沂河区肃家庄一个不满四十家的庄竟和包围的数百敌人激战至三日，敌犹强攻不下，最后竟无耻的施放毒气，而农民以手巾浸湿围在嘴上继续沉着应战。孩子很多中了毒，但母亲却仍然搬石头给自卫队准备最后的武器，一直坚持到弹尽时，自卫队才乘夜掩护全村老弱妇孺转移。

今天各根据地的民众已学会了地雷战。在敌人扫荡时，民众自动的会把厨房土地以至牛粪堆厕所旁埋设地雷，所以到处都有触发之危险。此次敌“扫荡”太行区，即触发了一千九百个地雷，即以每个地雷平均炸死一个敌人计算，这数目字是多么可观。

至于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中的工作人员，英勇壮烈的行为同样也多不胜举。

总之，在六年的伟大抗日斗争中，真不知有多少动人的史诗，真不知有多少光荣的无名英雄。他们只知一切为了抗战的真理，而不知有其他。这就是由于广泛的展开了抗日民族教育，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发挥了至高无上的爱国热情，也就是真正的实行了民族主义之所致。同时也由于正确的开展了民主运动，真正发动了各阶层的民众，特别是劳动群众参预政事，群策群力，把抗日的神圣事业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也就是真正的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同时也由于适当的改善了贫苦人民的生活，保证富有者应有的财权、地权，特别是奖励生产，因此相当减少了饿着肚皮抗日的不合理现象，巩固了阶级团结共同对敌。这就不仅是坚决的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华北敌后切实的执行了。从此也应该更深刻的使我们认识到：三民主义是整个一体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过去在华北坚持的友军遭受某些失败，基本上不是军事上的错误（自然不适合敌后环境的军事指导当可招致失败），而是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或者没有实行国共团结、军民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之所致。试想他们只要抗日，又不要民权，又不要民生，在事实上把三民主义改为一民主义，结果脱离民众，陷于孤立，焉得不失败呢？

在今后我华北的抗日政权、八路军，却应该进一步依靠民众，组织民众，真正与民众结合，成为水乳相融的密切关系，克服我们存在的某些弱点，才能克服胜利前的困难。越接近胜利，困难也越会增多，但胜利的定局已属我们中国人民。胜利在望，我华北军民应更加振奋起来，不惜任何牺牲，排除一切困难，坚定意志，提高信心，团结一致，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原载同日《解放日报》）

新四军在华中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陈　毅

一

七七抗战爆发，我党即在东南各大城市进行抗战动员及组织工作。随着徐州武汉的沦陷，我党即留在敌后，由城市转入农村，去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掀起华中人民武装抗日自卫浪潮。一九三八年，新四军奉令东征，与江淮河汉各地之人民武装汇合，更加强了敌后抗日阵线，由零星游击武装，变为集团的抗日部队，指挥统一，地区联系，各种战争建设次第兴办，蔚为大观。而敌寇之“扫荡”，亦日益频繁。自汪逆精卫粉墨登场后，更以“反共”“清乡”为敌寇“扫荡”之前驱。战局之紧张，斗争之艰苦，物质补给之困难，诚为前此所未有。本年恰为抗战六年度，亦即新四军东征后之第五年，抚今追昔，训诫良多。试略举敌我一年来军事斗争之诸大端，为本军同志告，并以就正于国人。

二

敌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去年夏敌寇以独立十二旅团南浦部队为基干，向我长江下游苏中区进行“扫荡”，六月开始进攻南通、海门、启东地区，七月转至靖江、如皋、泰兴、八月九月转至高邮、宝应、兴化，并第二度进攻南通海门各地。敌之锐利武器为水行利用装甲汽艇，陆行利用装甲汽车，水陆配合，且有大量土著伪军配合，运动迅速，刀锋深入每一农村角落。我一师粟裕部，经四个月血战，始于十一月初制止其“扫荡”凶焰。北面敌寇于九、十月之间大举“扫荡”山东我一一五师地区后，十月十一月以十七师团小林部队为基干，徐州为指挥中心，大举“扫荡”淮海地区及淮北泗水地区泗阳、宿迁、灵璧诸地，兽蹄所至，并及于津浦路西之凤阳、怀远、定远诸地。敌伪动员数达二万余人，继续“扫荡”亘二月之久。我三师黄克诚部、四师彭雪枫部、二师罗炳辉部，均轮番与敌伪纠缠。敌虽曾占我中心地区，终在我苦战之下，不得不被迫撤退。去年十二月为战局比较安定之月份，但敌寇是时正转移兵力进攻大别山及豫南友军李品仙、汤恩伯诸部。本军决心自动配合，我二师罗炳辉部、七师傅秋涛部在淮南路两侧及巢湖桐城之线予前进敌军之后路以袭击，我五师李先念部在黄冈黄梅及平汉线上发动游击及破击战，均收效甚宏。敌虽占领英山、潢川、罗山、商城、固始、立煌诸地，然历二十余日之激战，终在我国军抵抗及我军配合夹击之下怆惶撤退。

当大别山战役进行之际，一月初敌伪不断在南京进行“扫荡”新四军及鲁苏战区副总部韩德勤部队，公开广播东京报纸社论，连篇累牍讨论“扫荡长江下游中匪军之必要”，且谓

"予韩总部苏省府及新四军军部以毁灭性之打击，是粉碎英美反攻的太平洋总力战之必要部分。"又谓"长江下游富于食盐棉花粮食等战争物质，实不容渝、共盘据其间。如让其坐大，将为皇国百年大计之祸患"云云。敌寇鉴于多年"扫荡"之失败，转而与汪伪协商对策，选定人员，专门研究中国内战经验，尤注意于江西时代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的研究。敌寇二月间草定之进攻计划纲要，其为日后攻战所证明者，其概要如下：敌寇判断鲁苏战区副总部及省府与新四军军部均集结于旧黄河与射阳河之中间地带，东至于海，西至运河、高邮湖，两部常在该地带流转。敌寇决心以三个师团之兵力，进行大举包围，由西向东，由南向北，以实现歼灭我军于海滨之迷梦。敌寇计划之毒辣于此可见。敌寇之准备迅速就绪，于二月十二日即开始进攻，北面出动之敌为十七师团，由淮阴、涟水进攻，南面之敌为十五师团、三十五师团及独立十二旅团，由兴化、盐城北攻。十七、十八两日敌寇即在阜宁城、东沟、益林、凤谷村、曹甸一线上，完成其合击计划。本军三师黄克诚与韩总部互为犄角，策应得力。韩部于二十日后分批突围，渡运河西移。敌寇乃以全力"扫荡"我三师部队，及于整个盐阜地区。敌方分布据点构成大小包围圈，敌人大小合击数十次，企图撒网收网，期一举而得鱼。我军反击突围，时分时合，忽现忽隐，敌我双方极尽其纠缠、迂回、扭打之能事。当此之际，我一、二、四师粟、罗、彭诸部，出动部队援助友军，打击敌进军之后路。在路北侧翼，二月二十四日彭部攻克泗阳之洋河镇据点，韩部突围路经此间，彼此配合，恰收协同对敌之效。韩楚箴先生曾驰书致勉谢。我们深感援助友军共同杀敌，乃我们应尽之责，本军愿以更大之配合期诸将来。二月二十三日我一师粟部攻克南通东北曹家城、孙窑等地。二师罗部乘虚以奇袭入淮阴城内，夺获敌马匹甚多。淮安淮阴两城闭门数日。敌寇正面进占盐阜区，既难于站稳，而翼侧又受威胁甚大，顾此失彼，乃被迫撤退，敌寇宣称之盐阜滨海"扫荡"，遂于三月中旬结束。敌寇于三月中旬，自信其可靠之侦察，判定本军军部西移皖中无为、桐、庐之线，并以另一部南移苏南之茅山地区。敌寇不愿休息，复于上月十七日以大军进攻我七师之巢县、无为地区，并在苏南茅山地区加紧其第四期"清乡"，此为盐阜区大"扫荡"之尾声，亦即敌伪夸称对新四军之穷追计划。

巢南战局至四月初略趋平稳，而苏南敌伪之"清乡"工作，则已进至所谓第五期矣。我六师谭震林部活动于苏南地区，出没南京镇江城下，穿插京沪线上，为本军斗争最艰苦之区。一年来经过四次"清乡"，至今尚在坚持不懈中。

敌独立十二旅团南浦部队于"扫荡"盐阜区后返驻苏中，即于四月初连续进攻李明扬、陈泰运、黄逸峰诸部，我粟师迭与配合，不分畛域，使本军地区友军能够自由转移，能够获得必要供应。李陈两将军与本军抗敌合作之亲善关系，诚为敌伪所嫉视。此种抗战中的真诚团结，应随斗争的愈加紧张而愈益巩固。敌之独立十二旅团长南浦，乃敌方专任之公共指挥官，进驻苏北已历三年，日与本军接触。三年来其所属五个大队长，保田阵亡，石井负伤，部队消灭近三分之二。发动伪方向我军清剿，为南浦得意之作，南浦亦以此自夸，今则以清剿苏中，历未完成任务，复与伪方矛盾加多，不能协作，南淮因此去职，继任者传闻为小林师团，伪方为张北辰，我一师在苏中之反清剿战斗必更加紧，可以预测。

我五师李先念部队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及平汉路之两侧，北则肩摩皖豫，南则襟带江汉，远出挺进，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亦五年矣。今春二月十五日，武汉敌寇向长江与汉水间之三角地区进击我国军一二八师王劲哉部，沔阳以西地区失守，我五师即在汉川天门之线进袭敌寇，给友军以支援，迄三月八日，敌寇发动长江南岸攻势，分五处于岳阳

沙市间渡江，进占公安、石首、华容一带，我五师即在敌后发动全面配合对敌之破击战，五月中转战于宜都、安乡、南县诸地，复先后在潜江、沔阳、监利、襄阳等地发动游击战配合。总之，今春敌寇三次进攻我国军正面，我五师即三度在敌后痛击敌人，配合作战，其中以四月二十一日我五师攻入蕲春城，三月十日进攻黄冈，柳子港两役，对敌震撼之力最大，尤为当地绅民所称誉。

三

本军战斗举例：

（一）去秋九月二十五日南通战斗，我军歼灭敌保田大队长以下日兵八十五名，伪军三百余名，战斗形式为伏击。该敌于夏家渡被我待其半渡袭击之，敌退守沿岸村庄顽抗，我继攻至半夜，放火围歼，始克竟功，敌伪全部就歼，生擒三名。战后我军检还保田尸首于南通，以示我之伟大气度。敌方收尸复信感谢谓："贵军战后，归还战骸宽仁厚德，诚贵军政略之胜利"。是役我军由奇袭转为强攻，伤亡亦达百余名。这一战役之意义，在于阻止了敌伪下乡挺进之企图。

（二）去冬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定远之敌松尾中队长率敌伪四百余，事前诡秘进攻，突然企图一举而歼灭我驻在定远东南老人仓之驻军和党政机关。我军仓卒应战，予包围之敌以反包围，酣战至午，定远敌大队来援，复陷我军于二度围困中。我军应战至夜，突围而出。是役敌伪伤亡五十余名，我军伤亡数目略等。老人仓虽沦为敌伪据点，然迄今敌未敢再出。又三月下旬，淮阴淮安之敌逐日向我淮宝区推进据点，企图蚕食我军根据地，四月初已进至顺河集，企图进占高良涧、蒋坝之线，控制洪泽湖东岸，对我作更大之危害。我军于四月初袭击顺河集之敌，敌退至陈集。四月十日夜我军大举进攻陈集，亘一昼夜，敌三路来援，复放射糜烂性瓦斯以自救，十五日天明我主动撤退，敌我伤亡均重，是役后敌向南推进之计亦不得不自动放弃矣。

（三）今春敌寇扫荡盐阜区之际，二月下旬即密布据点，计二月末到三月初，在不及两县范围之地区即新增据点六十余处，妨害我军民居住活动甚大。我军乃于三月中旬复发动拔除据点之反击战，三月二十五日我军进攻阜宁西之陈家集，战斗当夜开始，敌据屋顽抗，我继以火攻，战至天明，敌不支突围。阜宁城之敌来援，亦被我军截击于中途。是役敌三十五师团之骈智也中队计八十名全部歼灭，伪军一部亦同归于尽。我军亦伤亡计营长以下百五十余名。除了此役以外，还有八滩单家港建阳诸地之著名战斗。敌不得已乃紧缩其据点，将新增之六十余据点减至十一处。敌寇密布据点，即所谓钉铁钉之政策。我军拔除据点，即所谓拔除铁钉之战术。钉铁钉之力甚大，拔除之力必超过之，始克有济。战斗之凶恶残酷可以想见。

（四）今春三月十六日淮海区敌寇分兵十一路，计敌兵千余人，包围我进驻梁岔之部队，企图以铁壁合围全部歼灭我军。我军闻讯，灵活转移，跳出包围，敌跟踪追击，复于十七日续行第二次合击计划，双方遭遇于涟水老张集朱杜庄一带，激战半日，我军复于黄昏后突围，转移至跃皮镇刘老庄等地。十八日晨敌三度合击，我军先头部队安全突围，而后卫则陷于重围中。我军乃就田野间之交通沟进行拒抗。第一阶段，我军进行突围，屡次与敌肉搏，均无效，乃决心固守待援。第二阶段敌见我转攻为守，欺我废弱，以大队骑兵向我猛

冲，为我军击退，其冲至防御工事前沿之敌，下马肉搏，均为我刃毙。第三阶段，敌悉知我仍不易与，乃选择较远距离，重新配备火力，以机枪大炮集中放射，对我进行火力毁灭。是时敌寇知我军已突围无望，乃妄想降服我军，无耻的伪军乃开始其招我投降的火线喊话。我军将士坚不为动，乃从容将机枪步枪拆毁，并将文件杂物付火，将忠骸掩埋后，乃集中未伤者之二十余名进行最后之突围。战至下午五时，终全部殉国。此我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第四连全部，连长白思才、副连长石学富、政指李云朋、文教孙尊明、排长尉庆忠、蒋员连、刘登甫等以下计八十二人，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敌寇虽歼灭我军一连，其损失亦相近。此役敌寇所获者无一可用之武器和杂物，伪方传出消息，敌军对于我军壮烈殉国之牺牲精神，深致敬佩。当地人民于战后三日内，即将忠骸举行公葬，题为新四军抗战八十二烈士之墓，谒者无不低徊流涕。烈士们殉国牲牺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惟本军转战敌后，长年累月，应与敌之包围作斗争，切忌陷入敌之重围。此战术上之重点，本军将士宜知所警惕者也。

（五）四月二十四日我军进攻运河西岸之洋河镇，经六小时战斗，歼灭敌伪军四百余名，残敌据房屋顽抗，我军以洋油火攻，房屋全毁，敌寇无一得脱。当我军在洋河镇上向民众收集火攻材料等，均照价给钱。洋河固苏北大镇，长十余里，战斗前后我军秋毫无犯。而后洋河伪军给罗圩伪方信称，洋河一战，人心大变，并谓新四军固不仅以力服人，且能于作战混乱之际，表现其严明之纪律，如此服人以德，谁不钦佩云云。

（六）苏南我军于四月十五日奉令渡石臼湖（溧水之西高沟以北）西向游击，十七日进至明觉寺附近，当被敌寇发觉，天明时敌寇四路包围，双方随于石臼湖东冈前堡新张家小赵王家东王墟之线，发生肉搏激战。敌寇企图全部压我投入石臼湖葬身鱼腹，我军背水抗敌，士气倍增，激战至夜，我军全力突击明觉寺方面之敌，敌不支溃退，撤围而去。我军当夜安全执行渡湖西进之原定计划。

四

战局平衡，分散兵力，巩固其占领之点线，集中兵力“扫荡”其攻击之目标，此敌寇战法之大要也。全面出动，以包围我军之根据地寻求我主力决战，此敌寇“扫荡”初期之动作也。密布据点、进行封锁，部署不断之大小合击，以肃清其占领地区附近之我军，巩固其已得阵地，此敌寇“扫荡”中期之部署也。“扫荡”末期，则进行所谓篦梳式之“清乡”，其目的不在打击我主力军，而以全力摧毁我方之党、政、群众组织，厉行其归化运动，即所谓政治“清乡”是也。敌寇进军之初，先以军事镇压，火烧掳掠，无所不至，继则进行其怀柔政策，以“反共”口号掩饰其毒谋，妄图使居民健忘而堕入其彀中，伪方上下，则为虎作伥。敌寇之分区“扫荡”，为敌寇兵力不足之证据。敌寇“扫荡”时期有继续至二月以上者，虽较过去为更持久，但终不能弥补其时间之中断。敌寇之施用毒瓦斯以及所谓三光政策怀柔政策等，均为敌寇外强中干、力量不足、对我无可如何之表现。此一年来敌寇“扫荡”之规律也。敌寇之所得，在予我根据地以极大之破坏，予我部队以相当的损失，但不能予我以根本歼灭。敌寇之所谓胜利，盖暂时之胜利，军事掳掠之胜利，战术上之胜利，而战略政略上之失败则与日俱增。敌寇亦自知之矣。

分散游击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兵力以突击敌之薄弱部门，此我军反扫荡之战法

也。“扫荡”初期，避免正面恶战，而必予前进之敌以阻滞。“扫荡”中期，相机击敌而必予敌新建之据点和封锁以适当平毁。“扫荡”末期，则必予敌以有力反击，并痛击伪部，以剪除敌寇之羽翼，歼灭敌寇以动摇伪部之心胆。我军抗敌有方，则伪部人心思汉，此乃事理之必然。我主力为反扫荡的骨干，灵活转移，在适当时机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军之时隐时现，零整互化，民兵就地游击，就地坚持，神出鬼没，及于敌伪之卧榻居室，构成敌伪之日常恐怖。三者互相配合，互相转化，使敌伪难于捉摸。敌伪虽强大，终必低首于此。在军民联合打击之下，“清乡怕不清，扫荡白费心”。此为敌占区人民之民谣，实为对敌寇扫荡之正确结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人民得你生，大家来参军，”此为华中人民要求参军上前线之歌谣。盐阜区士绅慰军大会，其传单有云：“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挥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阜宁国民党书记长某君称：“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扫荡’新四军，新四军能保全主力，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击，恢复阵地，足见抗战必胜利之前途。”淮海士绅见农抗会领导之民兵活动，使敌不敢下乡滋扰，盐阜区士绅见民兵作战得力，土匪乘机窃发，为民兵削平，交口称誉“党政方面有远见”，并谓“始知减租减息扶助工农政策为抗战建国之大端。共产党能担负艰巨，又能让人民同享其成，乃知我等以前之不满，属于浅见”云云，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适来华中，亲见反扫荡军民合作情况，指出“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谄言。余不亲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苏中有九十老人某君自言：“几十年来，数经世变，凡大战兴起于城市，匪乱必起于乡闾，战祸之直接损失尚小，战祸引起之兵荒匪乱使人民受祸甚大，不料苏北处在经常与敌伪对战中，大军转移吾村，月必数至，甚有日必数至者，而乡闾秩序井然，无跑匪畏兵畏匪之累。此乃党政办事之得法，战后之天下太平可于此卜矣。”沪上文化界某君等获悉反扫荡中我军与苏北友军配合作战的情况，为之大乐，远道驰书，申其敬佩。以上为人民对本军之评论，其于本军之缺点或略而不言，或嘉其长而宥其短，或言其大而忽其小。以本军之实况当之，自省仍有愧恧之处。然而反顾国人中间，亦有人以“游而不击”的蜚语，诋毁本军。古人云，止谤莫如不辩，止毁莫如自修，本军素以此义自励。但上述人民之言论，固系公正之判词，当为国人所共鉴。

五

克服困难，迎接胜利，抗战第七年，时局对日寇必日益不利，其疯狂镇压敌后，必日益加紧，严重扫荡必然来临。本军决心不惜重大牺牲，换取坚持敌后支撑全面抗战之代价。本军损失固无可避免，而敌寇亦不能不付出重大代价。战局之必趋更加严重，此困难之一面也。

抗战第七年，华中根据地平原地区甚大，战局时紧时弛，尚有喘息余地。今则敌我战斗趋于狭窄地带，寸土必争，进退皆非易事，游而不击者必亡，击而无力者亦必亡。既游且击，击必得力，此本军在敌后生存发展之道。违此者必降，为敌寇之降虏。其证例甚多，无庸列举。惟本军在武器拙劣和弹药缺乏的条件下，向强大之敌寇作战，故战斗之夜间性、白刃性、流动性、短促性、群众性表现最为明显，伤者多重伤，重伤者多死亡，此医药缺乏之所致，此困难之又一方面也。

自皖变以来，迄今仍有友军不断予本军以高压，我五师六师方面完全处在两面被夹攻之

地位，我四师亦常在被友军袭击状态之中。本军忍辱负重，不愿轻启事端，扩大事态，一切仅限于严正的不得已的自卫。去秋浙赣路战役爆发，苏南皖南友方千里撤防，本军无一兵一卒南进，此为铁铸之事实，为江南友军官兵地方绅民所目睹者。如何加强民族团结，援助敌后抗战之孤军，撤消磨擦方案，放弃特务政策，此本军所馨香祈祷者也。国内关系僵持不决，友军煎迫迄未停止，此本军处境困难之又一方面也。

近年法币贬值，百物飞腾，敌后部队给养更见困难，去冬以还，本军即采“寓兵于农”之旨，从事生产，力求自给自足。比者黄梅初熟，麦黄菜青，荒地辟而水利兴，耕耘多而收获大，官兵生活略有改善，人民负担亦为减轻，此我军生活之困难，以及如何克服之又一方面也。

以上仅就内部外部之困难条件大体言之。本军将士身经数百战，出生入死，一心一德，政治觉悟和战斗能力均历经考验，加以当地各界人民同情环绕于本军者数百万人，人民乃本军之父母，本军乃人民之卫士，故本军虽临万难，信心坚定，始终如一，盖困苦艰难之来，既无可避免，惟奋斗不息，尽其在我者，足以克之。最后之胜利，盖属诸最后之搏战。孟子云，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本军对国家民族之忠悃，庶几近此。如何以民主方策澄清时局，外以适合国际民主之潮流，内以解决多年内争之纠纷，万方有罪，反躬为上，是非混淆，民意是从。是在明达者一转念间耳。抗战六周年，胜利在望，克服困难，以迎接新时代之胜利，本军将士谨以此自勉，并待教于国人。

（原载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解放日报》）

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刘　伯　承

全国抗战，已六年于兹。本师即在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及朱、彭总副司令直接指挥之下，深入敌后，且现已与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广大民众血肉结合，坚持敌后抗战，成为敌人不可摧毁的力量。

我们与敌人斗争的过程，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七七”抗战起到武汉失守（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这一时期，即敌人所谓“堂堂阵容”的正面进攻的时期。当它由平津陆续攻陷大同、石家庄、太原、济南、新乡以后，其重点就转移到徐州、武汉的会战去了。它向华北进攻时，主要是依托铁路，进行“突贯攻击”与“分进合击”，及占领一地后，则注重于巩固战略要点和后方交通，逐步进行其歼灭我游击战争的围攻。先之以大烧大杀，煽动土匪会门，成立伪皇协军；继之以治安维持会的建立，以图消灭或驱逐我军，确实控制华北，变为殖民地。

这一时期，我八路军奉命开入山西，协同友军作战。本师即在同蒲路北段及正太路沿线之敌军的侧背进行攻击，以配合正面友军的防御。其间，以策应忻口战役，袭击阳明堡烧敌飞机，和在正太路南侧之七亘村、黄崖底等处所进行的诸战斗，曾给了友军以很大的助力。迄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主力向南撤退，而华北同胞惨遭屠杀之际，我党我军为要从敌人侧背牵制敌军，以掩护友军起见，为要结合华北广大人民，保卫身家保卫华北起见，曾提出“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实行坚持敌后斗争，以加强协助友军作战。此时，本师即一面坚持晋东南所有阵地与敌苦战，另一面则分遣部队，更深入敌后——冀南、鲁西北出击，特别着重于发动群众游击战争，摧击敌后交通，以使友军得以从容转移，严阵作战。迄武汉失守之日为止，本师在晋东南作战，最著者为破坏了正太路，粉碎了敌人对晋东南的六路围攻和九路围攻，抑留了敌人增调徐州会战的兵力。同时，深入冀南、鲁西北的部队，亦结合当地民众，摧毁了各地伪政权，连在冀察政权[1]时，地图变了颜色的冀南，即于此时被我军克复，并消灭了伪皇协军土匪会门武装六、七万人，策应徐州与武汉会战，并曾组织对平汉路、道清路与津浦路的大破击十余次，截断敌人在徐州会战中的接济。我军这样的在晋冀鲁豫间与民众结合抗战，特别是民众抗日武装蜂起响应，驱逐敌人，

* 本文为纪念抗战六周年而作，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延安《解放日报》。

遂开始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日寇尖锐对立，肉搏斗争。

第二个时期——从武汉失守到华北“百团大战”（一九〇四年底）

这一时期，即华北敌酋杉山元所实施的“治安肃正”时期，也就是对我进行所谓总合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总力战”的时期，而其在政治上着重于挑拨抗战的团结，在军事上则回师增援华北（仅在本区周围者已达八万），强化交通，割裂我根据地，建立治安军、警备队，进行所谓分散配置奇袭“牛刀子战术”的“扫荡”期。其目的在彻底消灭我军，由“治安肃正”进入华北殖民地秩序的建设，以便进攻西安、重庆、昆明。

这一时期，我军结合华北民众，对敌进行全面的全力的斗争，人民给了我军以“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在军事上，则以主要的游击战间以运动战，进行频繁的反“扫荡”与破击交通线上之敌。当时本师在“粉碎敌人囚笼政策”口号之下，粉碎了敌人大的“扫荡”就有十次之多，而破击战则更为激烈。冀南的交通斗争，甚至在一九四〇年的全年进行着，其中尤以阻滞敌人修德石路为最残酷。在山西，则收复了邯（郸）长（治）公路，破击了白晋铁路。以后又进行了“百团大战”。

第三个时期——一九四一年到现在

这一时期，即敌人在“百团大战”震撼之后的所谓“治安强化”时期，也就是总力战强化时期。现敌人已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特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加强人力物力财力的掠夺（尤其是壮丁、粮食的掠夺），建设伪军，整顿伪组织，求其“净化”。对我边地则跃进蚕食，对我腹地则“铁壁合围”。所到之处，显明的交通线封锁沟与潜伏的特务组织都构成网状，以期实现其抢光、杀光、烧光的政策。这尤为敌酋冈村宁次的“杰作”。

这一时期，我“三三制”民主政治的建设日有成绩，因而各阶级团结对敌的力量遂日益增强。在“精兵简政”之后，我们正规军游击队人民武装等结合人民而成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正发挥党政军民一元化斗争的威力。在一九四一年与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就本师作战来说，即达七千九百七十六次（冀南较多），而其中有十九次是大的反合围、反“扫荡”战，至于反蚕食与交通斗争，则成为日常工作。我游击队进入敌占区，结合民众，作反奴役反配给与反抢粮反抓丁的斗争，同时对敌伪内部进行政治攻势，收效很大。

现在敌占区与抗战区的游击性同时增大，形成相互插花、夹杂斗争的情势。我们相信，我军能与华北人民永远血肉结合，更能够一致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结成一元化的对敌斗争，一定能够坚持这一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与友军呼应作战，直到反攻阶段的到来。

我们概述的三个时期斗争经验，可以提出某些战术原则的问题来。

第一　战术社会性的扩大

这里又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抗战斗争的成员问题，另一个是斗争的战术问题。

由于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摆脱亡国奴命运的残酷斗争，所以参加斗争的成员，必须是每一

个中国人，而不单是某些少数人，尤其不是几个军人。几个军人，只能是侧重于武装斗争的成员，但他又不能限于武装斗争。为了动员广大的民众成为斗争的成员，一定要在民族抗战中建设民主政治，把广大民众的利益与民族利益结合一致，否则是不能成功的。因为广大民众愿意进行自做主人成员的抗战，而不愿少数人垄断抗战。现在我们全面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就是由抗战与民主结合发动起来的，今后更应循此途径，发挥全民族的力量，走到抗战胜利。

战术被运用的范围，不应只局限于武装斗争，而且应普及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斗争。军事战术与政治策略的含意本来就是一样的。今天抗战斗争的成员增多了，这对敌人的军事、政治、文化、特务等“总力战”、“歼灭战”的斗争，也错综复杂起来了。我们抗战的每一成员，必须掌握各种斗争的战术，不过个人都应抓紧个人斗争业务，而侧重于掌握自己的某一斗争的战术，并一般地掌握其他斗争的战术，以便与之结合（如战争、生产、教育等）而成一元化的斗争。单纯军事观点、脱离广大民众的军人，已成过时的人物了。

第二“敌进我进”

“敌进我进”就是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当敌寇攻占华北，友军南退，人民涂炭之时，我军曾在战略上进入敌后华北，结合民众斗争，掩护友军，因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即日寇痛呼为“盲肠炎”者。假若不是这样，要想敌人不去进攻西安、重庆、昆明，不在华北完成殖民统治的秩序，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又假若我们在反蚕食、反“扫荡”中，在战役战术上，不以一部或主力到敌人侧背作战，强化游击与政治攻势，而能巩固根据地，也是不可思议的事。不过，“敌进我进”是结合敌后广大民众作解放斗争的战术，而且我军在大后方又领不到饷弹已四年于兹，“敌进我进”的战术，对于我们实成为舍己为国、至大至刚的行动，原非脱离民众、空谈爱国者所能做得到的。曾经有人进入敌人后方，结果未能立足，或被敌人驱逐与消灭，甚或变节投降，而自绝于抗战胜利之路，这没有别的道理，就是自私自利，高悬于广大民众的头上，甚或压迫民众的缘故。

日寇的作战见解，是建筑在“敌退我进”之上的。故在抗战之初，以为我军只是掩护主力，收容部队之散兵，其次则认为游击队尚可聚歼，以后才喊出“八路军在占领区如此滋蔓，实乃皇军心腹之患”。这是由于日寇的作战要务令上并无“敌进我进”的条文。

第三“群众性游击战争”演变中的威力

毛泽东同志曾给我们英明地指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一般是执行了这一指示，因而取得了相当的胜利。我们在上述的第一个时期，在发动群众游击战争中，特别在日寇用兵狂妄的有利条件下，曾常以正规军队作大踏步的进退，取得了运动战的胜利。在第二个时期，在地方军队、人民武装初步建立时，在敌人增兵华北厉行“扫荡”、实施“囚笼政策”的条件下，曾以主要的游击战间以运动战，取得了反“扫荡”与破击战的胜利。在至今第三个时期，在地方部队、人民武装逐次壮大，在敌人强化交通与封锁沟墙，跃进蚕食、合围“扫荡”的条件下，则一般是发扬“群众性游击战争”。但

这并不是说，在群众性游击战中，不抓到敌人分散的弱点，不给以消灭的打击；相反地，正需要而且正容易抓到敌人分散的弱点，给以消灭的打击。只有如此，才能制止日寇狂妄的分散。不过，在这里战斗的机动性是日益加强了，尤其是指挥员，在敌我利害时机变换很快，而上级又无法及时指示的条件之下，必须发挥我军机断行事的优良传统。今年五月，在冀南馆陶格子网内王七坟的游击部队，于一小时内干脆地消灭了敌伪军一百余人，足够机断行事的本领。

无论敌人在其蚕食或“扫荡”中，曾现出许多花样，如“捕捉奇袭”、“反转电击”、“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抉剔”，最近又添上了“釜底抽薪”、“三角合截击”及“前进与截击”、“包围与扫荡”之类，然而异族正规军协同动作的特质，不断在群众游击战争万目监视之下，遭到无规律而准确的袭击，也无法以施展其长。其伤亡于冷枪、冷炮、地雷的人马，也通常大于正规对战的数目。因其兵力如集结过大，则易遭我适时分遣的消耗；如分散过小，则易遭我适时集结的消灭。日寇军中一句谚语：“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军大大的有。”这就是日寇无可奈何的呼声。

然而，群众性游击战争威力之大，并不只限于战斗，而且还有政治攻势。政治攻势不只是燃起了敌占区同胞的抗日热潮（日寇正感叹：三军可夺帅也，中华民族不可夺志也），而且也燃起了日军反战热潮。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日寇“十八春太行作战”②，正是它慑于政治攻势的表现。

第四　交通斗争

交通斗争，就是敌我双方各自打通自己的交通，打断对方的交通。日寇海陆战地辽阔异常，为作战输送的需要计，为控制占领区掠夺人力物力计，海陆交通已成为不可打断的生命线，如被打断，必演成肢解的死亡。但在我们看来，则成为或者是让日寇交通线紧紧缠死，或者是破坏交通线的问题。

现日寇倡导大陆作战的战术，以开发生产，打通交通线而确保之为主。去年十月华北敌军参谋长安达也说：“华北堡垒已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了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之外长城线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最近敌占区城市饿饭，敌军闯入根据地，拼命抢粮运走。这些都说明交通战斗达到了如何紧张的程度。

敌人的交通线和遮断壕如此之长，堡垒如此之多，意在确保交通与束缚我游击战与运动战。然而这长这多的工事，陷入于中国的人山人海之中，更形兵少防宽，就不能不以一个日本兵监视几个伪军来守备。于是，日寇防止中国人的敌视伪军与防止日本兵的反战等问题出来了。

我们一面在政治攻势上抓紧了这个问题，另一面则以军队的战斗力，结合广大民众的劳动力，进行了大众的破坏与技术的破坏。单以一九四〇年一年的破路而论，本师破坏铁路、公路即已达一万二千余里之长、从此交通斗争即成为此修彼破、彼修此破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到打出日寇的那一天将是不会停止的。

第五　对现代技术兵器的斗争

日寇是具有空军、装甲车队、炮兵和毒气等现代化的军队，唯武器论者曾夸大其作用，

以造成恐日病。我军是由人民在革命武装斗争中生长成的军队，武器窳败且久不得弹药的接济，然而竟能在敌后坚持抗战者，除结合群众斗争外，在作战上曾根据敌人诸技术兵种的性能，抓其弱点，利用和改造了地形，也利用天候与时间，特别发展了自己军队善于“机动”与“坚决”的擅长，不但防御了日寇的技术兵器，而且也摧毁和夺取了这些技术兵器。迄今抗战第六周年为止，本师烧毁与击落了敌人的飞机四十二架（其中以袭击阳明堡及长治时为较多），也毁了敌人装甲汽车三十七辆、坦克二十辆，汽车一千二百三十七辆（其中尤以响堂铺、香城固与破击正太路诸战斗为较多）。至于日寇使用毒气，也是经常的事，而尤以在辽县、榆社两次战斗使用者为多。但是辽县、榆社两城，仍于当时在我们坚决攻击之下收复回来了。我们现有的炮兵部队，大多数是夺自日寇而成立的。其他如机关枪、步枪之类，则夺自日寇者为尤多。这样以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将来也会有的，而且在某种时机还会更多的。

第六　侦察与防谍

侦察使我们明了敌情，防谍是塞蔽敌人耳目，并束缚其爪牙，使其无法危害抗战。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重点应放在侦察之上。

我们正在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军民都需要明了敌情，尤其要防范日寇特务机关、宪兵、警察、新民会等各方来的阴险万状、无恶不作的间谍活动。一般人所知道的，如日寇有劫持大批民众作间谍者，有以抗战面目拐骗陷入者，有混入经济系统作间谍者，有在伪组织骨髓中作高级间谍者，有便衣武装挺身队[3]潜入腹地袭击暗杀者，然而这还不过略露一斑而已。我们的侦察防谍，应成为大众的运动，并在大众的侦察防谍的基础上，建立军机的侦察防谍。因此，首先应使民众尤其是人民武装和营兵部队深刻了解，侦察防谍乃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有力保障，并知道如何察明敌军行动，如何识别间谍，防止他们破坏抗战团结、军事组织，及防止其察明我军企图部署。特别是营兵部队，应严守军事秘密，尤其是爱护文书应如其爱护眼珠一般。我们是抗战军人，即使日寇、汉奸、叛徒施行任何威胁，甚至以死相威胁，亦不应泄露半点军事秘密。对于营兵部队与人民武装，应分别定出几条防谍守则，以资遵守。特别要表扬民族烈士坚定不移、宁死不泄露军事秘密的光荣行为。

我们在日寇后方所谓的“兵站基地”——华北坚持斗争，是站在全国军队的前线。在日寇未被击败溃走之前，我们与敌人肉搏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必然是极其残酷与极其复杂的。本师抗战第五周年，全年战斗统计约四千次。而今年第六周年，全年则突然增到约八千次。于此可以预见今后敌我斗争的严重情形，敌我的战术竞赛，将随之而更新颖更丰富的发展，急需我们在斗争中注视研究与发展战术。

〔注释〕

（1）冀（河北省）察（察哈尔省）政权，指存在于一九三五年夏天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该委员会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寇代表梅津美治郎在天津签定的卖国的《何梅协定》的产物，对日寇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芦沟桥附近进行挑衅，宋哲元部下奋起抵抗，从此爆发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冀察政权亦随之瓦解。

（2）指日寇昭和十八年（即一九四三年）春季对太行区的“扫荡”作战。

（3）日寇进行武装特务活动的便衣中队，平时专门进行特务活动，对我军及根据地做侦察研究工作；战时乔装为各种各样人员，潜入我根据地进行袭击、暗杀活动，特别是袭击我军事统率机关。

华中局对整理自卫军和提高民兵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

今年冬季和明年春耕以前，各地应利用农暇，进行自卫军和民兵工作之整理和提高其坚持力量。兹就各地不完备的材料，加以研究后提出下列指示，各地斟酌实况实施之。

（一）自去年春华中局扩大会提出建立民兵及自卫军的工作任务之后，最近期间各地对自卫军和民兵工作有了初步的建立，在扫荡频繁地区（如苏中、淮海的某些地区）成绩最大，已把组织和领导民兵成了党的经常工作任务，逐渐找出了民兵工作的规律；在扫荡时有间断的地区（如淮北、淮南、盐阜区等地），则在战时民兵作用表现亦大，而扫荡过后复处于比较松懈和涣散的地位，这一情况自有其客观原因，故今后对民兵及自卫军工作应有如下部署：

甲、在中心地区一般应强调建立和整理自卫军。造成全民武装，农村军事化，党员军事化的反扫荡反顽的坚持抗日民主斗争的热潮，可用检阅、戒严、会操、轮训各种方式去进行；同时在一般自卫军建立之中，并注意于某些中心村镇或偏僻的居民点，建立自卫军的模范班或基干队。平时加强教育训练，战时即成为坚持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之骨干（即民兵）。过去在中心区只对自卫军作一般号召，不建立骨干或过早去建立脱离生产的民兵，两种偏向均属于形式主义，不切合斗争的实际，故应纠正。

乙、在边区或扫荡频繁已无中心地带的游击区，则应强调整理现有民兵适当扩大之。以加强领导培养其战斗力为主，逐渐使一部民兵过渡到地方军中去。应确定脱离生产的民兵成为主力与地方军的后备兵的意义，不过这种过渡和转化应该有步骤的依自愿原则去进行；保持其骨干，加以不断补充，防止连根拔除的剃头办法。同时也反对将民兵发展限制在本乡本土的停滞观点。在边区游击区不应强调建立自卫军，但亦不取消，而应根据当地情况用自卫团、联防会、联庄会、冬防会等名义，保持指导线索和系统，成为民兵的基础。

（二）民兵是带全民性的阶级武装。因此自卫军和民兵成份应以贫农、雇农、中农为骨干，但不拒绝其他成份。如抗日地主富农子弟的参加，只一般不宜让其处于领导地位。流氓、地痞，不应让其参加民兵，但不能因此便洗刷和拒绝一般稍有烟赌嗜好的农民。民兵应成为群众日常生活利益的保护者，但不能便成为反对地主和上层分子的阶级斗争的工具。相反的要吸收中间阶级上层分子协助民兵工作，鼓励其对民兵出力（如捐粮出枪弹等），以实现农村全力支持民兵，以保持根据地之政治任务。不认识民兵的全民性和其在民族斗争中的作用，必变成工农突出，失掉农村各阶层的支援，则孤立必败；同时不认识民兵的阶级骨干，造成品类复杂，又有为反动分子所窃据的危险。这两者的清楚辨别，是领导民兵的基本原则。

（三）民兵工作目前的弱点表现在代替政府职权。如乱捉人，乱罚款，乱没收破坏政策

的行为（如淮南所谓打资敌便是），又有随便以汉奸土匪名义肆意逮捕和处决人犯等；另一方面是地方保守和报复观念，个别地方发展为地方械斗，或不受主力部队及地方军指挥等。这些严重现象不能归咎于民兵本身，而应归咎于党的领导不够坚强。民兵之能有今天的成绩，固然由于党的领导和主力部队及政府的培养，但上述的弱点也正是领导帮助不够的表现。故纠正民兵现存弱点以及如何加强民兵，其重心应放在加强党在民兵中的领导上面。民兵是基层工作，是武装的群众工作，是分散的、细小的、复杂的战斗工作，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和不断的政治教育，民兵的往后发展将失掉掌握，产生得不偿失的危险。没有切合民兵的军事指挥和不断的训练与补充，民兵的战斗力的继续亦将感觉困难，要丧失民兵正在蓬勃发展的锐气。所以民兵工作的领导应从政治军事双方着手。指挥民兵应有正确而具体的军政方针，这是目前民兵工作的中心环节。某些高级党政军民机关，不讨论民兵工作，不关心民兵工作，应立即纠正。在民兵领导指挥上应由行政（村）乡或自然村（乡）的党的支部负全责。民兵队长（如游击小组组长模范班长等）均应成为乡村党的支部的委员之一，党的支部应经常讨论民兵工作，列入每周的议程。应确立党员成为民兵的骨干，每一中队应有相当数量的党员，成立党的民兵支部或小组以加强领导。区委、县委每月应检查和讨论民兵及自卫军的工作，地委、区党委于今冬和明春，应按季讨论两次，听取民兵工作报告，总结民兵工作经验，详订改进办法。各军区、分区司令部应指定专门委员会，由军事指挥员亲自动手，切实调查几个区、乡、村的民兵部队，仔细听取民兵的报告，作详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寻找弱点，详细订出具体的整理和提高办法。并以这种调查作为典型例子，来指导和推动全地区的民兵工作。民兵工作之加强不是无的放矢的空洞的命令训令可以解决，必须从基层调查研究着手。

（四）民兵工作的干部应在当地培养，纠正目前某些地区依赖部队派遣的观点。纠正某些地区只以军事勇敢为选择民兵干部的唯一条件，民兵干部应该是当地群众中党员中最有威信的群众下层领袖。党要有计划去加以培养，可以在民兵战斗中提出创造民兵英雄的口号：

甲、忠实于抗日的保乡事业；

乙、勇敢杀敌获有特殊战果；

丙、遵守政府法令。

三大条件为民兵英雄的标准。民兵英雄不应由上级委派而要由群众大会、民兵大会中以民主方式公认、公选。各地党部为培养民兵英雄，事前应先有精密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动员，在每一个村或乡应预先确定几个党员或非党积极分子取其可能培养者加以帮助，然后在实际战斗中去锻炼，一定要在战斗中有特殊表现，为人民所公认者，才由军政机关正式批准，给予民兵英雄的称号，在群众大会公布之。各军区党政军机关应具体讨论出适合该地创造民兵英雄的条例，颁布实施之，但不得轻易滥用。在一经宣布成为民兵英雄之后，地方党即要视为党的重要干部，爱如至宝，加以继续培养。为了慎重举行，可先经过神枪手、模范民兵等称号作为第一步，经过此一步的考验、培养，第二步再给予民兵英雄的正式称号。各地可具体规定可用的办法。在某些地区民兵战史已相当长久，亦可在总结过去战斗中推选出当之无愧的民兵英雄，以示鼓励和崇敬。

（五）各地应定期轮训民兵（或召集自卫军的干部开七天到十天会讨论工作，兼受训练），可视环境的可能给一周一月或两月的训练，由军政党机关预定课程，负责同志分出时间出席讲授。这一轮训班应成为培养民兵干部、整理和提高民兵工作自卫军工作的推动机。民兵轮训课程军政并重，政治讲抗战常识、民兵教育和阶级教育，军事讲民兵的实际战斗经验，采

取学用一致的原则，不机械用主力那一套。

（六）各地应总结一年半以来民兵战斗的实际经验，来发现真正又合理又合用的民兵战术。据现有材料看，以苏中第四分区的民兵在这方面有极大的收获，淮海区亦有一部分很可采取。其他各地民兵在战术方面一定有所积累，目前应由各地军区司令部加以总结整理，使复杂丰富的民兵战法，用战术理论加以说明，成为有规律可寻的东西。凡民兵战斗频繁的地方，正是经验丰富的地方，也正是需要战术理论去加以整理、说明和改进的地方。一般战术理论与具体民兵相结合，是今后民兵战术发展的必然阶梯。我们军事机关不担负此一用理论指导实际和以实际转而丰富理论的工作，这便表示我们的无能，同时民兵战术今后进步亦将受着限制。今天敌后民兵作用和他的战术发展，一般说已在某些方面突过内战时代，这是我们应该极端重视的，这是各军事机关新的业务之一。

（七）由于战斗频繁、地区分散及适合精简原则，垒层庞大的各级武委会不必机械成立；但县、区、乡三级的武委会则必不可少，必须视为重要工作部门切实建立。县、区、乡三级可视战局变化及地区特点建立之。有时只要县乡两级，或有时只建区乡两级，或有时只要区级不要县乡两级的灵活决定，但应坚决反对武委会的取消观念。武委工作，区党委和地委应当具体指示，县区委指定专人去领导，才不致失掉掌握，更要大胆经过武委去推动各阶层人民来积极参加抗日自卫运动，使自卫军和民兵从狭隘圈子中解放出来，以增强其群众性和全民性，而达到提高其战斗坚持力量以巩固根据地之目的。

（原载一九四三年新四军军部出版的《军事建设》第三期）

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陈　　毅

估量江南抗战的意义，不应从江南地方的观点出发，应从配合整个中日战局的作用上出发，特别在整个抗战已经开始进到第二阶段的今天，坚持江南抗战，普遍而深入的开展江南的游击战争，使敌人一刻不能安宁，一刻不能放松的来兼顾其后方的战局，对于停止敌人的前进，争取敌我相持局面的迅速到来，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江南某些士绅，以保卫江南某一地方、某些角落为满足，不敢向敌寇挑战，甚至唱保境安民的苟安政策，不仅不适合于全国抗战利益，而且不利于坚持江南的持久战。每个同胞，必须清楚认识的是：日寇之不烧杀某些地区，不攻打某些市镇，并不是日寇有爱于这些地区，而是因为战线延长，兵力不够分配，特别是因为我军在京芜一带，到处袭击敌人，困扰敌人，消耗敌人，使敌人不能不用主力来对付我们的游击区，企图进攻以至消灭我们，使他们能够整个吞没江南。到那时候，他便可一意孤行，生杀予夺之权，完全操在他的手中了。因此，在江南抗战，不仅要从全国的战局来决定自己的任务，而且还要从整个江南持久抗战的观点，来担负起我们所当担负的光荣任务，来完成我们的光荣使命！

江南是全国最富庶丰饶的区域，日寇企图以江南的经济来担负他侵略中国的经费；江南是全国水陆交通的枢纽，而且又是最便捷的地方，日寇企图以此来作为进攻华中、华西以至整个中国的重要根据地；尤其是江南包括着世界著名的商业都市的上海。因此，江南的持久抗战是与全世界反日援华运动的开展和深入息息相关，江南抗战的光荣战绩，不仅要提高国际人士对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确信，而且要推动他们鼓舞他们来开展最广大的反日援华运动。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江南坚持抗战，开展最广大而深入游击战争。从游击战争进展到大规模的运动战，不仅将给予日寇前进以一个致命的打击，来更迅速的过渡到反攻阶段，而且将大大的提高全国抗战的信心，扩大国际援助中国的运动，使最后胜利的降临更迅速的出现。

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实现这个使命，特提出江南抗战的各个重要问题，作为解决江南抗战所遇到的各个问题的初步建议。

（一）日寇统治江南政策的分析

不明白日寇的政策，无从决定自己的方针，日寇盘据江南，首先表现着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的全部残暴，抢劫焚烧，奸淫敲诈，极尽野蛮无人道的能事超过中国历史上一切外寇侵入的表演，此其一。第二就是挑拨中国的内部团结。如国民党赤化，苏联赤化中国，共产党代替国民党，新四军是共匪，号召剿共，建立反共统一战线，蒋政权没落，蒋介石下野，国府地

方政权化。但有一个明显的分别，在六月新四军未到以前，日寇中心宣传口号是呼吁和平、反对游击区。如说×游击队要抗战，请到赣鄂前线，不要来后方捣乱。现在完全以防共反蒋为中心。于此我们知道，无论日寇如何巧妙鼓弄是非，掩盖不了他对于××××坚强领导抗战的畏惧，对于中华民族内部团结的畏惧，对于国共合作的畏惧，对于苏联协助中国抗战的畏惧，以及对新四军到江南后游击运动开展的畏惧。第三，日寇正在收买北洋军阀、封建余孽成立伪政权，各县自治会、维持会，完全改为县知事公署，积极的委出区董、乡董、镇董，建立绥靖团汉奸部队，建立伪保甲制度，积极的准备抽收田亩捐，夺取人民秋收的黄金果实。第四，日寇尽量用大批金钱收买游击队，动员大批青年妇女混到游击队附近，进行间谍腐化工作，用重价收买民枪，勒缴民枪。第五，贩买鸦片烟，廉价推销日货，扩大其市场，就地收集各种军用资材。第六，烧毁民国十三年以后的教科书，焚毁各游击区，屠杀整个农村市镇，这是日寇的"皇道"，新的焚书坑儒的工作。第七，强迫壮丁入伍，加入绥靖团，补助其兵力不足，施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毒计。以上诸点的中心，集中在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寻找汉奸的基础，和利用抗战中的弱点，来进行其欺骗的武断的宣传，奴化、火化、分化和血洗，便是日寇万恶毒狠的手段！

（二）日寇的弱点及其在江南战略战术上的演出

我们还须说明日寇对于江南的战略战术的表现，依我们三个月来局部的经验看来，日寇整个战略是集中全力西进武汉，在江南是采取防守形势，其进攻扫荡，限于对某一点游击队最活泼的地区，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包括十县以上的扫荡，更不能进行持久长期的扫荡。这正是日寇兵力不足，不可能战胜游击队的第一个弱点。日寇在城市及据点内，经常枕席难安，汉奸常受狙击，防线时受攻击，居民中广泛传说我军的大队来临，所以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当日寇下乡之际，完全如入暗室，断绝了一切便利，等于暗中摸索。这种挨打的形势，非日寇坚甲利兵武断宣传可以克服的，这是侵略者在侵略他民族时必然碰见的悲惨命运，这是日寇的第二个弱点。第三，就是日寇进行战争，是依靠牺牲日本广大劳苦群众的利益，而这一集团，早在饥饿死亡线上不断挣扎，日寇进一步驱遣其葬身异国。因此日寇是以包括两个日益矛盾对立的阶级，来镇压日益团结的一个伟大的民族，持久的长期抗战，必然增长日寇内部的离心作用，加强我们中国的向心作用。这种形势具体表现在日寇士气不旺，攻击力薄弱，敌军动摇程度的增加，这是日寇的第三弱点。我们不知道日寇是否慎重考虑了这些问题，但我们一看他在江南的战略战术上的表演，就可知道日寇是很焦急的。它（一）日益增加各地的守备；（二）据点之间增加新据点；（三）日寇厉行烧杀政策，事实证明无效，而且更激起大的游击战争，现已兼用欺骗的怀柔政策；（四）不轻易脱离据点和交通线；（五）铁道公路运输，完全采取集团运动，配置重兵掩护，而且全部严密伪装；（六）放弃了许多次要的公路和水运，任中国人去破坏和阻塞，仅仅保持交通干线；（七）少数部队，下乡扫荡的次数减少；（八）许多被破坏的桥梁，无力修复，过时用木板搭过。这些具体事实，是被包围的日寇面目的素描，也就是我们游击战的很大收获。根据此点，可以粉碎新四军不游不击的谣言，但是并不是说日寇一切的长处和优势，已完全降低到零，不是的，日寇还有他的长处。第一，他在战术上是惯于抓住游击队的弱点，比如游击队警戒不注意，小数日寇的每次袭击，均走小路；游击队的侦查，注意白天．日寇常常夜间运动部队，进行拂

晓猛袭；游击队常常注意晴天，日寇曾利用大雨天进行袭击；游击队常疏忽水道，日寇曾三次利用水道进攻。这些证明日寇仍然是一个不平常的敌人，而且这些能被日寇抓住的条件，均由于我们工作薄弱，及人民武装动员不够而来的。我们纠正这些弱点，便根本剥夺了日寇上面的机会。第二，便是日寇军官指挥部队、掌握部队远非我们指挥员所能企及。敌军一般战斗动作，如利用地形地物，射击准确性，前进后退的队形姿势，均一般具备着较高的战术性。第三，就是由于日寇长期的欺骗奴化教育，使敌军士兵养成一种攻击力薄弱，防御顽强，死不缴枪的顽固性。这又要从不疲倦的瓦解敌军宣传工作及正确的俘虏政策来决定。最后，日寇在战略上，虽屡次计划调遣几个师团，单独担任扫荡江南的计划，均不能实行，目前仅能从各守备队抽调，作临时编组，这使日寇感受对江南游击区，穷于应付的痛苦。其次，日寇想利用中国壮丁，以补救其弱点，但这些苦心经营的部队，不能如意听其驱使，一遇我军进攻，即不抵抗而转到我军方面（如最近本支队在镇江高资消灭绥靖团队）。不消说，上面各点，均尚在日益发展的形势中，一天一天要变得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日寇。

（三）江南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江南战略总任务，是在以游击战歼灭日寇部队，破坏日寇西进的大后方。为执行此任务，须估计下列条件：（一）日寇兵力守备薄弱，小城市仅一连到一营兵力，城市之间，据点守兵仅数十名（一分队）到百余（中队）。除镇江、南京、武进控制较大兵力外，余均薄弱，仅依靠临时抽调和增援，日寇在城市及据点的工事，并不坚固，仅因近来游击队活动，有增加守备并调伪军二万余增防的布置；（二）江南具有一个特殊条件，即南京失陷后，国军遗弃了不少武器，无须政府武装人民，重要的是加以组织和扶助；（三）江南人民普遍燃烧着消灭敌寇的热情，欢迎我军东来，这是抗战游击队最好的时候；（四）江南现有的游击队，名目繁多，系统纷纭，缺乏固定给养与政治工作及统一指挥。总括一句，游击队是一个需要领导的问题，这里存在着扩大成为新的兵团的基础，江南人民武装及游击队不加以组织和领导，以及组织和领导不得法，就有受日寇利用的危险，对游击队的吞并政策、限制政策、取消政策，以及乱委名义的放任政策，均只能造成损害抗战利益的恶果。我们在此可以提议下列可能而必要的部署：（一）需要一个国军主力（两万人上下），组织挺进兵团，配备相当的重武器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进到江南广大地区，进行大踏步前进后退的有力机动，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方式（新四军如加以补充武器及兵员，亦可以担负这个任务）。（二）划分几个游击分区，每分区可以包括四县到六县，依据铁道、湖泊、山脉、公路线来决定，第一游击区可配置三个团的丙种师，作为游击兵团（现在旅的编制，不甚适用，如为不致减弱主要战线上的兵团，此种游击兵团，可就现有游击队中集中编成之），如游击区一切事权，应集中在师的首长指挥之下，省可派地方民政人员协助之。（三）各游击区兵团，自己选择根据地，游击司令部及游击队自己选择基点（或数个基点），这些根据地和基地，应替挺进兵团收容伤病员，担任后方工作，以便利挺进兵团能无顾虑进行移动。（四）每一县设游击司令，统率全县游击队及人民武装，不宜限制其兵员数量，扶助其尽量发展，并应分期采取集中三分之一到挺进兵团与游击兵团，或建立新的兵团。（五）在江南行动的挺进兵团与游击兵团的供养，均可取给当地，弹药初期则须后方接济，而后尽量发展到取给于敌军，以上均可归在战略部署中。在战术战斗的特点上，我们所见如下：（一）在原则上，不能完全拒

绝攻占城市，必要时进行强袭，攻破城市及据点，必须付与必要的牺牲，这仍然是游击战斗的一种（特别挺进兵团大游击兵团应如此）。（二）战术以奇袭、伏袭、夜袭为主。（三）选定攻击点，敌顽抗时，最好用火攻给敌以全部火烧（新四军一个支队，数用这个办法，颇有效，敌痛恨我们新四军，称为最恶毒）。（四）敌分数路下乡扫荡时，可采取击破一路或数路的反扫荡计划，或侧击或横扫，或从四路敌人之间穿插，转到敌后方活动，或集中主力转到新地区，留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四面进攻，进行混战。进攻部队的战术，最好是伏击，不可一味向后引退，一是此种处置，反不易脱离敌人和跳出其包围；一是此种处置，会引起居民的失望，同时在与外敌进行战争的条件下，采取上面反扫荡的方式，是完全可能的，不宜过分估计汉奸在居民中的作用。（五）游击队最忌讳停滞和笨拙，必须神出鬼没，时东时西，夜间运动，拂晓作战，充分利用人民屋场、森林、堤岸、湖泊等，作为自己的依托。（六）阻塞基本上不妨害商业的运河。（七）破坏交通工作，应与战斗联系起来，不消灭和打击敌人的守备队，单纯破坏工作，就易于修复，也就减少破坏工作的作用。（八）发挥地雷爆破战术，动员广大人民去进行。（九）在战斗动作上，应提高白刃肉搏的战斗精神，部队中练习和讲究劈刺术，必须纠正把游击动作完全看成不付血的代价的观点，敌愈趋向于防备，愈趋向新集团运输，必然使游击战的战术和战斗动作，向更高阶段发展，自然对于强攻顽打的蠢笨办法，同样要立加纠正。

（四）巩固与扩大地方武装

地方武装，应规定三种形式：（一）游击队分基干队与普通队两种，基干队完全快枪，待遇略同于正规军，完全用在前线。（二）普通队及常备自卫队，担任保护政府、抗日团体及重要市场，担任地方秩序防匪等，并有计划的与游击队轮流替换整理。（三）人民抗敌自卫团后备队，完全不脱离生产，有事集中，无事归田，担任防奸、防匪、守哨、侦查、救护、运输、封锁消息等。（四）正规军使用地方武装，应估量其战斗力量，不宜以之担任主要方向。（五）地方武装必须从战斗中巩固扩大，反对招兵买马的扩充办法。（六）游击队应以打汉奸伪军为主要目的，逐渐学习打小日寇。（七）国民抗敌自卫队，作为游击队的羽翼，游击队作为挺进兵团及游击师旅的羽翼，一切服从主力和整个作战计划，反对地方主义。（八）纠正某些游击队的土匪倾向，指定其给养的正当来源，纠正其扰民现象，同时反对那些拥兵自卫、不听调动、不上前线的恶现象，顽固不改正的，应以武力解决之。（九）不应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来限制游击队的发展，更不应取消一切游击队，如每县限定一定数目，这只能适应于后方和太平环境，在江南是日寇包围环境地区，在日寇据点附近，无游击队掩护，抗日运动是不能开展的，游击队数目，尽量扩大，于抗战只有益处，没有害处，恰恰是在沦陷区扩大国军的一种优良方式；另一面，在沦陷区仅用武力和命令取消游击队是做不通的，且有为渊驱鱼，便利于日寇的危险，是不能不加考虑的；游击队的给养，常是一个大问题，但在游击队真能抗击日寇，保护地区的条件下，人民是甘愿以粮食金钱培植他们的。（十）在江南有不少人，志愿作游击队工作，即应予以发展机会，每县限定游击队数目，无异乎使抗战力量缩小和弃置于无用之地，是最可惜的。（十一）游击队是地方性的，总不会远引他去，一切给养，可采取发米发菜钱的办法，则大量游击队给养，也易于解决的。（十二）游击队给养来源，可定为（1）夺取敌方资材；（2）没收汉奸财产；（3）

追究被吞没的公款；（4）人民乐捐；（5）正当的税收，均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办法。

（五）土匪问题

初到江南的人，没有一个不感觉江南"闹匪"问题的严重，抢案日夕数起，"坑山芋"（即绑票）威胁着江南人民；某些地区，黑夜出土匪，成为当地人的一种副业；某些游击队，也有黑夜出发，干其"坑山芋"的勾当。我们研究土匪问题，要认识他具有深刻社会原因，不是仅仅用旧式道德，无良心坏种等咒语所能解决的，同时也不是武力搜剿的办法能够解决的，江南土匪如毛，是江南农村经济命脉，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总崩溃后的强有力的证据，特别因为国家政权撤退，日寇侵入而乘机窃发，而特别活跃，这个问题不适当解决，有充分受日寇利用的危险。目前问题（一）积极作抗战动员，吸收失业人民加入抗战军队，效命前线，得附带解决其生活，发挥其活动力；（二）严厉镇压养尊处优坐地分配的土匪头子，这些家伙出租抢只，包庇匪群，有计划捣乱后方，日寇一来，摇身一变即为汉奸；（三）失业人民，仅以生活而迫于抢劫，不应屠杀之，应加以宣传释放，比如在句容，有一次竟有抗战阵亡军人家属参加抢劫，这如何能作为匪案办呢？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四）建立农村合作互助事业，协助一切无饭吃的人，解决其生活问题，吸引广大农民加入抗战，这是巩固农村统一战线的主要办法；（五）所有农村，建立农民抗敌团体，这些抗日团体，即须在不违反抗战条件下，解决人民生活，军队政府及高级人民团体，应经常给以指导和各种协助。我们相信这样可以根本消灭土匪现象。我们希望江南士绅，要专力防洋匪（日寇），那才是应该用武力去解决的，才无妥协余地；对土匪现象，不是用武力可以解决的；解决抗战中的民主问题，才是防匪的万应良药！

（注，本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

东江纵队成立特电中央军委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钧鉴。

广九全线沦陷，国民党军尽退路东，东江情势要变，我队活动地区扩大，惟敌人扫荡尤凶，内战烽火仍烈。兹为更加有效打击敌人，保卫东江前线敌后人民，巩固抗日基地，充实反攻力量计，乃于十二月二日成立东江纵队司令部。郑重宣言，通电全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彻底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军民聆悉，一致欢呼，争先杀敌，捷报纷飞。特电驰告，尚祈鉴察，赐予密切领导，不胜翘企之至。

职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　曾　生　政委　林　平

副司令　王作尧　政治部主任　杨康华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东江纵队成立宣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

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已经踏入了胜利的决战阶段，这是苏联红军无休止的胜利攻势所造成的。红军在广阔战线上摧毁希特勒匪军，现全线已渡过德聂伯河，向国境线推进。英美盟军在意本土的战争亦着着胜利，并对德国进行空前大规模的猛烈轰炸。希特勒德国的溃败正呈土崩瓦解之势，把全世界法西斯侵略者的命运投入汪洋大海中。墨索里尼塌了台，意大利由投降而参战。法兰西的游击战争正猛烈发展。尤以莫斯科三国会议的成功，表现了同盟国家空前的团结，宣示了明确不变的战略。首先打希特勒。尽一切努力缩短战争时间。一切盟国内部的法西斯应声虫，虽用尽了一切挑拨离间的手段，阻止与破坏同盟国家的团结，但都徒劳无功。中立国的土耳其、瑞士与葡萄牙，均采取了不利于德寇的步骤。一切附带国家，都从广大人民阶层中爆发出对德寇占领者的巨大愤恨，从怠工罢工示威与暴动的斗争，一直发展到统治阶层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而希特勒德国，亦正陷入不安与动乱的状态，这局势的发展正日已迫近着希特勒的末日。苏联的冬季攻势将驱逐德寇出国境之外，并将推动西欧第二战场的开辟，苏联与英美会师柏林，打垮希特勒，那只是明年夏秋之间的事情。在

希特勒德国灭亡之后，中英美联合对日总反攻必跟着到来，将日寇法西斯消灭。

在这国际大变化的前夜，法西斯日寇已经感到死亡的悲剧，太平洋上损兵折将，节节溃败，美澳联军的猛烈反攻，则正方兴未艾，失败主义的恐怖情绪蔓延全军，遍及全国，敌酋东条虽在计划动员一切力量，准备与英美决战，但事实将证明这只是绝望的努力。

国际形势对抗战空前有利，我国当局本应及早抓住时机，加强全国团结，积极作战，改良政治，增加生产，准备反攻力量。但政府当局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坐拥三百万军队不对日积极作战，反而撤退河防部队，包围陕甘宁边区。破坏团结，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一党专政"，对一切异己力量实行诛伐，对一切纯洁青年横加迫害，政治黑暗，金融紊乱，贪污枉法，民不聊生。对日寇三次公开诱降不加驳斥，对六十个投敌叛国将领不加讨伐，对汉奸吴开先则礼以上宾，对友邦诤言反而顽强辩论。此种做法，对国家民族的危害，诚属空前严重。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由于全国人民各爱国党派及国民党的爱国之士与同盟国家一致反对，内战投降的阴谋乃遭受严重的打击。这结果宣示了日寇政治诱降的失败，更宣示着日寇未能在与英美决战前解决"中国事件"，就是日寇的死亡。

我国政府当局最近虽然对日寇第四次诱降作了一次驳斥，并签订了中苏英美四强宣言，表示要继续抗战，国民党十一中全会虽然通过了"共产党问题应用政治方式解决"和"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实施宪政"的决定，这是好的。但观其实际做法，并没有大的改变。国共两党的关系仍然未有改善，包围边区的内战大军仍然未有撤退，法西斯第五纵队依然逍遥法外，吴开先依然可以自由活动，投敌叛将依然未下令讨伐，这说明着内战投降的危险依然严重存在。因此，日寇对于解决"中国事件"，仍图谋作最后努力，这就是停顿了一年多的正面战场，今天又重新活跃起来的原因。日寇妄图利用这一军事新的压力，威胁与动摇我抗战机构，进一步迫我政府当局投降，以图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对英美决战。但事实将教训东条，依然走不通。因为全世界的胜利前途，已经属于同盟国家，属于反法西斯的人民，属于共产党及一切反法西斯的党派，不是属于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侵略者。同样中国抗战的胜利前途，也不是属于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特务机关，而是属于中国人民，属于坚持团结抗战的爱国党派。中国共产党便是坚持团结抗战的中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六年来坚持敌后抗战，领导着敌后前线的抗日军民，收复国土，实行民主政治，建设起牢不可破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为国内外公认为对敌反攻的基地和主力。中国共产党有八十多万党员，有五十多万军队，有各抗日根据地一万万以上的基本群众及全国同胞的拥护，有英明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有反法西斯友邦的同情，有全世界和正义人士的支援，还有各爱国党派及忠诚于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国民党人继续合作。不论国内变化如何，全国共产党都有力量有办法，排除万难，领导全国人民，获得最后解放，一切反共投降的阴谋是必然要被粉碎的。尽管日寇在我正面战场，今天能暂时获得多少成就，但这都不能挽救日寇的死亡。

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是东江子弟兵，我们当中有各个爱国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与更多的爱国同胞，我们不分党派阶级与思想信仰，一致团结在抗日建国的共同目标之下。我们从成立到今天，都得着开明爱国人士的热烈援助，五年以来，我们在惠东宝一带，打击敌伪，收复失地，摧毁许多伪组织，恢复原有乡政权，维持地方治安，提倡教育，发展生产，实施救济，过去亦曾屡次获得战区当局传令嘉奖。太平洋战幕掀开，我队立即开入港九，积极扰乱日寇，营救政府要员及要人眷属，营救集中营内国际友人，营救文化人及知名

人士，掩护商旅，救济侨胞，这种精神，这一义举，为国内广大同胞及友邦人士所爱戴。然而，政府当局对我坚决抗日的东江子弟兵，不但毫无奖励反而诬为“叛军”、“奸党”、“奸匪”，调动大军实行围歼。今年以来，残酷凶狠的进攻未稍间断，但我们仍本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精神，尽量避免同室操戈的残祸，委屈求全到了极点。并再三再四的请求政府当局，停止内战，恢复我队名义，以利团结抗战。然而，一切呼吁都没有效果，内战愈打愈凶，烧屋杀人，奸淫掠夺，遭敌伪惯用的清乡“自新”、“三光政策”都采用无遗。这种祸国殃民的暴行，只造成日寇顺利进占广九路的条件，由于内战钳制与对消了抗战力量，使日寇两天之内占领广九全线。最惨痛的教训仍不能使顽固派有所悔悟，内战军又包围攻坪山，大举清乡。内战军见敌一枪不发，远见远避，打内战则穷凶极恶，毫不放松。这说明了顽固派，仍未放弃反共、反人民、反抗战、反民主的法西斯“一党专政”。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把内战黑暗的局面，转为真正团结抗战的局面，才能对敌反攻，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从五年来艰苦的抗战自卫斗争中，使我们全体同志一致认清，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救星。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历次制止了内战危机与投降危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畏缩后退，总是有办法克服困难，向前迈进。我们东江子弟兵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就是由于有共产党正确的政治主张作指导，以及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与各界的援助。因此，我们全体同志一致热诚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内战投降，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一贯政策，更一致热烈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认为，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能够获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全体同志的无上光荣，是东江同胞的无上光荣，是广东同胞的无上光荣。我们认为，在日寇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的阴谋诡计下，今后敌后的斗争必然更加残酷，我们应该增强力量来保卫家乡。因此，我们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深信，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也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争取最后胜利。我们的斗争并不孤立，我们不但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更与爱国党派及全国人民的斗争行动相关，而且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成一线。我们一定能够粉碎顽固派的进攻，最后将敌人赶出领土之外。事实证明，一切革命的新生力量一定向上发展，一切内战与反动的力量一定走向投敌与毁灭之途。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过去只有两个大队，且活动范围局处一隅。但经过三几年来抗日与自卫斗争的锻炼，我们扩大了我们的队伍，在惠东宝的前线与敌后骋驰纵横，且深入港九，活动于敌人的心脏地带，我们的人枪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十数倍。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我们今天实行联合组织，统一指挥，发挥抗日的更大效力，克服困难，恢复国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达到最后胜利。

同胞们！同志们！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彻底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到底。我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坚决与各界同胞，不分党派阶级，不分思想信仰，团结一起。我们愿意与各爱国党派及一切忠诚于革命的三民主义国民党人及国民党军队继续合作，如果政府当局能立即命令内战军队归还抗日岗位，并给我们与一切抗日部队一样平等待遇，则我们仍愿在余蒋两长官统一指挥下，完成作战任务。如果顽固派仍继续进攻，则我们必坚决自卫，而彻底粉碎之。我们坚持抗战，坚决反对投降，我们坚持团结，坚决反对内战，我们坚

持进步，坚决反对法西斯“一党专政”，坚决反对官僚资本的垄断剥削。我们主张各界同胞在团结抗日的目标下，来互相帮助，互相忍让，以解决一切纷争，改善人民生活，以增强各阶层的合作。我们保护一切爱国同胞的人权、财权。我们欢迎伪军反正，欢迎绿林豪杰参加抗日。过去由于我队内个别人员的幼稚，曾在某些政策犯过错误，我们已经分别予以处分及坚决纠正。我们希望各界同胞对我们多多批评与指教，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团结抗战有利，无不虚心采纳。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也就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队伍，我们除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并没有其他利益。

我们又掬诚向国际人士宣告，我们坚决拥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以无限忠诚与各盟邦及国际友人密切合作，过去在港九方面我们曾经这样做，今后仍将这样做。我们希望能与国际友人互相尊重、密切合作、共同完成打倒日寇的任务。

同胞们！同志们！今天敌人已经占领了广九路，追近惠博，并对我敌后游击区开始疯狂扫荡，而惠淡指挥部的军队，却依然在惠宝前线进行反抗战斗的行动。在这新的重大场面之下，我东江前线敌后的抗日军民，必须千百倍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决自卫，保卫东江前线敌后抗日基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最后我们高呼：

1、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2、坚持团结，反对内战！

3、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4、请政府马上撤退一切内战军队，开上前线抗日！

5、惩办东江内战祸首叶敏予、徐东来！

6、公审汉奸吴开先，讨伐叛国将领！

7、取消法西斯“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

8、肃清法西斯第五纵队，解散一切法西斯特务组织！

9、拥护中国共产党！

10、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1、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12、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司令员　曾生

副司令员　王作尧

政治委员　林平

政治部主任　杨康华

关于国共关系的估计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胡服同志：

已有电午养收到，兹复于下：

（一）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邱吉尔七七致蒋贺电称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但国共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英、美、苏均不会公开出面调解，只会暗中劝告及在公开舆论上表示希望中国团结。这些将来还会有的，我亦正在争取。

（二）我们现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待国民党好转更确定时，我再要求他通令山东华中部队，停止向我磨擦，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三）国共关系，国民党内部过去有一部分人倾向武力解决，但始终未下决心，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最近恩来见蒋谈的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为章和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

（四）我党七七宣言及整顿三风运动，在各方有很大好感。

（五）七月六日复你一电收到否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先念同志：

目前是极力争取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你们在这次行动以后，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并设法与周围国军取得和解为要。

毛 泽 东

十五日

对顽军以斗争求团结*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陈少敏同志：

酉元电悉，除对国民党中央目前不要批评外，对顽军破坏团结，进攻边区，仍应号召民众予以抵抗，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书 记 处

酉 有

---

* 这份电报的原抄件上注有“毛稿”（即毛泽东拟稿）二字。

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待我党的决议案，略谓："总裁盱衡时局，对内对外作政策上的指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宣言，服从政府法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恭聆之余，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晚集会，详细研究，一致认为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敬谨接受，并于宣言中将此种意义明白宣示。但为防止下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此文告内说明：在我国境之内，无论其为何人及何种名义，凡有擅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务望均能彻底觉悟，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精诚奉行三民主义。果能如此，则不问其过去之思想与行动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或为个人，政府当一视同仁，不但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等语。同时，十中全会发表宣言，其中关于对待我党者有云："对外必须互相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又云："三民主义非但国民党所信仰，实为全民必循之途径，顺此者昌，逆此者败。时至今日，不应再有所谓政见之异，亦不容再有互相猜疑，互相排拒，互相牵制妨碍之现象。吾人愿提示全国，凡能诚意信仰三民主义，不危害抗战之进行，不违背国家之法令，无扰乱社会秩序之企图与武装割据之事实者，我政府与社会应不问其过去思想之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为个人，一体尊重其贡献能力效忠国家之机会。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凡此尤愿特为标举，以冀引起全国有识人士之共鸣者。"等语。

国民党从一九三九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中间经过一九四〇年一月及其前后一段时间的第一次反共大磨擦（苏德条约订立及苏芬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一月解散新四军事件的第二次反共大磨擦（德意日三国同盟订立及日苏中立条约订立之后），这两次磨擦均有国际的与国内的因素为背景。自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及跟着苏英美订立同盟以后，国共关系即有某些改变，停止了大的冲突。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滇缅路被切断及英苏订立二十年同盟条约之后，更有好转。最近苏联在斯城的伟大胜利及英美在北非与在太平洋的胜利，增强了国民党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国共关系好转，亦有促进的影响。在国内，一九三七年以来，我党我军的极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但至今年，我党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损失及根据地的缩小，减轻了国民党的恐惧心理。他们估计，我党我军在今后抗日期间，还会有大的损失（这种估计是适当的）。同时，在日寇侵苏危险减少以后（过去国民党长期地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日寇必然要加重对中国的压迫，国民党需要利用我党的抗日力

量（日寇在华三十一个师，我党担负了十五个师）。再则，自从远东慕尼黑危险消失之后，我党停止了反对投降危险的宣传。而从去年四月直到现在，我党对国民党批评甚少，坚持地求得和他们改善关系。虽则国民党在这一期间内，仍然对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压迫（在大后方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出版大批反共刊物，在湖北、安徽攻击新四军，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大的特务破坏活动与经济封锁），我们亦忍耐下去，力求不刺激国民党。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取得了国民党广大人士的同情。再则，国民党自己有很多极端严重的困难存在着。其中，特别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及农民的骚动，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并企图经过缓和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去缓和他们和农民的关系，这里特别有严重意义的是河南六百万灾民的自发斗争，某些部分已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最后，一九四〇年与一九四一年两次反共大磨擦，国民党企图利用武力压迫把我们屈服，但遇着了我们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斗争，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企图动员舆论赞助他们的反共，但多数舆论的同情却站在我们方面。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促成国民党不得不对国共关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十中全会的这一处置，是我们和他们长期接洽及他们经过许多的动摇犹豫之后才决定的。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在某一点上和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所谓“根绝赤祸”的那个决议案有些类似，他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各地对于十中全会的决议，应本解放日报发表之态度进行解释。根据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所列四条（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革命，苏维埃改为民主政府，以期政权统一，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统辖），与国民党十中全会向我党要求的各点相比较，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分歧之处，我们不但过去遵守自己的诺言，而且在将来也准备遵守这一诺言。关于组织军队一点，过去是为了抗日的需要而组织游击队，并且是遵照二十六年蒋介石“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卫国之责任”这一宣言的。至于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关于国民党允许给我们以公民应得的权利及自由，我们应表示欢迎，要求实现。在十中全会后，国民党会放弃军事压迫而加强政治斗争，磨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一步的好转。

周恩来林彪向张治中所提国共问题之四条件

（一九四三年一月）

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

一、自得中央指示后，我同林彪同志于上月廿四日找张治中谈，告他四点：

1、共党合法化，国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

2、扩编为四军十二个师。

3、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

4、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如反攻）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

我们同时声明如认为这些条件可谈，即请委员长指示林师长留此继续谈如认为相差太远，则请委员长指示他的具体方针交林师长带回延安商量。并声明目前只能如此做，并非要价还价。张治中逐条记下，答应报蒋，后我们问张本人意见，他表示第四条最困难，同时说为什么军队不可实行中央化，我们当加以解释。

二、三十一日早张治中电话告我：他们已开小组会议。认为条件距离太远所提四条，好象哀的美敦书，并说未做决定，也未告蒋（其实一定先报蒋，蒋未发表意见，要他们先讨论的。据调查三十日晚蒋先确开了干部会议后，要张治中开小组会，闻他现正在草拟一种对付我们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的战略计划，估计要求必很高）。

三、我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根据中央发言人谈话及指示，将国共问题在办事处党员大会中作了一个报告（提纲将以朱电告）估计国共问题目前还在两可之间，即相机解决或拖。此估计已证明是对的。

四、现在我们准备，待张治中提出条件，如能接近即继续谈判，如无法谈判，林师长携条件回延。

恩　来

国民党在十中全会上对我党的对策

（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

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国民党十中全会对中共问题有详细报告，首先提出对中共从清党到现在的方略及精神与原理，始终一致计将其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清党到抗战内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镇压暴动军事政治并重，以武力清除武力，以组织破坏组织，奠定了国民党政权的巩固基础；第二阶段是围剿阶段，提出了攻外必先安内，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一面围剿红军，一面清剿苏区外围的中共组织，采取惨杀与争取并重，分化与打击并重的策略，执行自首政策扩大转变潮流。

第二时期是从抗战到现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抗战到武汉失守为中共的中（？）攻守乡村反共的抗战，是对国民党之暗示国党对策，主要是加强情报组织，阻止中共分化阴谋。第二阶段是从武汉失陷到苏德战争，中共召开六中全会，企图争取共同平分政权至皖南事件，经我当机立断始扑灭，中共嚣张气焰，并决定以瓦解中共组织为中心工作。廿八年国民党在各地设立会报，廿九年又改用党政军联合会报，由何应钦主持，第三阶段自苏德战争到现在新四军互相孤立，使中共在军事上失去信心，苏德战争中共在政治上失去信心，以整风运动乃挽救颓势之局。中共内部发生离心倾向，造成广大自首潮流。目前中共的策略是积蓄力量渡过难关，准备反攻，国民党取一致态度不被挑拨分化加强防制严惩国家纪律等语。

二、蒋介石在政治检讨总结中，指示现在一般盟国以民主政治为基础，过去苏对我不满，英美批评我国不民主，即在中共问题上发生疑虑，今后适应国际环境及抗战局势，对中共应采宽大政策。吴稚晖发言表示不同意，认为共党问题唯一态度待生死解决。孔祥熙继发言，认为抗日民主国的为多党政活动我们也不能限制，其党存在不必另待，此次解决只有总裁对国际国内局势了解最深刻，应采总裁意见，其他无发言者。据谈十中全会对中共问题三种表示：第一种认为无法解决；第二种认为不能解决，最好拖下去；第三种认为应当解决，但解决方案尚有多种，最好决定对中共政策成立特种委员会，研究公布明确表示，于是十一月廿七日遂公布了特委会的决定。

三、十中全会后，十二月十六日蒋二次召见林彪同志，表示中共是爱国的，是国家人材，国家是爱惜人材的，不会偏私，中央要求统一团结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国共问题应求整个解决，越快越好，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希望中共在军令政令下共作，最后立应发给药品。此外，林彪同志曾在渝访晤国党重要人，何应钦及陈诚、张治中、刘为谒、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邵力子等，除向贺等顽分外，大多数表示国际团结的趋势下，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接近，国共关系会好。李宗仁表示应该改善关系，重庆须指定专人从中调解，并派大员赴延安接洽，谈得相近扬言毛泽东反共口号出面求得两党团结，每人皆应有绝对自由和创造精神，共同享受此种政权。孙科在中苏协会上强调团结重要及国共团结是全国团结的基础。冯玉祥表示国共应互相通学，不可单要求一方。陈

诚表示对林彪关于中国抗战条件及前途的分析甚感兴趣。

四、从十中全会及蒋的表示看出，国党的政策是放弃军事压迫，加强政治与特务进攻。十二月五日国党中央训令各地党员加倍努力，养成组织意识，培养斗争精神，增进工作效率，以求组织健全，才能与中共以组织对组织，以工作对工作。十二月十九日社会统计局致各地指示称：藉此时机加强情报工作，并揭穿共产党诡计，具体任务是：

（一）收集共产党新罪行公布社会，发动各地报社记者文化记者参议员对共党群众政治攻势。

（二）加强内地工作，了解共党阴谋随时揭发及制定评判政策。

（三）增进情报工作，争取动摇分子。国党在此政策下特务活动必更加紧对此应特别警惕，我各地同志应本十一月廿五日关于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一方加强统战工作，争取时局好转，另方面必须提高严密组织防止国党特务活动，并清洗党内暗藏的破坏分子，巩固自己阵地。

中情部

一月六日

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对四条件进一步谈判

（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毛主席并书记处：

1、于九日周林见张文白，张云：其干部会的意见，认为我们所提四项与中央希望相距较远，何白皓电相距也远。干部会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根据皓电提示精神。张并云，干部会议意见甚多，如说军队应交出，提整个方案等等。如此则目前不能做到，其最后决定仍以提示为根据，而并未提高要求，这说明中央是要解决问题的。我们问：委员长对此意见如何？张则吞吐谓此意见报告委员长，总之，此等事非经过委员长不可。张并谈如正式谈判，仍须何白出面主持。

2、我们问张个人意见。张谓：他认为党与政府两项无甚问题。军队目前正在裁减（由六百万到四百万），十八集团军如太多，说不下去，驻地必须限期开动，否则距离太远。我们告以所提四项与皓电精神并无不合者，谓距离亦仅军队数目与移动时间。张又云：据郑延卓报告：毛先生曾说：对于开黄河以北可以签字，开动期间并非战后，而是现在。我们答以：如郑说确实，当电询问，我们所得指示和所知实情，目前无法开动。张乃云彼并非负责谈判者。

3、据我们所知，在四项办法提出后，国方干部确曾开会讨论，暂向我提整个方案。现忽改为依皓电谈判，仍由何白主持，情势已见让步，必为蒋所指定无疑。其原因似有种种，近来美国对华表示不满，国内又困难重重，实为推动解决问题之主因。解决关键在军队与驻地，驻地之移动为关键中之关键。

4、我们意见，谈判解决问题可承认皓电为谈判基础，指出四项办法和数目与时间的距

离，并无根本不合处，并赞成何白主持，以免他们两人招失（？）因为皓电和何白主持是他们需要的面子，中央同意，我们即向张文白表示，而开始具体谈判。关于具体问题，我们重考虑，关于驻地移动，可让步到以李先念部与他们山东部队对调，以便统一山东。如他们坚持距离较远办法，则林师长可回延安报告，行前再请见蒋一次，以便再来。

5、如何请示。

恩　来、林　彪

七　日

国民党对我之办法有三

（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

毛主席：

1、上月马电已将谈判情形报告，因未得复故尚未找张治中谈。我们拟向张治中表示，我们所提解决办法与皓电基本精神一致，时间，目前做不到而且只有时间数目之差，以便缓和空气，并向蒋请示具体方案，好叫林师长再见蒋一次，并请领一些药品及一百家属护照，开车回延。中央是否同意或另有其他办法，请即电示。

2、确息国民党特别会报决定，今年内工作计划，即：肃清我黄河以南部队，肃清大后方隐藏分子，加强自首运动。证明他们对自首运动决不会放松的。

3、花旗银行赫鲁谈：西安情形已甚严重，他们对封锁边区，不仅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即西安之官僚商人好以此赚钱，如边区运六元钱一斤的盐，到西安可卖二十多元，西安二十多元的布，到延安可卖八十元，他并要我转告朱总勿过分信任国党，要谨慎些。

4、因邱罗会谈，未邀请蒋，且通知很缓，也未提东方具体问题，故蒋很不高兴，到处发气，大公报因批评救济豫灾不力及限价失败事被停刊三天。

恩　来

五日

国民党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案

（一九四三年六月）

毛主席并书记处：

戴笠提议交由国特拟对中共方案，全文如下：

第三国际解散后，本党对中共应有之对策（提要）：

1、第三国际解散后，中共为应付不利形势，该党中央已表示坚决态度，但估计内部有作相当让步之可能。

2、估计中共之动向：有表示接受三民主义、加入本党以及取消十八集团军部队中政委制度之可能。

3、本党应利用时机与该党进行政治谈判，达到使其逐步交出军权政权之目的。

4、估计中共可能履行之条件，拟具四个方案，为政治解决之具体途径。

5、本党对策可分政治、军事、党务、宣传、特务五方面，针对谈判情形以为适当配合之应付。

6、目前应立即布置之工作，选派大员赴延安谈判，并分化毛泽东与留俄派陈绍禹，以及建立延安中央分社之工作，使消息更灵通，配合谈判与分化共党内部之办法（本文）：‘本年五月二十一日，莫斯科正式公布解散第三国际后，各国共党之政治地位及组织策略均将发生重大分化，中共为世界革命之派系，现已逐渐失去国际势力支援，其政治号召力必将失去或减低，中共分子之动摇心理亦必随之而剧烈。本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之彻底解决。’

7、估计中共目前可能采取之策略为此拟具本党应有之对策如下：

（1）中共可能采取策略及动向估计则：

（甲）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不利形势，为稳定其党的组织与挽救政治地位，必须以坚决之表示，说明第三国际解散不影响中共之存在与活动，该党中央所发表之文告，亦已声明此点。如本党利用其弱点向其施以政治恩惠立即进行谈判，该党可能根据去年七七宣言所提出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之原则，再作相当让步，借以取得该党公开合法存在。

（乙）中共能让步之估计：中共目前态度虽似甚坚决，实则无出路，故估计可能作相当让步，其可能之限度如次：

（A）在公报上表示完全同意接受三民主义之原则，强调反法西斯主义及统一战线。

（B）要求准许共党人参加本党及加入政府工作其参加者均限于个人资格，而以不作党团及小组织活动为保证（中共扩大六中全会曾有类此之决定）以取消中共在十八集团军部队中政委制度为条件，要求发给饷，保障其公开存在之权利。

（2）本党对中共应有之对策：

（甲）原则：

（A）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

（B）利用第三国际解散时机，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

（乙）进行步骤：

（A）发动社会舆论，加强宣传攻势。

（B）一面开始谈判，一面进行分化。

（C）在谋政治解决期间，本党在政治、军事、党务、宣传、特务方面，应配合进行。

（丙）方案：估计此项政治谈判方案，非可一蹴而成，徒悬理想则又势难打开僵局，不如把握时机，求得逐步解决，果能达到共党若干可能之让步，仅是开始，非本党最后要求。第一方案，中共党所履行之案件，为本党所最期望实现者，第二、三、四方案，则系估计施行之结果，加以损益并附本党应如何对付之方针，例如：第一方案，假定中共履行之条件：

军事：十八集团军完全国军化，遵照中央编制，下级干部由中央调训，改派人员接充，而其他部队一律听中央编遣。

政治：取消边区政府，听候中央处置。

党务：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

本党对付之方针：

军事：A、保留该部队师旅长以上人员，仍任原职。B、该军中下级干部调训后，仍畀以同等工作。

政治：对中共行政干部，按其行政地位，另畀以相当工作。

党务：准许中共党员，申诉加入本党或加入三青团。

第二方案假定中共履行之条件：

军事：A、十八集团军调驻于黄河以北指定地区。B、取消该军原有政委制度。C、解散该军内之共党组织。D、其他部队一律由中央编遣。

政治：取消各边区政府、组织，听候中央处置。

党务：A、中共修改党章党纲，改组为纯政党性之团体。B、绝对接受三民主义服从领袖指导。

本党对付之方针：

军事：A、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党工人员，至该军工作。B、调训该军中下级干部派员接充其工作，毕调后仍畀以同等工作。

政治：对中共行政干部，按其能力地位另畀以相当工作。

党务：准许中共为合法政党，但在本党任何机关中不得有秘密组织及党团活动。

第三方案，假定中共履行之条件：

军事：A、取消十八集团军中之政委制度。B、解散该军内之共党组织。

政治：改组边区政府，恢复原有行政区，划分行政系统。

党务：保存中共现有组织之存在，但在本党任何机关中不进行秘密组织与党团活动。

本党对付之方针：

军事：A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B、对其在指定区域以外之部队，相机予以解决。

政治：保留各边区政府中大部人员，仍任同等原职，但中央须派人参加。

党务：A、在后方不许设立党部，肃清其潜伏活动。B、分化该党内部，对其派遣来中

央之分子，畀以重要工作，促其解体。

第四方案，假定中共履行之条件：

军事：取消十八集团军之政委制度。

政治：改组陕甘宁边区为陕西省两个行政区，并放弃其在甘宁两省之侵占地区。

党务：保存中共组织之存在，但在本党之任何机关中不得进行秘密组织与党团活动。

本党对付之方针：

军事：A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党工人员至该军工作。B、进行分化瓦解该军工作。C、对其在指定区域以外之部队相机予以解决。

政治：派遣政府经济等工作人员至该边区工作。

党务：A不正式承认该党合法之存在。B、进行分化工作，争取觉悟分子，必要时，另组新党达到以共制共的目的。

（丁）对策之实施：

（A）政治方面：

A、示以宽宏态度，对该党重要干部，畀以相当重要地位，使该党分子对本党发生向心作用，达到分化目的。

B、以民主政治及国际潮流相号召，取得国际同情，动摇该党内部。

C、进行政治解决，应争取主动地正确确定谈判步骤。估计欲达到本党理想中之第一方案，必须经过若干，中间步骤，实行损益，然后步步相逼，促其就范。

（B）军事方面：

A、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

B、准备与挑选对共党斗争有经验之人员，至十八集团军充任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党工人员。并进行兵运，从内部去进行瓦解中共部队。

（C）党务方面：

A、以组织对付组织为原则，立即实行派遣至各边区担任党务工作干部人员。

B、运用参政员及其他有政治地位人员，前往各该边区宣扬中央德意，对该共党中下级干部进行争取工作与说服工作等。

C、多方设法争取他们党员及其干部，必要时以号召解散中共或另组新党之方式进行以共制共之工作。

（D）宣传方面：

A、强调第三国际解散为英明之举，足以促进同盟国进一步之团结。

B、强调第三国际解散中共再无独立组织之必要。

C、强调第三国际解散，证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理论最适合世界潮流。

D、强调中共应根据第三国际决议之精神，集中力量从事抗战不应再有违背国家、民族利益之行为。

E、在各边区政府区域内，立即建立宣传机构，发行本党报刊。

（E）特务方面：

A、加强防奸小组，肃清中共在后方之秘密组织与潜伏活动。

B、训练并号召富于对共党斗争有经验之干部有计划的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C、争取共党中之觉悟分子与动摇分子，准备于必要时运用蜕化方式号召再组织共党或

另组新党，达到以共制共之目的。

D、加强争取转变运动，严密组织与发动自首自新分子，使成为在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之一大力量。

（F）目前工作亟需布置事项：

A、派员赴延安谈判，并叫中共负责人毛泽东来渝。

B、派员与留俄派陈绍禹、秦邦宪接洽，提高陈秦政治地位，借以达到孤立毛泽东派，鼓励留俄派分化之目的。

C、派赴延安组织中央通讯社分社，使消息更加灵通，以适应政治解决工作之需要。

国民党的五大困难和我党今后方策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德怀同志：

一、有电悉。同意对太南处理办法。

二、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CC与复兴）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扶汪倒蒋，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励行特务政策，图以内部破坏我党此外毫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其他办法。党内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需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

三、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如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

（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

（二）是审查干部（清洗内奸包括在内）。

（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

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毛　泽　东

六月一日

蒋胡内战阴谋破产应克服困难保持国共一年和平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

德怀同志：

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不但七日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根据朱致蒋胡电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更因延安紧急动员，使蒋害怕不得不改变计划，十日令胡停止行动十一日蒋胡均复电致朱无进攻意，十二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第一军及九十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重庆外国人是与蒋胡同时（五日）得到朱总电故能于“七七”纪念日引起质问及各大使干涉，太南打击刘进尚非其时，望用一切方法克服困难，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

毛　泽　东

元　　亥

对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

山东分局并告北局：

午支电悉。（一）同意你们对付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但一切磨擦仗均须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断其借口及诬蔑。

中央书记处

午　　删

中央目前宣传方针——揭露蒋之本质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必武：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并稍示和缓（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目前检查渝办）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为此目的，望注意执行下列数事：

一、收到此文广播后，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

二、在渝办报馆中，以此文作为课本，进行解释讨论。

三、搜集此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顾此文的文章摘要电告，并全部寄来。

四、新华尤其群众可用其他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蒂的罪恶（思想、制度、特点和行为）。

五、其他技术问题由恩来电告。

毛泽东

马

南方局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提纲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国民党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

1、日寇入滇，浙赣战起，直接促成了国内形势的转机，而停止进攻边区是一个主要的关键（时间在五六月）。

2、蒋委员长两次见周及林师长来渝，造成了两党关系的缓和及谈判之门重开（时间在七至十一月）。

3、郑延卓赴延放赈，其意义在恢复两方关系，示中央德意试探我党真意（时间在十一月）。

4、蒋委员长在十中全会关于中共问题的报告其基本意思，是趋于政治解决的。

5、特种研究委员会的讨论，表现了国民党中有三种意见的存在。第一种认为中共问题无法解决，只有打才能了之。第二种认为现在还不是解决的时机，只有拖，只造成有可能于解决的时机。第三种：认为现在是解决的时机而且应该解决，但解决的方案又有多种：只有谈，只能互相了解，得到两党解决方案。这三种意见只是三种主要的倾向，还不能包括尽国党全方面的意见。有些人还摇摆于第一、二意见之间，可以半拖半打，上面宽下面紧，上面好下面坏，有些人只动摇于第二、三种意见之间，认为一面拖，一面谈，并不矛盾，可以徐图解决或能相机解决，不过完全主张打的人已渐渐少了。

6、十中全会的宣言的精神是好的，是值得称赞的，但尚有尾巴（叫抗战中的怠工，民兵中的党治，联共中的反共等），尚有缺点——一般政策的缺点（如统治人民管制经济等）。

7、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是趋向于政治解决的，但条件尚多，局部压迫并未取消，在国民党中仍能作可好可坏的各种解释。

8、然而可总结一句：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已不是内战危机的扩大，而是由军事解决转向政治解决的开始，也就是好转的开始，这虽然是数的变化，但如发展下去，将要起质的变化。

二、我党的表示：

1、我党中央发言人的表示（见新华日报十二月九日二版）有强调好的同时并重申我党立场，以推动其好转。

2、我党中央的指示要点：

（1）历史的估计——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两次反共磨擦均有国内国外的因素。

（2）从去年停止大的冲突到今年的好转，其中经过显然的国内国外因素的推动和影响。

（3）国民党十中全会决议给四个年头的国共关系作了一个总结，这总结指出了国共继续合作及具体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的解决（我党中央指示文）。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在某一意义上与国民党

三中全会宣言决议的精神是相同的，即表面好象很凶，实际上是好转。

（4）我党的态度：在于根据党中央发言人的表示进行解释，说明我党立场及将来仍准备遵守的诺言，关于军队我们可以不扩充，关于作战地区，战后当然要有所调整，关于边区我们早就要求合法化，关于对共产党员，我们要求实现国民党十中全会的宣言，予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但必须估计国民党以政治解决代替军事解决，其政治进攻和压迫；还会有的，虽然某些方式会有所改变，我们一方面应防止这种压迫，另一方面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自大，有损无益的态度，以争取更多的好转。（我党中央指示文）

三、国民党的干部会　国民党对待共党三个阶段的变化：

1、第一阶段：（一九三六到一九三八年，西安事变到武汉撤退；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是重在组织上解决，即图融化共产党时期。

2、第二阶段：（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二年，迁都重庆到经营西北；五中全会到十中全会）是重在军事上解决，企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时期。

3、第三阶段：（一九四二年——从经营西北，十中全会开始）是重在政治上解决，即图控制共产党的时期的开始。

三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都有其各个时期的国内外因素为之推动的，各种条件是相互影响的，但每一个范围内都有其主要的内在因素存在，在第二阶段中，经过两次反共高潮，而第三次反共高潮未得最后形式，这也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因之，也促成了第三阶段的开始。

四、目前国内的形势和国际情况：

1、希特勒德国先败，日本后败的形势是定了的，因之国民党对世界战胜利的信心是增加了的。而今年击败希特勒，明年击败日本的口号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原因在未能开辟欧陆第二战场。

2、德胜或苏德两败俱伤而美独胜是不合理的想法，已经幻灭了。世界民主的前途是定了的，因之某些对法西斯的崇拜者多少给予了一些精神上的打击，因之国民党对世界民主的前途也不得不认识和承认。

3、日寇的战略是保存主力，待机发动，因为要保存主力，所以他不去攻苏，攻印澳，而加紧南洋的掠夺和开发，加紧在华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加紧南洋的交通战和某时期对某一方面的和平攻势。因为日寇待机而动，所以只能够付少收多，仍会有军事上的进攻，而主要的方面会在中国，在中国他可不增加新的力量，便能击溃中国一方，因之这就使国民党对日寇局部进攻的可能性及其严重性也可以有新的认识。

4、由于国民党对美的依赖性，不能不使他对于美国朝野的舆论，有着极大的顾虑，美国要员访华后的观感，威尔基的备忘录，美国对于援华军火与兵力的控制，美国对于苏联的友好态度，英美对华某些特权的取消，英美民间的舆论都不能不使国民党在目前放弃其进行内战的企图。

5、苏联的伟大胜利，日寇攻苏危险的减弱，英苏同盟、美苏协定，邱吉尔、威尔基先后访苏，苏联对中国态度的一贯，都不能不使国民党重新趋于联合苏联。

6、国际间民族解放的趋势多少给了国民党一些弄好国内关系的影响。国内情况：

（1）军事上反共的失利及其目前消灭我党我军之不可能，相当教训了国民党的当局。

（2）我党我军在敌后的困难增加，减低了对国民党威协。

（3）我党一年一年对国民党进攻的隐忍，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的表示，国民党至少相信在目前我们是决无推翻他们的企图和可能的，虽然即在抗战后，我们也不会有这种企图。

（4）目前国内人力物力的艰难，财政经济粮食危机的增加，民众生活的痛苦，行政效率的低能，军队战斗的减弱，国民党部工作的涣散，人心的动荡和不满，都不能不使国民党需要集中内部力谋改善和缓和。

（5）国民党内主张政治解决的呼号，引起各地方势力的离心发制各小党派的民主结合各中间分子自由要求，都不能不使国民党考虑到国内分裂时的不利条件。

（6）蒋委员长与国家民族的胜败不可分离其不能不有前途，究竟如何和目前实际作不通的考虑，这是一个直接的决定因素，因此这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发展各种条件的错综复杂和相互影响，便不能不使国民党决定了以政治解决代替了军事解决，以控制共产党代替了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办法。但这种代替并非完全取消，而是孰为主从的意思，也就是后者附属于前者的意思。

五、前途的估计：

虽然如上所述，国共关系趋向于好转，但并非坏转的一面，国民党矛盾存在，国内矛盾存在，而国民党的两面政策矛盾政策亦仍然继续，国民党领导机关的意见，亦未臻统一，故坏的一方面并未取消，可是好转已渐增长，坏转已渐减弱，一般讲实行政治解决，控制我党我军不外乎下列几个主要条件：

1、要我军听调动； 2、缩小我军防区； 3、限制我军数目；
4、统一军制军政； 5、缩小边区范围各权制； 6、统一法令政令；
7、统一币制税收； 8、加紧思想统制； 9、加强特务活动；
10、限制我党发展和活动； 11、强调除奸； 12、进行挑拨。

目前空气是和缓了，关系是恢复了，但好转是一个趋势，能否具体解决问题，还在两可之间（或拖或相机解决）因为在好转开始中还存在两个应极端注意的重要事实：一个是两个解决问题的看法和办法，还有很大的距离，另一个是局部的压迫还没有放松，如在大后方政治上的压迫，对新四军区域军事上的进攻，对华北边区经济上的封锁，仍然继续着，这须我们十分警惕，不过前途的发展，国内外因素的增长，使国民党不得不继续改变，由数变走到质变，这种变化仍然不会彻底，因为是带被动性的，但变得多或少，我党的政策也是有关系的，这与世界战争胜利的彻底与否，战后民主政治扩大与否我国也是有关系的方面之一。总之，国民党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是有可变性的，而且已向好的方面变，可能国民党十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和各项实施其意图是好的，但实际方案是错的，或者是矛盾的，等到实行不通，会仍然有变的可能，我们的任务便在促进其变，欢迎其变，而不在阻止其变，反对其变。

六、我党的基本方针是不变的，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与民主是不变的。我们的目前方针即在现阶段促进国民党的好转方针应该是：

1、争取好转，勿忘防御，即是说加强策略教育不刺激不挑衅，以诚恳协商的态度，以

实事求是的精神，争取国共关系的好转，问题的解决加紧秘密工作严格党的纪律，以防御意外的袭击，局部的事变。

2、争取合作，勿忘斗争，即是加强统战工作，多主张少批评，以争取和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别各阶层关系的无间的合作，加强学习，加紧调查研究，改造自己，以利思想斗争。

3、争取发展勿忘巩固，即是说坚持大后方立场及任务（勤于学，勤于业，勤于交友）以开展党的社会基础，加强党性锻炼，实行精兵简政的精神，一个人作两个人的事，一笔钱作两笔钱用，机关小工作多，架子小效能大以巩固党的队伍和存在。

为实行这些方针，整风仍是目前不可懈怠的任务，为实行目前方针，我们必须准备克服行将到来的空前的困难。世界战争趋向于好转，而情形会更加复杂和艰难，要克服艰难，要有胜利的信心，团结的意图是不够的必须有具体而切实的办法。我党今后应一方面努力于敌后，坚持边区的建设，大后方的埋头苦干，沦陷区的隐蔽待机。另方面努力向国民党及各党派各地方各中间分子多提积极的建议，多提有效的办法，少作消极的批评为圆满的实行目前方针，党必须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要防止由于目前趋势而走到左倾的过分乐观情绪，同时也要纠正由于不相信可以争取好转的右倾悲观情绪。在大后方特别要防止由于局势好转而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和工作的积极性，要防止满足于表面上的和缓，而忽视努力推动以争取实际上的好转，要防止及局部的光明出发，过高的估计全部好转，同时也要防止从片面的黑暗出发，否定这一好转的开始和可能。

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

（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

必武同志：

世电悉。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上月郭参谋见我，要求林、朱、周赴渝，我即以林、周或可先后赴渝答之，郭又提及何白皓电、西北军事二点，我则答以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赴前方。我并告郭：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另据探悉，调统局以已得延安同意派中央社分社驻延并有不日来延之说，此事全属片面意旨，如有人询你时，你可否认之。关于伯渠赴渝事，今日另有有线电复你。

毛 泽 东

丑支午

关于反顽清剿指示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

各师各区党委：

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向我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已属困难（现在主要采取政治的特务的进攻方式），但对那些我们力量薄弱的地区（如敌后薄弱根据地敌顽交界我游击区或边区等），他们只要一有机会与可能便随时可能向我举行军事进攻与清剿的，比如近来国顽向我浙东、皖中、鄂中、淮北路东、淮南、路西等地区不断进行军事进攻与清剿便是明证，三月初华中局例会关于对国顽清剿计划已有讨论，兹将要点摘告各地参考：

一、顽方对我清剿的目的及其严重性

（一）清剿的目的首先是对我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进行清剿以打击驱逐我之有生力量和民主抗日政权，企图达到恢复其反动政权。

（二）清剿之步骤大体可分为三，第一步骤以军事为主，用优势兵力采取分割封锁办法，以图打击和驱逐我军退出清剿区，而对群众则采惨绝的镇压的办法（烧杀姦掠）。第二步骤（在第一步骤成功后）以政治为主，采取保甲制度，自首政策按村进行清查搜索。第三步骤（如果清剿成功）进一步以清剿区为基点，向我中心区进行蚕食或跃进或大举进攻，对我在顽后方之地区则彻底消灭我之力量。

（三）因此目前顽之清剿就对我整个华中敌后来说，暂时虽仍不是带全面性的，但对某些地区是有可能由局部性的清剿发展到全面性的进攻的（如皖中及浙东），因此这些地区能否粉碎顽军的清剿计划是决定其能否胜利巩固与发展之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对国顽的清剿严重性估计不足，动员应付和有失当，即可能遭受个别损失和局部的挫折。

二、但顽方内部是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弱点

（一）各地向我清剿之顽军主要是土顽武装与杂牌部队，它互相之间有很大矛盾，指挥也不易统一，因此其战斗力弱，且不能持久易被我各个击破。

（二）敌后及边区敌伪顽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之顽在使用兵力与作战部署方面都不能不有某种程度上的顾虑，并给我一定的便利。

（三）顽军对我清剿的野蛮性残酷性造成广大群众不满与愤恨而更加信赖我军。

（四）敌后根据地及边区宽广辽阔，回旋地区尚大，便利我反清剿之穿插游击。

（五）目前国际国内情况对我日益有利，同时日寇当反攻到达前，在某些地区对大后方发动局部进攻仍是可能。

因此只要我能善于利用其矛盾与抓住其弱点，是我可以坚持和粉碎其清剿计划，并可能取得发展的。

三、反清剿的步骤与部署：

（一）要加强思想上政治上的动员与教育——我们对清剿不能看为简单的军事行动，而是顽方对我军事、政治、文化、经济与特务各方面的行动，因之我不应只限于单纯从军事上去应付，而应在党政军民学方面作思想上政治上的教育与动员，使大家懂得清剿不但对抗日人民的野蛮残杀，而且也是可以被粉碎的，以提高其反清剿的胜利信心，并要提出一整套口号如"不打抗日新四军只打日寇汪精卫""反对清剿自己同胞""清剿新四军屠杀自己同胞是断丧民族生机的犯罪行为""不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各阶层人民都不能安生"等口号以揭破蒋介石所谓从政治上解决国内问题的欺骗实质。

（二）要作充分的组织的动员与准备工作——对已开始清剿和即将清剿的地区，亦彻底执行精简政策，将已暴露的干部与党员部分撤到中心区，一切留下坚持斗争的干部，特别是民众领袖，须参加部队组织民兵掌握武装，以领导反清剿斗争，并须速将各级组织形式加以改变，使之适合反清剿斗争情况，各种组织均应作备战准备，作最坏情况时之准备，告诉群众坚壁清野埋藏分散粮食我之资材除自己需用者外，可分送群众免落顽手，凡党政军民中之不稳分子，应离清剿区慎重处理，必要时并可组织大批壮丁，撤退到我之根据地免遭顽军屠杀。

（三）军事行动方针：

1、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不同时候，应采不同的军事方针，但一般的说在顽区应一般采用隐蔽的方针，利用一切可能与掩护来争取生存和保持力量，在边区应采忽来忽去忽分忽合突然袭击的方针，这就是说好打即来，不好打即走，要打即合，不打即散，又是突然动作的，在我根据地应采取就地坚持寻机各个击破的方针，这就是掌握主力在手，并即时跳出敌人合击圈外，同时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就地坚持与敌纠缠，以便找敌人错误乘机破敌的战法，并须多采用夜间动作为好。

2、坚持清剿区的武装，均应采用群众性的游击战，如果顽军势大而我不可能在原地隐蔽与坚持时，即选择时机跳出顽军的包围圈外，积极活动吸引和分散敌人，切勿死守一地亦勿过早过迟跳出为宜。至于比邻地区部队，须努力策应。

3、必须经常加强侦察警戒和对外封锁我区一切消息的工作。

（四）要更进一步的依靠群众，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粉碎清剿，——我能否就地坚持与粉碎清剿要看我能否依靠群众为定，并应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大胆争取与利用一切反清剿的力量（如会门土匪等），应重视一切原始武装组织，民兵与游击小组，经常研究当地反清剿的具体经验，特别应依靠当地的群众领袖与干部。

（五）加强顽军与清剿部队中的工作——应打破在清剿部队中不能进行工作的错误观点，清剿前及清剿中都可向清剿部队做工作，从政治上影响以至利用其内部矛盾收买他们，特别可利用各阶层人士去做。

（六）正确的执行统战政策——在清剿区内应适应当地情况灵活运用党的各种政策如对减租减息及三三制的政权形式应较我中心地区有更大的伸缩性应在"抗日""卫民"的口号下去团结一切可能力量反对清乡孤立敌人在反清乡中一切过右或过左的行为都可能造成脱离群众与陷自己孤立的危险。

（七）加强敌伪工作——在敌后及边区我应特别加紧伪军伪组织中的工作，利用与掌握其矛盾，使之不为顽方所用以反对我。

（八）加强锄保工作——应以革命的保卫工作去反对与克服敌人的特务政策，在估计清剿要来而尚未来的地区，一般可参照整风防奸的办法加紧进行防奸工作，在清剿正在进行的地区可参照华北太行军区军事戒严会中的办法执行，总之要将反特斗争变成群众性运动要教育群众，一切反特工的秘密办法。

（九）要采取灵活的政策以应付顽之目前政策。

1、当清剿未来到前要向广大群众作坚持革命（阶级的与民族的）气节教育反对背叛革命的变节行为。

2、在敌军占了优势，如拒绝自首，势不可能勉强拒绝，又有脱离群众的可能时，可允许群众集体自首以保持力量。

3、党员及干部在上述情况下，可用群众面目在群众一起去自首，但不能先于群众（可能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或后于群众（可能被顽发觉）。

4、对处置自首问题的原则，可参考中央所规定之原则。

（十）党的组织应短小精干，严格隐蔽，每个支部和党员既要对敌保持绝对秘密又要成为群众的核心。

华　中　局

三月十四日

对鲁各派顽军工作指示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

罗黎肖并滕邓：

寅江电悉，我们提出以下意见，请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执行：

（一）争取国内和平，团结抗战，坚持敌后斗争是我党一贯方针，去秋国民党向边区威胁，经我政治上猛击，引起英美及国内人士之注意与对国民党之不满，逼迫蒋不能不暂时改变对我斗争方式（军事反共转到政治反共为主），因此对顽斗争应坚持自卫原则，决不衅自我开。保持我党经常的政治主动地位。

（二）鲁南鲁中滨海三区，从去年夏秋后，地区扩大一倍以上，极应利用时机努力发动群众，深入减租减息，加强游击队与组织民兵，并须在今年内做出一定成绩。在老区域注重生产，继续深入群众工作，准备坚持今后更艰苦局势，盼深刻注意。

（三）张里元对我态度似历守中立，应彼此维持原界，我应多派人与之联络，引敌注意，对其威胁，使张受敌威胁后进步，而与我合作，或投敌或被敌扫荡而驱逐消灭，较我直接逼之出境均为有利，王善志与赵保元矛盾极深，赵力大，王畏之，前王与我联络因而断，且赵现为山东顽军中坚，常在敌军掩护下向我进扰，我应联王，利用赵向我进扰时给以严重打击，消灭其一部，造成赵王均势，扩大其矛盾而利用之。达到打通滨海与胶东区联络，否则造成赵王团结，依附敌人制我，甚为不利。张景月据云系土匪出身，狡猾异常，打击与争取其对我中立，请灵活运用之。如给以打击后，退还少数人枪，讲和抗战等办法，打击亦应在其进扰时施行，我才有理有利。

毛　朱　彭

十六日

毛泽东关于时局近况的通报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

各同志：

兹将时局近况通知你们：

一、蒋之军队由于其士兵是捆绑与购买来的，军官极其腐败与根本没有民族民主教育，提倡反共教育，因而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失去战斗意志。蒋军在豫湘作战中，绝对大多数或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损失在四十万以上。进攻河南敌军不过四个师团，蒋军近四十万，除少数武器较差，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胡宗南有十个师由陕甘开入豫西参战，但是只有一、二个师能打一下，其余都是一触即溃。河南人民在蒋军残酷压迫下，引起他们普遍的与军队对立，群众暴动围剿军队枪械。这些地方的共产党早已被国民党摧残，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民在对国民党失望后，希望中共军队到临，抵抗敌军之心甚为强烈。

二、胡宗南已调动十个师入豫参战，对边区威胁减轻，但直接包围边区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一切反共行为依然继续。

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四、罗斯福三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久可到延安。

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关于党的问题，国民党虽在形式上说可以照抗战建国纲领办理，但是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关于军队问题，又承认十个师即十万人的名义，其余三十七万军队，二百万民兵均要解散。关于政权问题，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对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代表八千六百万人民的民主政权概不承认，我党被捕人员不肯释放，其他要求条件都不答应。林伯渠同志尚在重庆，但是要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在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质困难，发展了广大生产运动，今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

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寇将向我们实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八、对国民党问题，我们将继续谨慎处理方针，谈判虽无结果，但仍在进行中。

密码发李先念、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山东分局、鲁西北、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其他不发。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点协议草案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应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

（二）国民政府应即改组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构成之，并应拟定及颁布一民主政策，就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各事项之改革方案予以规定。军事委员会亦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派遣代表构成之。

（三）联合政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原则，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政府所采政策，其目标应为：提倡进步与民主；主持公道及维护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并给予人民以向政府诉愿之权利，关于人身保护状之权利，以及住宅不受侵犯之权利。联合政府并应采取政策，俾前所规定之“免除恐惧之自由”及“免除匮乏之自由”得以有效实施。

（四）一切抗日武力应遵守并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由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予以承认，所有获自友邦之军事配备，应公平分配与各该武力。

（五）中国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

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函电和文件*

（一九四一年十月——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

北方局及军分会，华中局及军分会，冀察晋分局，山东分局，晋西北区党委，一二〇师，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聂区，吕、程〔1〕：

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该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中央书记处

理论研究阅读材料目录

各地高级学习组组长、副组长：

兹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如下：

（一）季米特洛夫之国际七次大会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解放社季氏文选一至一百六十五页）

（二）《联共党史》的结束语

（三）法英美德意五国共产党史的传播研究及对马列主义的宣传所作的决议（《解放》一百〇五期）〔2〕

（四）联共中央关于《联共党史》出版后应如何进行宣传的决议（《解放》七十九期）〔3〕

（五）《斯大林与〈联共党史〉》（《解放》一百二十八期）〔4〕

（六）《左派幼稚病》（解放社版）〔5〕

以上各件请先看，最好背精读一部至两遍〔6〕，由组长或副组长对于每一件材料提出要点加以讨论。

* 这组文件，是根据《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9期先后的《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函电》、《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的。凡本资料第9册已收入的除外——。编者

（七）艾译的《哲学大纲》〔7〕第八章“认识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

（八）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8〕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九）河上肇《经济学大纲》〔9〕序说（陈豹隐译）

以上××〔10〕可后看。

（十）《联共党史》全书

以上一部可后看，看及讨论办法同前。

毛泽东　王稼祥

十一月一日

本年内的学习任务及学习方法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

各地高级学习组组长、副组长：

（一）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范围。

（二）学习材料已由党务广播台电告（是否收到请告）。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

（三）在通读期间不求详细讨论，但各组长必须负责采取适当办法检查全体组员是否确实读过指定材料，解答阅读中的疑难。

（四）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中各地必有许多找不到者，可先将找到者阅读，或由组长就能记忆者作报告。

（五）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暂不进行。

中央学习组　毛泽东　王稼祥

支〔11〕

关于发理论材料目录等问题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周、董〔12〕：

佳、文〔13〕电均悉。我们并未发出辩证法提纲，只发了一个理论材料的目录，其中包括政治理论及思想方法论两部份。中共党史提纲容考虑，现已印了一本中共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有便人即可寄上。七大报告即季米特洛夫报告。

中央学习组　毛　王〔14〕

篠〔15〕

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甲、高级学习组组员资格，因为学习内容不同，应分为政治组与理论组。

乙、为使政治组与理论组确能成为高级的，而不成为普通的学习机关起见，必须规定选择组员的具体条件。

丙、政治组以研究政治实践为目的，须具备下列四个条件方为合格：（1）以现任及曾任区党委以上，军队中旅级以上，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各种工作干部为基础选择组员。（2）党龄一般须在抗战前入党，个别的可以在抗战后入党。（3）文化水平须确能阅读并理解党的历史文件，文化及理解力低者不应列入。（4）确能遵守组织纪律，未经允许，不得将学习会中涉及党内秘密的争论或结论向外宣布。上列四条缺一即不应编入政治组。

丁、理论组以研究政治理论与思想方法为目的。以各种工作干部中之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与理论修养，确能阅读并理解《哲学选辑》等书者方为合格，党龄不加限制。政治组组员合于上列条件者，均可加入理论组，不合者只能列席旁听，不编为理论组的正式组员。

戊、高级学习组之编组，以地域相近而又工作系统相同者为适宜。但如某一地区人数过少，亦可以工作系统不同者混合编制。

己、高级学习组以外的各级干部的学习，由各级宣传部门负责。高级学习组不加干涉，但可根据自己的经验予以帮助。

中央书记处

各地高级学习组应根据组织条例实施*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军分会、各军政委员会：

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16]。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17]外，其余可只报人数。关于学习经过，则须由组长、副组长负责随时报告。

中央书记处

十一月二十六日

学习马列主义要注重运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必须用全力使学者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它具体应用于中国环境。

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去年中央政治局多次地讨论到遵义会议前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同时指出这种错误的残余到今天还存在于党的许多部门、干部、党员中，未能肃清。中央在这一时期内接着发表了关于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决定。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十一月二十日在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宗派主义的演说、今年二月一日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学风（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整顿党风（反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党八股）的演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党八股的演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这些决定、演说及指示的主要内容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贯彻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这些决定、演说、指示发出后，曾引起了党内的注意和讨论，但是中央的这一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并没有贯彻到整个党的工作中去，尤其是在宣传教育部门中没有把贯彻党的这一思想作为自己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因此，提醒各级宣传部，务必以极大的力量集中来宣传解释中央的这一思想，务必把目前一切宣传活动和工作以宣传解释党中央这一思想为中心，务必在这一思想之下改造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检查干部学校教育，检查在职干部教育，检查报纸刊物，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流毒于党，就造成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离开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搬用教条公式，死记书本上的理论，在抽象、空洞的理论内打圈子，不注意研究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不能解答在实践、生活中所提出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

** 这是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关于延安中央直属干部学校的决定》时加写的一段话。

的实际问题，轻视对于周围客观环境、客观事物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夸大局部，否认经验，自以为是，于是造成工作中的错误，损害党，损害革命。

宗派主义流毒于党，就是造成党内的排内性和排外性。打击干部、夸大干部的错误以提高自己，责人严责己宽；在党内闹独立性、个人突出、风头主义；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在新老干部等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团结；在这部门与那部门工作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在党员与非党员、在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关系上，不注意关心和了解非党干部，不能好好地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党员包办，党气凌人，甚至轻视排挤非党人士，结果就会造成党内不团结、党外脱离群众两种危险现象。

党八股流毒于党，就是使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最后藏身之所。夸夸其谈，长篇大论，引证抄袭，毫无创见，模仿一套，到处运用。这样就束缚党员思想，失去生动活泼的气象，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感觉。

各级宣传部必须根据上述中央的决议及毛泽东同志的演说彻底改造宣传教育工作，广为宣传解释，贯彻党的路线和思想。今后各级宣传部的活动和工作，务必与整个党委的活动和工作密切联系和配合，高级宣传部（包括区党委以上的）要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策划如何把党的每个政策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贯彻于全部党的工作中，指导党的思想，要能及时地反映党内各种倾向，找到纠正的正确办法。如果把宣传部的工作看作单纯的编报、编书、写文章传单等工作，是非常不正确的观点；如果把宣传教育工作看作是搬运和贩卖抽象的空洞理论，更是非常有害的观点。必须把宣传部的工作接近党的实际活动。各级宣传部对中央及各地高级党委各项政策和决议，务必贯彻始终，宣传解释，检查反映。不要离开当地的实际问题去空空洞洞地宣传，也不要只空空洞洞地宣传一顿，而不去切切实实地检查反映，这样，宣传工作是离开实际的，也就得不到效果。各级宣传部务必改变本身工作的作风，要在宣传教育部门工作中造成一种新的作风，这就是活的、生动的、与实际联系的工作作风。各级宣传部必须将上述中央决议、演说、指示所进行的情形、反应结果，随时报告中央宣传部，并将进行中所发生的疑难及问题随时向中央宣传部提出。我们并准备随时回答你们所提出的问题。

中央宣传部

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

少奇、德怀二同志：

兹将号〔18〕目致恩来电发上，以供参考。原文如下：

恩来同志：（一）对时局估计电悉，与我们估计略同。柏林协定〔19〕似以苏联为第一对象。春季后，德、日各以陆空主力向北，而各以海军主力、陆空一部及意国海陆空主力向南。即使是这一局面，仍是有利的，因为德日各有三条战线，意有两条战线，兵力大分散了，如日攻印，则更分散。整个轴心将失败在分散与消耗中。如日侵苏，蒋将迫我北上，我

应准备对付他的压力，但滇缅路断，英、美接济须走苏联，对内必不敢与我决裂的。（二）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不知你处收到否？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亦可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延安在动员中。（三）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各根据地尚未至十分叫苦程度，亦有办法。边区三三制大得周围各地好评，区内则团结了各阶级。精兵简政方针正在各地实行。（四）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五）今年二月统计党员数目为八十万，去年九月统计军队数目为五十七万（包括游击队），对外守秘。（六）林彪返延，身体好了许多，唯尚须休养。他在兰州、西安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诸人曾有深谈。据林说，国民党统战工作很可开展，要我告你注意。

毛泽东

号〔18〕

讨论过去路线问题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恩来同志：

（一）铣[20]电悉。五中及遵义文件〔21〕当电告。（二）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22〕，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23〕。“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24〕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

毛 王〔14〕

马〔25〕日

准备应付反共高潮　继续抓紧党内教育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周[24]：

一百零九条[26]已收到。中央已根据你的材料及估计发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同时将你的材料通知远方[27]及各地干部，并在延安干部中作报告。日苏战争时机当在五月至八月内。在爆发前，我们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一日

中央总学委第一次会议决定事项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

（一）总学委巡视团的工作

同意富春所提巡视团会议中各巡视员的分工，以后每星期巡视团汇报时，总学委各同志均可参加。

（二）健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

决定王若飞、陈伯达、邓力群三同志参加学习报编委。因凯丰同志工作很忙，决定改由康生同志领导编委工作。

（三）解答各方面所提问题

决定由凯丰同志负总责，陆定一、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同志参加此工作。

（四）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

决定由总学委在学习时期轮流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的笔记（由总学委通知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第一批抽调笔记的名单由康生同志拟定。

（五）增加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名单

a、增加朱理治、吕振羽、王世英、李力果、许子桢五人参加中央学习组。

b、在整风学习时期，增加李景膺（边区党校）、卫之（自然科学院）、高克林（民族学院）、王绩波（行政学院）四同志临时参加中央学习组会议。

中央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决定事项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

1、决定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某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共党史》结

束语及《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两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另发通知）。

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同志，混合编为十个小组，组员名单由康生、陈云拟定之，组长与副组长的名单，决定于下：

	正组长	副组长	
第一组	毛泽东	高　岗	谢　老[28]
第二组	朱　德	彭　真	吴　老[29]
第三组	弼　时	尚　昆	徐　老[30]
第四组	家　祥[31]	贺　龙	陶　铸
第五组	凯　丰	林　老[32]	方　强
第六组	陈　云	罗　迈	蔡　畅
第七组	博　古	徐向前	定　一
第八组	邓　发	陈正人	师　哲
第九组	富　春	叶剑英	乔　木
第十组	康　生	谭　政	肖劲光

2、总学委抽阅各系统的笔记，分工如下：

一、四学校及文抗[33]的笔记——凯丰、乔木、蒋南翔。

二、党校——毛主席、彭真。

三、军委——王家祥[31]、陈云、陶铸、陈子健。

四、中央直属——康生、富春、尚昆、曾固、曹轶欧。

五、边区系统——弼时、康生、师哲、廖鲁言。

3、在整风学习期中，各系统所属之重要机关学校，应择其必要者加紧整顿之。要使领导者善于启发，使大家有话敢说，展开争论，暴露思想，然后从容结论，达到真能“治病”与“救人”。哪个机关、学校应特别注意，由总学委各同志与各系统学委商定之。

4、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部，按照延安经验，暂行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及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及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展开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全国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二十二个文件。

5、同意富春提议，中央总学委建立秘书处，处理日常工作，由康生同志负责领导。

6、同意富春提议，决定杨尚昆、柯庆施二同志参加中央直属系统学委常委工作。

中央总学委第三次会议决定事项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

（一）各机关学校在学习期中互相参观时，主要的行政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以收改进学习的实效。

各系统大机关的互相参观，由总学委规定之。

（二）各机关、学校出有墙报者，为着展开思想上、工作上的论争，对于投稿之选择，不论其正面的与反面的，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

（三）为着统一学习的巡视工作与收集材料工作，决定：

（甲）中央各部委到各系统的巡视人员概交各系统学委统一分配，但中央各部委仍可单独召集各部委人员汇报，并可要求各系统学委对各部委派出之人员轮流到各单位去，以便巡视普遍。

（乙）中央总学委及各系统的巡视人员除用自己的耳与手收集材料外，不向各单位要现成的材料。中央总学委与中央各部委要现成的书面材料时，向各系统学委索取，各系统学委秘书处有立即供给所需材料的责任。

（四）同意富春提出增加崔田夫、霍维德、唐洪晨、张秀山、陈伯钧、王德、邓辉、黄志勇、曾涌泉、方仲如等十同志参加中央学习组。

（五）同意富春提出中央学习组编成十个小组之组员名单，并通知各组长及组员。

整风的主要对象是高级干部

（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

荣臻同志：

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者，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宗派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毛　泽　东

支（11）

通知——关于文风的学习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份，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

（二）对于文风的学习，各学委会必须抓紧领导，作具体的布置。号召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以学习学风与党风的精神，来学习文风。其已经学完的地方，要重新研究，没有学完的要深入地学习。

（三）在文风的学习中，要求每个同志，认真去检查自己过去与现在的工作和自己所写

的文件作品（论文、文件、指示、报告、演说，会议、谈话、教课、文艺、整风笔记、工作方式等），借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党八股的余毒。

（四）十二月及一月上半月内专门学习文风，个人学习总结可移到明年一月去。

中央总学委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总结整风学习的经验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

恩来、德怀、小平、荣臻、林枫、朱瑞、荣桓、漱石同志：

为了总结去年整风学习、确定今年学习计划起见，请你将你处去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

（一）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

（二）在哪些干部中收效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高级？

（三）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

（四）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

（五）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

以上问题望予速复为盼。

毛　泽　东

二月十日

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三月）

（一）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的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

（二）我党在内战后期曾经犯过过火斗争的错误，这种过火斗争是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曾经给了我党以大的损失。但自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以来，党内又生长了一种自由主义倾向。此种倾向发生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我党接收了约七十万新党员，而这些新党员不论来自哪一阶层，都未受过马列主义的锻炼，他们带来了浓厚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其中尤以许多知识分子党员表现得最为严重。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在入党初期，仅仅怀抱一个民族主义目的（抗日），没有共产主义目的，或对共产主义仅仅采取同情态

* 这个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度，因此，他们不愿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不愿服从无产阶级纪律。另有许多人虽有模糊的共产主义目的，但对马列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纪律则认识不深刻。这是党内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来源。第二，我党原有的数万老党员，虽然经过长期实际斗争锻炼，但其中有许多人对于马列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纪律的认识依然很差，因而发生自以为是（主观主义）、闹独立性等毛病。这是党内自由主义的第二个来源。第三，日寇与国民党乘着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与大量发展党员的机会，派遣了大批内奸分子混入我党，他们以党员面目在党内活动，利用我党新老两部分党员中不坚定不纯粹的分子，挑拨离间，败坏纪律，极大地散播自由主义空气，这是党内自由主义的第三个来源。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之外，党内教育工作的缺乏与放松，则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主观原因。只在我们认识了这些客观与主观的原因之后，我们才能有效地想办法，克服自由主义倾向。

（三）我们的任务，在于加强马列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纪律的教育，使新老两部分党员中（首先是干部中）那些不坚定不纯粹的分子，受到逐渐深入与逐渐严格的锻炼，使新老两部分党员中那些比较坚定比较纯粹的分子受到进一步的锻炼，这就是整风的第一个目的。同时，有步骤地清除内奸分子，这就是整风的第二个目的。在整风中，必须注意团结一切比较坚定比较纯粹的同志向着那些不坚定不纯粹的同志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并号召每一个同志以正确思想作标准对于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对于任何错误思想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是不应该的。再则，还必须团结一切新老党员（包括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向内奸作斗争，对于任何内奸分子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是尤其不应该的。此次整风的第一个区别、第一个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区别与斗争，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作标准，而对之表示一条心的人们与对之表示半条心（仅仅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们之间的区别与斗争，是以自己今日的觉悟与今日的一条心对于自己昨日的不觉悟与昨日的半条心之间的区别与斗争（自我批评）。此次整风的第二个区别、第二个斗争，则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区别与斗争，是以革命作标准而对之表示一条心的人们（包括一切同志，包括名为共产党员而实是同情分子的人们）与对之表示两条心的人们（内奸）之间的区别与斗争。我们的目的是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对这两者都应反对自由主义态度。

（四）现在党内斗争中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不是过火斗争，故应强调反对前者，不应强调反对后者，否则就不能克服自由主义。但在深入整风中，过火斗争偏向仍有可能发生，故领导机关仍须注意在发生了过火斗争偏向的具体单位中抑制那里的过火行为。例如在纠正错误思想问题上，不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采取惩办主义的方针；在锄奸问题上，不合实际的乱提、乱审、乱锄，都是应该制止的。但纠正可能发生的过火偏向，不应事先普遍提出号召，而只在发生了此种偏向的具体单位去加以纠正。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防止过火斗争，则势必不能展开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的斗争，而有被具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利用此种号召借以保护其错误思想的危险，也有被内奸分子利用此种号召借以掩藏其内奸面目的危险。

（五）关于反对自由主义偏向，在党内提出普遍号召的时机，亦不宜过早。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此种号召，则错误思想的暴露与内奸面目的暴露都将受影响。普遍地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偏向的适当时机，是在整风已经达到适当的阶段（即第一号指示所说之第二阶段）。先让自由主义偏向尽量暴露，然后按照其特点加以切合实际情形的克服，乃是最能教育同志的领导方法。

（六）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尤其是这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善于掌握这个武器，不是主观主义地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当地干部中工作中确实存在着的最严重的偏向，并针对这种偏向展开自我批评，决不可讳疾忌医，让这种偏向继续存在。严重的抗日战争要求我们十分认真地整饬我们的党与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拿起自我批评武器，在继续开展整风运动中达到这个目的。

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

（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德怀同志：

（一）安子文已到。你要他转告中央的谈话他已交到，我们看了很高兴。（二）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专门对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34]，写一次反省笔记，延安党校曾为此四条研究了两星期。党风最后阶段还应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最后则发动坦白运动（可在冬季），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发动填“小广播”[35]表格及社会关系表，在这两个表上，叫各人将平日所作一切带政治性而不应泄露的“小广播”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通通填上去。在此阶段内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直待党风学完后（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应在明年上半年了。如能在今年一年真正做好整风，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少奇二日致陈、饶[36]电转发你处，请参看。

毛泽东

六日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

康生同志：

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请登载下列数语为盼！

毛泽东

七月一日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错误路线是："逼、供、信。"

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

据彭、罗[37]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务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引起你们严重注意的，你们必须立即检查此种现象。在基本根据地内，你们必须认真研究与坚决执行中央八月十五日关于反特务斗争指示（原名审查干部指示），密切地指导各级干部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正确路线，废止历史上传来的多捉多杀及逼供信的错误路线。你们在基本根据地内在反特务问题上不应过分强调前方的特殊性，不应过分强调前方环境与延安环境的区别。如果要强调的话，则应懂得正是在前方战争环境中，更应执行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的方针，才能在严酷环境下正确地保证反特务胜利。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不用公审大会，而用调查、研究、解释、劝说、斗争、开坦白大会的方法，弄清一切暗藏的特务分子；用极大的热忱、很多的方法（千方百计），争取他们转变为好人。即使是最大最坏的特务头子，亦须争取为我们服务。群众不了解此种宽大政策的作用时，须向群众作明确解释。

研究党的路线问题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漱石、荣桓、黄敬、小平、子华、林枫同志：

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日内即可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宽，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一百人至二百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决定。不要专为此事召集全根据地的高干会，可以先在你们附近组织若干人研究，然后就讨论别的工作的机会在全区高干会上传达及讨论。因中央所编《两条路线》[38]一书来不及送给你们，可就你处找得到的关于内战与抗战时期表现两条路线（正反两面）的文件选出若干篇（不要多）给干部看。在干部研究

*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各同志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的电报。本刊有删节。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

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中央书记处

亥俭（39）

注 释

〔1〕指聂荣臻、吕正操、程子华。

〔2〕即《论共产国际各支部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底传播与研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景林译自1939年8月12日德文《国际通讯》第8卷第45期，载《解放》第105期。

〔3〕即联共（布）中央《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底宣传的决议》。载《解放》第79期。

〔4〕即《斯大林同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载《解放》第128期。

〔5〕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6〕抄件原文如此，可能是：“最好能精读一遍至两遍”。

〔7〕即艾思奇和郑易里翻译的苏联米丁、拉里察维基等所著《新哲学大纲》。

〔8〕即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9〕河上肇（1879—1946），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济学大纲》是他1928年发表的著作。

〔10〕电文有脱漏，可能是“三件”二字。

〔11〕旧时文电中以韵目代日，指4日。

〔12〕即周恩来、董必武。

〔13〕韵目代日，指9日、12日。

〔14〕即毛泽东、王稼祥。

〔15〕韵目代日，指17日。

〔16〕指中央书记处1941年11月25日制定的《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

〔17〕抄件原文如此，疑为“职务”之误。

〔18〕韵目代日，指20日。

〔19〕指1941年12月11日订于柏林并同日生效的《德意日联合作战协定》，该协定是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补充，中心内容是：德、意、日三国政府“具有毫不动摇的决心，在共同对美国和英国作战胜利结束以前决不放下武器”，“在获得胜利以后，将继续紧密合作”。

〔20〕韵目代日，指16日。

〔21〕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文件和遵义会议文件。

〔22〕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

〔23〕这个提法应以后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决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九一八”以后，“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24〕即周恩来。

〔25〕韵目代日，指21日。

〔26〕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对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进行了分

析，并对时局作出估计，列举了近三个月以来国民党领导的反动事件109条。

〔27〕指共产国际。

〔28〕指谢觉哉。

〔29〕指吴玉章。

〔30〕指徐特立。

〔31〕即王稼祥。

〔32〕指林柏渠。

〔33〕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34〕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底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我们应当根据什么基本标准来挑选干部呢？

"第一，我们的干部应当是对工人阶级事业抱无限忠心，对于党抱无限忠心，并且已经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在与阶级仇敌作斗争时，证明自己实在抱有这种忠心的。

"第二，我们的干部应当与群众有极密切的联系——每时每刻都注意群众底利益，深知群众底情感、情绪和需要。党部组织底领导者之威信，首先就应当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上，就是要群众觉得他们是自己的领袖，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深信他们有能力来充当领导者，相信他们在斗争中有无限决心和牺牲精神。

"第三，我们的干部应当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独立决定方向并不怕负责解决问题。谁要是怕负责任，谁就不是领导者。谁要是不会表现创作精神，谁要是想——'我只执行别人指定我作的事情'，谁就不是布尔什维克。只有这样一种人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这种人在失败的时候，不张皇失措，在胜利的时候，不骄傲自夸，这种人在实行决议的时候，表现百折不回的精神。在干部必须独立解决具体斗争任务并觉着自己对这件事情负完全责任的时候，他们就最容易发展，最容易长进。

"第四，我们的干部应当有遵守纪律的精神，并且是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与一切离开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中，受过布尔什维主义的锻炼的。"《季米特洛夫文集》第191—192页，解放社1950年7月版。

〔35〕1942年12月6日《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延安整风学习中暴露了党内'小广播'的危害性是极端严重的。根据各方面材料可以看出：有的人将党内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等秘密消息与机密行动都泄露出去，破坏了党内有关生命的机密；有的人散布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甚至于'广播'对敌有利的谣言；有的人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有的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破坏党内团结；有的人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有的人替反革命分子制造反党谣言。这种严重的现象流行在每个角落里，无论在党政军民学各机关中，无论在老干部新干部中，无论公开工作部门中与机要秘密部门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虽然在整风的学习中已促成了许多同志的觉悟，自动的向党揭发出来。但在许多机关学校中'小广播'尚未彻底清除。"

〔36〕即陈毅、饶漱石。

〔37〕即彭德怀、罗瑞卿。

〔38〕中共中央书记处1943年10月编，收入1922年5月至1943年10月间党的文件135件。

〔39〕亥，旧时文电中以干支代月，指12月。俭，韵目代日，指28日。

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

（一九四一年）

任 弼 时

党性的范畴究竟包括些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的党性呢？就是说，为了增强党性，需要在哪些方面修养和锻炼自己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几个基本前提：

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

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

然而这都不能超出一定的社会环境而孤立起来看。因此，

四、我们中国共产党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并且它本身都具有些什么特征？

1、我们的党生存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就是处在落后的、同时又是最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中。这个社会中的各阶级、各阶层的复杂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党员。

2、我们党的组织基础的特征，是小资产阶级成份——农民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占了较大的比重。他们原来在经济上多半是独立的、个人的、分散的，在思想意识上或多或少受着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他们便会把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带进党内来。

3、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不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血统化了的无产阶级那样的集中和受过那样严格的锻炼。他们自身不是从手工业工人、雇耕工人中脱化出来的，便是刚从破产的小资产者中出身的。甚至自己是产业工人，但同时又与农村经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意识还未完全无产阶级化，还常常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甚至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4、因为中国革命现阶段性质和任务的要求，无产阶级需要与各阶级合作，包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组织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就给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侵蚀我党以及影响我们的党员，又增加了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党在它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日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决不是偶然的。显然地，在今天的环境中，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我党在二十年来的艰苦斗争中，一天一天地强大起来了，健壮起来了。它是经过长期锻炼的，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政党。然而今天在党的某些组织中，某些党员身上，尚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和现象。党研究了各方面的具体情形和材料以后，在《中

---

* 这个报告大纲是为宣传解释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而写的，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指出了这些不良倾向和现象。

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和表现，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普遍的现象，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确实是严重的，存在着严重的危险。

那么，为了克服这些倾向和现象，为了增强党性的锻炼，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应该在哪些方面修养呢？

第一，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且丝毫不受任何所谓“要尽的义务”所驱使，所催迫，所束缚。不然便会成为盲从者。盲从者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都是相对的东西。

要使我们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成为自觉的、自动的和积极的，这首先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性和阶级意识。因为缺乏阶级觉悟、阶级意识的人，决不会表现出真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同时，他的所谓忠实性和坚定性也会成为相对的东西。如果党员不能培养出自己对党的利益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那他的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一样会变为泡影的。

阶级觉悟、阶级意识是慢慢地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对于这点，党的组织应负责教育党员，而党员自己则必须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锻炼。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党员对党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也同样是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并且这一切，都相互影响着，相互制约着，同时又相互促进着。

要具有阶级觉悟，要把握住阶级意识，决不是在口头上讲几句漂亮话所能做到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强烈的斗争过程。就是说，不管我们的党员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成分如何，为了具备无产阶级的觉悟性，为了把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首先得和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战胜它，克服它，排斥它。只有这样，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容纳得下，才能站得稳，才能慢慢地变成自己属有的东西。显然地，这不是一天或者几天之内所能做到的。这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然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忠实的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的。

第二，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应同时并列而进行的工作就是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就是要充分地掌握“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1〕

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能化为乌有。对马列主义也得有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无论在学习它的时候，或运用它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然而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就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同时，要反对机会主义，对妥协、投降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对那污辱和曲解革命理论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就是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测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

〔1〕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2页）。

标志之一。

第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我们已经讲过，党员的利益，党员的愿望，应与党的利益和党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就是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要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因此，就得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应当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同时也对自身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因为这些倾向是破坏党的组织，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团结的。"党只有当它所有的党员都组织成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时，才能实际地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把它引向一个目标。"〔2〕

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独立主义等倾向，是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的，是产生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党的派别活动、小组织活动的根源。若果不适时地制止它，不与它作斗争，让其发展下去的话，是会发展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的。

所以，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我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

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教育他遵守党的纪律，而且也教育为革命而斗争的阶级遵守一定的纪律。当斯大林同志讲到什么样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时，曾经说过："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3〕

显然地，党的各个组织，以及每个党员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的人要求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而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就是说，首先自己应该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

所以，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说，少联系一个人，便对党减少一份力量。

所以，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总而言之，今天我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深刻地研究和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且应该对照这个决定中所指出的各种不良倾向，虚心地、诚恳地、切实地检讨自己

〔2〕《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页。

〔3〕《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

的言论行动和思想意识。若果发现自己尚有某样毛病时，便要毫不迟疑地立刻改正它。《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对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主要的要求：要我们为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而斗争；要展开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要坚决与阳奉阴违的两面性作斗争，并且要彻底肃清这种现象；要即时纠正和不纵容错误的发展，若果发现了错误，要正面地、坦白地、诚恳地提出批评；要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进步；要为服从纪律和服从组织而斗争；要克服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要把理论与实践、工作与学习联系起来，配合起来；要每个党员都参加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这就是培养和锻炼增强党性的几个重要关键。

中央军委
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军委为加强在校在职高级军事干部的军事教育和学习起见，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之下特设军事高级学习组。以朱德同志为组长，叶剑英同志为付组长，陈奇涵同志为秘书。其任务是：

一、领导延安在校在职的高级军事干部的军事学习。

二、审定并检查在校在职高级军事干部的学习计划和教材。

三、指定军事学习的各种材料（理论部分和实际部分）。

四、实际参加各军事学习组的具体指导。

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一）根据中央精简政策和过去的经验，适应当前的工作条件，中央机构有重新加以调整之必要，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

（二）根据上述方针决定：

A、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甲、宣传委员会的任务与权限是：统一和集中有关宣传教育方面事业的管理，研究宣传教育方面的各种具体政策，分别性质向政治局、书记处提供有关宣传教育政策的提案与意见；对于宣传教育日常性质的问题有权作出决定，交由所管辖之各部委执行之，已决定之问题，须向书记处作通知。

下列各组织，统归宣传委员会管理：

一、中央宣传部（包括宣传教育的指导，编译所工作及延安整风学习与在职干部教育的直接管理）；

二、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

三、中央党校；

四、文委（文抗拨边区管理）；

五、出版局。

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同志组成之，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王稼祥同志任副书记，乔木同志任秘书，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例会一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宣委成立后，原有之中央党报委员会组织取消。

乙、组织委员会的任务与权限是：统一和集中党的组织工作（政民在内）和根据地、大后方、敌后方党的各种政策（政民在内）的管理，经常研究上述各种政策，分别性质向政治局书记处提供有关政策和组织工作的提案与意见；对于日常性质的问题有权作出决定，交由所管辖之各部委执行之，已决定之问题，须向书记处作通知。

下列各组织统归组织委员会管理：

一、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

二、统一战线部；

三、民运工作委员会；

四、中央研究局；

五、海委。

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尚昆、弼时八同志组成之，由刘少奇同志任书记，杨尚昆同志兼任秘书，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例会一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

为着保证党务与各种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取得更加密切的配合，决定刘少奇同志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

B、为着分工又统一各地区工作的领导，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同志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同志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同志负责管理（因为陕甘宁晋西北在军事上已统一，财经亦趋统一，决定晋绥分局以后由西北局直接领导），大后方工作归陈云同志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同志负责管理，而管理各地区工作的同志，对其管理的工作，直接向书记处负责。

C、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D、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他的经常业务是：准备政治局会议的日程和应讨论问题的材料（或通知各部委准备）；负责组织政治局会议决议之执行并检查其执行的程度；在政治局的方针之下负责办理和决定日常工作问题。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的工作，由书记处直接管理，或经过宣委组委管理之。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

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E、中央研究机关重作如下之调整：将现有之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之一部分、图书材料室合并，另行组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设局长（刘少奇同志）、副局长（杨尚昆同志）各一人，下设党务研究室、材料室和图书馆。

甲、党务研究室设主任一人（王若飞）。该室的任务为整理根据地、大后方和敌后方党的建设各种政策的材料，并加以研究，将整理的材料和研究的意见，提供政治局各同志和组织委员会作为了解情况、决定政策之参考。同时负责编辑党的资料。

乙、材料室设主任一人（邓力群），下分政治，经济，国际三个组，每组二至三人。该室的任务为整理当前国内国外政治、经济等时事问题的材料，提供政治局各同志，作为了解情况，研究问题的参考。

丙、在研究局之下，合并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图书材料室、文抗、财政经济部的图书馆，成立一比较完备的图书馆。专供研究机关及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之用。但须规定管理图书及借阅的严格制度，保障图书不致失散。

丁、在新的中央研究局成立后，原有调查研究局名义取消。情报部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理，实行精简后，情报部与社会部可合署办公，干部工作，可以统一管理。

F、总政大部拨并于联政后，移驻王家坪与作战部靠拢，军委设秘书长，在军委之内增设军政研究室，其任务是收集和整理有关军队方面的材料，并加以研究，供中央及军委各同志作为了解情况研究问题的参考。军委作战部，除管理二局三局外，在本部之内设立作战室与教育室，在军委之内设立高级参谋室，以吸收由友军中来延的高级干部，另设办公厅，在

中央管理局统一的制度与计划下，管理作战部政治部二局三局之行政与生产事宜。

S、为着便于更有联系而统一集中的指导各地民众运动。决定将现有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设书记（邓发）和副书记（蔡畅）各一人，下分职工、农民、青年、妇女四个组，每组三、四人，分别研究工、农、青、妇工作。各组研究的结果提交委员会集体讨论。关于政策问题，提交组织委员会讨论后再交政治局会议讨论。海委及文委，因其工作性质之不同，仍然保留，不合并于民委之内。

H、中央财政经济部组织，决定取消，在书记处之下另设经建材料组，由洛甫同志主持之，负责收集整理各抗日根据地的经建材料，并加以研究，分别性质，提供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或中央各同志研究采择。

i、在中央宣传部之下设立编译所，翻译及编著关于马列主义著作，苏联及其他外国的著作，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著作及课本。

j、为着便于控制机密，贯彻精简，统一管理、审查、配备教育机要干部，决定军机、党机合并于中央机要科之内，由李志忠同志任中央机要科长，调曾三同志任机要科政治协理员，机要局组织取消。为了交换电讯机要工作经验，研究秘密技术之改进，决定每三个月召集一次机要科、二局、三局各负责同志的机要联席会议，由康生同志负责主持之。为使机要工作更有安全的保障，使公开与半公开的电报与机密电报完全分开，决定在办公厅秘书处之下设立专门译电科，将公开的指示、党务广播、战报及事务之来往电报统归该科译发，以便尽量减少密码通报。

k、自军委直属机关与中央直属行政机关合并后，中央管理局直辖生产和行政机关增加，而且有很大数量的非党人员在各生产、行政、卫生机关之内工作，因此决定直属党委应兼任管理局政治部的任务，负责在管理局系统下的生产、行政、卫生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保证各种业务计划的完成。

L、在华北华中大批党政军民干部来延后，中央党校应开办第二期。中央三委合并后，邓发同志任民委书记，解除党校校长之职务。决定由毛泽东同志兼任校长，彭真同志任副校长。

M、中央交通局在建立国内国际必需的交通线的工作任务下，应缩小组织，调换工作干部，归并于办公厅之下，成为一个交通科。

N、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组织，均应根据力求精简、灵活和增强工作效能的原则实行精简，由李富春同志主持之精简委员会，协同各部委局厅社主管人员，负责具体计划，并提交书记处通过后实行之。但须在四月半以前完成精简计划。

（三）中央及军委，各部、委、局、厅、处、社均于三月至四月份内作出一九四二年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工作计划，在这种总结与计划内，须有具体的内容与分析。

（四）中央各部委除应直接加强对各地来延干部的教育和审查（这些干部是带有全国性的），并与新来干部进行有计划的谈话，收集各地情况，并根据各地来电、报告材料，加以研究，作出指示。加强对陕甘宁，晋西北材料的研究与直接领导，作为自己经常业务外，应善于利用新华社广播、解放日报及党务广播，作为指导全国工作的工具，在延安各个中央委员及各部委工作人员，应该把经常供给解放日报、新华社及党务广播的稿件，作为自己业务的一个重要部份。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么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党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讲话。

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他们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他联合，一方面与他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

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象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那时是作为一个团体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后来陈独秀犯了错误。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反对国民党反共就没有根

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磨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党史，将来需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国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那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国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党的历史的发展，中国党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党史”上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立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

（一九四二年三月）

毛 泽 东

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任务是：除了汉奸及决心破坏抗战团结者外，一切阶层的抗日人民，不论是有党有派，或者无党无派，不论是同情我党的，或者只在一部分纲领上愿与我党合作的，也不论是已经与我党共事的，或者尚未与我党共事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和他们一致合作，共同为抗战建国的总目标而奋斗。我党长期地坚决地实行这一正确政策，是有了伟大成绩的，全民族的抗战赖以支持，全国的统一赖以实现。这些都是很好的情形。但在另一方面，不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党在政府、军队、党务、民运、文化教育部门内或者是秘密党内，都存在着一部分党员及一部分党组织与党外人员之间的严重的隔离现象，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作风并未完全扫除。这些党员与党组织，至今还不懂得我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与意义。他们违背我党密切联系民众的原则。他们不是密切联系民众，而是孤立于民众之外；不是站在民众之中，虚心体会民众的心理，而是站在民众之上，自以为是，称王称霸。他们不愿意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把党外人员看作无足轻重。他们不愿向党外人员学习，反以领导者自居。他们对于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或漠不关心，不予信任，或吹毛求疵，求全责备。他们对于政权的三三制不愿坚决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仍取包办态度。他们至今还不明白，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而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因此，对于一切忠诚抗日的人员，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为了认真地彻底地纠正各种不良现象，改造党的作风，必须在党内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的斗争，在一切地方与一切部门中展开自我批评，并将这种自我批评公开于党外人员之前，毫不姑息，毫不掩饰，以收彻底揭发与彻底纠正之效。同时，规定下列具体办法，要求一切党员与一切党组织认真地坚决地实行之。

（一）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一切党员，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

（二）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均应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占三分之二。如当选的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稿，后来没有发。

共产党员人数不足三分之一时，党组织不得指派未当选的党员去凑足三分之一，更不得排挤当选的党外人员。在这些机关中，共产党员与必须党外人员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共同商量问题与决定问题，共同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体、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并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

（三）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民众团体及其他机关中，凡须经过人民民主选出的工作人员，其任免办法均按前条三三制的规定。其他不需经过民主选举的工作人员的任免，亦不应以是否党员为标准，而应以是否赞成抗战团结及本人能力、经验、学识与工作积极性等为标准，实行用人唯贤的正确方针。

（四）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及一切已有或应有党外人员工作的部门中，党支部的任务是：对于党员进行党的教育，领导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团结党外人员，保证该部门工作任务的完成。支部不得直接干预行政领导，更不得代替行政领导。在行政关系上，党员必须服从行政的领导。在党外人员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部门中，该地或该部门的党组织及党员对行政工作有不同意见时，应取适当方式，与党外人员协商解决，不得直接处理。某些地方党政不分的现象，应该纠正。党员如有违犯行政法规者，应受行政的处分；其错误涉及党纪者，同时须受党纪的制裁。但在行政关系上，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党外人员，亦须服从上级行政的领导。

（五）党员及党组织不得任意地无根据地怀疑党外人员。必须从友谊中细心了解自己周围的每个党外人员的历史和特性，细心了解他们对人民、对我党及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思想自由及生活习惯，必须加以尊重。须知党外人员的愿与我党合作与我党的尊重党外人员，是彼此合作中不可缺一的条件。

（六）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七）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八）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工作中发生过失时，有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加以慎重考虑，采取适当方式，以诤友的态度，适时地诚恳地告诉他以所犯过失的真确事实及正当理由，并与他协商改正的办法，帮助他改正过失。决不可采取缄默不言、听其积累，或当面不说、背后议论的态度，须知这种态度是只会妨碍合作与不利于党外人员的。

（九）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凡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法律上是与共产党员完全平等的。在工作上，应给以必需和可能的工作条件。在学习上，凡在一切有党外人员的机关、学校中，无论在职干部教育或学校教育，党外人员均与共产党员有同样的学习权利。在物质

上，不是空唤优待，而是按工作情况，工作需要及现有物质条件给以真正必需的帮助，并须使党员了解这种帮助是应该的。

（十）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机关、部队及学校中，党的一般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允许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党外同情分子到会旁听，并得发表意见。

（十一）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有计划地召集党员与党外人员联合一起的干部会议及座谈会，与党外人员共同讨论各项抗日政策，并征求党外人员对党的意见。

（十二）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党的组织部或管理干部的部门内，设置管理非党干部的专门机关，担负对党外干部的接洽、登记、了解及照顾的责任。在党的各级保护健康委员会内，设置党外干部科，管理党外干部的保健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

自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党内团结空前地增长了，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极大地改造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阀主义倾向也逐渐被克服了，面目不清的干部被审查明白了，暗藏在党政军民学机关内大批奸细分子被清查出来了。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二十二年来我党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又证明着整风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与极端精细的斗争，必须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拿出极大的责任心，负责贯彻到底，并自己动手，以身作则，毫不夸张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务。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它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除陕甘宁边区责成西北局重新做出整风计划外，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责成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依据战争环境特点，重新做出自己的整风计划。已经做成此种计划并在实施中的地方，则根据此次指示加以必要的修改或补充。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我党增加了约七十万新党员，他们过去都是未受过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马列主义）的锻炼的。在数万老党员中，对于受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锻炼的程度也极不一致，其中有许多人仍然拖着很长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尾巴，思想上的关节还未打通（其中并有若干重要干部）。对于上述新老两类同志（目前着手是对于干部）给予深刻的整风锻炼，借以纠正其错误思想，打通其思想上的关节，坚定其阶级立场与党的立场，改造其工作作风，是完全必要的。对于那些思想比较正确，或对马列主义武器掌握得较好的同志，则借整风增进他们的修养，可以使他们更趋于进步与发展。因此凡以为整风是专整下级，不整上级；或专整上级，不整下级；或专整新干部，不整老干部；或专整老干部，不整新干部；或专整别人，不整自己；或专整自己，不整别人；都是错误的。

又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各地内奸的严重程度虽然不一致，也不是说每个支部都一定有内奸，但就各个地区来说，可以断定，此种情况是无例外地存在

着。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被纠正，内奸问题也至今不会引起注意。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因此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而对于该决定上要求注意领导方面，则暂时不予强调。这样做的目的，第一，在于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表露各种正确的意见，发扬正气纠正缺点；第二，在于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以便根据其表现而给予具体的与明确的纠正，使他们在自己经验中认识自己矛盾着的思想，因而便利于克服错误思想，转变为好同志。否则，毫无生气的、平平常常的学习，必不能有多大的效益；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使领导机关与广大干部逐渐识别他们。对于内奸分子，凡非军事紧急时期，紧急地点与紧要环节，不要忙于宣布他们是内奸，只把他们当作有错误思想的同志看待，以便诱使他们尽情暴露，达到彻底根究之目的。不论同志的错误思想与内奸的反党表现，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静地正确地观察与辩别谁是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与谁是反党的内奸分子。至于任何同志的正确意见更要虚心倾听，绝对不能抑制。

在采取这种政策后，在第一阶段中一方面正确意见会生长表露，另方面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说怪话、反领导，乃至反党等各种不正确的现象也会发生。而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尤其要使错误思想多多暴露。这一阶段是初学学风文风的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强调四三决定上要求注重领导一方面，着重发扬正确意见，缩小民主范围，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但须注意这种克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克服，而不是武断的命令主义的克服，不要伤害每一个还可挽救的同志，在这一阶段内，仍然不要提内奸问题，到了第三阶段，是学习党风的阶段，这是学习深入时期，此时大家都接触了实践问题（党风）又有了思想武器，将是反省自己、批评别人最开展最热烈的阶段。此时除学完党风外，主要地应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点与纠正其缺点。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对于继续发现内奸与教育群众都有极大作用。在第三阶段中，还应检查各单位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与改善工作。

这样，每一具体机关学校，从重新布置整风之日起，至少五个月内（战争时间不算在内）均须做为发现同志错误思想与纠正错误思想的时间。五个月后，方为开始着手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部分地清理内奸的时间。这样，一年以内（除去战争及其它繁忙任务所占时间）可以大体上结束整风学习，而把全部完成审查干部与清理内奸的任务，推至以后的时间。延安部分机关学校，一九四三年四月才结束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这些机关学校，从一

九四二年冬季才开始着手审查干部，一九四三年四月才正式审查干部。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易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但对内奸问题若过于仓卒处理，势必不能彻底，且易发生毛病。内奸的可怕是我们的不自觉，只要我们一旦自觉，内奸就不可怕了。有军队与政权在手，且有内战时期肃反经验的党，是有充分可能把内奸肃清的。故各地在一九四三年冬季以前必须着重于深入整风，决不可放过整风的伟大思想斗争。如果各地能于今明两年对敌斗争的严重环境中，恰当的分配时间与人力，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几件互相联系着的重大工作作好，就是我党的极大胜利。关于处理内奸问题，中央准备尔后再向各地做具体指示。

中央军委与总政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

自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提出整顿三风以来，延安整风已造成热烈的运动，党政军机关部队学校现均卷入了这一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思想革命的洪流。这对于团结和巩固全党，改正干部及党员的思想、转变工作作风，有莫大的作用，而事实上现在虽还处在学习文件的初步阶段，就已在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效果。

我八路军新四军是党完成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是由朱毛红军发展起来的，长期的在毛泽东同志直接的领导下。但过去主观主义曾经给我们的部队一些影响。在我们部队里，三风不正的现象是存在着的，特别是“老子天下第一”宗派主义的思想更为明显。抗战以后，大批新的成份加入了我们的部队，加之在统战环境中，我们部队是又被带来了一些非无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影响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的思想意识，所以在部队中必须热烈的来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整风的号召，极好的团结巩固及改造我们的部队。革命军队的干部必须能充分掌握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建立与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理论，反对军事领导中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肃清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对我们的恶劣影响（这不是指吸收这些理论中合理成份），克服军事理论与军事学习的落后，不让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存在于我们的部队中，使我们军队干部的思想能够正确的运动发展起来；这对克服目前困难，迎接将来光明，这对进行目前游击战争与准备将来正规战争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八路军新四军是我党一种特殊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党把这些武装力量的率领委托于军队干部，因此军队干部在党面前是负有重大的责任的。军队干部应该是没有毛病的，若不如此，其给党的危害就必然重大。所以在军队中整顿三风锻炼党性有更重大的意义。但部队是战斗的组织，我们整顿三风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不是为了涣散自己的力量；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妨碍战斗；一切有害于团结的言论与行动，必须立即纠正；学习文件与检查工作均应适应战斗环境，务求不松懈战斗的警惕性，不妨碍战斗的准备与进行。根据上述的要求与部队的特点及延安整顿三风的经验，对各地部队的学习整风文件与检查工作，除中央宣传部四月三日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议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及中央宣传部六月八日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外，特作下列建议：

（一）估计部队的特殊情况，在讨论整风文件与检查工作时，必须遵照下列原则进行之：

甲、不妨害战斗与战斗直接有关的工作，利用战斗空隙，特别注意利用青纱帐起后可能的战斗空隙。

乙、集中力量于主要干部（团营以上首长及相等的机关领导干部），务求在主要干部中首先收到成效（连以上、科员以上，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均可参加，但以文化政治经验程度为转移，不应平均看待）。

丙、时间可酌量延长，务求深入，草率了事是不对的。

丁、在战士及班排干部中，因为文化政治水平的关系，暂不学习整风文件，其教育照原来计划进行之。

戊、在学习整顿三风文件期间，干部的理论及业务学习暂行停止，以便集中时间于整顿三风文件的学习。

（二）学习文件可采取下列办法：

甲、将整顿三风文件印成小册子发给干部，利用战斗空隙阅读，但应将某一机关单位或若干单位的干部组织成小组，利用空隙进行讨论。

乙、利用轮训制度，调集干部专门研究三风文件是最妥当最便利的办法，特别是平原地区，更应着重轮训制。

丙、到适当时召集军区、分区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三风文件与检讨工作。

丁、必要时可实行分级学习制，先在师级弄好，然后到旅到团。

戊、对距离领导较远的部队，可组织工作团，先将文件研究好，然后派往各处帮助整风。对近距离的单位实施指导时亦可组织工作团。办法是把文件研究好，然后分赴各单位按件传达与按件主持讨论。

己、每个文件讨论之前，在会议上作报告，传达文件内容，使文化低、理解力较弱的干部能充分理解明了，懂得该文件的中心。

庚、在讨论文件时，各军区、师可出版党内军队专门报纸刊物，讨论与解答三风文件中的各种问题，指定主要干部及能写文章的干部，写文章以补口头讨论之不足。

（三）反省与自我批评的运用：军队干部在整顿三风中，反省自己，进行自我批评是需要的。借口军队是集中的组织而取消反省与自我批评是不对的。然而军队是战斗的集中的组织，加之目前环境日益困难，反省是为了团结，为了提高战斗力，而不是涣散战斗力，因此反省与自我批评必须注意遵照下列各项原则：

甲、干部反省与自我批评可写在读文件的笔记中，上级首长应检查与批阅这些笔记。

乙、每个干部在讨论文件时应写全面的自我批评语录，或者自我鉴定书，呈上级首长批阅，上级首长不得借故不阅，并在适当的会议上，例如在团级干部会议（如团长、团政委会议，军政委员会）上宣布之。

丙、各同级干部应作反省与自我批评及相互批评。

丁、干部反省与自我批评在考虑成熟经上级指示之后，应适当的正确的在一定的会议上向下级干部公开。这些正确的公开的自我批评，不会降低自己的威信，相反的会提高自己的威信。当然过分的失去自信心，失去应有立场的批评也是不对的，应加以纠正。

戊、师、军区、纵队以上主要负责干部的反省笔记，及自我批评语录，应摘要报告军委。

（四）民主与集中，军队是集中的组织，然而这次整风没有适当的民主，仍然是不行的。当然军队中这次整风中的民主与地方党是不相同的。关于在这次整风中，民主与集中的联系及批评方法的运用，可采取下列各项原则与办法：

甲、学习委员会与检查委员会，一律以民选或由首长指选。

乙、下级对上级有批评时应允许之，不能禁止，但应采取下列方式：

① 向上级首长写信批评某负责人或某领导机关，该级上级首长应作解答。为发现错误与缺点，上级首长可发动干部写信。

② 在适当会议上，应允许批评，但当其批评是错误时，应立即加以解说，以免涣散军心。

③ 一切不负责任的小广播、会外批评、信口开河、组织集体上诉等均应禁止，以免削弱战斗力。

（五）检查工作：在文件学习后，应即进行工作检查，但前方战斗频繁，部队分散，要检查所有工作及一切工作的细目是困难的。因此应把检查工作集中于领导政务（不是事务）和原则方面，但马虎是不行的，务求得出新的经验教训和结论，而不是照例的经验教训与结论。例如：

甲、从整顿三风眼光来看，本师、本旅、本团领导工作优点、缺点、错误等，但是这须要师旅团领导机关先作研究做出一般结论，再开会征求意见，分发下级讨论。不由领导机关先准备让大家乱说一通，是不会有结果的，但不征求下级意见不进行讨论，则检查工作也不会深入的。

乙、检查各部门工作如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干部工作等，使三风具体化。军委与总政准备发出如何检讨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中三风不正的提纲。

丙、在检查工作时，除上下配合之外，还需有内外配合，这就须要征求地方党地方政府的批评与意见，由军队负责人自动的访问地方党政负责人，并重视他们的批评与意见。

（六）认识干部与鉴定干部：这次整顿三风是改造干部的思想与工作的过程，除干部自我鉴定，自我批评语录外，还须由上级作决定。在思想革命中在工作改造中，对于真正进步的干部，应提拔之，落后顽固不变者应改变其工作，有希望进步与愿意进步的应帮助其进步，不能给以打击。

（七）在整风时期各部应供给军委总政一些整风的消息，以便收集编文在解放日报上登载，每月至少须供给一次，遇有偏向发生，应随时报告。结束时应向军委总政作总结报告。

（八）本文件应与二十二个文件一并加以讨论。

（原载《真理》第九期）

北方局、野政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

一、去年一年中整风学习，虽获得若干成绩，但一般的仍然尚只限在阅读文件及一般干部上面，深刻的反省和高级干部中的整风并没有普遍展开，整风学习还非常不深入。各地党与部队，今年应按照北局机关与总直属队、自三月起六个月的整风综合学习计划，进一步加强整风学习，重新进行新的动员，应把整风运动看成为一九四三年斗争的最中心的任务之一。

二、今年整风的重点，应放在地方党地委专署一级、军队中旅与分区一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内容上特别着重于学风部分。党的书记，部队中的负责同志亲自领导这一工作，务使上述干部同志深入文件学习与自我反省。每月并将整风情形和心得，用书面或电报，摘要报告上级，并由上级批阅其整风笔记。现规定区党委军区一级批阅地委分区一级同志的笔记，分局、北局、野政批阅区党委军区同志的笔记。县一级与部队中团一级干部亦必须进行必要的整风学习与反省，但分量与要求应酌量减轻。区一级与营连级干部及机关干事一级干部，文化程度实际工作经验少者，责成阅读必要的文件与分配其深入下层实际工作，更多的接近实际斗争；文化水平低者采取上课办法，授以文件中必要部分，对他们主要是进行文化教育。

三、整风学习如果没有深入的动员与坚强的组织领导、思想领导，就难收到好的成效。各级党的组织与负责同志必须把整风工作作为自己当前工作之主要议事日程之一，并以自己整风的模范作用去影响推动其他同志，启示与帮助其他同志的反省及进步。为了帮助同志们的学习，交换各地经验，已决定由新华日报出一整风月刊，党的生活出三期特刊，望能经常把稿件送来。对于这一指示执行的情形与对于整风新的工作布置望即报告。

华中局关于今年整风学习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

（一）去年华中我党我军，除个别地区与个别部队曾经造成了整风学习的热潮，并有了相当大的收获外，但由于整风是长期思想改造的过程，不是短时间所能奏效，而去年我们的整风又还有些缺点，还不够彻底与深入，因此决定整风仍为今年学习的中心任务，在播种告一段落后，从五月开始各地仍须继续整风运动。

（二）去年整风运动的结果，我们干部的思想提高了一步，工作作风有了一些改变，处理问题不象过去那样马虎草率，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现象减少了些，这是我们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还不能令人满意，我们的整风还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离改造思想改造工作作风的理想目的还远，这是由于过去我们的整风尚有许多缺点，如整风的一般化，如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与自我反省联系不够，如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的联系不够与行政上的配合不好，缺乏组织性，计划性，经常性等，但最主要的缺点是：

（甲）整风运动的一般化，在学习上没有重点，如没有抓紧学风学习与反对主观主义的中心环节，因为学风是克服一切歪风的根源。如没有注意按照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学习计划，因为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是不齐，工作性质有不同，革命历史与经验也不一致。如我们在过去的整风中多少存在平均的观点，在整风学习中并未有很好进行彻底的反省，并未能与其实际工作联系。

（乙）整风运动中存在轻重倒置的严重现象，如各级党委及部队的负责同志，没有亲自领导整风运动，没有以身作则来推动这一运动，而把责任推到宣教部门，如有些地区发现“上风不整整下风，大风不整整小风。”轻重倒置的现象，各主要负责干部在整风中不注意自己的反省，只要下面反省，不打自己的歪风，对下并重的整风。我们在整风中没有把重心放到整顿主要负责干部方面。

（三）为使今后的整风运动能克服上述缺点，收到更大的成绩，特有下列各项规定。

（甲）要整顿各级整风学习领导机构，各战略单位成立学习委员会，以区党委书记为领导人，分区成立学习分会，以地委书记为领导人，负责整风学习的计划，组织督促检查与总结经验。如工作部门的行政首长，应为该部门学习小组（或分会）的负责人（个别文化水平低不能领导学习者例外）以避免行政组织与学习组织的不协调的现象。要根据不同对象实行分组学习。应当把整风的重点放到区党委、地委、师、旅、军区一级。

（乙）区党委、师、行署及地委、旅专署一级主要负责的干部编为甲组，着重学风学习，县一级（县委、团级县府）与机关中科长一级以上的干部，及个别文化及理论水准低的地委、旅级及军分区干部编为乙组，着重党风的学习，其他干部则编为丙组，主要为业务学习。并分配到下层作实际工作，对文化水平低者的整风办法，则选定几个重要文件，一面阅读一面报告，或上课方式进行之，并注意进行文化学习，各组人员均由学习委员会按照具体

情况指定编组之，今年整风的重点应放到甲组，以甲组为整风骨干，甲组不但自己要学习，而且有推动帮助并指导其他各组的责任。

（丙）整风学习必须与自我反省和改造干部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联系，甲乙丙组必须作笔记，（但不是摘录文件，而是要把研究文件的心得及自我反省记录下来）。今后华中局定期抽阅甲组的笔记，区党委定期调阅乙组的笔记，乙组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和审查干部联系起来。整风是反省自己改造自己，同时也使党的各种任务效力能提高，使党能更好了解干部，考查干部，因此学习与实践应当联系，审查干部不能与整风分开孤立的去做。

（四）兹附上华中局军部各直属机关整风学习计划，供各地参考，并盼各地党委于接此指示后即刻进行讨论，定出计划，并将布置情形报告。

华中局

四月十日

北方局关于整风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

华北今年多数地区的整风进步仍然很慢这除敌后频繁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等客观影响外各地区的党委与行政负责同志主观上没有足够的认识中央对于整风一并（再）指示督促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基于党与革命的胜利有基于巩固及准备今后迎接新的更伟大繁重任务极其深刻的意义与情况因而在实际上没有能更积极的推动这一运动某些地区甚至多少有些忽视的现象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北局依据中央书记处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及华北整风当前发展状况研究讨论之后特发如下指示望各分局区党委立即切实讨论布置执行。

一、华北各地区整风应从本年八月起至明年六月约一年的时间中进行完毕“个别地区整风比较深入的可以提早完成”在这一年内必须根据整风的基本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去教育干部并检查和了解每个干部的工作和思想各分局各区党委与行政负责同志应即采取具体步骤与有效办法切实负责推动整风的真正进行并以自己应有的努力使其按期完成不能再有拖延与忽视如再拖延与忽视将影响到将来新的形势下新的任务的执行也将可能受历史的惩罚与党的责备这点应严重的认识与估计到为了保证整风任务的预期完成各地今后整风的方法应将文件经过适当的研究之后主要发动与组织干部根据文件的精神在会议“小组或机关全体干部”作反省“片断的或全面的”报告并开展对每一个干部反省报告的争辩学委与负责同志应多与干部进行谈话作深刻的自我反省起示范作用×规一般干部深入整风审查他的思想自传批阅他的反省笔记而不是长期迟滞于文件圈子中。

二、整风完毕后紧接着就应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一般的在明年七月起就应普遍开展这一工作并应尽可能的争取在明年下半年完成因为干部经过思想上的整风后组织状况审查就比较容易了些在审干时必须把党内这些不正确倾向和错误思想与反革命的思想严格分开。

三、但为了便利于顺利的进行审干必须在审干以前首先来巩固我们自己的防御阵地，因此在依随着今后一年整风的过程中应同时完成巩固阵地的工作由于抗战六年以来大批干部引进提拔与调动党的组织的骨干与核心领导之下的培植常常可能被忽视因此巩固防御阵地的工作应引起极大的注意这一工作大致可分如下两个步骤去完成：

第一步“今年八月起至十二月底止”重点放在军队内应首先保证团及独立营以上的军政机关的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处主任是党的绝对可靠的干部各级司令部之作战科股机要科股政治部之组织干部科股锄奸保卫科股必须保证在党的绝对可靠的干部手里。

第二步“四四年一月至六月”重点放在地方党内应保证县委以上至区党委各级党委的常委政府党团书记各级地方公安机关的主要干部“局长及侦察审讯科长”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的负责干部在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干部巩固军队党与地方党的防御阵地重点教育时间先后但不能机械的绝对的划分开来首先预备完成上述巩固防御阵地的工作必须在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对于人员与部门作些新的审查与必须的配备和调动。

四、除一面采取从在职干部中进行整风与审查干部外各地区的党校与党的训练班其主要任务亦应放在整风与审干上面而不是进行一般的教育。

五、这一指示只下达分局委员，及区党委书记与军区的主要军政负责干部。

邓小平同志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去年提出的整风号召，在全国，尤其在陕甘宁边区，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这次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对于我们中国党的建设有其伟大的意义，就是对于世界各国党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大家知道，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自然，我们的整风运动要从每个同志自己着手。党是由许多个人集合组织起来的，个人把思想作风整好了，就可以使他担负的工作得到改进，因而党的力量也就增强了；如果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把歪风去掉，那我们党不知要增加多大的力量！整风运动是我们建党的百年大计，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参加整风运动。

但是，这种意义是否真为所有同志所了解呢？我以为直到现在，大家的了解还是非常不深刻的，不但一般同志，就是领导同志了解也很不够。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的整风还没有整起来。因此，当着本期党校开学和太行区全体机关部队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再来说一说整风的重要性，不是没有意义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整风号召呢？我以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党的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特别是研究了党的现状之后，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使党在想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一致起来，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

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

* 这篇讲话刊登在北方局直属机关学委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出版的《整风周报》第二期上。

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

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党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整整九年的时间。我们党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痛感整风的重要的。

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但这是不是说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没有的。有了中央正确的领导，还必须有忠实执行中央指示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如果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还充满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歪风，中央的正确领导是无法实现的，而这些歪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恰恰在我们干部中和各级党的组织中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曾给了我们工作以不小的损害。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风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弱点提出来的，是一针见血的指示。我们大家可以好好回忆一下几年来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自己的思想意识，就会懂得这一点。拿太行、太岳、冀南这几个区域来说吧，几年来我们的工作，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我们同志，特别是我们这些负责的同志还有不少的歪风，给予工作的损害也是令人痛心的。比如我们在大发展时期，拉夫式地发展党的组织，直到现在还损害着党的巩固和战斗力的增强；我们同志中的宗派主义，把大批的乡村知识分子排斥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在三三制政权中始终不善于团结非党人士，不善于扩大巩固统一战线；长期的“左”的财经政策，“左”右摇摆（基本是“左”）的锄奸政策，形式主义的生产领导，简单生硬的工作方式等等，无时无地不发现许多的歪风。这些歪风给了我们很多损害，有些坏影响现在还未肃清，有的将来还要自食其恶果。凡是反省了一下自己工作的人，一定会懂得我们不整风是不行的。

至于说到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不仅普通的党员，而且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干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许多同志的思想意识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过去我们同志对自己往往是估计过高的，党的组织对干部的了解也是不深刻的。整风经验证明：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常常是夸大自己好的一面，对于自己的弱点总是原谅的，还往往把弱点看成优点。所以必须在集体的整风中，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重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各地整风的材料证明：有些同志虽然为革命奋斗了多少年，最近经过了深刻的反省和别人帮助之后，才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无产阶级战士，还没有最后地确立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或者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一只脚跨进了党门，还有一只脚是站在门外的。这样的同志，经不经得起大风浪呢？假如不改造，当然是很困难的。可惜这样的同志是很不少的，甚至有不少作了地委委员的干部，思想上的毛病还是很大的。老实说，现在不是自己有无毛病的问题，而是毛病多少，严重程度如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主观主义等歪风在今天不占统治地位，这是对全党来说的，我们自己就不应原谅自己，以为自己只有残余的歪风，值不

得那样严重地重视与警惕；事实上对许多同志说来，就不只是残余，有的还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占了自己思想的统治地位。这些歪风在各个区域的表现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区域少一点，有的多一些，有的还是歪风占了统治地位，致使那个区域遭到失败（如山东的湖西地区）。总之，不管那个区域，那个同志，毛病都是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我们应细心来考察自己，认识自己，这是改造自己、健全自己的基础。

彭德怀同志说：没有自身参加整风的人，是不会认识整风的重要的。的确，上期党校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点。许多同志对于整风的认识，都是随着整风的逐步深入而逐步深刻起来的，直到他获得了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效果时，才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整风力量的伟大。

以上是说的整风的重要性。

整风既然这样重要，为什么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还没有整起来呢？我以为主要的是在领导上对整风的认识还很不够，所以抓得不紧，办法想得不多。客观上有无困难呢？当然有的，如战争环境、工作繁忙等等，但绝不是主要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整风的重要，就会想一切办法去克服困难。

在这次党校开学的同时，全太行区开始整风运动。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的毛病，认真地贯彻下去，完成整风运动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致象过去一样半途而废，首先是领导问题。领导上一定要抓得很紧，每个负责干部要亲身参加整风，认真突破一点，积累经验，以指导其他。同时，这次还采取了一些具体办法，如每个部门、每个机关，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大多数干部集中整风，这种办法比过去半日整风半日工作的办法要好，容易行的通，大家精神也能贯注些。照现状看来，只要不半途松弛，一定会做出成绩的。

领导上对整风是更注意了，但更重要的是每个同志要具有正确的整风态度。因此，根据上期党校的经验，向参加本期整风的同志提出下列几点意见：

第一，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好好地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过去有些同志到党校，目的只是想听听报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整风主要靠自己下苦功夫。要自己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负责的精神，才会胸怀坦白，才会有“脱裤子”的精神，也才会把思想作风整好。没有这种决心的人，或者只是企图“秘密”地改正错误，不肯露出“尾巴”的人，是绝对整不好的。上期党校有些同志就吃了这个亏，于党于个人都是无益有害的。

第二，每个同志还要具有帮助别人整风的勇气，这是我们对党，对同志应有的态度。我们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要反对那种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态度。上期党校的整风经验证明：冀南区有些同志毛病不少，但是由于他们有坦率的自我批评和批评的精神，所以收到很好的成绩；太行区有些同志就因为缺乏这种精神，收效不如冀南同志大。当然，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治病救人；对于别人的批评尤应虚心采纳，作为自己反省的参考，即使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点感想，也是可贵的。

第三，整风要与检查工作联系，这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检查工作，不是专门的总结工作，那是要在整风完成之后才能做的。现在整风中联系检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容易打通自己的思想。上期有些同志在开始时，专力于泛泛地检查工作，结果变成了躲风的幌子，这种毛病也是要预防的。

第四，整风中思想上是会感到有压力的。当着一个同志把真理与个人利害对立起来的时候，没有胸怀坦白“脱裤子”精神的时候，特别在别人的帮助与批评之下，自己总是畏首

畏尾的时候，一定会苦闷的。这时，我们就要好好地帮助他，使他认识整风不是对人而是对事，在真理面前屈服是可贵的精神，绝不是耻辱。要鼓励他把心中的一切讲出来，以便大家帮助。就是对于那种“两条心”的失足分子，也应好好地鼓励他向党坦白，使他懂得对党说了，党是一定对他宽大的。过去的整风经验证明：当着一个同志经过一番内心的斗争和别人帮助，最后讲出了一切之后，他的精神会马上愉快起来，自己整风更会积极，帮助别人也更会努力。对于这种同志，我们应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欢迎。

第五，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同志、对自己、对上级就应抱有这种态度。在整风期间，如果对北方局、对分局、对区党委有什么意见，都应该坦率提出。虽然在工作岗位上有上下级之分，但不应顾忌这种区别，无论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都要坦白直率，互相帮助。我们整风的小组长、学委负责人，都要从整风的积极分子中去选择，而不应拘泥于平时工作岗位的高低。

同志们！在党校本期开学的时候，我只提供这几点简单的意见作为大家的参考。同志们离开工作岗位。专门进行整风，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虽很紧，只要我们有改造自己、改造工作的决心，就一定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几个月之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对工作的态度，都会面目一新，党的事业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辑）

新四军政治部对整风善后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三月）

（一）自整风审干运动以来，各部队收获成绩颇大，但根据各方材料，在方式方法上有不少缺点，甚至个别错误。各种政治机关，组织与锄奸部门进行奸细的处理复审工作，确实弄错者予以平反，恢复名誉。确有政治问题者，一方面要审查其真实性，另方面要适当安插其工作，随时关顾其情绪。至于党籍问题，中央未指示前，一般保持，以贯彻党的宽大政策方针。同样要提高警惕性，不要置之不理的放任态度。对所谓政治问题未弄清而有嫌疑者，如无别的确实材料，则应在清查复审中依据其本人自传所述，作出一定的结论，待后继续考察。否则给他以嫌疑的鉴定是不好的，会影响他的工作情绪，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二）整风审干已告一段落的部队，望即进行整理经验教训，作出总结，并将总结和典型材料于四月底以前报告军政为要。

毛泽东致何凯丰、秦邦宪、郭沫若的信

（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

致何凯丰[①]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凯丰同志：

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一）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敬礼！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①何凯丰（一九〇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致秦邦宪[1]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博古同志：

此文[2]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3]上亦是如此），

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4〕三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　泽　东

八月三十一日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秦邦宪（一九〇七——一九四六），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

〔2〕指原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解放日报》社论草稿。

〔3〕指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延安《解放日报》就山西襄垣李来成建立新式家庭一事发表的社论，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4〕艾，指艾思奇。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副刊部部长。参见本书第112页注〔1〕。

陆，指陆定一。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参见本书第276页注〔1〕。

余，指余光生（一九〇六——一九七八），浙江镇海人。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致郭沫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①，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②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③，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　泽　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三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2〕太平军，是洪秀全等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一八五一年一月在广西金田村举行起义，先后转战桂、湘、鄂、赣、皖、苏、浙等十余省，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但是，太平军在占领的地方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许多错误。因此，它不能抵抗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于一八六四年遭到失败。此后它的余部又继续奋战了两年多。

〔3〕《反正前后》，是郭沫若一九二九年写的反映自己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生活经历的作品，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五八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六卷。

“七大”工作方针*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毛　泽　东

代表同志们！今天我们能够开一次很好的大会。这个时机很好，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党较之过去是空前地团结了。

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斗争，不讲很远的历史，单讲比较近一点的历史，也有一百多年了。从一八四〇年和英国人打仗的鸦片战争起到一九四五年，已经是一百零五年了。这一百多年中间，有很多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当着资产阶级刚刚开始产生，或者稍微长大一点，或者后头更长大一点的时候，当着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先锋队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还不高。但是资产阶级有各种优势，它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经验上，都占优势，它有政党，有口号，有自己奋斗的目标。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它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只是近二十几年，无产阶级才有了自己的政党、口号和奋斗目标。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人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起来一次，被打下去，再起来一次，又被打下去，这样的历史差不多有八十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历史，据说有五十万年。这五十万年之中，一段是野蛮史，一段是文明史。文明史只有五千年或者稍多一点。我们中国的历史算长得很，但也只有四千多年至五千年。从黄帝纪元算起到辛亥革命四千六百零九年，再加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四年，也只有四千六百四十三年。其实所谓黄帝那个时代，还不是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从奴隶社会算起，在中国据现有的可靠资料，应从商、周算起。文明社会五千年来，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时代，资本家撞了资本家，市场少了，有的抢到的地方广一些，有的抢到的地方狭一些，因此打起来。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的大战，是在一九一四年发生的。在座的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就会知道，记得此事。这次战争，刚才讲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到那种程度，就要出这种问题的。马克思

---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

主义者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这次战争是破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损害人类利益的战争，是抢夺市场的战争，这是它的消极方面。但是它也产生了积极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在很多国家中产生了共产党，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我们就是一个。跟着世界战争来了一个世界革命时期。首先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后来接着有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意大利革命，但是这些都被打垮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分裂的，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的觉悟也不够。胜利的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俄国人民已经得到了胜利。许多国家都有了共产党。我们党一九二一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日本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建立，印度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建立。东方几个大国如此，其他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共产党，大体上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一九一九年，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

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五四运动，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民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现在十四五岁的娃娃都晓得。所以我说，同志们，你们很幸福。我们那时候长得很大，还不知道天多少高，地多少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①。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②。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飞机从莫斯科到这里也不止一天吧，但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把俄国的革命党叫做过激党。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

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③，一个是

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④，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现在还是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五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五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是俄国共产党胜利后的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五年也是大不相同的二十五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在这二十五年之中，经过共产主义的小组，经过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壮大起来了。但中间被人家拦腰一枪打在地上，爬将起来又和他打，叫做土地革命。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主要是北伐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是国内战争，三七年至现在是八年抗日战争。七年加十年，再加上八年等于二十五年。现在的同志经历三个时期的不多，经历两个时期的那就很多。这是就我们全党讲。在座的代表中，这个统计还没有做，究竟是三朝元老多，还是两朝元老多，还是一朝的多，现在还不知道。这二十五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象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六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象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很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十年。打蒋介石是不错的，但是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所讲的。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三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在组织队伍，如何打法的问题上比较好一些，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当时党内的同志天南地北，除了几个被国民党悬赏几万元捉拿的人以外，大都不知道。可是意见可以相同，或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相同，或者在那样一个问题上相同。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一九二五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六十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⑥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

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俄国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⑥。搞军队也是国共合作。当时的主要干部，军队的与党的都有国共两党的人。第一军是蒋介石当军长，恩来同志是党代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六军党代表是林老。那个时候也就是联合政府，军队是政府的主要部分。所以联合政府以前就有过。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现在我们讲一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经同志们详细讨论过。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决议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修改发表。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象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

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翻四覆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联共党史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一九一七年就胜利了，三八年才由中央出版联共党史，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可见此事不易。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五年的历史都写进去，那就更不容易。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历史决议案，在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譬如提名字，提上一两个人的名字，那并不难，但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

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该这样。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我再讲一讲治病救人。治病救人是说，为了救人而去治病。人本来是好人，但病菌进去了，得了病，就请医生看一看，吃点药，治好了。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无论偏向哪一方面都不好，都应该改正。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象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过去常说，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

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但是，官长不能打士兵，这就是说，干部与党员要有正确的关系。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们要团结一致。

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这个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又如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的，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象我这里没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但今天要政治不要？要。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科学上说来他这话不对。他这话只有一个革命意义，即是反封建，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是皇帝一人专制。但原始共产社会有众人，没有政治。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三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因此，我们要经过战争，经过阶级斗争，要放手发展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

人世间的事总是不完全的，儿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孙子比儿子完全一些，后来居上。

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

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五次大会我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现在又出了一个“共产党”，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合了一些叛徒，组织成的一个“非常委员会”。他们已经发出了宣言，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出来后，敌人一定会利用它。但是我们不管他们利用不利用，还是作出了这个历史决议。我们要不听任何敌人的挑拨。党内也可能有一些有歪风的人进行挑拨。不要怕这些挑拨。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总起来说，我们党二十五年来有成绩，成绩也相当的大。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注　释

〔1〕一九〇二年——一九〇四年，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几次讲到过马克思。一九〇六年一月，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内容，还提到《资本论》。同年，他又在《民报》第五号上发表《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说社会主义“自马尔克（按即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

〔2〕一九一二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连载了施仁荣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文题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

〔3〕陈潭秋于一九三九年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二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秘密杀害。由于情况隔绝，这里还说他“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

〔4〕指一九四五年四月董必武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5〕林老，即林伯渠。

〔6〕三十六天罡星，道家说，北斗丛星中，有三十六个天罡星。《水浒传》中把梁山伯的前三十六名头领称为三十六天罡星。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三十六名委员。

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陈饶：

二十七日电悉。

（一）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已经是非常精明非常广泛使用的政策是国民党目前反对我们的主要斗争方式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并还有成千的特务与自首分子派进各根据地来如果我们不能现在学会反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的全部艺术我们一定失败无疑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必须使全党一切忠实党员都学会特务斗争但你们今天还绝对不宜提出这个任务。

（二）目前我们对国民党特务还只能防御不能进攻韩德勤在苏北的武装力量虽已不值得重视但以这种武装来进行与掩护其特务政策的执行即对我们是严重的危害韩武装所经过与驻扎之处可威逼我之乡保区长及其他党员自首接受韩之特务任务你们必须采取办法来防止这点并审查那些地方的党员尤其被韩捕后释放之党员。

（三）为了对付国民党之特务政策我们对俘虏来之国民党军官令其自首（用说服利诱与威逼等办法）使其作我之情报特务是允许的必要的。这与过去再捉再放的俘虏政策并不抵触，在原则上说，对顽方一切军官及行政党务人员都可以用各种办法使其为我服务，为我作情报，但采用强迫威逼自首的办法则须选择对象，选择那些在他不肯自首为我作事时，我能长期拘押或秘密枪决的人威逼之，不要对一切人都用威逼办法，可多采用说服利诱办法，或用公布他私人秘密等办法威逼之。

（四）特务斗争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细密的科学须要详细研究和学习，饶漱石在外国，当大体知道这种斗争，其方法是极复杂的，你们实事求是的去试办可也。

刘 少 奇

六月二十九日

抢救失足者

——康生在中央直属大会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

同志们！

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正当着国民党以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三个集团军的主力，以暂二十五师、六十一师、二十八师、五十三师、新三十七师、第八师、一百六十五师、新骑二师、新二十七师、一百六十七师、七十八师、新二十四师、新二十六师、一百九十一师，及七个保安团、一个炮兵旅、一个重炮营、作为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日寇第五纵队的国特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国民党为了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不惜将第一军、第九十军等河防部队调离河防，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内战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的会议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局中间来开的。如果一个普通的政党，普通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吓倒；如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看到国民党撤退河防，发动内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但我们却还是照常开会，更加积极的工作、学习、整顿三风、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是边区人民，我们坚信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无论国民党想如何挑动内战，我们的党和军队是有力量打破和粉碎他们这种祸国殃民的阴谋。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我们不要忘掉一九四二年五月时局紧张之时，于炳然特务已准备好人，准备好枪，企图配合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军队来破坏我们，虽然于炳然这个阴谋被我们破获了，但是这个教训我们是不应忘记的。

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分子，他们不去破坏敌人，而是与敌探一起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和华中、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他们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国青年，而是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拉到特务的罪恶泥坑中去为日寇的第五纵队服务。因此从四月十日起，我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井。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人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号召，起来控诉日寇与国民党杀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不管他们其中尚有许多人未彻底觉悟，但我们应该欢迎他们这种进步，因为他们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可能，使我们可能引导他们跳出罪恶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

几百个失足青年一致起来感谢共产党的拯救，控诉国民党的罪恶，这就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与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作了一个很好的对照，更加证明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是祸国殃民杀

害青年的政策。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则是救国救民挽救青年的政策。你们亲眼看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边区，破坏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共产党的罪恶，但必须晓得，他们的这些罪恶是与日寇勾结在一起的。大家晓得王实味是托派汉奸，但更要晓得他同时也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王实味与国特分子纠缠在一起呢？因为他一方面为日寇服务，同时又为国民党服务，他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当我们与王实味斗争时，为什么一些敌探国特不惜揭破了"左倾"面目，出来为王实味打抱不平呢？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有共同利害的关系。为什么国民党为了声援一个托匪汉奸，动员了他们大后方所有的报纸杂志向共产党进攻呢？因为他们的特务机关实质上就是日寇第五纵队的组织，敌探王实味也正是国民党的特务人员。

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淮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肖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要将这些杂种特务机械的划分是不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并不以此为耻。如日寇密使吴开先公开作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敌探托匪张涤非公开的作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主任，就是铁的证据。因为敌探国特在反共的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个一致的目标之下，他们彼此结成"反共同盟"，并不惜蒙蔽一些青年去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因此我们应该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全体失足分子，起来反对国民党这种叛国殃民的滔天罪恶。

另一方面，你们也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它将几百个陷入特务泥坑的青年，从敌人的第五纵队里挽救出来，三个月以来，全体党员们执行党的宽大政策，以坦白运动、劝说运动以及各种方法，去帮助那些失足的人觉悟，将几百个失足的青年从罪恶中挽救出来。同志们！这是一种光荣神圣的事业，是改造人类的事业。许多改过自新的人说："共产党是他们的重生父母"，从这些感激的声音中，证明了共产党宽大政策的伟大，党的集体力量才是真正改造灵魂的工程师。

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不同的政策，摆在所有失足者的面前，何去？何从？这是很明显的。因此四百五十个人向党自新改过，正是这两种政策对照的结果，党的宽大政策胜利的结果。但是不是所有失足的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呢？不，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除了一部分少数甘心为敌人作第五纵队的人们外，其中大多数是在他们的脑子中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过去想不通，我们尚有时间等待，但是现在是军事时期，我们应该赶快的促使他们觉悟，今天开会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那些问题他们没有解决呢？

首先是对于国民党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幻想，对于三民主义认识的模糊，以为国民党"尚可依靠"的心理，以及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蒙蔽等等问题。

有些青年人，他们加入国民党，但他们根本不晓得国民党的历史，他们只看见"七七"以后，国民党抗战了，就以为国民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有一个人说："他过去认为国民党是伟大的，仅仅当国民党撤退河防，进攻边区的时候，才把这种幻想打破了。"这种看法，是一种进步，很可敬。但他却是一个长期被骗的人，又很可怜。不错，在西安事变时，共产党力主和平，释放了蒋介石，铺平了抗日的道路，使"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被迫抗战了。这是事实，这也正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基础。但请大家想一想，谁人在大革命的时候叛变了革命，投降了帝国主义？谁人进行了十年"剿共"内战，屠杀了无数中国人民，将日

寇引到中国来呢？谁人实行不抵抗主义，将东三省双手送给日本，使三千五百万同胞变成亡国奴呢？谁人从"七七"以来实行片面抗战，压制民众抗日自由，使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与中国的广大领土沦于日寇之手呢？谁人掌握了全国的兵力、民力、财力，取得了全世界同盟国的帮助，仅仅面对着日寇十几个师团（二十五万敌军，不到侵华敌军的一半），实行抗而不战，不游不击呢？三十三个高级将官叛国投敌，是谁领导的军队呢？谁下命令消灭抗日救国的新四军？谁人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下狱？谁人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与日本帝国主义一致的来进行反共呢？所有这些，这都不是国民党做的吗？不都是蒋介石做的吗？难道这就叫做抗日的党？难道所谓抗日的领袖就是这样吗？他们过去能够做出这样多的坏事，现在撤退河防进攻边区，这就不是奇怪的事。他们今天放弃河防，谁能保证他明天不撤退全部国防呢？这种投降危险，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是存在着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坚持抗战团结，坚持自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力求在抗战建国中与国民党合作。过去为顾全抗日团结的大局，对上述问题不愿多所指摘，可是一些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一些特务分子、破坏分子，你们自己为什么那样糊涂呢？难道你们就连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吗？你们自己既不肯说，我们就不能不说，因为蒙蔽人民欺骗青年是犯罪的。

有些国民党人说："国民党是救国的，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但请你们大家想一想，什么人帮助敌人灭亡中国呢？伪政府主席兼伪行政院长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不就是国民党的付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吗？伪政府行政院付院长兼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不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吗？伪政府的立法院长兼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不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铁道部长吗？伪政府的内政部长陈群，不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的内政部次长吗？伪政府的立法院付院长谬斌，不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吗？伪政府监察院付院长顾忠琛，不就是国民党的监察委员吗？伪政府的中央政务委员会委员陈壁君，不就是国民党的察监委员吗？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不就是国民党的监察委员、国民革命军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及河北省政府主席吗？这些叛国投敌的国民党要人们，我们一时是数不清的，据不完全的统计，仅仅是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就有二十个，仅仅是国民政府党政要人，又有二十四个。总而言之，所有伪政权的汉奸分子，都是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党国要人，所有伪军的汉奸头子，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军政要人。国民党的首脑内部和领导机关，出了这样多的汉奸、国贼、叛徒、败类，请你们想想，他们到底还是救国呢？还是叛国呢？到底是拯救民族呢？还是叛变民族呢？这些大汉奸们，帮助敌人危害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侮辱了中华民族的光荣，破坏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丧失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这真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更是国民党的叛变民族的罪恶。国民党内出了这么多的国贼败类，我们共产党还没有提出取消国民党的要求，但是，为什么那些特务们，那些国民党党员们，三青团团员们，你们自己不去反省一下呢？你们只会毫无羞耻的说："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却不想一想，叛变民族、叛变国家的，尽是你们国民党的那些党国要人啊！

有的人看见报纸上说，蒋介石是同盟国的四大领袖之一，他们听说，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于是他觉得好似蒋介石真正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甚至有的人把蒋介石称为"神圣的"委员长。可是不幸得很，这个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四大领袖之一，他并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是在中国实行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他在大革命时代，首先叛变革命，投降帝国主义。他是十年剿共内战的祸首，延安干部子弟学校许多

无父无母的孩子们，是谁将他们父母杀死了呢？这笔血债，是记在蒋介石的历史帐上的。谁人断送了东三省？谁人主张签定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谁人压制人民的抗日自由，使中国的广大领土沦入敌人之手？难道这不都是蒋介石亲手造成的吗？三十三个将领叛国投敌，这不都是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吗？难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应该负责吗？为什么他对于这些叛国投敌的汉奸，毫不加以处罚呢？谁人面对着不到一半的敌军，不敢动一动、游一游、击一击呢？谁人欢迎日寇的"劝降大使"吴开先到重庆呢？谁人让汉奸吴开先作国民党中央委员呢？谁人将公开的日本侦探陶希圣当做自己的亲信人呢？这不就是那个所谓四大领袖之一、国民党总裁、军委会的蒋委员长吗？大后方谁人不知，国民党员那个不晓，所谓蒋介石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就是叛国投敌的日本侦探汉奸陶希圣校阅的。在这本书上，他反对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提倡法西斯主义，极力反对英美同盟国，对日寇却非常客气。他说中国已经"自由独立"了，既然中国已经得到了自由独立，那末抗战还有什么需要呢？大概日本也成了他的一家人了，剩下的只有是解放共产党的问题。这一本汉奸理论的书籍，是叛国投敌的汉奸们的理论根据。如果出于一个汉奸手笔，原不奇怪，但是，这个"神圣的"蒋委员长，却签了名说是他自己写的，并请汉奸陶希圣代为校阅的。奇怪得很！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呢？这本书，如果在全体国民党员中进行讨论，我敢说越讨论汪精卫就越多，在军队里讨论，越讨论庞炳勋就越多。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之命运》出版不久，蒋介石就撤退河防军队，企图进攻边区。有的人这样说："这件事蒋介石或者不晓得。"让那些混蛋们这样想去吧！事实告诉我们，两次反共高潮，没有一件不是蒋介石亲手造成的。明白的说吧！皖南事变并不是什么白崇禧、何应钦捣鬼，而是蒋介石亲手造成的。这次进攻边区，也不是胡宗南的意志，而是蒋介石亲自指挥部署的。请大家想一想，日寇汪逆要剿灭共产党，蒋介石也动员大军要剿灭共产党，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那里？难道这就叫作四大领袖之一吗？到底是反法西斯同盟的四大领袖之一呢，还是要与希、墨、东条姘成法西斯主义的四大"领袖"之一呢？难道这就叫"神圣的"委员长吗？在我看，要换一个字，仅仅是一个字，即是将"神圣的"委员长，换为"希圣的"委员长（陶希圣的）。那就很恰当了。

有的人这样说：三民主义是科学的民族的，有的糊涂共产党员，也以为好似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毫无区别的。固然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三民主义，是好的、是进步的，我们是以这种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但是，以马列主义的科学观点来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是有基本的原则的区别的。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是二元论的，其中包含显明的唯心主义。他的民族主义，是不彻底的；他的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他的民生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所以列宁一面赞扬孙中山，一面又说孙中山思想存在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不管他的本质上也是利用苏联、利用共产党、利用工农，但他在中国革命是起了进步的作用，他是联共而不是反共的。这里说明一个真正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人，他应是同情共产党而不是反对共产党，孙夫人就是一个同情共产党人的代表，可是这一个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孙夫人，却长期的被监视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之下，一批"国特"去监视他的"国母"，而自己还是说信仰三民主义，这就是一个大笑话。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是披着孙中山的外衣，暗藏着希特勒的实质。蒋介石已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变为殖民地式的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请大家去看一看，在《中国之命运》上

的民族主义是什么？这里，蒋介石一方面将希特勒的“民族血统论”搬来，说中华族民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否认了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另方面将日本法西斯“同文同种”的“民族融合论”搬来，说“中华民族因其宗支不断的融和而其人口逐渐繁殖”，制定了投降日寇的理论根据。说：“现在不平等条约既已撤废，租界与外国驻兵区域不复存在”，“中国已得到独立自由。”可是，日寇的三十六个师团侵入我们的国土，也算作“外国驻兵区域不复存在”吗？我们广大的领土沦陷于日寇之手，一万万以上的同胞作了亡国奴，也算作“得到了独立自由”吗？这大概就是蒋介石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吧！现在英美已把不平等条约取消了，于是乎蒋介石就说：“我的上帝！”“我的奋斗！”戴季陶就说：“阿弥陀佛！”一切“万事大吉”，中国已得到自由独立了，日本强盗呢？“其宗支不断融和”了。这就是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在《中国之命运》上民权主义是什么？这里说中国老百姓的自由太多了，现在不是实行“民治”，而是实行“法治”，什么是“法治”？“法治”者，法西斯主义之“全民政治”也。这就是蒋介石的民权主义。至于民生主义如何呢？最好拿大后方实际情况，拿人民实际生活来看一看，大后方的人民生活，可以说是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四民主义，那就是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上所说的：“民情隔阂，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变蜂起。”这就是蒋介石的民生主义。以上就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无怪乎在陕西一个军官看了《中国之命运》后说：“国破家亡，之乎也者，命运大危，运气不佳”。呜呼！中国之命运！

有些人他们很早就来到延安，他们脑子里还以为大后方人民的生活会比边区好。也有的人以为国民党的前途虽不可测，但是现在还是可以依靠的。因此，我想略略说一个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情况，到底已经到了什么样子？［编者：下面几段删略］。

………

我们的宽大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是有镇压政策的另一方面的。因此，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坚决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我们希望未坦白的人，对于国民党的问题，对于共产党的问题，对于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问题，都要仔细的想一想。在这里我们送给他们一付对联：“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选自解放出版社的小册子）

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华中局：

我们意见，你们应即在军部与二师一部附近进行一般的清查特务分子的运动（公开名义为审查干部），以便能在华中突破一点，推动全局。除开严格按照中央清查特务九条方针的决定进行而外，你们应经过各机关、学校或农村中可靠的领导核心，用细密调查研究工作，清查出几个特务分子，并用宽大政策说服这几个特务分子，然后召集几百人、上千人的坦白大会，令这几个被说服的特务分子当众报告自己的特务机关，活动情形及罪恶等，作为坦白示范。在这些人报告后，即组织所有积极分子，向一切有嫌疑的人进行劝说运动，推动他们出来继续坦白。如此的可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的清查运动，即可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并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为了这个运动的成功，必须注意下列各项：

（一）在坦白大会之前，必须有慎重的严密的准备，除开调查研究一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单之外，并须动员组织一切积极分子，秘密监视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论行动，在大会上察言观色；在他恐慌动摇到极度时，即找紧他劝说，督促他坦白自己并坦白别人。

（二）必须在各机关学校农村组织自卫军，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规定严格的生活起居制度。

（三）必须在大会上宣布党对于悔过的特务分子之宽大政策并须真实的执行宽大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为了必要逮捕起来的特务分子一经坦白之后立即释放，坦白分子的党籍及工作地位除最机要在外，一般不变动，只有坚持宽大政策，才能使罪恶严重的特务敢于坦白。

（四）在群众反特务的热情已经高度发动并清出大批特务之后，即须防止群众中的左倾及坏分子故意左倾，打骂人，诬陷好人等，而给以适时适当的纠正，并须防止坦白分子的自杀。

（五）要在运动过程中及时的教育积极分子与群众，随时总结经验，写成教训，并须特别注意利用已经坦白的特务分子去劝说别人坦白，这可收到极大的效果。

上述各项，望予注意，并望随时将进行情形申告。

中央书记处

十一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少捉不杀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份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份子总数百分之五。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过上级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枪杀外，一切特务份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因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份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关于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之处理，有太行军区命令一件发供你们参考。

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对坦白分子之处理，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绝不要将所有坦白了的人都认为是特务分子。因为在坦白运动中固然有少数重要特务分子，常常用假坦白的手段来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警惕；但又有很多坦白分子，按其性质，并不是特务问题，他们或因问题复杂，一时难弄清楚，或因惧怕镇压，或逼于群众压力，或由于逼供信的错误，或由于特务的诬陷，而暂时承认自己是特务分子，这种事实，在延安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区别，笼统的将所有坦白分子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就会犯严重错误。

（二）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加入了特务组织，进行过特务活动，保持着特务联系，以特务工作为职业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被迫首要与胁从之别。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是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是自首后写过反共文件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没有实行但也没有向党报告的，这一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是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公道团、或其他党派，其中许多人加入我党后没有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亦占颇大数目。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其中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利用，有的因为半条心作了特务的工具。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欺骗组织、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甚至被误认为特务。第六类是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实是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以上六类，是根据延安坦白分子的情况，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其准确性尚待今后甄别工作来证实。但职业特务是极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种估计大致合乎事实。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因此你们可以将这六类分析，当作一个方法，去细心分析你们那里的人，遇有不是特务而被误认为是特务者，必须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要教育同志认清从党内清出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正在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特务已经清出之后，由领导同志先向高级干部解释明白，对于所有坦白份子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而加以平反。

（三）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这里要注意不要将所有或多数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分子或嫌疑分子，延安许多机关在初步复查工作中已证明新知识份子大部份是好的，其中有政治问题的（轻重不等）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个经验值得注

意。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四）关于坦白分子的党籍问题，为了顺利的展开坦白运动，目前不要宣布停止，即对那些杀过我们人的和假坦白的人，暂时不明白宣布，但你们绝不要通过什么正式决议和文件，中央局及分局的负责同志也不要肯定的担保党籍，因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到解决的时期。对于不愿真正坦白的分子，主要的是依靠调查研究，搜集证据与宽大政策感化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促其觉悟，一般的不要采取逮捕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实材料与真凭实据，即使逮捕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目前凡在开展了反奸斗争的地区，右的熟视无睹思想，已经克服，但有些地区左的特务如麻的错误，又生长起来。太行军区发生一二九师之司令部、通讯队、参训队、侦察队、印刷厂、生产部各有反革命支部之错误认识。集总直属部门发生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认为电台人员均是特务，军工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认为总直有一个总的反革命组织，有的人供称去年七月间特务在晋冀豫边府所在地开过四十三人的高级特务会议，并涉及许多高级干部。冀南左的毛病更加厉害。冀察晋平山县以简单的逮捕方法代替调查研究，在坦白大会上使用斗争镇压方法，使犯错误的人，不敢坦白，使特务乘机挑拨。所有这些现象，证明逼供信左的错误，在各地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特别是太行军区的现象，证明那里存在着严重的逼供信错误，事实上特务绝不会如此之多，如此猖獗，那些供词是决不可信的。如果是，则党与军队政权在严重环境下尚能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左的偏向，主要是由于特务如麻的错误思想，夸大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只信口供，不重证据，只找特务，不辨好人等等原因而来的。如果不彻底纠正，便会冤枉同志，孤立自己，不仅不能有效的反对特务，反会在党内造成混乱现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使党遭受重大损失。

二、逼供信错误，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某些机关、学校、部队、农村、也严重的。发生过根据三月间西北局高干会检讨结果，看出反奸斗争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犯过许多严重错误，最主要的是捉多了人，逼死了人，冤枉了人，损伤了人。有的地方和军队将所有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有的学校将整个班的学生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都戴上特务帽子，有的在一个整风班内使用二十四种肉刑及变相肉刑，有的农村将大多数居民都坦白成特务，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中央宽大政策九条方针宣传不够、反逼供信错误不深入，不正确估计敌我力量，不了解特务暗藏在我党我军的组织内是极少数，不知将反对特务与保护好人统一起来，不重调查研究，不重证据，只凭口供，不精细的进行个别研究分清是非轻重，而到处采用抢救运动的简单方式，不相信最大多数的新知识分子是好的，而有的地方对他们存在着宗派主义报复主义的倾向等等。因此西北局高干会进行了反逼供信主观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决定开展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成为现阶段的中心工作，使被特务陷害或被弄错的人，得到平反，去掉特务帽子，恢复名誉；使真正的失足者，得到结论，去掉疑虑，为我们忠实服务；使假坦白及未坦白的顽固特务，孤立起来，无法进行挑拨，混水摸鱼。这样，党便更能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更能有效的反对特务。我们已将这次高干会的总结，印成小册子，送至晋西北速转给你们，望北方局及北分局派人去取，经北局送至山东

及华中去。

三、反对逼供信错误，中央在屡次指示中都已指出，目前再提起各地注意者，有以下问题：

甲、应清楚认识，任何地方只要群众反奸运动坦白运动开展起来，逼供信的左的毛病，就会随之而来，绝不要以为自己那里不会产生逼供信错误，应该肯定这种偏向在各地已经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因此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彻底检查，实事求是的采取有效的方法，坚决的克服逼供信左的错误，并在工作中时时注意防止，稍一放松，就会出乱子。

乙、在已经进行过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反奸运动的地区（如集总直属太行军区等地），应适当的将突破工作坦白大会，暂时停止，使干部的脑子冷静一下，好好的研究中央历次反奸指示，深刻的检讨工作经验，将思想酝酿成熟，根据当地情况进行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用研究典型取得经验的方法，有步骤有阵地的前进。同时教育干部了解一个人如不是特务而戴上一个特务帽子，对他精神上是一个重大打击，甚至长期不能恢复，个别人还有可能走上仇恨党的道路。因此，没有真凭实据的人，绝不能肯定他一定是特务。一些弄错的受冤枉的人，必须加以平反，去掉特务帽子，恢复他的名誉地位和工作，而且在群众中公布。

丙、在斗争刚刚开始的地方，必须使干部深刻的了解和掌握中央的方针，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正确的估计敌人力量，相信自己的干部，注意调查研究依靠真凭实据，千万不能轻信口供，即使许多人的口供大致相同，也不要信以为实。当群众性的坦白运动起来时，要使干部懂得坦白运动中的群众压力，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的。在群众威力下，即使不打不骂不逼不斗，都可能使青年人在沉重的神经刺激下，自己戴上帽子。因此群众性的坦白大会必须慎重使用，而坦白运动坦白大会的方式，不要采取抢救运动的方式，不要采取尖锐斗争反特务的方式，而采取整风学习自我反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坦白生活的、道德的、工作的、思想的、政治的、党派的、特务的各种问题。不但反省自己，也允许批评别人批评上级，对上级的正确批评，领导人要诚恳接受，不能给以打击，不正确批评，也不忙于纠正，在适当时期加以教育解释。即使坦白出特务问题，如果没有确实证据，或有证据而无紧急处理之必要时，亦可暂时不加深追。这样便于进行调查研究搜集证据，便于启发坦白人的自觉性，便于解释宽大政策，进行争取工作，不致造成对立形势，使坦白者容易向党靠拢，容易弄清是非、弄清问题。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经验，他们在四百五十个参加整风的干部中，坦白出日特五名，国特四名，嫌疑分子八名，托派二名，国民党十三名，其他党派十二名，道会五十三名，贪污一百三十四名，隐瞒党的八十四名，不道德的二十八名，动摇的六名，隐瞒学历的五名，隐瞒成分的九名等等。这些数目字的真实程度，其中尚可能互有出入，但这种方法是很好的，今后各地的坦白运动应采取这种方式。

四、经常的将你们反奸斗争的情况，工作中好的经验，坏的偏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告诉我们。

中央关于审干反奸问题给各地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鉴于内战时期的肃反教训，抗战初期某些地区乱捉乱杀的错误，鉴于去年延安抢救运动时在实行正确路线中发生的过火行动，因此各地对于审干反奸工作，要采取谨慎态度。澜涛来此，知分局同志能掌握此种方针，这是很好的。目前工作情况如何，望你们将成绩缺点经验教训电告我们。为使正确方针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不致在运动开展中发生毛病，特将下列问题提起你们注意：

一、分局应速将九条方针的条文、中央今年几次反奸指示、西北局高干会反奸报告、中央社会部审讯条例等文件，多多印发给各地区、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的干部和党员，配合晋察冀抗战初期的反奸教训及这次工作中的经验，进行广泛深刻的教育，使党员干部搞通思想，掌稳政策，这是一切工作的前提。这种宣传教育工作，应耐心经常的进行，采取整风的方法研究文件，以民主的方法吸取群众的意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工作，务使九条方针的每一条都能深入到群众中，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两条，两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凡无调查研究或虽有而是表面的非真凭实据的，一概不能误认为特务，此点须使一切干部充分认识清楚。

二、在党校和分局、军区、行署各机关中审查干部，更要特别慎重，不要将反对公开的国民党特务（如×××之流）的方法，使用于党内审查干部，也不要将反对公开的国民党党部的方法，使用于三三制政权中的非党人士，因此党校及各机关的审干反奸工作，不要采取单纯的反特务斗争的方式（这样很容易产生简单化的毛病），而应采取整风学习，自我反省，坦白运动的党内方式。行政人员训练班不要发展为反省机关（这样很容易产生扩大化的毛病），而应成为一种整风学习的教育组织。一切机关、部队、学校和地区，不要将审干反奸与坦白运动分离起来，而应将坦白运动当作审干反奸的主要形式，以党内整风反省的姿态，达到坦白生活、道德、工作、思想、政治、党派、变节、特务等各种党内党外问题，分局务将这个方针继续贯彻下去，对于一切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须随时注意。

三、在坦白运动中，应提倡说老实话，宣传“是则是非则非”的口号，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干部中强迫坦白，指名坦白，过火要求，不坦白特务不过瘾的左倾情绪，同时反对坦白者哗众取宠，混编乱造，夸大其词。对逼供信偏向，及时注意，即使个别现象也不要轻易放松。对于坦白了特务和变节的分子，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同志的奸计，混乱了自己的队伍。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逼供信错误，可以有意识的放松一时期，或暂时按他所讲的作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秘密侦查，这样如系好人则便于团结，如系坏人则便于麻痹。对于一切坦白材料和口供，绝不可轻信，必须用周密的调查研究具体分析的方

法，分清其中有真有假有冤枉有夸大各种不同的性质。因此，一切被审查的人，无论他坦白党内党外问题，均应进行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这是审干反奸一个最重要的关节。你们已经进行过坦白运动的机关学校及进行过反国特群众运动的地方是否已经开始。

四、经常检查和警惕有无肉刑与变相肉刑，车轮战、打骂、捆吊、污辱等等犯法行为发生，实行逮捕人犯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并不得超过嫌疑分子百分之三的制度，根据具体情况订立反奸纪律，在群众中公布。

五、随时防止和纠正老的工农干部对新的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与报复情绪，正确估计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特务只是极少数，不要将他们的思想问题与特务问题混为一谈。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军队中更要极端严重的注意。许多知识分子从抗战以来，在军队中在战争的环境内出生入死多年，当审查他们时，绝不要忘掉这个重要的根据。对他们的方针是：既要详细审查，又须关心爱护，二者必须统一。

对太行生产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

彭　德　怀

北局对华北各根据地发出生产号召，太行因连年灾荒，敌后斗争又须长期坚持，在你们领导下重视生产已引起注意，这是很好的。为着你们更顺利进行增产，特补充以下意见。

（一）太行区从三九年军队机关即开始生产蔬菜养猪等，四一年后已有相当大部分蔬菜自给，唯粮食生产，直至去年才从特团开始，在生产长期过程中没有发展成为普遍群众生产运动。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与粗枝大叶毛病外，我认为在军队机关方面还犯了严重平均主义。譬如杨立三领导的后勤部，历来生产是很好的，因此他们的给养也比较其他部门要好些，许多同志批评杨为本位主义。谢汉初除参加集体生产外，私人还喂了几只鸡，斥为资本主义思想。这样不恰当的批评必然会阻碍集体与个人生产的发动。去年后勤某单位伙伕利用午睡时间生产自制冬衣，不要公家发给（立三谈），这是军队中的劳动英雄，应当表扬，使之成为推动军队生产运动的模范例子。因为我们受着历史上党内反资本主义的束缚与错误了解，忽视了群众中生产的创造性，放过了这样的典型人物。只有纠正过去的错误思想，抓住典型，才能推动全体。生产热情不仅要重视军队机关集体生产，而且要发动个人生产，从生产中得来的私人积蓄不仅不应反对，而且是允许的。某一单位生产好吃得好，应当奖励，只有那些好吃懒做的平产分子，才应受到批评与指责。

（二）在基本根据地内，群众团体主要经常工作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其次才是适合具体情况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注意培养劳动英雄，使之成为新的群众领袖，如果没有千百个群众公认的劳动英雄，想要把生产组织起来是不可能的。吴满有不仅为自己增产改善了生活，而且帮助了本村与邻村群众组织变工队（太行山叫互助小组），建立模范乡村，帮助别人增产与改善了别人生活。陕北已有数百个这样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劳动英雄，因此使生产运动普遍化与实际化了，这一宝贵经验敌后根据地应普遍采用。

（三）军队机关应利冬寒进行个人手工生产（做鞋袜纺织及其他手工），并须给以一定工资与本钱。

（四）公营商店应坚持过去四大原则：

（1）稳定与巩固本位币。

（2）调济市场。

（3）刺激生产（帮助生产者原料工具销售，不以赚钱为目的）。

（4）改善人民生活。

南泥湾驻军展览生产成绩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南泥湾驻军自十九日起，举行首届生产展览会。各部送来的展览品共达五百件。数日来，附近驻军各部都组织了代表队，纷纷前来参观，代表们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人人欢笑，相信部队首长领导的正确，并欣然表示明年愿以更大的努力从事生产。同时，老乡们也踊跃的来参观，有的是从街上抱着娃娃的妇女，也有从数里路以外赶来的老农。展览会的第三天，二乡一大队自卫军队列整齐的高擎着红缨枪前来参观，当他们从展览会的大门通过时，个个高仰着头，对用包谷合成的“首届农展”，及以农产品缀成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称赞不止。二门上高悬着边府办公厅赠送的“劳动创造一切”的横匾。在两间大厅内陈列着各种展品，第一室里的墙上，挂满了延属地委专署等机关送来的锦旗及名种统计图表，从这些数目字里，可以看到该地驻军在执行“南泥湾政策”中，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亚洲”部×连被选为全体驻军的代表连，农业生产方面：共种地一、七二二亩，收获粮食四四三石，菜蔬七三、八二〇斤，谷草糜草等二十三万斤，总共从开荒到秋收费时六十八天，用人工四千九百个。在牧畜方面，有猪八十六只、牛四头、羊八十八只、马三匹、驴、骡各一、鸡鸭七十三只、兔子五十八只。在该连解决困难项下，标着七十四万五千零九十元的数字。再“欧洲”部×连的菜蔬收获量共有二十万零五百七十六斤，为全体驻军之冠。“非洲”部×连麻的生产成绩卓著，今年共种九十亩，收麻子二十七石。除温够全年自给外，多下的能顶四十石粮食，麻除供全连全年的绳子等用外，每人能打两双草鞋。在实物的展览品中，有结着四种包谷的长包谷杆，有二斤五两重的洋芋，有十三种选出的谷穗及数十种种籽，其中最长的种绳头谷长达一尺九寸五。卫生部的白谷穗，颗粒大，每亩能打六斗以上的粗粮，最长的一穗有一尺八寸长。再在种籽中，引人注意的为三亩地打了十石的稻子，苏副旅长亲自种的蛾眉豆等。在另一角里有一株为“澳洲”部×连最初试种的棉花，每亩能收净花二十五斤。从第一室到第二室的路上，排列着各种自己动手建造的生产工具，具有从开荒到粮食入仓整个过程中的全套。镢头、播种机、锄头、镰刀、連枷、木叉、木锨、枷篮、筛子、风车，样样齐全。而在手工业方面，也发挥了最大的创造性。最显著的就是今年全部的毛呢军服，从羊毛、毛绳、布、染色、衣服等全部自制的过程，明显的摆在眼前。手工捻线最好的为一两七十六丈长。“美洲”部许明兴同志研究出织布机，但最初只有刘青有同志会织，在大家热心学习下，不到一个月，调来毛工厂的同志都学会了。刘福生同志又研究出染布的方法，用边区山沟里非常多的黑格蓝（老百姓称为黑刺）树根作染料，既省钱，又美观。再有×团战士同志自己解决学习工具的创造，桦树皮制的学习本子，和桦树烧后制成的黑墨，很为实用。在文化娱乐工具方面，有剧团同志们自己造的胡琴、三弦等，及×部一个同志造的大众琴。所有这一切，在表露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景象。一个今年九月才入伍的新战士看完后，把笔记本子珍重的收起来，笑容满面的走出展览室。当征求意见的同志问他看了觉得怎样时，他响亮而自信地说：“太好了，我明年要努力生产，创出更多的更好的展览品来。”现展览会已仓促结束，赶着参加全边区的总展，各种展品已全部运延。

（原载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更向前一步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直属生产运动总结会上的结论摘要

李富春

一　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的基本总结

中直各个机关学校在去年做了三件大事，都有很大成绩，这就是整风学习，审查干部和生产运动。这三件事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风运动给生产运动做了思想准备，而生产成绩又作为整风与审干的物质条件。

全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运动，还是一九三九年在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号召下开始的，中直的生产也于这年开始。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走着弯曲的“之”字路。在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〇年的二年中，是以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方针，这是毛主席的方针，正确的方针，也是曾经得到很大成绩的。但是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因为在执行这一方针的第一阶段中间发生了一些毛病与缺点，当时不了解应当如何深入检查，总结经验，改正缺点来贯彻正确的方针，反而因噎废食，放弃以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方针，代之以依少数人生产，并以商业为主的方针，结果走了两年的错路。直到一九四二年冬季，经过毛主席总结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批判了过去错误，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才又把第一阶段的正确方针重新确认，并且发展起来。这样我们的生产运动就在去年一年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收到了很大的成绩。

去年生产运动的第一个成绩，是作到了“丰衣足食”，减少了财政负担，建立了“革命家务的基础”。

去年一年中直的生产总值折合小米三万一十石，平均每人有三石。中直是劳动力最少的，还得着这样的成绩，其中各机关学校公共生产占百分之七十三，个人生产占百分之十，管理局经建处生产占百分之十七。从生产的性质看，则农业和畜牧收获占百分之六十，手工业作坊收获占百分之十六，商业收获占百分之二十，业余社会劳动（泥工土工）收获占百分之四。由此可见，去年的生产是掌握了广大群众自己动手与农业第一的方针的。这样就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把丰衣足食的口号变成了实际。一九四三年除个别单位外，最大多数的单位在物质生活上相继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标准，而且去年中直的经费支出除粮食被服两项仍由政府支给外，平均计算有百分之六十是自给的，政府发的只占百分之四十。这就是说，另一方面把“建立革命家务”的口号也成为实际。我们的生产基础比一九四三年扩大了，在农业方面，我们现有农场十三个，菜园二十九个，耕牛五十头，土地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亩；在畜牧业方面，猪除了去年吃的现在还存有一千八百五十只，五个人养一只猪的任务

达到了，羊有二千零九十只，牛有一百八十四头；在手工作坊方面，现有豆腐房十五个，粉房四个，酱园五个，磨坊十九个，挂面房三个，杀房两个，酒房五个，木工厂七个，铁炉三个，焊工厂三个，马掌铺一个，纸厂一个，毛织厂一个，铁丝厂一个，油房一个，瓷窑一个，机器修理厂一个，石灰窑六个，纸烟厂一个；在商业方面，共有资金计值一千六百六十石小米。此外至去年底止，各单位还存有现值八千石小米的物资。

去年生产运动的第二个成绩，是在依靠大家的努力，创造许多新的技术，新的组织形式，将生产力提高了，又将供给制度改善了。例如菜的收获量，前年的标准一亩水地是一千五百斤，可是去年党校的菜园一亩水地平均收了四千四百斤，造纸前年每工每月最多能捞一百九十刀，而去年战卫团纸厂的捞纸英雄王国初在一个月内捞到二百八十七刀，创造了全边区捞纸新纪录。农业手工业生产力提高的例子还很多，现在我不必细说。

去年供给方面改善的情形：第一、是大灶伙食的改善。现在中央办公厅大灶菜的烹调方法到了六十种，每个月不要政府多发麦子，仅从节省的粮食中调剂，一月可吃十多次馍。第二、是运输队的改造。由于将运输队改为运输合作社的结果，去年全年中直运输力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总计全年运输量比前年增加了一千五百万斤，并且替公家节省了很大一笔经费，计值一千余石小米。第三、是供给商店建立，特别离延安城较远的机关，不但以便宜的东西供给本单位全体人员需要，而且改善了采买制度，杜绝了贪污，且将采买人员减少了。第四、是节约运动。去年供给工作上的节约，证明生产与节约是保证丰衣足食的不可缺少的二方面。节约最有成绩的是粮食和石炭两项，这是由于和厨房中建立了二八分红、公私两利的节约制度的结果，前年中直食粮超过了预计一千三百石，去年则反而节省了一千一百担。石炭的节约去年普遍到每个单位，估计当在四十万斤以上。总之，我们去年在生产与供给上有了各种创造，经过这些创造，才更有条件走到丰衣足食的道路。这是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努力而得到的。

第三个成绩就是改造了个别杂务人员。前年许多机关里面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烂勤务、死马夫、好吃懒做的大司父。"这句话有很大的毛病，将部份现象扩大化了，因为大部份勤务员、饲养员、炊事员都是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的好同志。但这句话又确实反映了当时一部份事务人员和杂务人员思想意识和工作态度相当落后的情况。有许多机关事务人员当有不安心工作的现象，但是经过前年和去年的整风，经过业务教育，加以丰衣足食和供给制度的改进，这些现象是差不多没有了；相反的，一般事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去年许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最大部份是在这些勤劳苦干的同志们中产生出来的，而且提拔了许多负责生产供给工作的新干部，开辟了一个引进与培养经济与供给干部的丰富源泉。这就说明了同样的人，只要他愿意革命，在革命队伍中能照顾他、关心他、教育他、发扬他的长处，克服他的短处，是能有大的进步的。这个成绩对于那些把成千成万的人看成一个模型的主观主义者，对于轻视事务人员与杂务人员的官僚主义者，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由于人的思想的改造与生活的改善，就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队伍，就战士的逃亡现象说，去年是大大的减少了。如战卫团全年全团逃跑了四十八人，去年全团人数增加了，但只在部队合编时跑了十五人，比前年减少三十三人。机关学校部队的巩固，还表现在病员数目的减少上。一般机关学校的病员减少数目，据总卫生处的统计，比前年减少百分之四十，单就战卫团的例子说，前年战卫团有一个连全年住医院的共七人，去年该连人数增加三分之一，而病员只有四个，实际上病员数目减少了百分之六十。

第四个成绩是加强了我们与人民的联系，首先是由于机关学校部队自己生活改善，杂务人员的进步，与人民的日常关系改善了。其次，去年我们机关学校部队有很多生产事业是与老百姓合作，如安置难民、安伙子、合办作坊、运输、畜牧、商业等。帮助了老百姓的生计，使我们与人民的联系更密切了。

去年一年的生产运动我认为它的成绩，主要的有着上面讲的四点，但是各单位在生产发展与供给改善上是不平衡的，产生这种不平衡不平均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各单位在去年进行生产运动与供给工作的进程中对下面的几个规律掌握的程度不同所致：

第一个问题就是对生产运动的认识问题。去年的经验证明，凡是对生产运动认识正确的就有成绩，否则成绩就差。现在可以阻碍生产运动发展的不正确认识有那些呢？首先就是有些单位的负责干部还有轻视生产的观点，这表现在有的领导同志忽视了对生产运动的领导，没有了解工作学习与生产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没有了解生产搞好、生活改善可以帮助工作与学习的推进，可以少在日常问题上兜圈子，没有了解生产是一切其他任何的物质基础。另外还表现在有些干部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只了解了一半，而没有体会其全部，只要“丰衣足食”，而不愿“自己动手”，还有就是存在依靠少数人生产，而不大家动手的现象。就由于此，严格的说，还有坐食别人成果的思想未完全去掉。

其次是缺乏长期打算，建立革命家务的观念。这就是没有把供给服从生产，而且把生产服从供给，也就是生产一点浪费一点。在自己生产基础上还不可能做的事，也要加强去做，甚至超过丰衣足食标准，而走到某些不必要的浪费，这个思想如果发展下去，就会变成一个“大少爷”，“坐吃山空”完事。因此必须深刻了解，供给标准的高低，是靠自己生产能力的大小来决定，而且是不超过一定限度的。

最后是依靠别人帮助，消极等待的观念。处处强调自己的困难，自己的“特殊情况”，而自己并不认真研究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因此也就不积极动手，而是把自己固定起来，一步都不能前进。这些就是去年生产成绩发生不平衡不平均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问题就是首长负责，亲自领导的问题。去年经验证明，凡是实行了首长负责，亲自领导的就得到成绩。在这方面去年战卫团的负责同志是值得学习的，他们亲自动手定出切实的计划，能适时的深入督促检查，所以他们那里的生产比前年有了大的进步。每个单位负责同志必须决心学会这一套本领，掌握生产的必需知识，才能把本单位生产工作与供给工作搞好，才是全面的领导，而不是跛足的领导。

第三个问题就是群众路线问题。去年的经验证明，凡是在生产工作、供给工作中有群众观点、群众作风的，便有最大的成绩，反之，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毛病，其生产成绩就差。要掌握群众观点、群众作风的具体内容，就必须记着毛主席在去年中直生产展览会上写的题辞所指示的“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情绪、群众经验”。什么是群众生产呢？就是说要大家动手，要把生产成为“热火潮天”的群众运动，大家动手可不是把自己放在生产运动之外。每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只有将本单位的群众生产很好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他那里的生产才有群众基础，才会有成绩。什么是群众利益呢？就机关学校部队的群众利益说，就是要在生产与供给上贯彻公私两利的方针，以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认识多用一分力量，不但团体多得收入、个人也多得收入，而生产所得确能保障大家丰衣足食的生活。因此在供给工作方面，就要贯彻面向群众，为大家服务的原则，在现有的物质基础上，照顾到群众的需要，而将供给调剂得更好，特别要照顾事务人员的需要。再就老百姓的利益来说，去

年各单位有好多生产事业和老百姓合办的，要照顾老百姓的利益，也是要贯彻公私两利的方针，公私合作的生产事业不仅有利于公家，而且必须帮助老百姓发展经济。什么是群众经验呢？上面讲到在去年的生产和供给方面有许多新创造，这些新创造不是某个领导者坐在窑洞中能够空想出来的，都是依靠群众经验，都是群众创造的。所以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就要善于在群众运动中注意群众的经验，把它总结出来，提高起来，又利用了去指导运动，继续前进，这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原则，这就要我们真正实行向群众学习、向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学习。什么是群众情绪呢？生产运动既是依靠群众的，就必须注意群众的情绪，如果不了解群众情绪，不注意巩固群众的积极性，不倾听群众的呼声，就要使运动的开展受影响受损失。例如中央办公厅大灶的改造的第一步，就是从掌握群众情绪着手，从深入到炊事员中间，找到炊事员工作情绪不积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许多物质困难未给解决，于是给以解决进而教育他们，大灶就逐渐得到改善。

生产供给中间的群众观点、群众作风就是毛主席讲的这十六个字。去年因为各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群众观点认识的不同，与群众结合的程度不同，所以在生产的成绩上有了很大的差别。

第四个问题是"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问题与群众观点的问题是不可分离的，有了充分的群众观点，才能谈到把群众组织起来。去年的经验证明，凡是能够在生产工作、供给工作中间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方针的，就有成绩，反之，让其散漫自流的，成绩就差。"组织起来"的基本内容，在机关学校的生产与供给工作上说，就是"公私合作、公私两利"八个字，掌握这八个字，就会运用各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一套办法，去代替旧的组织形式，旧的一套办法，来改进生产关系，刺激生产情绪，将每个供给人员对于供给工作的关系，供给工作的态度加以改进，这样生产就能得到发展，供给能力、供给工作即能得到改善。

这种照顾到"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新形式新办法，去年我们创造了七种，在实践中证明都是成功的：（一）采取以劳动力入股的工作形式按比例分红；（二）在生产中规定分红比例；（三）节约分红；（四）一个机关里面大小单位的合作；（五）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合作；（六）与老百姓合作；（七）个人生产的公私合作，公私两利。今年我们如果更加发挥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原则，提倡先公后私、公私结合的精神，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办法是会更多的，生产运动与供给工作的群众积极性将更加提高，生产与节约运动更可展开，公私经济更可发展。因此我们还要好好研究，要很熟练的掌握这原则。

但是要熟练的掌握这个原则，必须打破对公私合作、公私两利八个字的怀疑与不坚决执行的观点。这种束缚自己手足的怀疑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从经验主义的倾向来的，认为我们历来都是一切归公的，如果提出公私两利，公家不要吃亏么？这是不去注意在新的情况下新的机动的观点。事实证明，去年如运输队的改造，大厨房节约分红制的实行，实际给了公家前所未有的利益。而且在集体生活中私人的一部份利益，私人问题解决了，也即等于解决了公家问题。领导者要注意的问题，是要把私人所得好好组织起来，帮助其储蓄，而不听其浪费。一方面是从教条主义的倾向来的，认为公私两利的原则是不适合共产主义原则的，是不适合每个革命者，每个党员应当牺牲一切的原则的。这样的教条主义者，不了解我们将来的共产主义最终目的，是必须通过现实的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才能实现的，不了解我们对每个革命者、每个党员现在在经济上既不是要求他们完全取消私有制，也不提倡他们先私后公或以私人利益与公家利益对立，而是要求他们先公后私，把私人利益与公家利

益结合起来。因此，公私两利的原则，我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是很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提高生产与节约的积极性，才能解决公私两方面的问题，而且正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杠杆，决不应轻视这一原则。

第五个问题是技术的研究与提高问题。去年的经验证明，凡是对于生产技术、供给制度有着认真总结群众经验与研究精神的，即有成绩。反之，凡是熟视无睹，墨守成规，固执老一套的，而生产与供给的结果则大相悬殊，原因之一是由于掌握技术的不同。例如种洋芋，在同一亩山地上最高的产量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二斤，而最低的仅收获二百五十斤，相差九倍，由此证明不注意掌握技术，不注意群众经验，是无法改进生产与供给的。

第六个问题是掌握"农业第一"的方针问题。去年的经验证明，凡是真正掌握了农业第一的方针的，就有成绩，真正建立了革命家务的基础。反之，凡是想偷便宜的投机取巧的商业道路的，虽然也可以在形式上获得利益，但在实际上是亏本的。对于这个经验，要严重注意。必须了解到农业手工业是最可靠的，投资少收获大，而且最能组织广大的劳动力，在农村的环境中如果不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不使"黄土变成金"，就谈不到真正的生产运动。

以上这六个问题，实际上是机关学校也有部队如战卫团生产已经摸索得到的初步规律。要好好研究充实，才能保证生产供给工作的提高。

上面是我们对一九四三年机关学校部队生产运动的成绩和它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这虽然不过是总结中央直属机关学校部队，在全边区机关学校部队中不过一小部份，但是全边区所有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方面与供给方面的主要经验，大概不外乎此。根据这个总结，我认为我们对于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应有一种新的估价，应从四方面的意义上去认识它：第一、是在经济方面的；第二、是在财政方面的；第三、是在贯彻党的政策方面的；第四、是在全国影响方面的。

就经济方面说，边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即革命三民主义的经济，是由公营经济、私人经济两部分组成的，而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是公营经济三个组成部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即政府的企业、部队的生产与机关学校的生产，在长期抗战中，机关学校的生产是建立"自力更生"经济的柱石之一，因为只要能自己动手，则任何经济的封锁与任何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我们就更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公营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关系说，机关学校的生产通过各种老百姓合作的形式，在公私两利的原则下，可以使公私经济互相发展。机关学校的生产不仅可以向老百姓学习，而且反过来可以在经营方式上、劳动技术上提高老百姓的生产，逐渐的影响老百姓生产方法的改进，如施肥、选种、修水利、兽医及合作方式等等，都可以起着示范作用。

因此，机关学校部队与老百姓合作经营的生产事业如更加发展，不但与老百姓更加在经济上密切团结，而且使公家经济与国民经济结合，更能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更能推动老百姓互相间私人合作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看到了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远大的前程。这里我们还要好好的研究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原则。

就财政方面说，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是政府的直接收入部份，去年我们中直系统生产总值三万一千担细粮，也就是减少了政府很大一部份财政负担，如果今年的生产搞得更好，到明年除了粮食被服外，一切机关学校就可以不再向政府要钱。这对政府财政问题是个很大的帮助，对革命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同志们，在长期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机关学校部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套办法，我们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发展的。再者，在现在的环境与生活条

件下，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体生活中，以公私两利方针，大家生产，大家享受，只要自己按自己的可能来劳动，个人家庭与公家结合成一起，都有丰衣足食的保障，都有个人节约储蓄的便利，这不比中国其他地方靠薪水津贴的人们天天愁吃愁穿愁住的艰难生活要有保障些，要好些么？

就贯彻党的十大政策方面说，从机关学校生产这个侧面来看，毛主席所指示的“党的十政策是联系不可分割”的话是完全对的。机关学校部队的生产运动配合老百姓的生产运动，成为一切工作物质的基础。抗战是长期的，得此方可支持下去。整风、防奸、文化教育等项工作没有生产的基础，决不能有现在的效果。我们守政府的法令与政策。执行自已动手生产，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帮助了人民经济的发展，这岂不是最好的执行了拥政爱民的政策吗？现在大家都在生产，大家都把工作学习与生产三者适当配合起来，统一起来，把工作的积极性与效能提高起来，把专门从事消费的转到生产，由生产所得节省了最大的公家开支，这岂不是最彻底的而且最合理的执行了精兵简政吗？十大政策成为不可分离的十个连环，而生产却是一切任务的物质基础，我们是应当把生产的认识提到应有的高度。

就全国形势方面说，我们及全边区老百姓都已过的经济繁荣，丰衣足食的生活。可是在不愿实行革命三民主义的地区的情况，则是大不相同。在敌占区，更被敌伪敲榨抢夺得民不聊生，这两个鲜明的对照，我们真是高举在黑暗中间的明灯，中国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民是更明亮的看到自己应当前进的道路了，这就是革命三民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由于部队开展了生产运动，部队可以做到自给，不要国民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而由部队自己发饷，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古今中外没有见过的队伍。由于机关学校发展的生产运动，机关学校也可以走到大部份自给，不要政府发款，这也是前所未闻的事。

总之我们有着坚固的信心的，我们是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认真实行，我们创造的制度优胜于旧制度，我们能使人们活起来，能使人们丰衣足食，我们发展了生产力。一切人类的历史证明，凡能发展生产力的，是值得生存的，我们的坚固信心的最后根据就在这里。

二　一九四四年生产运动的任务与方法

根据去年的生产总结，我们一方面有了生产的物质基础与生产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力还未真正的全部组织起来，加上自卫备荒的任务，因此今年我们的生产决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而应向前大进一步，应向着完成“巩固革命的家务，提高自给能力，保障丰衣足食”的任务而努力。在提高自给能力方面，除粮食和必需的被服补充外，要求今年作到全自给和有些单位的半自给，明年除个别特殊单位外，则全部作到全自给。

今年的三个任务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革命家务即生产的物质基础，只有建立了并巩固了家务，方能为着提高自给能力与保障丰衣足食打下基础。

要完成上述三位一体的任务，不仅要依靠去年的基础与经验，特别更加要贯彻毛主席“大家动手”与“组织起来”的号召，认真实行“组织起来大家动手”，才能大大提高生产力，因此今年生产的特点，就是要实行各单位“公共生产与个人生产并重”的方针。由于去年个

人生产成绩不大，经验不多，故今年在领导上应特别注意个人生产。

（一）个人生产

我以为个人生产是机关学校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我们要特别从加强个人生产中来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原则。“组织起来”，不仅在经济上意味着大家“组织起来”努力生产，而且意味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起来”的严重意义。我们机关学校中有许多同志曾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我们如能从事生产，组织在生产战线，一致的行动起来，体验劳动，打破轻视劳动的二流子思想，打破剥削阶级的思想，则我们也即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工农兵进一步结合起来。就更能使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一致的团结起来，至于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适当配合、适当调剂做得好，将使我们身心两健，这更是个人生产的可能的收获。

今年个人生产的方针和方法，我提出七条供大家参考：

第一、大家动手，各尽所能，反对平均主义。只要在工作学习身体等条件可能的都要参加生产，但动手的程度、劳动的轻重、任务的大小、生产的对象应根据工作学习任务的不同来决定，才不致重复一九三九年生产运动中平均主义的错误，决不要因生产妨害了必须的学习与工作和身体健康。

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防止自流现象。个人生产时群众的散慢性大，所以应特别注意有组织的领导，必须建立生产小组，经常督促检查，经常进行解释与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才能坚持下去。

第三、农业与手工业并重，发扬一技之长，多种多样，反对公式主义，而且要特别注意个人生产与公共生产的配合。不要重复去年公家与私人一样种菜，以致菜有剩余的，生产过剩没有销路，浪费劳动与劳动成果。

第四、合作互助，变工代耕，防止个人主义。个人生产中间注意提倡互助精神，采取各种合作变工方法，使个人与集体结合，一方面又要使老小强弱都能发展，对于工作繁重的负责同志进行必要的代耕。

第五、公私两利，按劳得酬，防止公私偏废。在个人生产的公私两利方面，应先公后私的原则下，尽可能多照顾个人的利益，个人生产所得归公归私的比例，须按各单位经济情形与个人生产情形而定，私人所得最低应有百分之三十，最高可至百分之五十。而且个人所得应实行按劳得酬，就是生产多的得的多、生产少的得的少。再者在公私兼顾的方针下，在生产与节约的所得中，不但应注意个人的利益，还应注意大小单位的基础、如果在发展生产中个人能有利益，也得大小单位都能建立基础，都能相当独立的解决个人及各大小单位的困难问题，这样政府的财政支出，才能得到最后的与最好的保障，在行政工作上才能从应付日常的保证的琐事中解放出来。

第六、掌握技术，精耕细作，反对敷衍了事。

第七、提倡节约，帮助储蓄，防止浪费。节约运动与生产运动同时进行，才更能建立革命家务，提高自给能力与保障丰衣足食生活。生产与节约的私人所得，要好好的帮助其储蓄起来，各单位或几个单位应共同建立个人生产与储蓄的合作社或私人合股的生产事业，使其所得储蓄生利，这些储蓄只可有合理的个人用项，允许其随时交领，特别对于战士与杂务人员，需要将自己的储蓄寄回家中者，我们应帮助其汇兑，不需要寄回家者，可以长期帮助其储蓄生利，建立其个人的家务，作为将来退伍养老、成家立业的经济基础，使私人与公家在经济上长期的密切的结合起来，这种公私两利的方针的贯彻执行，不仅关系于个人的经济问

题，而且在新民主主义下是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以上七条是现在所能摸到的领导个人生产的纪律，中央办公厅的个人生产计划是依照此七条制定的，可供各单位参考。

（二）公共生产

去年生产运动公共生产的经验是最丰富的，根据去年的经验，今年公共生产应当特别提出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主要的有两个，即：（一）在各种生产供给中进一步贯彻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方针；（二）在生产事业上进一步贯彻农业第一的方针，这两个方针应当再进一步。

在贯彻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方针时，对分红应注意下述两点：

第一、为着发展生产节约的群众情绪，今年生产节约的分红比例，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量增减，不必拘泥于二八或一九分红，并且必须实行等级分红制。不要不分勤惰，不明赏罚的平均主义的分红。第二、为着保持生产节约的情绪，今年定要保障按期分红，要设法保障各个时期有红利可分，如果在某个时期分不到红利，应帮助他们研究解决。

关于贯彻农业第一方针问题，提出今年对各种生产事业的经营原则如下：

农业：今年既要进一步发展农业。故在农业生产上有三个任务：（一）首先是各单位要将农业生产增加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扩大农业基础。（二）提高豆子马草的收获量，保证菜蔬完全自给。（三）多种洋芋，不但可以作杂拌饭，节约粮食，而且可以保障猪食。今年经营农业的原则，应是少占土地，注意精耕细作，所以应注意选种、施肥、育苗、锄草、水利等问题，因此就要注意提高业务教育，今年每个单位都要培植一个种菜或种粮的专家，将去年技术相差很悬殊的现象消除。

畜牧业：今年的方向是增加牛羊与猪的繁殖。对于保障猪的繁殖，要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就地就食的办法。就是把猪分散到本单位的伙房、粉房、豆腐房、菜园、农场各处饲养，它的好处猪食解决了，其次在猪瘟流行时可减少损失。要提倡与老百姓合伙饲养，要研究饲养法，管理局应将去年喂猪的经验总结起来。

手工业：首先是经营的方针，今天手工业分作四类：（一）以供给中直整个需要为主的，如榨油，由管理局经营，成品应以薄利供给各单位。（二）以供给本单位为主的，如磨房，今年要提倡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分工合作，如几个单位合办一个豆腐房，或者甲办磨房，乙办豆腐房，按出的人力与资力分红，以节省人力物力。（三）以供给半营业的，如炭窑，应先以薄利供给中直的需要，多余的成品再到市场出售。（四）以营业为主的，如管理局的丝织厂，应提高质量，根据老百姓和出口的需要制造成品，以求推销。

其次是研究技术，提高技术，规定标准产量质量，如一斗豆子最低应出几十斤豆腐。实行严格的检查，按标准的量、标准的质点货交货，这一工作如不切实的进行，就不能发展生产，改善供给，必须坚决的肃清生产与供给工作的官僚主义。

再则实行手工业作坊上的公共生产与个人生产相结合，办法是将手工业作坊中非技术的人员减少，只留下必要的技术工作骨干，其余就组织在职人员的业余劳动，参加生产。这个办法的好处，可将公共与个人生产范围都扩大。

运输业：各单位运输队在三月底以前都要实行改造，去年已经改造的要继续提高，进一步向中央办公厅运输合作社看齐。今年特别要注意：第一、保障运输队有来回货驮，由管理局统计中直运输力量，与物资局协商，帮助物资局运货。一方面给运输队以流动资金，运输土产，不但可保障增加红利，且可发展土产贸易，帮助老百姓推销农产品。第二、规定运输

量的最高标准，与酌量增加牲口的草料。教育运输队员不要因只顾节省图利而损害了牲口。

商业：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公营商业政策必须决心转变，而且今年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了生产基础，也就有了转变的可能条件，转变的方针就是坚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理与土产贸易的自由，所有机关学校部队的公营商业必须缩短，抽出资金人力转到农工业，转到与老百姓伙粮，帮助政府安置难民上面去。

（三）组织与干部问题

方针和计划订出以后，组织和干部决定一切。

对于组织问题，根据去年的经验，我提议：（一）各单位还应就本单位的可能再实行精简，多转到生产方面去。转到工厂方面去，使许多工作少的同志们能在生产岗位上发挥积极性。（二）比较大的机关（三百人以上者）应考虑将总务处改组为供给与生产两处，两处直接受行政首长或秘书长领导，在学校则直接受校务部领导，使两处工作能专门发展，不致顾此失彼。（三）各单位过去的生产委员会可以取消，而酌量组织本单位的财经委员会，使各方面各小单位人员的代表能参与本单位内生产与供给工作，使他们能了解情况，提出意见，决定方针，这样使各单位的全体人员更能在日常的生活上联系起来，而不致发生彼此隔阂的现象。

关于干部，我认为我们要特别重视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特长，引进他们担任特长工作的领导。要照顾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不断进步，保持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光荣，使他们成为群众的模范与领导者。另外在生产与供给工作上要大胆的吸取知识分子参加，使他们也能与工农兵相结合，与生产知识相结合，培养党在各方面的专门人材。

关于建立审核统计奖惩制度问题，去年各单位的审核统计工作都有很大缺点，各种统计不完备。到总结工作时有些数目字搞不清楚，今年的生产与供给都要按周统计，按月检查，三个月总结，在奖惩制度方面，去年注意了奖励，这是好的，但是忽视了惩罚，甚至有的对破坏纪律、破坏政策的行为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而没有执行应有的处罚，这是不对的，今天要有奖有罚，赏罚分明。

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 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

毛 泽 东

三月十四日郑电，四月二日三人电，均悉。

（一）派兵困难，不要依靠；

（二）你们将重点移到路西，向老河口方向发展是对的，兵力部署你们自己调剂；

（三）财经民运干部，已令组织部考虑酌派；

（四）你们除食粮外，其他用费应由主要依靠税收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自给，放手由各区自己生产解决，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办法。一九四〇、四一、四二整整三年，陕甘宁边区财政困难情形比你们还要厉害，从四三年起就是依靠这一办法解决了问题。仅有人口一百五十万的边区，却养活了十五万公家人，而民不伤。五台、太行两区的困难也比你们要大，去年一年大生产运动、情形就变了。今年应该是你们展开大生产运动的一年，万勿错过春耕时机。望在财政会上切实讨论，口号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一面酌增公粮，必可保证供给。关于扩兵，要在新发展区域去扩，依照那里人民的可能负担条件，酌量扩大部队。关于群众工作不好，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你们上面领导同志只总其大纲、给予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切不可将一切重担都由上面负起来，致使下面都望着你们要吃要穿要办法，你们虽忙甚急甚，也不能尽如人意。这是游击战争特点所引起的方法，不知你们认为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办为盼。

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精兵简政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要求从长期坚持根据地着想，注意节省与积蓄民力。二是要求从战争与农村环境着想，注意组织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贯彻下去，使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使军事行动能灵活便利。中央为总结并继续研究精兵简政问题，望各根据地将执行的经验教训电告，并望收集下面材料，一次或分次电告中央。

一、关于节省与积蓄民力方面：

（一）根据地现时在我统治下的有多少人口（必须是能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出负担的，对于游击区只能纳部分负担者须注明）？

（二）现时脱离生产的人数，是否符合中央百分之三（军二与党、政、民一）的规定？如果超过了，须说明原因，并说明在人民负担上是否有困难？

（三）计算一个脱离生产者一年要多少费用（要用实物与钱同时估计），要多少人口才能养活一个脱离生产者？

（四）当地人民每年每人平均收入多少，个人消费多少（一切用费均折合粮食计算）？

（五）现时人民负担占其全部收入百分之几？并指出富有者负担最高达到的百分数及贫农负担最低的百分数，同时还要计算出整个边区各种负担（包括财力、物力等）占该区整个国民经济收入百分之几？

（六）根据地每年出产粮食若干石（按普通年成计算），除民食外尚有多少余粮？现收公粮若干石，若再增加兵员是否有吃的？

（七）根据地十八岁到四十五岁壮丁现在多少？除壮丁外能参加生产和半参加生产者有多少？农业用的牲口有多少？是否够用？

（八）根据地各种人力、牲口的动员是否有一定制度，平均每一个能服役的人及每一匹牲口一年要支差几天？

（九）敌占区、友军区与我根据地的人民负担孰轻孰重（应举出一般估计与具体数字）？人民对此有何反映？

（十）估计敌人以后扫荡更残酷，地区还可能缩小的情况下，在财政经济上有些什么办法可以长期坚持？

二、关于组织精干与增强效率方面：

（一）党、政、民各级原有脱离生产人数及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后新编制人数（应将干部与杂务人员及战士分开写）。

（二）现在党、政、民各种组织是否还有机关庞大，头重脚轻，上下隔阂，政令不能贯

彻现象？

（三）现在党、政、民各种组织是否还有组织太多，会议太多，干部疲劳，群众厌烦现象？

（四）现在党、政、民各种组织是否还有重叠可以合并的机关，还有无事可做的工作人员，还有分工不合理遇事多绕圈子、效率迟慢现象？

（五）是否有后方庞大，行动笨滞，敌人扫荡易受损失现象？

（六）正规军与地方军是否已经划分，两者间的比例如何？民兵与自卫队占全人口的百分比，及其已起作用？

中央关于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区党委：

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军区、分区两级有些缺乏领导中心，许多人谁不服谁，而不能承认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环境完全矛盾着，如果再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必须认真地讨论这一问题，根据中央统一领导决定及精兵简政政策，在今冬明春做到如下各项，以便对付明年的严重环境，迎接最后胜利的到来：

一、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是领导中心），几个次要工作人为部长、处长，若干个办事员，助理工作，其余干部一概派往各分区、各县。在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一定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并加强所属各县的领导。军区、分区两级许多性质相类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有些可以合并的分区加以合并。

二、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手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不是小小的不痛不痒的）。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情况特殊者例外），作战损失后，两团并为一团，两营并为一营，两连并为一连，旅的架子也可取消一些。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全军五十七万准备缩至二十余万），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地方党、政、民、学大大缩减，一人兼做两人、三人、四人之事。大批干部人员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空虚而需要的部门去，派到接敌区、游击区、敌占区去。尤其是知识分子须令经过下层锻炼。军队（包括游击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的比例，为四分之三与四分之一的比例。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派到游击队中去。提倡降级使用干部，号召干部安心做下层工作，这不但因为目前环境需要如此，也因为我们的很多干部降一级或降两级使用更为恰当。学校有些停办，有些缩小，有些改为训练班。各地干部凡可能来延安的，由中央局、分局筹划派送大批来延保存、学习。保存干部仍是目前要注意的任务。

三、干部相互间必须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严格地痛快地清除自己的宗派主义余毒，乐于交出机关，交出部队，而被分配到下级的、别地的、别部的或学习的新岗位去。每一军区、每一分区必须承认一个比较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不应谁不服谁，闹到群龙无首。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着重地注意培养所属各军区、各分区领导核心的建立，告诉他们如何自觉地形成这种核心，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中的第九条（论建立领导核心）运用到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与地委的领导建立上去。只要我们有了这样坚强的各级领导核心，我们就会胜利的。

四、此电除各中央局、各分局及冀中、冀鲁豫边区、皖东、湖北四区党委外，其余各区党委由你们转达。实行时要预先周密研究，不要草率从事。

中央对于各军区分区精简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

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林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处于无力。军区、分区两级有些缺乏领导中心，许多人谁不服谁而不能承认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未来严重的分散的游击环境完全矛盾着，如果再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必须认真的讨论这一问题，根据中央统一领导决定及精兵简政政策，在今冬明春做到如下各项，以便对明年的严重环境迎接最后胜利的到来。

（一）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是领导中心。几个次要工作人员，如部长处长，若干个军事员助理工作，其余干部介绍派往各分区各县。在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并加强所属各县的领导。军区、分区各级许多性质相类似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有些可以合并的分区加以合并。

（二）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手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兵，不是小小的不痛不痒的。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情况特殊者例外），作战损失后两团并为一团，两营并为一营，两连并为一连，旅的架子也可取消一些。全军准备在明年与后年缩小一半（全军五十七万人准备缩至二十万余），量小而质精，提高战斗力。地方党政民学大大缩减，一人兼做两人 三 人 四人之事，大批干部人员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空虚而需要的部门去，派到接近敌区游击区敌占区去。尤其是知识分子须要经过下层锻炼。军队（包括游击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的比例为四分之三与四分之一的比例。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派到游击队中去，提倡降级使用干部，号召干部安心做下层工作，这不但因为目前环境需要如此，也因为我们的很多干部降一级旅降团级使用更为恰当。学校有些停办，有些缩小，有些改为训练班。各地干部可能来延安的由中央分局筹备派送大批来延保存学习，保存干部仍是目前要注意的任务。

（三）干部间必须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严格地痛快地清除自己的宗派主义余毒，乐于交出机关、交出部队而被分配到下级的别地的别部的或学习的岗位去。每一军区每一分区必须承认一个比较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不应谁不服谁闹到群龙无首。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着重地注意培养所属各军区、各分区领导核心的建立，告诉他们如何自觉的形成这种核心，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中的第九条（论建立领导核心）运用到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与地委的领导建立中去，只要我们有了这样坚强的 各 级 领导核心，我们就会胜利的。

（四）除各中央局、分局及冀中、冀鲁豫边区、皖东、豫北四区党委外，其余各区党委由你们转达，实行时要预先详细研究，不应草率从事。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精兵简政的一组函电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九四三年八月）

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①]

（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

陈毅同志：

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情况，这是很好的。你们又刚在四月底开过扩大会还不很久，也不必急于更改。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②]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觉哉、正人二同志：

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③]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象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

敬　礼

毛　泽　东

八月十九日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4]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德怀同志：

（一）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事学校或党校。

（二）胡服[5]同志现到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望告。

毛　泽　东

十七日

对精兵简政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6]

（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

冀察晋分局：

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已悉。毫无疑义，你们应实行精简，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你们现在只有九十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九十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八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决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三万，只留五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减去三万人中，除吕部[7]六千西移外，另调聂部[8]四千西移，共计一万人西移，其余两万在本地安插。如果明年更困难，再准备从五万中减一万。

中央书记处

未　　微

一面支持斗争　一面保存干部[9]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

德怀同志：

关于一面支持斗争，一面大批保存干部的观念，除你以外，大都是不正确的。聂区[10]所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中央已去电要他们从直属机关、学校（党校、抗大）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区抽调好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学习（可有一部分最好的中级干部）。请你和刘、邓、杨、黄[11]等说通，从直属机关、学校，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级上级干部五百左右送延学习，其他大批中级干部及犯错误有嫌疑而前方不好处的人亦可送延，但不在此数目内。边区物质条件增加二三万兵、一二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可望丰收。

毛　泽　东

未　　真

抽调有造就前途的领导干部送延安学习[12]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小平同志转太行分局各同志：

中央给冀察晋分局关于保存干部电转给你处，谅已收阅。希望你处照此电意旨同样正确地处理此问题。即是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而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学习，提拔中下级上来代替他们的职位。你处中级干部及犯错误难处理的干部亦可送来，但不应放在上述数目之内。

中央书记处

八月十六日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给当时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电报。

2 这是毛泽东给当时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的信，谢、陈都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编整委员会委员。

3 这是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

4 这是毛泽东给当时中共北方局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报。

5 胡服，刘少奇的化名。

6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冀察晋分局的电报。

7 吕部，指吕正操领导的部队。

8 聂部，指聂荣臻领导的部队。

9 这是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

10 聂区，指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

11 刘、邓、杨、黄，即当时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冀鲁豫军区政委黄敬。

12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当时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

华中执行精兵简政指示的情况报告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陈　毅

四月二十二日电问精兵简政执行情形，兹将此间情形报告如下：

一、去冬得到关于精兵简政指示后，各师战略单位即开始讨论今春华中局扩大会又根据精兵简政原则及军委关于根据地军事建设指示作具体讨论和部署。三月底各单位代表返部，到四月底各地区军政党扩大会召开，现在刚刚才开完，执行情形尚未报告来。

二、在扩大会时各地代表报告中各种统计数目字皆为约数，业已由军参谋处分别电呈。

三、现在仅就执行中央指示中的各种倾向报告如下：

（一）在地方党政人员常常在讨论中央精兵简政时着重主力裁减，其根据是部队愈大、公粮及税款难办。发生不顾华中敌顽对我环伺，我之主力尚不足够应付，而华中人力物力之调征，并未达到饱和点，除淮海、津浦路东地区外，一般均未达中央脱离生产人数不得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三的规定，华中主力仅八万人，地方军仅四万余，相当的扩充仍属必要而且可能。这种裁兵论、缩小论是基于片面理由，我们认为应加纠正。

（二）另一方面，华中主力八万余，力量并不算很小，但分布七、八个独立地区，每一个师均无力单独应付顽方之大举进攻。军部手上并无集团的机动部队，尽可能大量抽调时亦只能抽十二团去进行大的会战。各主力师均为地方任务所牵制，主力限于地方任务，结果等于无主力。主力调走地区即不能巩固，地方工作及粮款来源即受影响。假如将现有之四万地方军扩大到十万，比较能负担主力现有任务时，则主力即可选择安心放手整训的机会，足可应付大的局面。故扩大会主张发展主力到九、十万，地方军到十万，自卫军二十万，基干队十万，准备一年内完成此计划。而目前着手重心放在地方军及民兵建设上，主力一般注意整训、巩固，不作大规模的扩大动员。这个主张又发生有所谓特点论出来障碍，其实质是某些主力的工作同志认为主力编制不充实，不同意搞地方军，而要求继续编并地方武装以扩大主力，认为中央精兵主义只适用于华北，不适用于华中。强调地方的特点，因而曲解中央精兵建设指示，专强调主力的扩大，不了解华中地区主力亦必须注意本身地方化，某些地区如苏南、苏中、无为等地，部队不地方化，即难于坚持，即令某些地区人力物力尚可供我征调，但提前注意积蓄，保持军民实力，仍是必要的（又此时不通过发展地方军的办法，孤单的扩大主力也不可能）。我们对这种地区特点论者不了解华北、华中同为敌后，不了解斗争的长期性，民力为军力之泉源，不爱惜民力，绝难长期坚持，这些观点正在纠正。

（三）华中各根据地从一九四〇年冬黄桥决战后，才完全控制在我手，才有了正规建设的可能。但不数月即一九四一年春李长江叛变，是年初秋敌伪清乡并扫荡盐城；又如韩德勤未走，在予我建设以阻碍，因此许多应办机关均未成立，比如各根据地的参议会，仅先后初

办，许多机构仍未建立，如一切裁减势必影响工作，但如不顾可能，不密切注意敌后环境及根据地发展之趋向，而建设庞大机关及后方，亦必在扫荡中遭受损失。

四、一年多来的华中局面敌友我均保持三角的相持形势，汤李等大军计四十余万屯集豫皖鄂、……故我应利用此时机在两个反扫荡之间，来迅速进行建设工作，反对各种偏向，正确而灵活的执行中央的精兵简政的指示。

五、在军事建设上，皖变以来，本军七个师均一律采取三三制，现已感觉不妥，故决分为甲乙丙三种师的编制。甲种师则采取三旅三团三营四连制，乙种师则采取废旅制，丙种师如七师则直接废旅，并且团亦废营。又如一、六两师师部合并，该两师原为一个部队分开的，且地域接近。又各师或兼军区或不兼，某些军区之下设分区或不设，总以避免迭床架屋头重脚轻为目的。

六、民兵建设工作现在方开始，军工生产亦才开始，但经验及指导均不够。

七、华中群众工作，在今年夏收可保证普遍进行减租减息，今年秋收可将人民大多数初步组织起来，并建立系统的正规工作制度，我们打算秋收前完成扩大地方军到十万任务，冬季动员数万新兵充实主力，冬季才有可能使各种工作走入正规或可能完全照中央规定的报告项目，作正确的统计报告。

八、华中局仅保持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宣传、青妇各部仅一人或二人，政府工作部至今无人负责，军政治部主任亦系兼职无人负专职，我们军直机关连特团抗大在内仅三千人，我们工作机关拟逐渐添补人员。

九、胡去山东，饶去二师，仅将最近情形简要报告，祈指示。

彻底实行精兵政策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

《解放日报》社论

很久以前，党中央即已明白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同时，也指出为坚持敌后斗争，今后建军的方针"精兵主义应为今天主力军的原则"。这个指示，在各抗日根据地部队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反应；各地部队认真实行之后，也收到极大效果，但在个别地区和少数干部中，对于中央这一正确的指示，还有误解或执行不够的地方。而在此敌后斗争日益残酷尖锐的时候，精兵政策，又为敌后军事建设当务之急。所以，今天对精兵之要义还有再为申论之必要。

中央指出，这一敌后建军的原则，完全是依据敌我力量的诸般变化，敌后斗争客观形势之发展而正确规定的。血战进行了五年，敌我斗争已进入一残酷的新阶段。在敌后，敌人刻正倾其全力向我进攻：在军事上，对根据地扫荡之频繁，战术之隐秘鬼谲；在经济上，对我生产力之恣意破坏，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与投毒放菌；在政治文化上，厉行四次强化治安，据点增多，特务活跃等等，都使敌后我军的活动，遭遇较过去百十倍的困难。在这新的斗争阶段中，我们决不能墨守成规，因循怠忽，我们要安排新的斗争形势而采取新的灵活的组织形式来适应目前斗争环境，精蓄力量，争取时间，以配合将来的战略反攻，争取抗战胜利。

新的斗争形式是什么呢？

由于敌寇的残酷扫荡，我各抗日根据地中已有些地区开始部分的缩小，某些游击区逐渐变为敌占区，某些根据地部分的变为游击区；敌人的"三光政策"更使人畜不留，废舍为墟，大大破坏了根据地的生产力量，甚至有个别地区生产力减缩二分之一；再加以五年来长期的战争负担，不能不使根据地的经济更形困难。在此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很好顾及到因地区缩小、生产力破坏而可能发生的供应缺乏，衣食不继的状态。华北军民同甘苦、共患难五年了。在这严重的关头，我们更应该关心民疾，照顾群众的利益。适当的紧缩部队，减轻负担，爱护民力。

坚决执行中央告根据地党员和将士书中的指示："始终和老百姓在一起，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不脱离群众，不浪费民力"。使敌后民众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使敌后部队有力继续为祖国生存而战。才不会弄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食用不继，兵与民争食的困境。

军事上敌寇的阴谋，更花样翻新。在战略上，敌人由正面进攻转而为敌后扫荡；在战术上，敌人由鲸吞而分期蚕食。敌人"自鸣得意"的捕捉战术与奔袭战术，尤其是以我军主力或指导机关为其进攻目标；而在敌我力量绝对悬殊之下，我军只能发动广泛游击战争消耗敌人，不以力取而以智胜。加以敌人大小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密如蛛网，地区分割极

小，大兵团不易回旋活动，加以敌寇特务奸细之潜藏，便衣队的活跃，今天我们要坚持敌后斗争，一定要实行精兵政策，划小作战单位，充实作战兵团战斗力，符合战术上灵活机动的要求。

我们还要清楚的认识到，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再熬过两年，胜利反攻的阶段即将到来。所以精兵政策不仅是为了打破目前的困难，而且是为了准备将来局势开展，为了将来担负全面反攻的任务。为此，我们必须加强部队战斗力，适当的保存干部，提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军事技术。实行"精兵"之后，把抽出的干部送一些去加强下级的训练和领导，同时，也送一批去进行正规化的教育，以备将来新局势的开展，准备反攻的新力量。

必须指出所谓"精兵"并不是说取消主力，消极的裁减主力兵团的员额，简单的缩小后方勤务机关；也不是裁兵减员，拆台散伙；而是要充实主力，加强主力部队的作战力量，而是要按照敌后各种不同的情况，规定何者应减，何者应紧缩，何者应充实；按照敌后斗争形势发展的规律，主动的改变我们战斗组织。目前，我军力量的生长，应在质量中去求改进，而不是在数量上去求扩大。

如果今天还有些地方，企图把地方武装编入正规军，扩大主力，只看到局部情况，暂时利益，舍不得把自己的部队精简一下，这种作法，将来必然会处处撞壁，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的。这种作法，必须速予纠正。

很明显的，精兵政策是目前敌后建军的正确方向，是坚持敌后斗争和准备反攻力量的重要步骤，各抗日根据地应用一切力量彻底实行精兵政策，扩大民兵的武装。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目前敌后严重的难关，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毛　铎

边区在今年春间依着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坚决紧缩军政民的组织机构，注意精干，使之更适合于敌后日益残酷斗争的环境，并认真的爱护民力与节省民力。如总部直属队在紧缩后，只留下原有人员百分之四，其余百分之九十六，一部分用以充实下面，一部分真正裁去。边区政府本身在紧缩后，也裁减人员百分之四十八。节省经费百分之四十六。预计至本年底七个月内，全太行区即可节省粮食四万九千一百五十六石，及经费四百二十六万六千一百二十元（每月可节省公粮七千石，经费六十万）。其实施经过情形，根据现有材料报导于后，以供各地参考。

采取的步骤

首先是部队政府都由上而下的召集了各级干部会，进行关于精兵简政的深入传达与政治动员，在动员中检讨了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和人民负担情况。并建立了各级领导机关的整编委员会，以便专门负责，统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同时，更由参议会政府部队各发表了告同胞、告干部人员、告战士书，（部队中还编成教材，进行深入教育，使全体军人均能透彻认识，以加重每个人的责任观念）。其主要内容，在于说明这一精兵简政的意义，是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胜利反攻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号召所有干部人员、战士、群众，拥护与认真一致的执行，以取得这一任务的彻底完成。

为了正确慎重的实行，各方都当做了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并采取了三个实施时期。如冀鲁豫行署决定：以第一月为试验期，第二月为深入检查试验、总结经验教训期，第三月为确定简政方案、彻底完成期。

如何简政

确定简政方针，是在于紧缩行政机构，健全工作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减轻人民负担，规定政民脱离生产干部、杂务人员，不得超过居民人数百分之一。所以：

在紧缩行政机构上，是裁减骈校机关，克服头重脚轻，达到组织短小精干，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因此边区政府决定除本身统一各部预算和事务工作、减少杂务人员，马匹，归并其它机关（如农场、服装厂、生产部的取消，医务所归并于太行卫生处，行政干部学校并于抗战学院等），减少人员百分之四十八外；并规定专署兼理所在地县政，如和西、平顺、涉县、沙河各县，均由专署兼理。县府亦可兼理所在地的区政，但游击县份与专署兼理县份

则例外。小县可改为区，或二县归并一县，或由一方兼理，如邢东邢西合并为邢台，平南平北合并为平顺，武南磁县，归并为武磁（武北仍为武安），各县并可依照不同情形划分为甲、乙、丙、游击四种不同县份（如太行区甲等八县，乙等八县，丙等七县，游击十县），以便适当编制。现有区则酌量归并以减少原有区数百分之四十为标准。对于村，一般是实行并村（个别有增加，如辽县原行政村为七十二个，现在增为七十八个），在并村时，必须照顾主村与副村，大村与小村之过去纠纷及不公平现象。纠正大压小，主欺副，以利将来工作进行。如情势不许可时，则采取联合村办法，主村设正村长，副村设副村长，或者多加不脱离生产干部来解决。各村委员会，一般是由七个并为四个，即将地政工作归财政委员会，优抗工作归民事委员会，锄奸工作归武委会，生产委员会仍旧。各村书记和村警均取消，由村政委员会兼理，发扬干部的劳动作风。其他许多机构，均正在缩编。如邢台县二区已减去村干部十七个，计全年可节省经费二万二千多元。

在调整干部上，不是单纯的减员，而是加强下层更好的使用干部，提高干部质量，以一当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因而在原则上，是多减上层，少减下层(即是增强下层)。在干部的使用调整上，有三个原则：（1）不妨碍三三制的实行，（2）优先留用历史久的干部及大后方敌占区来的干部，（3）不是排斥某些人，对妇女干部尤需安插。在调整时，凡民选干部，以民主方式改选撤换及取消，不能以行政方式由上而下的乱调，或者以增加副职办法来加强其工作。如边区高等法院，在简政后，减少了人员二分之一，且提出了“少用一个勤务，多添一个法官”的口号。太行中学亦决定：（1）减少杂务人员，（2）实行劳动制，不要勤务员，（3）学员能自费者一律自费，（4）本身进行生产。对于编余人员的处理，除调训外，是以经营生产为安插原则。其缺乏资金者予以补救，其办法：（1）在根据地内有家庭者，有享受春耕贷款之优先权，（2）太行区在边区建设项下，拨款五万元为工商业贷款，以贷给外来编余人员，作为经营工商业之用。

在健全工作制度、提高行政效率上，是反对了组织上作风上的官僚主义。政令要由繁而简，以便下级干部人民能轻快执行。所以在深入领导上，决定专署加强对县领导，检查到区，研究到村。县加强对区领导，研究到村。其领导方式上，新的具体办法是：

（1）区村不得出布告。（2）少下命令，命令的范围应限于：干部任免及奖惩事项，颁布条例法令，行政区划之变更，确定制度及制度以外之经费开支，强制执行之事项等。（3）确定财粮、义运、支差及荣誉军人安置制度。（4）凡有制度有规定之日常工作，边府各科长、秘书主任，专署各科长，有机动处理之权，但处理后须向负责首长汇报。（5）政府制定重要法令政策及计划时，应事先征求下级意见，以期深入切合实际情况。（6）边府专署及县，应健立与加强联合办公制度，以便商讨工作，避免迟缓与矛盾现象。（7）建立与健全档案与文牍制度。（8）边府及专署对电报须在一天内答覆，一般公文限三天内答覆，须提交会议讨论解决者，应尽量提到最近一次会议解决之。各单位于两周内，清理边府成立以来之政令，以便加以研究，发现缺点及问题，予以改进。（9）发文件检查表，以检查政令执行情形。（10）一切政令、文件、布告，应力求简明通俗、易于了解执行。

如何精兵

精兵的方针是提高部队质量，加强战斗实力，巩固内部力量，规定一切脱离生产的武装

部队，不能超过居民人数百分之二，同时发展民兵，培养民兵战斗力，以坚持敌后战争。

其具体的精兵办法是：

第一，调整编制，一方面缩减编并某些单位，另一方面认真充实连队战斗能力。

第二，有计划的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干部，到地方军与民兵中去，以强化地方武装建设，开展群众游击战争。

第三，紧缩后方机关，减少人员马匹。规定战斗部队团以上战斗人员与直属队人员数目，应为七与一之比（即战斗员七，直属队工作员一）。团以下战斗人员与团直属队人员数目，应为五与一之比。后方机关如学校教职员，杂务人员与学员之比例，应为二与五之比。医院工作人员与休养员应为四与六之比。工厂职员杂务人员与工人应为一与四之比。牲口马匹亦大量减少，转入生产部门，从事耕工运输。如今春军政编余牲口共约五千匹，大部交给地方区政府，借给贫苦群众春耕。减编机构，力求经费减缩，如各修械所长联席会议，讨论精兵简政实施时决议：（1）积极增加生产，以最大努力，满足前线需要，各工厂非工业生产人员，每人必须完成二百元之农业生产；（2）加强节约，在经费支出上，以三变二为原则，估计可省数百万元；（3）缩编不必要之人员，一般老弱工友及年幼学徒，亦可另组工厂；（4）奖励发明，发扬创造精神。

第四，利用战争空隙集中整训，加强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教育。工农干部多学习，知识分子多实习。特别将文化教育成为一般战士的日常必修课。改善教育方式，使教育与实际合一。编印必要课本，逐步提高文化水平。并经常抽调干部轮训，与派优秀干部到陆军学校受训。

第五，以经营生产事业，如办理工厂作坊，工艺学校，来按插老弱战士，荣誉军人，以便从事学艺生产，半工半读。

第六，根据编余人员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如总部直属队，对于编余人员，根据四个原则处理：（1）抽调出之人员，如抗战以来未曾正式入学，或青年战士、事务工作人员可以造就者，即送入学校学习；（2）过去住过学校，或有专门技术，而其他部门正须要者，即调赴他处工作；（3）老弱残废与有病者，分别另行安置；（4）牲口，事务人员，减至最低限度，决不多留一人或一牲口。如太南军分区，在第一步整编后，计全分区编余人员×××人，送往学习深造者占百分之二十七，投入生产部门者占百分之十八，介绍到武委会工作者占百分之四，遣散回家生产者占百分之五十五。预计可节省粮食十万斤，经费二十八万九千七百余元。

爱护职培养民力

爱护民力、培养与节省民力，是精兵简政的中心问题。边区曾有“白天多做事，晚上少点灯”，“人人要当家，公私都节约”，“谁不了解民困，不体念时艰，谁就不算好干部”等关于厉行爱护培养民力的口号。使爱护民力的运动，在多方面，干部中，群众中，上级下级，内部外部，广泛的开展起来。关于爱护与培养民力的办法：

首先是发展生产，以增加人民收入。而发展生产中主要是发展农业。本年度的农业建设计划是以提高土地生产量，与办水利及扩大植棉为中心。其具体计划如下：（1）普遍增加农业生产量。按照二十九年原有农作物生产量，食粮本年每亩地平均增加三升，上地四升，中地三升，下地二升。（2）不断消灭熟荒。要求废地空地完全下种（内包括院宇、屋角、

场面等地），修旱地及消灭大路两旁小路。并加紧锄地，保证青苗不荒。（3）增加耕地面积，全区共修河滩地一万九千二百六十二亩，修整旧河滩地五千五百五十八亩，开荒二千五百二十七亩。（4）开新渠与整理旧渠（包括打井修蓄水池等），扩大水田面积，全区增加水田一万零三百五十一亩。（5）全区共植棉六万亩，每亩以十五斤净花计算，估计产量九十万斤。（6）农村副业（包括耕畜）方面，按照三十年年底原有数目，全区要求增加耕牛百分之十，驴骡百分之十，羊百分之二十，争取完成百分之三十，猪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此外全区平均每两人养一只鸡。关于养蚕，第六专区可根据去年原有数，要求增加蚕丝五百斤，其他专区，本年只作提倡，不另具体规定。（7）植树造林方面，要求全区每人植树一株。各机关学校及地方武装集体植树，每人二株。发动群众普遍建立小型苗圃（在有利条件下每一个村建立一个），大量培植树秧。同时进行明年造林准备工作，要求本年搜集树籽，能够播种十万亩。此外，恢复禁山禁坡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为了这些农业生产计划的实现，边府特令各县成立农业指导所，专门领导补充农具耕畜，努力施肥，提高农业技术等。并于今年春耕中放出生产贷款一百三十万元（只太行一区）。建立水利局，颁布与办水利办法，规定水利贷款只收七厘息，可分年还清，河滩地修竣后，五年内免除其资产及收入的负担，而较大之水渠防堤，工程费用浩繁，民众不愿或无力修筑者，得由政府垫款兴修。如清漳涉县段，今年修滩七千亩，变旱地为水田二千亩，预计今年可能增加滩地一万亩。

关于增加工业生产，主要的是以恢复作坊，发展家庭手工业，开展工业合作运动，号召热心生产人士投资生产，兴办各种作坊工厂，并要求全区工人提高劳动热忱，节省原料，提高生产质量与数量。计划在太行区除公营工厂外，（1）发展妇女纺织小组一十八，二百五十二人，生产土布十万匹；（2）开造纸池八十八百个，造纸八十一万一千四百令；（3）增加煤窑六座；（4）增加油房，保证油的自给自足；（5）组织群众熬盐二万二千五百斤，及群众采药，制造陶器。如武乡成立了毛笔厂，造纸厂，熬盐厂等，预计今年能产盐××万。又如涉县建设了一百个造纸池，年可造纸二百万张，编苇席二十万幅，编草帽十万顶。建立运输合作社及消费合作社三十个，真正群众性的合作社二十个。

其次，是要军政民（民众团体）费用百分之三十，以自力更生来解决，因之军政民各机关都积极进行生产工作，以节省民力、财力、物力。在部队方面，如一二九师×旅今年生产：（1）以团为单位成立农庄，选择适当人员，成立农庄生产队，专门实行垦种工作，供给部队二个月之蔬菜二百二十五万斤，二个月之猪肉一万斤；（2）生产全年八个月的菜金二十一万元（3）连队每人每年生产十六元，机关每人每年生产二十一元；（4）发展部队手工业，熬盐、造纸、打马掌等；（5）修建滩地，挖掘土窑。此外又号召连以上干部每人每年节约二十元，战士节约十元。在政民机关方面规定：（1）专署以上机关，每人每年生产六十元，以五分之二交公，五分之三改善生活（补助教育学习经费亦在内）。县级政府每人每年生产六十元，以三分之一交公，三分之二改善生活（补助教育学习经费亦在内）；（2）机关生产每半年检查一次，由财厅分期于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扣留应交公之款数；（3）学校之生产，全部作为改善生活及补助办公费之用。

再次，便是减少公粮负担（今年公粮比去年少征八百石），整理各村财政，清算旧帐，抵制仇货，禁烟禁毒。并严厉实行以下节约办法：

粮食节约：不报预算，不发粮票，厉行粮食日报制度。以粮食作菜换菜，或换面换大米

者，就是变相贪污。实行集体吃饭，余粮按数交公；不许用饭喂猪喂鸡；减少不必要的招待，严格收取粮票饭票；吃麦子自己磨面。

被服节约：厉行被服登记，无被服表者不予分配工作。规定五年一床棉被，二年一套棉衣，一年一套罩衣。衣服按季交公家保管，破烂者交公。

公杂费节约：墨水、变色铅笔、日记本、纸夹、洋烛、墨汁，不许报销。便条不用白纸，一个信封用四次，一张信纸用两次；旧笔换新笔，一年一个笔帽；尽量少点灯，印刷品少留空白。无故遗失或损坏公物者，按价赔偿。字纸收集归公，由勤务员负责，售价提二成作奖金。旅费路粮节余退还公家。除慰劳抗日军外，赠送品不能报销，无外宾不作宴会。手纸不用净纸。不经行政首长和机关医生批准，自己买药不准报销。提倡用火链，节省火柴。私人动用公款，以贪污治罪。

牲畜节约：不合编制的牲畜，不得开支公粮公款，牲口疾病死亡，饲养人员管理人员须负行政责任，依照情节予以批评与处分。保证牲畜肥胖无病者，饲养员半年增发两月津贴。盗卖饲料按贪污处罚。牲畜粪归公，售价提二成奖励饲养员。牲畜鞍缰装配，无故损坏者赔偿，建立牲畜使用登记制，调节劳逸。

其他节约：没收品一律归公，违者以贪污论罪。打贵重药针（如六零六等）须经行政首长批准，少铺张（如大修房屋、添设备等）。

为了这些节约条文切实的实行，如机关部队，均组织有节约委员会，以领导要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提倡干部勤劳主义，号召干部都能先从自己做起，由日常小处着手，定期总结成绩，对于优者奖励，坏者批评和处分（不管官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正由于这样严厉的节约，边府已节省粮食二万石，移作减免太行区各敌占区人民负担之用了。

在节省民力方面，边区关于支差运输诸种战时勤务，亦提出“少开会多做事”，“反对滥用民力”等口号，订有抗战勤务条令，其主要内容是：除参战外，凡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及公营企业合作社采购处等（军队经营者在内），一律不得用差，规定了用差机关，必须持有旅级以上政治部首长签名及经专署批准的文件，才能由县府拨差。有支差路程与时间上，规定最远七十里，往返不得超过四日，农忙时不得超过两日，规定了运输载重（如每人不得超过六十斤，牛驴骡最多不得超过一百六十斤），和必须借给支差人畜一定食用（如每人每日发小米一斤七两，牲口每日发干草最少八斤与料半斤），如不发时农民可以拒绝支差，如支运牲口损失，须予以相当数量的抚恤及赔偿，特别规定对于农忙时的乱要差者，不论何人均可扭送政府法办。

因目前正在开展群众游击战争，民兵大量发展与积极活动，这固然是好的方面。但民兵数量过多，活动时间太久，也会很大的妨害群众生产劳动。因而提出“劳力与武力结合”，广泛发展劳动互助小组，规定民兵不得超过当地居民百分之五，民兵服务时间，每月不得超过两日，农暇时每月不得超过四日，纠正了以前民兵活动占全部生产劳动时间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每月约七日到十日）的现象。至于民兵训练时间，武委会亦规定全年不得超过一个月，其中冬季占三分之二，其余为三分之一，农忙时停训。训练集中在一村时为半天，分散在各村为一天，早操不得超过十分钟。接敌区是以实际行动为主。三十五岁以下之自卫队训练时间，只能占民兵训练时间三分之一，即一年训练十天。此外又停止了不必要的自卫队民兵的检阅，取消了据根地内形式的站岗放哨，而实行以定期戒严，加强群众锄奸工作（如调查户口等），及严格实行送信制度，以尽量减少人力负担。

总之，晋冀鲁豫边区，在党政军民全体一致，上下一心，认真坚决贯彻实行精兵简政之后，已获得了很大的成果，这在今后熬过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将来的胜利上，是开始奠定着有力的基础。

（原载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解放日报》）

精兵简政的模范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解放日报》社论

十九日，本报发表了一个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文章，并已广播，这是一篇值得郑重介绍的文章。今春以来，各抗日根据地，根据我党中央指示实行精兵简政，晋冀鲁豫边区军政机关，在敌后战争的环境下，认真周密，彻底地执行了中央这个指示，在工作上创造了不少的成绩，所以这篇晋冀鲁豫边区精兵简政经验的总结，不仅值得每个党员去细心研究，而且足供各抗日根据地借镜与效法。

晋冀鲁豫边区精兵简政工作，是有比较周密、精详而切合实际的办法。在纵的关系上，它从政治动员、工作的布置计划、工作的执行以及总结检查，都能有条不紊，依次进行；在横的关系上，它能把精兵简政的总方针贯彻于各方面工作，它对政权工作、军事工作、财政工作等等的精简工作，都有一个全盘的计划。

精兵简政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党政军民中深入的传达与动员。光是领导机关知道中央精兵简政指示是正确的，这是不够的；没有使干部和群众了解今日敌后的严重困难，敌后斗争的曲折性，没有了解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胜利反攻的唯一正确的出路，那么便不能彻底完成任务。所以，晋冀鲁豫边区对精兵简政的工作所采取的步骤，首先是部队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教育与动员。在动员中，检讨了各级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和人民负担情况，并建立各级领导机关的整编委员会，并使专人负责统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

政令冗繁，不特于事无补，而且劳民伤财；政权机构庞大，各级机关叠床架屋，浪费力量，又互相掣肘，因此实行简政，不只是简单的减少人员，而是加强行政机构，改善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充实上层，加强下层。不必要独立存在或工作可以兼顾的机关，可予合并调整。勤务员、伙夫、马匹可以裁减节省的，编入生产的队伍。如晋冀鲁豫边区，规定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不超过居民人数百分之一。根据这规定，政府缩减人员百分之四十，节省经费百分之四十六，按各种条件实行并村、并乡等等。淘汰冗员，兼理公差，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干部，发挥干部的劳动作风。如邢台县二区减少村干部十七人，全年节省经费不下二万余元。

在调整干部时，也详细注意到干部的情况，适合于何种工作？何处工作需要？务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对编余人员，亦有妥善处理。有的上学，有的转入其他工作之部门，有的进工厂农庄参加生产，有的由政府贷予小规模款项，助其经营工商业，使壮者有工可做，老者弱不致流离失所。在干部使用调整问题上，亦规定出三项具体办法；①不妨碍三三制之施行，②尽先留用历史久的干部及大后方敌占区来的干部，③不是排斥某些人，对妇女干部尤须按插。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事无巨细，都经过一番详细的筹划。

精兵简政工作，要配合爱惜民力、培养民力与发展生产同时进行。军政机关更要动员一

切的力量，投入生产，力求自给，处处照顾人民利益。如今春边区编余牲口共约五千余匹，大部分交给地方区政府，借给贫苦群众春耕。又如一二九师某旅，全年生产蔬菜即达二百五十万斤，猪肉一万斤，菜金二十一万元。根据地主要应发展农业生产，增开荒地、滩地，来增加食粮等收获。在工业上奖励私人投资，发展家庭小手工业，使根据地的生产力量得继续发展，战胜敌人的破坏。

实行精兵简政，要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在今天根据地生产困难，物资缺乏的条件下，实行节约，尤所必需。晋冀鲁豫边区所实行的粮食节约、被服节约、公杂费节约、牲畜节约等，收效很大。例如禁止用粮食养鸡养猪，被服每季更换交公家保存，写字用废纸、少点灯等，均有明白的规定。并制定奖惩条例，切实施行，如有贪污，严重治罪。就是违反节约原则，破坏或浪费公物，私人动用公款等行动，亦以贪污治罪。

精兵的意义，一方面求得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另一方面也是顾到今日敌后的经济困难，而紧缩部队。晋冀鲁豫边区规定正规军与地方武装不超过居民数百分之二，因此必须紧缩后方机关，充实连队，减少人员马匹。战斗部队团以上战斗员与直属队人员为七与一之比，团以下战斗人员与直属队人员为五与一之比。民兵发展亦有限制，不得超过居民数百分之五。农忙时尤要注重节省人力，免除形式的自卫工作。边区对于精兵的执行，可以说是很彻底的。如总部直属队在紧缩后只留下原有人员百分之四，其余百分之九十六，除有一部分用以充实了下面以外，都真正裁去了。

晋冀鲁豫边区彻底精兵简政之后，已收到许多显著的效果。首先是节省了大量的物力，总部直属队及边区精兵简政之后，预计自六月至年底七个月内，太行区即可节省粮食四万九千余石，节省经费四百二十余万元。边区政府现已节省粮食二万石，移作减免太行区各敌占区人民负担之用。不仅如此，部队和政府更加精干，战斗力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更适合于敌后的艰苦战斗环境，而军政民的团结亦更加增强了。

以上所述，都是晋冀鲁豫边区彻底实行中央精兵简政指示后所获得的成绩，其认真执行的精神，和遇到具体的办法，尤值得各地之效法。现在已进行精兵简政而应有一些成绩的地区，要向晋冀鲁豫边区看齐；个别精兵简政工作落后的地区，更应迎头赶上！

华中局军分会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政策以来，我华中许多地区已开始筹划和进行这项工作，但还有些地区并未确切进行，同时在某些开始进行精兵简政的地区，又因缺乏正确深入的政治动员与精密的计划，故在工作中尚未获得显著的成绩，而且部分干部对精兵简政的认识仍然发生一些错误偏向，如把精兵简政看作为克服困难的一种消极方法或视精兵简政只须以一纸训令即可实现，甚至个别干部和个别工作部门间有因执行精兵简政而发生不团结的现象。为了克服对精兵简政的一切误解与偏向，为了确切贯彻中央的指示，关于精兵简政的计划和步骤特有下列的通知：

（一）精兵简政必须进行深入的政治教育与动员，必须使党政军民一切干部和群众了解今后敌后的严重困难与斗争的复杂和曲折，而精兵简政则正是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胜利反攻的唯一正确的出路，了解精兵简政不是简单裁兵减员拆台散火，而是充实主力加强部队战斗力量，做到以少胜多，短小精干；了解精兵简政正是为了关心民族，照顾群众利益，进一步依靠群众，建立军民血肉不分的联系，不致造成人民负担过重，与民争食的困境。只有从思想意识上使一切干部对精兵简政有正确了解，才能最高度启发其在执行工作中的积极性与自觉性，同时也只有依靠于干部的自觉，而非简单依靠上级的命令，精兵简政始能确切贯彻。

（二）要有精密的计划和步骤，在实施精兵简政时应当分期进行。如第一期为政治教育与动员，其主要步骤是部队和地方党政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教育与动员，克服一切错误偏向，由各师政治部各区党委将中央精兵简政指示，晋冀鲁豫的经验，并据本通知研究拟就精兵简政报告提纲，由负责同志分别到各旅团各地委县委作口头传达，领导各级干部深入研究和讨论党中央指示与报告，务使全党全军都知道中央精兵简政指示的正确。如第二期为调查研究与计划布置，其主要步骤为发动部队及地方党政自下而上进行调查检讨，及各自讨论执行方案，各师司令部及各区党委可组织巡视或考察团，会合各级领导机关调查检讨各级机构工作制度和人民负担情况，建立各级领导机关的编整委员会，并指定专人负责统一领导。各旅团各地委县委，经过一定时间切实调查检讨后，可分别召集精兵简政干部会议，订出自己的精兵简政具体方案，交上级审查批准（在各旅各地委干部会议前各师各区党委当根据中央指示原则配合各部具体情形，预先提出各部应当减缩的大体比例和数目字，作为其检讨标准是必要的）。如第三期为确定全部方案，总结与交换经验及彻底完成计划，其主要步骤为分别召集各师各战略单位与全军全华中精兵简政会议，最后确定全部方案，训令各地全面执行。关于这点在将来华中建军会议中，当有具体讨论确切的原则。

（三）在计划精兵简政中当注意下列基本方针，即在精兵方面应注意在提高部队质量与加强战斗实力的原则下，调整编制，缩减编并某些单位，充实连队，规定战斗人员与直属队

人员数目及比例（连队六与一之比，直属队四与一之比）。严格紧缩后方机关，减少人员马匹，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地方干部到地方军及群众中工作。在简政方面应注意在紧缩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下，裁减骈枝机关，合并单位，达到各级短小精干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严格遵照政民脱离生产干部及杂务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的规定，减少大批杂务人员马匹及伙食单位，克服行政机关庞大脱离群众现象，加强下层机构，使政权进一步依靠群众。

（四）在精兵简政中干部的调整及编余人员的处理应当特别审慎注意。抽调大批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党校抗大学习，不得降级使用，抽调大批可以造就的事务人员及杂务人员送入学校学习，对有专门技术的人材应调到其他部门工作或给以进一步学习机会；对一切编余人员及老弱战士与荣誉军人亦当有计划地安插，如经营各种生产事业，一切对编余人员采取漠视和轻视的态度，都等于犯罪。

（五）爱护培养和节省民力，是精兵简政的中心问题。切实计划开辟各根据地敌后边区整理财政税收，发展生产事业，厉行各种节约运动，严格注意公粮保管及分配。关于以上各种问题，晋冀鲁豫边区精兵简政计划中，均有具体规定，望各地参考执行。

（六）华中局及军分会为了全盘讨论并确切规定全华中精兵简政方案起见，特规定于十二月，举行华中建军会议，盼各师各区党委根据本通知切实布置工作，收集材料，限令于十月内完成精简政治动员，十二月完成精简调查研究，决定具体方案，应将全部材料和方案提到建军会议作最后决定，预计明年一月至二月完成华中全部精简工作。

（七）各战略单位应以精简工作为冬季的中心工作任务，不得有任何忽视，或借口拖延现象，并按月向此间作报告，以便转报中央并交换意见，以利工作进行。

（原载《真理》第十期）

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

毛并报贺高：

关于所询问的十个问题，经过研讨之后，根据此间工作的发展证明及目前情况答复如下。

第一个问题：

1、在反特斗争及减租运动中，左的现象是有的，但并不严重。在去年冬季抢救运动之初期，曾有特务如麻与疏远党外人士的现象。也有乘机造谣说：坦白运动是清党运动，是排斥党外人士者。也有故意陷害党外人士者（如对刘少白、孙良成）。但我们即当众声称，坚持统一战线及三三制政策，提出“保护好人”，并给陷害行为以揭露。抢救运动结束后，半年来，我们对党外人士特别注意尊重与给以实际的工作任务（如以民教付处长、孙良成兼高等法院院长，以樊业如推广纺织运动等）。现在党内外都已了解了反特斗争与三三制及统一战线政策，是有严格的区别的，是两回事。另一方面，在反特斗争中及整风学习、时事讨论中，消除了许多党外人士对我党的误解，提高了他们对于国共两党的认识，也提高了他们本身。党外人士表示“受益非浅”者甚多。因此，这又密切了党内外的关系。

2、党外人士的普遍不满，是对于减租赎地，对于区村干部，对于商量不够。减租减息，关系地主切身利益，颇难说服。而区村干部是直接支持群众的，故易使他们的不满（有时也很不策略，很不妥当）。我们的缺点：则是贯彻三三制的思想不够，对党外人士的帮助不够，民主作风不够。为了进一步的团结，需要在思想上打通及养成民主作风。日常工作要很好在党外讨论过了，再在行政会议上形式的通过，特别需要和他们密切的商量。至于党的重要政策，尤其需要和党外人士交换意见，进行讨论。这对于团结与提高他们，以及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是很有作用的。而我们可是在这方面做的非常不够。

第二个问题：

1、减租中，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在四二年以前，是相当多的。自四三年，减租成为群众的集体性的运动以后，这现象已不多见了。

2、内地区各县的减租任务，已完成了十之七八（兴县十分之九以上都减了）。未减者，多为不应减，或不必勉强减的。边境县，还只是小部分减，大部分未减。因此，今年的减租任务，在晋西北，是不平衡的。我们在秋季，将提出普遍彻底减租的要求，着重在边境县。而内地县则着重时事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减租运动开展以后，大川的工作开展了（地主多在大川），农民种地的多了（兴县约二十四万亩，二分区约

二十八万亩）。

3、左的现象（不普遍，事前注意了争取地主），主要表现在污辱人，减租过多（有减至原租十分之五六者），退租过多（有退至一九四〇年者，原定自四二年临参会后退起），并加以利滚利，使地主担负不起。

第三个问题：

1、拥政爱民运动有进步，表现在部队中已成为群众性的运动经常性的工作了，普遍深入的进行了思想教育，凡事责备群众，批评政府，对群众抓一把的现象没有了。在对敌斗争中，反抢粮，反抢牛，掩护群众生产，帮助群众训练民兵，医病、教育、赔偿损失等方面，都有进步。缺点，则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打通，以为拥政爱民是交换性质的，是上级命令，是部队纪律。单独外出者，特别是事务干部，运输人员，离开监督而犯纪律者还不少。在游击队中，拥政爱民运动还展开的不够，违犯纪律的多些。因此，群众对主力的关系较好，对游击队的关系较差。生产运动，对于拥政爱民运动，是有好作用的，凡生产不好的部队，与群众的关系就差些。

2、拥军优抗有进步。在政民干部及群众中展开了拥军的思想教育与反省，提高了对军队的认识。变工队，有组织的为抗属代耕，在战时，自动的组织担架，爱护伤病员，在平时，招待过往军人，安置退伍及残废军人等，都有进步。缺点，则是思想教育还不够，还有单纯的物质慰劳，简单的摊派办法。对优属，还只限于代耕，没有积极的帮助抗属及退伍军人建立家务，平均主义（不需要代耕的也代耕了），没有积极的培养模范抗属，及经常检查优抗工作不够。

3、在军民大生产、大变工中，及劳力与武力结合中，使军民关系大进一步。

第四个问题：

1、秋冬季大整训，正在研究与计划中。如情况无大变化，估计主力可轮训百分之六十，游击队百分之三十，民兵全部。此外，并将训练地方干部。我们拟提出“全民皆兵”，“全党皆兵”的口号。

2、现在军事工作的主要缺点，是技术落后异常严重。根据夏季军区抽调各分区连队所组成之练兵团检查结果，射击教育有十七种错误理论，托表尺缺口准星尖目标的关系位置，全弄错了，其人数占士兵总数三分之一。手榴弹，全付武装原地立投，近者（十）五米，远者二（？）十三米，平均廿（？）米左右（以实战例证更为明显）。与此并存的缺点，是不爱护武器，擦枪不经常，磨擦准星。以武器担东西，不了解自己武器号码及其性能。练兵团第一次检查武器，全团擦枪较好的只有一支，其余或多或少都生了锈。亦有将机枪零件按错了的。考其原因：

（1）由于战斗频繁，缺乏训练。

（2）由于形式主义的练兵方法沿袭已久，深入人心。在干部不了解训练是作战基础，以为练兵是上级要求，一练兵即突击一时，不顾士兵实际需要，以迎接上级要求的一套形式加诸士兵头上，追人接受。以致操课堂，先生闷气。在士兵则因杀敌保身，迫切需要提高技

术，但不得其门而入，一遇切合实际的练兵方法，即欣然接受，而自觉自动踊跃参加。此大练兵中干部与士兵两种想法与两种练法。此种缺点有纠正之必要，以便造成提高技术，爱护武器的风气，使之习以为常，更加提高我军战斗力。

2、目前政治工作的主要缺点，是零乱和不深入。一方面，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虽然受到批判破坏，但思想上的残余尚未肃清。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作风虽有些发展，但还未系统的建立起来。另一方面，经验主义还未受到必要的批判，干部中狭隘保守的毛病还很严重。因此，连队中许多新的创造不能迅速与充分的反映，更谈不上条理化。新老干部之间有隔阂，这也防碍了新经验的创造与发挥。分别说来，原主力师部队比较踏实，但多保守。三纵队比较活跃，但欠踏实。新军之三十六团（原暂一师），类似一二零师。其余，类似三纵队。（当然具体分析，各部队互不相同，以上是就大体上说）。

第五个问题：

1、现在民兵的主要缺点，是射击，投弹的技术差，爆炸运动犹未普遍开展。

2、现有民兵三万余人。此后一年之内至少可以发展至六七万人，即发展一倍（发展两倍有困难，晋西北现有青壮年约十八万人）。

3、使民兵普遍发展地雷战。首先要领导上注意提倡给以示范并要主力军对地雷战有信心，自己使用，带领民兵使用，设法普遍的制造地雷，使用合格可能使用的东西，以民制公助为原则。

4、晋西北的民兵，是完全参加生产的。多数民兵分编到各变工组（变工的办法），少数单独组织的民兵（仅在最接敌处），则就地参加为宜（变地的办法）。自提出劳力与武力结合之后，克服了民兵脱离生产的现象，生产情绪大大高涨，并更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又促进了民兵的发展。民兵有特别多生产，以解决民兵之费用者。半年以来，证明了民兵英雄往往是努力生产，而积极生产的部队多，往往打过一些好仗。所以在群众中，在部队中，战斗英雄与劳动英雄往往是双料的。减租运动促进了生产运动，而民兵运动的发展与变工互助的发展，又是互有关系的。

第六个问题：

1、关于合法与非法工作的配合，在沦陷区甚差，在接敌区较普遍。其他工作，主要是部队与群众相配合的反抢粮斗争，以及群众性的反贪污斗争，打暗窑运动。此外，则为利用伪组织与掌握维持（在敌据点附近，不能完全消灭对敌的维持，否则群众受害太大）。在敌占优势地区，而我又能利用合法。联系群众，秘密坚持工作，而以离石阎子成武工队为典型（陶铸曾调查此材料）。2、在利用合法工作中最易发生突出的毛病，以至破坏了合法。这是由于许多干部在思想上不愿意承认合法斗争，以及对于战争长期性的认识不够之故。合法与非法，在工作上应相互配合。但在组织领导上，必须严格分别。否则，亦易出毛病。

3、赤白对立的现象，妨碍工作，曾经发生过。经过反对殖民地的观点，及抓一把的思想之后，已逐渐消灭了。现在对于游击区的负担，减至较内地区为轻。对于敌占区，已没有什么负担了。同时，又注意了帮助敌占区的群众解决物质困难（武工队的任务之一）。

第七个问题：

城市工作，正在研究中。过去对此工作的注意非常不够。在中央新的方针之下努力想办法，可以逐步实现的。晋西南工委及八分区（太原区），在太原城内及平川，已有一些工作基础（另电详报）。

第八个问题：

1、人民的负担现状。只有统一公粮一项（对商人是税收），只对农业生产征收。其他副业，如纺织，畜牧等约占国民党经济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皆不征收。去年之产量一百一十七万石，征收公粮二十一万九千五百石，负担率为百分之十八点七六。今年之总产量约为一百三十五万石，征收公粮二十万零五千六百石（比去年减少一万三千九百石），负担率为百分之十五点三二。

2、如从一面增产，一面减收，并以去年之负担率计算，则今年减轻负担为百分之十八点九二。

3、对财政影响不大。惟加重了机关部队的自给任务（明年的予算在研究中，不日拟定后详报）。

第九个问题：

1、机关部队干部及战士的生活，已相当改善。但经常对敌斗争之游击队、武工队，因吃菜困难，生活较差。现在业已实现的供给标准，战士每月每人炭各四十五斤，油十五两，盐一斤，肉二斤。干部则增加一倍，伤病员与干部同。今年的生活，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五十，比四二年以前提高百分之百。对于各机关部队现有之生产基金，每人平均有白洋八十元。今年之自给，为财政总支出百分之三十五。明年，可达百分之五十。

2、农民的收入，是增加的，生活是改善的。因此，历年开荒（少数村庄已超过战前生产水平），种棉、纺织（已绝对超过战前），减租，买地，减轻负担，变工互助，深耕细作等等。富农。中农、贫农的生活上升与翻身者比较，皆是中贫农上升的比较数量大，两年来有上升四五倍。而惟坐吃山空的地主，则是下降的。自己经营的地主，则又不然。

3、农民对于按户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因为有了陕甘宁及晋西北去年的模范例子，中贫农是积极拥护的。有牛的中农及富农，开始时犹豫，后来在锄草时，因劳动力缺乏，也有些参加了。经营地主也有参加（？）的（可少顾长工）。春耕期间，平均十分之二的全劳动力组织起来了。夏锄时，又增加了。惟对于按户计划的检查非常不够，命令主义在开始是有的，随即纠正了。

4、食粮可以做到耕三余一，棉花，今年不足五十万斤。明年再掀起，可以争取自给。油可以百余万斤出口。盐需完全入口（油盐可相抵）。煤、铁、磁器、纸、麻，皆可出口。惟熟铁要入口。菸可自给。颜料现需入口，推广种兰，可减少入口。军火、电器、医药、印刷等材料，每年入口约需白洋百万元。火柴及针，需全部入口。全根据地出入相抵为有余。但

除盐及绝无办法制造的工业品以外，其他都可在发展农工业的方针下设法自给。

第十个问题：

1、各群众团体，并已转入生产运动方面。并准备于今年冬季开始文化卫生运动。

2、在减租、生产、发展民兵、及防奸运动中，积极分子大量生长。今冬（十一月七日），特举行七百五十余人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各种模范者大会（同时开高干会），随即改建与改选各种群众团体。

3、明年正月，拟普遍召开群众性的一揽子会（今冬先在干部中及积极分子中准备好）。其内容，是拥军拥政、发动生产，反省、防奸，改选村政权，及群众组织。

林　枫

未　巧

华中局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

二十八日午电悉。各师首长商谈谨答复如下：

1、关于三三制：

一般说来，时事教育与整风，对华中党外人士影响好。仅有个别士绅在时事教育时，为避嫌疑计，曾自动写反国特（申）明书及申言，但多未把他发表，故印象良好。在反特中，各地均多发生左的倾向，部分士绅在群众大会坦白，且有部分因畏罪逃亡者（如淮北边区参议会付议长及淮南、皖中均有个别参议员逃亡）。另外，淮北边区，因进行反恶霸，反贪污，算旧帐等过左政策，曾一时造成党外人士不满，与不安。各边区对参议会运用和领导，一般经验少。参议会驻会委员，多无经常工作，多感有职无权。苏中区士绅曾说，参议会是马桶，政府要时用他不要时撇在一边。其主要原因：

（一）敌后环境严重，党外人士，特别较老士绅，不能吃苦，会后不愿参加工作。

（二）生活待遇不高，又无油水可揩，多愿回家营业经商，不肯驻会或留任工作。

（三）驻会或留任工作士绅，及党外人士，因生活习惯作风不同，及党员与工农干部对他照顾不周，常感无事可做，或有事不便做。

（四）许多政府重要计划与运动，事先既未和他们商讨，事后又未及时通知他们。有时即使提出讨论，又因磋商精神不够，不能展开争论，故他们不愿提出真心意见。

（五）对他们代人求情、疏通的事，不给他们一些面子。

由于以上原因，虽各地开参议会时热热烘烘，但会后多冷冷静静。要使他们安心工作，我们认为：

（一）对党外人士生活待遇（最少是边区一级）要适当优待。

（二）要配备社会地位与经验均够高的党员参议员，参加驻会委员中工作，照顾其生活习惯作风，领导其工作。

（三）政府重要工作计划及运动，尽量事先召集参议会驻会委员与行政委员联席会议商讨，讨论时，要发扬民主，展开争论。并多召集联席会议报告工作，及发动与采取其批评。

（四）对政府各种兴革工作与运动，利用各种方法吸收他们参加。如事先的调查研究，及设计督导，与事后检查总结，即使对那些当选而不愿参加工作的人，也要经常分派他的工作，及签署他的名字，以尊重他。

（五）对年老与事实上不能参加经常工作的党外人士，应经常吸引他们参加各种社会事业，及在各种社会事业中尊重他一定的地位。对他代人向政府求情说理的事（只要与法律基本不相抵触）应注意顾他一些面子。只要对政府各种兴革计划与运动，使他能参与讨论和工作，则他们对一定社会阶层才能起代表作用，及使他对所代表的阶层获得一定的地位，因而

他们才会乐意和争取参加工作。

右的现象，就是各地对参加政府工作士绅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未能及时纠正。最近才纠正过来。

2、关于减租：

由于地主阶级掌握国民经济及占有财政经济传统优事，又加敌后战争与动荡环境，故减租乃一种艰苦与带长期性的拉锯式的斗争。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并进行连续不断的督促，与反复清查，始能普遍彻底。华中自四一年开始，普遍发动群众减租运动以来，曾连续进行减租与退租运动，凡二三年之久，仍有部分明减暗不减之现象。故我们发动除生产中心任务外，减租仍应定为今年之任务。根据此间经验。一般在开始进行减租运动后，仍须规定每年夏秋二季为减租，冬季为查租，春季为退租（即对查出未减租者其退还佃农，同时春季为贫农缺粮之时，故退租才生效）。只有如此反复进行数年之久才能变成习惯，趋于贯彻。

此间减租中过左现象，有银租不肯改粮租（沿江一带，多公司经营，土地多属银租）。有对游击区与对鳏寡孤独采用减租水准，而不知改变。有一次要退租数年者（如从四〇年退起）。有对中小地主收回部分土地自耕，亦不允许者。至于减租斗争方法过左之处，更多。

3、关于拥政爱民拥军优抗：

较前均进步。表现在，军队已一般开始注意爱惜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帮助人民生产。打骂人民，破坏法令现象大减。地方对军队爱护与优抗工作，较前认真。但拥政爱民工作，在赔偿损失与道歉等上，多认真。而思想与政治教育，尚不深入。因此，部分战士误会“首长变了心，爱民不爱兵。”及在平时拥爱工作尚好，但在战时便不加注意了。拥军，则多偏重物质慰劳，有加重人民负担现象。优抗多半仍属临时慰劳救济性质。其次，较少数是从生产上得到核准解决的。

4、关于练兵：

中央整训部队指示，我们和各师首长讨论过两天。一致认为，根据目前环境，除四师执行新任务，暂难集中整训外，其余各师，只要情况无大变化，均能做到在一年内轮番大整训一次。惟华中整风较陕甘宁要迟，有些地区今年年底才能完成整风任务。因此，整训时间可能推迟一些。如一、二、三、四师，只能从十一月分开始。其他地区可能延至明年一月进行。我们正调整整风与整训的时间问题，以便将整训的时间尽量提前及干部整风不致过分影响部队整训。关于部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除谭政同志报告所指出那些，大部都存在外，教育机关与行政机关，仍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偏向，工作与思想教育，均不深入，常轻作组织结论与政治处分，而少注意耐心说服与打通思想工作。由于敌后长期分散游击战斗环境，各地均不善于争取时间进行整训，故部队游击习气一般浓厚。除一、二、三、四师个别主力兵团外，其他部队兵团，作战经验少，技术和战术教育均差。许多内战时代有经验的老政治干部，多改任军事工作。团营以上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政治干部，为抗战新知识分子，故经验甚差。同时，团级军事干部亦甚缺乏。为了应付将来战争及发展需要，确有从中央补充大批军政干部之必要。

5、关于民兵：

华中民兵与地武，仍有大量发展的可能。除对其他新近发展（可能继续发展）地区，不易估计外，苏中民兵数目尚未过全人口百分之一，淮北民兵不足全人口百分之二。今年各地民兵，仍可增加发展五十万到六十万。计苏中二十万，苏北十万，淮北十万，淮南三万，皖

中八万。但最大的困难，无地方武装干部。过去未注意培养，及缺乏武器（华中民兵一般武器很好，如无好步枪民兵就不要）。为了大量发展民兵与地武应在党政军民中进一步进行思想教育，与各种必要准备，把大量发展与训练民兵与地武，作为今冬各地方党政主要任务之一。在党员军事化的口号下，发动大批党员与干部参加和掌握民兵。在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坚持原地斗争，以便主力将来抽出进行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口号下，普遍发动各地群众参加民兵，与进行军事训练。在边区，特别抓住对敌斗争与保卫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和行动，号召各阶层参加和支持民兵。在各根据地中，应协调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口号，号召群众和各种劳动互助组为基础，进行冬季军事教育，与文化教育，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民兵。在各地普遍开办民兵与武装干部训练班，及编印通讯教材，并总结各地民兵经验，调整各地民兵领导机关。民兵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发展不平衡。例如，在战斗频繁与边区，则民兵发展快，作用大，干部对民兵领导也重视。但在其中心区域，则相反，有些地区对民兵领导较差，有使用民兵去作减租减息的武装斗争，引起各阶层不满。在对敌斗争中，使用民兵担任危险任务，致遭受损失，影响民兵的情绪。由于对民兵的领导教育不够，民兵中党的组织和领导不强，在民兵中均多少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如打骂（个别地方甚至捕杀）群众，脱离群众的现象，发洋财的思想，浪费弹药，违反法令的行为等。关于民兵中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运用，只有在战争频繁的地区，游击地区，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如民兵组织同时成为劳动组织，进行互耕，开荒，修水利。如民兵在有情况时则打仗，掩护群众生产，无情况时，则全体劳动。及在边区，由民兵轮流放哨，轮流生产，发展到一部放哨，集体生产等等。各地中心地区，亦正在参考上列经验，并积累新的经验。要使这个经验成为群众生活习惯，则民兵组织与效能，始能获得极大的发展。

6、关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

我们经验，在民族斗争中，是较阶级斗争中，使用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起来，发展工作，要容易得多。一般的说，在那些我们已有一定的组织基础与群众联系的沦陷地区，或接敌区和在那些我们武装曾经活动过，而现在则安全撤出了，但群众对敌斗争已有相当锻炼的沦陷区，或接敌区，运用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对工作是有更大的发展的。特别在那些过去为我根据地，而后来经过敌人残酷蚕食和清乡，表面上变成沦陷区的地方，如果我们仍能存较小游击队，坚持秘密工作与群众工作，又转变较快较好，而且又彻底运用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之策略，则工作不但可以保持，不受重大摧残，而且可以麻痹敌人，获得更广泛而隐蔽的发展（苏南镇江，丹北地区工作的保持，与苏中四分区在反清乡斗争中对沦陷区和接敌区反获得相当发展，就是很好例子）。但在运用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策略时，要异常活泼灵敏，要善于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地区，不同力量对比，不同群众条件，与群众情绪的变化来正确运用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之策略。在一定时间与地方，要以合法为主，非法为辅。在另一条件下，又要以非法为主，合法为辅。或要把合法与非法相互而行。同时，要善于根据情况之变化，使合法与非法工作的配合，相互转化才能使工作得到发展。

由于不善于活泼运用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策略，而使工作受到损失的经验，也是很多的。华中地区，一般没有发生过赤白对立的现象。只有四〇年，在苏南句容、高淳地区，由于对帮会政策错误，曾发生过几期赤白对立的现象。在苏中高邮地区，地主把持下的联庄会，怕我们去夺取其武装，发生过短期对立现象。但不久被克服。克服方法主要利用敌伪顽

与其上层领袖之矛盾，而多方设法与其上层接近，解释误会，给于实际关照，扫除其疑忌与成见。只要上层见效，则下层对立易除。如果上层接近成功，则当采取双管齐下政策，一方面，始终不过激与不放弃争取其上层，另一方面，则利用其内部矛盾，团结其群众。主要以团结抗战及以我根据地实际正确群众政策，来争取其群众，孤立其反动领袖。

7、关于城市工作：

我们一致认为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完全有实现可能性。但这是一种艰巨工作，一时普遍收效，恐非易事。我们和各师首长，经过两天讨论和研究决定各区党委立即成立城市工作部，并进行配备训练干部，总结各地城市工作与沦陷区工作经验。除各根据地中小城市，次要交通要道，交各区党委分别布置外，对上海、徐州、南京、蚌阜、安庆、武汉及长江与几条主要铁道，均有大体的分工，与相互配合之规定。同时各根据地开始选择一、二个较大集镇，研究和积累管理城市工作之经验，来研究如何利用商业贸易与伪军关系，来开展大城市的宣传，和广泛联结的工作。我们正计划，以大城市地下党为中心的秘密工作，和耐心的群众工作，与以根据地民主政权为中心的公开号召和广泛联络，配合起来，以便双管齐下，来加紧开展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我们在各师首长整风会后，拟专门总结上海工作经验一次。

8、关于负担：

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许多地方人民生活可以相当提高。特别近年来华中各根据地水利建设，均获很大成绩，增加良田，提高产量甚多。仅就淮南路东地区而论，由于水利建设一项，可增加收入百分之十五。华中人民负担，一般较陕北及华北轻得多，各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公粮、田赋负担与总收入量的百分比，计苏中，贫民为百分之三，中农为百分之三点五，富农为百分之四，地主为百分之十。淮南，贫农为百分之三，中农为百分之五，地主占百分之十。苏北，贫农占百分之四，亦贫农无负担，中农占百分之六，富农占百分之八，小地主占百分之八至十，中地主占百分之十二至十五，大地主占二十。淮北，贫农占百分之二至五，中农占百分之六至八，富农占百分之九至十二，地主占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皖中，贫农占百分之三，中农占百分之四，地主占百分之八至十。各地人民，由于负担较轻苛捐又消除，土匪被肃清，一般人民生活（特别是贫中富农生活），一年比一年显著提高，比较沦陷区，顽固区。的确有极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只打算从发展生产，不再增加人民负担着手，而不打算生产后再酌量减轻人民公粮田赋之负担。今年各地均正选择一二区乡，试验征收农业累进税。预备计划明年，普遍征收农业累进税。

9、关于军民生产：

部队生产后，一般生活均改善。如一师，每日油盐五钱，青菜一斤，每月可吃十二两肉（而地方比主力好些）。二师每日油盐五钱，青菜一斤以上，每月猪肉一斤。三师每日油盐五钱，蔬菜一斤以上，每月可吃肉类半斤至一斤（但地方比主力还要坏些）四师每日盐四钱，蔬菜一斤，每月油一斤，黄豆一斤做豆腐（指战员均一样）。七师，每日油三钱盐四钱，但自生产后，每日也可达油盐四钱，青菜一斤，每月每人猪肉一斤标准。但华中各地，因战斗环境不同，及土地分布条件不同，故对部队生产受到一定的限制。大都除栽种蔬菜、麻、饲养猪、羊、鹅鸭外，均进行较大规模榨油、磨粉等合作事业。只有淮南地区，因地广人稀，部队开始能进行较大粮食生产计划。在部队帮助人民生产方面，刻在收割之时，供给人民很大利益。关于开展群众生产运动方面，各地均有成就。仅就淮南路东一个地区而论，在夏收

以前，已有十万以上全劳动和半劳动力的农民组织在互助组织内，已有互助小组约八千个，至今年冬季，估计有二十九万左右农民可组织到劳动互助组。按家计划，我们叫做兴家计划，在普遍进行中。各种民众合作社，亦在开展中。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经过三年来的经营，已大体走上延安南区合作社之道路。举行纺织、榨油、卷烟、运输、农具制造、买牛、贷资、贷粮、贷款、各种事业均在进行中。仅门市部已由一处扩充到十八处，今年上半年门市部营业（卖出货物）达一千九百四十万元。预计下半年可发展到三千万元。半年得利估计可达一千万元。一般经验，按家计划，互助组织需要按照群众自愿为原则，不同地区要采取不同步骤和方法，要同干部和群众先打通思想，要先做样子（选择一二模范互助组织做样子）给大家看。开始要着重奖励模范互助组及劳动英雄，并普遍发动农民到模范互助组与劳动英雄家去参观的运动，求得能把运动迅速普遍发动起来。但要把互助运动进一步巩固坚持与扩大，必须妥善解决互助组的人事问题，慎重选择一个好的组长，对记工和计划，要有一套公平合理灵活而简单的办法。要耐心解决互助组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大小问题。要发扬民主，遇事大家商量解决。劳动规则和纪律，要慢慢建立，不可操之过快，也不可放任不管。凡能照上列办法去做的，不但发展很快，而且巩固也容易，但一般的说，各地在这些工作中，存在命令主义，还很严重。

华中各根据地，除布匹、药品、电料、军需弹药外，一般大都可以自给（只要不是特别荒年及没有敌伪大的扫荡和破坏）。

近年来，各根据地均普遍提倡纺织事业与穿土布运动。个别地区（如三师），已可做到土布自给，其他地区再过一二年，亦可做到。军队布匹，由根据地自给。但自黄淮合流以来，各地湖河淤塞，一遇较大水灾，则洪泽湖有洋溢到苏中的危险。如此，则各地灾荒，不堪设想。但塞黄导淮，工程浩大，非反攻胜利，无法实现。此则我们每年提心吊胆的大事。

10、关于民众团体：

一般的说在减租减息后，各民众团体工作，应转到领导各地人民发动生产，文化娱乐、卫生及各种社会事业方面去，否则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很少工作可做，要成为空架子。特别是妇女群众，如果不用“组织起来”，生产方法，团结他们，则妇女团体，很难真正成为较巩固而有力量的群众团体。现在华中各地均正在（部分已经）作此种转变。但一切与此有深切联系的群众团体，虽在减租减息后，群众仍有许多细小日常生活问题，必须经常充分照顾。尤其乡镇基层政权尚未完全改造，及人民武装尚未充分发动与部分地主仍相当掌握私人武装的时候，群众团体在减租减息后，应注意领导各地人民，协助民主政府，开展民主斗争与对敌斗争，并从民主斗争与对敌斗争过程中，来彻底改造各地乡镇基层政权（摧毁旧式的封建保甲制度），及普遍发展人民与地方武装组织，使一切武装掌握到抗日人民手中来。如果在减租减息后，不注意发动人民完成政权的改造（即使群众抓到镢把子）。则群众对生产兴趣和积极性，将不能极大的发展起来。当华中开始实行减租减息运动时，各地流行一种民谣说：“减租减息，样样都很好，非抓镢把枪把不能保”就是此种心理的反映。华中各根据地基本地区，在今年底，各乡镇民选运动，普遍可以进行，大部乡村政权，可以完成改造。同时在这方面，多年各地均获到相当成绩与经验。

饶漱石

八月二十七日

〔附〕 抗战六年来北岳区农村经济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一九四三年五月）

一、四种地区的四个趋势

战争改变着一切。六年来的抗战，一方面是进步、建设与繁荣；另一方面则是倒退、破坏与衰落。是两种势力和两个方面的决死斗争。在这里对抗着两个政权、两个制度：一方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和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另一方面则是日寇汉奸政权和日本法西斯强盗奴役中国的殖民地制度。由于敌我斗争之犬牙交错，进退起落，由于敌我力量对比之消长变化，反映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上，就表现出四种地区的四种趋势（这四种地区是依敌我斗争情况临时划分的）。

甲、在巩固的根据地（根据三十五个村庄的调查）：

这种地区的基本特点是：党的各种政策一般的都能贯彻，基本群众在政治上已经占有压倒的优势，抗日社会秩序相当稳定。但其中也有一些地区接近敌人，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村庄，都经过敌寇一次再一次的扫荡破坏，有的并曾成为敌之临时据点。

这种地区经济变化的基本特点是：

1、地主经济在逐渐的大量下降和削弱：地主阶级在一九三七年占总户数2.42%，总人口3.61%；在一九四一年降为占总户数2.06%总人口2.85%，到一九四二年则继续下降为占总户数1.91%，占总人口2.51%。在土地占有上：一九三七年占全部土地的16.43%，一九四一年占11.28%，一九四二年则降为10.7%。在劳动力的占有上：一九三七年雇佣劳动力在全部雇佣劳动力中占15.58%，一九四一年占10.28%，一九四二年占8.05%。强畜力（骡马）一九三七年占有18.90%，一九四一年占有3.36%，一九四二年占有6.64%，其他畜力（牛驴）亦大量减少。而一切超经济的剥削和高利盘剥也都取消了。借贷已改为一分利息，即减低了原利率至少约60%。而地租则减低了三分之一，以至一半。目前北岳区一般地租量平均约等于农民总收获量20%—25%，即已少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至于商业买办的支配压榨也大大削弱了。尤其在本区在政治上已经摧毁了地主豪绅的专政，武装了基本群众，广大劳苦人民已经翻了身，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使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受到严重而带有决定性的打击，随之在经济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打击。

2、农村小商品经济大量的畅快的发展：目前根据地小商品经济大量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大量贫农迅速上升，中农经济比重急剧增加。一九四二年中农在农村户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由

* 本资料系一九四三年五月战线社出版的《北岳区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资料》中的第二部分，原题为《抗战后六年来北岳区农村经济与阶级关系变化的特点》。

一九三七年35.42%上升到44.31%；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40.57%（一九三七年）上升到一九四二年之47.47%。从土地占有上看，中农已差不多拥有全部耕地之一半，（即占总土地量之49.14%，一九三七年是41.68%）；从劳动力的占有上看，中农拥有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47.89%，雇佣劳动力在全部雇佣劳动力中占28.08%；占有52.16%的骡马畜力（一九三七年占42.41%）、79.41%的牛力（一九三七年是53.44%），61.88%驴力（一九三七年是55.70%），成为目前农村中欣欣向荣的强大的经济力量。这种农村小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农经济的长足发展（有不小的一部分中农向富裕中农发展），是给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坚实的前提。目前在边区内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份有某种程度的增加，这是战争中乡村对抗城市的必然现象，是落后的中国突然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后，不可避免的暂时现象。但是在同时交换经济在某些地区又有新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则是独立自主的，完全摆脱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

3、富农经济有某些下降，亦有某些上升，一般的是停滞。但在抗战过程中，富农经济之半封建性已被排除，其半殖民地性却完全消灭；而且，在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下，最近也开始表现某种上升的端倪。如富农人口在总人口中之比重由8.45%（一九三七年）降到7.78%（一九四一年）又升到7.88%（一九四二年）富农占有土地之比重由21.93%降到19.15%，再升到19.56%。其目前的变化是不大的，但在环境变化后，尤其在党的政策之普遍正确执行后（过去将地主与富农实际上平列看待和过左的劳动政策，曾给富农经济以很大削弱），富农经济将会有很好的发展的，这是完全符合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方针的。新的富农经济的发展，将是资本主义性的。其半封建性必全被排除。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富农必然要走的道路。尤其是由中农甚至贫农上升的富农，其生产积极性及其政治积极性都是新劳动者的类型，这一原则的区别，应很好的注意。

4、商业资本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大衰小盛”，但经过一度衰落之后，较大的商业亦有逐渐兴起者。这主要的表现在某些市镇的繁荣，某些地区小贩运销的发展和某些中等商业的恢复或新建。大商业的封建性、垄断性已渐被排除（收租放债的商号已经极少，商业中高利盘剥，一般的说已被取缔），中小商业摆脱了大商号及买办阶级之附庸的地位，大中小商业之间，在我公营商店的影响和领导下建立了“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共同对敌”的关系，这是根据地新兴商业的特点。如果将统一累进税中对私商征税适当减轻，则对根据地商业的发展和吸收“敌占区”商人投资必有重大作用。

5、公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政府经营的某些工业及公营、公私合营的商业之发展，消费与生产合作事业之增长，在对敌经济斗争与反对一切“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斗争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合作经济中出现了农业合作生产的新形式，如阜平草厂口十余顷被水冲了的滩地（地权是地主的，滩股东则是出力修滩的农民），由股东选举领导机关，统一指挥生产，按股出力，按股分粮的生产方式，在沙河、唐河沿岸相当流行（这种形式有其发展的理由，与“集体开荒”“青年林”“妇女林”等勉强出来的“集体”是不一样的）。这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新的经济形式，是值得很好的研究其利弊得失与经验教训的。

6、小手工业，家庭富业之逐渐恢复——主要的是家庭纺织事业：如平山田兴村（曾经是无人区，已经恢复。）织布机数：

年　代	铁　机（台）	木　机（台）
1937年	22	36
1941年	24	37
1942年	30	36

一般的讲，家庭手工业及小手工业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其发展前途则是不可限量的。

如以自去冬今春救灾以来新的材料（不是88个村庄的调查材料）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只要党有正确坚强的领导，在新的劳动群众的基础上，在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与封建经济束缚的条件下，在市场需要的不断刺激的情况下，小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是会大规模的发展起来的。尤其因为小生产者在战争中所具有的特殊优越的生活力（生产工具简单，固定资本极小，易毁亦易复，可以在战争中不屈不挠的生存），和一般的家庭副业免税的鼓励下，小手工业特别是家庭副业之发展具有极光明的出路的。在今年救灾的片断材料中，即可看到新的发展情况。

纺织工作去冬起首在完县试行，得到很大成功后，从此各地大规模开展起来，解决了大量灾民的生活问题，稳定了部分灾民逃荒的情绪，各地纺织人数在日渐增加着。如一月份统计：

三　专　区	纺　织　人　数	6,000余人
四　专　区	纺　织　人　数	10,714人
五　专　区	纺　织　人　数	4,401人

其中以四专区参加纺织人数较普遍，二月份四专区纺织人数已增为一六三六四人，到三月底则增加为二二三〇四人。阜平山地过去有的老百姓未曾见过纺车，更不会纺纱，目前也开展了纺织工作。如五区一个区新增了纺车即有三百二十余辆。

在生产救灾过程中，除纺织与贸易运输事业的大规模开展外，其它各种家庭副业也得到急遽的发展，在救灾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最普遍的如打柴，完县有的地区每人每天可打柴50—100斤，卖七元——十四元，即可解决一个多人的生活，完县一区团结村有七十三人，清醒村有十户依此过活。此外如徐水的打石板业发展到三百多人。割荆条在三专区四专区都有，如易县灾民到狼牙山割荆条为生，完县一区百福台有十四户灾民依割荆条为生。

在四专区，目前已发展了的副业有以下几种：开矿（唐县七十人）编筐织席（阜平三五〇人，唐县一四三人），炭灰业（阜平四十人），织毛口袋（阜平三二〇人，唐县一〇人），纺绒线（阜平一〇〇人，唐县五〇人），磨香油（完县三〇人）。这种副业生产都发挥了不小的渡荒作用。如阜平七区房家河，最近烧石灰六〇〇余斤，每斤可卖洋五元，向山西运销，每斤可换回莜麦半升或其它杂粮一升，近计划（三月底）再烧二七〇〇斤，对灾民生产的接济上作用很大。又如编筐织席近在阜平三、四区开展的很热闹。除上所举者外，各地都恢复一些本地所旧有的副业，打破了生产的局限性，扩大了救灾的范围。

但是小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的发展，必须有计划的调剂，必须和各种生产事业和对敌经济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将资金原料、劳动力和市场一链三环的结合起来，必须充分的注意到其季节性，否则是不会顺利成功的。

乙、在游击区（根据四十二个村子的调查）：

这些地区包括接近敌人的地区，有游击根据地（占绝大多数）及敌占据点。这些村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四一年反扫荡之后才变成游击区的。环境变化之前与巩固区特点相同。环境变化之后，我之政策一般的尚能执行，但对敌负担一般的均极重，其中少数村庄还在三四年前即已资敌，在其资敌前及资敌后，我之工作大多数已经建立，各种政策一般的亦能执行，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后环境再变，敌之统制加强，勒索加紧。但我之工作一般的还在坚持。抗日两面政权是这些地区的基本特点。

这些地区，一般的是处于平原或山缘地带及大河流域。经济生活比较富裕。其在抗战中经济发展之特点是：

1、封建的地主经济急剧下降：地主的户数在总户数中的比重由1.69%（一九三七年）到1.68%（一九四一），再到1.50%（一九四二）。在人口中的比重由1.81%（一九三七年）到1.44%（一九四一）再到1.29%（一九四二）。在土地占有上由10.47%（一九三七年）到8.41%（一九四一），再到7.61%（一九四二）。在劳动力的占有上也是这样一直下降的趋势。

2、富农经济显著的下降了：其在总户数中的比重由7.95%（一九三七）到6.97%（一九四一），再到6.81%（一九四二）。在人口中的比重由12.23%（一九三七）到10.25%（一九四一）再到10.13%（一九四二）。在土地占有上则由26.95%（一九三七），到22.02%（一九四一），再到21.15%（一九四二）。在劳动力占有上的下降，亦甚显然，巩固区富农经济下降是不明显的，且在一九四二年某些方面已见回涨，游击区则是显著的下降，也不能不继续下降。

3、农村小商品经济由上升到停滞：主要的表现在一九四一年以前中农激剧上升，其增涨率虽不若巩固区之大，但亦相差不远，（以户数而论，巩固区由35.42%到42.65%，游击区由36.14%到41.01%），在一九四一年环境剧变之后，中农上升极其困难，贫农则显然增加。如巩固区中农在户数中之比重由42.65%—44.31%；游击区则是41.01%—41.93%，在此期间巩固区贫农仍在减少（38.59%—37.72%）游击区贫农则有些增加（由43.05%到41.65%又到41.93%）。

4、工商业（主要是商业）及小手工业则大不如前：最显著的如：曲阳文德村抗战前年产土布约十万匹，现则只产一万匹，小车业抗战前销行数县，现已大不如前。行唐南曲河，过去80%的人家均织布，现在已不多。云彪东山羊是三分区最大集镇之一，现已衰落。完县五里岗手工业由繁荣到衰落的情况，更是典型的说明：

年份 \ 户数 \ 行业	纺织业	荆货业	磨坊业	小商业
1937年	45	39	8	17
1941年（夏季）	68	47	1	18
1942年	23	13	1	13

丙、在老"爱护村"：

根据定唐小西涨，庞白土，寿阳的解愁，橙桥沟，广灵（原属蔚县）大探口五个村子的

调查（这五个村子已统计到游击区中了）。这种地区的一般特点是：敌寇势力很早就占着优势，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即已开始资敌，我之工作开辟较晚（大都在已成为爱护村之后，组织基础比较簿弱（两个村尚无支部，或只有一个党员），顽固势力还占优势，我之政策执行既差且迟。这种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全体下降，全体破产。

1、地主经济大多数陷于破产：在户数中的比重由2.83％到2.09％，再到2.05％；在人口中之比重，由2.58％到1.50％，再到1.42％；土地占有由8.36％，到6.36％再到6.28％。至于粮食、衣服财物之被敌掠夺、抢劫，为数尤巨。特别在初被敌人占领时，敌伪之勒索敲诈尤为残酷惊人。

2、富农经济大量下降：在户数中之比重由4.99％到3.44％，又到3.52％；在人口中之比重由7.45％到4.67％，又到4.95％；土地占有由17.41％到10.98％，又到11.23％；劳动力占有人力由6.11％到3.80％，再到4.06％；雇佣人力由85.25％到75.14％，再到65.72％；骡马由24.67％，到25.93％，再到28.22％。

3、农村小商品经济同样下降或没有发展：中农在户口中的百分比是由32.28％到32.15％，再到33.40％。中农在数字上虽略有增加，但这是由于农村经济破产，地主富农大量下降的结果并非由贫农上升所致。贫农则是激剧增加（43.60％到47.85％再到49.89％），而贫农的大量增加，就是农村经济破产的悲惨写照。

4、工商业萧条：如解愁是寿东商业中心现已衰落不堪，手工业都大不如前或者完全破产。

5、在这些地区基本群众尚未取得优势，封建势力仍然把持政权，摊派不合理，因使中农贫农破产愈为深重。

上述材料，极不完全，不能完全代表老“爱护村”的一般经济实况。

丁、在无人区（四个村的统计）：

这些地区是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后，变为无人区的。在此以前，都是我之巩固根据地，在目前亦已恢复。在这些地区我之各种政策曾经贯彻实行过（五台三个村主要是在一九四〇年民主大选举中贯彻的），现在亦仍然继续执行着。但经此浩劫伤痛惨剧，现时经济发展的面貌已大非昔比！从下列数字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一九四一年前后不同的经济情况。

1、地主经济急剧下降，又显回涨：地主阶级在户数中之比重由2.87％到2.54％又到3.03％。土地由21.99％到16.52％又到13.58％。

2、富农经济飞速下降：户数由9.68％到5.08％再到3.17％。土地占有由28.85％到16.61％再到10.52％。劳动力占有亦同样是下降的。

3、农村小商品经济是“急起直落”：中农经济由大量增加到剧烈减少，（户口比重由33.13％—39.76％—29.83％；土地占有由33.01％—44.79％—33.65％）贫农经济由大量减少到急剧增加（户口比重由34.04％—30.49％—38.15％；土地占有由15.46％到16.81％再到31.31％）。

戊、四种地区经济变化的具体数字，表一、表二的数字可作参考和根据。

表一A

抗战以来不同地区各阶层人口户口百分比分配表*

阶层		巩固区			游击区			无人区			老爱护村		
		1937	1941	1942	1937	1941	1942	1937	1941	1942	1937	1941	1942
工人	户数	2.56	1.92	1.99	1.64	1.31	1.13	3.78	3.41	3.03	1.81	1.77	1.82
	人口	1.92	1.49	1.49	1.26	0.94	0.76	3.65	2.61	2.47	0.82	0.76	0.76
雇农	户数	7.06	3.61	3.23	4.74	3.24	3.25	8.77	8.82	10.06	3.39	2.32	2.50
	人口	4.82	2.55	2.41	3.21	2.13	2.22	7.03	5.93	7.55	1.59	0.74	0.82
贫农	户数	40.47	38.59	37.72	43.05	41.65	41.78	34.04	30.49	38.15	43.60	47.85	49.89
	人口	35.71	35.00	33.94	39.02	28.81	39.08	25.96	29.97	29.83	43.55	50.44	52.59
中农	户数	35.42	42.65	44.31	36.14	41.01	41.93	33.13	39.76	29.75	32.28	32.15	33.49
	人口	40.57	43.04	47.47	39.03	43.75	44.40	34.21	40.87	30.55	35.22	33.78	34.83
小工商业	户数	4.41	3.75	3.32	3.16	2.76	2.01	6.35	8.07	10.74	8.27	7.62	3.75
	人口	3.40	3.10	2.25	2.55	2.31	1.61	7.86	8.36	10.35	7.66	6.87	3.24
自由职业者	户数	0.08	0.02	0.02	0.03		0.01						
	人口	0.03	0.01	0.01	0.03		0.01						
富农	户数	5.91	6.02	5.8	7.95	6.97	6.81	9.68	5.08	3.17	4.99	3.44	3.52
	人口	8.45	7.78	7.88	12.23	10.25	10.13	16.22	8.43	4.82	7.45	4.67	4.95
工商业	户数	0.72	0.59	0.66	0.14	0.11	0.10				1.13	0.99	0.91
	人口	0.17	0.53	0.86	0.04	0.05	0.04				0.45	0.47	0.41
地主	户数	2.42	2.05	1.91	1.69	1.58	1.50	2.87	2.54	3.03	2.83	2.09	2.05
	人口	3.61	2.85	2.51	1.81	1.14	1.29	4.48	3.05	3.44	2.58	1.50	1.42
游民	户数	0.48	0.44	0.45	0.58	0.52	0.55	0.16	0.30	0.14	1.47	1.44	1.82
	人口	0.37	0.31	0.39	0.22	0.20	0.23	0.04	0.10	0.04	0.61	0.63	0.88
孤独	户数	0.13	0.14	0.21	0.70	0.85	0.09	1.58	1.79	1.65	0.23	0.33	0.34
	人口	0.13	0.12	0.15	0.19	0.22	0.25	0.43	0.68	0.85	0.07	0.14	0.09
其他	户数	0.34	0.30	0.25			0.20	0.15					
	人口	0.23	0.22	0.13			0.01	0.18					
合计	户数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人口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此原表不准确，未改动。

表－B

抗战以来不同地区各阶层土地占有百分比分配表*

阶层	年份	巩固区				游击区			
		水地	旱地	其他地	各类土地共计	水地	旱地	其他地	各类土地共计
工人	1937	0.08	0.55	0.06	0.42	0.13	0.13	0.11	0.14
	1941	0.06	0.29	0.03	0.24	0.25	0.21	0.14	0.23
	1942	0.03	0.37	0.39	0.31	0.35	0.18	0.21	0.21
雇农	1937	0.75	1.15	0.13	1.18	0.43	0.90	0.35	0.81
	1941	0.43	0.73	0.41	0.67	0.33	0.57	1.50	0.55
	1942	0.33	0.86	0.50	0.75	0.41	0.57	1.80	0.55
贫农	1937	12.89	18.36	30.81	17.92	16.60	20.75	21.80	20.00
	1941	14.72	20.43	26.38	19.13	18.18	21.16	28.60	20.81
	1942	17.59	19.24	28.99	19.37	18.53	21.92	27.33	21.33
中农	1937	40.40	41.59	47.17	41.69	36.01	41.51	45.32	40.65
	1941	50.78	47.33	57.13	48.36	40.04	48.39	41.60	46.08
	1942	49.70	48.42	59.89	49.14	43.01	49.11	38.73	47.60
小工商业	1937	0.43	0.22		0.26	1.23	0.56		0.68
	1941	0.53	0.33	0.23	0.37	1.10	0.65		0.73
	1942	0.66	0.29	0.40	0.37	1.02	0.65		0.71
自由职业者	1937								
	1941								
	1942		0.01						
富农	1937	19.09	23.10	12.76	21.93	34.67	25.02	32.36	26.95
	1941	16.80	20.24	8.23	19.15	30.49	19.92	28.20	22.02
	1942	16.99	20.88	7.79	19.56	28.70	19.16	25.25	21.15
地主	1937	25.21	14.63	7.92	16.43	10.48	10.62		10.47
	1941	16.65	10.37	7.42	11.28	8.45	8.56		8.41
	1942	14.27	9.63	2.02	10.17	6.96	7.77	6.68	7.61
工商业	1937	0.17	0.03		0.10		0.00		0.00
	1941	0.16	0.08		0.10				
	1942	0.15	0.18		0.17				
游民	1937	0.37	0.02	0.03	0.06		0.14		0.01
	1941		0.06		0.05		0.23		0.19
	1942	0.01	0.09		0.07		0.02		0.44
孤独	1937	0.01	0.01		0.01	0.12	0.31		0.02
	1941	0.12		0.03	0.03	0.27	0.33		0.32
	1942	0.17	0.03	0.02	0.06	0.29	0.40		0.58
其他	1937		0.03		0.00				
	1941				0.02				
	1942	0.10			0.02		0.02		0.02
共计	1637	100.00	100.00	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941	100.00	100.00	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942	100.00	100.00	00.00	100.00	100.00	100.00	190.00	100.00

*此原表不准确，未改动。

抗战以来不同地区各阶层土地占有百分比分配表

无人区				老爱护村		
水地	旱地	其他地	各类土地共计	水地	旱地	各类土地共计
0.52 0.67 0.58	0.71 1.08 1.14	0.36 0.37 0.22	0.57 0.80 0.80	0.04	0.15 0.11 0.11	0.13 0.09 0.08
0.78 1.92 1.95	1.51 1.89 2.41	1.02 1.07 5.15	1.17 1.67 3.04	0.29 0.05 0.04	0.17 0.09 0.08	0.23 0.08 0.07
8.08 13.20 11.34	11.79 11.63 26.73	31.04 29.48 54.21	15.46 16.81 31.31	29.34 32.03 40.85	39.73 20.02 23.82	32.15 30.07 32.11
23.40 42.23 47.04	32.36 45.43 33.82	40.05 45.62 24.86	33.01 44.79 33.65	38.24 41.96 39.72	43.86 53.01 15.62	40.05 50.75 49.14
3.29 7.52 9.17	1.54 3.21 4.86	0.81	1.70 3.28 4.85	0.93 0.92 0.73	0.81 0.86 0.87	0.87 0.87 0.84
54.48 32.38 23.30	24.12 15.03 11.37	5.64 6.93 1.14	28.85 16.61 10.52	32.24 19.69 17.32	11.24 9.60 9.02	17.47 10.98 11.23
3.18 1.47 4.65	27.63 21.16 18.94	21.99 16.52 13.58	18.89 15.61 14.91	8.92 3.35 1.34	7.81 7.17 7.53	8.35 6.36 0.28
	0.10		0.08		0.09 0.10 0.12	0.08 0.99 0.08
0.66 0.51 1.99	0.33 0.58 0.89		0.35 0.43 0.84		0.14 0.16 0.16	0.18 0.13 0.1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0	01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抗战以来不同地区各阶层劳动力占有百分比分配表*

表—C

阶层	年份	巩固区					游击区				
		人力		畜力			人力		畜力		
		自己的	雇的	骡马	牛	驴	自己的	雇的	骡马	牛	驴
工人	1937	2.30					1.46				
	1941	1.87					1.13				
	1942	2.01					1.05				
雇农	1937	6.85					4.14				
	1941	3.62					2.77				
	1942	3.21					2.64				
贫农	1937	38.49	2.69	5.67	21.88	28.57	39.04	0.73	9.65	20.79	24.03
	1941	35.29	2.82	12.04	25.25	21.60	38.19	1.03	7.96	24.80	22.62
	1942	36.40	2.70	10.97	3.53	18.34	39.44	1.38	7.17	24.06	22.86
中农	1937	41.52	21.83	42.41	53.44	55.70	41.23	12.10	38.82	53.69	49.01
	1941	48.49	22.79	52.10	60.05	60.72	44.52	15.42	43.58	55.88	59.54
	1942	47.39	28.08	50.16	79.41	61.88	45.08	17.94	45.84	56.57	60.55
小工商业者	1937	2.04	3.85	3.20	0.36	1.33	3.57	1.99	0.1	0.73	1.29
	1941	2.97	2.72	5.04	0.39	1.34	3.26	1.02	0.90	0.68	1.19
	1942	2.80	2.50	7.97	0.64	1.14	2.16	1.28	0.23	1.53	0.33
自由职业者	1937						0.01				
	1941	0.01									
	1942	0.01									
富农	1937	5.83	51.92	29.92	17.61	12.26	9.64	74.85	44.57	17.08	15.57
	1941	6.11	58.95	27.45	13.11	14.23	9.39	76.86	45.00	16.76	14.92
	1942	5.87	56.64	20.94	15.67	16.27	8.89	69.01	44.95	16.44	14.48
工商业者	1937	0.51	0.78	0.32	0.10	0.14	0.01	0.11	0.11		
	1941	0.39	1.29			0.45					
	1942	0.56	1.00	0.66	0.42	0.89					
地主	1937	1.33	15.55	18.90	4.87	1.94	0.61	9.96	5.91	1.65	9.61
	1941	1.14	10.28	3.36	1.29	1.31	0.42	5.30	2.47	1.85	1.75
	1942	1.01	8.05	6.54		1.40	0.36	9.83	1.80	1.30	1.57
游民	1937	0.16				0.10	0.15	0.18			
	1941	0.14					0.14	0.13			
	1942	0.16					0.15	0.14			
孤独	1937	0.01	0.03			0.05	0.20	0.28	0.01		
	1941	0.03	0.64			0.06	0.19	0.38		0.08	0.09
	1942	0.04	0.61	0.66	0.33	0.02	0.25	0.42		0.08	0.10
其他	1937	0.19			0.10	0.18					
	1941	0.08	0.56			0.12					
	1942	0.05	0.43								
共计	1937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94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94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此原表不准确，未改动。

抗战以来不同地区各阶层劳动力占有百分比分配表

无人区					老爱护村				
人力		畜力			人力		畜力		
自己的	雇的	骡马	牛	驴	自己的	雇的	骡马	牛	驴
3.64					1.27				
2.78					1.21				
2.86					1.26				
8.14					1.72				
7.59					1.05				
10.30					1.11				
35.05		17.39	27.29	0.06	48.54	2.54	16.44	21.50	19.25
31.12			26.07	11.00	47.03	0.29	37.04	24.19	44.34
39.72			34.31	25.00	51.86	1.74	34.27	22.20	42.69
36.25	7.95	26.07	55.91	0.42	34.73	9.67	49.29	63.50	55.10
44.00	30.21	20.00	57.50	51.66	35.28	12.68	33.33	68.51	42.86
33.57	24.49	25.00	59.85	44.23	36.74	24.65	37.50	67.89	45.07
6.19		4.34		0.05	10.94		6.86		2.25
7.75		10.00		3.85	10.55	2.82			0.61
9.11				7.69	3.76	2.75			
10.03	90.19	21.74	9.15	0.38	6.11	85.25	24.67	15.00	18.11
6.09	65.63	50.00	3.80	26.65	3.8	75.14	25.93	6.85	11.55
3.45	75.51	75.51		17.31	406	65.72	28.22	9.90	12.23
0.45	1.13	30.43	13.65	0.04	1.22	2.54	2.74		5.29
0.48	2.08	20.00	11.67	6.66	0.60		3.50	0.81	3.65
0.77			5.81	1.92	0.63	5.41			
					0.41				
					0.36				
					0.52				
0.10					0.06				
2.08					0.12				
0.24				3.85	0.06				
0.1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各阶层户口人口土地劳动力分配表

阶层	年份	户口				人口			
		巩固区	游击区	无人区	老爱护村	巩固区	游击区	无人区	老爱护村
工人	1937	134	128	25	16	513	519	93	25
	1941	108	108	21	16	381	385	77	34
	1942	114	94	22	16	354	312	66	33
雇农	1937	370	369	58	30	1,291	1,322	179	78
	1941	203	268	59	21	651	888	175	33
	1942	185	272	73	22	573	915	202	35
贫农	1937	2,122	3,351	225	385	9,544	16,059	661	1,859
	1941	2,169	3,446	204	433	8,930	16,179	885	2,247
	1942	2,162	3,486	277	439	8,065	16,097	1,066	2,271
中农	1937	1,857	2,823	219	285	10,844	16,182	871	1,540
	1941	2,397	3,393	266	291	11,745	18,226	1,207	1,505
	1942	2,539	3,498	216	294	11,280	18,280	818	1,504
小工商业者	1937	231	246	42	73	926	1,050	200	327
	1941	211	228	54	69	790	964	247	306
	1942	198	168	78	33	678	664	277	140
自由职业家	1937	4	8			12	15		
	1941	1				2			
	1942	1	1			2	2		
富农	1937	310	619	64	44	2,259	5,028	413	319
	1941	332	577	34	31	1,984	4,275	249	208
	1942	333	568	23	31	1,872	4,175	129	214
工业商者	1937	38	11		10	172	19		19
	1941	33	9		9	136	21		21
	1942	38	8	2	8	201	18	2	18
地主	1937	127	132	19	25	972	746	114	110
	1941	115	131	17	19	728	574	90	67
	1942	109	125	22	18	597	531	92	67
游民	1937	25	46	1	13	90	92	1	26
	1941	26	43	2	13	80	82	8	28
	1942	26	46	1	16	72	94	1	38
孤独	1937	7	55	7	2	39	81	11	8
	1941	8	70	12	3	31	93	20	6
	1942	12	75	12	3	37	102	23	4
其他	1937	18		1		63		3	
	1941	17				55			
	1942	14	2			33	3		
共计	1937	5,243	7,783	661	883	26,725	41,113	2,546	4,270
	1941	5,620	8,273	669	905	25,513	41,687	2,953	4,455
	1942	5,731	8,343	726	880	23,764	41,193	2,677	4,318

此原表不准确，未改动。

各阶层户口人口土地劳动力分配表

土				地			
巩固区				游击区			
水地	旱地	其他地	各类土地共计	水地	旱地	其他地	各类土地共计
10.30	249.10	2.00	261.40	38.62	163.50	2.00	204.12
7.30	139.80	1.00	148.10	77.11	251.18	1.50	329.29
3.85	171.65	10.00	185.50	96.34	205.88	2.50	304.72
93.98	629.60	4.00	727.58	122.37	1,074.37	6.50	1,203.24
48.42	343.85	13.00	405.27	102.00	672.49	16.50	790.99
36.83	397.75	13.00	447.64	110.69	663.07	21.50	795.29
1,610.64	8,452.40	985.75	11,048.79	4,621.71	24,344.02	392.9	29,659.33
1,623.53	1,691.00	670.70	11,985.23	5,198.59	25,377.53	313.80	30,307.20
1,975.25	8,929.30	754.45	11,656.00	5,042.11	25,377.53	326.60	30,746.24
5,055.07	19,134.27	1,510.14	25,699.48	0,044.20	49,299.03	815.50	60,158.73
5,593.97	22,340.18	1,452.59	29,386.74	10,968.34	56,692.55	456.93	68,117.82
5,578.50	22,441.97	1,552.24	29,572.71	11,701.92	56,856.82	462.73	69,021.47
54.80	108.65		163.45	542.82	668.62		1,011.44
59.04	159.77	6.00	224.81	302.51	759.26		1,061.77
73.84	136.50	10.50	220.84	276.53	748.11		1,024.43
	2.00		2.00		4.50		4.50
	3.00		3.00				
2,494.34	10,628.63	408.44	13,571.41	9,653.38	29,743.00	582.30	39,978.68
1,871.65	9,557.52	209.19	11,638.36	8,352.65	23,398.49	309.90	32,061.04
1,906.98	9,679.94	202.18	11,789.10	8,008.07	22,185.83	301.90	30,495.80
21.80	39.30		61.10		5.50		5.50
18.70	39.90		58.60				
16.85	85.45		102.30				
3,151.44	6,732.68	253.60	10,137.72	2,916.70	12,616.12		15,532.82
1,769.19	4,895.97	188.70	6,853.86	2,314.36	9.925.86		12,240.22
1,601.68	4,462.79	52.40	6,116.87	1,894.81	9,000.36	80.00	10,975.17
3.80	17.44	20.00	41.24		175.36		175.30
1.40	30.50		31.90		271.70		271.70
1.10	41.51		42.61		236.00		236.00
2.30	5.00		7.30	63.95	364.75		428.70
13.80	0.50	1.00	15.30	75.05	385.90		460.95
19.20	13.00	4.00	36.20	79.35	467.97		547.32
3.30	0.30		3.60				
10.80	2.00		12.80				
10.80	2.00		12.80		24.00		24.00
12,498.77	45,999.38	3,183.93	61,682.08	27,803.75	118,759.41	1,799.20	148,362.36
11,017.80	47,200.99	2,542.18	60,760.97	27,300.61	117.152.24	1,098.63	145,614.49
11,224.94	46,364.86	2,595.78	60,185.58	27,209.61	115,765.57	1,195.23	144,170.41

各阶层户口人口土地劳动力分配表

土							地
无人区				老爱护村			
水地	旱地	其他地	各类土地共计	水地	旱地	其他地	各类土地共计
12.95	26.80	7.00	46.75	1.00	15.30		16.30
10.25	38.20	7.00	55.45		10.30		10.30
7.00	45.45	4.00	56.45		10.30		10.30
19.27	56.50	20.00	95.77	5.60	18.20		23.80
28.90	66.70	20.00	115.60	1.14	7.89		9.03
23.33	95.99	95.00	214.32	1.14	7.89		9.03
214.43	442.30	609.00	1,265.73	770.07	3,765.96		4,536.03
199.00	411.48	553.00	1,163.46	887.30	2,679.97		3,567.27
136.86	064.93	999.70	2,201.49	981.24	2,720.41		3,701.65
720.47	1,213.85	785.70	2,701.02	1,006.10	4,619.15		5,625.25
636.59	1,607.60	855.82	3,100.01	1,005.50	4,895.25		5,900.75
567.89	1,348.01	457.60	2,373.50	953.85	4,709.30		5,663.15
81.35	57.90		139.25	24.35	85.05		109.40
113.36	113.43		226.79	21.95	70.15		101.10
110.70	194.60	15.00	320.30	17.55	79.45		97.00
1,345.76	904.91	110.00	2,360.67	585.00	1,183.66		1,768.66
488.13	531.97	130.00	1,150,10	400.00	877.69		1,277.69
281.25	452.83	20.00	754.08	416.00	878.69		1,294.69
78.60	1,036.60	430.50	1,545.70	236.20	823.0		1,059.30
22.10	748.75	310.00	1,080.85	80.20	660.10		740.30
56.15	742.69	250.00	1,048.84	32.20	691.60		723.80
					10.00		10.00
					10.00		10.00
	3.80		3.80		10.00		10.00
16.30	12.46		28.76		14.90		14.90
9.15	20.46		26.61		14.90		14.90
23.86	35.35		59.21		14.90		14.90
2,670.13	3,751.32	1,962.20	8,183.65	2,629.92	10,533.62		13,162.64
1,507.48	3,538.65	1,875.80	6,892.33	2,396.09	9,235.25		11,631.34
1,207.04	3,983.65	1,841.30	7,031.99	2,401.96	9,122.54		15,524.50

二、农村经济发展中两个力量的斗争

甲、上述四种地区农村经济变化的趋向，显然的可以说明敌我经济斗争的尖锐情形，特别是表示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因素逐渐的瓦解与削弱封建半封建经济势力的斗争，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的预见到抗战以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大致趋向和轮廓。

抗战中封建半封建经济势力在四种地区都是逐渐的削弱着：在日寇的亡国灭种的野蛮掠夺之下，下降的最快，在我之各种政策正确执行的地区，下降的比较缓慢，且有一定的限度，在我之政策执行中发生偏向的时间和地点，则下降极快，且无定度。农村小商品经济还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但它却是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园地，在我党的政策的执行和影响之下，在四种地区（主要是巩固区与游击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我之巩固根据地，由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贯彻执行，得到比较畅快的大量的发展；在我之政策能够执行，同时又遭受日寇法西斯残酷压榨的游击区也是发展的，但发展的比较缓慢，而且经受着许多痛苦；在日寇组织较强，但我之政策还能部分执行的"老爱护村"，则发展的更加缓慢或表现某种停滞，其发展中所经受的各种痛苦也更多更大；在曾经成为无人区的地方，虽被日寇残酷的破坏，但既经恢复（即变成有人区）之后，仍然是发展的。因此，目前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富农经济）虽无显著发展甚或表现某种停滞与下降，但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因素则得到长足的发展。富农经济在党的政策（主要是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更认真的普遍正确执行之后，在根据地内亦会有新的发展的。至于在敌占区少数汉奸发财之地，有极少数新起地主，那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一般的规律。更不能表示经济的向上发展。

乙、封建半封建经济势力之逐渐的削弱和农村小商品经济之发展，主要的表现在：

1、农村中封建剥削阶级在户口、人口、土地、劳动力占有的比重上均大量的减少。农村中小商品生产者（中农贫农是主要的，尤其是中农）大量增加（如以上所述者）。

2、土地处于分散的过程，大批土地由地主及部分老富农手里流入贫农，中农，以及新起的富农手中，下表（表三）即可非常清楚的看到这种趋势。

表三　　抗战以来土地关系变动表　　（单位：亩）

			工人	雇农	贫农	中农	富农	地主	小工商业
巩固区	买卖地	卖出	4.00	7.30	492.45	765.00	1,061.30	1,320.61	4.50
		买入	29.80	102.15	669.89	1,192.18	113.77	35.25	60.70
	当地	当出		3.00	44.00	188.53	175.94	423.10	4.30
		当入	16.20	16.24	401.23	496.00	85.35	4.85	98.15
游击区	买卖地	卖出	16.00	19.31	818.00	1,173.89	1,354.68	1,410.20	10.50
		买入	34.84	68.84	1,215.87	2,232.64	514.30	106.22	139.36
	当地	当出	4.00	18.00	654.78	1,374.95	1,844.42	1,375.72	25.30
		当入	223.50	62.87	1,742.50	2,469.65	232.30		56.90
	抽地	抽出			174.05	315.59	142.40	38.00	18.25
		抽入	60.33	22.80	1,007.31	481.15	46.55		31.80

注一，巩固区是根据二十四个村子的调查：

峰泉、马各庄、西大悲、东显口、大长峪、和家庄、下柳林、水峪、北贾良、理家庄、郝家庄、杨庄、庄旺、南淇槐树庄、红草河、城南庄、草厂口、下寨南、黄统岭、脑上、陈庄、陈家院、北庄等、二十四个村子的调查。

注二，游击区是：

南窑、沟里、白沙、庞白土、东于家庄、东山羊、文德村、北养马、中佐村、西邸村、西回舍、东岗上、朱食、北湖、南洼、南孙家楼、南曲村、贾庄、小西张、穆家庄、柏家庄、东五里岗，木台北，横涧、橙桥沟、解愁、辛庄、穆集、南张吾、回城寺、岳庄等三十一村的调查。

注三，抽地只是：

白沙、庞白土、于家庄、东山羊、文德村、西邸村、中佐村、朱食、北湖、南洼、东五里岗、木台北、横河口、小西张等十四个村的调查。

注四，因进行调查时，没有调查上述各村各阶层原有土地数量，因此无法研究各阶层增减土地与原有土地数量之比较

由上表可以清楚的看到：

（1）中农、贫农、雇农、工人、小工商业者的土地是绝对地增加了。尤以中农、贫农增加的为最多。这些阶层中也有卖地的，大多数是：水换旱、远换近，坏换好；少部分是因婚丧急用而当地；再少部分是遭灾（水、旱、寇灾）卖地走口或卖地换吃的；还有少部分死了“劳动力”，种不过来；极少部分是因为负担过重。

（2）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大大的减少了，尤以地主减少者为最多。地主没有当入地者，买地者也极少。游击区地主买地106.22亩，只应县柏家庄一村几户地主即买105亩，个别户是开油房发了财，其他则是卖了离据点近的换离据点远的。他们共卖去471亩，买来105亩，依然是减少的。

（3）地主、富农大量出地的原因是：减少目标，避免过重的负担（对敌或对我），卖地交负担（对敌的或对我的）特别是游击区，由于敌压榨过重，大多数地主贱价当地或“拖粮地”或“认粮种地”（种地者代地主拿对敌对我之负担，不出当价），有的甚至“白送地”、“倒贴钱”。少数富农卖地是因工资过贵“雇不起人”，卖一部，自种一部。地主富农出卖出当地及地价涨落，是与对敌伪负担之程度直接相关的（如××县最近对敌斗争胜利，地主富农出卖地者几乎没有而一亩水地由白送人涨到数千元以至一万元，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4）一部分地主已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策和新的劳动环境下，自动的或被迫的转变其生产经营方式。如部分地主改为雇工经营或自己下地；晋东北“打伙计”的地主，抗战前本是带有农奴制度的剥削方式。但在减租与排除一切劳役负担与超经济剥削之后，其剥削性质也有新的变动，北岳区大部分中小地主都开始参加耕种。这已可以看到我党“七分资本，三分封建”政策的作用；同时也可看出在封建剥削受到削弱与打击之后，地主阶级的经济动向及其前途。地主阶级中某些阶层说化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是有充分可能的，这是本区有些地方已得到了证明。

（5）中农、贫农经济摆脱了封建经济及帝国主义经济（在巩固区）势力的压迫，虽在战争不断破坏和战争长期消耗下，而一般的中农和贫农经济还是上升的趋向。

丙、在环境变化后，封建经济还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回涨”，因为地主阶级有大量土地是当出去，“拖”出去或“认”出去的土地，当价很贱，甚至无价，其期限一般是三年到五年，抗战胜利以后，这些土地还可能流回一部或一大部，地主经济可能有某些恢复。但绝不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也绝不能改变其下降与被削弱的基本趋势。虽然如此，但绝不能因此而轻视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因为在今天北岳区的大部剩余粮食和货币，差不多都掌握在地主富农和大商人手里，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多余其生活需要的土地生产物，可以听其自由支配，可以成为他们进行经济及政治活动的资料。自然，地主政治优势的丧失，中农贫农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合作事业，国家公营经济和银行力量的雄厚及农业统一累进税政策之执行，地主的“经济优势”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对这一问题应做全面的辩证的了解。

三、农村阶级关系变动的具体情况

甲、各阶级阶层不同的变化：

1、工人：绝大多数是手艺工人，部分的是煤矿工人（平定寿阳一带），渠坝工人（平山田兴村最多），少数是店员工人。

无论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来看，工人阶级向其他阶级阶层的变化都是很大的。

（1）一大部分转为贫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以前，巩固区工人转为贫农者15.67%，游击区（此时不少地区环境尚未变化）18.78%，老“爱护村”12.50%。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以后到一九四二年九、十、十一月间，巩固区6.48%，游击区11.11%，无人区10%。

（2）少数转为中农或小商业：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5.97%，游击区3.11%，无人区（此时与其他巩固区环境是一样的）8%变为中农；巩固区3.95%，游击区0.78%变为小商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巩固区0.93%，游击区0.93%变为中农；巩固区1.85%，无人区5%变为小商人。

（3）更少数的变为雇农或富农或其他阶层。

这种转化从形式上看是上升了，从实际上看未必尽然。一般的讲，变为中农或富农者是上升了，转为贫农小商业者一部分是上升，一部分是失业改行（实际上其经济生活是下降了）。转为雇农者则完全由于失业。

2、雇农：绝大多数是长工或“长短工”（即经年以“打短”为生者），一部分是畜牧工人（牛羊官）。这个阶层向其他阶层的转化也是很大的。

（1）较大的一部分转为贫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28.37%，游击区27.91%，老“爱护村”30%，无人区3.45%。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6.90%，游击区6.72%，无人区6.08%。雇农过去即占有微量土地，现在转为贫农者绝大部分是上升了。极小部分则是因失业而改营自己的微量土地，实际上是下降了（有的地区的失业是和劳动政策的过左有关的）。

（2）一部分上升为中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上升为中农者占10.28%，游击区2.71%，无人区1.72%；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1.97%，游击区1.11%，无人区1.70%，（指平山田兴村早已恢复之无人区而言）。

（3）小部分转而经营小商业：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占2.43%，游击区占1.08%，无人区(主要是指平山田兴村)6.18%；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占0.49%，无人区（主要是田兴村）3.39%，这种变化，部分是上升了，一小部分则因失业转行，实际上有的是下降了。

（4）极少数上升为富农或转为其他成份。

整个的讲，抗战中雇农的经济生活的上升是很大的。

3、贫农：部分贫农只有小部生产手段（有少数工具畜力或土地），又有一部分则完全没有。

（1）大部分保持原来的地位：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占全体贫农78%，游击区87.78%，无人区（此时与其他巩固区的环境是一样的)71.56%，老“爱护村”97.92%；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90.73%，游击区94.69%，老“爱护村”97.92%，无人区84.31%。但其中一部分因负担减少，土地增加（当入、买入、“调剂”入或开荒修滩），经济生活大大提高，接近于中农的水平，又一部分（在游击区、“老爱护村”及现在的无人区）则形式上虽仍保持贫农地位，实际上是大不如前了。

（2）不少的一部分上升为中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巩固区占18.57%，游击区10.01%，老“爱护村”1.04%；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期间，巩固区5.11%，游

击区3.74%，老“爱护村”0.93%。

（3）很小的一部分下降为雇农，工人；又很小的一部分上升为富农，还有很小的一部分转为其他成分。

整个的讲，抗战中贫农阶层经济生活的上升是很大的。他们的生活和经济地位是日益改善和改进着。

4、中农：一部分是自耕的中农，一部分是佃耕的中农；极少数中农有少数土地出租，抗战前兼放高利贷，又有少数兼营商业、副业生产。

（1）从数字上看，中农的变动是不大剧烈的。保持原来地位者，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占88.37%，游击区92.89%，无人区（此时与巩固区环境相同）81.73%，老“爱护村”91.23%；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95.45%，游击区95.69%，老“爱护村”97.59%，无人区60.15%。但其中在根据地及部分的游击区内有一部分则发展为富裕的中农，他们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并不断的增加土地，其中不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赶上了某些地主富农，在环境和平安定之后，其中一部分可能迅速上升为富农。

（2）部分的中农下降为贫农或雇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占8.18%，游击区占5.41%（此时游击区与巩固区环境大体相同），无人区占13.69%，老“爱护村”7.37%；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2.13%，游击区2.63%，老“爱护村”1.38%，无人区则为30.95%。

（3）少数中农变为地主或富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中农1.67%，游击区0.92%变为富农。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0.79%，游击区0.65%，变为富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0.11%，游击区0.04%变为地主。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无人区0.38%变为地主。这种剧烈的飞跃向上发展中包含着某些假象，不少的是“假上升”。因为，一部分是丧失了劳动力而出租地或雇工人的。

如中农变地主者四户，一户是当医生发了财而上升，三户则是由于没有劳动力而出租。

中农变富农者六十户中，有三十四户是真正上升了（因劳动力强，因抽地减租，因有副业，因有工业等），有十九户则因劳动力减少而雇工，有一户是不愿生产而雇工，六户原因不明。

5、富农：大多数富农同时就是土地占有者。一小部分是部分的租入耕地，极小的一部分主要的是租入地。一般的富农兼出租一部土地，抗战前兼放高利贷。大多数富农是小富农。自己参加劳动，少数的不参加，一部分富农有商业投资或副业生产。

（1）一小部分下降为贫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1.29%，游击区0.96%，无人区4.69%，老“爱护村”9.09%。

（2）不小的一部分变为中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占15.15%，游击区12.44%，无人区42.19，老“爱护村”22.73%；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占6.63%，游击区5.20%，无人区26.54%，这种下降大部分是真下降了，少部分是自己参加劳动，转变生产方式，其经济生活并未显著的下降。

（3）一小部分转变为地主：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占1.29%，游击区占2.43%，无人区3.12%，老“爱护村”2.27%；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0.3%，游击区0.52%，无人区8.13%。这种转变并非上升，实际上是下降了。如二十五户由富农变

为地主者中，只有一户是由经营副业而上升，其他二十四户即是下降的：有的是因劳资政策执行的“左”（三户），有的是因人口逃亡（二户），有的是因为减少目标，大部土地当出，少部土地出租，而绝大多数则是因为没有劳动力经营生产（共十九户）。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地位是多么重要。这已成为本区农业生产中一个极重要而立待解决的问题。

（4）大部分富农保持原来地位：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80.32%，游击区（此时大部与巩固区同）81.76%，无人区50%，老“爱护村”65.91%；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90.97%，游击区93.24%，老“爱护村”100%。其中极少数的经济生活是上升了，大部分保持原状，也有不小的一部分经济生活实际上是大大的下降。根据十一个县二十六个村（平山的田兴、西黄泥、朱毫、下柳林、陈家院、北庄，灵邱的杨庄、下寨南，繁峙的庄旺，应县的破碓臼村，代县的赵家湾，灵寿的陈庄、北贾良、南洼、孙家楼，平定的大西庄、岳家庄，定唐的小西涨、庞白土，阜平的城南庄、草厂口，完县的峰泉、西大悲、马各庄，唐县的东显口、和家庄。）四十一个富农（巩固区三十个，游击区包括老“爱护村”八个，无人区三个的调查，可以看出一个轮廓来。

土地关系之变动：

一九三七年共有土地	2,544.25亩
在此期间买入当入土地共	8.80亩
一九四二年九、十月所有土地共	1,884.03亩
土地减少共	660.22亩
	（占原有土地总数26%）
其中卖出土地	89.10亩
当出土地	123.40亩
水冲土地	251.84亩
被抽去土地	56.00亩
减少原因不明者	148.60亩

目前的生活状况（只二十五家的调查）：

比抗战以前好了一些	3户
生活下降不大的	5户
相当于中农生活水平者	4户
生活困难相当于贫农生活者	7户

总起来说：富农的经济生活是部分变化不大、部分下降，极少数较抗战前为优。

6、地主阶级：

（1）整个地主阶级在抗战过程中都是下降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地主下降为中农、贫农、小商人者之百分比合计占7.87%，游击区合计占8.33%，老“爱护村”占24%，无人区占10.52%；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3.48%。（降为中农），游击区4.58%（中农、贫农），老“爱护村”5.26%，无人区5.88%。

（2）一部分地主转变为富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11.02%，游击区8.33%，无人区10.53%，老“爱护村”4%；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4.35%，游击区2.09%。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一部分是由于经济下降（主要是地少了），极少数的则

并未下降。

（3）保持原来地位，即保持旧日生产关系者，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占76.38%，游击区80.39%，无人区68.42%老“爱护村”72%。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91.30%，游击区93.13%，老“爱护村”94.74%，无人区94.12%，其实际的经济状况，也是大大下降了。在抗战中地主阶级是流出土地最大的阶级。根据十个县（平山、灵寿、曲阳、定唐、代县、易县、满城、灵邱、房涞涿、阜平）十七个村庄（北庄、西回舍、西黄泥、朱毫、燕尾沟、陈家院、陈庄、城南庄、赵家湾、南安庄、潦水、抱阳、庞白土、文德、横河口、中佐、下寨南）二十三户较大地主的调查，看的十分清楚：

一九三七年共有土地7697.13亩

一九四二年共有土地331.00亩

土地减少　4386.13亩（占原有土地总数55%以上）

其中共卖出　1372.80亩，

当出　1441.83亩，

送人　226.50亩，

分家分去　387.00亩，

水冲　5.00亩，

未说明原因者　953.00亩（其中大部是当出、水冲或分家分去）

7、小工商业：

（1）不小部分变为中农或贫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变为中农或贫农者之百分比合计巩固区14.72%，游击区15.15%，无人区4.76%，老“爱护村”6.85%。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巩固区4.73%，游击区15.80%，老“爱护村”13.03%，无人区3.00%。变为中农者是上升了，变为贫农者则不少是因商业停顿而改行了，实际上是下降了。

（2）极少一部分下降为雇农，也有极少的一部分变为富农或地主。变为雇农是下降了，变为地主富农者大多是缺乏劳动力者。

8、工商业者：绝大多数是商业资本家。

一部分下降为小工商业：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巩固区10.53%，游击区9.09%。少数变为贫农或中农。极少数变为地主。

9、游民、孤独、“其他”：

（1）整个家庭为游民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变为中农、贫农、小工商业者之百分比，在巩固区合计占32%，这些人是已“改邪归正”了，经济生活也有些上升。游击区变为雇农贫农者合计21.71%，老“爱护村”变为贫农者23.08%。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亦有不少的变为贫农或中农或小工商业。

（2）不少孤独自己有了劳动力，变为贫农，这在经济生活上实际上是改善了。由于人力动员目前各地的孤寡的数量是增多了。

（3）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表上列的“其他”一项，大多数是抗日干部及战士的家属，因没有劳动力而雇工或出租地者，极小部分成为中农，一大部分成为贫农。这是说，好多抗日干部及战士家属的生活是大大下降了（但“其他”之统计极不完全）。

10、总结各阶级阶层经济地位在抗战中消长升落的复杂变化，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简单的结论：

有三种变化的性质：第一是上升，第二是下降，第三是转变生活方式（不一定全是上升，亦不一定全是下降）。雇农、贫农、中农，一般的讲是上升的。地主阶级是下降地。工人、富农与大小工商业者有的上升，有的停滞，有的下降，有不少的则是转行。

有的变化已经起了公开的质的飞跃，有的则还是隐蔽的量的发展。但在事变进程中质的飞跃将是不可免的。这就是说，一部分地主还会继续下降（在我根据地内，其下降会缓慢一些，且有一定限度），一部分富足中农在环境和平安定时可能迅速发展成为富农。而在敌寇压榨严重的地区，各阶层的一大部分虽仍保持过去的阶级地位，实际上则是濒于破产了。

在阶级关系变化中一部分假象——即所谓“假上升”与“假下降”的现象：工人变贫农，中农变地主或富农，以及工商业者变地主，其形式是上升的，其实质则有些是下降的。地主变富农，富农变中农（富裕中农），其形式是下降的，其实质有一部分并未下降。而一般地主富农之下降的程度也不能完全从表面数字来看，因为有些土地不是减少，而是“坚壁”了（如低价当出、“送人”等）；有些财富不是没有了，而是“不敢出世”。又因为有不少一部分地主富农之“下降”是由于分家——这是家长制的家庭分解的过程，自然也是大大削弱封建力量的，但这种分家下降其性质又不同于一般的下降。

乙、各地区各时期的不同变化：

（一）老“爱护村”。

1、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这一阶段：（1）巩固区贫农上升中农的占18.57%，游击区（此时大部分环境尚未剧烈变化）10.01%，而“老爱护村”则只占1.04%。（2）老“爱护村”没有中农变地主富农者。而中农下降贫农者则占7.37%（巩固村四个村一九三九年大水成灾最烈，故下降的大。但不能与此相比）。（3）老“爱护村”雇农没有上升中农者，巩固区则占10.28%，游击区占2.71%（因某些地区已受敌之压榨，故又与巩固区不同；而无人区主要是因田兴村水灾未恢复）。（4）老“爱护村”工人没有上升为中农者，巩固区则占5.97%，游击区3.11%，老“爱护村”小工商业变为中农者只占2.74%，巩固区则占9.96%，游击区5.54%。（5）老“爱护村”地主阶级变为富农者只4%（巩固区则是11.02%，游击区8.33%），地主降为贫农者老“爱护村”占12%（巩固区则是2.36%，游击区2.27%）。老“爱护村”地主降为中农者12%，（巩固区则是4.72%，游击区6.06%）。（6）老“爱护村”富农变中农者22.73%（巩固区则为15.15%，游击区为12.44%，无人区占42.19%）。下降为贫农的，老“爱护村”占9.09%，（巩固区则为1.29%，游击区则为0.96%）。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出：老“爱护村”经济上升者到贫农而止，下降者又大多降到贫农，两头向贫农看齐而不是向中间挤。是中农停滞而不是富农停滞，是全体下降而不只是地主下降。在某些顽固势力占优势之村，则是中农贫农下降，而地主富农下降则不大。

2、有些阶层形式上能保持原来地位，实际生活则濒于破产（如寿阳橙桥沟之地主富农大多不能维生，大部分中农要下煤窑做工，以求补助。庞白土地主富农破产，土地流入贫农中农手中，但对敌负担太重，中农贫农之生活并未改善）。

3、老“爱护村”也有个别上升的成份，但极不正常：

（1）大多数阶层尤其地主富农大量当地，而买地者则多是城市中的汉奸、特务、伪军家属及投机商人。根据庞白土村之大概统计，买入地者：

汉奸特务占30%；他们要死契地，地价极大。

投机商人占50%
有人力之户占0.6%
}多要活契地。

（2）某些成份的"上升"是由于当伪干部或替敌做事而赚钱，如伪村长，看沟的，看汽路者，一部分给敌当伕者。

（3）少数"上升"成份是"跑敌区"作买卖者。

（二）巩固区的变化规律则与老"爱护村"完全相反：

1、工人雇农特别是贫农大量上升为中农。地主富农的下降亦多降到中农而止（降为贫农者较老"爱护村"及游击区均少）。两头向中间挤，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现象。

2、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间的变化是比较缓和的。一方面时间还短，一方面是由于政策之正确的执行。如地主富农没有下降为贫农者（同时期内游击区老"爱护村"则急剧增多）。

（三）在游击区：其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巩固区有许多共同点，这是因为在这些地区一般的我之各种政策尚能执行，基本群众仍占优势。但有些地方又表现其不一致性和特殊性，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政策执行之下，基本群众要上升，又一方面在敌人压迫勒索之下又要下降。因而其具体变化的程度与巩固区不能相同。

1、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工人、贫农、中农、地主、富农变化的不同已如上述。

2、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期间，虽变化之差并不甚显著，（主要的因巩固区连年灾祸），但亦可以看出：巩固区中农下降为贫农者少于游击区。前者占2.13%，后者占2.63%，巩固区没有下降为雇工者，游击区有0.06%；巩固区贫农上升为中农者占5.1%，游击区占3.17%；巩固区雇农上升为中农者占1.97%，游击区占1.11%。在敌寇统治下，上升为中农是一件难事，有些地区事实上已具有老"爱护村"的变化规律了。同时游击区一般的是平原区，两年收成又好，按一般规律，其上升应远大于山地，而目前的变化则没有更大的区别，其实质是反映了游击区经济上升的困难。

3、工人在游击区一般的也是上升的。游击区工人上升稍快，不能表示其经济上升大于巩固区的趋向，因为那不是正常的现象。

（四）在无人区：无人区这四个村庄的变化是不规则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环境未变化之前（此时就是巩固区），基本规律与巩固区是一致的。其中田兴村一九三九年大水冲去十几顷良田，使中农富农地主下降较大。又因五台三个村庄在一九四〇年大选举中基本群众抬头，向地主富农算老账，以地折钱，故贫苦农民上升与地主富农之下降均表现剧烈。一九四一年秋经过敌寇无人区政策之破坏后，则又"全体下降"：中农下降为贫农者占百分之三十点九五。地主降为中农者百分之五点八八。富农降为贫农与中农者之百分比合计百分之二十九点四九。其变化形势是"急起急落"的。

富农变为地主较其他地区都多，但这不是上升，而是由于这些人身在敌据点，只好把地出租之故。

（五）总起来说四种地区阶级变化的特点是：

1、在敌寇严重压榨下的地区是：全体下降，各方面向贫农看齐。

2、在我根据地及各种政策能够贯彻之游击区是：有的上升，有的下降，两头向中间挤。但游击区由于敌我两个力量的尖锐斗争，局部人民经济生活的上升、是很慢而且是很困

难的。

3、在无人区则经过敌人的无人政策，全体下降，阶级关系的变化最为剧烈。但在恢复之后，其变化又会逐渐与巩固区看齐的。

4、因为敌我斗争之犬牙交错，此起彼落，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之消长变化及我党政策贯彻程度之不同，本区的经济变化是十分不平衡的。但不论那一种地区，党的政策之贯彻执行和对敌斗争之胜利进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之重要保证。这在北岳区六年来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丙、阶级关系变化的各种原因：

（一）各阶层向上变化的原因：

1、党的民主民生政策（主要是减租减息和劳动政策）的执行，排除了土地关系、债务关系上的超经济剥削和重利盘剥，废除了苛捐杂税，减轻了基本群众的负担（在抗战开始二三年时，基本群众大多数没有负担或负担极少），使贫农中农的生活大大改善（租地多的上升最大，喇嘛寺院的村子上升亦大）。

2、大多数地区在一九四〇年民主政治高潮中，在抽地换约中，和清算斗争中，不少基本群众获得土地而上升。一九四〇年是本区阶级关系变化最显著的一年。

如曲阳西邸村五十八户抽地换约户的变化：

抽地后：十三家中农中，三户变为富农。

二十五户贫农中，一户变富农，十四户变为中农。

一户工人变为中农。

五户商人中，一户变为中农。

3、由于物价特别是粮价的高涨，种钱租地者突然致富，而钱租地及低租地之地主则急剧下降（大多数钱租地是十元到十五元佃钱，二五减租后，现在差不多不到一升粮食的价格就够了）。

4、抗战初期财政动员极其紊乱，又非常集中（平山巨绅齐学韶一次即拿出二百石稻米，其他各地集中负担的事实，也均不少）。再加以地主富农一贯的反共成见，遂大量低价出地（当地多），以减小目标。而佃户有要地的优先权。游击区在敌寇勒索压榨下，地主富农也大量分散土地（低价当地、“认粮种地”、“拖粮”地、白送地、倒贴钱等等），这都使土地迅速分散，使基本群众大量的得到了土地。

5、一方面地价贱；另一方面劳动力极度缺乏，工价较高。根据地及某些游击区实行半实物工资制，克服了粮价高涨所给予的影响。工人雇农的生活遂大量上升。在敌寇统治的地区，有人力者当夫赚钱作小生意，都极易取得土地。

6、由于敌寇的封锁分割及战时工业品的缺乏，经营副业及商业，特别是小手工业，无论在游击区或巩固区，都获利极大。某些投机商业则超额利润更大。某些地区驮盐贩粮、贩牲口者上升极大（如曲阳、应县）。

7、由于民主民生政策的执行，部队政府对生产之鼓励和帮助，人民觉悟程度大大提高，根据地一般的生产情绪是高涨的，能够大量开荒，兴修水地，迅速恢复一九三九年大水冲去的土地（阜平卓厂口是显明的例子）。

为了说明本区军民生产之热情及其对经济发展之影响，这里还可以举出八十八个村庄以外的材料来说明。如一九三九年大水灾前本区大河流域二十一县共有滩地一七〇四二七亩，

冲毁者一四七六二六亩，现几全部修复，且有扩大超过者。再如由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内，北岳区二十余县开渠二二七二道，浇地四十余万亩，凿井四千余眼，浇地三万余亩。再如北岳区子弟兵积极助耕，仅一九四一年秋耕即达五万余亩，而一九四二年助耕助收竟达十三万亩以上。这些对于本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均给了强有力的推动与影响。

8、劳动力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因劳动力增加或增强而上升者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在某些游击区，由于大批妇女参加生产，得以补充日寇掠夺人力，破坏生产的影响，而保存农村经济的某种元气（如曲阳羊马村，抗战前参加生产的妇女十五人，一九四一年七十九人，一九四二年增至二百二十余人。某些地区还有个别雇女长工者）。

9、除以上这些基本的一般的原因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个别的特殊的不正常的原因：

（1）因自然力的原因：如南曲河因河水改道，空出土地。又如不少户死了人，消费人口减少而上升。

（2）因外力援助：又继承财产，家人或亲友在外经商作事寄钱。

（3）因贪污枉法，仗势欺人成为乡村之新兴黑暗势力者。

（4）因被雇当兵：如潦水村某户赚小米二石、小麦四石，即买地十五亩上升。

（二）各阶层向下变化的原因

各阶层向下变化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1、在游击区日寇过重的榨取，过重的劳役，无厌的勒索，和对于耕地的破坏，是各阶级阶层经济下降的基本原因。在巩固区日寇扫荡进攻中的破坏抢掠，使不少人民直接破产。

为了更具体的说明日寇的“摧残毁灭”政策对我区经济民生之影响，这里再举出八十八个村庄调查以外的材料来说明。如在北驮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调查，堡垒据点为一千二百多个，敌占公路长约一万里，封锁沟长约一千八百里、封锁墙长约四百里，合计即占去良田十几万亩。每亩以年产粮一石多计，即等于毁坏我二十余万石粮食。至敌人六年来烧毁我房屋至少在五十万间以上。其他如农具、家畜、耕畜、衣服、现金之损失，何止万万，日寇的这些破坏，给我区农村经济之发展以巨大破坏与阻碍。

2、不少是因水、旱、虫、雹等天灾而成。根据地中农贫农及某些个别地主富农之下降，不少因此。特别是一九三九年之大水灾，使某些村庄至今不能恢复元气。

3、某些地主富农之下降，是由于租息收不上来，负担过重，抽地换约中的过“左”偏向，某些地区的过高工资以及粮价高涨对钱租地的影响等。游击区有些地主下降则是由于地在敌占区收不回租。

4、某些地主富农及部分中农下降，是由于分家，一般分家的原因是因为减小目标，逃避负担；家庭不和，各自逃生。

5、某些地主富农及游击区少部分人民，政治上悲观失望，生产情绪低落，游手好闲，大吃大喝。

6、疾病灾害，劳动力减弱或减少，或某些地区因抗战勤务过于繁重。也有在游击地区因地主反攻又转而下降者。

7、某些工商业的衰落，主要是由于敌寇的封锁、破坏，战争环境的影响。

8、游击区某些当抗日干部的被敌勒索、雇工出夫而下降。

9、除以上这些基本原因之外，还有以下这些特殊的个别原因：

（1）被政府处罚。

（2）赌博、吃大烟等（雁北某些地区）。

（3）迷信，如辛庄一老太婆，抗战后信佛教，烧纸点香招待“师父”，用费极大而下降。

（三）总结以上阶级变化的各种原因，我们可以看出：

1、敌我两个力量、两种制度的斗争，是决定各阶级阶层变化的第一个基本因素。日寇的掠夺破坏和无厌的勒索，是游击区各阶层普遍下降或不能迅速上升的最基本的原因。

2、各种政策的正确执行，是决定各阶层经济生活另一个决定的因素。党的政策能贯彻的地方，即使在敌之勒索破坏下，基本群众亦有某些上升；而党的政策执行中的某些偏向，则往往引起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党的政策未能贯彻的地区，则变化不大（地主土豪劣绅仍占优势）。

3、劳动力的问题，是决定各阶层经济生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地某些地区某些阶层经济生活下降，劳动力缺乏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妇女参加生产目前在整个社会生产中还没有起其应有的作用。

4、副业经营（纺织、贩买、驮脚、养家畜等）是决定各阶层经济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无论在巩固区及游击区副业生产及季节性的小生意，实有大大提倡的必要。

（《北岳区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资料》，战线社出版1943年5月）

华中部队准备大发展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张饶李郑：

河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盘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州亦将不守，敌由广绍向北进行夹击亦计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但在目前，由于敌寇尚未大举进攻五战区，和平汉路尚未修复，故五师方面只宜以待机姿势作各种发展的准备，四师之一部越过津浦路，可西进至涡蒙阜颍等地，相机处理，亦暂不宜向豫境急进。总之发展河南的斗争任务是必须完成的。目前从各种有利的准备入手，请将五师四师在这方面的准备情形见告，另一面敌寇在粤汉路大举攻蒋，目前湘北湘东赣西北之间，均构成了极宽广的敌后地区，我五师宜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指示他们就当地敌后的实情向南推进，预先占领一二线阵地也是必要的，宜调查通山通城阳新境内九宫山脉的情况，就可能作相机推进，鄂南发展是仅较河南为次的，发展方向亦请他们考虑见告。

刘少奇　陈　毅

二十三日

中央军委关于打击阎军东侵，消灭六十一军主力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

滕邓：

甲、阎通敌东侵之非理，已为国内及英美人士所知，且妨害我抽兵南渡配合发展中原及秋冬整军屯粮诸大计。

乙、提议在秋中利用高苗雨季敌不易增援之时，寻求在运动中消灭该六十一军，或以围攻其突出部，吸引该军增援，歼灭其主力，如太岳区兵力不够，应由太行增援主力一部，但事先应作各种具体准备：1、公开暴露六十一军高级军官之通敌罪行。2、加紧对该军瓦解工作。3、自己内部除政治上战术上作必要准备外，还须注意战术之切实准备，如工兵炸药。自造燃烧山追炮弹，太行山还存有卜福斯山炮弹约五百颗（问刘鼎便知），该式炮弹较晋造日造山炮弹破坏力均大，如不合膛（口径相同），可减少装药量，利用原有之炮弹筒改装，请与兵工厂及炮兵干部试行之。

军　委

六月三十日午

中央同意五师巩固原地区并向河南湘鄂赣发展的方针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

郑李任陈并告华中局：

午江电悉。

（一）我们赞成你们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

（二）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以便中央能派干部到你们地区来。中央已令华北派部队到密县、登封、淮阳、西华一带活动，望你们由信阳、罗田逐渐向北发展。目前你们有一个团的兵力，并有一批干部组织河南工作委员会去工作是好的，但须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三）对于湘鄂赣你们应利用目前机会去占领若干有利阵地，以便将来能有更大发展。亦应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四）中央准备派一百个以上高级和中级干部到你们地区工作，并带各种材料给你们，只要交通有办法，在两三个月以后，即可从延安起身。

（五）望你们注意侦察河南及湘鄂赣敌友我三方情况，随时电告我们。

中　央

七月十日

中共中央、军委对华南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曾王林同志并告东江纵队全体指战员，冯白驹同志并告海南岛人民抗日军全体指战员：

自广州沦陷，迄今六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抗战进入了第八年度，国际环境对于我国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是空前有利。

我八路军、新四军七年来，不仅坚持和巩固了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团结了敌后八千六百余万的人民和二百一十万的民兵，并拥有四十七万的正规军，克服了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二两年最困难时期，而且年来在地区和人口上均有极大的发展，冀东我军已挺进至热河、多伦、赤峰及辽宁之锦州一线。一年来党的十大政策在敌后各根据地获得伟大的成效，使全体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为着坚持根据地和准备对日反攻上空前的团结起来了。

总之，不论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中国敌后战场都是胜利的。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处处失败，中原沦陷，长沙、耒阳相继弃守，现粤汉之敌，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之企图。因此大块华南将沦为敌手，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民众。因此，你们在华南的作用与责任，将日益增大。英美在太平洋上继续作战的胜利，一旦接近中国南方海岸，实行对日反攻时，则我华南根据地，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国部队以直接的配合，并可能获得他们一部分帮助。为着迎接新的伟大任务，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有充分准备。为此，必须更亲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加紧整风，打通干部思想，坚持统战政策，加强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原阵地，并力求继续发展，扩大武装部队，建立广大的与强固的根据地。

为使我们能及时了解你们的斗争情形，望随时将敌伪友及我部队根据地情形电告。

关于冯白驹同志领导下之琼崖抗日部队，因交通中断，此间已无法联络，望你们东江纵队多方设法派人赴该岛与该部取得联系，并建立电台通讯，使华南两大根据地有机的配合起来，并力求与中央取得电讯联络。此电请曾王林派人转送海南岛。

中共中央
军　　委
七月十五日

中央对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林平转军政委与临委：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秋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

1、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将来此项武装在名义上不一定与东江支队联系，与余汉谋部亦应避免磨擦，以便自己发展。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总此诸事统应由军政委会讨论施行，并统一其指挥。

2、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我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之方针勿变，惟临委可斟酌实情抽调一部分干部转至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

3、你处仍应不断设法派人与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如可能亦应派人至广洲湾附近发展武装抗日斗争。

4、在广九市上的武装斗争有成绩，但不宜常做，免致引起敌人对我过多报复和进攻，并妨碍我城市秘密和抢救工作。

5、你们与潮梅闽西南最近有无联系，潮、汕附近有无发展游击战争可能，望告。

中　央

午　有

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华中局并告北局、山东分局：（此电由华中转五师）

一、华中局真电悉。

二、北局已决定由太岳派二个团渡河赴豫西工作。冀鲁豫分局已派一个营加强睢杞太地区，四军五师抽七个连沿平汉线向河南发展，这是我党向河南敌后地区发展的初期部署。同时华中局提议在四师抽五个团兵力进入永城夏邑肖县宿县地区建立阵地，打通与睢杞太的联系，并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之地区。

三、四师西进部队应配置百名以上地方干部统归雪枫之师率领，加以轮训，然后向西开进。

四、四军三师派一部进入淮北地区。

五、鲁南军区可接收运河支队地区，以便四师向西发展；同时冀鲁豫六分区应相机派队打开微山湖西岸局面，以策应四师在南面的发展。

六、中央正在准备派一批干部分发到河南及湘鄂等地工作，最早要到冬初才能动身，各地不要等待，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政策问题详另电。

中　央

七月二十五日

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敌寇进占河南，已打通平汉地。铁道附近地区时小扫荡已在进行。国民党留李品仙、何柱国、陈大庆三个集团军在敌后，企图最后坚持，估计正规军计八万，地方武装不少于十万。敌寇是否向李等大举进攻，还要看以后情况的发展，大举扫荡和暂时保留顽军以阻止我军西进，两种可能均存在。因此，此次向河南发展，与以前发展华北和华中的情况均有不同，情况更复杂，我军政策应照顾敌伪友我诸方面，更灵活的去适应具体情况，成功关键取决于此。因此我们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我军发展河南，要善于插入敌顽之间的空隙地区，在敌伪区及其边沿去建立抗战秩序，对李、陈、何三个集团的地区不应主动楔入，如其向我进攻，才可举行严正自卫，不故意去制造磨擦。

（二）发展新区一般规律是，首先着重政治宣传，争取同情，建立武装，扩大武装，以自己的军政力量扫除阻碍，使局面初定，即转入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以建立根据地，这个步骤不宜先后倒置。关于新区武装建立和争取问题。第一，对已有不反我之地方自卫武装，应建立友善同情的外围关系，长期帮助，耐心争取，使其能自觉自愿走我军道路；第二，坚决反我之地方武装及遭人民反对之土匪武装，如争取无效，则应坚决解决之，但对俘获人员，不问首从，一律采取宽大政策，分别改编或资遣之；第三，还应放手根据当地政治条件，去建立新的武装，以扩大我军的地方势力，但不得乱发委任，自乱秩序。我军的武装发展，是经过团结和争取各种新区武装的道路，反对并吞政策和不培植地方武装的剃头政策。

（三）迅速发动群众抗日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是我军深入新区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此应注意者：第一，我军进入新区第一件大事是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其次，除在当地筹粮外，至少最初几个月应自带菜金，筹粮时每户只筹一次，至多不过二次，严禁各部队往来重复向当地人民推派粮草，人民吃什么，军队即吃什么，不得专向人民另筹米麦、细粮。我军三大纪律做得好和筹粮有秩序，是我军与河南人民的最初见面礼，敌伪顽我的比较，在人民眼中第一天是从纪律和筹粮的具体行动出发的。第二，我军进入新区多半是敌伪顽等蹂躏过久的地区，人民痛苦最深，我军初到应懂得安定人心，首先给好日子过，多做好事，使人人都有来苏之庆。因此不筹饷，不乱打汉奸，不捉人，不罚款，不杀一人，就是坚决的反共分子、特务分子，也采取宽大政策资送出境。第三，对新区应适时发动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我军一面要支援和领导群众的减租减息运动，一面要说服地主执行法令，采取双方协议，我军出面玉成的方式，减额不应过高，宜适合双方情况，我军应以关怀双方利益的态度，以迅速进到发动群众运动之目的。

（四）新区政权，我军进入初期，应委派自己的县长区长，但要善于吸引当地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出来做事，作我之助手。新政权任务，在建立抗日秩序，担任初期军事需求的任

务，并努力造成绅民与我军的合作，应召集有绅士参加的座谈会，许多问题都同他们商量。政府还应注意兴办几件与人民福利有关的一些建设，使人民认识新政权不仅向人民要东西，而还能替人民做些有利的事情。新政权的各级改选不宜任意举行，彻底改造应放在群众运动发动之后。国民党旧官吏，应吸收其进步分子来共同办事，但不能轻易信任，淆乱人民视听。同时，亦不可任意打击或逮捕拘禁，造成自己孤立，其卸职家居者，如申明愿遵守新政府法令无反动行为，政府应予保护，不侵犯其正当权益。

（五）我军和新政权应注意容纳和吸收当地专门技术人材和知识分子。过去在华北华中这一工作是有缺点的，我们过去所吸收的只是其中进步分子，总比例占少数，大部分对我党是消极的，今天在河南应多注意礼遇和容纳各种知识分子替民主政权服务，给以工作机会，对一般青年给以读书机会。旧式中小学应接收逐渐改造，使其自愿接受我党教育方针，对中小学教师待遇应有所改善。

对华中整训部队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张饶赖：

十四日电悉。

（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的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负责师旅干部应亲自主持。

（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判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读的办法，既不宜注人，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训练班，先教好教员，四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选拔教员，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材，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政人材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责去解决。

（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关于使用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得及的。

以上提议，请你们按实况实施之。

毛泽东
刘少奇
陈　毅
八月二十二日

同意八路军南下打击耿冯二顽牵制韩顽向四师之进攻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张饶赖并告罗黎：（由罗黎转告冀鲁豫并告北局）

俭电悉。

同意你们的建议，在自卫原则下，由八路部队南下，打击耿维勋、冯子固等部，保障四师侧翼安全，以便四师能击退韩德勤、陈大庆大队顽军由南面之进攻。但望立即将顽军历次向我进攻，勾结敌伪的罪恶包括顽军高级司令部之命令等，电告中央，并在华中、山东立即发表。

毛　朱

八月二十九日

中央、军委关于民兵工作指示（草稿）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目前我民兵总数虽号称二百万，但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兵实不到此数目。各根据地的民兵工作是不平衡的，现在民兵质量还不够坚强，不够巩固，而有些地区还必须扩大现有民兵数目，要求民兵发展到总人口百分之三的比例（各地区因工作基础及客观条件的差异，得略高或略低于此比例的规定）。以我整个根据地现有九千万总的人口来看，我们应有三百万左右的民兵，这是今天我们可能与必须做到的数目。但今天我们的中心工作，一般应放在巩固与提高现有的二百万民兵上面，加上新的发展，如果能很快有三百万左右真正起民兵作用（不是一般自卫队作用，一般的自卫队必须有几千万的数目才是，有些地区，忽视一般自卫队的工作是不对的）的民兵，那我们就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由于目前国民党的严重军事危机，抗战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在美国的帮助下，我八路军、新四军相当大的一部正规军与游击队，会抽出来接受新的装备和训练。这样，敌后游击战争的坚持，势必更多依靠民兵的力量，有三百万强大的民兵，在坚持斗争上才不会发生困难。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的反攻，必须准备扩大现有的正规军，如照现有数扩大一倍，就势必要从民兵中提补五十万，而当百

万正规军在前线作战时，没有二、三百万的民兵做补充前线的预备兵，那是很成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已准备好了这一着，将来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二、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认识上与工作布置上，充分地把握上述新的形势与任务。认为民兵就仅仅是民兵，不能有其他作用，不积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教育民兵，使民兵逐渐提高成为熟练有节制性的兵员，而始终满足于民兵在群众武装自卫的那种散漫和落后性上，那是不正确的。但要健全民兵的组织生活，加强其教育训练，来提高民兵，增强其节制性，使之能变成正规军的广大预备兵员，也是不能用有损害和削弱于民兵作为广大群众性的武装组织这一固有特性来达到的；反之，要更好地发挥民兵作为乡村保卫者的作用，切实使民兵将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使民兵更加成为广大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积极提高民兵，取得我们所需要的大量预备兵员。因之，在这一问题上，要反对只看到群众的落后与保守的一面，不去积极设法提高民兵的观点；也反对不照顾群众当前的要求与觉悟程度，主观地一下子就想把所有民兵早成为马上能够动员到正规军的预备兵员的念头。正确的是在确定了这个方向后，依靠我们积极的耐心的有效的实际工作，去争取尽快的实现。

三、加强对民兵的训练，是巩固与提高民兵和变民兵为我有组织有训练的预备兵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在中央的练兵指示中，其方针与具体办法都已提到，在此仅补充这样几点意见：

1、对民兵的军事训练，过去多半是无计划的自动的进行的，同时与自卫队训练没有什么分别。现在应建立对民兵经常有计划训练的制度，集训与平常的训练应很好配合，军事要求比一般自卫队要高一些。

2、集训民兵时，在军事上应着眼于军队生活行动与遵守纪律的习惯的养成，和教育一些简单班、排、连战斗动作。因此根据地边缘地带的民兵，虽有很好的打游击战的实际训练，也应有计划地抽调参加此种集中训练，至于内地区民兵，应多进行些集中训练（不妨碍生产的大集训外的小集训），必要时可带至前线地带做实地打游击的演习。

3、民兵的政治与文化教育训练，应很好地配合军事训练进行。因为民兵究竟还是民兵不是营兵，要想以严格的军事训练，把民兵训练得很好，一动员到正规军中便等于老兵，那是困难的。我们应多从政治上来补军训之不足，什么时候都可以动员，能如此，到正规军后，提高其军事技术是容易的。民兵的文化教育也须引起注意。这不仅因为提高政治需要借助于提高文化，同时迎接我军将来实行新的军事装备与训练时，亦大大需要提高文化知识，预做准备。

4、要使民兵的教育训练能很好的经常进行，应使正规军与游击队与民兵建立很好的教育训练的联系制度，正规军与游击队在那一地区，就应负责对那一地区的民兵进行教育训练，还应经常有计划的把民兵分批轮训，带到自己队伍内参观或随着行动，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耐心地帮助民兵学习和使之了解与习惯于军队生活。这不仅容易使民兵军事动作熟练，战斗力提高，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可大大减少其农民的落后保守性，民兵与军队的感情会弄得更好，给将来动员正规军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过去有些军队干部因为民兵不准做补充队伍之用，对民兵帮助便有不积极的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克服。

四、巩固与提高民兵，建立民兵中的政治工作，应成为很重要的课题。过去一般都注意

不够，现在必须用大力来建立。首先确定村支部，特别是边缘区的村支部，应把建立民兵政治工作做为自己的中心工作。支部书记兼任民兵中队指导员（内地区的村支部，必要时可设一副支书任指导员），以保证党对民兵的领导。同时，只有使支部成为民兵政治工作的领导组织，要求“党员军事化”，动员最好的党员到民兵中去才有可能，而要使民兵坚强有力和实现预备兵的任务，民兵中一般应有强大的党的组织。党员应保证占民兵数目的三分之一（原有党员参加民兵者及民兵中新发展为党员者，在民兵中应采取发展党员方针，这对于坚持斗争，将来动员补充军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今天在民兵中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党员能充分地起模范作用。其次，民兵的政治工作应把解决民兵家庭生活问题做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过去有些地区民兵工作不活跃，就因为这个问题没有适当地解决，自此提出武力与劳力结合，战斗与生产变工后，这个问题的方向已明确解决，政治工作应很好组织这一工作。第三，加强对民兵的教育。在今天应特别地强调提出，作为民兵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经过教育的加强，提高民兵的自觉性，改造其农民的保守观念，使其在思想上认识正规军的重要，爱护正规军，以参加正规军为无上光荣，愿意成为正规军的预备兵（不一定提出民兵是正规军的预备兵）。过去有些地区，发展民兵不完全依靠在一般自卫队中进行很好的动员，基于自愿的原则，而用强制的如编一般自卫队一样的按年龄造名册，或类似的强制的选举方式，这是要不得的。政治工作即应注意这一个问题，进行很好的解释与教育来弥补这一缺陷，使其不会影响到将来做为补充正规军的动员。至于民兵教育内容与方式，一方面要有步骤的使其认识些革命道理，启发其思想，扩大其眼界，而主要的则应从实际生活中来进行教育，用积极领导其与敌斗争，以增强斗争决心，用积极组织武力与劳力结合，战斗与生产变工，以提高劳动与群众观念，用经常检查其不良行为表现，以改造不良倾向，用军队与民兵的联系制度，以激发其对军队的拥护和增加其参军决心。再就是对民兵政治工作与正规军的不同，应很好的联系到本村和民兵的家庭，注意其实际困难的解决，以具体的人和事例的好榜样来改造坏的和推动工作，并在群众中造成正确的舆论。最后，民兵政治工作的组织建立与干部缺乏问题，应即设法解决。村设指导员，由支书或副支书担任；区设教导员，由区书或副区书担任；县、分区、军区的武委会，应有政治工作部门的组织；分区、军区政治部与武委会，应很好组织民兵指导员与教导员的训练班，有计划的调干部轮训，培养出一批民兵政治工作者，并组织工作组下去实际帮助工作，创造经验，以丰富与推动民兵的政治工作。

五、积极发现、培养与宣扬模范民兵和民兵英雄，有计划的定期发动竞赛与选举，召开民兵英雄大会，形成广大群众运动，应作为我们巩固与提高民兵很重要的方法和一种工作制度。目前我们各地在发动民兵大整训中，应更普遍与深入的来一个大规模的民兵英雄运动，要从这一运动中发现与培养出一大批干部，只有在民兵中我们有了一批真正与群众有联系、在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革命意志很坚强的骨干，我们的民兵组织才算巩固，才能更好地负担起对敌斗争的任务。同时在将来做补充正规军的动员时，经过他们自身模范作用与号召，就可以成组成队的参加军队。而这样动员组成的军队也是最巩固与最能作战的。这种经验，在民兵工作比较深入的地区，是有很好例子被证明了的。不过，民兵英雄的培养，要注意一经发现后，即须加强其教育，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多帮助他，不要一下子抬得很高，应经过考验，由群众来提出。这样培养出的民兵英雄才真能称起英雄，不致有锦标主义与风头主义的

缺点。

六、为着适应今天对民兵工作的加强需要，应加强武委会的领导。区、村武委会主任应是区委与支部的军事干事。县委、地委、区党委应设立人民武装部，以该部部长兼任武委会主任。为着使民兵更好地取得军队的帮助，特别是军事教育训练、武器补充、医药供给方面的帮助，分区武委会主任应兼军分区副参谋长或政治部副主任，以建立民兵与正规军之间的更密切的联系。军队必须把建设民兵工作看做自己应有的责任，民兵必须更好的接受军区的领导。从这上面立即来开始建立民兵与正规军之间的正确关系。在民兵工作已很深入，发展数量已够，并臻于相当巩固的地区，可采取晋、察、冀的办法，改武委会为人民武装部，直属于军区的领导，俾能更加加强对民兵的军事管理与训练。但必须注意民兵作为人民武装的地方性与群众性和内部民主生活之保持，同时实行动员补充正规军时，亦必须在军区的统一计划下采取很好的政治动员与自愿参加的方式。现应严禁各部队擅自动员民兵补充部队，要使所有部队干部明白：今天只应是多对民兵给以各种帮助，把民兵巩固和提高，眼光要放远一点，注重将来的大用，而不应仅仅于目前几个人的补充。至于民兵的编制，应进行较严格的编队，村成立中队（因村之大小和人口的不一，中队人数不必划一），区成立大队，县成立县总队。在内地区，可以建立一些必要的军队生活（不妨碍生产与家务），如进行民兵登记与体格检查，发给符号佩带，以示区别，并通过和宣布民兵应守的纪律，各级队部亦应颁布队的关防，建立一固定的办公地点等。但要防止因这一来而容易产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

中　央、军　委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华中局关于在日寇占领福州后对福建党的工作任务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

福建：

一、敌寇此次占领福州，是为了防止同盟军在我东南沿海一带登陆，所以此次占领是长期性的，而且将来有向福州两翼地区（闽东、闽南）扩展的可能。但目前敌寇兵力不大，国民党仍采应战和不战政策。而且在闽省正面兵力亦不大，对敌尚无重大威胁。因此敌寇目前只仅占沿海狭小地区，或进一步扫荡闽省正面国军，以扩大占领面积。这两种可能都存在。

二、我们目前一切打算，应从敌寇暂占沿海狭小地区作出发；同时对敌寇深入扫荡与扩大占领地区的可能，应作积极的准备和打算。

三、目前福建基本任务有四：第一、深入和加强沿海敌后工作，对福州及沿海敌后一带采取各种方式蔓延发展；第二、向宁德、福安、福州、闽浙交界海岸线发展，以图打通闽浙联系；第三、以各老基本地区作基础，沿山区一带向大后方开展武装工作队的活动，建立隐蔽游击基点，打下党与群众基础；第四、加强福州、厦门等中心城市的工作。

四、估计目前沿海敌后地区狭小，国民党必将采取种种方法与我斗争。因此我们对于敌后工作应采取隐蔽发展的方法，而不可以我党我军公开活动方式去进行。我们要以隐蔽方法打入各部伪军中去工作；对我群众基础较强的地区，要以保卫家乡，地方人不害地方人，中国人不卖中国人的口号去团结群众，组织群众，以维持家乡秩序的姿态及灰色落后的名称去建立地方自卫组织（如大刀会、联庄团等），一切武装组织与政权组织都应当是实际是革命的，但表面是落后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我们，但形式上又要敷衍敌伪。要善于利用旧形式与落后作法去争取公开与合法去掩护非法斗争与党和群众的发展。只有在敌人向内地挺进，敌后地区扩大的条件下，我们则依照当时敌、顽、我三方力量的对比，来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

五、你们过去派遣武装工作队，依靠山地，面向群众，到处发展党的组织与建立隐蔽基地的方针是很好的，今后仍当努力进行这种作法，对于分散敌人注意目标及广泛联系群众都有很大意义的，你们应当很好去积累和创造更多的经验，以便供各地参考。崇安基地，国顽可能更加加强控制，应当注意隐蔽活动与秘密工作。

六、伪军工作绝对不可以我党的公开面目出现。在群众中已有威信的人和共产党员，不可公开派到伪军中工作，这不但要造成政治不良影响，而且易遭危险。对顽化伪军采取打击方针；对流氓地痞成分伪军，采取分化瓦解方针；对地方实力派及反蒋土匪领袖的伪军，采取争取方针。伪军工作应注意争取上层与控制其骨干部分，但对一切不可靠的伪军应把上下联系严格划分，免遭牵连。在伪军工作中特别要注意秘密工作。

七、主要军事干部与党的领导机关，应适当向沿海山地集中，但不可过早转入敌后，免遭损失。你们应很好利用山地作隐蔽基地，以便集中力量，审查干部，教育党员，培养大批干部及就近指挥敌后工作。关于发展城市工作与防奸工作另有口头传达。

八、目前国际国内局势，对我异常有利，估计盟军在不久将来即可在沿海登陆，你们只要能够想方设法熬过一年或最多一年半，即可获得伟大的发展前途。

中央关于巩固中条阵地建立沁河豫北基地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一、已决定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韩钧等率河南干部约百人，七七零团、并二团、约一千六百人，十一月初由延起程，照来电经太岳往河南。

二、太岳派两个团入豫西，我们意见：（A）铁道与伊河间之洛水深，两岸淤泥亦深，不易随便徒涉，如遇敌顽进攻，不大便于机动。在冻冰前，似不易使用大兵，在不妨害中条山发展与巩固情形下，派政治军事较强的干部率一个小团，进入该区与地方党密切联系巩固已有同情武装，先求站稳脚，部队小给养亦易筹。（B）太岳区目前极应巩固中条山已得阵地，积极发展汾河以东（三角地区）沁河以西广大地区，特别豫北之沁、济、临、孟四县，山西之垣、平、芮三县，以及黄河与铁道间（估计有被敌控制之地区应广泛利用合法形式及建立荫蔽根据地），使华北与中原密切联系。

三、太行、太岳、平原区，今冬整军期间，尽可能充实小团，并每区补充两个大团，（共六个团），根据目前发展情形似有必要与可能。

四、解决河南新区军队给养问题，在根据地未具规模以前，可采取以下临时过渡办法：（A）按每亩产量抽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未减租以前，由地主出，减租以后农民确实得到减租利益时，东佃各半。（B）或者照国民党田赋征收办法，每亩粮银应征公粮若干但无论那项办法，均须比以前国民党及现在敌伪统治，民众的负担要轻与合理些，并保障每年只征一次，请当地士绅及富中贫民代表商讨，上述办法或其他更适当的办法，总之力求与地主不要过早搞破脸，使自己站稳脚，如与地主过早搞破脸，基本群众又未发动起来，将增加我许多困难。（C）在根据地建立有初步头绪时，即应筹办征收出入口税，以保障根据地物资与帮助部分解决财政问题，其征税原则：

（一）对敌利大，对我利小，则抽重税，甚至禁止出入口。

（二）对敌利小，对我利大，则抽轻税，甚至免税。

（三）对敌我均有利，则按我需要缓急定出适当税率。（D）为避免混乱，保障安定社会秩序，便利于自己站稳脚，须禁止乱打汉奸、罚款，军队须有最高司令部，统一发给临时粮票，给粮户作为收据，对部队内部须按人数给以应得粮票，以免重复过去浪费。以上意见提供你们及皮徐同志参考，并望将你们意见电告。

中　央

十月十四日

军委对开辟河南根据地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郑李任陈：

申艳电悉：（一）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皮定钧（司令）徐子荣（政委）率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申陷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东西疾山一带。现正从事建立根据地，并分向各地活动中，尚有后续部队，正从新安以北渡河南下。洛阳伊川宜阳一带已有地方党员所组织的游击队进行活动，群众对我军进入河南极为欢迎。敌情与顽情亦不十分严重。（二）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陈先瑞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戴王刘陈等在一个月内可从延安起身，中央派到五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起身。（三）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军　委

酉　寒

中央对四师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

华中局并转淮北区党委及韦吴：

（一）四师西进部队已获得极大战果，目前应以巩固已占地区为主要任务，应即迅速建立与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吴信元及其他投诚的部队与地方发展的部队为基础建立若干独立团，除派干部外并可由主力部队抽出若干连编入地方部队，使其担负地方守备任务以便主力能迅速进行新的任务。

（二）四师在豫皖苏时代的武装政策中有一些是错误的，如并吞过多的部队，处理胡晓初部队的失当等，应切实研究过去的经验，凡来投诚之部队其领袖及其干部愿意进步者，均应切实忍耐的帮助其进步，不得随便撤换及调动，我们派去帮助工作的干部应诚恳在其领袖的领导下工作，不得有盛气逼人，锋芒毕露的态度。

（三）路西应即成立地委，由区党委配备得力干部，应利用秋收立即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并立即召集士绅座谈会县参议会等，以便迅速组织与团结人民，巩固我军的社会地位。

（四）如果能利用伪军关系在商邱宁陵拓城之间派一个小部队去活动，建立一处跳板以与水东打通联系，那是有战略作用的。如有可能，应设法求其实现。

（五）最近顽军一部已由涡河北进寻求你们作战，应准备集中必要兵力将其击破，并歼灭之。

中　央

十月十八日

军委关于对阎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

邓滕并转太岳：

甲、陈诚到克难坡晤阎后，中央军有接防秋林，阎部调河东之确实消息。其原因：

（一）阎恐慌畏我进攻，请中央军保护。

（二）阎准备进一步与敌合作，向我晋东南进攻，防我向秋林报复故事先撤离。

（三）陈诚支援阎反共，更不反对阎联日，其阴谋是利用阎日牵制我向河南发展。

（四）敌阎间还有矛盾，河津敌有攻阎讯。种可能那种为主或并重待证。

乙、我为取得将来对阎之更多政治理由，便利于我冬季整军与生息民力，暂时和缓阎一下，似有必要，提议放回阎部俘虏一至二百人，分送六十一军五十九军（王静国部）及吕梁山使之到处散布影响与面报阎，在放走口头说明（不用文字）六十一军不该联日反共打八路军决死队，阎司令长官不该污蔑八路军不抗日决死队是叛军，今后如不再重复以前错误，我愿谅解，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仍归旧好，是否能达到暂时和缓目的要看将来发展，不要因此松懈自己，更不要在任何文字上表示愿意和解恢复旧好。

丙、谢王王华电汾州一带集敌，请注意敌阎配合扫荡太岳及太行山之三分区。

军　委

十月二十日

东江纵队给南方局并中央的报告

——对东江当局罪行的控诉

（一九四四年十月）

恩来并中央：

为控诉东江当局勾结敌伪，破坏抗战，进攻抗日军民，破坏团结，怂恿特务横行，迫害青年，反对人民，实行焚烧、滥杀、抢劫、奸淫种种暴行，特列举事实公诸社会，盼我后方各界人士，察实情，明是非，维护公理正义，主持公道，此不特东江人民的祸福问题，亦为争取抗战胜利，战胜全世界法西斯之利害问题也。

（一）关于勾结敌伪、破坏抗战方面的主要事实：

1、民国三十一年二月三十日，东江当局纵容守备队陆如均、吴斌、莫炯炎等部勾结敌伪，洗劫新界我抗日据点，坪洲、塔门二岛顽军共乘大木船九只，由敌人电扒拖往另岸，电扒一艘先驶塔门停泊，顽军登岸将民众财物洗劫一空，并捉了民众二十人交日寇带回大圩。

2、三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宝安我队袭击六明圩（公明圩），吴逆东权部挺进队独二支黄文光部打我伏击，截我归路，据清溪前伪乡长张晋完供称，本年二月九日敌队长川口送酒二支并有密信一封托令转交黄文光。

3、本年二月二日，挺进队独二支徐东来守备第十大队陆如均部，配合电岭岛伪军约四百人突向下涌稔山沿海等地扰乱，并袭击我护航队刘培部。

4、自我独立第二大队挺进增（城）博（罗）前线，积极打击敌伪之后，几年来很少有顽军踪影的增博前线遽起内战，本年四月三日，当李逆潮部四百余人进攻博西上南我税站时，驻增博顽军便从后夹击，后来敌伪包围源头，顽则“相让”退出，四日至七日，敌伪增至七百余人包围源头茹屋，我队及民兵坚持苦战三昼夜，敌以飞机轰炸，炮楼被毁，我队不得已始掩护民众退却，在战斗期间我增援部队因顽军的牵制与截断，被迫作四天的自卫战斗，致陷茹屋军民于孤军奋斗中遭受严重损失，烧光、抢光损失达一千万元。

5、本年五月二日，惠（州）淡（水）守备区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罗懋勋亲率独九旅六十七团、独二十旅一个营守备队徐东来、李乃名、陆如均、×××、×××、宝安县警队等顽军约二千余人大举进攻惠（阳）宝（安）沿海，并公开勾结敌伪从海上配合进攻，三日敌电扒四只、铁拖一只、机动帆船十只、大木船二（？）只，计四百余人进攻顺寮，洗劫一空，五日进攻坝岗，十五日进攻南澳，均为我海上队所击退。

铁的事实证明东江当局不但不抗战，而且破坏抗战，坐拥军队四五千人，但分布在前线上的不上千人，而多数兵力用于进行内战，敌人进攻广九路不发一弹，狼狈撤退，且毫无民族气节，勾结敌伪祸国殃民，前惠淡守备区指挥官张光琼，公开训令部下看着敌人迅速撤退，遇到“奸匪”应不惜任何牺牲予以消灭，这种精神一直贯彻到今天毫无逊色，难道这也是自夸“堂堂国军”者所应发扬的事情么。

（二）关于欺骗青年、迫害青年、残杀青年的情形：

1、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九日，东江当局开始发动内战，突然围攻坪山，对来自美洲南洋安南暹罗一带满腔热血的男女爱国青年，实行不经审问便活埋与屠杀，与囚禁惠阳狱中的百余人每餐供粥一碗，致饿死与病死的四十余人。

2、几年来，在被迫进行自卫战争中受伤的或已解除武装的俘虏、对与我方非武装的地方人员、交通人员、勤务人员小鬼及战士家属，毫无例外的一律枪杀，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八日，我宝安铁岗医务所伤病员及看护共一十八人全体被惨杀。

3、把抗战经费，人民的血汗金钱豢养大批特务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的特务说，“东江一地已组成了两个特务支队，就活动费一项每人每月多至数百数十万元，至少亦有千元，还可论功加赏”，大批青年被欺骗引诱充当内战特务，最近数月来派入本区作破坏活动的已发现百余人之多，指挥部连续开办特务人员训练班，据受过训者供称，“先是派往沦陷区工作，引诱青年加入其组织，训练后则派来做内战活动，如果稍有消极表示，即被警告或暗杀”，至于派往沦陷区之特务则大部是一身而三任焉，除做国民党特务外又兼做日寇与汪逆的特务，据他们供称，“我们被派来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反共，破坏游击区，消灭游击队，由于目标一致，所以一身三任倒很便当”，促使青年走上堕落腐化消沉毁灭之路将是他们的特务政策。

4、所谓东江别动大队在广九沿线游击区域到处疯狂抢掠人民，据自称“抢沦陷区人民财物充当经费是上级的指示，这是我们经费的主要来源”，近数月来在新界之坪洋，在龙岗清溪林村塘厦等地竟冒称游击队名义抢掠，企图造成社会紊乱现象，破坏抗日军民的团结。

5、由于特务横行，人权毫无保障，教书读书没有自由，淡水新圩等地教员如爱国言行表现激烈就被逮捕，强迫全体员生加入三青团做反共工作，因之崇准小学象山小学淡水澳头之中心学校教员学生被迫离乡别井连群逃亡，近更变本加厉，在澳头淡水各乡村召集保甲长会议，所有十八岁至三十岁的青年都要加入三青团，三十岁至四十五岁者都要加入国民党，强迫全体保甲长具结担保完成之，并实行五家联保，如有一家参加游击队或与游击队有联络者五家受连坐处分。

青年是国家的柱石，民族的精华，政府当局不加爱护，反尽摧残之能事，这是什么道理呢。

（三）关系对抗日人民的种种暴行：

1、焚屋烧山一片焦土，抗战及今焚屋计四千间以上，特别是东莞之观平沿平扬西各乡焚烧最惨，有全村被焚百分之八十以上者、焚烧过半者极多，宝安之布吉龙华民治各乡除焚屋外，果园华腊山为躲避军师而筑之山寮亦焚烧一光。

2、滥杀人民，罪行滔天，在三十一年一年内据张光琼自己说杀了一千八百余人，实际上已超过三千人，使东宝游击区没有一个村不杀过人，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在观澜圩，把布吉、龙华各乡投圩民众均行逮捕，不经审问即用机枪扫杀，有敌寇良民证者反可得免，观澜圩烂庙学校老教员（五十余岁）俞氏父子二人不加担保被枪决，老同盟会员对革命历建功绩之美洲华侨卓凤厦（康）先生，又是政府委员派之龙华乡长，因讲公道话亦于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枪杀，许多过境侨胞来往客商行李货款被没收，人被枪决，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板田被抓去梅县客商三人就这样财去人亡，三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东莞连平乡长廖瑞周先生被杀，据黄文光之刽子手陈福胜供称单他经手杀的人就有二百多，本年在惠宝沿海一带

的几次内战中二月十三日在大鹏城杀民众六人，三月二十二日在大湾（澳头至淡水公路上）杀民众二十余人，三月二十八日在金钱坳杀十二、三岁之女孩一人，同日在坪山杀民众六人，五月八日在新界杀民众二人，现下杀人已及于十二、三岁之男女孩童，国民党的上级已公开宣传要注意沿海“童匪”活动，“童子”也成“匪”，当然，国府无须国际有法，应格杀无论了。

3、劫民财物花样百出，自内战开始以来，东（莞）宝（安）地区各村三番五次被洗劫者实难计算，前挺进队司令邓琦昌对部下说，“游击区的老百姓很多都是汉奸，他们的东西可以自由去没收”，因此牛猪米谷、烂衫裤、烂棉花都搬了个光，连国民党宝安县党部文书记长的家财也在“没收”之列，捉了的人就是不杀也要数千元至数万或十余万元赎一个，宝安光头仔老同盟会员陈家寿先生也要钱赎，顽军在柠坑被敌人包围丢了枪要该村民众赔偿，现在就是国民党自己驻防地区，如有损失都要附近乡村照数赔偿，本年内战几次顽军所到之处无不大抢特抢，东海顺寮下涌一带大鹏半岛以及葵（涌）沙（鱼涌）坪山横岗龙岗一带均遭洗劫，仅坝岗一地即损失百余万元，如顺寮五月三日在顽军勾引下敌伪四百余人登岸大劫，其后又受陆如均周义心部洗劫，交通要道圩场经常检查行人们的腰包，有钱就在“没收”之列，如不相识还有生命危险，顽固派目下就靠鼓励部下发洋财来进行内战，如王竹青对其部下说，“发洋财的机会又到了，只要大家把胆子放大些机会难得”，由此可见内战军队与土匪实际上没有分别。

4、就地奸淫妇女行同禽兽，顽军奸淫妇女也是合法的，邓琦昌对部下说，“你们去打游击队捉到女的给你们做老婆”，这就是鼓励部下可以任意奸淫妇女，这种禽兽行为至今未变，三月二十六日进攻坝岗时一六十余岁的老妇竟被顽军五人轮奸，到处强奸良家妇女，陆如均周义心部在顺寮下涌一带不论白天黑夜、山上屋内，都大肆奸淫，堕落无耻道德沦丧以至于此。

东江当局这一切剥夺人权，屠杀抗日人民的暴行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表示着他们忠实执行法西斯第五纵队的任务吗，这不是破坏抗战摧残人民违背三民主义的罪行吗？

大后方的同胞们，我们蓄着满眶热泪，抱着无限忠心代表东江敌后前线抗日军民，向你们提出控诉状，控诉东江当局的暴虐无道，我们盼望我们的控诉能获得你们正义的同情与援助，我们更欢迎你们前来作实地调查，详搜真相，我们诚恳祈望着经你们的努力给予东江全中国带来团结抗战的新局面，更快地走上光明胜利的道路，在民主世界的大家庭中出现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林　平

华中局关于时局与华中党的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

（一）近数月来国际国内政局均有重大而显著的发展，首先是苏联已将德寇全部逐出国境，红军目前已越过自己国界在九个国家的辽阔土地上作战且已深入德寇巢穴，同时英美盟军在完全解放了法国之后又已越过比荷边疆深入德寇本土，意大利战局亦有进展，轴心国所奴役国家的游击战争与各种反抗运动和各被解放国家的民主反法西斯运动正如怒潮般普遍汹涌开展着，这不但确定法西斯希特勒速将复没，而且决定了今后国际新民主运动不可动摇的趋向。

（二）远东局势虽由于国民党节节溃败使日寇最后失败将较过去一般人们合理的估计可能要更加延长一些，但由于美国在菲律宾登陆的胜利及大举轰炸台湾和日本本土各地等预示着盟军在中国海岸登陆的时间日益接近，同时由于我党我军在敌后胜利坚持和事实上已经控制着绝大部分对将来反攻日寇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基地（如沿海岸线及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特别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使盟军在击败日寇的实际任务上有要求和我党我军密切合作的需要，我党目前的政治威信和影响在全世界与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是以飞跃的速度发展着。

（三）日寇在此次大战与中日战争中虽一变逞其凶焰，但在已断然趋于没落与最后失败，日寇自身亦已显然丧失其胜利的信心而企图把前途与出路寄托于下列幻想上面，即：压迫蒋介石退出战争，增加盟军反攻的困难，以便求得在廉价条件下与英美议和或希望英美与苏联团结破裂，以便从中取利确保其所获脏物。（日寇加强对我沿海一带的控制与打通平汉和从安南直达武汉的铁路交通就是为了预防盟军登陆阻止盟国从大陆上反攻和压迫蒋介石投降的救死方法）

（四）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因为占有全国政权与正统和合法的地位，且掌握着占全国武装部队的绝大部分，故对抗日曾经起着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蒋介石一贯执行依靠与等待外援和一贯采取积极避战与消极抗战的失败主义方针一贯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主义政策已经在全世界与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堕落的真面目，蒋介石最近对我党谈判仍一味敷衍对我军与大后方人民仍坚持其高压政策，对英美苏仍用流氓恫吓诈骗手段，对日寇汉奸仍采一面应战一面勾搭的方针，这不但证明其顽固反动已到了完全不可救药的境地而且也暴露蒋介石反动统治已经日益接近无法维持的地步（最近国际舆论对国民党的强烈抨击与大后方人民反法西斯与争民主运动已经快要接近爆发点就是明显的例证）。

（五）以上是目前国内外时局演变的概括情形，就目前整个时局发展趋势而论，蒋介石如果不愿接受盟国舆论与我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的要求实行改弦更张（目前无此象征）又不愿接受日寇条件公开退出战争（目前仍存在着此种可能）则国民党军队必将继续遭受严重挫败，整个平汉粤汉路东不久即将沦为敌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可能发生严

重危机势难照旧维持下去。

（六）根据上列形势的分析与判断，我们对华中工作方向与布置应提出新的估计与考虑，华中一方面为日寇统治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全国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集中地区另方面又为盟军在华登陆首先必争的地带（特别是对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及沿海沿江一带）同时华中为全国精华为国民党与我势在必争的地区，如果我们在敌寇继续进攻与国民党继续溃退的时候能够迅速加强对上海、宁波、杭州、南京、武汉与沿海一带工作能够争取时间迅速完成发展河南控制中原与发展东南控制苏浙的任务这不但对将来配合盟军反攻而且对粉碎蒋介石反共内战阴谋均将起着决定的意义，因此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与适应目前时局迫切要求对今后华中发展方向与各方工作布置有下列的计划：

1、华中目前发展方向，一是向南——即发展东南控制苏浙，一是向西——即发展皖北河南控制中原，而尤当把向南作为我们发展的主要方向。

2、向南发展须由新四军独立担任，我们准备先由粟率两个主力团南下汇合十六旅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进一步与浙东打通联系相机向南发展控制全浙，随后尚须从一、二、三、四师增调几个团南进完成任务。

3、向西发展须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共同负责，除目前四师主力与三师七旅担任向豫东皖北方向发展外，于必要时尚须从三师再抽一部参战完成任务。

4、发展步骤应采取逐步发展的方针，即于每一战役胜利后即应发展群众运动与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和建设党的组织于建立巩固阵地后再向前推进。

5、对淮南×南桂顽方针一方面随时作大规模自卫战的准备，另方面又不主动去刺激桂顽，但桂顽对我任何小规模的进攻与蚕食都应设法给以必要的报复和打击以阻遏其气焰，如果我们能把桂顽向我大举进攻的计划推延到几个月以后则对各方面均有利。

6、七师目前基本任务除监视桂顽巩固原有根据地外，今后主要发展方向为向江南特别要加紧开辟芜湖，高淳，当涂，南京地区游击战争和党与群众工作，加强胡明地区工作与扩大其根据地造成恢复皖南阵地与将来能够占领芜湖的条件，同时应加强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地区的地下党工作，并相机去恢复上述地区的组织与工作。

7、为着应付新的发展任务。我各师地区应加强下列基本工作：

A、对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应作具体布置和检查，特别对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徐州抚州与沿海岸沿长江铁路一带必须立即布置工作与开展游击战争（已经布置了的须经常检查）但我们估计敌人在反攻前夜对上述城市与地区可以特别加强控制，因此我们对上述地区工作亦应力求隐蔽持久，切忌表面铺张。

B、发展整顿民兵充实提高地方兵团要做到主力机动，地方可以就地坚持的目的，各师主力应加以适当的充实和补充并力争时间整训和准备随时可以机动参战，各地区机动兵团抽走以后可由老的地方独立团提升若干为机动兵团，并由老的独立团留一部分作底子成立新的独立团担任地方守备。

C、大胆提拔地方干部坚决抽调大批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干部进行训练准备分配地方兵团与发展新地区工作，各地区应即开办建设公学（或建设专门学校）广泛吸收各根据地内青年工农及知识分子入学训练，如果没有成百成千经过训练的各方面工作干部的准备则无法应付目前和未来空前发展的局面（华中局正计划开办建设大学中，计划另告）。

D、加强党与群众工作，这里特别应注意加紧完成整风审干防奸并从发展生产运动（发展和巩固劳动互助与各种合作社运动）中去团结提高根据地各阶层群众与完成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使各根据地从各方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E、整理公粮税收准备明年普遍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与积蓄大量物资，必须确保大发展中经济与物资的需求（华中局正计划研究一、三师盐棉运销与适当调整各根据地的财政问题）。

F、加强时事政治教育，扫除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从思想和政治上加强全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团结。

G、经常注意反扫荡的准备与继续保持精简状态。

H、经常检查总结各种政策的实施情况与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向，必须各方面贯彻党中央正确方针及时克服偏向始能团结全根据地各阶层人民为巩固现有根据地与发展敌后新地区而斗争。

8、各区党委为着完成上列方针和任务对各地工作应有新的具体布置华中局对各地个别具体要求当另有指示。

（此指示发到地委及旅级为止，口头传达到县级）。

中央对东江行动与发展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林平同志：

（一）同意戌真电所述各项。

（二）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对外守秘）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好输送干部给你们。因此派往西江的部队及干部能多一点为好。你们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向广西与南路。

（三）嘱咐去琼崖的人将中央对冯白驹同志及其整个部队致慰问之意带去并告诉他们的任务有二：第一，派得力部队向南路发展和你们取得联系；第二，占领整个琼崖。

（四）你们须办一大的训练军事、政治与地方工作干部的学校。短的几星期，长的三四月毕业。分批集训。主要向广西方向派遣。

中　央

戌　寒

东江纵队一年半(1943—1944·6)工作报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这一年半，是我队一个重要转折点。可以分做两个时期，以十月十二日敌人打通广九路做分界，以前一年是第一时期，以后半年是第二时期。

一年半来，仍是处于敌顽夹攻三角斗争的基础形势中，仍是自卫斗争为主的形势，围绕着1942年的残酷内战。在第一时期（1943年），更加加深了国民党对我七月的军事进攻。特务的大批潜入，经济上的封锁，都比前更深了。一年半中，我们担负抗击顽军总兵力为一万人，与伪军相等，比敌人多一倍。第一时期中，更加上旱灾、粮荒，米价涨到空前的五六千元一百斤，富有者迁、中等食稀粥，贫民中有食杂粮树根。这些，都指我队面对着严重困难。到第二时期，敌人打通广九路，整个路西沦为敌区，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退，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我队力量与威信大大提高。尤其是十二月二日，宣布接受中共领导，成立东江纵队司令部以后，更有飞跃发展，这半年来，屡次对敌伪或反磨擦战斗胜利，无论人、质、地区都

巩固与扩大了。中央各项政策也都切实的实行了。到了今天，已经奠下了基础，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一个有力根据地。由于国民党政策及军队的倒退腐败，我党我军实际成为广东人民的旗帜。

第一时期（1943年1月至11月），由于我队1942年采取防御战略，一般了解为退避，不敢作大战，过分利用敌顽矛盾，掩蔽于接敌地区，我军处于被动的保守的地位，变成了消极的躲避。因此，招致了相当损失。又因为粮荒，全队厉行节约，生活艰苦，于是队内笼罩着悲观失望、恐敌、怕顽的情绪，产生了动摇、逃跑，作战不力的现象。

我在二月会议中，即已指出了今后形势，顽、伪脾馁，我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其于粮荒的严重中。定方针为精兵简政，建立外围武装，巩固原有阵地，干部分散分区领导，以小队为战斗单位，精干活动。而精减政策的执行，又变成简单的减人，甚至有一中队减至十八人的。

1943年初，敌伪出动较积极。顽军则因东莞、北柳战斗，宝安的尖子山、黄田战斗，惠阳、梧桐山战斗的损失，其锐气已成强弩之末，准备调防。我们则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反对苟安、保守、消极、逃避、恐日、恐顽的倾向，提出了随时打击敌人，即时准备战斗，积小胜为大胜的口号。同时，重建主力队，挑选全军得力干部，组成了主力中队（珠江中队），认真整训教育，成了全军的模范，屡次战斗均获胜利。一面则加紧整风，虽然环境常变动，以至影响整风计划，一年中没有好好的有效的使干部得到大的改进。但政治方面的干部，在若干程度上的转变是有的。

东江纵队在积极整风与积极打击软弱的伪军中，连获战捷，全队战斗力提高。随之，四月初对顽两战全胜。遂积极布置较大胜利的战斗，党内动员，政治动员，军事侦察布置，用炸药攻坚，爆破使用。曾公开宣示，此战斗成为我军改变作风及军威由此而振的一个枢纽。由于打了一个胜仗，把前时的一切颓靡不振、被动、偷懒的风气一扫而光，由防御转为出击，军威大振，战斗力大大提高。开始了使用地雷打击伪军，如摧枯拉朽。顽军亦为我打服。配合着反对国民党包围边区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尽量翻印了各项文章、专讯编成小册子，普遍散发各队，进行两个月关于这些文件的中级教育，纠正了干部对国民党的错误认识，空前提高了我党政治威信，国民党“正统”观念开始从民众心目中淡下去。军事上对顽军进攻采取主动积极的打击。凡此，都为下一时期做了准备工作。

政权已开始在东、宝较巩固的地区成立了，某些乡政府及各乡办事处，奠下后期民主政权开展的基础。生产运动，也逐渐点滴的进行着。这一时期里面，干部与战士中，仍保留有一贯的浓厚的游击主义作风，没有建立根据地、建立政权的观点。对于一切建制，不肯执行，不重视中央与上级的指示，不善于把握政策，仍有存在严重的违反政策的事实（减租问题、防奸问题、爱民问题）。然而，经过这一时期，我们根据地在艰苦的关头，而受到了大的锻炼。可以说，是已经站稳了脚，准备开步走了。

第二时期（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

广九路被敌打通后，敌人开始重视我队，曾举行了大岭山的万人大扫荡，与宝安的十路围攻，都被我们粉碎。这时候国民党军队退守路东及惠阳未沦陷区一带，在这些地带，仍然向我加紧进攻。以罗懋勋（特务头子）为首的顽军，曾举行了四次大进攻，兵力每次达到空前未有的二千五百人的围剿。结果，每遇痛击不敢深入，完全为我粉碎。而敌伪顽层层勾结，配合进攻的事实，比以前更为显著了。

无论形势的需要，民众的渴望，主观的力量，都要求我队成为一个更强大的队伍。在中央的批准下，我们于十二月二日，公开公布接受中共领导，正式改组成为东江纵队，成立司令部，以曾生（惠阳人），王作尧（东莞人）为正副司令。

这些公布与成立，无限地增长了我军我党威信，使广大的群众拥护与依靠我们，也鼓舞了全军干部与战士。由此声威大震，与前期完全两样。

因此，这一时期的方针，是大量发展，建立新地区与根据地。

在主力队的不断提高战斗力，连打胜仗影响下，每区均有一个或二个大队，以中队为战斗单位。由于敌兵力单薄、分散，故打伪军与打联防队成绩显著的战斗，几乎是开战以来的胜利。另一种，是反动地主的武装（护沙队），也有挂伪军名义，也有挂国民党与伪军武装名义的。其中土顽势力相当大，不易消灭（如东莞之刘发恩、南番顺之李辅群）。这半年中打伪军占战斗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这一时期，比以前时期人员增多了三倍（但是在扩军中仍有拉夫现象），武器增多了二倍（即1943年底为一，1944年6月人数为三，武器为二）。

整个路西，自沦为敌后，我们的活动区是扩大了，一直伸展到东江北岸。增、龙、博、广州、香港及东、宝、惠根据地的规模，是可以建立起来。我们在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到处成立，现已有东、宝行政督导处一所，区政府四个（包括四十二乡）。并在宝安、龙华、龙县乡间，民众选举了参议会。参议员中有地痞三人，我们的政权亦将其收下，鼓励其开荒，帮助其解决困难，使民众认识到与国民党旧的政权，完全不同。

在部队扩大政权建立的推动下，民兵也逐渐扩大了。脱离生产有战斗经验者二百七十三人，后备民兵有一千五百人，其中百分之五会单独打击敌伪。

1944年元旦，我们公布了拥爱公约，拥爱运动在全军掀起热潮，使民众认识到我们是他们的子弟兵。同时，生产运动也展开了。在惠阳普遍成立了生产救济会，均有成绩。今年二月间，我们救了美国机师凯尔上尉。五月间，又救了五个美机师。把我队在国际地位上空前提高，得到盟邦的重视。

而在建军建制，我们有了新的设施。司令部下设立了参谋处，分作战、交通、情报及教育四科，使全军参谋工作从建立而健全起来，对于研究敌、友、我情况、掌握战术、提高战斗力，都有成效。设立了军需处，对我军经济收支、物资管理、统筹统发、预算决算，都有条不紊的进行。建立了生活待遇，被服管理，工作报告等制度。此外，又建立了卫生科，策划进行全军卫生工作。这些，就逐渐地使游击作风肃清了，部队是壮大而坚强了。

党员（队部在内）在全军中比例（百分之二十五），由于扩军结果，较前一时期降低了（前期是百分之三十五）。一般虽能起模范，但因团结与领导群众工作做的不够，以致形成党在士兵群众中领导薄弱的现象。一般说来，党员能力与水平均好，但组织生活，党内教育均不健全。

为了干部缺乏与干部能力不强，而办了多期训练班，科队级以上干部共训练了一百二十人。

这一时期中，曾生发了一种骄气，重新起的军阀主义的作风。干部的自满自足，麻木不仁，对士兵打骂、官僚主义等恶劣倾向都发生了。经过拥爱运动和整风，一般均已在开始注意克服了。

领导上主要的缺点：

首先是忽视调查研究工作，各部门工作中，都存在浓厚的主观主义。由于没有收集材

料，不了解具体情况，也就不能正确掌握政策。而对中央指示决定，也没有重视，及召集高级干部先行讨论研究，再作具体传达指示的。如去年中央十一指示，直到今年，才被注意，开始执行，对各项政策，也缺乏周密的研究了解。

其次，不重视整风。虽自前年即已开始，但至今仍是小型的整风班。学委会虽建立，而徒具空名，所收效果极微。甚至整风文件亦不齐全。直到今年七月，得中央补发来，才能出版。因而大部份干部思想关节均未打通，背上包袱未放下，工作没有很大改造。

第三、领导方法仍是死板一套，不会灵活。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并未得到重视，没有加以研讨。以致未能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对干部批评坏的多，未发扬好的，甚至没有发扬。工作只是平常，不会发现模范者，及突破一点，推动其余，群众观点未彻底建立，不善于与群众联系。这使得我们工作没有蓬勃奋发，步步提高的新气象。

第四、从来对于各项经验的总结，都是新来的，也不懂得怎样总结。无论大的事体，小的战斗，都没有好好于事后总结其经验，即有也是形式化、表面化，没有深入研讨，得出生动的经验教训，使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能领会与接受，避免重犯从前山坪岢时，不幸事变的错误而东征。以至在战斗反磨擦斗争和各项建设都没有一个完整而具体的总结。今天干部中仍严重存在着排外的宗派主义，统战工作的忽视，统战政策运用上的过左，部队中本位主义，没有尽用大的力量去发动与组织群众等。

以上的缺点，都已严重注意到，并且逐渐在克服中，特别是公布是中共领导的部队以后，一切政策设施、言论、行动，均慎重。对于收集材料，工作报告，均比前充实具体。政策已能比较抓得紧。领导方法也学会一些，试行有效。对某一事件，某一些问题，都能注意总结其经验。

在两年半中，华南我党部队，所以能坚持与壮大，而且日益坚强，得到今日的成绩，恩来同志与中央的密切具体领导，是异常重要的因素。有了中央的帮助指示，才使我队不致迷失方向，失去信心，或者对工作无法可施。有了中央的帮助指示，才使我队日益进步，负起更艰巨的责任。

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及我军发展与扩大解放区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子华同志：

亥文电悉。

（一）敌对蒋仍是一打一拉，目前又到拉的时候，但将来还可能打；

（二）蒋对我党不愿作任何原则上让步，我党应坚持联合政府。在此种立场上不关闭谈判之门。其他不应再谈。结果仍是拖；

（三）沦陷区扩大，如我党能执行正确政策，便可使现有军队获得巩固，并可在新发展地方扩大军队；

（四）豫湘粤浙四省明年可能大发展。陕甘宁边区已抽出六千军队及干部赴豫湘；

（五）河南发展。胡宗南汤恩伯两部又南调十余师，此间已不感威胁。不须再增兵；

（六）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

毛泽东

亥　巧

对发展江南准备工作的意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张饶赖：

你们向南发展的部署和给各师首长的密信，中央各同志均已阅悉，你们的分析和部署是对的，中央前已略覆，为了应付情况变化和在准备工作方面，我们又想到几点，特提出如下意见供你们考虑：

一、为了准备在反攻时期，我党确实能占领芜宁沪杭各大城市，目前必须以大力着手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湘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包括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南面应包括浙西天目山京干路沿线及打通武夷山曾镜冰龙跃西处，西面应加强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地区的地下党工作或相机去恢复，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如果是这样，则北面夺取陇海沿线的任务，应由华北山东负主责，华中只担任配合责任，关于西面争取平汉沿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豫部队及四军五师划为一新的战略单位（由华北、太行、太岳各地予以协助）湖南及两广各为一战略单位，四军对以上单位只担任配合责任，但目前你们与五师的关系暂不改变。

二、为了争取江南苏、湘、皖、闽、赣地区，四军部队开始分批南下，粟裕率三个团为一批是对的，叶飞（或震林同去）准备率第二批去，嗣后，看情形可能再从二、三师派第三批去。提议派去部队，每团均留下三分之一的底于番号仍旧使在原地继续发展。

三、如反攻时期揭幕，则四军全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者外均应南渡长江，去保证在江南伟大发展，诸如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等任务，目前你们应从此种战略的可能情况出发，一面能使四军逐渐南调，一面能使现在江北的各地方兵团逐渐加强和提高，而能适合需要全部担任江北重大的配合任务。你们今后一切工作都应照顾大举南进和加强现地的双重任务。

四、华中局及军部应预有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期率队进入江南去主持全局，而江北现地应于军部南移后能成立一个独立工作的大单位，负责江北工作，这个江北军区要能担负起华中战略后方的重大任务，如出干部出兵、出军需品、粮秣资财，保证前线动用无缺等。

五、因此你们应开始考虑江北大军区的人选，将来这个单位仍是华中局下面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单位，下面的各军区，专区、县区均应以就地取材为原则，尽先任命与当地人民有联系的苏皖干部去担任领导工作，许多外地干部，应大量调赴江南工作，这方面在华北、华中过去均未十分注意，中央来陕北，自开始重用陕北当地干部充任重要领导责任之日起，收到改进工作团结全党，团结人民的效果极大，在华中，例如粟叶南进，应考虑培养管文蔚、李方、黄逸峰等，作为苏中的领导中心，重新要他们担任指挥部队和党的工作。例如在军队方面，三师应注意提拔原十五军团的干部到师级工作（徐海东同志病况如何代中央慰问）例如

二师方面中央派郭述申周骏鸣等回来负责，过去在二师方面对引用大别山的干部方面是不够的，在其他各地的地方工作方面，均应提拔当地干部，不仅作政权工作，而且就其可能去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我党在整个内战时期均曾犯过以外地干部代替当地干部的偏向，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偏向，你们在进行大的战略转移之际，宜注意人事配备中的提拔当地干部的原则，自然，华中的大发展是在四军进入之后，那时不能不形成外地干部占优势的事实，但几年的情况变化，当地干部已受过锻炼，这一事实已到了应该改变时候了，而且在四军未到之前，华中确有一些开创游击的老干部，如管文蔚、孙象涵、涂宗田、吴觉及其他许多同志，目前应考虑就才德资三方面的可能性，宽广大胆的在当地去重用他们，加以培养，加以提拔。

六、中央决定将华中前后来延干部计百余名全部派回华中工作，另从在延的东南籍贯的团县以上老干部，调四百名左右来华中工作，还又加调东南各地的新知识分子约四百名同来，这些干部明春可分批起程，但这些干部大部应使用在江南去担任发展工作，并准备就可能派些到闽赣各地去，而在江北各地区仍应征先录用当地人材。

七、以上是属于战略部署上的一些意见，提出供你们考虑，例如江南情况是否能屯集众多兵力，其限度如何，江北地区抽调兵力的限制是否影响到现在坚持和将来配合，以及提拔当地干部，和提拔部队老基础的干部的可能程度，均应防止另一偏向的发生，还有其他未想到事情甚多，请你们详细加考虑电告中央，再作执行的决定。

刘少奇
陈　毅
亥　宥

中共中央关于武工队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1、三年来武工队斗争逐渐发展，已成为对连续进攻与长期发动农民的主要形式。两年来的斗争，大体上已将敌人挤到点线上与边缘地区，并保证了主力作战的胜利，保卫根据地的建设更臻巩固，成绩是很大的。

今后方针是消灭内地点线，开辟敌占区，把敌人挤到主要交通线上。因此，一不应满足于已有成绩，二不应拘束于现有经验，必须坚持进攻方针，继续向前发展，综合各种武工队的经验，把武工队工作，更加提高一步，以实现上述方针。

2、武工队有三种较好的类型：一种是阵地的，由正面推进，如刘笃庆、杨德兼型以公开为主的武工队。一种是深入敌人内部，掌握合法斗争，如阎子诚型以秘密为主的武工队。一种是钻入敌占区争取群众，取得阵地，逐渐发展，如安正福型半公开的武工队。应把三种经验综合起来加以提高并普及于各个武工队，使之善于运用公开（明）的，秘密（暗）的，半公开（灰）的，武装（硬）的，和平（软）的，非法的，合法的，一切可能打击敌人的斗争的方式，把正面推进与敌后发展结合起来。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点到面逐渐向前发展。

3、武工队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斗争的经验，和军事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经验，应大大发扬。任何一个军事斗争（从主力到民兵）若是没有内线工作，群众斗争的参加，就没有可靠的把握；反之，任何一个军事斗争，又必须估计到发动群众的可能如何，是否可以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军事的（民兵爆炸）、政治的（政权，反奸，敌伪内线工作）、经济的（反贪污，反维持，减租生产等）、文化的（敌伪宣传，群众教育，冬学，演剧，读报等）各种斗争，不如此，便不能保证持续的胜利。按一般经验，切合时宜与切合群众迫切要求，提出经济口号（如反贪污，反负担，反维持，反抢掠，减租生产，贸易合作等），是发动农民的中心一环（也可说是普遍真理）。其他斗争与经济斗争相辅而行，逐渐提高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不合事宜的生硬口号，应当避免。

4、进一步贯彻群众思想，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仍然是武工队的重大问题。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必须见之于"让群众起来干"的行动，包办群众斗争，忽视群众力量，任何胜利不会巩固的。只有群众起来和我们一起来干，不管任何地区，都能站住脚，扎下根。当群众起来之后，培养地方干部与培植地方武装，又是巩固与提高群众的两件大事。过去这两件工作，做的还不够，今后要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到武工队中来，凡是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群众领袖就要注意培养，大胆提拔，绝不要限于资格、经验、文化的偏见，而弃之不顾，贻误工作。培养地方武装，由组织公开或秘密民兵及掌握伪青年团着手，以自愿的个别的方式，逐渐发展为民兵战斗队、地方游击队、或掩蔽在群众中的秘密游击队（聚则为兵，散则为民）。武工队有了联系群众的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就可能成为不可被战胜的力量。

5、贯彻群众思想，实行主动进攻，综合斗争，统一领导，是武工队完成任务的基本问题，望多加注意。

中央关于开展南方工作指示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周：

南方局在目前时期的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与上层联络工作外，应用大力进行下层的群众工作，为了准备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以及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我们必须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南方局及大后方各地党的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深入到农村中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办法去为农民群众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只有这一工作获有大的成绩时，然后才能在日本进攻中或国内重大事变中有雄厚的与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这个工作望你与若飞商量，加以布置。

中　央

大后方的一般概况*

（一九四五年春）

董必武

我回到延安一个多月，看到我们各方面的建设，都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成绩。过去，我听到的也很多，到延安后眼见的就更多，把眼见的和耳闻的比较一下，眼见的比耳闻的多得多。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这几句话给我们在大后方工作的人，以很大的鼓励。到延安后就应向大家做一报告，我一回来就感冒，把这个报告一直拖到今天。因回来的仓卒，来不及搜集材料，不能做什么有系统的报告；但看到边区受着封锁，各同志连大后方的报纸也看不到，我讲的只算是一些片断的新闻，各位把它当做几段不完全的报纸看吧！我讲的零零碎碎，拉拉杂杂，不能有很好的系统，这是要请大家原谅的！

今天我讲的总题目是：——大后方的一般概况。

大后方的一般概况，是怎样呢？如果从政治、军事各方面做一概括的说明，我们党有句很好的话，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失败主义的军令”。另外更简略一点讲，也可以用我们党的一句话：——“大后方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更露骨的来说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

首先来说一下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这个个人独裁的形态，是慢慢的搞完备了。前年八月以前，林森做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那时只是党的总裁，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还没有真正的完成独裁统治形态。林森死后，他做了主席，独裁统治形态更完备了。国民政府原有一个“国民政府组织法”，组织法上规定主席的权力只是国家元首，和接待外宾。实际上只是国民政府的监印，有任命和命令时盖盖印而已。等蒋要做主席，他就把组织法修改了，主席可以做中国海、陆、空军大元帅，可以兼任任何职务，——行政院院长及其他一切职务都可以兼。过去国民政府五院院长是经国民党中央提出和通过的，现在便由主席提经国民党中央通过；以前五院院长向国民党中央负责，现在是对主席负责。从这里可以看到，别人做主席时，什么权力也没有，他做主席时，便有一切权力，别人不能兼任何职务，他却可以兼一切职务。现在蒋介石的兼职，有国民党总裁，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是党与军的。政府方面，他兼行政院院长，不久以前才换了他的舅子宋子文，还是代理的，财政方面呢？四行联合办事处主任是他；教育方面，抗战前兼过教育部长，不久以前兼过中央大学校长，现在，陆军大学、中央军校、中央政治学校、警察学校……的校长还都是他，（笑声）一切都是他。有一个时期还兼任过四川省主席。有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说，如果重庆市长出了缺，他还会兼市长，

* 原说明：这本书是董必武同志一九四五年春由渝返延的报告。印出供目前党内时事学习的参考。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甚至与他邻近的那一保的保长出了缺，他也会兼的。（大笑）但可惜他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一切机关的存在都是表面的，实质上一切权力都在他个人身上。我曾经和一个外国朋友研究：国民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究竟在什么地方？他说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一党专政。这样说有点象，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平时则是常务委员会。那末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应该是最有权力的了，实则常委会什么事也管不了。一次，一个国民党的常务委员，问我："我们陕西省党部书记长是那一位？"我说："你们省党部的书记长是谁，怎么问我呢？"象这一类的事，不仅他一人不知道，别的中央常务委员也一样，党内有好多事他们都不知道。又如世界注目的国共问题，多少常委时常问我们，谈判的情形如何？这样大的问题他们都不知道，可见最高权力机关不是常委会了。行政院呢？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但什么事也都得去问蒋，可见也不是什么最高权力机关。军事委员会也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蒋介石用他个人名义打一个电报，可以撤销他的任何命令。此外有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看去该是最高的了，其实也不是。有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问我："最近有什么事，知道不知道？"我反问他道："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什么事不知道，怎么还来问我呢？"他说："我们国防最高委员会什么都管，只有一件事不管，那就是国防。"（笑声）总之，只有蒋介石个人是最高的。他有一个"侍从室"是最高的机关，什么命令，蒋的名字后附一"侍"字就行，就高于一切。但"侍从室"的组织，在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是无规定的。

从这几点看来，在世界上，蒋介石可以说是最独裁的独裁，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象他那样子的吧？

再讲一讲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几个问题。国民党曾于政府机关、学校、军营工厂等处进行集体入党的办法，虽没有完全达到它预期的目的，确吸收了一大批党员。考试制度、铨叙方法与各机关设立人事科等都是为着便于一党专政的。去年五月，国民党开了十二中全会，那个会未做一种有意义的事情，只解决了一个党内问题：就是CC重新掌握国民党的组织权，陈果夫代朱家骅做了组织部长。故国民党里有一部分人说："花了×六百万元宰了一个猪"（即朱家骅之"朱"），"结了一个果"（陈果夫之"果"）。又因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也挤落了，故有人说十二中全会是杀猪（"朱"）宰羊（"杨"）。现在国民党内部意见有很大的分歧，蒋介石感觉到和过去不同；另外党外各种势力，特别是我们党势力的增长，使他考虑到他自己党的实力，于是他想把党加以纯化，以便加强他的统治，便使CC上台。陈立夫对人讲：北伐时共产党在国内横行，他做了组织部长，把党内纯化了，把共产党打击了，在他们区域彻底把共产党清除了，捉了共产党员两万多，干部四千多，中央委员有三十七八个。这种说法有无夸大？把我们牺牲的人计算起来，说两万多没有夸大，干部也无夸大，中央一级的都有名字。他说将来要做的事，就是加强内部统治，使党内纯化，以对外。对外是会更加毒辣的，我们看到希特勒德国快要崩溃，他要挽救自己，便用希姆莱为内务部长，而国民党现在重用CC管组织，这正和德国用希姆莱是一样，这是一。

第二要证明国民党想加强其统治的，就是"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去年十月间，蒋召集他的党团干部会议，要成立党军，因为日本进攻大大削弱了他的力量，又看到国内的许多人不满，我党力量日增，所以蒋介石就想出这样的一个计划。蒋介石曾有一个讲演，说到这么几点：目前日本还在内侵，"奸党"到处横行，党国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挽救的关键，就是要恢复黄埔建军的精神，必须发动十万党团员从军。蒋的军队是集体入党的，号称五百

万，已经是党军了，为什么还要成立党军呢？他知道军队中的党员是个虚数，不可靠，故另打主意。蒋以为国民党有两百万党员外，三青团还有六十几万团员，编成十万党团员的军队是容易做到的。蒋在讲演中说："本总裁愿任该军军长"，而且还不只一次，说了三次。总裁是国民党内领袖的职衔，总裁任军长，这也说明他要组织的是他理想的党军，如象德国希特勒的SA和SS一样。

为什么以后变了形态，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从军而不限定于党团员呢？第一个便是内部的原因，在蒋介石宣布成立党军后，党部讨论了一下，认为从军是青年的事，大部分人应该是团员。团方面则说：那不是成了团军吗？而现在成立的是党军呢！争执的结果，决定党团两方面各分一半。但这决定，在中央党部，就引起党员的辞职，眼看着行不通，于是又决定党团员只按五万再折半各分二万五千名。其余五万则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因为只有一半是党团员，所以就不叫"党军"，而改为现在的名字。第二是外部原因。蒋对这个军队不仅是想在生活、训练上搞好，武装上也想搞得特别好。这就得向美国要，但美国最恼火的是中国法西斯化，它固然愿意扶持蒋介石，但不愿中国法西斯化，因而对蒋介石成立党军是不愿意帮助的。美国对共产主义，固然不赞成，对法西斯更不赞成，前美国国务卿赫尔有一个名演说：他说这次大战是反法西斯，那一个角落里存在着法西斯，便要消灭它。不只美国人，中国人也感觉到这一点。孙科就说：美国跟苏联搞的很好，美国害怕的是法西斯主义，现在它并不怕共产主义，我国想把反共争取美国的同情是大错而特错的，目前应把反法西斯放在前面。美国不赞成就不行。再就中国内部说，国民党内部聪明人也不赞成成立党军。我们看出他这种阴谋，自然设法揭露它，我们就把德国的SA，SS是怎样形成的？它的作用是什么？一一在报上公布；"新华日报"做了两篇社论，我们说青年应该参军，但为什么不愿从军呢？就因为政府不民主。第一篇说得浑含一点通过了，国民党自然不满意；第二篇社论说得更露骨，就被扣掉了。因为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使党军的名目不能公然成立，而用了青年知识分子从军的名称，而且冠有远征二字，欺骗作用更大。名称虽不叫党军，而仍保留着党军的形态，如办理这件事的总机关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三青团中央团部，各地方也由地方党部和团部负责：青年知识分子从军的指导委员会有六十余人，其中有社会上一二知名人士，但是挂名的，而且他们也都有国民党的党籍。就指导委员会中十三个常务委员来说，那完全是国民党或三青团的要人，如何应钦、吴铁城、陈果夫、张治中、康泽……等，康泽做了主任秘书，他是在三青团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康泽是一个特务头子。这种党军组织形态，我们不能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但我们能用口头到处讲。重庆及其他地方读我们报纸的青年，看见"新华日报"不登各地青年从军的消息，想着国民党号召的这桩事，中共机关报没有表示拥护，那桩事大概是不好的。我曾问一个学生，为什么你们不去从军呢？他说：我们读"新华日报"，看你们报上，关于青年从军的事一字不提，你们报上不登，那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对此事也就很冷淡。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训练科长以上的干部，各地党团员还经严格的考试，每年入校二三百人，现共四千多人。为着响应国民党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军的号召，中政学校有二百余人报名。该校党部觉得这个学校是国民党最高学校，应该全体响应才好，党部开了三天会，决定政校全体自愿从军。十月十九日开全校党员大会，特区党部负责人做报告后，宣布了那个预定的决议，并说大家考虑一下，要么赞成，要么反对，不准讨论。有一人举起手来要求讲话，主持人说有人举手赞成，"好"，就算通过了，马上宣布散会。但散会

后，许多人不服，留在那里的还有一千多人，大家另组织主席团，自己讨论，认为决议不民主。推定代表去找教育长程天放，说明大会主席团宣布通过决议的不合法。程天放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说我去查一下，你们散去。代表回来报告，大家仍不散，程派萨孟武去解释，萨在会上把国民党这次组织党军来对抗共产党的意思畅发一番。反对的人不听，把萨哄走了。这时赞成决议的二百余人就闯进会场乱打一顿，大家就被闹散了。第二天停了课，说有“奸党”造谣，捉了四个人，才把风潮压下去。但全校全体从军的消息也消沉了。蒋原来不打算公布什么文件的，因中政校这样一闹，才决定发表告青年知识分子的书，这封书是十月二十四日公布的。青年从军问题，在中央大学也闹了一桩故事，蒋曾兼过中大校长，蒋的号召应该得到很好的回响的，可是蒋告青年书发表后，中大全没声响。校长顾毓琇急了，自己打冲锋先报名，学生说：“好，校长从军，我们欢送”。顾曾编“荆轲”一剧，剧中用了荆轲的两句歌词：“风肖肖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中大学生就把这两句歌词改为“风肖肖兮易水寒，校长一去兮不复还”。直到后来，敌人侵入贵州独山，顾放出风声说敌陷贵阳，中大就要解散，学生想不出别的出路，于是才有两千多人报名从军。

那末，是否国民党号召十万青年知识分子从军就完成不了任务呢？不，不是的。最近“参考消息”上讲：国民党自称已有十二万余青年报名从军，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日本打进中国，还在一天一天深入，抗日对人民仍是一个很大的激动，青年的抗日热情还是存在着，这就可以吸收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去。另外他号召组织远征军，这样也容易引诱一些人从军，因为大家不愿意打内战而愿意打日寇，远征自然是对日寇的。而且远征军是去印度，一切由美国供给，吃的好，穿的好，武器又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派去从军，还可以从大后方沉闷的空气中跑出去，呼吸些新鲜的空气。从军后，蒋介石还发给五千元安家费，入伍后，一切膳宿，待遇都特别优待，比一般部队生活都加倍的好，并且还找了几个地方，做做样子，这样也很可能诱动一些青年去报名从军。此外，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知识分子，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大后方，学校不能容纳，又无法找到职业，甚至东北每年流亡到大后方的青年也不少，他们都是亲身领略过日寇奴役的滋味的，他们都愿意打回家乡去，收复失地，这是第三个来源。第四个来源是公务人员可以从军。公务人员从军，除原薪不动外，外加五千元安家费。大后方公务人员，生活很苦，一个科长，月入一万元，看来似乎不少，但物价高涨，青菜和柴薪每斤五六元，食盐每斤四十元，油每斤二百来元，米六七千元一市石，平均每人每月需洋三四千元，才能维持生活。这样万余元的收入维持一家数口人的生活是困难的。如去从军，自己的一分薪水，可以多养活家里的一口人，并有五千元安家费，这就首先可以暂时解决一下生活问题。第五，大后方大批的失业，也是一个来源（以下讲到）。有这些后备军，十二万人报名从军，是可能做到的。但报名的人未必个个都能合格。即令有那么多人合格，是否就算是达到他党军的目的了呢？这就不见得。因为：一、大多数还不是党团员；二、还未加以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可能有变化；三、武器还要从美国拿来，美国对这种表面作国防军召集而实际是党军的办法是否完全无知呢？这还是个问题；四、欺骗遮眼法总会被人民揭穿的。另有值得注意的一方面，国民党军队的生活是很苦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沙眼、疟疾都很厉害。曾经在重庆有一个团看到从军的知识青年一个连，吃得好，穿得好，就骂起来，后来更打起来了。这说明把知识青年从军的生活提高，就使原有军队对自身生活更加不满。照他的目的做去，一方面，加了十万战斗力；另一方面，却减了二百万的战斗力。这不能不说是摆在蒋面前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三，要说明加强法西斯统治的是最近内政部、军政部、教育部的改组。教育部是由这一CC（陈立夫）换成另一CC（朱家骅）负责。内政部，在外国是最主要的一部，但在国民政府，过去则不然，它是拿来安插一种不关重要的人的地方。但现在蒋介石看重了内政部，用CC大将张厉生去做内政部长。因为蒋介石看见赤裸裸的一套法西斯办法行不通，又要玩"宪政"的把戏，于是地方自治啦，选举啦，又喊起来了。蒋要CC控制地方自治与操纵选举，所以和国民党内组织部配合起来内政部用张厉生。国民政府有考试院，权力很大，照它的章程一切的公职人员都要经过考试。考"三民主义"，现在还考"中国之命运"，考试获取后才能任职，地方自治人员，选举人，都是一样。考试已经是只便利国民党员，再由CC主持的内政部来监督地方自治与选举，那还那里有非国民党人任公职的权力呢？所以蒋用张厉生任内政部长只能看做是蒋想强化他的法西斯统治的一个步骤。用陈诚做军政部长，有人说陈诚比何应钦好，这不是没有道理。如以陈与何个人来作比，陈是比何在品质上有些不同，在抗日这点上说来，陈诚比何应钦要好些，因何是失败主义者，亲日派头子，何对建军工作也消极怠工，贪污是最厉害的一个。陈诚在国民党那边说来还没有听见人说他有什么贪污，并且因为他年纪较轻，有事业心，比较积极一些。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蒋介石用陈诚，主要是来加强反共，陈反共的方法比较要巧妙些，何的反共则较笨，用公开投降敌人的方法是反不了共的。因此，陈诚任军政部长，应看到其有更坏的意义的一方面。

下面说一些国民党的几个欺骗人民的办法：蒋介石的独裁，不要把它看成是个简单的问题。

（一）首先是关于民主问题。蒋介石在抗战初不讲民主。在三九年时，因国内人民要求民主的迫切，他虽允许于四〇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讲了一下民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一变，我国因抗日而国际地位提高，成四大强国之一，蒋本人亦成为四大领袖之一，国民大会无期延期，因此他又不让人民讲民主了，后来更任意把国民大会的召集推到抗战胜利后一年以内。说要实行"民权"（注意：蒋介石故意避开民主二字不谈，而用民权字样，是有他特殊用意的。民主在英美有极普遍的含义，而民权则系依照蒋自己规定的内容来表示的），说待战后又要召集国民大会，这是由于去年连吃败仗，想稳定人民对他的信仰。且因英美舆论严厉批评他的独裁。所以，蒋介石最近又讲要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他是借此来欺骗人民，欺骗英美，企图取得盟邦的援助。

（二）关于检查制度中放宽尺度问题。在国民党最反动时期，我们"新华日报"上，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抗日胜利的战绩是不许登载的，"边区"字样是不能提的，"三三制""新民主主义"更不能提，甚至连孙中山先生的话也不能登。有一次我们把孙中山先生提倡人民有权的话，在"新华日报"上登出来，检查人员硬把它删掉。我们报馆的人去质问新闻检查所，他们答复的真妙不可言，他们说："这是我们说的话，你们不能讲。"（笑声）过去国民党对言论的控制，有些话我们只能讲一次，讲两次三次就不行。送检的原稿，检查员任意删改，有时删得文章前后不贯气，你也只能照登，他改掉原文意思，把他的意思添在稿上，有时不通，有时甚至与原意相反，你不照登，他就给你处罚。去年，国际国内舆论都指摘国民党检查制度的不合理，经过宪政实施协进会的要求，国民党才允许放宽尺度。所谓放宽尺度实际是什么呢？照国民党规定，凡出版书籍杂志不涉及国防、军事、政治、外交者，都可以不事先送检。过去，连自然科学、历史、哲学之类都是要送检的，现在是采取事后检查的办法，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随时任意检扣，印成书被扣，出版家和著作者损失更大。

对于一般言论上也略有放宽之处，但对我们则仍严格的限制着。我们采取各种方法，突破它的限制，所以在“新华日报”上也披露了不少的东西。这就是国民党检查制中的放宽尺度。

（三）关于保障人身自由问题。在国民党特务政策统治下面，在路上走的人有被抓去的，在家中坐的人有被抓去的，甚至坐在办公厅的公务员有被抓去的。抓去的方式，不依任何法律手续，不公开，被捉到什么地方去考问和监禁，没有人知道，抓错了的经过要人保释，可能释放，但出来后不准谈被捕及被监禁的情形。去年蒋听见国内要求人身自由的呼声很普遍，国际也有批评国民党统治下这种特务横行的舆论，宪政实施协进会提案要求，国府被逼才公布一道保障人身自由的命令，定于去年八月一日起实施。国人要求政府公布有权逮捕人的机关，弄了几个月在报上披露一次消息，说政府认为有权逮捕人的是二十几个。实际上不公开取消特务机关，所谓保障人身自由的命令，仅是欺骗国际国内人士的一种手法。举例来说，在重庆北碚附近兴隆场有国民党特务机关设立的集中营一所，在七月只剩一百四十余人，八月保障人身自由命令发生效力以后陡增至二百余人。过去无辜被捕的思想犯和爱国政治犯，既不审判，又不释放，如张学良、杨虎城，新四军军长叶挺以及我党同志廖承志等，至今尚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我曾经对国民党要人说，不管政府公布多少次保障人身自由的命令，如果张杨叶廖等不得自由的话，那是一文不值的。

（四）关于扩大参政会职权问题。参政会，国民党对外宣传为战时民意机关，实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参政会无论就其组织或职权来说都与所谓民意机关距离甚远，参政员二百四十名中大部分由各省参议会选出，但省参议员都是国民党指定的。另一部分则由国民党指派，所以就组织成分来看都与人民没交涉，参政会的职权可以听政府各部长官的报告，可以询问，可以建议，但一切决议，都要送国防最高委员会审核后才发生效力。询问权一项在国民党看来已经了不起，实际那算什么一回事呢？去年张君劢、左舜生等在宪政实施协进会内提案要求扩大参政会职权至于能看一下预算，不是审查和议决，国民党拼命反对，后来为着敷衍张左才答应了。看一下预算，仅仅是知道政府一年收支大概情形，而政府拿出来看的还是做好了的一篇皮面帐，实际的收支，它是无论如何不会让人知道的。现在国民政府又公布了省参议会组织法，省参议员规定由县参议员选举，县参议员是经过考试后的候选人，选举时又要经过国民党指定，还不是与人民无关系。但蒋的这类假民意机关的把戏，不是人人都明白的。

蒋介石估计政治形势有几个基本观点：

蒋介石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关于英美苏联合抗击法西斯和他们相互关系问题。这次世界大战英美苏要共同击败法西斯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而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又是分歧的。对这些分歧点，斯大林、罗斯福都说过；邱吉尔没有说，实际上却做了很多分歧的事情，如：英国对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政策，便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些事实反映在蒋介石的身上，他认为英、美、苏目前虽合作，将来总会分裂，甚至会打起仗来。他知英美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两种国家经济制度是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他不知道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威胁着苏联，同时也威胁着英美，这使他们不能不协力抵抗。战后彼此都需要和平，必然都想要找出较长期合作的办法，而某些分歧的问题是不断的在发生、存在和解决中，这反映到蒋介石眼中觉得他们中间的分歧点比共同点还要多一些。这好象赌博的人押老宝一样，他把自己的宝总押在“双”上，想着总有一天会有“双”出现的。

蒋介石的第二个基本观点，是从第一个基本观点来的。他认为英美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于是，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得到英美的支持。抗战以前，英美是用了很大力量支持他反共的；抗战后英美虽没支持他反共，但用很大力量支持了他也是事实。而且英美国内的金融寡头反对他们国内的共产党，也反对国外的共产党，更会支持了他的立场。这便使得蒋介石觉得国内反共可获得资本主义国家支持的，这一宝押得很稳当。要说资本主义国家会援助共产党，一般说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目前威胁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生存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英美的一些爱好民主的人士都看得很清楚，目前反对法西斯主义还是第一的。又因反法西斯各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最英勇，最坚决，一切爱好民主的人士都与以同情并愿意和他们共同对法西斯作战。这在蒋介石看起来自然是很奇怪的。

蒋介石的第三个基本观点，他认为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英美与日本妥协已经成为不可能。英美要消灭日本的武力，他们的海空军，是占优势的，但是要彻底消灭日本陆军，英美把大量的陆军运到远东来决战，是难以设想的。美国海军人员过去曾想从日本本土登陆，以为这样就搞垮了日本，这观点已逐渐幻灭了。要从海陆空三方面消灭日本，英美就不得不利用中国的陆军，蒋介石自信陆军数量还不少，只要他一天不公开和日寇妥协，英美便要利用他。所以，他认为英美今天将不管他的力量在国内的反动性如何，他依然抗日，英美舆论虽对他不满，但英美统治者都会支持他。蒋介石也知道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无论如何，是不会单独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的。

根据以上的基本观点，蒋介石决定的基本方针：一、反苏，二、反共；保存实力，骗取英美的军火，特别是美国的，以加强他反动的统治。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了强大的力量，国际地位增高了，因此，蒋虽实际反苏而口头上却不能不说要与苏联关系搞好。记得我国驻安哥拉公使曾有电报回来说土耳其政府要人们在押宝，他们想英美早晚一定会反苏，土尔其与苏联的关系总搞不好，一定会博得英美的信任。土耳其政府要人们所押的宝和蒋介石所押的一样，天下事真是无独有偶了。至于蒋介石的反共更是经常进行，虽然事实上碰了几次钉子，但是直到现在他的观点还没有改变。因为目前英美，特别是美国不愿中国有内战，因为全国人民反对打内战，因为他自身武力的削弱和我们力量的加强，蒋介石才在表面决定国共关系用政治方法解决，而绝不表示有政治解决的诚意，实际上仍是“骗”与“拖”。

很显然的，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英美与苏联矛盾虽很多，但是目前反法西斯德国战争期间是合作的，即战后的一定期间内也还要合作的。在英国邱吉尔等虽保守，不赞成共产主义，但广大工人与爱好和平的人民是要求与苏联合作的。美国是更加要求与苏长期合作，因为它的基本要求是贸易市场问题。英美现在当局都是实际主义者，他们首先所注重的是行动怎样，至于信仰什么，他们看作是次要的。而且只有象在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才有所谓思想犯，在英美等国，信仰共产主义是不犯罪的。甚至在美国报纸上有人公开说他自己相信法西斯主义也不犯罪。美国正是与法西斯主义国家在作战呢。我们共产主义者只要自己在策略上不犯错误，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争取英美爱好民主人士的同情和合作，就一定可能。自然，我们不能说让他们也会相信共产主义，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能实现正如我们不相信资本主义会永久存在下去一样，这是属于思想问题。当然，我们若要在策略上犯了错误，那便另是一回事情了。

由于蒋基本的错误观点不变，他对国际国内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便不得不采取一些欺骗的办法。其欺骗办法如不在政治生活中深刻体验，是不会知道的。如：最近他在元旦广播中

提出要复员，可是自一九四二年以来他一贯是讲“复员”的。他为什么讲复员呢？蒋介石是把他的宝押在苏日战争上了，他希望由英美的海空军消灭日本的海空军，苏联的陆空军消灭日本的陆空军，然后他借同盟国的帮助把他的力量加强起来，收复失地，消灭国内一切异己分子，于是遂有“复员”计划。（笑声）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就当我们的面说过，“中国有什么力量打胜日本呢？只是把日本拖着，等到英美苏把它打垮，我们中国收复失地就是了。”前年十一中全会，蒋介石估计打垮日本只需半年或一年，当时我们想日本为什么半年就能垮台呢？除非是日本火山爆发，大地震，把日本岛沉到海内去才有可能。去年“九一八”，蒋介石在参政会开会时说：“中国军事危机已经过去”。但过了几天，他又对参政员说：“自从五月以来，中国的军事危机是一天天的严重”。最近又说：“我相信日寇妄想消灭我们中国的时机，已经过去了”。这些话谁相信呢，甚至国民党的党员也说：“蒋老总的话都是瞎说的”。

蒋介石还另外有一个基本观点，从“中国之命运”中可以看出来，“中国之命运”的要点是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这恰恰反映出他自己是法西斯主义的观点。关于“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出版和再版的经过在这里顺便讲一下也有必要。“中国之命运”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出版的，那时蒋介石估计：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再没有力量打中国了，因为英美是世界两大强国，这两个强国与日本为敌，日本一定要用全力去准备决战，他又估计日本在太平洋及南洋群岛和缅甸的侵占，一时消化不了，便会放过他所统治的中国。那时日寇在华北华中疯狂的“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想巩固其占领区，已累得喘不过气来，自然不会搞到他头上去，这时期他在国际上的地位确是提高了，原因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寇在太平洋、南洋、缅甸横行无阻；美国在珍珠港受到袭击，以致太平洋舰队不能活动。而英国经营多年远东头等军港的新加坡守军八万余人不到二十天便被日本攻垮了，不到半年功夫日本把英美打得狼狈不堪，而中国是一个军备很弱的国家却抗日抗了四年多，于是英美把蒋介石看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时，蒋介石的雄心也很大，他跑到印度去打算组织“中印联盟”想当这个联盟的领袖。可是英国虽然在南洋输给了日本，但谁搞印度还是等于挖他的祖坟。所以蒋介石到印度去，英国开始并不理他，后来才叫驻印总督林里斯哥招待他一下。蒋要见甘地、尼赫鲁，林里斯哥要他在总督衙门接见。他见了尼赫鲁，在回国的路上才见了一下甘地。实际上英国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于是，蒋介石回来以后便大骂英国是帝国主义。在写“中国之命运”时，他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因为他吃了英国自由主义的亏。自然，反共是更重要的。一九四二年底已写好，他试印了几百本，原来拟订的是五年计划，正式出版时又改成十年计划。这本书出版，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民党内部也受到批评。在欧美影响极坏，尤其英国人不满，只有日本人才欢迎它。这本书为什么引起外国的反对呢？蒋想夸耀他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功勋（其实取消不平等条约是英美送中国的一种也重要也不重要的人情），说明过去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经过，大骂帝国主义，这样一来不仅触犯到美国，更触犯到英国；他对英国不还九龙、香港和不让西藏回到中国怀抱，是很不满的。英国觉得他这本书反英气氛很浓，所以更不满。蒋曾准备把它译成外国文，以王宠惠为指导，组织了一个翻译委员会，其中有一个美国人浦徕士参加翻译，这个人一向是捧蒋的。蒋征求他对该书的意见，浦徕士说：“委员长这本书没有表现出委员长人格的伟大”。蒋问何故？浦徕士说：“你已经是一个全中国的领袖，而这本书中表示你只要做一个党的领袖，这不相称”。又说：“你写的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经过都是过去的事情，对同盟国而且好象是算

旧帐，对盟友现在不应算旧帐”。蒋听后说：“嗯，嗯”。同时宋美龄从美国打电报回来，请蒋将该书的英译本等她回来看过以后再出版，她已经知道美国不满意这本书了。国民党内部有人说除最后两章讲国共关系的以外，其他都很好。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整个中国是一个宗族，是同一血统等，实际上回族、蒙古族、满族、藏族，再如裸裸摆夷等有许多信仰、风俗、言语、文字、经济生活、居住地方，都是不相同的民族。说这些民族是同一血统，简直是伪造历史。这点连国民党内的人都不满意，已经有人写出批评的意见，但不敢公开发表罢了。蒋介石听说“评中国之命运”出版了，曾派飞机到西安来取，看了以后大发脾气，结果亦无如之何。

对于“中国之命运”的批评，外国虽然没有写出专书，但却经常引用该书里面的话句，于是蒋下手谕说凡是引用该书语句的人，必须得到他的同意。（笑声）

为着想回答“评中国之命运”，蒋拟把“中国之命运”修订再版，过了一些时又停下来，到一九四四年元旦，终于将“中国之命运”增订本出版了，有什么原故呢？说起来话很长，不说终不能明白，只好讲下去：

前年十一月开罗会议时，蒋介石曾闹了一个大笑话。罗斯福、邱吉尔邀蒋开开罗会议，是为了要和斯大林开德黑兰会议，先商量一下远东问题，然后好切实布置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开罗会议虽非决定马上和日寇决战，但对反攻的力量和计划要通盘筹划一番，这是应当的。所以，罗斯福带了海陆空军负责者和参谋人员及其他要人一百七十余人。邱吉尔则以一支战舰带了海陆空军负责者参谋人员经济外交要人六百多人，预备把盟国方面的武力资源做一切实研究。在三巨头会议之外还要开许多专门的会研究讨论。可是蒋介石所带的人连宋美龄的老妈子在内一共是二十个人，在排定参加各种专门会议出席人时，人家问蒋的随员黄仁霖：“贵国参加海军会议的是谁？”黄答曰“委员长”；又问：“参加陆军会议的是谁？”又答是“委员长”；又问：“参加空军会议的是谁？”还是答“委员长”。于是外国人问：“贵国怎么只有一个委员长？”黄答：“中国是以质胜量”。当时外国人大为不满说：“我们难道都是饭桶吗？”蒋介石出席这次会没有准备任何反攻日寇的材料，只想伸着手要东西。另外带了一些反苏反共的材料。开会以前蒋与罗斯福交谈，罗斯福说：“这个先放下以后再谈”。使蒋碰了一个大钉子。在会议中英美要蒋介石提出关于反攻计划来，因为蒋没有准备所以提不出，最后还是美国提出一个计划，蒋介石同意了。蒋要求英国把地中海的舰队移到东西亚海上，邱吉尔不答应，蒋想提出九龙香港的问题不敢提，想在西藏开公路，也没有谈到，这又是一个大钉子。第三个钉子是蒋介石想向罗斯福借十万万美金，罗斯福说：“美国宪法，总统无权签定借款，先要经国会同意，这事请你的财政部长与我的财政部长莫根索商量吧”。蒋写了十九条备忘录交给罗斯福，第二天王宠惠问贺浦金斯：“我们委员长的备忘录总统看了没有？”贺浦金斯答：“总统很忙，预备带到华盛顿去再看”。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是碰了很多的钉子。所以，他回国以后闭口不谈开罗会议。

但是在开罗会议中，蒋知道英美对苏的态度有差别。到德黑兰会议苏联的意见要把德国国防军搞垮，邱吉尔却只想把德国纳粹搞垮而放过国防军。因为英国本土只有四千万人，他怕搞垮国防军会过分的损失自己的力量，同时看将来苏联国力增长，也希望保持国防军成为将来欧洲抵抗苏联的堡垒。罗斯福同意把国防军搞垮，因为美国反法西斯比较彻底些。由于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同意，邱吉尔也就不得不同意，但内心是不舒服的。所以德黑兰会议以后，邱吉尔在回国途中患病，没有宣布他病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是与德国秘密议和。这个消

息在安哥拉和开罗的报纸上都登过，但因报纸小，未引起注意。以后“真理报”就揭露这件事，当作谣言登出的，说安哥拉谣传英国在大西洋海岸与德国秘密谈判。人们都知道“真理报”是不登谣言的，所以看了之后，就知道里面有故事。这件事，直到去年五月间艾登才在下院正式承认英国曾有一度与德国议和，但时间、地点却都没有说明。这件事，蒋介石当然知道。德黑兰会议以后英美两国内都有反苏的现象发生。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高放反苏的言论。后来英政府看波兰流亡政府闹得太不象样，曾把波兰报纸的机器收回。美国内反苏，表现在参议院有一个孤立派的议员质问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出卖了多少灵魂。直到去年一月中旬，英美反苏的空气才慢慢低落下去，德黑兰会议是英美苏三国进一步合作的会议，国际局势应当更好，但在会议以后的一个短期间内，确实很混沌的。蒋介石乘此机会配合着国际间反苏，他就更激烈的反对我们共产党。前年七月反共军事行动，被我们从政治上把它击退。蒋虽表明采取政治解决的态度却暗地里在西北增加军火和粮食的准备，原来增加包围边区的队伍也未撤退。去年一月间又想试一下军事冒险。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朱绍良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十四日下令同时取消我们西安重庆电台。但反共没成功。原因是苏联把英德秘密议和的阴谋揭破了；同时，孙夫人写信给美国“新群众报”说国民党军队封锁游击区，使作战很英勇的游击队得不到医药及任何接济等情形，英国“雷诺德周报”将这封信刊载出来，“纽约泰晤士报”和“先驱论坛报”次日用大字标题转载此信。国际方面知道国民政府仍在反共，国内我们呼吁团结。蒋介石知道他所计划的秘密军事反共反不成了，于是才提议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林主席三人赴重庆谈判政治解决，暂时军事进攻边区的阴谋掩盖下去。“中国之命运”的增订版于去年元旦发行，便没有什么奇怪了。那时蒋正在对边区搞军事，“中国之命运”的再版发行，便是配合着他的军事行动的。

国民党内部问题：

蒋介石的统治完全是为着一群封建法西斯的私人利益。但国民党内部不满蒋独裁的情绪逐渐增长起来了。去年，国民党内有地位而无实权的人倾向民主渐露头角，公开的演讲，秘密的出书，蒋也控制不住了。现在重庆一地，国民党内部要求民主的座谈会有七十多个。

蒋对下级的赏罚很不公平，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功罪。真正打败仗的汤恩伯，他很相信他，因为汤积极反共。去年，参政会上，国民党河南参政员徐炳昶痛哭流涕的说：“政府若是枪毙汤恩伯我宁愿去陪斩！”后来，在国民党的党团会议上，他要把党证交出来，说：“我这党员不当了，这还象个什么党！”去年军事上严重失败，以及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刻化，“大公报”也提出了“借头”的要求，蒋把守长沙的四军军长张德能枪毙了。蒋命令张守长沙若干日，在这期间，蒋把他的部队抽去了两个团，城里只留一团人，守不住，后张撤退了，也还是奉到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蒋把他杀掉，借以伸张军纪。实则张被杀是很冤枉的。张是广东人，行伍出身，战功素著，这次由长沙撤退，又非他一人之罪，结果，激起广东人的不满，粤籍军人尤为愤懑，形成湘桂线作战时广东人的半独立的状态，薛岳、余汉谋对蒋命令不反抗也不执行。而另一方面，方先觉守衡阳，后来投降了敌人，有广播，有演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最近从昆明飞回来，很明显是日本送回来的，蒋不但不处罚，相反的，却大大的嘉奖，且让全国慰劳总会慰劳他们一千万元。还有，新疆的盛世才，作恶多端，殃民祸国，死有余辜，他把国民党派去做省党部书记长兼教育厅长的CC黄如金，建设厅长的林继庸等人抓起，用电刑拷打。蒋为了敷衍盛世才，竟把自己派去做工作的心腹人物也牺牲不管了。从这里可以看到蒋介石的赏罚是怎样的颠倒啊！我国历史上有“郭公好善而

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传说。蒋介石正是郭公一类的人。他装出礼贤下士的样子，实际只是纵容下面作坏事。我国古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把这两句话来描写蒋介石也很恰当。他组织的政府没有做出一件好事情，他却把一切坏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他在今年元旦演说把战争动员不起来的责任推给“社会”，说：“社会也有责任”。他前几年就号召复员，政府不动员，反把责任推到社会上去，这是何等的胡说八道！国民党人在南京时曾有人拟了一副对联挖苦蒋介石，上联是“下诏罪人，破格用己”，下联是“励精图乱，发奋为雌”。可见“下诏罪人”是他的惯技了。

总起来说，蒋介石的统治是半封建法西斯的统治，它的政策是一党专政反苏反共反民主。机构是叠床架屋，互相牵扯，互相推诿，蒋不相信一个人，如他把粮食工作分到好几个部去管。征粮归财政部，保管归粮食部，运输一部分归军政部，有什么好处，大家都抢，有什么坏处，大家都推，毛病发现了，也找不出谁应该负责。又如指挥军队，蒋自己可以直接指挥到团上；管理生产的机关有二十七个。所以照蒋的现行办法，没有一个人能痛痛快快的做事。甚至陈立夫，谈起教育，也痛哭流涕的说钱少了，教育办不好。说到人事，粮食部长徐堪在参政会上说过：“大家都责备粮食部发生贪污案很多，这是对的，但我想找些好人来办事，好人都不愿进来，我有什么办法呢？”好人不愿去作官，这种统治的恶劣可以想见！

国民党统治了十几年，个别好的政策总不能说没有，但由于坏的机构，坏的人事，都把它做坏了；个别好的机构也是有的，如过去第一届参政会，武汉时代的政治部，一九三九年的党政委员会（周副主席提议组织的，李济深为副主任委员，比较还没有做坏事，后来改派程潜负责，成为专门反共造谣的工具，成绩不佳就取消了），但经蒋介石一盘就都盘死了；国民政府不能说没一个有用的人，但在蒋钳制下，有用的人也变成无用了。我国夸奖某人有本事就说：“化腐朽为神奇”，而蒋介石的本事却是：“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在蒋介石统治下，好的政策变坏，好的机构盘死，好的人也变成无用的人。

现在要讲一讲大后方军事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

关于军事方面，这几年来，特别去年以来，蒋的力量大大削弱。据我得到的材料估计，河南、湖南以至桂黔之战，损失不下六十万人，最近日本同盟社广播说蒋损失了七十万，这个数字大概是差不多的。蒋在这几个战役中，依然采取加强嫡系，削弱杂牌军队的政策，如在河南战役后取消了刘茂恩、马法五（前庞炳勋部）、李家钰（川军）三个集团军。这个办法，使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的不满，汤恩伯丧师失地，一个多月丢了四十余县。他指挥的正规军三十余万，加上游击队，垮的不能收拾。但汤的集团军名义未取消，汤本人还在负责。刘茂恩部守洛阳，照蒋的命令还多守了几日，李家钰战死，马法五部抗击敌军也出了力，可是这些集团军的名义都被取消了。国民党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比起抗战开始，简直不能想象。士兵体力，两年前，过去三个人对付一个日兵，几年来，体力的削弱，六个人对一日兵都对付不了。就事实来看，为着打通滇缅路，战略上系采取东西夹击的办法，西边我驻印远征军由美军官指挥，装备给养都很好，姑且不去论它，东面的滇西军由卫立煌、宋希濂指挥，虽已收复龙陵、松山、八莫，据一个西班牙医生告诉我，松山之役，中日两军的损伤简直不能比，松山是个小地方，但是一军事重地，地形好。守军与攻军固然不能平衡看，但日军守松山的只一百人，打了四十八天，日守军损失了百分之七十，跑了百分之三十，中国的一万二千人，剩下二千人，跑的不少，死了的也不少。龙陵日守军三百人，这地方较大，日军可以飞机增援，但经常保持三百人样子。中国用的是两个军，打下来后损失依然很大。

为什么军队如此不经打？体力如此之坏？首先可以从兵的来源来看。国民政府虽公布了兵役法，中国没有户籍法，人口无确实登记，其数目大概由年销多少盐等推算出来的。这样征兵制度是如何行得通？国民党依靠保甲来征兵。保甲是封建制度用来控制人民的，利用它来征兵是行不通的。但国民党为表示是一个现代国家，硬要实行征兵制度。我们曾建议把征兵制和志愿兵役制并行，未被采纳。结果它的征兵变成掠伕和绑索，表面上虽做些抽签的样式，实际上有钱有势的人家子弟，就是中了签也还是不去的。保甲长就把最穷苦的人或行路的人捆去塞责。在拉去的时候，没有衣服没有被单，曾有从云南到湖南前线去的新兵，一路上一丝不挂，只弄些草遮一遮羞，见到老百姓的东西，就拿到嘴里吃。捆来的兵在送补训处之前都是关在小屋子里，既无草，又无铺，热天闷得要死，冬天冻得要死，吃喝大小便都在那里，生病的很多，新兵能到达前线的，达到百分之五十就算是最好的，经常只能保持百分之三十。这个问题能否解决？据说成立了兵役部是要改善的，依我们看，如政策不变，部分的也许能改好一点，想整个改善是办不到的。甚至在下面有这样的情形：有的县为应付兵役，由老百姓凑些钱，经常养些人在那里。新兵一到，将一千元，五百元，存在连长那里，连长认为很好，新兵既存有钱是不会跑的，就是逃了，连长将存款吞掉也不报上，缺了额，还可以吃空饷，跑掉的兵又回到原地去应差事，这就是所谓兵役贩子。大家知道的过去有位联络参谋郭仲容，是黄埔学生，觉得这样不是办法，自己下去做保长，结果还是说一点办法没有，他说保长是本地人，抽签当兵，你把那家的人送去当兵，家属找保长闹，弄得没法，只能绑些过路人去，即使有较好的人当兵，在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下，也无法搞好。在我们重庆住的地方附近，也有驻军，吃饭时，连长拿一个小瓢，走一个舀一瓢，每人只有二瓢。有许多后备兵入营后去做苦工，兵因为总能吃饱饭，官也愿意，因为可以省下一笔伙食，更赚到兵的工钱。重庆红岩嘴一带房子就是新兵造的，这事国民参政会曾提出抗议，国民党说已经改了，实际上还不是那样做！自抗战开始，兵饷一直是每月四元，到四二年改成二十元，现又说改善士兵生活，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听起来加得不少，实数只是五十元，增加了后，买双草鞋也多不了多少，上等兵每月才一百元。士兵给养，规定每人一天二十五两米。向老百姓征来的粮食本是好的，但经过保管要搀假，再经过运送又要搀，本管军需一克扣，米就少了，也吃不得了，军队领到吃不得的米，在有老百姓的地方，他们就给老百姓换米吃。副食费每人每月一百八十元，规定每人一个月吃三升豆，一斤油，十四两盐，三十斤菜，烧三十斤柴，真正照这样办也还不坏。可是大后方柴、菜每斤都需六元，光柴或菜就要一百八十元，副食费总共才一百八十元，士兵生活是极端恶化的。国民参政会有一个提案，是一个国民党参政员提的，说士兵生活不如重庆大户人家的狗，第五军从陕西到贵州经过四川□江县，重庆有人去慰劳；他们说，你们到重庆去找，那一家人家的狗食不拌些油盐？我们就没有油吃，只把一点盐搀在水里。蒋的要办青年知识分子志愿从军，兵源枯竭，亦是原因之一。新兵在路上死的很多，也有病尚未死难得招伕就被活埋了的，埋得不深的病人在土里叫唤，老百姓把他们挖起来的也有。这样就使人民从军情绪大大减低。云南参政员在参政会上提议说，他亲眼看见有十几个兵士，病死在路旁，没有人埋，穿的破衣被剥了。这些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改善士兵生活，要六百万万元，这笔款子来源是富户献金献粮，富户是否愿意拿出来呢？如果特种富户不把参政会议决要动用的外国存款强制挪用，那末，国内一般富户就存观望态度，献金献粮都会成为问题。把改善士兵生活放在这种未知数的来源上，怎能彻底解决问题呢？

军队训练问题。日本侵略以来，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很强。蒋未加以启发。军队训练内容是反共，有时不敢公开讲，有时不敢普遍讲，有时也公开普遍讲，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反共宣传很多，他们总说共产党向他们挑衅要打他们，他们不能不防备，但他们的部队没有受到共产党军队的进攻，碰到的却是日本人。因此，兵无战意，见敌即逃。至于训练重形式而轻精神，多打骂而少说服，更是国民党练兵的特色。

军队指挥不统一。衡阳之战，日本以五千人围住了方先觉军，国民党调四个军去打。如果协同动作，加上美空军的援助，是可能解衡阳之围的。但负责指挥的，有九战区长官薛岳，四战区长官张发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还有老蒋自己；一个军一个军开上去打，结果都垮下来了。这是一个美国空军军官向林老说的。他说，中国军队指挥不统一，以致丧失许多可以作战的军队。能不能统一呢？照蒋的老办法，是不可能的。

以上兵役、给养、训练、指挥四个问题，如不解决，军队就不能打仗。军队打仗，还要与老百姓关系搞好，才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蒋的军队是防制老百姓，损害老百姓，压迫老百姓的。汤恩伯部驻扎河南六年，河南人民受汤部的扰害，恨的不得了，把汤部比水灾旱灾和蝗虫灾，因为这几年河南老百姓受河泛、天旱、蝗虫的灾害很大，加上汤部的扰害，所以河南老百姓说河南的灾荒有四种，水、旱、蝗、汤。第九军从陕到黔几千里行军，所到之处老百姓皆关门闭户，还有逃跑的，要找一个宿营地方也找不着。那时是九、十月，天已很冷，到璧山才发一件棉上衣，每人只一条薄布毯子，裹在身上，赤着脚，下雨也是如此。宿营时就大家坐在街上，背靠背或抱着取暖。国民党曾搞“军民合作站”，实际只有块牌子没有人办事。军队到四川綦江县时曾问县长，县长也不知道“军民合作站”究竟是干什么的。九军军长说：这次行军中他深深体验到军政不和，军民不和，官兵不和。陈诚在观察河南战役以后也说河南战役失败原因有五不和，现在说有六不和了。除以上九军军长所说的三不和外，还有军党不和，将帅不和，与友军不和。如果政治基本问题不能解决，这六不和就只能不和下去，那就军心不固，士气不振，要想打胜仗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大后方的财政经济状况，先从财政方面说。去年财政预算，据财政当局自己讲，收入只占支出百分之五十，支出的数字说是八百万万，支用结果，据国民党内部人说，大概要一千二百万万，据我们想，支出应不止这些。而实际收入，也不到四百万万。今年预算各部分，支出总数有四千三百万万，蒋为了好看，减到二千六百万万。如以折半收入，应为一千三百万万。但去年收入四百万万，今年要收到一千三百万万，是很少可能的。他的收入大宗是田赋，以前是征实和征购，现在把征购改成征借，这样政府不出一文钱，总共要农民缴八千四百万市担粮食。今年粮食征收也不能和往年一律看待，河南原征四百万市担，湖南六百万市担，广西大约是三百万市担，共一千三百万市担。自豫湘桂被敌侵占以后，这些地方都失掉了，纵使不是全部收不到，也大部分收不到。豫湘以东的邻省和安徽江西闽广及浙江，也要受影响。粮食征收不易足额，国民党自己也知道，所以表面虽则八千四百万市担，而实际则作六千四百万市担打算。盐税增加已到极限，在重庆，去年一月初，盐每斤十元余，后增至三十几元，加的三十元说是副食费，再加的可能是很少的，河南湖南广西失掉了，销盐地区缩小了，这也不能不影响到盐税额。直接税本来征得很重，很苛细，因人民反对，弄简单了些。现在地区缩小了，征税面积缩小了。由湘桂、黔桂撤退的机器有六万多吨，占大后方工厂机器的三分之一现在都损失了；加上许多工厂的停工减产，税源也减少了。如果说去年预算收入相当于支出的一半的话，今年无论如何是完成不了一千三百万万的。

国民政府到底靠什么维持它的财政呢？第一，是美国的借款，美国借给我国的黄金，政府拿来出卖，收回一部分纸币是可能的，至其利害所在，那就当别论。第二是印发钞票，现除了在美国印之外，大后方又建设了一个纸厂，三个印刷厂，还赶不及印。以前印一百元的，现在则印五百元。听说又在印一千元的钞票。通货膨胀，就是它的财政政策。

大后方的经济更不景气。国民政府的财政与经济不相协调，自己不能不承认。财政部为了增税，搞专卖，行统制，每一种商品被专卖了，价格就随之增高，市场上公开买不到，黑市到处流行。结果只便利了一群贪官污吏与贪污勾结囤积居奇的奸商，而国家和人民两方都困惫的不得了。政府没有力量掌握物资，妄图统制，它统制原料，统制运输，统制制成品。一切都讲统制。而经济界呈现了极端的不景气。如以统制棉花纱布为例，政府统制棉花，把花价定得很低，农民不够成本，卖了花亏了本之后即不再生产。陕西战前年产花一百四十万担，统制以后，减至二十万担。政府只知限价收棉，棉价不让涨，别的物价三个月就要涨一倍。老百姓就不再生产棉花了。棉花原料减少了，其他如桐油、茶叶、丝以及其他农村副产品，因政府统制，无一不减产。官僚资本家们统制收构机关以外，又暗地收买，较公开收购价高一点，他们买去做黑市。至于公家收购能否足额，老百姓能不能再生产，他们是不管的了。

政府统制运输，把一切运输工具都控制着。商人要自运，说是破坏了统制。政府管理运输工具的机关很多，商人请运，手续顶麻烦，结果原料运不到工厂里去，工厂只好停工减产。官僚资本家却把政府统制的运输工具，运他们自己囤积着的私货。现在大后方轻重工业都陷于危机中，大后方钢产，每月约二万吨，这数量比起我们的盟国原是小得可怜的。因为统制，别的工业不能发展，钢铁也没有市场，钢铁工厂停工的很多，由三十几家减至五六家。嘉陵江的煤矿，加入工会的计有一八六家，去年秋季已减至六十七家。战时生产局成立后，连准备复业的一并计算，也不过一一四家，仍停了三分之一。轻工业：纱厂纱绽，中国连英日纱厂在内原有五百万绽，移至后方的为二十五万绽，最好时候开工的是十五万绽。现在不过五万绽在活动而已。手工业：豫西、湘鄂西出产土布，原是很有名的。统制以后，那些地区的土布减产了。农产品的粮食也减少了。这因为兵役制的办理不善，采取拉伕绑票的办法，拉一个绑一个就要跑好几个。每年为公家服务的人数和时间都占很大的数目字，农村劳动力大大减少。“新华日报”曾派人到重庆三百里以外的涪陵乡村去看过，一向从不下田的女人，少奶奶和大小姐都下田了，但不是为了扩大农村生产，只是搞一些自己吃的。市场情形亦大不如前，商品流通大大减少。这因物价太高，一般人民的购买力减低之故。我初到重庆时，夜市很热闹，百货商店里推出涌进的人，川流不息。现在无论哪行哪业，打锣打鼓都无人过问。重庆市面商店关门停业的很多。市场不景气可见一般了。

战时生产局成立，因美国帮助，经济状况可能好些。美国希望把中国军需生产的能力，尽量发挥。大后方在经济不景气状况下，曾有这样事情，一个一万六千人的兵工厂，为了要减产减至一万四千人。战时兵工减产，除了受轰炸不能继续以外，象中国这样是没有的。因蒋怕预算过大，不论什么，不按需要，一律缩减，所以兵工也只好减产。抗战八年，兵工仅只为了财政的原因，实行减产，这是中国的特殊现象。我们的敌人已经搜集破铜烂铁，扩充兵工生产还怕来不及。我们一点点钢铁还闹生产过剩，很少的兵工生产还要减低。这也证明蒋的等待政策了。生产局成立后，经美国整理军需有关的生产部门可能活跃些，但基本上国民经济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购买力的提高，要从农村与各种工业生产的发展着手。国民党没

有这力量，也没有这计划；也许个别比较聪明的人有这想头，但亦无法实行。

国民党只希望美国帮助，不自己动手。去年孔祥熙到美国要求物资援助，要的是美国出产的棉布。美国人对我们讲，中国要美国帮助飞机、大炮、坦克用来打日寇，是天公地道的。现在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穿衣，也在一分一寸的节省，中国人穿衣的材料不是没有办法想得，这也要美国帮助，是没有道理的。但美国政府还是答应了帮助国民政府二千万匹布。国民党向大后方大吹了一顿，说美国棉布要来，但至今未来，大概是要来些的。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参考消息"载美国麦克鲁少将说，美国不仅将以军火供给中国，必要时将以适当之食物分配中国作战士兵，这就是说，不仅穿衣，甚至嘴里吃的，也要盟国供给一部分。

说到大后方的人民生活，一般的讲是极端困苦的。试看工人生活吧！产业工人为着战时生产，很卖气力。但工资较固定，赶不上物价的飞涨。一家人都要从事劳动，才能勉强过活，发生疾病就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经济不景气，减产停产的工厂很多，又因战事损失，不能生产，于是有大批的工人失业。失业工人的困苦，是大家可以想见的。有些技术工人在大后方无法谋生，就转到沦陷区去，另一部分改业。但百业萧条，改业也无业可改。总而言之，大后方失业的人，确数没有统计，但很多的事实是存在的。手工业工人因政府统制原料、运输和制成品，而感到无法继续生产。苦力工人则因物价昂腾，也常常不能维持其生活。

农民因负担太重，生活困苦亦不待言。国民政府每年庞大的预算收入，大部分落在勤苦的农民身上。地主所出的粮，直接间接的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去了。苛捐杂税名目也说不清楚，农民只有照付，除出钱外，还要服劳役，服役中的伙食自备。如就四川一省为例，全川人口五千万，今年政府征实，征借粮食二千二百万市担，大户献粮三百五十万市担，总共二千五百万市担，这都是四川农民生产出来的。此外每人储蓄捐，去年定额四十万万元，今年一定还要增加。役税又是几十万万元。这些大部分的税款，都要向农民身上榨取，农民还负担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租，他们的生活如何好过呢？保甲要钱，民兵训练要钱，慰劳要钱，过路军队要柴、要草、要菜，这些负担无一不出在农民身上。农民负担不了，甚至发生暴动，暴动的结果，或者被骗或者被压了事。一九三九年以来，四川一省就有十余县发生过民变，其中不少是因反抗拉伕绑票式的兵役而起，但也有反抗苛捐杂税的，泸县自流井等处的罢市和打税卡，便是明显的例子。

又其次，大后方俸给生活者的生活也是困苦的，这个范畴包括有官厅公务员，银行、公司商店的职员、学徒，大中小学的教职员等等，连其家庭人口在内也以千万计。他们依靠俸给为生。但俸给有定额，增加有定时，而物价的高涨，是随时在扶摇直上。国民政府一位次长对人诉苦说，他每月薪俸和公费补助费总共一万余元，连请一席客也不够，除自缢寻死外便不能不贪污。大学教授有卖参考书为活的，就是说连吃饭的本钱也卖掉了。

学生自沦陷区去的有补助费可领，这首先要受思想检查后，学校当局认为没有问题的才领得到，领到的数目也有限，学生精神上痛感学术思想的不自由，物质生活则营养不足，患肺病、砂眼的很多。教育部报告，亦认学生的健康，是颇严重的问题。

至于受战争影响而向大后方逃难的难民，其困苦是难以言语形容的。试举敌攻湖南后难民情形为例：湘桂、黔桂两路有铁路交通，麇集向这两路逃亡的四五十万人，政府对难民完全不管，不接待，不疏散，不安插，听难民纷纷扰扰的乱窜。抢到铁路车厢上去的，原只一

层坐人的，变成五层人，车厢顶蓬上一层，车厢内上层放东西的一层，坐人的一层，坐位下至车厢底间一层，车厢底至铁轨间也夹一层。上下两层出事情很多，死人不少。在车厢内的人不敢离开占有的地点，大小便就在车内方便，甚至闷死了的人，一时拖不出，车行平常两三日可到达的地点，经月不能到，还有抢不到车上去的，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白天买不到饮食，夜晚找不到住宿，疾病更无医药，听说有一位在桂林是千万富翁，逃到贵阳便一无所有。更有传说，一家两夫妇带着两个小孩逃难，丈夫逃不见了不知是死是活，两个小孩都病了，女的急得没法，拿出一千元摆在路上，要求过路的人把她的两个小孩抛到河内淹死，就把那一千元取出作酬，她自己好寻死。这类惨事是很多的。听说逃到重庆的难民有上十万人，每日在街头流浪找吃的住的，政府还没有想出办法，难民叫骂百端，政府也只好听之。

大后方的民族资本家也不是好过的，因政府统制过严苛捐杂税太重，又不给他们融通资金，且和他们争利。真正有企业心的资本家也弄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受战争影响的，因得不到政府的帮助全部财产都损失完了，如零陵设厂新中公司的支秉渊氏便是极好的例证。

从大后方军事、财政经济、人民生活等方面看来，国民党目前政策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照这样蒋介石的政权老早应该垮台了，为什么还能存在呢？我想决定蒋政权前途的有三个基本因素：其一是中国的人民，包括政治觉悟较高的一部分人即政党在内。我们必须了解，大部国土被日寇蹂躏了，虽然八路军新四军收复了广大的地区，但城市和水陆交通线是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广大人民仇恨日寇的心理和情绪是空前未有的。要赶走日寇出中国，要收回失地，是国人普遍的要求。中国是抗战的环境，谁掌握抗战的旗帜，即使做了些坏事，人民还是支持他。蒋打着抗日的旗帜已经八年，他所领导的政府是被国际承认的政府，全国人民还在他的这种影响之下生活。他的政策是抗而不战。如果真抗，他怕日本就要打垮他。如果不抗，中国人民就要唾弃他。他的这种两面政策是很巧妙的。他实际不抗，表面总不说不抗。蒋曾对青年党负责人说，共产党想逼我投降，我决不上这种当。他又暗地与日本勾结。吴开先、方先觉先后回来了，此外还有千头万绪的联系。但公开的却又没有投降。他的这种两面政策只有我们共产党懂得，也不一定每个共产党员都懂得。他抗战是公开的，和日寇勾结是暗中进行的。人民只知道他抗战，还不了解他和日寇暗中勾结。这说明了为什么他还能存在的理由。人民支持他抗战，也包括政党政派的，即如我们党，也没有采取推翻他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政策。我们虽知道他暗中勾结日寇，但说给人家，人家不相信。王若飞同志曾对傅斯年讲，蒋和日寇勾结，傅说如说何应钦和日寇勾结还可信，说蒋就不可信。小党派如青年党，在二十二周年宣言上也还拥护蒋抗战。抗战的旗帜是很重要的东西，要揭穿蒋的抗而不战这个把戏，我们共产党人有很大的责任。政党不满意他，人民不满意他，但都还没有要推翻他。抗战以来，大后方民变有几十起，这些民变的口号，大都是反对贪污，反对他的粮政与役政等办理不善，没有提出要打倒蒋的口号。这些民变，有政治觉悟的人没有参加进去，后来有些人参加进去，也是使老百姓少吃些亏，保有一些元气，不是去为推翻蒋而扩大民变。因为人民最爱护抗战的旗帜，有政治觉悟的人更不能不顾及这一点。我常把抗战中一些人民的暴动，比作一个人被勒得很紧，手脚乱动起来一样。蒋的反动政策逼勒得人民手足无所措，人民就发生变故，全是自保的性质。人如被勒而手足弹动起来，若将勒索松一下，手足便瘫软了。蒋介石懂得这个道理，有很多地方的民变，他就用松一口气的办法来缓和它。如四川广汉地方，人民为反对兵役暴动起来，蒋即宣布那个地方缓役，那地方就平息下来了。成都万余学生示威游行，反对警察打人，要求撤换成都警察厅长；也有提得与我们

一样的口号，如要求实现联合政府，蒋就把警察局长换了，也平息下去了。这如人被勒乱动的时候，把勒索一放松，再动就鼓不起劲来了。

抗战的旗帜，不仅得到人民的支持，还得到国际的支持。英美苏三国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盟邦。我国抗战初期，苏联是积极支持的，大批军火供给，什么都给了国民党，大家知道，我们从苏联援华军火中分得了一百挺轻机枪，也还是经过了蒋介石的。以后国民党自己反苏，苏才不积极援助国民党。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要集中力量打垮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远东问题不能象从前一样关心，但苏联也无不理蒋的表示。如莫斯科四强会议宣言，中国大使还被邀签字。英美政府虽然态度有些不同，在太平洋战争前，一般是不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太平洋战争后，美国用很大的力量支持着中国。军火援助，虽只占租借法案的百分之一强，但价值一万万多美金，拿到中国来还是一个大数目，这是帮助了蒋的。美国在华有两个空军部队，十四航空队与二十轰炸机队，是在蒋所属的地方。这两个空军部队虽由美直接指挥，蒋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形式上或实质上都于他有利。此外还有中美混合机队，还有在大后方许多军事人员，这都说明美国在军事上是支持蒋的。财政上，美国第一次借了一万万美金，后来又一次借了五万万美金，按现在美钞黑市，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的法币。英国借了五千万镑，合二万万美元，借约去年春已签字。两者合计八万万美金。蒋财政上如要崩溃，向美求援，美虽不高兴，还得帮助他。甚至经济上帮助他以物资，士兵的粮食也还得帮助。英美不得不扶蒋，因蒋打了抗战的旗帜，也还有力量。他领导的政府是久经他们承认过了的。我们也有力量，但我们是在国民政府之下的。英美政府直到现在没有帮助我们任何东西。英美社会上对我们的援助不少，钱药都有，如国民党不控制着还可能多些。钱和药，还是小事，最可感的是在舆论上有很大的同情。假令只有中国人民支持他，没有英美的帮助，没有空军帮他轰炸，没有军火和借款，蒋在精神上老早也就垮了，他的力量的削弱，也将更不得了，所以英美支持他的作用是很大的。但英美也不是完全赞成蒋，可以从舆论、特别美国的舆论看到。太平洋战争后的初期，美国认为蒋了不起，后来人来得多了，到处看，也看出来了。从四三年五月赛珍珠发表了文章以后，现在左的中间的都不赞成蒋了。两个中国的说法，不是我们讲的，是人民看出来的，是美国人看出来的。美国人很多是同情我们这个中国的。我们毫无外援，解决了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问题，美国人认为是奇迹，但这是舆论。英美政府方面，在去年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以前，从来未表示对蒋政权的不满，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以后罗斯福才说中国军事未可乐观，跟着又说只限于军事范围。这是对蒋的轻微的批评。邱吉尔说得露骨一些，也只说美国对中国有过分的援助，而中国战场仗打得不好。英美政府至今还是支持蒋的。这是蒋政权所以不垮的第二个基本因素。

蒋擎着抗战的旗帜，使全国人民无法不支持他，盟邦不得不支持他。英美的支持他，也还为了怕他投降，但这也说明了蒋一天不公开投降，他们就要支持他一天。蒋政权存在的另一因素是日本军阀也不要它垮。日本军阀知道靠自己赤裸裸的统治中国成为不可能，日军侵占到的地区，一定要扶植一些傀儡政府。这些傀儡政府，北平，太原，南京，广州，武汉都有。这些傀儡政府可能代日本搜括一些东西，也首先要日本用武装与垫款去支持他们。另外日寇有这么一个经验，他们一到那里，民众就起来了，共产党和民众搞到一起建立起强固的抗日根据地。日寇对这点最感到头痛，毫无办法。日寇若是搞垮了蒋政权，那末，民众起来了，进步力量团结了，民主分子抬头了，共产党员活跃了，真正抗日政权一定会出现，日寇就麻烦得多。它不搞垮蒋，让蒋的力量压迫着民众，在蒋统治的区域内进步和民主分子不能

活动，共产党员也不能积极作抗日工作，让蒋介石统治着大后方，实际比日寇自己直接来统治还要省事些。而且敲一下蒋，还可以从蒋那里得到一些英美援助的东西，如在进攻长沙、衡阳时所缴获的大炮就是一个例子。蒋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正好成为日寇控制中国的一个工具。日寇为什么也要打他呢？其目的是在逼蒋公开投降，且亦怕蒋的力量长大。敌不利于蒋之垮，而利于其削弱。假若不然，敌人增加十个或二十个师团，进攻重庆，蒋是无法抵抗的。敌人为什么不这样干呢？有人说敌人要维持其兵力打英美，所以没有进行这一着。但敌人对英美的决战主要靠海空军，消耗十几师的陆军并不发生影响。有人说敌人要准备对苏联决战，所以蓄积力量。这理由也不充分。首先最近将来日苏是否打仗还是问题，而且消耗十几个师说敌人就不能与苏联打也不对。日本陆军仅次于德国，德在对苏作战上消耗了一百多个师团，决战还有力量。日本即损失其在华的二十余师团，决战力依然存在。况且，打到重庆，十几二十个师也不会完全损失。在日寇看起来，问题是如果打垮了蒋，要另外扶植傀儡，要多占据点，多牵制自己的兵力，而且共产党与人民起来，搞民主，搞进步，搞团结，搞真正的抗日，这不是日寇自找苦吃吗？所以截至现在止，日寇还没有搞垮蒋介石的决心。

有人问蒋现在是否会垮？上面的分析如果觉得有理由，那他一时是不会垮的。我们所布置的工作是在沦陷区，在国民党区域还是统一战线。蒋虽被国际人士骂，被各政党骂，被人民骂，四川人甚至叫他“蒋该死”。但英美政府支持他，中国人民还没有提出不要他，日本还没有要打垮他，有这三个因素，他不会立即垮台的。但以上三个基本因素，不是不变的，这三个因素本身在变化着而且互相影响着，这是我们看这个问题时所当注意的。

如果蒋的政策不变，老百姓受不住他的欺骗和压迫剥削，民变就会更多，有些可能被欺骗或被压迫而平息下去，有些就消灭不了。湘西有一个彭春荣，现在有一二万人，也没有说不要蒋，蒋也消灭不了他。这些民变的力量从零星的到扩大的，从散在的到联合的，都有可能。在野各政党对民变也不会长久不参与。其次，英美政府对蒋的帮助也会变化。蒋吹牛说，不管共产党如何，我退到加尔各答，还是一个中国政府。（笑声）大家不要笑，蒋如退到加尔各答，英美政府还是会承认他的。英美政府对合法这一点是看得很重要的。比如波兰流亡政府，英美现在还是承认的。但到那样情况，英美政府就不会只帮助他，或象现在一样看重他了。英美并不是一定非长期支持蒋不可，英美在中国是要找一个同盟，或率直些说是要找一个工具，要工具也何至于一定非蒋不可呢？英美帮助了蒋，日本打来，蒋抵不住，敌后又有许多抗日力量在生长，愿意与英美合作，那时英美为什么一定只有蒋可以支持呢？日本是不是一定不搞垮蒋？这也不一定。武汉退出以后，四五年间，日寇未真正打蒋。去年才打得不同一点，那是因为蒋得到美国很多的帮助。在英美对蒋帮助多的时候，或者蒋被迫对人民放松一些。人民起来了的时候，日本也可能下决心要打垮他。人民受束缚的厉害，不能动员起来，抗日就没有真实的力量，英美要行动时就不会赞成这样的办法。对这种反动政策就会有所批评。英美帮助越多，他们对中国越有发言权。日寇的进攻将越厉害。对日战争愈失败，英美不满和国内人民不满一定增加。这些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蒋为人很机警，总不下死棋。他个人还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他虽号称以不变应万变，实则他也有变的可能。我们要观察蒋的前途，应该看蒋现在依存的三个基本因素和他本身的变化如何而定。

我们党已把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要求提在蒋的面前，这是与他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策针锋相对的。我党这个要求在国际国内方面都博得广大人民的赞成，甚至在国

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明达之士认为极合理。但蒋拒绝了，他必然要想些新的骗人的办法。我们要尽量揭穿他的阴谋和假面具，同时，毛主席提出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把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我们更要想出许多办法来和全国人民一道去完成这一总的任务。

关于大后方各党派问题

今天讲的是关于大后方各党派问题：即国民党、国社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以及最近成立的民主同盟的问题。要对这些党派作一个历史的研究，今天是谈不了，时间要很长，现在只从下面几点来谈，即：（一）各党派组织形态；（二）党员及其成分；（三）政纲；（四）领袖和干部；（五）宣传机关。

一、国　民　党

国民党是中国最大的政党，是当权的党。它的历史有五十年，去年举行了该党成立的五十周年纪念。

（一）组织形态

它的组织形态，是大后方各党中组织最完备的，最高党部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下有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等于我们的支部）、小组。

（二）党员数量及其成分

党员数量据他们自己说有二百万，还不包括军队党员在内。他们的军队是强制全部入党的，军队有五百万，这样算来，军队党员就有五百万了。但国民党经常把这部分党员和普通党员分开来算，国民党党员的极大多数是公务员、保甲长、大学教授、中学生、小学教员；公务员包括高级官吏在内。民国二十九年强迫入党，最多的是初中学生和小学教员。党员成分包括买办、地主、资本家、中小资产阶级以及少数工人——是一部分出卖阶级利益的工人。除军队中的党包含有农民成分外，没有农民党员。去年春国民党曾经开会，决定要发展乡村中的党员。结果如何，不清楚。但在农民中影响不会大的，因它的现行政策，不能为农民所拥护。

（三）政　　纲

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最高政纲。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孙中山先生自己有讲演，胡汉民有解释，汉奸汪精卫周佛海等各有解释，蒋介石也有解释。那些解释是分歧的。正确的解释应当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根据。因为（一）那是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的大会通过的；（二）那是代表大会上的决定，不同于私人意见的；（三）那时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共产党也赞成那种解释的。

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解释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但现在国民党当局的解释是对外则要求民族独立，对内则以大汉族为中心。这自然是与该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解释相抵触的。至于说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的解释应包含有国内各少数民族有分离独立的自由权，那就是现在国民党内最开明的各派都难承认的。

民权主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权是“一般平民所共有，

非少数者所得而私”的民权，是革命的民权，而不是“天赋人权”。是“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而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

民生主义——主要的原则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孙中山先生在时关于节制资本讲的不多，关于平均地权讲了几次。“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解释亦很简略，只说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使土地权不为少数人所操纵，为平均地权之要旨。只说，凡企业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为节制资本要旨。但国民党在南京执政之后，把民生主义完全摔到脑后去了。中山先生的基本观点还没有要消灭私有财产，平均地权是允许土地私有权的存在；节制资本也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这是很明显的。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所了解的社会主义是很抽象的。不消灭私有财产制就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另外的问题。“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解释，也不包含有消灭私有财产的意思，照其所主张的办法做去是比较进步的。我党现行政策还没有超过这个纲领。

其次是“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决定这个纲领为抗战期间施政的准绳，自然还不是三民主义的全部实施。但按照这个纲领切实去做，对抗战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拥护这个纲领。

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公布了他自己的纲领，那就是“中国之命运”，这本书著者自称是依据三民主义写的。他讲民族主义，把中国境内各民族讲成是同一血统的种族。这是伪造历史，是法西斯的讲法。全书的精神，是反共产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关于民权主义说的最少，只说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讲的最多。他说的建国计划是很可笑的。试版中只说五年计划，后来觉得少了，在正式出版时就添五年，改为十年计划，各项经济建设的数字也增加了。在增订版中又补上农林建设的计划，可见那些计划是很随便写的，例如：说十年以后要有十二万个医生，可是现在政府登记的只有几百个医生。而医科学校在国内的不过几百个学生。一个医科学生要经过大学毕业，至少要五年才可成为医生。那末，从他的计划实行之日起，要第六年才有大批新医生出而问世。这应当要设多少医科学校呢？医科学校应有怎样的设备才算数呢？这些都没有谈，只说要在十年内造成十二万个医生，这实在是瞎说，是向壁虚构的。这样的“中国之命运”还要在考试公务人员和学生时，用来考试的哩！

拿上面三个纲领来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解释的三民主义是最进步的，“抗战建国纲领”我们可以支持，“中国之命运”是法西斯的精神，最反动的。

(四) 领袖与干部

甲、国民党的总裁是蒋介石。他是流氓出身，曾作过上海交易所的拍板人。他为人很机警，阴贼险狠，野心很大。住过保定军官学校，也是日本士官学生，入国民党后颇为孙中山先生所信任。但在国民党内直到一九二六年地位尚不高，后来因练兵打胜仗（这方面得我党与苏联的帮助很大），渐被该党尊重。他又拼命扩充他私人权力，逐渐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和中国的大独裁者，他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保守、顽固，复古倾向很重，鞭笞人民，奴役部下，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重私感，好面子，说好听的话，做顶坏的事，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欺善怕恶，欺软怕硬，装模作样，恃势骄人。有时又作出卑躬折节，礼贤下士的姿态，假仁假义，使诈使贪。拉老人捧场，用青年垫脚。他惯用的手段是“哄”、“吓”、“压”，他凭借的资本是“官”、“势”、“钱”。感情极易冲动而学忍耐，自信很坚而顾虑颇多，如下棋不下死着子，这点却值得我们学习。他个人生活有秩序亦

是其优点。

乙、国民党的干部为数很多，不能一一叙述。但就政府和党机关中著名的干部，写一部分。

1、五院院长：

行政院——院长蒋中正，现是宋子文代，副院长孔祥熙。

立法院——院长孙科，副院长叶楚仓。

司法院——院长居正，副院长覃振。

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副院长周钟岳。

监察院——院长于右仁，副院长刘尚清。

2、行政院分十二部，部长如下：

内政部——张厉生。

外交部——宋子文。

军政部——陈诚（原何应钦）。

财政部——俞鸿钧（原孔祥熙）。

经济部——翁文灏。

交通部——曾养甫（现已改任俞飞鹏）。

粮食部——徐堪。

教育部——朱家骅（原陈立夫）。

社会部——谷正纲。

农林部——盛世才。

兵役部——鹿钟麟。

司法行政部——谢冠生。

3、军事委员会分四部，部长如下：

军政部——陈诚（该部在行政上属行政院，在军事上属军委会）。

军令部——徐永昌。

军训部——白崇禧。

政治部——张治中。

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程潜、白崇禧。

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

4、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如下：

组织部——陈立夫。

宣传部——王世杰。

海外部——陈庆云。

5、特务系统：

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现改为叶秀峰（局长为陈立夫不管事，由副局长负责，但现在管事最多的是郭紫峻）。

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局长有时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有时为侍从室主任，实际不管事）。

宪兵司令——张镇。

6、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蒋中正、书记长张治中。康泽是三青团管组织的，他领导着团的工作特务化。

贺衷寒过去主持政治训练处，他也领导了政工系统中的特务。蒋介石侍从室的秘书主任是陈布雷。蒋经常接近的有以下一些人：（美国的一个杂志，曾画过一张漫画——蒋介石坐在中间，周围是一群亲信）戴传贤、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何应钦、孔祥熙、张群、吴铁城（中央党部秘书长）、王世杰、张治中，这就是蒋介石的一圈子。

丙、蒋和他的干部有三种关系：

1、亲戚关系——主要是孔、宋两家。蒋对孔祥熙很相信，因为孔很听话，蒋用钱是没有预算的，宋要预算，孔就不要；并且孔夫人宋霭龄与蒋夫人宋美龄是姐妹，宋美龄从小时候就是宋霭龄照顾长大的。孔是他夫人管钱的，孔夫人和蒋夫人又是姊妹，他们里面的事情就难得搞清楚的。

2、同乡关系——戴传贤是浙江人，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也是浙江人，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都是浙江人，蒋相信黄埔尤其是相信黄埔中的同乡。

3、同学或部属关系——何应钦、张治中，他们代表复兴派；贺衷寒、康泽也是。和蒋经常来往的还有张群、熊式辉等政学系著名人物。

与蒋关系密切的不是五院，而是以上所说的一些人。

（五）国民党中的派系问题

甲、元老：这一批元老，实际上还不成为一个政派，著名的有：孙科、于右仁、冯玉祥、居正、覃振、邹鲁、丁维汾、劭力子，还有戴传贤和张继。这班元老在党国的地位都很高，但没有什么权，绝大多数主张抗战和民主，都赞成联苏和联共。可是在程度和方式上又各有差别：戴传贤是最反动的一个，蒋的保守顽固的政策，戴都给以理论的支持。张继反苏反共最坚决。居正据说对抗战有些动摇，其余的人对上述四个问题的态度都较好。这因为有很长久的革命历史，又他们信仰三民主义，对抗战和民主是愿意的，要抗战获得真正的胜利所以也同意联苏和联共。但是他们每人都拖着一个大尾巴——家庭和亲戚故旧，所以不敢动，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的要算孙科和劭力子。

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柳亚子（柳原是监察委员，因皖南事变同情新四军，被开除了监察委员职务）。他们是国民党元老中左派，更没有权，他们想恢复大革命时国共合作的状态。这一些元老彼此在政治上没有较亲密的关系，见面时大家都是很客气的，很少交换政见。

乙、CC派：头子原是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现在陈布雷因地位关系也变成要脚了。他们下面的大将有：潘公展、洪兰友、张道藩、徐恩曾、张历生、方治、余井唐、曾养甫等。张历生曾一度依附陈诚，颇受CC打击，以后才渐渐好起来。还有一员大将是朱家骅。但朱家骅自己成一个系统，他做过浙江省主席，做过内政部长，做过三青团书记长，做过五年组织部长，所以他自立门户。他由CC出来，逐渐变成CC的反对派。陈立夫与朱家骅对立是很厉害的，蒋也感觉到了，但毫无办法。潘公展管图书审查委员会。张道藩搞戏剧协会。潘就搞一个著作人协会，和张对抗；张潘都是CC中搞文化工作的，两人矛盾很厉害，各想领导文化界。余井唐是组织部副部长。方治是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徐恩曾原是CC的特务主持人。CC的地盘是党部，是政府机关，是学校，抗战后已逐渐伸入财政经济

界。CC是国民党中最反动的一派。它反苏反共反民主，也反对抗战。这因“七七”抗战以后，它挨骂最多，损失地盘和权力最大，所以不愿抗战；CC中有许多汉奸，著名的是周佛海、吴开先、李敬斋等。

丙、复兴派——复兴派大别之有两股：

一股是何应钦、陈诚、张治中、蒋鼎文、刘峙等。这些人都是黄埔的教官；他们都当过大权都有地位，是帮助蒋打天下的功臣，绝大多数都已发了财。

另一股才是真正的复兴派，是黄埔学生出身的，以贺衷寒、胡宗南、康泽、滕杰、袁守谦、刘咏尧等为首脑。

复兴社的地盘是军队及军事机关，是军中的政治部，是三青团。这派反苏、反共、反民主和CC一样，有时还要露骨些；与CC不同的，它还支持蒋的抗战。

复兴中做特务工作的是戴笠、郑介民，还有曾扩情现在不大行时。

黄埔生中只有贺衷寒、胡宗南、曾扩情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复兴派的理论家有刘健群、刘炳藜、陈钟浩等。刘健群是第一个主张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的理论家，抗战后为了和老婆闹离婚的关系并且政治上不很得意，曾做过一次和尚。刘炳藜和陈钟浩现在不谈法西斯又来讲民主了。他们都不是黄埔出身的。

丁、政学系：著名的有张群、熊式辉、陈仪，都是中委。吴铁城、王世杰，国民党都说他们是新政学系，也都是中委。不是中委的有吴鼎昌、张嘉璈、翁文灏等。这班人都有点本事，继承了中国官僚的传统，现在都有地位，也有权。他们以蒋的政策为政策，代他出主意做得更圆滑些。他们不象CC那样党化，也不象复兴那样蛮横。

戊、英美派：王世杰（留英）、翁文灏、蒋廷黻、王宠惠（老国民党员）、杭立武（教部次长）、孔、宋也属这一类。他们比较接近英美，了解政治也多，也赞成相当的民主。这一派象政学系没有什么组织和政纲。其中，孔与宋却是水火不相容的。

己、另有大革命时代的左派，现在没有势力，没有地位和权力，不得志，人数可不少。他们坚决主张抗战，要求民主迫切些，外交主张联苏，对中共愿意联合，这些人中有谭平山、李世璋等，他们原来相互没有联系，但现在是在接近中。

庚、旧改组派及其他：郭春涛、邓飞黄、范予遂、罗贡华、于振瀛等。他们要抗战，对其他的问题内部意见颇分歧，但要求党内民主则是一致的。

要求党内党外都实行民主的一派，当以孙科为首，但他还没有取得党内主张民主各派的领导地位。这因为他过去政治态度摇摆不定，又因为国民党内要求民主的各部分都没有联系起来。现时国民党内部在重庆共有七十多个讨论民主问题的座谈会。其中以孙科一派为最大。这派以立法院一部分人为主，如王昆仑、许宝驹、钟天心、周一志、马超俊（马与CC有过接近，但碰了钉子又回到立法院来了）等都属之，这些人中王、许在目前是比较进步的一派。

辛、地方实力派（有国民党籍的）

滇——龙云（中委）。

川康——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

桂——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夏威（李、白、黄是中委）。

粤——余汉谋（七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九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四战区司令长

官）、李汉魂（广东省主席）。

晋绥——阎锡山（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集团军总司令原属阎，后归蒋）。

西北——1、冯玉祥系——孙连仲（六战区司令长官）、刘汝明、冯治安（都是集团军总司令）。2、杨虎城系——孙蔚如、赵寿山（都是集团军总司令）。

东北——只剩下何柱国（集团军总司令）。

回回——四马：马鸿逵（宁夏省主席，集团军总司令）、马鸿宾（军长）、马步芳（青海省主席、集团军总司令）、马步青（军长）。

这些地方实力派都有国民党党籍，但大多数对蒋是离心的，因为蒋要搞垮他们。蒋与川滇实力派矛盾很大，冲突很多。这些地方实力派大都要保全自己的实力，其中抗战较坚决者为粤桂系及晋绥之傅，公开勾结日寇者为晋阎，为着对付蒋而赞成民主主张者为川滇实力派，他们也不反苏与反共。

壬、国民党内各派别的相互关系：CC与复兴关系最坏，甚至互相杀害，CC分子李蔚唐在安徽是复兴主持杀掉了的，CC分子卢斌在山东也是复兴分子杀掉了的；CC主持的特务与复兴主持的特务也是水火不相容。CC、复兴又与政学系不相容，与孔宋也不合。孔与政学系又不和。中央与地方总搞不好，至于各派内部的磨擦，个人相互间不调，简直是矛盾重重，举例也不胜其举了。

（六）国民党的宣传机关

甲、报纸——“中央日报”属中宣部，总馆在重庆，各地设有分馆；“扫荡报”属政治部；各省或县还有不少的日报。

乙、杂志——有“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等共四十余种。

丙、通讯社——中央通讯社是垄断性质，和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合众社，订有条约，交换电讯，但和塔斯社条约还没有订好。还有一个假充民办的通讯机关名“盟利社”是何应钦、潘公展等出名来办的，他们恐怕中央社宣传反共不大方便，所以假借人民的名义，来专门反共。

丁、中央文化服务社——各省各县皆有布置，但成绩不很好，花钱多，效果少。

还有大书店如正中书局、青年书店、拔提书店（拔提是Party的音译）。正中书局想垄断全国教科书，后来搞不了，才与中华书局、商务印刷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合伙。现在教科书都由他们出版。此外还有独立出版社、文信书局等（在重庆）。国民党曾企图统制全重庆的印刷机关，但没有达到目的。

二、中国国家社会党

中国国社党的前身，是一九三〇年春夏之交，上海一些银行家和大学教授，看见中共力量的增长，国民党统治的无能，他们想从中国旧传统和外来科学文明中找出办法来挽救中国，办了一种刊物名“自由评论”。人称为“自由评论”派。“九一八”以后以“抗日救亡”旗帜相标榜，才正式成立组织，公布政纲。

（一）组织形态

国社党组织形态未完备仅有中央领导机关。

（二）党员及其成分

党员数量不多，抗战初据说有二百余人，以后没有听说有什么发展。

党员成分：大资产阶级，大学教授，大学生。

（三）政　纲

国社党的政治主张有下列三要点：

（甲）国家民族本位。他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不能与之相抗。"

（乙）修正的民主政治。他们主张"在原则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在实施上必须使党派的操纵作用，不能有所凭借"。关于"修正的民主政治"，国社党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公布了一个方案共十一条，其第一条主张以举国一致之精神组织统一的政府。第二条主张由全体公民选举代表，组织国民代表会议；并主张凡党纲公开，行动公开，不受他国指挥之政党，一律参与选举。这条后半截的用意何在，不难想见，明明是限制共产党不能参与选举。其余各条大体是摹仿英美民主制而写的。全文在附录中，可供参考。

（丙）渐进的社会主义。他们主张"（一）为个人谋生存之安全，并改进其知识与环境计，确认私有财产。（二）为社会谋公共幸福，并发展民族经济与调剂私人经济计，确立公有财产。（三）不论私有与公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四）依国家计划，使私有财产趋于平衡与普遍，俾得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五）国家为造产之效率增加及国防作用计，得以公道原则，平和方法，移转吸收私人生产及其余价，以为民族经济扩充之资本"。

国社党认为他们的"国社主义"与希特勒的"国社主义"不同，因为后者带"民族"的意味甚多，而他们的"国社主义"，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

〔附注〕本节甲、乙、丙三项中括弧内引用的语句都见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君劢给蒋汪信。

（四）领袖与干部

国社党领袖为张君劢（五十九岁，江苏人，德国留学生，研究倭铿哲学，在我国"科玄之争"他是主张玄学的主将。国外颇有学者名）

党中著名人物有：

罗隆基（江西人，美国留学生，大学教授，过去反苏反共，抗战后态度有些转变。一九四二年被国民党强迫登报脱离该党）

张东荪（在北平被日寇软禁，亦称脱离该党）

罗文干、胡石青（两人均已去世）

徐傅霖（原在香港办报，后赴新加坡，新加坡沦陷后不知所终）

章士钊、江庸（此二人不承认是国社党员，但他们和张君劢的私交很好）

梁实秋、蒋匀田、孙亚夫（都在重庆）

汤　铭、陆鼎揆、诸青来（汤在天津，陆在上海，都与日寇有往来；诸在南京任伪职）

国社党的组织实际上已呈瓦解的形势，很少听到他们举行什么会议。对于国际国内政治问题，除张君劢个人偶尔发表一点意见外，久已不见国社党的什么主张。

国社党对抗战是主张的，虽有几个党员在日寇那里活动，张君劢在一九四二年被国民党逼迫已声明那些人与国社党无关系。张君劢一般是主张抗战的，在抗战不利时有些悲观的言论，当国际好转一点，他的胆子又壮了。

国社党主张的民主是英美式的民主，他们对于广大人民是忽视的。

国社党对苏联不研究，一向是盲目的接受英美反苏分子的宣传，所以他们反苏，他们不

认为苏联是民主国家，不研究斯大林宪法。只有一位胡石青看了斯大林宪法后，才说中国制宪，应采取苏联新宪法的精神。我国抗战，他们希望苏联帮助更大。苏联自斯大林格勒获胜后，他们才认识到苏联的力量。他们在外交上是主张联苏不赞成反苏的，当然他们还保留着若干对苏联的批评意见。

国社党过去反共，被国民党利用了一次，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张君劢致毛泽东同志一封公开的信，主张我们把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交给蒋手。劝我们取消特区，暂时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等。毛主席没有理他。我们许多同志加以痛驳，同情的人也有驳斥他的。国民党利用他这篇文章到处翻印散发。给了一点钱让他办一个民族学院。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国民党反动，因张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将张扣留重庆，解散民族学院，张对国民党自难发生好感。我们自一九三九年来，慢慢和张接近，解释我党政策，他的态度已不敌视我们，他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我们赞助同盟的组织，他受国民党打击，我们寄以同情。他现在不但不反对我们扩充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军队的力量不够强大和边区遭受袭击呢！张已认我党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军。

（五）宣传机关

他们有一种刊物名“再生”，近来脱期很久，张君劢也不大写文章登上去，张近来的文章多登“民宪”月刊。

三、中 国 青 年 党

中国青年党原名国家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中国留法的一些相信国家主义的学生和侨胞，因临城劫车事件，各帝国主义倡议瓜分中国的刺激，在巴黎成立的。后改名为中国青年党。

（一）组织形态

中国青年党的组织形态较完备，有中央领导机关，有地方组织，但地方组织只在四川较有基础。

（二）党员及其成分

党员确数不详，据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成都“华西日报”载“自强社讯”：十二月二日为中国青年党建党二十一周年纪念，并谓“该党为中国今日之一大政党”，“拥有大量党员”。

党员成分：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大学生、公务员、军人、地主及资本家。

（三）政　纲

中国青年党的基本理论是排斥异族，认为自己的种族优越；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和历史性，认为国家是超阶级、超历史的，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中的最高理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青年党的宗旨，是“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该党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标语下有很长时期的反苏反共，政治上与北洋军阀多往来。因不满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曾提出“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口号。直至“七七”事变后，才倡言“政党休战”，提出各爱国党派共同抗日的主张。

青年党的抗战主张“（1）拥护政府抗战，以求最后胜利。（2）促进民主政治，完成各级民意机关。（3）厉行全民总动员，加强抗战力量。（4）在不妨害国家之独立与统一原则下，联合各党共同奋斗。（5）肃清贪污，解除人民痛苦。（6）策动友邦，实行制裁暴日”（见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青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为青年党建党二十一周年纪念，该党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四项主张：（1）武装全民，（2）结束党治，（3）培养富源，（4）敦睦盟邦。其次在教育文化上，主张“尊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取消统制干涉的政策”。对在国内各族主张“尊重民族及宗教间的自由，保障其自治权利”（摘自书报简讯五十五期）。

（四）领袖及干部

青年党的领导人物：

曾　琦（四川人，留法学生，复古倾向很浓，喜欢旧文学，很自负，他开始以为蒋介石在战事失利时会改组政府，要拉他入阁，后来蒋不理他，他就跑到上海去住，没有就伪职）

左舜生（湖南人，去法国游历过，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些著述，当过大学教授，主张抗战，但对蒋所领导的抗战常抱悲观。近来他在青年党中是比较肯研究苏联的，对苏联比较了解）

李　璜（四川人，留法学生，研究历史，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中共抱机会主义的见解，对他有利时他表示好）

陈启天、余家菊、常燕生、姜蕴刚、魏嗣銮（他们都是大学教授）

翁照垣（广东人，“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时，他在十九路军任旅长，守吴淞炮台颇著名）

赵毓崧（也是青年党党员，现在南京伪政府任职）

曾、左、李三人是轮流值年主持该党。该党对抗战是拥护的，但党员中有在南京任伪职者，有暗中和日寇来往者，他们从未公开批评过。他们许多主张是同战国派一样的。曾对法国贝当的投降寄以同情及希望。

该党对民主，“主张民主政治，实行各党并立”，“因而，对于一党专政与一阶级专政皆未敢苟同”（见“国论”八号，“中国青年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在政治上虽主张“实行全民政治”，主张实行宪法，但实际上是很狭隘的民主，顶多是象过去法国第三共和的民主那样。

该党对苏联，抗战前是持反对态度的，在抗战初期，苏联帮助中国很大，所以那时对苏联比较好，以后，在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苏芬战争爆发，苏日“中立条约”宣布时，他们都反对苏联。该党一贯指苏联为一极权主义国家，不承认苏联是民主制度。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在战争中逐渐取得优势时，他们对苏联态度也好转，现在是主张要和苏联搞好的。

该党过去反共，抗战后在理论上还是反共的，反对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反对有阶级立场的观点。该党在川康有时也受国民党的压迫，但国民党在各小党派中拉拢他们是比较厉害的。不过，当国民党想利用他们做反共的工具时，他们没有做。该党去年二十一周年纪念所发表对时局宣言，比它在一九三八年所公布的对抗战主张还要进步些。在争取全国民主是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我党在解放区的力量，也逐渐被他们所认识。对我们猜疑和恐惧的心理，比从前淡些，但未完全去掉。

（五）宣传机关

他们有日报名“新中国日报”，在成都出版，可以销售三四千份。有杂志叫“国论”，以前停了，去年又复刊。有一个书店叫“国魂书店”，也在成都，但时开时闭。也办有学校，叫“川康建设学院”，是国民党出钱由他们主持的。

四、第 三 党

第三党本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原在国民党内工作、因反对当时党的政策而脱党的共产党员，和当时国民党左派的一部分，共同组织的。

（一）组织形态

该党各级组织尚未建立起来，只有党员与其负责人联系着。

（二）党员及其成分

党员确数不详，散在中国东南区（如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颇多，党员成分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也有当过大学教授，现在在学生中党员数量不大。

（三）政　　纲

该党原定政纲的主要点，是根据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反对中共用武装暴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一九三四年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主要是他们策动的。在“九一八”“一二九”后，他们发表组织反日阵线第一次宣言，响应我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在宣言中，他们主张“中国反帝民族革命战争，应自对日战争始”，他们认为“中国人民，除了以民族革命战争回答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暴行……解放中华民族外，其他一切的方法都是自杀的方法”。他们主张“召集人民非常代表大会，由一切真正民众组织和革命的政团及革命军人选派代表参加”，成立最高抗战机关，主持对日作战事宜。他们号召“一切革命的党派……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下，形成巩固的联合阵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导机关”（详见“抗战行动”半月刊第一期该党宣言）。他们在抗战中主张“土地革命”，是过左的政策。

（四）领袖及干部

该党的领导人物：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九一八”后，已被国民党在南京枪毙）

章伯钧（原为共产党员，在叶贺南征潮梅失败后，自动脱党。安徽人，德国留学生。一九三九年后政治态度更确定）

邱映芙（广东人，现在香港）

张云川（江苏人，是梁漱溟的学生，曾到过华中根据地，写过文章，对我们很好）

杨伯恺、李伯球、王一帆、杜冰波、朱蕴山、王枕心、季方等。

谭平山、黄祺翔（两人已脱离第三党加入国民党）

彭泽湘（脱离第三党投降国民党，在戴笠名下做特务）

第三党对抗战是坚决的。曾经呼吁全国人民拥护抗战到底，反对动摇犹豫的分子妨碍抗战的一切企图。该党对民主，认为抗战胜利与实现民主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们认为要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政治的改革，改革政治的内容决非对过去政治方针加以局部的修改，而是整个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施民主政治。他们赞成各党各派的联合，反对一党独裁。

该党对苏联的态度与前述各党派不同，他们坚决主张联苏。主张把英美法对中国的同情援助和苏联对中国的同情援助要严格加以划分，说前者“断不是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前途下

的举动，而是站在他们自己本身在华利益和暴日对立的行动”（见“抗战行动”半月刊第一期）。只有后者，“才有革命的意义”（章伯钧语）

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抗战与民主的中间最可靠的朋友，对破坏团结的一切言论，他们都加以严厉的驳斥。如章伯钧说：“所谓反共问题，更无辩驳的价值了……在当前抗战阵线上，共产党是同样效忠国家，为民族服役，参加抗战，更无特殊标榜反共的理由”（见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新华日报”）。

（五）宣传机关

抗战初期，在武汉出版一个日报叫“进步日报”，随着武汉撤退而停闭。同时有一个“抗战行动”半月刊，也在武汉撤退时停刊了。在重庆开了一家“正谊书店”，以后受国民党压迫关了门；该党拟办一“中华论坛”杂志，开始国民党不允许，去年被允许了，但他们自己又无力出版了，直到最近才出了创刊号。

五、救国会

救国会是在抗战前不久成立的。“九一八”后国民党政府持不抵抗政策，日寇侵略中国的事件不断发生，全国各地救亡运动迅速开展，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救亡团体。为了指导各种救亡运动，需要全国性的统一组织，由上海各救国会联合召集全国各地救亡团体代表和热心救亡工作的个人，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青年会开了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发表了宣言及通过了抗日救亡初步政治纲领。

（一）组织形态

救国会还没有形成一种政党的组织，只有上层的机构。

（二）会员及其成分

会员数量无确实统计，成分是知识分子、公务人员、店员、自由职业者，多属于小资产阶级。

（三）政　纲

他们的政纲主要是要成立救国阵线，而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彻底团结与共同抗日，认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联合阵线毫不能让步的要求。他们主张召开各党各派合作的抗日会议，主张以普选方式产生国民救亡会议及统一的救国政权。他们认为“国家力量的统一，是必需的；但应该为抗敌而统一；以抗敌求统一；而不能为统一而统一，更不能以统一消灭抗敌”。

（四）领袖及干部

救国会的著名人物有：

沈钧儒（满清进士，浙江人，今年七十二岁，日本留学生，学法律，是旧国会参议院议员，在上海办法政大学，当律师，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又是国民党党员，一九三六年因救亡运动为国民党政府逮捕，有名的“七君子”之一，“七七”事变后才被释放。抗战后任参政员，现为律师）

张申府（河北人，法国留学生，大学教授，很早时加入过共产党，以后脱离，在中国传播过罗素的数理哲学）

陶行知（安徽人，美国留学生，大学教授，专门研究教育，是生活教育学说的创造者。他的学生很多成为我党党员）

邹韬奋（江西人，在著作言论界有权威，编过“生活周刊”、“大众周刊”、“全民抗

战”……等刊物，拥有读者三十余万。曾游历过英美与苏联，对苏联有深刻的同情。亦为“七君子”之一，抗战后任参政员，新四军事件后反抗蒋的反动，被迫离开重庆，去年因病去世）

沙千里、史良（都是名律师，都因救国被捕，为“七君子”中的名人，史曾任参政员）

李公朴（“七君子”之一，他品质不好，社会上对他有许多不好批评，是我党的叛徒，破坏过我党组织）

王造时（也是“七君子”之一，但已被国民党收买。曾任参政员，现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会员）

章乃器（浙江人，他想在国共两党之外求出路，主张救国会不要共产党员参加，这要求被救国会其他人拒绝，所以他就不愿成为救国会会员了。近来对我们较好，也是“七君子”之一）

张志让（江苏人，名教授，主编“文摘”与“宪政”）

刘清扬、曹孟君、胡子婴、韩幽桐、杜君慧（都是中国妇女界有名的人物，她们本身都很能干）

张友渔、王炳南（他们二人是中共党员，在救国会内是公开的）

救国会对于抗战是最坚决的。

对民主。他们主张民主较为广泛，对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是完全赞成的。对工人、农民、妇女、国内各少数民族都有较进步的主张。

对苏联。他们主张加强对苏外交，与建立强固的中苏轴心，但亦不要放松争取英美法同情援助的工作。只有在苏日中立协定公布时，他们不满苏联，曾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这是王造时受国民党嘱托，在会议上提议通过的，后来他们才知道错了。

对共产党。他们是我们党亲密的朋友，他们也靠近共产党，国民党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外围，社会上也知道他们是同情共产党的。

（五）宣传机关

在抗战前，办了许多刊物，如：“救亡情报”等不下百数十种；抗战后办有：“抗战三日刊”、“全民周刊”（在武汉时合并为“全民抗战”）、“救亡日报”等。书店在重庆有生活书店、峨嵋出版社，在昆明有白门书屋等。

六、中华职业教育社

该社是民国六年成立的一个教育团体，主要工作只宣传和推进职业教育，后来在政治生活中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派别。

（一）组织形态

该社有总社，现在重庆，有些省分亦设有分社。

（二）社员及其成分

社员数量不下十万人（因为它办长期或短期职业训练班次数很多），但社员与总社联系较差，抗战后曾发行一种秘密刊物名“国讯通讯”以联系所有社员，但不普遍；也想把国讯社变成政党组织，但因国民党不准立案，没有成功。社员成分有大资本家（如钱新之），大流氓（如杜月笙），社会上的名人，实际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如公务人员、公司职员、店员等。

（三）政　纲

没有什么明确政纲，其政治主张有下列几点：他们历来的基本主张是教育救国，职业教育更为重要，他们是“以救国为职志，以全民抗战为途径”。主张拥护统一，主张民族平等，主张拥护政府及最高领袖，主张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致合作，但要服从领袖的命令，主张逐步实行民主政治，主张大规模发动民众。他们有五个个人修养的基本信条：1、高尚纯洁的人格；2、博爱互助的精神；3、忠勇义侠的气概；4、刻苦耐劳的习惯；5、正确前进的思想。

（四）领袖及干部

该社著名人物有：

黄炎培（江苏人，前清举人，谘议局议员，江苏教育总会主干之一，游历过美国，袁世凯时代任命他做教育总长他没有就职。抗战前很受国民党的压迫。现年六十七岁，著作很多，对中国旧文学有修养）

江恒源（江苏人，曾任江苏教育厅长，老教育家）

冷　遹（江苏人，军人，辛亥革命时曾任过师长，现办生产事业）

杨卫玉、孙起孟、贾观仁、王正廷、杜月笙、钱新之、穆藕初（已逝世）（是他们董事会的人）

他们对抗战是坚决的。

对民主，他们主张在现行基础上逐步改良，但不主张立即实现普遍的民主政治。

对苏联，主张亲苏与联美并重，他们宣传苏联战前的建设与战后的成绩，对苏联是有热烈的同情。

他们对我党主张团结，并愿意为国共合作的拉拢人，例如他们领导者黄炎培说：“国民党是大拇指，共产党是小拇指，我们是食指、中指与无名指。国共要合作非依靠我们来拉拢不成”。抗战以来，对共产党没有公开反对过，并要我们写文章给他们的杂志，关于我们解放区建设与抗战成绩的文字，只要投稿给他们而国民党不扣掉，在他们机关报“国讯”上都是登载的。但中华职业教育社决不是革命的组织，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派别。几个主要负责人如黄、江、冷三人，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所办的一些事业也没有很巩固的基金，每年都是从一些资本家和现政府得到一些补助和津贴来维持。他们还要顾虑亲戚故旧和家庭儿女等，拖着这样一个大尾巴，自然无法摆动。但在抗战中实现民主，他们还是有作用的。他们也训练了一大批事务人才。

（五）宣传机关

他们在抗战前办过“新教育”，“生活周刊”在开始也是他们的刊物之一。“九一八”后，出版了“救国通讯”，宣传救国运动，后改为“国讯”，是他们的机关刊物。他们办有国讯书店和中华职业学校。

七、乡村建设派

该派的创始者是梁漱溟。他的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二年，到民国十七八年逐次成熟，以后在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开始讲演他的“乡治十讲”。他的理论在广东、广西、河南、山东都讲演过。后来在山东邹平开办乡村建设学院，并以邹平为他的理论实验县。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起于：1、救济乡村运动；2、乡村自救运动；3、积极建设之要求；4、重建一新社会构造之要求。他认为中国旧社会在崩溃中，崩溃中的中国社会之问题，是

文化失调之问题；中国在政治上无办法，所以要从乡村建设入手。他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见梁著"乡村建设理论"三二六页）。抗战以后，邹平乡村建设学院的学生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留在山东打游击和我们在一起作战；另一部分做了汉奸；还有一部分流亡到大后方去了。梁本人对抗战是坚决的，他原来只想做一种社会运动，不搞政权，他曾说："我们要守定社会运动的立场，绝对不自操政权"（同上附录一三页）。但在抗战中他逐渐改变了这个态度，对民主运动他积极参加，他是民主同盟的首领之一。但他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很有趣味的，他主张"一多相容"建设"透明政权"。所谓"一多相容""透明政权"者，即议会应包纳各党各派，但各党各派参加政府的党员都应该脱离党籍。自然他这种主张完全是一种空想，不能实现的。他曾经到过延安，和毛主席谈论，见解没有得到一致，以后又和我们谈得很多，除对一般民主没有争论之外，对于具体实现民主的见解是有参差的。后他又到过山东一次，回来时对我们有些不满，但他对国民党区域更加不满，所以对民主运动才积极起来。他对于苏联的建设是很称赞的，他对于苏联如何解决农村问题，有些研究，但实际并不十分了解。梁本人自信很坚，也肯思考，但是从唯心论的观点出发，对事实的分析尚是片面的。他的著作很多，在邹平开设一个乡村书店，发行他的书籍。抗战后在重庆附近还办有一个勉仁中学。

八、星五聚餐会

这是重庆五个工商实业团体所组成的，其中包括：1、中国工业协会，2、西南实业协会，3、迁川工厂联合会，4、国货厂商联合会，5、中国生产促进会。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组织，每星期五聚餐一次，并讨论他们本身的困难和需要问题，也有讨论到英美苏对我国的关系及国内政治问题。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自延回渝后，他们曾邀请"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向他们报告陕甘宁边区的状况。他们所最注意的问题是：共产党的实力及对私有财产和对工厂生产、劳资关系等态度问题。该会现在是经济团体的性质，还没有明显的政治主张，目前只要求国民党把经济统制政策放松一点，让他们有发展的机会，他们就满足了。他们自身的出路，需要一种政治上的民主，对这一点他们还了解不够。在去年十二月他们才发表了一个希望实施宪政的宣言，他们对抗战是赞成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伟大的胜利和中共力量的增长，对他们都有影响。"新华日报"上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主张，他们是重视并且赞成的。

九、恒　　社

这是以杜月笙为首的清帮公开组织，里面有：陆京士、朱学范等，听说他们见国民党要实施宪政，也想改成政党的组织，他们在经济界有力量，在社会上有潜势力，他们对文化界特别是戏剧界有兴趣。

十、华侨组织

在重庆的华侨，设有银行（华侨银行），办有发表他们意见的日报（"侨声日报"）。他们对抗战是赞成的。国民党分化他们很厉害，因他们之间有广东帮与福建帮的区别。他们另外在各方面还有投资，因国民党的财政经济政策，不能帮助他们发展，所以他们不满意，因而也要求民主。

十一、民主同盟

原称民主政团同盟，去年九月才改称民主同盟。这是由国共两党以外各在野党派领袖及

社会上要求民主的人士组织而成的。

(一) 组织形态

组织形态逐渐具备，有中央机关及地方组织，成都已成立支部，昆明、西安及广西均有他们的组织存在。

(二) 党员及其成分

党员数量不大，但逐渐发展中。

(三) 政　　纲

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

一、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

1、改善官兵之生活待遇；

2、实行精兵政策；改善装备，加强训练，并提高军官教育之水准；

3、排除派系及地方观念，以军事能力与作战成绩为选任与升降军官之准则；

4、淘汰抗战以来作战不力之将领；

5、划清军政、军令、参谋以及前线作战指挥之权责；

6、根据民主动员之原则，彻底改革现行兵役办法；

7、加强沦陷区之行政组织，并发展人民之抗敌活动；

8、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

9、尽量发展本国军需工业，以求达到武器自给之目的。

二、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1、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

2、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之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害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与条例；

3、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4、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集全国宪法会议，制颁宪法；

5、在宪法颁布前，付予国民参政会以各民主国家议会具有之主要职权，并扩大省市参议会之职权；

6、充实一切地方自治基层组织，普遍实行民选；

7、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

8、简化政治机构，分明权责；

9、本公平原则，按照生活指数，改善公务员待遇，并厉行裁汰冗员，严惩贪污；

10、对于战时战后之受灾人民，统筹切实救济。

三、确立亲睦之外交政策，加强对英、美、苏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并把握当前之胜利，奠定世界永久之和平：

1、促进中苏邦交，以期实现英、美、苏、中四国之团结；

2、严整外交阵容，淘汰不称职之外交官吏，尤应注重驻各重要盟邦之外交人选；

3、加强国民外交，并分别组织文化经济等民间立场之国际访问团，以期增进了解，加强亲善；

4、此次战争结束之媾和条约，以及参加战后一切和平机构之提案与人选，政府必须交

由民意机关予以正式通过；

5、关于运用外资，以及一切经济或工业之协定，政府必须征求民意机关之同意。

四、确立战时经济、财政之合理机构与政策，以期对内对外树立政府与国家之信誉，并奠定和平建设之坚实基础：

1、财政绝对公开；

2、国家之预算、决算，须交民意机关审核通过；

3、关于增加租税、募集公债，以及带有强迫性之储蓄等事项，必须征求民意机关之同意；

4、根据公平原则，调整一切税法，要整饬税收机关与人员，简化收税手续，以免除苛扰，根绝贪污；

5、成立币制委员会，力谋稳定币值，并整理流行全国之一切通货；

6、成立调整物价委员会，以研究调查一切生产、分配、运输、专卖以及合作、工贷、农贷等实际情况，以为平抑物价之张本；

7、制止少数人之奢侈，停止滥费，及一切与战争无关之兴作。

五、彻底革新目前之教育文化政策，保证思想、学术之自由发展，并迅速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

1、立即停止党化教育；

2、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自由；

3、保障学生读书、阅报之自由，不得根据党见，加以取缔；

4、保障教职员生活之安定，并注意改善学生之营养；

5、立即停止学校内之特务活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十日　公布

(四) 领袖及干部

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张澜（四川人，前清举人，为四川保路同志会坚决的领导人之一，民二国会议员，做过四川省长，前四川大学校长，现年七十四岁。他富有正义感，很耿直，社会声望很高）

中央委员有：左舜生、李璜、张君劢、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张申府、梁漱溟、黄炎培……等（实际在重庆主持盟务的是左舜生）。

他们对抗战是坚决的，要求民主是他们的目的，对苏联主张中苏关系要进一步搞好，对于共产党，认为任何民主没有共产党参加是不能实现的。

同盟的组织还不够广泛，力量还没有充实，但前途是很广大的。

(五) 宣传机关

有“民宪月刊”，由左舜生主编，其中多青年党人写文章，还不能完全代表同盟的意见。另有黄炎培、张志让来主编的“宪政”，是由钱新之等筹款所办，虽不是同盟的直接宣传机关，但与同盟有很密切的关系。

以上各党派的介绍，材料大部分仅凭记忆，难免有些错误，这是因为手边缺乏参考资料所致，希望阅读的同志予以指正！以后如有机会，当作比较具体详细的介绍。这里所述的不过是一个大概而已。

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

——一九四四年八月六、八、九日第十八集团军
副总司令彭德怀对美军观察组的谈话

今天利用这个很难得的时机，和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们，美国的朋友们，谈一谈我们七年来华北抗战的情形，把华北战场上的敌军、友军和我军的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以便反法西斯的国际战友们有一个概况的了解。

七年的华北抗战，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平型关战斗至武汉失守；（二）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三）百团大战至我国抗战五周年；（四）抗战五周年至今。现在逐一叙述其具体情形于下。

第一时期——平型关战斗（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至武汉失守（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敌方情形

日寇进攻我国，最初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这个方针，用之于既无准备，又无决心的国民党军队则可，用之于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和抗日思想酝酿已久（自“九·一八”以来即开始）的广大人民则不可，因而他只能获得初期的某些胜利。敌人进攻作战的重心，首先是在华北，这是根据田中奏折的老计划，由东北四省而进入华北，企图尽掠黄河以北，抢夺河北的棉花、山西的煤铁，然后举兵南下，经华中、华南而直抵南洋。在太原尚未沦陷之前，敌人作战的对手，主要的还是国民党的军队。当时，敌人的华北派遣军司令是香月清司，集十二个半师团的兵力，为第五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二十师团、第一〇八师团、第一〇九师团、第一一四师团、铃木旅团、酒井旅团、山井旅团等之全部，及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四师团、第八师团之一半，近三十万人，约占当时日寇侵华兵力二十又半个师团的五分之三的兵力，作所谓“堂堂阵容”的正面进攻，由北而南，长驱直入，未及四月，即占领了平、津、保定、石家庄、太原，控制了北宁路、平绥路、正太路，以及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之北段。

太原、临汾相继失陷后，整个黄河以北的地区沦入敌手，友军望风南溃，退出了华北战场。此时在华北与敌人作战的，只有共产党人，八路军、山西新军决死队、河北的杨秀峰、山东的范筑先，以及由监狱释放出来的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游击队。这些新兴的抗战力量，团结在八路军的周围，与华北人民深相结合，就象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地生长起来，到处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和敌人周旋。从此，日寇在华北的作战，就以八路军为其主要敌手了。这时敌人提出“巩固已经占领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确实掌握华北”的方针，在其占领的铁路沿线和城市周围，修筑据点碉堡，以便防守。同时又提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口号，进行培植伪军、伪政权和掠夺人力、物力、财力的阴谋毒计。为了镇压方兴未艾的游击战争，日本侵略军除调走两个半师团（第六师团全部及第一师团、

第二师团、第四师团之一半）参加徐州会战外，复增派七个师团到华北战场（第二师团、第十一师团各一半、第二十一师团、第二十三师团、第一〇四师团、第一一〇师团，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混成旅团之全部），并另将铃木旅团、酒井旅团、山下旅团等三个旅团扩编为三个师团（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团），在华北兵力为十八个半师团，约四十万人，较战争第一年增加了六个师团，仍为当时日寇在华作战兵力三十又半个师团的五分之三。

敌寇初与我八路军交锋，尚不知我军特点和利害，在战术上采取"突贯攻击"，单刀直入式的向我横冲直撞，以为我军如其他中国军队之易欺，企图把我们碰垮，但结果反而碰伤了他自己，常常遭受我们的歼灭打击，敌人遂不得不改变"突贯攻击"的战法为"分进合击"。在武汉失守之前，敌人以千人以上兵力向我合击者已有十余次，以万人以上围攻我一个地区者已有五次，企图乘我立足未稳，抗日根据地尚未臻于巩固之际，一举加以摧毁，以扑灭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焰。但这些合击，都在我集中力量打击一路之敌的战役指导下，被我击破，根据地在反围攻中逐渐巩固起来，我八路军也日益更加强大起来。

敌人为了巩固其占领要点，便利对我作战，吸吮我物资以达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乃开始修筑铁路。至一九三八年底，被我加以破坏而敌人重行修复的铁路，有平（北平）绥（远）线、平（北平）汉（口）线、北（平）宁（辽宁）线、津（天津）浦（口）线、同（大同）蒲（州）线、坨里（良乡至坨里）支线、西陵（高碑店至易县西陵）支线、六河沟（安阳丰乐镇至六河沟）支线、济宁（滋阳至济宁）支线、口泉（大同至口泉）支线等十线，约二千七百九十二公里，新筑平（北平）古（北口）线一百四十六公里，合计二千九百三十八公里。在部分地区，且已开始建筑碉楼据点，但为数还不多。

在华北的伪军，在抗战前即有李守信、王英与赵雷等组织的伪蒙军及冀东保安队。抗战初，大汉奸齐燮元成立靖安自治军（后改为治安军），初仅有四个连，至一九三八年底已扩大为五个团，为华北正规伪军的主力。此外，敌军曾大事收编散兵、土匪、会门武装，组织伪皇协军、剿共军，以及伪护路保安队等，至一九三八年底，华北伪正规军与伪地方军合计约有七万人。但系统复杂，素质低劣，在我游击战争开展之下，多半（估计约四万五千人）为我八路军所消灭。

（二）友军情形

抗战开始，华北战场上的友军，有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等不下七十五万人，当时士气一般的还好，而且也打过几次仗，比如南口之战、忻口之战，并有若干将领于作战中英勇殉国，如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等。但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缺乏信心，更无久远打算，所采取的政策是单纯的片面的军事抗战，而不是发动民众进行全面抗战，在战略指导上，又是正面单纯防御，而不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不是积极防御作战，更不承认灵活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因而处于被动，形成处处招架，也就是处处挨打的形势。再加以若干高级将领的贪生怕死，拥兵自肥，比如韩复榘不知搜刮了多少金钱，在敌人进攻时，不作抵抗，一味地保护着"私人财产"向后退却。晋绥军战斗力很差，但高级军官们个个会做生意，个个发大财。李服膺当敌人占领大同，距敌尚有几十里远时，就望风而逃，急急向雁门关以南撤退，因而形成不战即溃，日蹙百里。而太原、临汾、新乡相继失守，在城市和铁道交通线被敌人控制以后，友军更溃乱不堪，争先恐后地抢渡黄河。就是当初高唱"守土抗战"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先生的晋绥军亦全部退至黄河以西，被敌人截断而留在敌后侧翼的，只有第九十三军（刘戡）的五十六师，也是惊慌失措。至于平时鱼肉人民的官僚政客，一闻

炮声，即携带妻妾细软，逃之夭夭，而难民伤兵，军需器材，全被遗弃。更有摇身一变，奴颜卑膝以事敌人者，如王克敏、齐燮元、潘毓桂之流。人民目睹心伤，悲愤莫名。

（三）我方情形

抗战开始时，红军有官兵八万人，八月二十五日奉军事委员会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只给三个师的番号，按四万五千人编制和发饷，即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的番号。九月，我们自韩城、潼关两处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进，踏入了华北战场，增援前线。当时，我们就知道中国抗战是长期性的，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也给我们规定了作战指导的基本原则，“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因为根据敌我装备上的优劣悬殊，留置敌后进行长期战争的艰苦环境，以及我们具有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与特长，只有在此种作战指导原则下，才能制胜敌人，这已是被七年的战争实际所证实了。

我军先头部队，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甫抵前线，一与敌人接触，即创造了平型关大捷。我军在运动战中，击溃敌精锐的板垣师团，歼灭其一个联队，创开战以来的胜利记录，一扫友军节节败退的耻辱，大大振奋了全国人心。平型关战斗使敌锋受挫，但敌人已自茹越口友军防地突入长城以南，我军旋即迂回敌后，猛袭敌交通线，配合友军忻口作战，保卫太原。此时，我一一五师光复冀西、察南十余县，一二〇师数度占领雁门关，一二九师则袭入阳明堡飞机场，焚毁敌机二十四架，敌人后方的交通联络线全被我军切断，忻口被围之敌，粮弹俱绝，死伤极重，大有歼灭可能。狡诈之敌，乃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进，进犯娘子关，声援忻口之敌。我一二九师闻警驰援，尚未进抵阵地时，该关友军已弃守，刘师长、徐副师长机断行事，在正太路南平行路上之七亘村、黄岩底、广阳连打了三个胜仗，打开了敌人阵地的一个缺口，救出被围友军曾万钟之第三军，阻滞了敌人的西进，掩护了友军的撤退。但不久太原失守，遂使忻口敌人获救，至为可惜。

在此以前，我军在华北的作战，主要尚系配合友军行动，在此以后，我军在华北即开始单独作战，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

太原失守前，我军已预见华北之将沦为敌后，故即确定方针：“变敌后为前线，发动广大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迨太原失守，即有计划地将兵力分置于同蒲路两侧与雁北敌后，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管涔山等为依托，从事创造抗日根据地。对于敌人之围攻与合击，我则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以对抗之，使敌人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战线，常常扑空。我则灵活集中兵力，乘敌之隙，打击其一路，予以坚决粉碎。如敌人对晋东南和晋察冀的围攻，均合击一个中心点，待敌进至转换线上，我主力即跳出圈外，集中力量打击其一路，使敌人在尚未进抵中心点时，即被消灭与击溃。同时，我遣军东下冀鲁豫大平原，北击绥、察、热、冀东、长城口外，光复祖国河山，拯救沦于敌人铁蹄下的人民，协同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部与爱国人士，配合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光复的国土上，我们即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安抚流亡，救护伤兵，实行二五减租，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廉洁政治，发动广大民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帮助友军进步。所有这些，都是为着增强抗战力量，树立长期抗战的基础，把华北创造成为坚韧不拔的抗日基地，使中国抗战在正面战场以外，更增辟出一个敌后战场，以便前后夹击敌人，制敌死命。

在这一时期，我军为配合徐州、武汉两大会战，一方面坚决粉碎敌人对我新建根据地的“扫荡”与围攻，消灭敌有生力量，牵制敌人的调动，如一九三八年三四月晋东南一二九师

反对敌人九路围攻，长乐村一战，歼灭苫米地旅团主力，并使敌由同蒲路调兵东援徐州发生很大的困难；九月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反对敌三万兵力的二十五路围攻，曾击毙敌常岗宪治旅团长与正亚、清水两联队长……。另一方面，我军又主动地向敌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击，并扫荡日寇培植的爪牙——伪军，计一九三八年初，晋察冀我军大破平汉路北段，袭入保定、定县、望都、正定等县城；二、三、四、五月，一二九师破袭平汉路、津浦路，在南宫赶跑敌清水司令，消灭盘踞河北伪军崔培德等约五千人；三月三十一日，一二九师伏击东阳关与涉县间的响堂铺，焚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山东我军在台儿庄会战正酣时，破击鲁南之台（儿庄）潍（县）公路,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发动矿工起义；七月六日起，晋察冀我军同时出击平绥、正太、平汉诸铁路,激战三天二晚,毙伤敌千四百余人，炸毁北平城北石景山之发电厂，使北平顿成黑暗世界；七月十六日，唐山矿工在我军领导下，发动抗日起义；七七抗战一周年,我宋、邓支队进入冀东；冀东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二、三十万人的大起义，占领遵化、玉田、迁安等十余县城；我一二九师所部主力进击平汉路、道（口）清（化）路，消灭冀鲁豫伪军扈全禄部；九月,一一五师陈光旅在晋西三战汾(阳)离（石）公路，八月十三日,山东我军袭入济南；十月三日,山东我军又破坏胶济路百余里……等。

由于游击战争之广泛开展，反“扫荡”作战的连续胜利，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我军力量倍增，声威愈壮。活动区域东临渤海、黄海，北达冀东长城口外，南至陇海路，西襟黄河，几个大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在抗日民主政府确实管辖下的人民，为数达千万之上。

第二时期——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

（一）敌方情形

敌人在未占领武汉之前,已深感八路军在敌后的严重威胁,认为是灭亡中国的“绊脚石”。一九三八年八、九月时,敌华北派遣军即提出“五台与武汉并重”的口号。敌人占领武汉以后,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其战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从此，中国抗战的两个战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即以敌后战场为主。

此时期内，敌寇回师华北，兵力骤增，一九三八年敌寇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十八个半师团，曾调走第五、十、十四、二十、一〇九等五个师团参加武汉会战，但旋即新增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第六、七、八、九、十、十五混成旅团，及第二十师团之一半共计八个半师团，因而此时期内敌人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二十二个师团，四十四万人，较抗战第一年（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九个半师团，较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三个半师团，占当时日寇侵华总兵力（一九三九年初为四十八个师团）之一半稍弱。

为了加紧进攻，敌曾二易其帅，由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其间阴谋层出，不断翻新。由于“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加以在上一时期敌人已饱尝我们的老拳，知道八路军和华北人民是个很“讨厌”的敌人，故改唱“百年战争”，说要“掌握民心”，与我“进行比赛忍耐力的斗争”。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任何延年益寿的仙丹灵方，也不能使日本法西斯有百年之寿。一九三九年春，敌华北派遣军颁布所谓“治安肃正计划”，提出中国内战时期“反共英雄们”所早已唱滥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军政民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提出“巩固点（城市）线（铁道、公路）、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一九三九年九月，多田骏上台后，更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实行“分区扫荡、

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牛刀子战术”为一日本术语，取中国语“杀鸡焉用牛刀”之义，表示八路军虽“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征战。在政治上则高唱中日“同文同种”，说什么“黄种人联合起来打倒白种的英美”，在敌占城市举行反英美宣传，并把侵略中国的战争叫做“打回祖国去”。对于老百姓则大烧、大杀，以辣椒水灌鼻，强迫人民承认“不抗日”，“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英美”；一经承认则又施以小恩小惠，以事笼络，称之为“威德并用，软硬兼施”。在经济上，敌对我解放区施行严密封锁，说要陷我于“无衣无食”、“自生自灭”的境地。这种封锁政策，以后长期继续，从未放松。敌人用这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毒辣办法，猛烈地向我们进攻。

战局是空前紧张，“扫荡”是大大加紧了，北起冀东及大青山，南迄黄河冀鲁豫，到处都爆发全面的“扫荡”与反“扫荡”。抗战第二、第三两周年，敌对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万左右。其中一万人至二万人的“扫荡”有七次，三万人以上的“扫荡”有二次，还有一次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

配合这些“扫荡”，敌人疯狂地实施“囚笼政策”，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楼。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两年中，敌修复的铁路有同蒲、正太、胶济、道清、汾阳（平遥至汾阳）、微水、博山（张店至博山）、阳明堡（至平原）、周口店（琉璃河至周口店）等线，计长一千八百七十公里，新建铁路有白（圭）晋（城）、石（家庄）德（州）、新（乡）开（封）、凤山（南张村至凤山）西佐（马头至西佐）等线，计长四百七十七公里，合计二千三百四十七公里。新建公路有平（北平）大（沽口）路、唐（山）大（沽口）路、邢（台）济（南）路、邯（郸）济（南）路等，计长一万五千六百公里，新建碉楼据点二千七百四十九个，一九四〇年即较一九三九年增加四倍。

所谓“囚笼政策”，为德国塞克特的“堡垒政策”与清代曾国藩“步步为营”政策的结合，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给敌占区人民加上一副深重的枷锁。在“囚笼”之内，强化伪政权，组织伪自卫团，厉行“人质”政策，掠夺粮食、棉花，倾销海洛因毒品，强迫人民种植鸦片。但无论什么办法也不能阻止人民的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和反抗，有八路军、解放区的支持，敌占区人民是绝不愿当“顺民”的。比如敌军散发鸦片种子，老百姓将它在蒸笼里蒸熟之后，再撒播在田里，自然不会发芽。敌人莫名其妙，大叫“皇军倒霉，皇军倒霉”！对于我根据地说来，“囚笼政策”则是封锁、割裂、蚕食、扫荡我根据地的依据。白晋路的贯通，把晋东南划成太行太岳两区，平汉路封锁沟墙的修筑，断绝我山地与平原的物资流通。而在平原地区大修公路，将我平原根据地割裂成井字、王字、田字形，缩小了我军活动的回旋地区。此外，敌人还专门修筑了一种圆形或螺旋形的公路，以为包围合击我军的基线。在敌人进行修筑“囚笼”之前，必先以兵力向我“扫荡”，迫我让路，而“囚笼”筑成之后，“扫荡”遂更有所凭借，故“扫荡”愈繁，“囚笼”愈密；而“囚笼”愈密，“扫荡”愈烈。这是华北战场敌寇活动的规律。

“囚笼”政策的实施，使敌人产生另一弱点，即兵力愈加分散，更感不敷应用。而此时由于汪逆精卫之投敌，敌人遂更加强化其“以华制华”的政策，大量地有计划地培植伪军，繁殖其爪牙，并开始将伪军加以整顿，小股的合为大股。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更采取“精兵主义”，放弃过去的乱编办法，改“皇协军”为“剿共军”，改“靖安自治军”为“治安军”，并加强伪军训练，提高其战斗力，使之协助据守公路据点，配合“扫荡”及进行清乡，时常以一班敌军控制一排伪军而据守一个小据点。同时，又大量建立伪军之地方部队，如伪县警

备队、伪警察、伪保安自卫团等。又建立爱护村和厉行连坐法，协助敌人守望道路、电线。连坐法为古代专制魔王及内战时期“反共英雄”所用的“一人犯事，十人同罪”的杀人不眨眼的老办法，以期根绝抗日分子。至一九四〇年底，华北伪军为数已达十四万五千人，较第一时期内约增加一倍，而国民党军队这时已有投敌改编为伪军的，如驻防绥远的三十五军游击支队丁其昌、东北挺进军白凤翔，相继率部约一万三千人投敌；豫北的CC分子张岚峰，也率部数连叛变，使伪军的势力更加扩大。

（二）友军情形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失守，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政治上即开始倒退。他们错认日本人再不会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不是日本人。因此，把抗日政策改变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专制独裁，走向法西斯。一九三九年六月，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九月，又颁布了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的《异党问题处理方案》。此后，共产党遂被称为“奸党”，八路军遂被称为“奸军”或“匪军”。敌后解放区被称为“匪区”。抗战初期，他们曾将华北弃如敝履。但到了八路军艰苦作战，解放沦陷国土，打开了一个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遣军北上，要再从抗日人民的手里去“收复失地”。这些被派到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其目的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反共”。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在抗日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做出来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危害抗战的罪行。

他们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军退过沧石路、正太路以北之线，一方面调集大军二十六个师，以中条山为基地，杂牌军为先锋，嫡系部队在后督阵，自南而北向我追来，以与当时日寇的由张家口、北平一线，自北而南地向我军“扫荡”遥相呼应。而旧日被敌截留于敌后的石友三、张荫梧、秦启荣、赵云祥、胡和道等，当其托庇于我军之时，皆曾相安无事。此时在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指使和特务阴谋的活动下，也就勾结敌寇，袭击我军后方，杀害我官兵，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破坏对敌作战。此时我军处于敌寇和国民党的两支大军夹击之中，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处境十分艰危。同时当局又下令取消各地民选的抗日政府，连国民政府已经承认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企图加以取消，硬派一批法西斯分子充任县长专员，压迫民众抗日运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暗杀活埋抗日干部家属，摧毁一切抗日民主秩序。陈立夫、戴笠、康泽的特务系统更派来大批特务，混入解放区，造谣惑众，放毒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我八路军，每月应得薪饷六十三万元，也从此取消，再无分文发给。总之，种种倒行逆施，使志士侧目，寇奸弹冠。记得当时北平敌伪还曾召开过一个庆祝会，庆祝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战绩。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内战内行”的措施，我共产党、八路军起初曾一再忍让，据理交涉，希以团结抗战为重，勿令盟邦失望，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但竟未获见谅，反被目为“示弱”，而进攻愈急。有些人甚且高唱“曲线救国论”，决心“联日反共”，把他们的卖国行为说成为“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行抗日”。在如此“反共第一”的政策下，终于爆发了一九三九年冬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正式向我们开火。当时情势紧急，迫不得已，乃对向我总司令部所驻之地进攻的朱怀冰的一个军予以还击。朱军起初声势汹汹，作战时且有日本飞机配合助战，暴露其与日军联合进攻之事实，他们全军官兵对此多数表示愤慨，一经接触，其内部即土崩瓦解。朱怀冰本人身为军长，竟经敌驻之邯郸，由平汉路、道清路坐日本人火车回大后方，至今尚在我大后方做官，诚为咄咄怪事。这次磨擦与

反磨擦斗争，不仅是民主与反民主之争，而且是抗战与投降之争，这在以后看得更加明显。如果我军当时未能妥善应付，克服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高潮，则华北早已被国民党断送给日本，决不会再有今日敌后抗战形势，也不会有今天全国抗战形势，更不会有与英美盟邦共声正义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事业。

（三）我方情形

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正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的局面遂一天更比一天艰苦。这时期内，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华北抗战的既定方针，努力巩固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作战指导上，针对着敌人的"联合扫荡"与"囚笼政策"，而着重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的"反扫荡战"与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

"反扫荡战"，此时期内在全华北展开。在晋察冀，一九三九年五月，敌人向边区北部进攻，我军在上下细腰与大龙华打了两个大胜仗，敌遗尸近千；九月，敌向我腹地陈庄突进，被我包围歼灭千余，粉碎了敌人的这次进攻；十月，敌以二万兵力，分十二路向边区进攻，血战四十三天，将敌击退，并于涞源战斗中，毙敌阿部规秀中将，此为中国战场上打死敌人中将级军官之第一次，敌酋多田骏在追悼阿部之挽联上写道"名将之花，凋谢太行山上"。在冀中，曾粉碎敌人的五次围攻，一九三九年四月在河间齐会战斗中，我贺师长中毒负伤，为国际公法所禁止使用之毒气与达姆弹，敌寇在中国战场上于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使用了。在冀察热，平西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六月，粉碎了敌人三次"扫荡"，冀东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粉碎了敌人的大举"扫荡"；七月间，我平西挺进军派一部队伍越平绥路深入平北，在明代十三陵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在晋冀豫，一九三九年七月，敌以六万之众发动九路围攻，贯通白晋路，深入我腹地，尽占所有城市，企图"釜底抽薪"，一举摧毁我根据地，但终为我所粉碎。在冀鲁豫，敌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年底，连续发动四次大"扫荡"，兵力由一万五千至三万不等，并配备有机械化部队，也终归失败；一九三九年二月，刘师陈赓之一部，在威县香城固，创造平原歼灭战，一小时内歼敌两个中队。在山东，自我一一五师之一部于一九三九年春挺进山东后，战事即告紧张；六月，敌以二万兵力合击沂蒙山区，为我击破；八月，梁山战斗，我以一个营歼敌三百余；一九四〇年一月，敌以三万人"扫荡"鲁西南，又为我粉碎。在晋绥边区，一九三九年二月，粉碎万余敌的六路进攻；六月，我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歼灭静乐敌六百余；大青山区，也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扫荡"。此外，在此两年中，敌曾七次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河防，悉为我河防部队与一二〇师健儿联合击退。在这些胜利的反"扫荡"战中，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便日益巩固起来了。

为了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发动了"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群众斗争，唯有军队与人民结合，协助破击，才能收到宏大的效果。这一斗争，起初是将重心放在平原，但也不放松在山岳地区的破击战。在山区，我们曾主动地发动白晋战役，邯长战役，平汉战役等，破坏敌深入我根据地的交通线，摧毁平汉路两旁的封锁沟墙。在平原，我们整年的从事有计划的交通破击战，在组织上，有军、政、民破路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机关；破击时划分一定地段，且有指挥、掩护、联络、侦察警戒、破坏等之具体分工，破击性质有战术性的破击，有战役性的破击；破击时机，有季节性的破击（如春季泛滥时期，秋季青纱帐时期以及"扫荡"前后等），与随时的不间断的破击。特别是对沧石路、石德路的破击，冀中、冀南均各动员五万人以上，坚持时日甚久，敌人的修路计划为之推迟半年。总计抗战第三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五千三百二十里，公路一万六千四百零

八里，毁电杆四万二千二百二十根，收电线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三斤；抗战第四周年，计破坏铁路二千一百六十四里，公路一万零四百八十三里，毁电杆二十三万四千五百零一根，收电线一百四十万零六千五百三十二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六里，公路三十里，桥梁一座半，差不多每七天炸毁敌人一个火车站，九天炸毁敌人一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一辆汽车，每天毁电杆六百四十二根，收电线三千八百五十三斤。仅抗战第四周年所破坏铁路的长度，就将及一条平绥路，或一条半同蒲路，三条胶济路，给敌人的“交通建设”的打击之大，是不难想见的。

在平原地区作战，不仅要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而且要挖掘道沟，以改变平原地形。道沟深六尺，宽五尺，刚好可通牛车，沟外有胸墙，以便我军凭之作战，沟内每隔一里挖一圆形或弧形沟，将积土堆在中间，既使敌人无法顺沟之纵深以行射击，而人马又可在此让路。一九四〇年，河北平原已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八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的百分之八十二。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运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八至十二里。这样就消灭了敌人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象步兵一样的与我们作战。

拔除敌人据点，为反对“囚笼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据冀南经验，共有六种办法：（一）常用袭扰、袭击、强攻以袭敌；（二）钓鱼，即诱敌外出，以伏击之；（三）狐狸咬鸡，即埋伏于据点附近，待敌出来时给以意外的突然袭击；（四）利用坑道进行爆炸；（五）地道战，即在村庄内普遍挖地道，其内有横墙，并村与村相通，洞口多为隐蔽，内有储粮储水及防毒设备，如黄蜂窝形，敌来则利用此地道以进行战斗，小股敌则歼灭之，大股敌我则从地道中进行转移，伺机以打击之；（六）利用地窖封锁，并利用坑道钻入敌人据点内打击敌人。

为了更进一步的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大量牵制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计划，以及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投降危机，我军于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百团大战。这是一个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系在统一的计划下各地区同时发动的，时间整三月又半，使用兵力达一百零三个团，战线之阔，包括有晋、冀、鲁、豫、察各省。先后受我打击的敌军有第一一〇师团、二十五师团之全部，第二十六、三十六、四十一师团之各两个联队，第三十七师团，三十五师团之各一联队，第一、二、三、四、五、七、九混成旅团之全部，第六、十五混成旅团之各一部，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平绥、胶济、白晋、石德等八大铁路，均被我破坏得支离破碎。

此役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十日，为交通的总破击战，重点是在正太路。我晋察冀军区部队与一二九师主力，同时通过和深入根据地的纵深堡垒线，突然出现于正太路上，以有组织的行动，扫清沿线据点之敌人，将沿路的重要桥梁、车站、隧道、水塔等彻底破坏，铁轨枕木或毁或焚，敌半年后始完全修复。第二阶段自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上旬，继续进行交通破击战，惟重点置于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根据地内之敌据点和交通线，其中大的战役有晋冀豫的榆辽战役，晋察冀的涞灵战役，冀中的任丘战役，冀南的破击石德路、邯济路，晋西北的同蒲路之宁武南北段的破击等。第三阶段自十月六日至十二月五日，以反“扫荡”战为中心，在各地次第展开了大的反“扫荡”，时间不一，此阶段内我军又打了几次歼灭战，如关家脑歼灭战等。

在百团大战这个大的进攻战役中，我军毙伤日军二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一百一

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零七人；消灭敌据点二千九百九十三个，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零四里，桥梁二百一十三座，火车站三十七个，煤矿五所，仓库十一所，争取伪军反正者一千八百四十五人，日军投诚者四十七人，解放煤矿工友一万零一百二十人。

百团大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潜在力量的无限伟大，并证明毫无接济的八路军是中国抗战的主力，整个中国战场，抗战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战役进攻。

第三时期——百团大战后（一九四〇年底）至抗战五周年（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一）敌人情形

百团大战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多田骏因其“囚笼政策”之破产而滚蛋，继任者为冈村宁次，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而为致力于“剿共”。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系“治安肃正”之演进，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进攻、统制、奴役和掠夺，把华北变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企图将华北作为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的兵站补给基地。

此时期内，敌人抽走了第二十一、四十一师团去参加太平洋战争，第三师团也曾一度抽走，但不久即被调回，此外又新增了第十七师团，并将第十、十六混成旅团扩编为第五十九、六十九师团，经常保持着十五至十七个师团的兵力在华北。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敌人以“囚笼”为依托，将华北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与“非治安区”（即我抗日根据地），而施行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调“乡村自卫力之强化”，县筑县界沟，乡筑乡界沟，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用圈村办法编制大编乡，肃清内部的“不稳分子”（抗日分子或动摇分子），掠夺粮食物资，以一切方法巩固其占领区，强化其奴役的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头”、“维持”，或制造“无人区”；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墙与碉楼，防止我军深入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严重的摧毁和破坏，企图在人民中制造失败与悲观的情绪。在“扫荡”作战的战术上，则有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而“清乡”、“蚕食”、“扫荡”三者又是密切配合的。“清乡”以巩固其占领地的“治安”，限制我军活动；“蚕食”以伸张扩大其占领地，缩小与割裂我根据地，以便于进行大的“扫荡”；而“扫荡”的目的则是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消灭我八路军主力，以便“确掌华北”，这便是敌人政策的中心目的。

在敌人的千奇百怪的阴谋进攻之下，华北战场的敌我斗争，愈演愈烈，至为复杂，至为残酷，非目睹者所能想象。以“扫荡”而言，抗战第四、五两周年，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的千人以上的“扫荡”达一百七十四次，较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兵力达八十三万八千九百人，较前增加一倍。其中一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十五次，亦较前增加一倍。“扫荡”的性质也愈演愈为毒辣，有所谓“毁灭扫荡”、“抢粮扫荡”等，时间有延长到两三个月的，企图彻底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产、收割，消灭我之“生存条件”，情形是十分严重的。

同时，“囚笼政策”仍然是继续强化，一九四一至四二年新筑与修复之铁路七百五十二

公里，公路发展至三万七千三百五十一公里，封锁沟墙增加至一万一千二百三十公里，新增据点碉楼共七千八百零一个，尤以平原地区为繁密。一九四二年十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谈话："华北碉堡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线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其工程之巨，扰民之苦，是骇人听闻的。这些堡垒、沟坝，都是拆老百姓房屋的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地，强迫老百姓的劳力而修筑起来的。被抓去的老百姓，二、三十人一起做工，稍有怠慢，敌兵即用皮鞭抽打，并有以水泡石灰，使之滚热，将怠工者抛入，而被脱皮烧死的。

由于前一时期敌我"交通斗争"与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和教训，敌人对于交通线、据点的建筑和保护，也采取了许多新的办法。比如，填高铁路之路基。路轨不用螺旋钉钉在夹板上，而改以死钉钉死，使不易拔取与破坏，又在重要地段附近预置铁轨器材以便遭我破坏后迅速修复。公路两旁挖护路沟，深八尺，宽一丈二尺，许多重要公路且筑有平行路，此条遭破击，另一条仍可通行。电杆用钢骨水泥之建筑保护，上悬路灯，每隔三五里置一电话机，不断地联络通报，碉楼筑外壕，架铁丝网，最重要的且通以电流，最毒辣的是利用编乡保甲，强迫敌占区人民分段保护交通，要他们晚间放哨当"肉电杆"，哪一地段遭到破坏，即由该地段附近村庄负责修筑，赔偿损失，甚至屠杀人民，以为报复。这些，就使我们在破坏敌人交通上增加了很多困难。

由于交通线与据点之增加，需要更多兵力配备，同时敌人企图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乃更加大大地扩充与整顿伪军，虽有我军之争取与瓦解，华北伪军在一九四二年仍达三十四万之众，尤以山东为多，占十五万七千人，多半是由国民党地方武装哗变投敌的。国民党在敌后，为敌人培植了不少爪牙，增加我抗战军民的许多困难与负担。

但这一时期，敌人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主要的是：（一）"治安强化运动"之推行，奴役与掠夺分外加紧，民族矛盾空前增长，敌占区人民，无论哪一阶层都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均增加了同仇敌忾之心，便利于我对敌占区工作的开展；（二）交通线与据点之增殖，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愈益暴露，不能不更多地依靠伪军，并分散配备，只得将旧据点的兵力抽到新据点去；使其后方更加空虚，为我造下更多的活动余地，至于伪军的"不可靠"，更是敌人不可挽救的悲哀；（三）日军厌战情绪比以前严重，士气比以前低落，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少敌兵感到返国无望，悲观沮丧与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我要在这里代表华北亿万同胞，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这一时期，日寇在绝望之中疯狂暴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决非世人所能想象。这种暴行并非个别日本士兵的行为，而是日本军部有计划造成的，反之，有许多日本士兵倒是不愿意而被强迫干的。敌人这个政策的名字，就是一提到都令人热血上涌的所谓"三光政策"。在"扫荡"中，凡敌人军行所至，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许多多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杀人之惨，较之吃人生番的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平白无辜的老百姓都被杀掉。八路军兵士或抗日干部被俘获了只有死路一条，有用以训练新兵射击或刺杀作活靶的，有用以训练战犬作猎物的，有被活埋的。杀人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有滚水剥皮的，有挖眼睛的，有抽舌头的，有摘心肝的，有"五牛分尸的"，有将人挂在树枝上劏为两半的。小孩子也被杀掉，并有剖开孕妇之腹以取出胎儿杀戮的。对于妇女的侮辱，更为古今中外所仅有，日寇对中国妇女任意强奸，甚至强迫父淫其女，子淫其母，以为作乐取笑，颠乱我中华民族的人伦和道德，虽疯狂的野兽，也赶不上日本军阀的残暴。敌人梦想其残暴兽行，可以收震慑人心，动摇我军民抗

战意志的“功效”；但结果适得其反，我全体军民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是更加深重，抗战意志是更加坚定，只有消灭日本法西斯才能获得解放，这笔“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我们希望在打败日本以后，能把在华北作恶的那些日本法西斯刽子手，交给华北人民来公审制裁。

（二）友军情形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友军遍布于晋、冀、鲁、豫各省的，号称八十万大军，实际上约有四十八万至五十万人。计中条山周围有曾万钟、刘茂恩、李家钰等集团军约二十五万人，晋鲁豫交界地区有庞炳勋、孙殿英集团军及地方纵队约八万人，山东于学忠、沈鸿烈、秦启荣部及地方保安队约十五万人，此外还有阎锡山部队之一部。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这个数目不能算小，但他们采取的方针仍是：“反共第一”。他们认为敌人“不足虑”，在剿共中容易与敌订“无言协定”（反共将军李仙洲语），因而对敌人则一味观战、招架与应付，求得“和平共居”，更有暗地与敌人谈判投降条件，信使往返于平津、太原、新乡，大摇大摆，毫不以为可耻。而对八路军与抗日人民，则视之若眼中钉，所谓中条山抗日基地实际上主要还是反共基地。庞炳勋窥我太行，阎锡山于第二次反共高潮时（皖南事变），复派四十三军与六十一军袭我太岳，一九四二年李仙洲之率部奉命入鲁，也是为了反共。

敌人抓紧友军之“反共第一”的特点，采取诱降与威逼相辅而行的方针，在“和平”谈判不成时，即继之以军事压力。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敌人发动中条山战役，友军既以“反共”为事，对敌人作战就毫无准备，致使不三日而敌人尽占温、孟、济源、平陆、垣曲等县，全军溃散，被俘达十万之众，有第三十师师长公秉藩以及第三、九、十七、八十、九十三、九十八军之各一部均行投敌，为数约二万二千人。与此同时，日阎谈判失败，敌人进攻晋西南地区，晋军骑兵第一军被击溃，第五十一军的一个团被消灭，骑一师师长赵瑞，骑二师的团长杨诚，都率一部投敌。一九四二年六月，敌在“扫荡”太行我军之余，进攻陵川、林县，新五军暂三师的两个团溃灭，第二十七军四十五师溃不成军，预八师在当时仅得保有两千人，新五军副军长刘月达率部三千人投降敌人。接着敌人又“扫荡”山东，东北军大受损失，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率三个团（约五千人）投敌。这就是友军在这时期内的表现。

此外，这一时期内华北友军投敌者逐渐增加，其较大者有：冀察战区游击总司令孙良诚率部六千人投敌；山东警备处长孙玉田率部三个团投敌；暂编二师师长张步云率部八千人投敌；暂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率部四千人投敌；山东警备第三旅旅长CC分子齐子修率部八千人投敌；新五军四师团长王天祥率部一团投敌。此外，较小的在冀鲁方面的有杜心斋、吴恩胜、周长富、刘经川、高玉林、曹振东、苗春庭、董砚璞、成建基、董鸿儒、徐斌彝、杜孝先、莫正民、高玉璞、蔡吾康、李歧山等多人率领地方武装投敌，给敌人大大扩张了实力，且其中不少为地方武装（保安队等），对地方情形熟悉，为害不小。所有这些人的投敌叛变，国民党当局从无有一纸明令讨伐或通缉，而这时却正是国民党当局高唱“军令军纪”唱得最响的时候，所谓“军令军纪”为何，也就不难了解了。

（三）我方情形

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但我也支付了相当的代价。百团大战时，我军使用兵力的总数为四十万人，而一九四一年曾一度略有减少。同时，由于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下采取了一套新的特别野蛮和狠毒的进攻办法，而我们在初期，还缺乏充分的研究，缺乏一整套针锋相对的方策，因而也曾吃了一些亏。至一九四二年春，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

六分之一，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一，冀中、冀南平原游击根据地变成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处于非常严重的局面，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与锻炼，我们便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寻到了制胜敌人的办法，证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的方针是：一面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同时，针对敌人的"总力战"，我们也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军"，深入到敌人心脏里活动，打击敌人的封锁、割裂和蚕食，使敌人"变华北为兵站基地"的企图归于破产。如果详细说来，则可分别为在根据地、在游击区、在敌占区的三整套办法如下：

（甲）在根据地

我们首先努力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为只有根据地建设得好，抗日的力量增强，才能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在建设根据地上，我们做的工作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实施"三三"制（即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的民主政治；厉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提倡生产，发展经济，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分散建设手工业，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自给，冲破敌人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增设国民小学和中学，加强冬学等社会教育活动，帮助报纸书刊的出版发行，提高人民民族民主思想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加强军区建设，培养地方武装和民兵，将正规军分遣于各分区，并抽调部分军队干部和武器分配给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帮助他们发展，帮助他们训练，以提高其战斗力，建设起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因而一九四一年我正规军数量虽有减少，但质量提高了，而县以下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又是兵又是民的民兵，差不多都较前发展了一倍。

在反"扫荡"作战方面，我们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我们以一部分主力分散开来与民兵相结合，依靠地方游击队与民兵日夜和敌人扭打，敌进也打，敌退也打，不断地袭扰敌人，截住敌人，围困敌人。民兵利用土制的地雷、手榴弹和石雷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所掠夺，以切实保卫人民的利益。同时，我另以有力部队转进敌后，破坏敌人交通，打断敌之补给线，摧毁敌占区的统治机构，错乱敌人的作战布置，主动地制造敌人的混乱与恐慌，然后灵活地集结主力之一部，坚决消灭敌之一部，迫使敌人撤退，粉碎敌人的"扫荡"。这就是依靠地方武装与民兵有力地坚持我腹地游击战争，使二者作为主力有力配合的战法。此时期中之后期，许多次敌人的大"扫荡"，都是在这种战法下粉碎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敌以六万兵力"扫荡"我晋察冀北岳区，敌人事先有周密的计划，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岭上，建筑起一条南北五百里长的封锁线，然后反复合击我腹地，以寻求我主力决战，我即在腹地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同时以有力部队出击平汉线，敌虽坚持了三个月的"扫荡"，但终于支持不住，鼠窜而逃，沿途又遭受我严重打击。又如，一九四二年四月，敌以五万兵力，发动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采取"拉锯捕捉"的办法，企图歼灭我主力，但在群众性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下，其目的终归落空，唐河两岸地区虽为敌一时所控制，但不久在游击战争火焰的燃烧下，又把敌人在大"扫荡"中所获得的些微成果夺取回来了。再如，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伪以八万兵力，对我太行山区实行"铁壁合围"，起初凶猛无比，但当我游击战争展开时，便疲于奔命，终于在我军不断袭击下，被赶走了。

（乙）在游击区

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向敌人展开反蚕食斗争。我们采取充分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有机配合，实行“正面坚持和敌后配合”。在正面，我们组织联防线，以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结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的蚕食。在平原地区，堡垒林立，活动异常困难，我们便创造了黄蜂战，即以地道战（坑道和掩体），坑道爆炸（掘至敌人堡垒下，以硝药爆炸）和地面的游击战结合，以保卫村庄；敌人每占领一个村庄，一条河流，都需支付重大的代价。比如争夺冀中藁无县的一个北堠村，敌人便死伤了七百多人。在后面，我又以武装深入敌占区活动，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推翻伪政权，使敌人腹背受敌，顾此失彼。此外，我又集结主力，乘敌之隙，坚决拔除深入我内地的敌据点，或袭占敌纵深据点，或围点打援，迫敌处于被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至一九四二年秋，敌人的蚕食政策，即归于失败了。

（丙）在敌占区（或敌后之敌后）

以反清乡斗争为主。我们组织了武装工作队，越过敌正面的封锁沟墙、据点、公路，潜入于敌人的格子网内（囚笼里面），在“中国人大团结一致对敌”的口号下，与群众共商对敌斗争的办法，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

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人民结合的一元化组织，也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其成员包括军队中的中下级干部和模范战士、政府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知识分子、敌工干部与日人反战同盟的战友等，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觉悟也较高。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作政治活动，分合自如，出没无常，敌人找不到他们，老百姓却经常会面，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动的、静的各种斗争。其最高准则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一切为着人民利益，为着抗战利益。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的经常工作，是发动与组织人民，展开对敌政治攻势。比如寄慰问袋给日本士兵，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用电话通话，上夜课，占领敌人的会场，宣传我军与盟国的胜利战绩，访问伪军家属，通过他们以进行对伪军的政治工作，总之，用各种方法，燃起日伪军的反战火焰。打击敌宪兵队、特务队及死心踏地、鱼肉人民的汉奸，使之不敢随便入乡勒索人民，减轻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同时对于可以争取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也设法加以争取。摧毁伪政权，伪情报网，解散伪合作社、仓库，使敌失去统制、奴役和掠夺人民的爪牙。反对敌人的抓丁、抢粮，在敌人抓丁抢粮时，予以袭击或截击，以解救壮丁，保护粮食等等。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活动，处处要取得人民的掩护与配合，因而宣传与组织人民为其经常的重大工作。比如，组织“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游击小组、“保众民团”等，增加真正的人民自卫力量，以数村或数十村互通声气，齐心对敌。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生了根，就可以创造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如此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三者相结合的斗争，一方面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停止了敌人的前进，使其压缩与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失败；同时，又在敌后之敌后，解放出许多村庄，建立起抗日基地，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以至游击根据地，使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破产，“治安区”永远不安，其一切吸吮物资，征兵南下的计划均成泡影。比如，敌人一九四二年拟在华北征粮二千万石，结果其所得当不超过十分之一（太谷县预定征粮六万石，结果连抢带买只得三千石，仅及预征额的二十分之一）。在我政治攻势宣传下，日军士

气逐渐下落，一有调往太平洋的风声，士兵们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啦！死啦的！”山西、河北、山东各地，都一再出现日兵集体自杀或失踪事件，石家庄、安阳等地还发生过日兵暴动事件。这样士气的部队，即是有一两个师团调往太平洋作战，效能也要降低。抗战第四、第五两周年，我俘虏伪军三万三千二百九十六人，反正的有九千四百八十四人。此外，被我打散解放的伪自卫团与被征的壮丁，则更不计其数。无怪乎敌酋和汉奸头子王揖唐都叫苦连天，说什么“华北因匪患不靖，兵站基地的一切使命均无法实现”。

这就是我们从敌我的生死斗争中创造出的一整套办法，一整套战胜敌人的办法。

第四个时期——抗战五周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情形，由于交通困难，有些报告尚未收到，有些材料尚在整理，因而只能较简略的谈一谈。

（一）敌方情形

这一时期，敌人经常保持十四个师团左右的兵力。敌人进攻中原时，曾从华北抽调了第三十七、一一〇师团和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第一一〇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已为敌新编师团所接替；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已为申板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师团原在晋东南之三角地区，现为第六十九师团由晋中南移接替，而原第六十九师团所驻之临汾、汾阳地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和特务旅团所接替；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砀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之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

在向我进攻的方针上，自“治安强化运动”破产后，一九四三年三月，敌提出新的诱降政策，即所谓“对华新政策”。这是敌人“以华制华政策”的新发展，因敌占领南洋后，企图利用汪逆的臭招牌接管敌后，以所谓“民族形式和地方形式”来统治和进攻我国。同时，在华北敌占区，敌人还发动了所谓“新国民运动”，为“治安强化运动”的继续，不过其名词较为“温和”一些而已。

“对华新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对付友党友军，并作为欺骗中国人民的幌子；而对于八路军的进攻和压迫，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疯狂和残暴。抗战第六、第七两周年，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千人以上的“扫荡”共一百七十七次，使用兵力为六十一万六千二百人，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二十二次，使用兵力二十九万七千人。此时期内“扫荡”的特点是以“铁壁合围”与“驻守清剿”相配合，即更带毁灭性与长期性。

在“对华新政策”的诱降下，华北友军大批叛变。敌人并以“青天白日”旗帜诱骗善良的农民参加伪军，伪军数量遂较前激增，总数达四十七万，齐燮元的伪治安军，即由号称七个集团军扩大为十二个集团军。一九四三年冬，敌人更大事整顿伪军，表面上由汪逆统一指挥（实际上绝不能达到统一的目的），将治安军、剿共军陆续改编为华北绥靖军，并另扩充伪中央军；逐渐向充实装备，严整编制的方面发展。

（二）友军情形

中条山战役以后，华北战场上友军的实力已大为削弱，剩下的只有在山西的晋军，在晋豫边的庞炳勋、孙殿英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在山东的李仙洲、吴化文（于学忠在李仙洲入鲁时奉命离鲁），此外为一些地方性的武装，如山东的宁春霖、秦启荣，晋豫边的侯如墉等。

这些在华北战场上残余的友军，不但没有从中条山战役失败中取得真正的经验教训，以

求改弦更张，放弃“反共第一”政策，反而变本加厉，更为丧心病狂地采取与敌寇“联合反共”，“变奸伪区（反共将军们给我抗日根据地的称号）为敌区，再由敌区变为自卫区”的“借刀杀人”政策。这明明白白地是在为敌人效劳，和敌人的“以华制华”的“对华新政策”两相心照呼应。

但是，敌人并不完全满意于友军的如此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态度。“对华新政策”中不仅有“拉”的手段，而且有“打”的手段。敌人见“拉”的手段已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已把许多友军“拉”为实际上的奴才，乃进而迫其“明朗化”。一九四三年敌人对友军连续进行军事上的压迫，有所谓“山东战役”与“昭和十八年夏的晋豫之战”。友军精神上早已投降敌人，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招架不住敌人的压力，乃纷纷公开投敌。除李仙洲部有一部退过黄河外，其他如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预八师师长陈孝强、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山东保安处参谋长宁春霖、二纵队夏维礼、三纵队秦启荣、四纵队侯如墉、九纵队李旭东、胶东四纵队王尚志、绥西伊盟游击军张励生等，都在国民党当局“机宜行事”的电令下，纷纷率部投敌，或者说奉“令”投敌。这就是为什么数十将级军官卖国投敌而国民党当局连一纸通缉令也没有的原委。自中条山战役以来，友军正规部队投入“汪逆之伪和平阵营”的，前后约有十五万人。许多部队在投敌以后，番号不变，防地依旧，完全证明了是久已暗中通敌。而我英美盟国援助我国的武器弹药，不但早已不曾用之以打击敌人，而且整整齐齐地公开地奉献给敌人，实堪痛心。今天，这些伪军大多环伺我各抗日根据地周围，充当日寇向我“扫荡”之鹰犬走卒，其行为特别残暴和无耻，为我抗战军民之死敌。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一意孤行的反共反民主政策的恶果。

现在华北战场上仅存的友军，只有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张里元（第三十六师）、赵保元（暂十二师），都是不择手段谋求自己的存在。阎锡山部号称二十五个师，实际每师平均只有一千五百人到一千八百人，大部都背靠后方，与日寇“和平共居”。只有一个六十一军，为进攻八路军与决死队，于去冬与日寇订立协定，在日寇掩护下由晋西南进攻晋东南，形式上好象是在敌后，实际上跟敌人是一家人，也就无所谓了。

（三）我军情形

一九四一年至四二年的艰苦斗争，给我们奠下了这一时期胜利开展的基础。我们继续坚持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更努力于开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对华新政策”，揭穿其各种各样的欺骗，宣扬美国在太平洋上反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以振奋人心，更进一步动摇日伪军，并不断地主动出击敌人，打击敌人爪牙——伪军伪组织。

反“扫荡”作战方面：山东清河区曾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与十一月两次粉碎敌二万人的大“扫荡”。晋鲁豫太行区，曾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与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四次反“扫荡”战中都获得胜利，特别是后一次反“扫荡”战，在主力与民兵紧密结合的作战方针下，依靠着出敌不意的袭击和广泛开展的地雷战、石雷战，显示了我军民作战的很大威力，辽县、武乡境内，凡与敌人接战村庄的民兵，平均每村打死十三个日本兵，每五颗子弹打死一个日本兵，警卫团第五连与民兵相结合，百余人打死了一百二十三个敌人，自己仅有数人伤亡。晋察冀北岳区，于去年九月到十二月，胜利地粉碎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万五千敌人的大“扫荡”，这次“扫荡”，敌人不仅想打击我主力，而且要破坏我秋收及屯粮计划，企图在经济上予我以摧毁，因而我们反“扫荡”作战的组织也十分复杂，一面艰苦作战，一面争取每一分钟时

间从事生产，最后终将敌人赶走，并完成了秋收和屯粮计划。冀东区，曾于去年十月和今年二月至四月，击破敌人的两次大合击，第一次在山海关附近，第二次在锦热路上。

各地我军主动出击和组织远征方面：晋冀豫的太岳区，在中条山友军退出后，即遣军南下，又从敌人手中重新解放了中条山地区，今年四月复攻克沁水等县，前后解放国土一万六千平方公里，我军先头已活动到黄河沿岸；太行区于今春收复林县、榆社；冀鲁豫平原，自德石路以南至陇海路，我军克复了清丰、内黄、朝城、城武、莘县、菏泽等县，并经武工队的活动，开拓了数十块隐蔽的小游击根据地，共解放人口千万；晋察冀的北岳区，去年一年中消灭了敌人五百八十一个据点，恢复和开辟了三千个村庄；冀中，我连克任丘、肃宁、高阳等十余县城。敌人据点在一九四二年为一千三百四十三个，至今被我消灭得只剩下四百九十五个了，冀察热我军北出长城口外，东向辽宁之锦州，热河之凌源、承德，新开辟了将近十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此外，晋绥边区和山东我军的活动均有发展，山东方面已扩张至海岸线。

讨逆战争方面：去年八月，太行我军出动讨伐伪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毙俘伪新五军六千人，伪副军长刘月庭为我击伤；十一月，鲁南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刘桂堂部，将其全部消灭，滋扰华北六、七省，为匪数十年之刘桂堂也为我击毙；同时，鲁西我军讨伐伪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孙逆总部直属队被消灭，伪二方面军甄参谋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人就擒；又滨海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三十六师七十一旅，攻克赣榆县城，活捉伪旅长李亚藩等一千二百人，使之全军覆灭；鲁中我军于去年冬至今年春，曾发动三次的讨伐伪和平救国军山东方面军吴化文部，将吴逆总部各处、伪四十六、四十八师两个师部，以及其部下十三个团消灭殆尽。这些战斗大大削弱了敌人的羽翼，破坏了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某些收获，也使其始终无法由华北战场抽调大批兵力出去，其意义是很大的。

经过以上的许多战役，华北解放区的面积大为扩张，人口新增加了二千万，因而，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军在华北敌后渡过严重困难后的再次开拓和发展的时期。

• • •

目前，我八路军共有兵力三十二万人，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伪军三十余万还不在内）。最多时，曾钳制敌人二十二个师团。

七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七万四千零六十次，平均每天与敌人作战二十九次；共毙伤日军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人，伪军二十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二人；俘日军二千四百零七人，伪军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六人；争取日军投诚者一百一十五人，伪军反正者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一人。这里人数，约等于已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十八万九千零二十八支，轻重机枪三千一百二十挺，各种口径炮四百八十九门。我们主要就依靠这些战利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七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十八万六千五百九十三人，阵亡十万零三千一百八十六人，日伪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二与一。

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事上划分为五个大的军区，即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与山东军区。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西至黄河，宽二千二百华里；北自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线，长一千八百华里，包括华北之晋、

冀、察、鲁、绥、热、辽七省。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达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一千六百多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一百五十八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强。民兵的前途尚可大量发展，可能发展为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它是今天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助手，也是我们将来进行反攻的强大后备力量。经验证明，农业社会动员兵力可以达全人口百分之三，将来反攻时，我们可以动员一百五十万兵力。人力方面在我们是不困难的，食粮也可自给，再配合以强大的民兵作后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

在这些抗日根据地里，我们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居住的自由，法律上一律平等。各级政府和官员，均由人民选举而产生。参议会和政府中，有各党各派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共产党在政府中只占三分之一，被选得多了就自动退出。在经济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而且较战前还好。比如根据晋察冀北岳区的三十五个村庄的调查，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雇农上升为贫农的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七，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点二八；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八点五七，中农经济的比重，急剧增加。文化教育事业也在突飞猛进之中。虽然七年来受到敌人许多严重的摧残，但因我们在战争中始终注意建设，积蓄民力，培养民力，而且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环境中，依靠着丰富的地下蕴藏和资源，一定可以建设起一个自由繁荣的华北，成为民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年来，敌人对我华北八路军的作战，曾用尽许多阴谋与残酷的办法，五易其统帅，由香月清司而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而冈村宁次，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毒。在作战指导上，亦曾变换多次，由"突贯攻击"，"分进合击"，转变到"治安肃正"的"总力战"，"囚笼政策"，"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又转变到"治安强化"与"铁壁合围"。但所有这些，都为我八路军所击破，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我们并不否认，日寇辛苦经营华北七年，是有其某些收获的，主要是交通线与据点的扩张与繁殖。但总计起来，毕竟是得不偿失，且其战果极不巩固，一有变动，敌人就无法控制。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地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

华北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为什么国民党军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不能在华北存在，而我八路军犹能屹然独存呢？为什么强大而野蛮的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相反，我们胜利地坚持到了今天，而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呢？其中道理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首先看看敌人。日寇是一个强大而又野蛮的法西斯帝国，在军事上是占优势的。比如技术比较发达，装备精良，而常备役的军队，久经锻炼，黩武主义的"武士道"的毒中得很深，并且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它就占领了华北所有的铁路沿线和重要城市，无论在作战和统治上，增加许多便利，因而它在七年的作战中有了某些微弱的收获。但它有一个根本弱点，就是在对付我们的群众游击战争中，深感兵力不足，以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常常顾了前方，则后方空虚，集中兵力对某一区域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则其对另一个区域的控制就会削弱。敌人曾以各种办法消灭这个弱点，如繁殖伪军，培养爪牙，作战指导上的"分散配置，联合扫荡"；但伪军不可靠，易为我军争取与瓦解，反而常常要用日本兵加以监视，"分散配置"的结果，使敌守备更为薄弱，处处露出破绽。而且由于战争的持久，敌军本身

的政治素质也日见降低，士气消沉，军纪败坏，战斗力亦不如前。在政治上，日寇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它不仅和我整个中国人民站在对立地位，而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维持正义的各民族相对立，对于日本国内劳动人民说，这个战争也是有害无益的。敌寇在华北的疯狂屠杀和残酷掠夺，激起我全民的义愤和反抗，这种反抗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之下，就特别有力。敌人的一行一动，都遭到我人民明的、暗的反抗和破坏，真正是防不胜防。敌人收买和利用汉奸，并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恩威兼施”的办法。但汉奸究竟只有极少数民族败类去充当，小恩小惠的欺骗笼络，终掩盖不住其残暴掠夺的本质，至于强力压迫的结果，则是压迫愈烈，反抗愈大。日本法西斯是无法弥补这个政治上的基本弱点的。

我们的友军呢？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但装备弹药比起八路军来，条件要好得多。有一个时期，友军在华北的数量要比敌人多，装备也差不得很远，而且有后方的接济。在政治上，按道理说来，应该是属于优势的。但是，可惜这些有利条件，他们都没有很好的加以利用。相反的，他们执行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假抗战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心猿意马，动摇不定，时时求与敌人“和平共居”。驻防前线，不但不知体恤民困，发动民众，取得人民帮助；反而勒索无限，发国难财，随便吊打、杀害人民，有些地方老百姓称他们为“小日本”、“二鬼子”。兵员的补充，不用政治动员，反用抓丁捆绑的办法。部队内部进行的是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教育。讳言抗战，长官们与敌人信使往返，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而士气消沉，兵无斗志。部队与部队间待遇不平等，相互不团结，嫡系歧视非嫡系。步骤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作战时互相推诿，互不救援。当局甚至故意采取离间政策，扬甲抑乙，或抑甲扬乙，唆使互相磨擦，以便驾驭。战略战术公式呆板，缺乏主动性和机动性，平素又毫无准备，敌来只有挨打，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更加上当局对抗日有功者，不独无赏，反而加之以罪，对通敌叛国者，不惟无罚，反而互通声气，保持联络。致使友军一遇敌人，上有叛心，下无斗志，只有溃散或投降两条道路。这就是友军不能在华北敌后存在的基本原因。

我八路军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也处于劣势，技术和装备远不如敌人，也不及友军，且无后方接济，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但是，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意志坚强，士气旺盛，每个连、排、班，甚至每个士兵都可单独作战。作战上高度主动和机动，善于研究敌人，发现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指挥统一，行动一致，部队虽然分散在如此宽阔的战线上，却可以组织统一的战役，敌人“扫荡”某一区域，邻近区域的部队就会自动起来配合，从外线反包围敌人，击敌侧背，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更主要的，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这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这就是八路军所以独能巍然屹立于敌后，制胜敌人的秘诀。

最近，我们获得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于去年八月一日所刊载的《中共军内幕分析》一文，称我军“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战斗技术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和敏捷的行动。”又有伪《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有《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一文，其中对我军有如下的描述：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

的躯干倒在地下，也不要紧。后面的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这枪，使用绳子把它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时候，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暂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拥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的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的”。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拚殴。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八路军战士的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十分恐怖的。我们相信，如果在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上，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必增强百倍。如果我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它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根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炮、反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即会有更多的类似“百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交通线将无法控制，敌人将会更多地被我们钳制在华北战场上，以至将敌人赶出去。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缺乏此远大眼光，不仅无任何帮助，反而多方限制与打击我们抗战力量的增强，这对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十分有害的。

我把华北七年抗战的真实情形，向我们反法西斯的美国盟友介绍，就此结束。

新　四　军　抗　战　始　末*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

陈　　毅

一、向大会献词

大会主席团、大会代表同志们！

很久以来，全国人民都热烈注视我党对大会的准备情形，盼望大会开幕，准备在大会的号召之下进入新的行动以完成消灭日寇和新中国的建设。从一九二八年六次大会以来到七次大会，两个大会之间，全世界与全中国所发生的事变，都严重地考验了我党。今天在反法西斯的远东战场上，巍然屹立着八路军、新四军的坚强的抗日力量，控制着华北华中华南的战略要地，这就是十多年我党经得起历史事变考验的结果。回想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有许多党派，许多军政集团，许多领导人物，在事变锻炼中的升沉兴废，便有力地指出了我党岁寒不凋、独立傲霜的事实。中国革命之持久性及其曲折性，无一处不说明我党处境之艰苦及其奋斗之英勇。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即在各国政党的历史上，恐亦罕有伦比。我党今天领导着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控制着广大的遍及十六省的敌后解放区，拥有广大而坚强的革命干部，更拥有能胜任领导的党中央，最后更拥有伟大的革命舵手、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我党和中华民族的光荣。在今天我党我军成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些成就是值得我们代表大会骄傲的。

在这里让我代表华中党政军民全体向代表大会致布尔塞维克的敬礼，敬祝大会主席团和代表同志们的健康，敬祝我党领袖、代表大会的指导者毛泽东同志的健康。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和其他负责同志的副报告。关于如何打败日本侵略者完成抗战胜利以及建设新中国的各种指示，我认为这些正确分析，是我们中国抗战建国的宝筏和南针。我相信大家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指示之下行动起来，便是中国抗战建国胜利的保证。让我再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使我们代表大会对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以及战后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现在让我来叙述一下党在新四军和华中工作的历史，以及八年抗战的情形，可以看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伟大的抗战工程上前进了好远。同时我还说一说我们在华中今后应如何来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大会的决议。

二、东进抗敌，回忆当初

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是新四军的前身。党领导这些游击队在湘粤闽赣浙皖鄂豫诸山区，

---

* 这是陈毅同志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度过了极其反动而严重的武装“围剿”的年代，这一时代起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由江西苏区长征，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直到是年十月方获得国内和平为止。在整整三年的长期游击战争中，党领导游击队，击破了数百次的严重进攻。对方的进攻，其军事力量常常数百倍于我们，其采用的进攻和清剿的办法，确实是开亘古未有之奇，是异常毒辣和周密的。如封山、封坑、断粮、移民、烧山以及普遍对居民群众的烧杀政策，和苦刑勒逼的自新自首的政策。我现在不来描写当着各个苏区沦陷后人民大众沉入血海，那种茫茫大地无处藏身而被迫起来作最后反抗的悲壮情景。但我需要指出的是，当着那样的革命受挫折的年代，当着人民大众那样的受高度摧残的苦难年代，我们共产党员如果畏惧苦难遗弃群众，群众也将遗弃我们。因此，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共产党员仍然与群众结合作最艰苦的奋斗。我们与人民大众同生死共患难的悲壮场面，确实做到了使受苦难的人民时时刻刻仍然听着共产党的革命声音，看着共产党的政治面貌，伴随着共产党英勇反抗。我们共产党员就在那种穷山野营、风雪饥寒之际，仍然不是孤立的，整千整万的老百姓仍然与我们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共产党与广大人民这种钢铁的结合，就粉碎了一切反动进攻。当着反动派不断改善其进攻办法企图最后绝灭我们时，我们党与群众的结合也就针对着更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反抗艺术。我们把灵活的武装游击战争与地下工作的各种经验综合起来，创造了游击进攻与分散待机的宝贵的革命经验，使斗争范围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公开的、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诸方面，这样使反革命的进攻计划长年累月地流产下去，而我们南方各省边区游击队达到了保持阵地，保持武装，保持党的组织，保持大批干部的伟大成果。因而我们能够高举着共产党光辉的革命旗帜，与人民大众渡过重重难关，以迎接伟大民族抗战之到来，而诞生今天光荣抗战的新四军。

一九三七年秋抗战爆发，在党中央命令之下，南方各省游击队接受国民政府改编，东进抗敌，以符合我党的团结抗日的新政策。这样，南方各省游击队便毅然离开其多年血战保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而远征敌后。计根据地十三个：湘鄂赣边，粤赣边，湘赣边，湘南，闽赣边，闽东，闽西，闽南，闽北，浙南，赣东北，鄂豫皖边，豫南。其中包括的小根据地四十余处，散布计百余县。这种出动，无疑表现了我党是以极大牺牲的精神来实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处处都忠实于自己所宣布的诺言和政策。假如我党中央不决定南方诸游击队出动抗敌，任何外力是无法使我们离开南方山区的。在反动年代能排除万难坚持自己的阵地，而当着抗战年代，又能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献身于国防前线，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武装部队的优秀品质。我们新四军在内战末抗战初，正带着这种革命精神走向抗日战场。

在此我得向代表大会补述一点，即当一九三八年新四军部队先后离开南方山区之后，国民党不久即背信弃义派部队去进攻上述各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以为是可以顺利地去贯彻其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然而事实不然，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又仍然激起了当地人民的自卫反抗，这种自卫战争一直继续到现在。其最显著者如闽北之崇安、邵武，浙南之平阳、龙泉，闽西之永定、上杭、龙岩，粤赣边之信丰、大余、南雄，湘粤边之宜章、乐昌，湘赣边之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永新、茶陵、莲花及其他各地，又被迫重新拿起自卫武装。这又给国民党反动派以严重教训，使他们知道这些地区具有政治觉悟和团结的人民是不可欺侮的。他们打游击已经超过十年以上，他们所遭遇的艰苦斗争的环境和独立奋斗的精神，是值得全党学习的。他们坚定的革命的心，始终是向着我们党，向着我们代表大会，向着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及其所统率的八路军、新四军的！

当新四军出动之前，我党在华中以及东南各省早保持了地下工作，这是在各种国内迫害之下所保存下来的骨干。抗战爆发后，我党领导了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民众抗日运动。京沪沦陷后，我党一面保持着上海的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据点，一面分散在京沪杭三角洲的农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同时，许多出狱的共产党员亦归田高举武装反对日寇侵入农村。此外，华中各地更有党外人士亦徒手起自田间作保卫家乡的抗战工作。因此，在华中我党的地下力量与当地人民结合，早就组织了许多游击武装，准备着华中敌后抗战的胎盘。新四军东进使骨干与外围力量两相汇合，便强有力建设了横贯江淮河汉遍及大江南北的华中解放区大战场。

三、侵略、投降与反抗之交织

华中解放区，包括苏、皖、浙、鄂、豫、赣、湘诸省地区，贯穿长江中段和长江下游，位置恰在江淮河汉之间。包含江淮平原、湘汉平原、苏南平原、河南平原。华中地区，人文荟萃，物产丰饶，在全国来说，首屈一指。敌寇进军以来，即盘踞京沪武汉诸大城市，努力经营，认为“华中是大东亚战争的屯兵场”，是“中日满协同体的高度结合地带”，是“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在政治上，敌寇保留了汪精卫式的“国民党”、“三民主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新国民运动”、“新经济建设”、“政治反共”、“清乡反共”、“拥护最高领袖”、“最高领袖万岁”的中国式法西斯全套把戏，同时敌寇还在形式上“承认”汪伪政权。他们是考虑到，经过汪精卫来屠杀中国人民，是比一切都自己动手要更乖巧一些。敌寇对华的分治宰割政策，表现在分别建立“满洲国”、“蒙疆国”、“华北国”、“华中国”等的具体部署上。敌寇需要大小不同的各种狗腿，但不愿众狗腿之中有一总管，这就是从溥仪、王克敏到陈公博求当奴隶总管而不得的悲哀。在军事上，敌寇除自己的军事控制之外，还着手建立伪军以作为进攻我国之前导，以政治诱降和伪逆为媒介，策动国民党军队投敌。在经济上，敌寇是以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总揽华中经济掠夺事业。这个会社是与华中派遣军的头脑各重要军官保持密切联系。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配合得十分好。华中振兴会社下面已设立了十四个子公司，计有华中铁道、华中矿业、华中水电、上海内河轮船、上海恒产、大上海煤气、华中水产、华中蚕业、华中纺织、淮南煤矿、华中公共汽车、华中电讯、华中盐业、华中振兴住宅组合等。这些庞大的侵略组织先后开始于一九三八年，近年已逐渐完备，企图由城市深入乡村。据初步估计，总投资额在二十万万日元以上，其中部分吸收了中国股份。敌寇在各经济部门除保护日资领导地位外，还用各种办法吸收中国资本为其服务，视其服务大小给以部分余沥，诸如在政治上“废除不平等条约”，经济上交还工厂等等。这便是以汪逆为首所代表的中国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对敌寇感激涕零的来源。在文化上，提倡“中日文化交流”，“文化联欢”，提倡“读经救国”，“孔孟道统”，反对英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邪说”等。敌军所到之处，组织随军文化征集队，来搜集中国文化古物，如字画、古书、金石、钟鼎之类，作大规模的文化盗窃。京沪杭公私收藏，为之罄尽。

这就是敌寇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各方面使中国全部殖民地化的设施，也就是在华中做出一个灭亡中国的榜样。这样就确定了敌我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从各方面展开了白热化的战争。假使说新四军与敌汪的斗争仅限于军事斗争，那是大大的错误，虽然军

事斗争在其间是主要的。我们以政治上的民主设施以对抗敌伪之黑暗虐杀；以解放区生产建设、安居乐业来对抗敌人的经济掠夺；以解放区之大众抗日文化运动来对抗敌汪的复古文化和麻痹文学；以我党领导的全体军民的坚持抗战来粉碎敌人的扫荡；以敌后抗战的艰苦成就来遏阻敌汪所掀起的投降潮流。几年来，每当国民党叛将高举投降旗帜，举国震惊，敌伪弹冠相庆之际，重庆抗战中枢，却噤若寒蝉，束手无策。只有我八路军、新四军能振臂兴起，毅然讨伐叛逆，以伸张抗战正气，稳定人心。这真是人人称快的壮举。我们站在八年抗战历史的尖端上来看，今天在华中亦已准备着一个消灭日寇，配合盟国的抗日战场。如果在华北华中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坚持，一任敌寇占领，如十几年前的占领满洲故事，一如去年一年敌寇席卷河南，囊括湘桂，染指滇黔的故事，则可断定全国抗战战局必早已全部失败。这最足说明新四军和华中敌后人民在京沪武汉坚城之下苦斗八年的伟大贡献。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八个大字期望新四军，这是就新四军的成就和它所处战略地位，课新四军以反攻任务。我新四军全体将士愿勉力从事，以副人民的期望。

四、抗日战旗，遍插华中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江北军第四支队进抵敌后巢县、无为地区，第五支队随后继进，越津浦路进入苏皖交界地区。是年六、七月，我江南军第一、二支队进入苏南，直抵镇江南京城下；九月以后，东进入苏、锡。一九三九年更东进抵达淞沪近郊。一九三八年武汉、徐州、开封相继沦陷，我党我军即留在敌后及其侧翼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为我党我军开辟华中敌后解放区的一年，抗日战旗便普遍竖立于华中各沦陷区。

这个时候，国民党大军败北，退如水洗。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卷旗而逃，国民党党部销声敛迹，其中还有不少败类相率投敌，卖国求荣。国民党惨澹经营之江苏模范省，原来不堪敌寇一击。南京城内，则“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南京城外，则明孝陵与中山陵相对饮泣于斜阳衰草之间。东南数千万人民日夕在敌寇烧杀、伪匪抢掠之下，莫不西望掩泣，无处逃生。敌寇军队，三五成群，可以任意下乡，可以任意选择其蹂躏奸淫之对象。我新四军之闯入敌后，如对巢县、无为之袭击，卫岗、龙潭之攻取，丹阳、武进、句容之围攻，江都、大桥、扬中等地横渡长江之穿梭游击等，这些战绩乃使敌寇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一支新四军之存在，乃知道侵略中国才是一个“出血的战争”。东南数千万同胞得着我党我军之领导，欢喜如狂，乃停止跑反，转而配合军队作战。我军得着广大人民的帮助，便如虎添翼，开辟了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的伟大场面。

我们这个时候的行动方针，是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大胆东进，以模范的纪律、灵活的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大法宝，到敌后去创造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个指示立即在实践中取得伟大效果。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了敌寇。一九三八年春，敌寇十五师团驻金坛的金子联队长推称：“新四军的游击战术是百战磨练过的回旋打圈的游击战术，皇军不可敌。”我军借东西还，坏东西赔；住屋借住偏房，不入正室；讲话如见亲故，常带笑脸；打仗掩护人民先退，行住不动一草一木。人民决然选择了与新四军站在一起来共同反对敌寇。老百姓怕兵大爷的心理有了历史的改变。我党我军讲抗日建国的大道理，拿这个大道理去调解东南各地人民间的矛盾，如城派与乡派的矛盾，新派与旧派的矛盾，土著与客居的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对土匪不用剿灭政策，而用抗日改造政策。

对伪军伪组织用争取反正和彻底消灭其中坚决投降分子的政策。对当地人民武装不用改编吞并政策，而用扶助其抗日发展的政策。对沦陷区的国民党员采用共同抗日合作政策，予他们以各种帮助。以上正确的政策便团结了各阶层人民，调动了各阶层力量去打击敌寇，获得了胜利。我党我军在敌后的领导地位，便自然形成了。

五、反扫荡与反投降

从一九三九年起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为止，这一阶段是敌寇与国民党反共军对我党我军的夹击阶段。敌寇见我军在敌后之发展予他以致命的威胁，乃大举进行不间断的扫荡。汪逆精卫于一九三九年以儿皇帝的姿态僭位南京，煽惑国民党军队分批投敌，更助长敌寇凶焰。敌汪对我军举行了疯狂的联合扫荡。在这个时候，国民党见我军在敌后打开局面，站稳脚跟，知道敌后战局大有可为，乃分批遣军插入敌后，向我军作所谓收复失地的工作。他们接连订出几路夹击新四军的计划，亦即从江南江北，从南面西面北面各路围攻新四军的计划。我军临此危局，一面对敌汪的联合扫荡举行有力的反扫荡，一面对国民党反共军的武装进攻采取严肃的自卫方针。经过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正确指导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南下亲临指挥，经过全党全军的努力，经过两年的苦斗，一九三九年苏南的迭次反扫荡战役，一九四〇年秋淮南反扫荡战役，一九四〇年春皖南铜繁反扫荡战役，一九四一年春苏北讨伐李长江、杨仲华叛国投敌的泰州战役，便粉碎了敌伪的进攻，保持了我之根据地。同时，在江北苏南皖东各战役，举行了自卫，击破了国民党三路消灭新四军的计划。这一胜利教训了敌伪：华中新四军和华北八路军一样，不是几个扫荡可以消灭和赶走的，敌寇才检讨自己的错误，订出一九四二年以后的清乡计划。这一胜利教训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知道新四军是不好欺侮的，乃决心由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订出了歼灭新四军在皖南部队的计划。他们是先以计诱，督促叶、项率队过江，然后以七万大军围歼我军于行军途中。严格说来，皖南事变不是一个什么战争，而是国民党头子蒋介石利用其抗战统帅地位，布置陷阱以歼灭其部属的罪恶阴谋。叶、项的错误不在于违抗命令，而在于忠实的服从其命令，蒋介石的长处在于懂得"君子可欺以其方"，在施阴谋诡计上，叶、项败于蒋介石之手，在坚持抗日团结的正义上，蒋介石败于叶、项之手。皖南事变把蒋介石和叶挺推到国际反法西斯的正义的法庭上。叶挺将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正气，蒋介石自己丧失其抗战统帅的地位，堕落到流氓政客军阀的可耻地位。皖南事变时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计九千余人，大部被歼，突围者千余，即今天新四军的第七师，现在有了几年发展，已有二万余人，忠勇将士的努力是极可奖励的，很快从敌伪手中补偿了自己的损失。又皖南事变的损失仅及当时全军十万人的九分之一，故新四军在敌后的地位和实力并未损伤。经过皖南事变，全世界全中国的公论，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举行皖变的目的，在于与敌汪配合反共，是其预定的停止抗战投敌汪的一个大胆尝试，而新四军经过此役则成为具有国际荣誉的抗战军队。

我们更重要的是来回想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处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的经过。我党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总方针，以强大政治攻势揭穿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诉诸国内外舆论，以坚持军事自卫方针，稳定敌后阵脚，发布了成立新四军新军部的命令。我们把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国府纪念周上对新四军事件的讲话，和我党军委于一月二十日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与谈话两相对照，加以研究，则露骨地表现出蒋介石半吞

半吐、欲盖弥彰、腰痛腿软、语无伦次的鬼脸，而我党则词严义正，着眼大局，代表了全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团结，反对反共投降派的伟大心愿。所以皖南事变的事实结论是：蒋介石国民党从抗战的中枢地位下降到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狭小集团利益的地位，丧失了全国人心，失掉了国际同情，鼓励了敌寇汪伪。反之，毛泽东、共产党上升到主持抗战团结领导全国的地位，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获得了国际的同情，严重打击了敌汪策动国民党投降的阴谋，稳住国民党保留在抗战阵营之内。毛泽东同志的坚强领导，又一次树立其举止动静维系天下国家安危的革命模范。

回想这几年的抗战局势，有各种各色的投降理论和各种各色的投降方式：例如"身在曹营心在汉，我降汉不降曹，即降汪不降日"；例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投敌是为了抗战"；例如国民党在敌后部队的联日反共的"曲线抗敌"政策，制造出国民党军队的投降潮流等等。因此，有汪精卫的投降方式，有庞炳勋、孙殿英的投降方式，有李长江、杨仲华的投降方式，也有陶希圣、高宗武、吴开先、方先觉等的投降方式，还有隐藏在国民党大后方与日寇秘密来往的亲日派，他们多年干得惯熟的隐藏的投降方式等。不管是旧式投敌的关夫子，也不管是新式投敌的汪总裁，也不管是经过北庭同意回相南朝的新秦桧，他们无一不以反共反人民为其卖国求荣的理由。我们共产党为坚持抗战，对一切民族败类，都在口诛笔伐和兴兵剿办之列。没有我党我军历年来这种坚决反投降的精神和部署，要克服投降潮流，要坚持八年抗战是不可能的。

六、残酷的清乡和敌进我进

一九四二年以后，敌寇把其失败了的分路扫荡计划提高为集中全力进行大规模的残酷清乡。清乡计划之前，敌伪共同组织了国民党内战五次围剿的研究委员会，学习国民党内战经验，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乡方针。以敌军担任攻击和包围，以汪精卫国民党和伪军担任清查户口，建立清乡区整套政治、经济、文化的伪化工作。其进行步骤是：第一军事清乡，企图击破我军力量；第二政治清乡，企图摧毁我之地方党部、地方政权和群众团体；第三经济和文化清乡，厉行各种捐税榨取和物资没收，以及自首自新的投降归化政策，同时进行建设"东方王道乐土"的各种文化麻醉和欺骗。在进行方式上是从军事清乡到政治清乡，从经济清乡到特务清乡，从文化清乡到思想清乡，从武装清乡到和平清乡，从集中清乡到分散清乡，从短期清乡到长期清乡和所谓机动清乡。这一整套办法企图完全驱逐我党我军在长江下游的敌后抗战势力，企图把我华中解放区摧毁变为和平反共的清乡模范区以贡献和服从于大东亚战争。

在这样敌伪清乡扫荡新阵势下，严重地考验我党我军，于是敌伪与我党我军的白热化的斗争便展开起来。从一九四二年春到一九四三年末在江南如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江宁等地，在江北如泰州、江都、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启东、东台、盐城、兴化等地，在湖北如孝感、黄陂、黄安、应山、汉川、应城、潜江等地，进行两个整年的清乡与反清乡的残酷斗争。这些地区的敌我斗争成为华中敌后的最前线决定胜负的场所，其紧张斗争的场面正与敌寇进攻的华北各解放区的残酷达到同等程度。我党我军执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散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执行了精兵简政政策，执行了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配合的新斗争办法。主力兵团的相机转移和相机突击，地方兵团和民兵的就地游击就地坚

持，地方党政机关的全部军事化游击化，在任何情况下留原地分散隐伏坚持斗争，任何情况下保持与人民的联系，使自己的抗日指导不致中断。昼伏夜行，分散游击。对集中的敌人采取袭扰，对分散的敌人采取围歼，对下乡的伪军不让其安全回到原地，对清查户口的伪工作人员，其坚决为敌寇服务，则予以击杀，其动摇可以中立的分子，则争取其留在敌寇附近，替抗日服务，以功折罪。同时敌人集中在某一地区清乡，则我各友邻区同时出击，加以援助，使敌寇顾此失彼。这样正确而灵活的对敌方针，打破了敌汪清乡计划，而我解放区党政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锻炼得更其坚强了！

在一九四三年秋以后，我党我军知道敌寇清乡之伎俩日新月异，为了制止其凶焰，乃进一步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敌向我区清乡，我则向敌区游击，敌我之间发生不断的回旋纠缠，造成两不相下的相持局面，这样才达到各解放区之能坚持而且能向敌伪区作新的扩张。古训“寇能往我亦能往”，这是我军对付敌寇清乡的新的斗争原则。

我可以引几则敌寇方面对我军反清乡的观察来作一个证明。一九四四年三月敌寇上海《每日新闻》、《文友》月刊日人武克所著《共军内幕之分析》一文内称：“皇军占领的地方，也是新四军出没的场所，他们盘踞广大农村，造成对皇军据点的包围，不断扰乱皇军占领区的后方，进行交通破坏，用以孤立和封锁城市，使皇军一无所获，而皇军的补充接济也受到阻碍与阻隔”。又称：“共军以小股游击吸引其他处各地的皇军部队，而以大力集中以围歼某一路皇军，其唯一目的便是控制据点以外广大农村，置于其统治之下。”一九四四年一月敌寇上海驻军第十一军团司令部派参谋团对我苏中地区的清乡视察报告书上说：“新四军进入苏北，历史虽短，但其影响民众，不可忽视，苏北清乡敌人最大的为新四军，故自去年四月一日以来，开始集全力于扫荡工作，但新四军之反清乡扫荡工作，亦有极强之基础及组织。故一般方式之扫荡，殊难收肃清之效。新四军之长处，不仅在其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而尤在其对人民之组织力量，统一民众，导以一定方向以结成有组织之力量，其方法殊可为吾人参考。新四军尚留存于江苏农村间，因此不能不认清问题，因其于本地区有地盘有组织，故能有今日之强大反抗力量，事甚明显。”这便是敌我清乡斗争中从敌寇口中所做的一般结论。我不必更多征引。敌寇在抗战初无敌于世界的骄横气概，在长期扫荡清乡失败之余，也不得不承认一些事实。足见我党我军的铁拳已把日本帝国主义教训得多少老实一些了。

七、破坏与建设的比赛

上面只说了反清乡反扫荡的各种工作，这只是敌后斗争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在敌后斗争中我党我军的伟大的建设工作。不打破敌伪扫荡，则我党我军根本不能立脚，大好河山已非我有，一切无从谈到。但如仅仅在军事上解决了立脚点的问题，而不从事各种必要的建设，则这种军事斗争也绝难持久。因此敌后的军事胜利所以掩护建设工作而建设工作所以支持军事胜利。军队胜利是使用力量消耗力量的，各种建设工作是积蓄力量保存力量以供长期使用的。八年来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的工作贯串交织着这一基本特点。

我们建设工作是在敌寇侵略破坏之后的废墟上进行的，是在严重的敌情包围中去进行的，是以连串的短期突击方式去进行的，是在一面服从战争利益，一面大度爱惜人力物力财力的原则之下去进行的。我们的建设可归纳为三大项目：第一，群众工作建设，第二，军事建

设，第三，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建设，是从人民的切身利益、经济利益的提高改善做起，从减租减息到组织训练广大人民，提高其觉悟，把他们动员起来，成为强大的抗日力量。几年的群众工作，把华中三千万人民统统组织起来，这一支人民抗日大军成为敌后党政军的强大基础。

当我党我军一九四二年开始组织华中大多数人民的时候，亦即开始彻底进行减租减息的时候，数百万人民纷纷起来，以独立的人格，自己起来自己作主，自己起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起来管理自己，并奋勇参加抗战。这种伟大群众运动场面，震动了每一农村角落。其热烈欢欣，手舞足蹈之状，是将数世纪不公正不人道的租佃制度加以照顾双方的改订而引起的。这个时候立即引起士绅朋友们中间的分化，一部分开明士绅赞成我党我军的群众政策，一部分怀疑我党我军的群众政策。我党为抗战利益、为了带领千百万人民进入抗战，贯彻了自己的坚定的群众运动方针，打破来自任何方面的阻挠和反抗。而且在减租减息之后，紧接着提出改造基层政权、武装群众和发展大生产运动的新方针。这一系列工作之完成，一到敌寇大举扫荡，几百万人民就配合我军出来应战。人民参战的胜利事实，证明了群众运动的力量直接表现在抗敌救国保乡自卫上面。于是一切对群众运动怀疑的人，也翻然觉悟到我党政策之正确，才知道我党群众政策是照顾各阶层的抗日救国的正确政策。我们曾亲自劝告那些怀疑主义者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压迫是应该反抗的，日本的鞭子打在我们身上是痛楚的。但是我们中国的统治阶级的鞭子，打在中国人民身上，同样也是痛楚的。鞭子的形式有日本式与中国式的区别，但其痛苦则是一样，这中间并无民族性的分界线。假如我们真心抗日，要从放下一切鞭子做起。假如有人只愿放下日本鞭子，而要保留自己手上的鞭子，保留自己有打人的特权，这不仅太不公道，而且自己拿鞭子先打走一切中国人，谁来共赴国难呢？"这个话，说出了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实施民主的必要。企图长期奴役工人农民，企图在抗日战争中利用人民去为他火中取栗，而仍然企图原封不动保持其封建专政，这个思想是太反动太落伍了。经过三次大革命的中国人民，有共产党同他一道是再也不能随便愚弄的了！请反动专家们睁眼看一看，今天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全世界反动法西斯走到绝灭的时代啊！

我更要指出群众运动发展不仅放在武装抗战方面，而且更放在大生产运动方面。华中几年来的生产运动集中在兴修水利、改良农作、加强劳力互助、提倡纺织事业、发展合作事业、与灾荒蝗蝻作斗争，以及军队和机关的菜蔬自给等。在这些生产运动中，实行了武力与劳力结合，即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在生产工作中产生了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救灾斗争中产生了大批的领导人材，并开始学习和掌握技术。这样的群众运动是真正的建设性的群众运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安放在这个伟大的生产运动的物质基础上面的。

我们的军事建设是将主力兵团、地方兵团、民兵人民自卫军三者造成强固的联环。民兵人民自卫军基础广大；地方兵团，如独立团营，县、区、乡武装，各边区游击队，承上启下；主力兵团，则充实强大，起着军事上政治上的代表作用。三者互相依靠，互相配合，造成解放区强大的军事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在我主力兵团已不是初期进入苏皖时代的江西客军状态，它今天已地方化群众化与当地广大人民溶合，组成了华中人民的子弟兵团了。而我之地方兵团和民兵已不是安土重迁的旧型农民部队，它经过战争的锻炼，经过群众运动的教育，能征惯战，有志四方，业已逐渐提高其战斗的水准了！我们军事建设的总经验是把保护广大人民的当地利益与反扫荡反清乡的全国抗战利益相结合，故能在千百万人民的拥

护之上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基础。

华中解放区的政权建设，首先废除了封建专政的保甲制度，建立了人民的民主的会议制度，这不同于苏维埃式的工农代表会议，因为它包括了各阶级人民在内。它不同于各种参政咨询机关，它直接由人民自己作主。它是经过民主选举的立法行政机关，全乡人民代表大会是全乡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取决于多数。人民能依照自己的愿望来兴办各种事业，来调处相互间的纠纷。在区、县、专区，各级成立了临时参议会，由各级参议会选举行政委员会主持政务。中共中央规定在各级政权机关共产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的实施，使当权的共产党让出席位给党外人士，造成了各解放区民主政权成为各阶级联合主政的实体。于是华中各地许多国民党员皆以国民党员身份积极参加政权工作，许多非党人士同样参加主持各级政务。中华民族各阶级的亲密团结在各解放区便真正实现了！共产党与新四军只有拥护政府的权利，而无干涉政府的特权；共产党员与新四军的官兵只能以抗日公民的同等身份，在政府领导之下从事行动，与其他公民受同等待遇。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权形式，是适合抗战建国需要的新政权形式。在此政权形式下，人民自己有权去建立自己所愿意采取的生活方式。几千年来的封建奴役的丑恶劣迹一扫而空。华中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生活在经过自己同意的自由民主的新国土上。这一自由国土正待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去而最后完成。

这就是敌寇大举扫荡破坏了我们一切，而我党领导广大人民利用反扫荡间隙不怕破坏去进行了伟大建设。这些建设今天才开始，它本身带着浓厚的应付军事的初创色彩，不完备之处甚多，也难免犯错误和走一些弯路。但是经过八年抗战胜利的事实，指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方向是中国人民的民主胜利的新方向，这一点已经成为真理。敌寇之破坏与我之建设两相比赛，我们是胜利了。

八、认识困难和克服困难

在上述八年的胜利斗争的进程中，我们是否遇着一些困难呢？我回答，我们是遇着极大的困难！第一，是敌寇的扫荡清乡给我们各种工作以威胁和妨碍，许多工作旋做旋辍，平常一二月可做成的，非改为一年二年去坚持不能完成；第二，是从国民党顽固派方面来的各种破坏，如军事进攻、特务捣乱等，直到今天，在华中的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仍未停止；第三，我党我军是一个独立抗战的军队，无外来任何接济与帮助；第四，最初敌后的现有条件均经过敌人的破坏，即令保留了一点，都是国民党铸就的腐朽的旧制度，不适合抗战救国之用，一切有待于自己重新创造；第五，敌后是广大农村，分散和被分割，不便集中指挥，一切经济生产条件，也是较落后的，直接动用以支撑战争的效能是小的，一切非加以改造和提高不可。

我们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呢？我们依照从多年实践中得出的克服困难的几大信条：第一，就地取材，不鄙视落后的低级的条件，一切条件加工后即可大用；第二，是自己动手，不是坐吃山空；第三，是向人民学习，不自高自大，不好为人师；第四，是取给于敌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夺取敌人武装武装自己；第五，是上下团结，党政军民团结，以人和去利用地利而造成强大的政治优势（天时）去战胜强大的敌寇；第六，依靠我党我军八年来支付了极巨大的血肉牺牲。在与敌伪的战斗中，有数万名战士捐躯殉国。其中包括党员和许多非党同志，例如西北军宿将鲁雨亭先生，合肥童汉章先生等皆毁家纾难，赤诚为国，率队

加入我军与我党并肩作战，或光荣殉国或积劳逝世，例如我党同志中先后光荣殉国者计有彭雪枫、邓振询、巫恒通、彭雄、田守尧、杨学诚、林英坚、胡发坚、龙树林、罗化成、罗忠毅、廖海涛等同志，以及在皖南事变中被难的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张正坤等同志，共计团以上干部百六十余名，营连排干部二千余名，阵亡战斗员同志计六万余名。这些损失皆四方英才，十年精锐，贡献抗战事业铸就了伟大的成绩，其壮烈英勇，照耀人间，永志不忘；第七，依靠华中各解放区内的开明士绅予我党我军以各种帮助，例如已故有韩国钧先生、邹韬奋先生等，皆以党外人士资格帮助我军甚大，韩先生殉国，华中军民将其故里划为紫石县以永留纪念；邹先生殉国后，其服务大众的文化思想已在华中深入传播，永识典型。现在各地均有党外人士逐处与本军并肩作战，成为本军之臂助。特别是香港南洋华侨、上海文化界、产业界工人、青年、妇女等人民团体，关怀本军，同情我党，几年来不断予本军以精神的物资的援助，贡献甚大。总之，没有上述各方面的帮助，则我党我军之坚持华中抗战将是更困难的。我党我军特别努力自勉，以副他们的期望。

最后还依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为我们指示方向，调节进度，指示各种克服困难的方法，以各种远见和估计，随时提醒我们，使我们在转弯抹角中间少犯错误，能稳步地前进。今天敌后的抗战尚有更多的更新的困难等着我们，我们应更有准备的去迎接它，克服它！

九、准备反攻和迎接胜利

现在的战争形势，正处在准备反攻与实施反攻的过渡环节上。我党我军应准备一切力量去实施反攻。在这之前，敌寇可能最后大举扫荡敌后，我们仍然不能轻视敌寇的力量，努力坚持现在局面，努力准备反攻，争取反攻胜利，这就是在目前过渡环节上的把握点。

为了顺利渡过困难，完成反攻准备：第一，必须努力练兵，提高战斗力，必须研究用兵之道，提高作战方法。必须总结带兵养兵的经验，饱腾士气，准备厮杀。总之，练兵习武，成为我们目前的中心工作。目前华中新四军计正规军三十万，民兵八十万，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一切军事工作是如何把这个力量训练得更好和组织得更好，以备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之用。

第二，就是巩固党政军民的联系，以便以全力迎击敌寇疯狂扫荡，过渡到反攻局势。我们要估计到华中现有三千万人民是坚持现有局面和反攻敌寇的伟大力量。我们党要检讨自己的政策和领导艺术，能否胜任愉快去统率这一支民族大军。党员的模范作用，党部的指导能力，党的工作方式和民主作风，都要加以提高和改善。要善于出主意，善于使用干部，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保持与广大人民联系。要在坚持时期，咬紧牙关，冷静思索，不惊慌失措，能扎硬寨，打死仗。要在反攻时期，头脑清醒，勇猛迈进。当时的复杂战局所引起的烦难的军事政治问题，我党要首先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有各种准备，才能受得起考验，领导军民到最后胜利之路。

第三，就是广泛在敌军中伪军中展开政治攻势，从事实上指明决定胜负之日将要来临，他们应该选择将功折罪的自救的道路。根据八年来我党我军在敌伪军中的政治声威，这一颗政治炮弹的炸裂将成为敌伪军机构内部的延烧物，可以估计到其帮助战争结束会是很快的。

第四，就是在敌占区的城市和农村中，作各种确实而坚强的可靠准备。以组织地方军为

工作中心，以便适时发出消灭日寇的雄伟号召，使他们进入行动，配合我新四军大军的进攻，去犁庭扫穴，清残除秽，以完成抗战大业。

第五，就是配合盟国军队登陆作战。华中华南海岸线很长而且辽阔，十之六控制在我新四军手中，盟国如选择在这些地点登陆，我新四军是早有配合作战的准备的。我新四军本身可以立即出动的力量和在广大人民中间能动员起来的力量是很大的。如果作一个具体确切的估计，则今天时机尚未成熟，我们不愿言之过早。我们请日本侵略者等着那最有决定性的一天。

第六，就是抗战胜利之日，应该是民主中国全盘实现之日。全国军民应警醒起来，力阻反动派偷取血战八年的果实，企图继续其反动统治。特别在华中的我军，应以清醒的头脑，独立抗战的姿态，去保持抗战果实真真能落在有功抗战的人民大众手中。

以上就是我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对我党我军在华中已经做过的工作和将来要做的工作作的说明，谨待大会鉴核和指示！

我敬祝我党七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和成功。

〔附〕何应钦对（国民党）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摘要）

（自三十三年五月至三十四年五月）

关于作战部份，就八年来之作战经过，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报告：

子、第一期

自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起，至二十七年十月底武汉会战后止，本期作战指导的总方针，在确立持久抗战的基础，不惜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消耗敌人兵力，并使敌备多力分陷入泥淖而不能拔。抗战开始，敌人战略在利用优势兵力，向我连续大举进犯，企图歼灭我野战军，摧毁我抗战力量，敌一面在华北发动，一面又在上海登陆，掀起淞沪之战，经我猛烈抵抗，敌军在华北、平汉、津浦、平绥、及华中各战场，不断增援至二十余万人，时间持续到三个月，毙伤敌军约六万余人，尤以上海及晋北忻口会战，予敌打击最大。

二十七年初，中战场敌军已进据南京，津浦线敌已进抵鲁南，为企图打通津浦线，控制陇海东段地区，于三月下旬以十三个师团兵力，由南北两方会攻徐州，作战时间达两个半月，因我官兵之英勇奋斗，造成台儿庄的大捷，在徐州会战以后，敌欲摧毁我抗战力量，在五月初，企图以大兵由津浦平汉两路直捣武汉，因黄河的改道，泛滥的大水将开封郑州隔断，使敌主力无由南进，但在中战场方面，敌军以十二个师团的兵力，于六月起进犯武汉，我军节节抵抗，会战持续到五个月，虽武汉于十月二十五日撤守，而我大后方一切抗战工作，因之取得准备时间。

总计本期敌我除进行上述四次大会战外，尚有重要战斗二百七十五次，共毙伤敌军约七十万人，我军亦伤亡约一百万人。

丑、第二期

自二十七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止，本期作战指导的总方针，在完成持久抗战准备及争取与国，以待国际形势的转变。

自武汉会战后，我军大部已转至山岳地带，敌军在我战场的兵力，虽有二十八个师团之众，但因备多力分，速战速决的企图已告粉碎，因之他的作战方略，已由速战速决，改为以

战养战，其指导要领，虽历年不同，但战略守势，战术攻势的基本方针，迄未少变。

二十八年，敌在我国兵力已达三十五个师团，于三、五、九、十一等月，相继发动南昌、随枣、第一次长沙、及桂南等四次会战，除南昌南宁陷敌外，进犯长沙之敌被我彻底击溃，进犯随枣之敌，亦受重大打击，同时我军主动的发动四、五、九月及冬季攻势，普遍予敌以打击。

二十九、三十两年，敌军在中战场，曾发动枣宜、上高、第二、三次长沙等会战，除宜昌陷敌外，我曾以反包围战法，击溃进犯上高之敌，并在湘北造成第二、三次长沙大捷，在北战场的敌军，曾发动豫南会战，被我击溃，惟五月间之晋南会战，使我孤悬敌后的中条山陷入敌手。

本期我军对敌作战，已改整然攻势为游击攻势，即以第一线部队编组出击队，经常轮番出击，消耗敌人，同时伺机抽调兵力集中整训，以加强战力。

寅、第三期

自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大战起，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底湘桂战争告一段落止，本期作战指导的总方针，在牵制敌人的兵力，迟滞其南进，使盟国得确保印度澳洲之策源地，一面联合盟军，打通国际路线，并保持兵力，以待欧洲战事的结束。

自敌于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偷袭珍珠港，掀起太平洋大战后，在我国各战场的兵力，曾抽调一部，但留置的兵力，仍在三十个师团以上。

三十一年三月间，我为协助英军，并掩护国际交通，而派赴缅甸的远征军，曾在同古、曼德勒、蜡戌间，与敌激战，后以盟军失利，我军一部撤至滇西，一部撤至印度，敌军跟踪窜据龙陵、腾冲，同时在我国战场，在于五月间发动浙赣会战，浙赣路东段，一度被敌打通，旋被我反击回窜金华及南昌，三十二年五月及十一月先后发动鄂西常德两会战，均经我击溃，退返原防。

我为打通中印国际交通，取得物资入口，积极培养战力，准备总反攻计，以驻印军于三十二年十月起，由列多向缅北对敌展开攻势，我远征军为策应驻印军之攻击，亦于三十三年五月起，横渡怒江对滇西之敌开始攻击，于九、十一月先后攻克腾冲龙陵，十二月克遮放，我驻印军于八月间克密支那，本年一月十五日克南坎，二十二日与我远征军在滇缅国境之木姐会师，举世注目中之中印公路，至是乃告打通。

同时，在三十三年，因太平洋上美军攻势，渐迫倭土，倭寇对南洋海运，日感困难，于是乃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求补救，并谋加强沿海防务，摧毁我空军基地，打击我野战军，从事所谓“大陆决战”准备，四月间以兵力十余万，发动中原会战，打通平汉路，并陷我洛阳，五月下旬，敌更以六师团兵力进犯我第九战区，并陆续增援达十余师团，六月下旬直趋衡阳，我第十军在优势敌人包围下，与外围部队相呼应，坚守达四十七日，造成抗战以来守城战之新纪录。八月八日因守军牺牲殆尽，衡阳终陷敌手。

长衡战后，敌军继续西向，发动桂柳会战，因我军千里转战，无暇休整，致桂柳不守，敌乘机沿黔桂路北犯，一度窜抵都匀附近，经我增援反攻，退回河池，此外由北海及雷州方面进犯南宁之敌，与越南东窜之敌，十二月十六日，会于思乐，遂打通桂越交通。

卯、第四期

自三十三年十二月起，至打倒倭寇之日止，为第四期，亦即末期，本期作战方针，因属于军事秘密，恕不报告，但有一语，可以奉告，即我国必可达成最后胜利。至于敌人作战指

导方针，尚在迷梦于大陆决战，此乃垂死挣扎的现象。

三十三年底，敌在我国战场兵力，已增达三十八师团，本年一月敌军又根据前述企图，以约六师团兵力，由湘南粤北两面会犯粤汉路及湘粤赣边区，我军以侧击尾击态势，曾节节予敌打击，现敌局促赣南粤北少数城镇，我已克复茶陵、永新、遂川等城，仍向敌攻击中，此外敌于三月间，又以约四师团兵力，附机甲部队一部，犯我豫南鄂北地区，二十五、六日先后窜抵南阳及老河口，我守军曾予敌以猛烈打击，四月五日至七日我军在南阳西南地区，歼敌达一联队以上，敌势大挫，我乘机反攻，十二日克老河口，现我军正向败退之敌攻击中。

现时湘西战斗概要，敌感于湘西及湘黔边区，我野战军对湘桂路，及长衡之威协，与芷江机场对湘鄂桂粤各交通线及要点之轰炸威胁，惴惴不安，自三月底，开始抽集约四个师团兵力企图向湘西分进合击，以打击我野战军，进而摧毁我空军基地，于四月九日，先由邵阳正面以一一六师团全部，及四十师团一部，沿邵（阳）榆（树湾）公路及北侧地区进犯，敌三四、六八两师团各主力，于十二、四两日由全州东安分向新宁以西以北地敌指向洪江，又洞庭湖南岸沅江宁乡六四师团一部，亦同时西犯，经我军先后于武阳、武冈、桃花坪、龙潭铺、高沙市、竹篙塘、山门、洞口、桃花江各据点之坚强抵御，尤以于十七日窜至放洞敌四、五千，几被我围歼殆尽，俘获更多，宁乡及由益阳西窜桃花江之敌，于二十一日均被我击退，自四月九日至五月三日止，战事进行已达二十五天，敌仍被阻止于我既设之纵深阵地中，现地形于我愈为有利，并分别被我包围于放洞、洞口间，及瓦屋塘附近地区，如敌无后续部队增援，则不难粉碎其此次进犯企图，而予以歼灭之打击，我最高统帅对湘西王司令耀武所部，英勇奋战，业传令嘉奖。

总计第二第三及本期作战，截至本年三月底止，敌我曾进行大会战凡十六次，已如上述，此外尚有重要战斗六百三十二次，小战斗二万二千〇七十六次，游击战斗一万四千四百二十次，毙伤敌军一百五十七万二千五百六二人，我军伤亡二百〇九万六千九百二十五人（连失踪），连同第一期总计毙伤敌二百二十八万二千五百五十二人，我军伤亡三百〇九万九千七百〇四人。

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政治部关于坚持边沿区对敌斗争对策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

一年来敌人在南太平洋上的节节失败，及我军在敌后坚持反蚕食、反扫荡，连续胜利，使敌人不能不改变过去对我分散配置的方针，而采取重点主义政策与政治攻势结合的方针，以达其巩固华北兵站基地与准备总的战略防御，待机与英美决战的目的。这一方针的实施并未改变敌后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相反的，由于敌人接受了过去历次对我进攻与治强运动失败的经验，研究了我党我军几年来军事与政治斗争的规律，使敌人不能不采取新的斗争方针，而使今天敌我斗争双方走上更加全面、更加复杂，针锋相对的阶段。我们决不能认为敌人这一政策的实施，单纯的是为了强化其城市、交通线、资源、地区的控制、摧毁我地下组织、打击我向其交通线工作的发展；而且更积极的在我根据地周围设下一定的重点，并向我根据地楔入重点主义的攻势，加强扫荡的突然性与机动性，采取“以游击对游击”，“以突击队对小部队”，不断的对我军进行奔袭合围，剔抉清剿。强调所谓九分政治，一分军事，“以政攻对政攻”，“以组织对组织”，向我根据地展开强烈的政治攻势，加强特务匪化会门的活动，统一各种反共力量，实行“以一元化对一元化”的全面斗争。因此不光是斗力，而且是斗智；不光是政治，而且是军事、经济、特务等，双方斗争力量、指导能力、总的比赛与发展。谁如果不足够认识敌人这一政策的深刻阴谋，而满足于过去的胜利、成绩，而麻痹自满或粗枝大叶，简单化的一套办法，都将招至严重的恶果。最近各地部队的不断的遭受袭击，民兵的叛变，敌工干部的受害，会门的重新活跃，边沿区的遭受损失，都不能不引起全党全军高度的警惕，在思想上更加充分的准备与巩固自己，加强边沿游击区，开展敌占区工作，贯彻全面的对敌斗争，粉碎敌人的重点主义政策，进一步的加强我们自己的阵地，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为了坚持边沿，在军事上打击敌人重点主义的军事配备，必须坚持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方针；在政治上与活动方式上，更加灵活的发挥敌进我进，组织强有力的小部队，武工队，插入敌大、中、小点之间活动，争取与团结群众，破坏敌人（肃清内线，深入非匪区，打入外线）的计划，使其大小据点彼此孤立，破坏其联络线，打击敌人特务活动，积极困扰敌据点，在有力的政治攻势结合下，继续拔除某些薄弱的据点。在这些重点圈内活动的部队，必须采取隐蔽的活动形式，在活动的规律上，不应墨守成规，而应采取灵活的穿插进去，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此起彼落的形式，麻痹敌人。在边沿区应有重点的配备主力，去支援地武民兵的对敌斗争。并以主力为核心，以地武为骨干，以民兵为基础的形成边沿的对敌联防线，有力的打击敌人向我边沿活动的小部队。对敌人的突击队，更应采取内线瓦解与军事上伏击、清剿的方式，予以歼灭。只有自主积极的活动，并来扩大我游击区，扩大边沿，争取不整齐的，甚至是暂时的敌我相持，以赢得时间，加强我区工作。在整训的

部队，决不能把练兵与对敌斗争孤立起来，我们是面对着敌人练兵，正是为了同敌人作长期的艰苦斗争，战胜敌人。各级指挥机关，必须加强对敌重点与远区战略支点的侦察工作。整训的方式，在接近边沿地区，应采取分散、轮番整训为主，并必须发现与研究敌人活动的规律，充实与改进我们整训的内容，把边沿当成我们的课堂。当发现敌人对我内地实行奔袭、扫荡时，则应该集中相当强有力的部队，配合地武、民兵，诱敌深入，造成敌人过失，乘敌奔袭疲劳、分散、麻痹、分股退却之际，我应机动的转入敌退路之两侧，寻求机动，不失时机的予以打击或歼灭其一段。

（二）为了对付敌人政治攻势，就必须加强边沿区的反特务、反伪化的活动。敌人所谓九分政治，就是更进一步的强化对我边沿的特务、伪化活动，而特务的组织及活动、训练又是各色各样的。因此，我们的对策，也不能一般化，基本上是采取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结合。由于敌人特务花样之多，因此，我们须从思想上、政治上予以广泛宣传、揭发敌扩大特务活动的阴谋。对敌一般化的公开的武装特务，我应抓紧一切有利时机，予以歼灭；对于为恶最大的首要分子，应予以镇压；而对其被利用的群众，应争取、分化、悔过自新，个别的可加以利用；对特务的地下线，我应以谨慎的秘密调查研究工作，与群众的反特务斗争下，予以揭发和秘密训练，为我利用；对有些为敌特利用的地主，则应予以劝告，填保证书。在边沿区的一切下层组织、地武、民兵，是特务活动的主要对象与漏洞，我应加强政治控制，清洗流氓、异己分子，拿特务活动的实例来教育大家，与欢迎被欺骗的分子反省坦白，予以宽大处理。在敌我相接区来往人员，必须有一定的机关接洽，不许自由混乱关系，而造成敌我不分。在公安工作上，更应把边沿接敌的村庄，当成自己工作的重心。对一切伪组织的家属，适当的登记，开展群众性的瓦解伪军、特务的运动，但须防止主观夸大的现象。对特务处理，必须坚持慎重实事求是的方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不能一般看待。

（三）对于为敌特伪化所组织的会门组织，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敌人利用对我不满的封建势力，利用会门，在山东农民中深深的影响，与群众的迷信、落后心理，抓住我在边沿政策上的严重倾向，造成群众与我对立。对于这种为地主所掌握、所操纵，为敌伪所利用的一种带群众性的组织，是不能简单用打击办法解决问题。而必须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同的原因、对象，提出对策。原则上，应分化瓦解，争取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中间力量，孤立上层首要分子，通过群众路线，镇压个别汉奸头子，揭发其勾敌事实。对我如果在执行政策时发生错误，而造成群众与我对立的地区，我必须进行解释，收回影响。对少数为汉奸所操纵，反我最积极的会门，就是要予以军事镇压时，也必须异常慎重。这种镇压，只是为了打击汉奸活动，与争取会门群众的目的，决不能采取狭隘的报复观念，而脱离群众，孤立自己，而且我们的部队必须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才能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

（四）因此：我们在边沿区的政策，与根据地政策执行的好坏，是对于边沿的长期坚持，与敌占区群众的向背，有决定的意义。在边沿区，我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依靠基本群众，团结各抗日阶层，服从于对敌斗争与长期坚持的利益为原则。因此，脱离了边沿斗争的现时情况，强调一面，忽视全面，强调暂时局部利益，忽视了长期的政治利益，都会脱离群众，使党的政策和影响受到莫大的损失（马列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情况）。从实际出发的去运用党的政策，而不是教条的、公式的去搬运，或把根据地的一套，去指导边沿游击区工作，都是不合乎实际的。在边沿区发动群众，应该以团结群众，对敌斗争为主。从对敌斗争中，达到少资敌，不资敌，减轻群众对敌负担，打击敌人掠夺，保

卫人民利益。从减轻各阶层的对敌负担中，经过说理、调解方式，适当的执行减租、增资，减租的数量，应少于二五的标准。并使这种阶级的矛盾，约束于合法的范围，并服从于对敌斗争的原则，使群众眼前的利益，与长远对敌斗争的利益相结合起来。对村政也应从反恶霸、贪污、反投降斗争，并予以改造，确实掌握到对敌斗争积极的基本群众手里，只有依靠基本群众，才能巩固与地主的合作，才能制止地主的投降，才能使边沿游击区的斗争，有着广泛的基础。对地主，尤其是开明士绅，中间力量，我们必须适当的照顾其人权、财权、地权，使其积极的参加对敌斗争与根据地的民主事业，鼓励他们参加劳动与对敌斗争，广泛开展游击区敌占区的社会统战。我们的政策既需要在对敌斗争中，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又需达到团结地主抗日的目的，把阶级的利益，要与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

（五）在边沿游击区，是敌争夺最激化的区域，群众的态度，是以我们的政策为转移的。因此，我们不能存在任何殖民地的观点，严禁乱罚、乱没收、抽枪、乱捉人的严重现象，这种现象在客观上，正是帮助了敌人，损害了自己。目前有些边沿区的形势恶化，正是由于违犯了政策，所得到的惩罚。政府应该制定边沿的法令，稳定边沿社会秩序。工商管理局，应该整理边沿的税收，不能以财政收入的多少为出发点，而应以群众的利益与政策的利益为标准。在这些地区的工、商人员，不应乱用恶霸、流氓、投机分子，而应派出能够掌握政策的干部，到边沿区去进行对敌的经济斗争。在货币流通上，应克服目前筹码不足，小票太少，及不顾情况一概没收，伪币上采取逐步兑换办法，而使广大基本群众吃亏的现象，尤其有少数人员，假公济私，变相的掠劫，更应受到严格的纪律制裁。在物资统治上，主要是掌握主要的物资，并在贸易斗争上，要照顾广大群众的利益与商人的利益，有计划的组织物资的输出和输入，欢迎敌占区工、商业家投资根据地，准许在政府法令下，自由贸易，发展敌占区走私，打破敌人物资封锁，配给制度。对于逃亡地主，正是目前敌人利用反我的重要对象，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争取，适当检讨我们政策上所发生的偏差，与我对敌斗争的坚持是不利的。应该宣传我宽大政策，重申保障其人权、地权、财权，保证减租、减息后的交租交息，准许其回来，不究既往。对有些因干部思想上过左，而发生偏差时应该予以解释，并适当的由政府给以调解，尤其对中小地主的政策，不能与大地主一样看待。必须团结他们，共同进行抗日与民主事业。

（六）武工队是坚持边沿开展敌占区城市交通工作的有力武器，他的作用已由过去的战术地位，提高到战略的作用上去。但是有些党委、政治机关，并未重视这一工作，一般的使用多，教育少，甚至让其自流，不加检查指导，不能发挥其高度威力。这次武工队会议所指出的缺点与经验，必须加以重视。各地区应根据敌我斗争情况，与开展城市交通工作，打击敌人重点主义的方针上，重新的予以配备、充实与加强。必须使武工队真正能为团结敌占区广大人民对敌斗争的一面旗帜。有些成分太复杂，不称职的武工队，应予以改造，加强干部领导，以有效的完成对敌人的政治攻势的任务。

（七）为了更有力量的组织边沿的对敌斗争，使政治攻势能以县为单位，经常的进行，就必须加强边沿工作的组织领导，有重点的配备核心干部，将过去对敌斗争有经验的干部，加强到边沿区去，在边沿区应以党委为中心，去结合党、政、军、民的力量，通过各种不同的组织，订出对敌斗争计划，灵活的运用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不要墨守成规，不要被动自流，应在一元化的方针下将每一个任务贯彻下去。及时的帮助下层干部，研究情况，总结经验，掌握政策，纠正偏向。只有如此，我们的对敌斗争才会有胜利的保证。各级党委、政治机关接到此指示后，应传达讨论，并将具体布置情形，电告我们。

中央对潮梅闽西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

林平并转临委：

我们对潮梅闽西南工作有如下建议，望考虑后转告林美南等同志。

1、沦陷区及可能沦陷区，如潮揭普惠，潮澄饶工作可以经审查后恢复活动，以组织保卫家乡各种式样的地方性武装为主，未能审查党员则给予任务单独活动，林美南应到潮普惠揭主持工作，潮澄饶则由周礼平负责。

2、梅埔等国民党区工作，应劝导一部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同时积极开展新的战略据点。梅、蕉、杭武边的放点工作，由李碧山负责。

3、闽南可能沦陷的老支点，应由阿叨乌纵分开负责，组成二个流动武工队恢复联系，闽西仍应在群众中继续巩固秘密党的基础，此二地应统一在朱同志领导下。

4、潮汕一带，敌后游击小组，可以集中行动，并求发展，调罗林回来负队长职务，在普揭中找一干部为政委。

5、沦陷区的各式反日武装及国民党区的反蒋武装，我们均应设法与之进行统战工作，特别澄饶边土匪武装，更应打入工作。

6、各地情况如何，望经过东江电告。

中　　央

山东分局关于伪军工作经验简报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

去年在伪军工作上有很好成绩，争取了王道、莫正明、张希贤三大股共六千余人枪，编成军区独立第一、二、三旅。一千人以下小股伪军反正，约一百四十股，共六千八百余人枪。这一工作的开展，大大提高了各地对于争取伪军之信心与努力，打破了对大股、对上层，尤其对于国民党有关系的伪军，没有信心争取的偏向。

一、山东伪军，大部是过去地方实力派投敌者，便于我开展。

（一）他们不能长期脱离地方，处处应付，求得保存实力，要能够适当照顾与不损害其实力，如谁严重威胁到他的时候，也可能向谁屈服。

（二）首领大部是国民党员，至今还与国特有来往，有一定程度的正统观念。国民党时常设法掌握他们，但同时他又与国民党有矛盾。对国民党排除异己政策，一贯表示不满。过去中央军在山东时，他们是身受排挤之苦的。

（三）这些部队，大部是封建团体，各据一方，互相争雄，互相嫉视，矛盾极大。如我们善于掌握利用矛盾，打此拉彼，各个击破，是我工作有利条件。

二、只要掌握了以上特点，灵活运用策略，一方面掌握严正的革命立场，一方面正确执行宽大政策，痛打、密拉，就能使其进一步依靠我们。所谓痛打，就是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打击其痛处，逼之就范。在军事上的打击，如对莫正民，十月间打下其八个据点，因为没有打倒其嫡系部队，打得不痛，他反亲自动员其部下反共到底。我一面劝其悬崖勒马，限三日为期，与重新谈判，一日已过，我又发起攻势，消灭其嫡系三个中队，迫使莫不能不向我屈服。这正是由于我们打到痛处。正如莫自已说：“无论怎样说，你们是胜利了，我的主力打掉了三分之一，好枪丢了一半，机枪丢了十五挺。”在政治上打击其痛处，就是指出他是汉奸，是民族罪人，进行伪属登记红黑点、善恶录，揭穿曲线救国论，削弱正统观念，打垮其对国民党的幻想，造成群众性反汉奸舆论，形成日夜逃跑，人心向我的局面。如对吴化文，四个月中，组织了四次群众性的宣传攻势，由于掌握了其部队这一时期的情绪，宣传有力。四个月被我瓦解、逃跑官兵达二千人，造成其部队极端恐慌动摇之情绪，在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动荡。滨海、鲁中、鲁南三个地区，九个月共瓦解一万三千余。在经济上打击痛处，要作围困据点、封锁给养，造成其极端的困难。如对王道部，我地方武装和民兵，天天包围敌人据点，动员群众不给敌人出伕、纳给养，靠近据点村庄都搬家，实行空舍清野。当时伪军只好自己修墙、挖工事，到据点外找高粱穗子、棒子，煮着当饭吃，拂晓打蚂蚱当菜吃，不久病号即占一半，造成王道部急于找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打正是为了拉，痛打则造成我拉的更好条件，便于建立关系，争取其反正。所以在打之前，打之中，打之后均必须拉，痛打密拉，必须紧紧结合起来，否则光打不拉，就会形成死敌，誓不屈服，使其更加依靠

敌人。如对吴化文，在军事上，曾进行三次讨吴战役，政治上、经济上曾造成其不少困难，但因打的痛，拉的不密，结果形成死敌。光拉不打，或打的不痛，则会形成拉的无力。如对莫正民部，在一年半工作中，我曾退还一挺机枪，对给养只要不浪费，可以给他，拉的的确很密，但因打的不痛（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迁就他），结果形成他对我应付，甚至威胁我，以攻为守，来扩大保存实力。在打前，要拉，要造成打的理由。要先礼后兵，而后打，同时也给拉留出后路。如打夏庄据点，事先谈判，伪即答应在我消灭鬼子后，自动撤退，结果我将鬼子消灭仍不退，我即一鼓歼之，敌人答应一月后撤退，过期不理，我即坚决拿下。这些打得很恰当，使伪军哑子吃黄连，虽然被打，还得向我赔不是。打之中，必须有拉的一面。如莫动员反共到底，确亲信其他区表现最为积极，捕杀我一个侦察员，解决我一区中队，当时我即提出惩办祸首，而且实际消灭了王的三个中队，这一打，使最坏的一部分孤立。如王说："上下不落人情，四面不讨好。"中间分子，都以王介千为型，为王太笨；好的则更接近我，认为这和自取打的不同，政治上一面揭穿汉奸罪过，一面又宣传我之宽大政策，释放俘虏，执行反正后三大保证，鼓励其带罪图功。在经济利益上，除罪大恶极、汉奸财产外，采取代管而不没收。对逃出反正伪军官之土地问题，采取不和解而斗争，也都是在打之中，还有拉的一面，给其留余地，而不堵塞门路。打之后，拉的工作尤为重要。必须说明，我打他是为了民族利益及其他理由，并表明我军之宽大，并要其悬崖勒马，我即不咎既往。在一定情况下，为了达到争取目的，在物质上要大方，必要物资及人枪退回，甚至为其解决一些困难，都是可以的。要表明我决不"乘人之危"，而是诚恳待人。如王道部，在我反蚕食的军事、政治、经济打击之下，要与我建立关系，其目的为了缓冲局面，我完满答复其三个要求，起了据点周围我所埋之地雷，送他二千斤麦子，并派人带路送回小清河南，经过根据地，并未盘问，这给其部队极大感动，造成反正先决条件。一年来工作上是由那一地区军政首长亲自负责，打拉结合的密切，工作就有显著成绩，只交敌工人员去做，打拉必然结合不好，成绩也就很小。

三、由于伪军封建性与集中性，要先拉通上层关系，取得工作便利，随即可以打入中下层关系。过去在思想上，认为上层是顽固，只会对其采取打击与不理态度，或者拉上关系，即作过高要求，都会影响工作开展。直至目前，对上层工作还未普遍重视，与上层联络的经验，尚不丰富，去年一年，共建立了八个大股工作团，有些是分局军区直属去做的。对上层联络，同样是我同伪军斗争一种形式。联络时，既不能表示我与对方同等地位，又不能盛气凌人，给人以生硬影响，第一次见面尤为重要。我干部一举一动，人家都很注意，往往以一个人的态度与作风，作为认识我党、我军的初步标准。说故事，讲笑话，是可以的，但不要低级庸俗，谈话要灵活，但不要表现出老好工作的气派，正当道理提出，要义正辞严，不能表现"低声下气"、"拍马求情"，但态度必须和蔼、谦虚，应酬要大方，但大烟、白面、妓女，要绝对禁止。这样才能表现我党我军的风度，首先在关系中建立一个很好的印象。除注意自己风度外，必须从各方面去建立威信，首先要掌握我对该伪军的整个方针与对策，并研究在不同情况下，如何贯彻此项方针与对策。这样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处理恰当，使对方不敢小看自己。否则，遇事畏畏缩缩，人家会将我干部当做通讯员，而失去其联络作用。其次，在同对方提出条件时，要估计到对方可以接受的程度，提得过高，会使对方感到不够诚恳，故意与他为难，这会影响到他对我们的信赖。谈问题要有余地，不要把话说死，弄成僵局。再是每次见面，让他先谈，观察他的态度，使我有考虑问题的机会。在领导上，

必须帮助联络干部建立威信，如送人情的事，叫他去做，经常与联络干部研究对策，解决今后困难，形成上下一致，使对方知道这就是上级代表，这样才能提高联络干部的威信与作用。伪军上层，一般很诡诈，与我建立关系后，往往限制我与其下层接近，甚至利用与我联系来稳定巩固其部队。我必须打破这一封锁，去开展中下层工作。如通过上层去做中下层工作，表示我不是为了分散其力量，而是为了争取其团结，共同抗日。如对王道部，派出干部是以到城内做情报工作的借口，去接近中下层。对莫正明，则以据点分散，恐怕发生误会。而于各据点设联络站，去接近中下层。此外，还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与社会关系，去建立秘密中下层关系。一年工作中，证明革命两面派，多在中下层，而不在上层。几次伪军顺利反正，如无中下层工作的积极活动，如无革命两面派的骨干作用，则是不可能的。

四、去年一年，在伪军工作中，我们曾不断的克服工作中的偏向。如上半年，有些地区过分强调长期埋伏，单纯保存关系的保守现象。有些地方，对争取上层始终没有信心，对关系全不信任。几年来，关系好的不下委派的。在斗争上，对反国特斗争没有信心，与国民党有关系伪军，即不去争取等，形成工作不开展，关系不提高的现象，敌工干部的业务知识不丰富倾向严重，长期在外，少教育，不学习，形成一般的情绪不高，不安心工作，政治上不够坚强的现象。现在决心大批抽回学习。没有对这四项工作中的偏差不断的克服，工作也不会进展的。

五、夏秋季战役后，形势已有转变，伪军集中使用，许多退驻城市，敌人对我伪军工作已严密注意，以特务小部队袭击我之工作站。在伪军中成立特务网，即侦察组以进步面貌，欺骗我干部与伪军关系，寻找线索，一网打尽，我各地敌工干部，已损失二十余人。为适应新的情况，在干部中首先树立以我为主的反攻思想。伪军工作，不只是为着掩护帮助今日之抗日工作，还必须进行里应外合思想与工作准备，强调打入工作。所有网站人员，力求深入据点、城市。打入网站人员，只在据点外围绕来绕去的方式必须改变。强调网罗培养外围人员，使敌工干部不限于青年党员，知识分子，凡可用之士绅、商人、会门、俘虏等，都可利用打入，才能深入各阶层，争取各种人物。建立城市交通线敌工站，进行伪军、伪警工作。实行中央指示，分散多头进行工作。不强调统一，要单线领导，要防止敌之破坏，要从远近，各方面，东西南北，向城市进攻，总结研究里应外合的艺术，为反攻准备。继续加强对大股伪军上层的争取工作，大股伪军工作，必须首长亲自负责进行，这是今年伪军工作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

山东分局政治部

附中央批语：

此报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并请转各地党委。

中　　央

寅　　俭

华中局关于目前形势与苏中斗争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

丕显：

关于目前局势与华中党发展方针，我们曾先后与粟、叶及各师负责同志商讨过。这些部署和规定至今依然适用，故不重复。现根据情况发展与中央指示原则，提出下列四点供你们研究和讨论。

一、美军在华中登陆是必然的，日寇为保卫沿海及打通浙赣路交通，扫荡顾祝同，可能性很大。这两点给我们工作与向南发展以极大便利。我们过去对华中与苏中工作的调整和部署，正是从这两点出发。但近月来敌人增加大批关东军到上海及连云港，证明日寇已有坚保上海及准备在华中地区与美登陆部队决战之决心。同时敌寇在就地养战口号下，正在华中各地加强掠夺物资及控制水陆交通路线，因此在反攻序幕揭发前后，敌人扫荡我华中敌后地区亦有很大可能，如果我们对这种可能到来的严重环境在思想上与组织上不作充分与必要的准备，则我在胜利尚未到来之前是要吃亏的。因此，你们对各区一切工作的布署仍须本着从坏处作打算向好处去争取的精神。

二、苏中在敌伪不断扫荡清乡与艰苦坚持中成绩很大，但仍须从各方面提高一步，这是我军将来夺取上海、南京控制长江下游，确保南北战略交通最可靠的基础。为了应付盟军登陆与可能新的变化，敌人已感到兵力不够分配，故日寇今后采取类似对四分区那种长期集结兵力的分区清乡计划，愈加困难，但苏中在军事、经济与交通方面均占极端重要地位，近悉敌有增调一个师团驻苏中与孙逆第五军不久即要调驻高兴宝地区，在叶部出动后，苏中环境可能更加困难起来，你们一方面应与三师很好商讨配合制服孙伪的计划，另方面对某些水陆交通要道地区，应效法四分区与丹北经验，预作最困难条件下的坚持准备，只要我们从各方面预作打算，即使这种困难环境真会到来，则时间也不会拖延很长，而且也易顺利渡过。

三、目前苏中要争取一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中各方面的工作，对一切根据地与游击区应深入发动伟大群众运动、生产运动，深入减租减息，加紧整训部队扩大和训练人民武装，培养本地干部，很好掌握政策与正确处理贸易金融问题，这是使我党我军与苏中人民建立血肉相连的必要条件。对一切目前尚无我党我军活动的敌占区，应组织许多有训练的武装工作队去开展游击战争，去建立隐蔽的游击基地。其办法应从解放区抽调精干部队，配置强的领导干部，携带短小武器，配好党政军民的工作人员，分路派到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附近地区，广泛进行半公开的及秘密的群众工作，很慎审的去争取伪政权与顽方敌后活动，进行巧妙的斗力与斗智的斗争，可学习四分区与丹北地区的经验，华中各地掌握边沿区两面派的经验，华北武工队的经验，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经验，这种游击战争中心目的不在

克复少数据点，而在宣传组织群众、争取伪政权，制裁死心塌地的汉奸，领导伪化区广大群众，欺骗敌人，团结力量，切忌表面夸张，切忌过早刺激敌人，这种工作做得愈好才能于盟军登陆、敌寇前线失败和紧缩与撤退时，领导各地群众以地方暴动方式解决一切反动伪军，到处截击日寇，使一切隐蔽活动地带成为我之根据地。金柯与钱敏活动地区更应普遍采取这种办法。

四、对城市工作除过去所讨论各点（如争取伪军、伪政权，利用一切合法可能团结工人、市民等等）外，更应当调查研究学习，各城市一切现存非法组织（如绑票匪、小偷集团、流氓集团等）所以能够存在及其活动的方法，我们一面要在打汉奸、分粮食、要工作、争生存等口号下学会运用一切非法组织与活动方法，去组织大城市的地下军或城市游击队，而另方面要在这些地下军中有耐心、有步骤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工作，这种地下军每队人数不可过大，对外可采取各种各样的灰色封建名义，以麻痹敌寇，这种地下军发展步骤，应先从失业工人入手，逐渐推到各厂在业工人，从近郊推到城市，从工人区域推到市中心区，如果这一工作有效，才能于时机成熟汇合成为城市武装起义。

华 中局

三月十五日

华中局关于深入开展江南新区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六日）

粟：

一、你们击败国顽二次进攻后，估计顽军暂时不会大举再次向我进攻，我应暂利用目前时机迅速巩固已获阵地，并相机与浙东打通联系，主力部队除留必要一部担任前线游击警戒和开展杭嘉湖地区外，大部以团为单位分散整训和做群众工作，并可由主力部队抽出若干连编入地方部队（担任开展地方武装与警卫地方任务），不应长期集中耽误整训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如果顽军再向我进攻，我临时集中亦来得及。

二、你们应将上次派到江南干部大部派到新开辟地区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建党的组织及进行群众工作，须知巩固已获阵地是一个很大而繁重的组织工作，是将来大部跳跃发展的必要条件，金明张颜杨纯不久即可率大批干部前来江南工作。

三、你们要很好争取半年和一年时间扩大和深入苏南各方面工作，对我广德宣城以北一切根据地与游击区，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深入发动伟大群众运动生产运动，深入减租减息，开展并训练人民武装，培养本地干部正确处理财粮问题，很好的掌握政策，这是使我党我军与苏南人民建立血肉相联的必要条件对一切目前尚无我党我军活动的敌占区（如杭嘉湖及其他）应组织许多有训练的武装工作队去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隐蔽的游击基地，向敌后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附近逐步挺进，这种武工队的主要目的不在攻打据点，不在公开袭击敌人，而在深入敌后之敌后抓住群众切身利益以半公开及秘密的方法，广泛进行宣传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日常利益斗争，争取伪政权裁制死心塌地的汉奸与顽方敌后活动，进行巧妙斗力和斗智的斗争，学习丹北与苏中四分区的经验掌握边沿区的两面派经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经验去团结群众欺骗敌人，切忌铺张切忌过早刺激敌人，如果这种工作做得好，则在盟军登岸敌寇前线失败与撤退时，可以到处领导群众，以地方暴动方式解决一切反动伪军，消灭反共土顽到处截击溃败的敌寇，使一切敌后地区成为我之根据地，你们应利用目前时间按照上述原则与苏南各坚持部队和党政军民干部切实部署沪宁杭三角地区的工作（请参考廿七日中央指示摘要）。

华中局

三月十六日

华中局、军政治部关于伪军伪组织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缺报头）

希特勒被打垮后，盟军在远东与日寇决战已为期不远，中国抗战更临近反攻，边沿伪军、伪警、伪组织人员惶恐动摇，以及寻找出路的迫切要求日益表面化。国民党内反动派现有极大的政治阴谋诱惑与勾结这些伪军、伪警、伪组织人员，以便在反攻到来时，作为其反共、反人民的资本，甚至企图利用伪军作为其反共反人民的先遣队。在这一新的与紧迫的情况下，华中局对目前敌伪军工作认为还有更加加强的必要，因此特有如下指示：

一、各级党委与军队各级政治部门，应大大加强敌伪军工作，必须用严肃与认真的态度，不放松任何机会与可能去努力开展伪军、伪组织中工作，以便这一工作在最短期间作出更显著的成绩来。各地区应号召党、政、军、民一致动员起来，从战略思想上更明确的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我敌后地区全党全军应把敌伪军工作看成当前极重要工作之一，首先各级党委书记，以及军队政委、政治主任须亲自参加督促与领导这一工作。

二、当前伪军工作的重心，应放在争取大股伪军与带战略性地区的伪军上面（这一中心工作由旅及军分区以上去做）。地方性伪军、伪警以及伪组织工作，可责成由地委去作，必须于最短期间内将工作全面展开深入，各区党委、地委、以及军队师、旅政治部，应将所在地区大股伪军及带战略性地区的伪军加以调查研究，作出全面但有中心的完整工作计划，抽调相当数量的高级或适当干部，组织与充实各专门工作委员会或工作组应作主要对象，有计划的进行工作，对上层应从各方面找关系去进行联络，对下层应从各方物色干部进行打入，利用一切可能从内部到外部寻找适当人材，抽调大批有伪军关系，有社会经验而面目又未经暴露的知识分子，与伪军中俘虏来的中下级军官开办训练班，实行广泛打入工作，作到通过上层以组织下层、掌握下层以控制上层，同时为了展开工作以便于争取出某些伪军，应有计划地给以适当与必要的军事打击，特别对部分顽化伪军，应给以严重打击。因为不制服部分顽化伪军，其他伪军工作是难开展起来的。但军事打击其目的在于达到争取、瓦解。因此在打的全部过程中须贯穿着争取的政策，要痛打密拉（打得要痛，拉得要紧）。但对于死心塌地为敌作伥，屡次劝说争取无效的伪军、伪组织则应采取坚决打击与消灭之方针。

三、中央一九四一年八月对敌伪军工作指示，应采取蓄集力量，等待时机一般的不进行反正的原则，直到现在对某些在重要大城市与重要战略地区而又与我们有组织关系的大股伪军与伪组织，依然适用。但由于目前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广大伪军、伪警日益表现恐慌和动摇，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条件，与可能对一切与我无直接和间接关系的伪军，应普遍公开联

合他们立即反正，说明希特勒已经垮台，日寇死亡不远，如果还不立即反正就快没有时间和机会来为国立功和向民族悔过赎罪了，如果对反正还表示怀疑，将来就要受到民族惩罚人民裁判了，这种宣传愈普遍愈好，这种伪军反正愈多愈好，但另方面对某些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伪军，特别对某些重要战略地区与交通要道与我有关系的伪军，则仍应采取隐蔽待机的方针，“并要从各方面去加强其内部的组织教育工作，以便将来配合战略反攻”。而不应过早暴露和过早反正，要把一般普遍公开联合反正与个别秘密具体组织反正很好结合起来，同时就是对某些与我有组织关系的伪军（如驻守在今天对敌并不十分重要，但对我扩大与改善解放区却有很大作用地区的伪军），亦应当有计划的很好组织他们及时反正，但对于组织和领导伪军反正是一种严密而精细的艺术，如反正前对客观环境与内部情况要加以充分精细的估计，对反正时机与组织反正的一切技术问题，应有很好考虑和周密布置，对反正后的巩固和处理问题应作周到的准备等等。在组织与领导伪军反正问题上，如果存在任何疏忽，就可能招致严重的恶果。

四、为了更有效动摇、瓦解伪军、伪警、伪组织，和争取他们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各地应根据当地情况与具体对象，采取种种有效的方法（如经过各地伪军关系，释放伪军俘虏等等），向一切伪军伪组织人员普遍提出警告，并广泛开展调查叛国罪犯运动，各地行政公署与军区政治部可颁布布告和调查叛国罪犯的条件，动员群众团体用生死簿、善恶录、红黑点等等方法去警告一切为敌作伥的汉奸，在开展调查叛国罪犯运动中，一方面应说明：我们对一切及时回头，早日悔过及在行动中予新四军与各地抗日民主政府反对日寇以实际便利者，一律表示宽大的至诚，并给以确切保障（如既往不咎、保证其生命、财产、及对反正者还保证不缴枪、不编散其部队、不剥夺其军权与军职等）；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对一切罪大恶极不愿改悔与继续坚决帮助敌人反对中国人民的叛国罪犯，在我军所到达的地区与在国土收复之日，必将一律迅速依法治罪，决不宽饶（军政治部特拟就处理伪军、伪组织人员自新条例，反调查叛国罪犯的办法草案，供各地参考）。为了扩大影响及发动广大社会人士参加调查叛国罪犯运动起见，各地可正式公开成立调查叛国罪犯委员会，并广泛吸收各阶层社会著名人物参加。

五、各地各级党、政、军统一敌伪工作委员会，与党、政、军各级敌伪工作部门，必须很好健全起来。各地统一敌伪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为：按时总结经验，确定工作方针，制定工作计划，并调整各地党、政、军各方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关系，至于党、政、军各敌工部门的内部组织与具体工作，则责成他们自己去作统一工作委员会，如须调整或调动各敌工部门的人员和干部时，则应经过一定的组织手续和制度。为了加强大股伪军与伪组织工作，应组织专门工作委员会去进行工作，如遇有大股伪军调防他地时，则工作委员会亦应随之行动，不得中途放弃，或借故调走干部。党、政、军必须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去加强敌伪军工作和建立对各大股伪军的工作委员会，并须经常研究、总结、交流敌伪工作的经验。

华中局

巳感

南下支队湘鄂赣边斗争的教训总结

（一九四五年）

王 恩 茂

南下支队经过将近四千里的远征，于一月二十七日到达大悟山，同新四军五师会合了，休息了十七天，二月十四日继续南进，走了十天，二月二十三日，全部渡过了长江，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在江南的湘鄂赣边斗争，到现在已经是四个多月了，这四个多月的斗争是非常紧张的，非常艰苦的，我们获得了不少的战斗胜利，保卫了鄂南敌后的根据地，这是我们斗争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我们付了巨大的代价，同志们受了许多的劳苦，花了许多的精力，流了许多的鲜血，牺牲了许多的生命，当着毛主席和中央给我们指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斗争，没有得到更大的成绩，没有能够更早的向南发展，而丧失了好几个月一去不返不可再得的时机，这个中间，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很好检讨和总结。我个人认识到的有以下关于政治方针和军事政策上的几个问题。

敌占区与国民党区的问题

我们党的方针，是到敌占区发展的方针，敌人打到那里，就到那里发展的方针，在敌占区，发展抗日的人民的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我们的武装力量，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全部经验的证明，是一定能够胜利的，这是我们力量发展和胜利的规律，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和我们讲得很清楚了，离开延安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次的指示，亦是明确不变的这样指示，但是由于我们在思想上认为“中国人容易欺负”，过低的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认为国民党军队容易消灭，企图首先大规模的消灭国民党军队来迅速的大量的发展自己，而过分的强调敌占区的困难，过高的估计敌人力量，因而对于执行上述正确的方针，发生了偏向，对于敌占区发生了不同的解释，目的企图在国民党区域发展和建立根据地，这种企图的开始尝试，就是三月六日的攻占鄂南专署的驻地，崇边的大源，在那里曾经停留了整整十天——从三月六日至十六日，成立了一个崇边临时行政委员会，准备留四支队在那里工作，并提出建立以幕阜山为依托的湘鄂边根据地，讲到我们的远征基本上已经结束，表示了我们向南发展的方针掌握不稳，这种企图的继续发展，就是三月二十六日攻占平江城，平江城原来是敌占区，但二月二十九日敌人退出了平江，而为当地的抗敌自卫团与三纵队所占领，在平江成立了平江县政府，分派了干部到各区乡工作，在汪坪开始建立我们后方，打开大源缴获的大铅印机、医院，都放在那里，并企图进入浏阳，向中央提出了创立湘鄂赣根据地的建议，相当强调目前南进的困难。三月二十八日攻打长寿街，顽三纵队固守，没有打下，二十九日，顽七十二军之新十三师、十五师增援长寿街，顽九十九军之九十二师、九十九师由南面也开始进攻平江，三十一日，顽四纵队进到我们的后方——汪坪，大平一

带，配合七十二军九十九军的进攻，薛岳发布了"剿办"奸匪的计划，第一步七十二军"剿办"，第二步增援梁鲁两军"剿办"，我为打破顽军的进攻，决定首先消灭威胁我们后方的顽王剪波四支队，四月三日，进行了清水洞、笆蕉坳的战斗，虽取得了胜利，但未达到消灭他的目的，故四月七日继续追击攻打大云山，四月九日，顽十三师两个团、三十四师一个团已进到西岭、操溪，正向南江桥前进，其目的在配合九十九军夺取平江城，我本乘大云山战斗胜利后，继续消灭顽王剪波部，但在此情况下，四月十日部队转移到南江桥，进行南江桥战斗，虽给了顽十三师、三十四师以打击，但未取得预计的胜利，顽九十九军、七十二军由东、南、北三面已经迫近平江城，到了四月十五日，故不得不自动退出平 江 城， 此时的情况，比较严重了，客观事实开始给了我们的回答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不是那样薄弱，不是那样容易消灭，国民党区域不是那样容易建立根据地，那样容易发展，所以这种客观有了若干的改变，觉得在国民党区域发展，也有许多困难，而改变在接近敌占区的国民党区域去发展，计划开展以大云山、药姑山为依托的岳、临、平湘地区工作，但企图在国民党区域发展，和企图大量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思想基本上没有改变。而顽九十九军、七十二军向我进攻并没停止，我虽退到了昌水以北，但顽还是向大云山、药姑山前进，在黄岸市企图打一个大胜仗，以打破顽之进攻，未找到很好的时机，故只有转到顽后，修武活动，以达调动顽军之目的，一则使我留一部分部队和干部到鄂南湘北能争取一个时间工作，以利迎击顽军进攻，二则使我部分精干部队能乘机南下发展，这一行动基本上达到了目的，最大的成绩是留了杨宗胜同劳及三个步兵连和相当多的干部在湘阴完全敌后的神鼎山、玉池山工作，今天在那里有了发展，并有继续发展的前途。遗憾的是精干部队，准备转入敌后相机渡江向南 发 展 ，没有实现，而北返岳、临地区工作，这时，王陵基任湘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指挥九十九军、七十二军，专门的进攻我们，六月初，又来了一次以进攻大云山、药姑山为目标的大进剿，六月七日，企图消灭进攻顽军的一路以打破顽军进剿计划的小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牺牲陈宗尧同志，张云薪同志，是很大的损失。小战斗后，我们第二次南下，到了桃花山、湖源山，加强了湘阴敌占区的部队和干部，并第二次准备进入敌占区和相机渡过湘江向南发展，这表现了我们认识了南进的必要，和敌占区比国民党区好发展的问题。但由于对全国形势和敌占区情况没有清楚了解，对于南进和在敌占区发展的困难， 有 若 干不适当的估计，以及企图等到后续部队一齐南下，所以终于北返鄂南了。

总结四个多月斗争的经验，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内，在国民党区域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在敌人占领的区域建立根据地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巨大发展的前途，现在我们都一致的认识了必须到敌占区去发展，到敌占区去创造根据地，但是，这是经历了企图在国民党区域发展和创造根据地的曲折的道路转变过来的，是受到了实际的教训转变过来的，特别是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明确的和坚定的指示，转变过来的，没有实际的教训，没有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这种转变恐怕是困难和不容易的。

为什么我们在国民党地区创造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呢？而在敌人占领区域创造根据地又可能呢？为什么我们在平江国民党区域，和以大云山、药姑山为依托的岳、临广大地区不能站脚不能发展，而杨宗胜同志三个连的部队在湘阴、长沙敌占区又能站脚、又能发展呢？当我们许多部队在国民党区域不能站脚，不能发展的时候，但一旦转到敌后就能站住脚，就发展起来了，就和种子撒播在春天里湿润肥沃的土地上一样必然生长和发展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国民党区域不可能建立根据地，首先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占了绝对的优势，而他

的实际质量，并不是如我们从前所估计的那样没有战斗力，他要拼命的同我们争夺地方，他要集中他的全力来消灭我们，只要我们在一个地方驻扎和工作十天半个月，他的进攻就来了，本来，工作正在开展，群众正在起来，政权正在建立，部队正在扩大，但是顽军的进攻一到，一切这些均受到破坏和摧毁，平江地区的工作是如此，岳阳、张谷英、饶村、黄岸市等地的工作也是如此，岳临地区的大云山、药姑山地区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被迫的退出了所有的国民党区域，有的退出之后，还返回去过一次，大多数的地区是一退不能重返了，国民党在那里增强了兵力，建立了碉堡，残酷的镇压人民，在我们军队刚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人们只敢心里说我们好，拥护我们，但不起来积极的斗争，唯一的原因，就是不相信我们能够在国民党区域站脚，预料我们是要走的，走了之后他们将要吃亏，群众这种预见已经成了事实，所以难怪不敢起来，我们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可是可能取得消灭国民党一团或数团兵力的胜利，但国民党对付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消灭了其一部分，他又可能增加兵力来进攻，这种纠缠不止的日益严重的磨擦战争，对于我们是不利的。其次，国民党区域，尤其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国民党区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厉害的，特务活动是毒辣的，国民党军队在其区域可以得到反动政权，特务分子的支持，而我们在其区域，县政府县长逃跑反对我们自不在说，就是乡长、保长及其武装亦是逃跑和反对我们，地主、绅士虽不满意国民党，同情我们，但还没有积极起来帮助我们，工农群众是反对国民党的，但因为怕我们走了之后遭受摧残，而不敢起来。第三，到国民党区域发展，人们怀疑我们团结抗日的政策，是不是和实际行动相一致，因为人们看到抗日要到敌占区去，国民党区域没有敌人，在国民党区域发展，意味着我们主动的超过了自己原则的进攻国民党，这在政治上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对于团结人民的政策是要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对于我们是不利的。

在敌占区能够创造根据地，因为敌占区，除了几个战略要点屯驻强大的兵力之外，一般敌人的据点虽是多的和密的，但守备的兵力是比较薄弱的（三、五个十来个，到一百多个敌人），据点与据点之间，铁道线与公路线之间，能够找到我们活动发展的地盘，敌人不容许我们在敌占区生存发展，而要组织对于我们的进攻和扫荡是必然的，但敌人在敌占区有兵力不够的基本弱点，敌扫荡此一地区必须调集彼一地区的兵力，而发生此一地区扫荡，彼一地区空虚的现象，这使我们有回旋活动的条件，敌人扫荡某一地区，经过一个时间必然要退的，不可能象国民党军队一样，进攻到一个地方除非用我们的行动和战斗调动他之外，他是不会自动退兵的。尤其重要的，日寇——他是民族的敌人，他同我们民族结下了血海深仇，一切中国的人民都是反对他的，虽然他有伪军和伪维持会的帮助，但是他们究竟是中国人，民族的仇恨还是有的，我们可以做争取他们的工作，真正死心塌地的汉奸是不多的，特别是日本即将死亡的现在，我们在敌占区依靠广大人民是可以战胜敌人的，这是一。二、在敌占区，国民党的正规军一般的是不多的，但保留了地方部队和别动部队，在顽我力量的对比上，不一定我们处于劣势，国民党正规军大批的开入敌占区和我磨擦，比较其在国民党区域是困难得多的，因而磨擦斗争的形势没有象在国民党区域那样严重，甚至还有可能做争取工作，在敌占区的国民党政权，由于敌人进攻和敌人据点和交通线的隔离受到了破坏，丧失了政权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及和外部国民党区域的联系，加上敌占区民族矛盾特别强烈的原因，乡长、保长，看到我们来了并不逃跑，而且差不多都能起来帮助我们。三、我们在敌占区进行抗日斗争可以取得社会更广泛阶层的拥护，地主、士绅、资产阶级能够同情并实际帮助我们，国民党进攻我们，将丧失一切政治上的借口，因而也丧失一切人的拥护，在政治上

我们占着一切的优势，这将决定我们在敌占区斗争的胜利。

在敌占区发展，是不是没有困难了呢？也不是的，困难是多的，很严重的，对于困难如果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是不对的，因为同样会妨碍我们在敌占区的发展和胜利。敌占区的困难是什么呢？敌人不让我们发展，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消灭我们，袭击、进攻、扫荡是必然要发生的，抗日斗争是连续的、紧张的、复杂的、艰苦的，国民党也是不让我们发展，可能增强兵力敌占区同我们磨擦，反磨擦的斗争，也是连续的、紧张的、复杂的、艰苦的，但是我们相信依靠毛主席和中央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政策，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依靠全体同志的英勇奋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斗争是可以胜利的。

是敌占区就可以去发展，不是敌占区就不可以去发展，到底那些是敌占区，那些不是敌占区，这个问题也必须弄清楚，和要有明确的观念。

杨宗胜同志在湘阴发展的区域，是敌占区，如象这种区域是可以去发展的，另外，我们经过下列三种区域，不是敌占区，而应算作国民党区域，如象这种区域是不可以去发展的，这是我们经验证明了的。第一种：大源、鄂南第一专署驻在那里，是敌人从未进攻过的地方。第二种：平江，敌人曾经占领过，但以后退走了，那里恢复了国民党的统治。第三种：岳、临，敌曾经进攻过，有的地方占领过，但以后退走了，恢复了国民党统治，但敌人没有全部退走，国民党恢复的区域，一面是靠敌占区，一面和其邻近的国民党区是密切联系的。我们曾把后两种区域，解释为敌占区，暂在这些区域工作，但结果是站脚不住的，所以，不仅第一种，而且第二种、第三种区域也是不适宜去发展的。

抗日战争与磨擦战争问题

我们到敌占区去发展，是要进行抗日战争的，离开抗日战争而谈我们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向南发展问题时，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是说：“抗日的旗帜抗日的口号，抗日的实际行动，对于国民党严守自卫的原则我们一定胜利”，这次中央明确的指示，在敌后发展打击削弱敌人，扩大部队、组织民兵、建立政权、坚持敌后，对于向我进攻，妨碍我们在敌后发展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队，才站在自卫的立场给以还击，目的，在于使我们在敌后发展抗日战争。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入湘以前，我们曾准备不主动的进攻国民党军队，首先打日本以表现团结抗战的精神，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的群众，这种准备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同这种准备，同中央上述的指示，是不一致的，入湘以来，我们连续不断的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磨擦战斗，把我们的部队完全卷入在严重的磨擦战争的漩涡里，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在思想上曾经主张“磨擦起家”，主张打内战来发展自己。因为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因为想要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国民党动员了两个军，六个师，四个纵队向我们进攻，这就是我无法进行抗日战争，而只有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

这样磨擦战争的结果，发展自己没有达到目的，虽然取得了许多战争胜利，捉到了一些俘虏，但是，我们的伤亡是很大的，部队老的成分大大的减少了，比较起来是得不偿失的，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也没有成功，我们虽然在国民党区域。这是因为国民党区域，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是强大的，在数量上他是有绝对的优势，其部队经过了许多抗日的战斗，表现了还有战斗力，他有国民党政权，保甲组织、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分子的援助，他能控制

其区域的群众，他有后方供给运输便利的条件，以我们现有的力量和他斗争，是不能取得决定意义的胜利的。

经验证明，在目前条件下，企图专门打国民党军队来发展自己是不可能的，而应该到敌后去发展抗日战争才能发展自己，我们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打日本，伤亡消耗很大，得不到什么缴获，要缴获、补充，还是要靠打国民党，因而得出结论，日本可以不打，必须打国民党来发展自己，但这是错误的。因为第一，不打日本是不对的，因为日本是全民族的敌人，今天人民遭受最大的灾难是日本的侵略，房屋被焚毁，生命被宰割，妻女被奸淫，财物被掳掠，田园荒芜，敌人百般蹂躏，残酷奴役，陷人民于不能生活下去的惨境，人民第一个迫切的要求和希望就是抗日，特别是湖南的人民富于民族反抗的精神，他们不忍日本的奴役，自动起来同日本英勇的斗争，坚决不维持敌人，不当顺民，而仇恨日本，仇恨汉奸到了极点，如果，我们不能代表群众的这种要求和希望，进行坚决的抗日战争，或只有抗日的旗帜、抗日的口号，而没有抗日的实际行动，都会脱离群众，在今天日寇还没有打出去之前，谁能坚决抗日，谁就能得到群众拥护，我们同日本战斗，要付很大的牺牲，要花很大的代价，但另方面，我们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真正拥护。

琼崖情况报告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

恩来并中央军委：

据琼崖云涌同志（他原在琼崖负责支队付，去南路联络），现到此，所得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方情况：司令冯白驹，兼政委，副司令斧田（即庄振凤），参谋长李振亚（即李从），政治部主任黄魂，在去年三月间牺牲，现王伯伦。独纵下辖四团，一特务队。

1、数目配备分布如下：

一支队：队长吴克之，副陈武英，政委林豪，政主黄一峰。内有两个大队，共八个中队。轻机九、重机一挺、掷弹筒一支，一千余人。活动于文昌、琼山、安定、澄迈地区。

二支队：队长符振中，副陈琳光，政委符荣鼎，政主符树义。内有两个大队，共六个中队。日式轻机七，掷弹筒一，八百余人。活动于昌江、感恩、乐东、崖县的西部地区。

三支队：队长符哥洛，副林平（歧），政委莫达，政主祝南芬。内有三个大队，共七个中队。日式轻机七、掷弹筒二，约一千人。活动于乐会、万宁、陵水、崖县的东部地区。

四支队：队长马白山，副潘亚汉，政委吴某，政主江田，内有三个大队，共六个中队，一个独立中队。轻机七、机关炮两门（系日式（？）的）、掷筒一，约一千人。活动于临高、儋县、白沙地区。

特务队，轻机一，百余人，随司令部作警卫。各支队均有驳壳排。

总人数约五千，主力均在山中游击。平原方面，只留武工队活动。民众完全拥护我队。粮食供给可以解决，但衣物药品困难，常因病冷、烂脚、痢疾致死，疾病的死亡数，多于战斗的死亡。

2、琼崖最高政府为东北区政府（最近准备改变名称）。主席冯白驹，下设一科（行政科）吴骢吾。二科（财建科）詹力之。三科（民运科）符明禄。四科（司法科）潘之甫（国民党员，曾任县长）。五科（保安科）李定南，秘书吴耀南。民主政权计有文昌、琼山、澄迈、临高、儋县五个；联合县政权，琼东定安一个，乐会、万宁一个，昌江感恩崖县一个，陵、崖、保、乐、办事处（包括陵水、崖县东部，保亭南部乐东东南等地）。白沙县——人民解放团；较有巩固基础的为文昌与琼山，整个山区，没有一个公开的市镇据点。

民众武装，只有文昌、琼山有基干常备队，但人数不多。

3、民众组织：除保亭、乐东、白沙三县外，各县都组织有抗日救国联合协会，以前亦有分立的组织，予以合并，一般民众对敌顽已极痛恨，斗争情绪相当高，对我队及政权均真诚拥护与帮助。

4、地方党工作数量不明，其主要负责人为特委书记冯白驹、副书记兼组织部李剑，代

理宣传部雨达（原是陈健，病在广州湾），民运部陈乃石。文昌县委书记符忠元，琼山县书肖焕烽、儋临联合县书李汗、乐万联合县书月波、昌崖感联合书记陈克文。

二、敌情：全琼崖除黎境个别乡区外，其他各县城市乡村都已沦陷（敌顽割地划防者除外）。日寇兵力计有五个海军陆战队的警备队，第十五、十六、十八警备队，余二个番号不明，惟人数约二万人。十五警驻文昌，琼山，十六警澄迈、临高、儋县，十八警驻琼东定安乐会。最高指挥官佐贺中将，去年二月才调来。

据传敌准备增二个至三个师团来琼崖，但自太平洋战争失利以来，战斗情绪低落，台籍士兵厌战优甚，去年十月至十二月战三次投降计第一次在乐东一位台籍兵携手提机一支投降二支队，第二次文昌有五名台籍兵携十支步枪投降我地方党，第三次一位台籍兵携步枪二枝投降我一支队。

日寇对正面仍时刻乘机扫荡，但对解放区民众四二、四三年实行三光，近则着重政治怀柔。对反动派则割地划防，共同反共。

日寇的经济抢掠，非常积极，没收土地，垄断土产，开发矿山等。建筑一条由昌江至崖县的铁路和修筑海口、清兰港、三亚榆林等地的码头。以三井三菱组织各式各样的株式会社。

军事上建立五个飞机场：一个在海口附近，一个在文昌潭牛市附近，一个在临高的加来市附近，一个在感恩县北黎港附近，一个在崖县三亚港附近。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水力发电厂，在乐东县东部附近。

三、伪情：日寇把琼崖改为海南守备府，在琼崖的伪组织称为临时政府，其主要傀儡是伪主席赵士桓，副主席吴柏，警备所长兼伪军司令詹仲年，全琼各县都有伪组织，伪军有五千余人，指挥权均属当地驻防之日寇，伪司令只有空名。

四、反动派主要人物有守备司令王炬，九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丘岳宋，保安副司令兼第六团团长杨开东，驻澄迈白沙，保安第七团团长肖候然，驻文昌琼山国界（潭文、甲子）。守备第一团团长符大椿，驻保亭万宁。守备第二团团长王微（娄），驻白沙定安，一部分在澄迈。自卫大队队长丘玉关，驻白沙、临高一带。共计四个团，一个大队，及地方杂牌，约有三千余人，靠与日寇割地划防，剥削人民以生存。

林　平

辰　虞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

林平：

一、自赫尔利回美报告后，美国政策已决以全力扶蒋，不给我以援助，但因怕苏联参战助我故尚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

二、国民党六大开后，表面文章对我故作缓和，实际是对内压力益增，准备内战益急，而特务对我之阴谋破坏亦将较前更凶。

三、有此二因蒋戴特务很有可能利用蒋美特务合作，及美我目前关系钻入我军，施行侦察破坏。上月底美机利用气象合作竟未经我方许可，实行降落美军四人，中国一人，于晋察冀解放区，显然含有此种阴谋。

四、现美军欲以华员代欧尔义，恐亦属于此类阴谋。你们拒绝，甚为正确，对欧尔义可表示愿与合作，但只限于供给敌情气象及地方救护，如有其他事项，或增换人员（连上次侦察大亚湾在内）必须向延安总部请示，如有华员入境或有未经同意之事项发生，我们有全权禁止。

五、欧尔义以后，赠送任何东西，均望报告，并须登记，以便决定是否应该接收，好明外交界限。

（此电大意并望告周楠派来之云涌同志）

中　　央

中央对广东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

广东区党委：

1、七大已闭幕，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两报告广播，想已收

* 这是周恩来同志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到，望发动广泛讨论，并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2、对日战争，今年尚不能达最后决战阶段，明年可能有大变化，华南形势，因英美划分作战地区，美国将不在华南登陆，英军逐步东移亦需时日，故日寇目前行动似在缩短广西阵线，转向粤赣边扩大战场，还不能估计其已有从华南撤退之迹象。

3、国民党六大开后，专门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准备内战，但在敌人未败退前，还不能放手内战。

4、美政府目前政策是在扶蒋抗日反共，但日如寻蒋决战，蒋尚有再败可能，英美在华南矛盾甚大，苏联对华赞成论联合政府，主张声援民主运动，英美及蒋，不能对苏无顾虑。

5、因此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

6、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依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中央即将电令现在湘、鄂、赣边区之王震部队沿粤汉路经衡阳、宝庆间直向湘、粤、赣、桂边区发展。另由延安派出五千人部队，由文年生率领，沿平汉、粤汉路南下，向湘、粤、赣、桂边地区前进，并负责护送七大广东代表及二百名军政干部给你们，计时七至八个月可到，以至配合你们创造南方局面，成为制止内战之一翼。

7、为实现此战略方针，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打成一片，并接收干部，现在小北江支队，及在紫金支队，亦应继续向北发展，以扩张左右两翼。

8、区党委会议，除决定上述战略方针，及在此方针下的各种工作外，还应着重讨论在国民党区的农村散布生活在群众中的武装工作队的工作，国民党军队工作（顽军以破坏为目的，友军以统战交友，便于将来改造为目的，有愿入党的重要分子，可发展为极秘密党员）及伪军工作。

9、区党委委员应包括东江、珠江、中区三纵队及南路北江各负责同志，并推出区党委书记名单，速电告，以便中央核准。

10、琼崖不划入广东区党委管辖，你们及南路有无办法，送电台及人给琼崖，望与云涌商复，你们电收之中央各项公开文件，云涌如不便带回，必须使其择要，多看数遍，以便回去传达。

11、南路及闽西南报告俟收齐后另复。

12、执行情形望告，并将政权工作及政策实施情形分类电告。

中央关于对美政策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

若飞：

1、五·卅来电，一般估计和方针是对的，但有下列两点须加修正，一点是美政府目前政策，确是扶蒋抗日反共，其错误在认蒋可以打败日本，统一中国，但结果会与其希望相反，日蒋如决战，蒋必再败，日如撤退，蒋必内战，统一无望，美只有扶助中国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要使美国改变现行错误政策，必须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批评美国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反对美国专门援蒋助长内战的危险，促使美国觉悟，而不是预言美国不会助蒋内战与必会联合中共，须知美国现行政策，是确定了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一点是我们反对内战，同时却要表示我们不怕内战，以压蒋之气焰，坚同盟者对我之信心。

2、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此外敌人打败他，国际干涉他，都不归我管，因此，我们除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并派兵建立华南战略根据地外，在大后方，应着重农村武装斗争之积极准备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第一项可依各地情况，以散布在群众中的武装工作队方式行之。第二项对进攻我的顽军，以破坏为目的。对友军，以统战交友为目的，中央在七大后，拟为大后方，准备这两项工作的干部，训练后陆续派出，你在布置工作时，希望着眼此点，多作准备，但须十分机密，勿与办事处及报馆公开工作发生任何联系。

中　央

六月十七日

告时局方针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

若飞：

一、我党对参政会态度，已于今日广播，决定不出席此次会议。广播文另有军政台电你，到后抄送各方，并由你函告邵力子。

二、复七参政员电，及广播文亦请你抄送，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

三、揭露美械助蒋内战事，将由剑英发表公开声明，列举事实，诉之世界，以后并将经常供给你以此项材料，便于对外宣传。

四、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将于本月底成立。

毛泽东

六月十八日

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一）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二）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的有利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

（三）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而在湘中衡、宝、潭、醴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在日寇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这一方针，和在延安时我们向你们所说在地区上是不同的，但我们认为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四）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启龙、文年生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个部分。在以三南①为中心的粤赣边，在宜章、坪石、乐昌、南雄地区，在郴县、道县、临武、蓝山、连县地区，在以江永、灌阳、恭城为中心之湘桂边区（如有敌伪军占据），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寇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准备被切断，准备独立作战，惟一的直接的依靠是你们内部的团结，是你们自己的正确的军事政策与正确的团结人民的政策。如果你们在这些政策上犯了大错误，那便要接受失败的结果，这一点必须预计到。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湘鄂赣区党委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的电报。

（五）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虚心，力戒骄傲，十分谨慎，力戒浮躁，十分团结，避免并逐步消除可能的意见分歧。在情况许可条件下实行委员会的民主讨论，集中多数同志的意见，然后坚决执行之。

（六）现在大局有利于我，只要党内能团结，不丧失时机，在政策上不犯大错误，我们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中央给你们的伟大任务的。希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注释

①指江西南部之龙南、虔南（现名全南）、定南三县地区。

军委关于一年内创造五岭基地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

广东区党委并告王王：

一、军委估计了整个抗战发展形势，对于华南局势认为要经过一段长期复杂而艰苦的斗争过程才能获得胜利，没有时局的预见没有未雨绸缪的及时准备工作，将会遭受到许多困难甚至严重的挫折与失败。

二、华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能否在一年内（决不可错过此种时机）建立起真正有群众基础的粤北湘南赣南山区根据地，以准备在一年之后英美蒋军占领广州及平原地区之后，我军能有山地依靠在华南斗争坚持下去，使你们日益发展着的主力军获得回旋机动的群众条件地理条件以为将来之依靠，如果这一任务不能完成，那你们在一年之后就将遇到失败。

三、我们曾电告你们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向粤北赣南湘南的五岭山区，建立湘粤赣桂边（以五岭为中心）根据地，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合力创造华南新阵地，配合华北华中我军举行对日反攻作战，并于日寇消灭后能够对付国民党必然发动的内战。

四、你们接电后执行情形如何？你们派出的北江支队已进到英德地区活动现进到何地？人枪多少？首长为谁？与你们有无电台联系？除此以外尚有其他力量北上否？均望即告。你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

五、王震王首道二同志所率部队由湘北已开始南下与你们会合，望你们迅速与该部取得电台联系（三局已将通信呼号等电告你们，密码不日即有，电台望注意接收），加强湘南赣南粤北的情报工作，随时将该区敌伪友顽我的情况电告王震首道，协助其顺利南下并作一切配合行动的部署和部队会合后的各种准备，达到华南全军团结一致完成党的任务。

军　委

七月十五日

〔附〕　东纵六月初旬人员武器统计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军委并中央：

一、六月初旬止的东江纵队本身的人员武器统计如下：总人员共9577名、各式重机16挺、各式轻机91挺、英式小炮3门、日式掷弹筒3个、英式平射机2挺、美航空机关炮2门（尚有10余支未修理）各式步马枪32680支，各式短枪1085支（内驳壳枪占半数）。

二、本纵队的活动地区分布状态各支队配备与辰月电报告大致相同。

三、本报告只限东江纵队本身，各地方团队及民兵等另行报告。

曾王林
巳艳

令启龙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启龙、年生同志并五师、王震、河南：

（一）你们现达何处，在太岳、中条境内准备休息几天（应完全恢复疲劳），部队情绪如何，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如何。

（二）渡汾战役虽有损失，但已胜利通过，此次经验对于以后行军作战将有帮助。

（三）已令王震、首道率部南开，直达粤北，在湖南中部不可久留，在此等地方不可能建立稳固根据地，日寇失败后蒋介石一定要用全力驱走我们，故应直往湖南粤北，依五岭建立永久根据地。你们目的地亦是湘南、粤北，在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条件下，应注意酌量缩短行军过程，争取在阳历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

（四）河南解放区新创，经济极端困难，你们到时应准备按价购买不要当地供给。

（五）你们电台应与王震、首道台经常联络。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二日

中央关于开创湘粤边工作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四日）

广东区党委：

午陷电悉。

一 王震、王首道率三千人七月从鄂南出发，现到湘潭、衡山间，一个月内可到湘粤边。文年生、张启龙率六千人现到河南，四个月内可到湘粤边。

二、你们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之兵力及领导，并从东纵派出一有力支队由一个得力同志率领附电台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三、现到广宁、四会间并向怀集、连县、连山、阳山地区推进之珠江纵队主力，与你们有无电台联络，领导人是谁？兵力多少？该地区敌顽分布情形？均望即告。这一地区（小北江）极端重要，你们对之应加强领导。

四、盟军登陆日寇北撤后，你们所处平原地区将处于极端困难地位，目前即应充分考虑此种情况，在精神上与部署上作周密而适当之准备。整个广东力量应就各部现在活动地区及其附近选择适当地点，深入群众工作，训练干部，准备将来长期奋斗，方不至临时张惶失措，遭受挫折。这些地区为小北江地区、乐昌地区、南始地区、北江地区、东江地区、珠江地区、西江地区、中路地区、高雷钦廉地区、琼崖地区、潮汕地区等，每区均应有主力军、游击队、民兵之组织，极力和民众打成一片，坚决减租减息，解除民生痛苦，准备长期奋斗，不怕内战，对国民党绝不让步。每区均应有电台联络并多购无线电器材。上述各区中应有一区为中心根据地，作为建立广东军区机构及区党委所在地。此区以在何处为宜，望考虑电告。

五、中央除给你们干部二百人（由伍晋南率领随文年生部队南下）及派王震等至湘鄂边建立根据地和你们配合作战外，一切依靠你们及各区同志自力更生，依靠人民独立奋斗，发扬创造力，绝对不要依赖外援，即王震部亦是配合作用，不可存依赖心理。

六、你们必须将上述方针在半年内部署完毕。尤其注意精神准备要有不怕一切困难之精神。

中　　央

八月四日

中央指示五师应付将来局面办法

（一九四五年八月四日）

郑李陈：

午马电未支收阅。你们已估计到将来问题是很对的。

（一）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作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方不致临事张惶备受挫折。

（二）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鄂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计。你们应有几个根据地，其中鄂东、鄂南、鄂西、鄂北可就现根据地逐步发展之，大别山、桐柏两处现亦有相当基础，将来可集中主力夺取其一部或大部，作为主要根据地，而以其他各处为卫星。目前极力发展豫南力量迅速与王戴打成一片，甚为必要。是否可将师部及区党委移至豫南，请加考虑。

（三）加强群众工作，加强民兵，加强军训，加强财经工作及准备干部，此五项望在扩大会上根据自己经验加以总结。此五项中，有几项是你们不甚擅长的，应加强调。军队不只是打仗一项任务，还有做群众工作及从事生产自给两项任务，这个问题你们必须着重解决。军队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亦须于军训中很好解决。不是缺少做地方工作干部问题，而是军队帮助地方群众工作一项任务强调不足之故，对此加以强调，转变军队作风，地方工作干部就会多起来。

（四）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中　　央

八月四日

中央对广东区党委工作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

广东区党委：

1、我党在两广的民主运动有两重任务。目前应在抗日民主的号召下动员人民实行自卫自治，并联合一切反蒋的上层分子，进行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但同时为保护人民利益，绝不应放弃反对地方封建压迫的斗争，好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建立起群众的基础。

2、我党在两广展开上层统战工作，主要依靠于我们自己武装力量和群众工作的发展及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这才能吸引地方上反蒋的上层分子愿意接近我们；同时也要这些反蒋的上层分子经过他们自己多次的失败，并逼得无路可走时，才肯和我们作暂时的联合。故我们对他们的联络，不必急求有效，更不应期望太高，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失去阶级的警觉。

3、根据上述两项原则，你们对两广上层分子的工作，可采取如下办法：

①李嘉仁同志可派赴李济深处任联络代表，如陈正云确实表示需要我们派报务及译电人员，则可偕陈李同去，并带去与东江通用的密码，叫待通你以后，再转介绍给延安。

②赠李款项，如确由陈正云表示需款方可，不要硬送，赠或借由你处酌办。

③我们不必去提议召开华南党派会议。如李梁等自动地召开民主同盟会议，或其他形式会议，李嘉仁可在他们同意时列席，不必作负责主张。如问我党在华南主张，可告以我们赞成李济深所提倡的人民起来自治自卫的主张，我们愿在各地努力，希望他们也本此方向一致奋斗，如有成就，再行联合可创出华南新局面。对梅县张香池、粤北李章达、八步何香凝、梁漱溟、昭平陈劭先、陈此生、三党李伯球等亦可以此意告之。

④我们目前宜于分头合作，发动群众，建立基础，不宜过早作无基础的联合，徒惹敌蒋双方注意，既会增加扫荡和压迫，尤宜使这些上述分子一压即垮。

4、望将上述指示由李嘉仁同志口头转告狄超白，另复李狄何诸人电亦交嘉仁以密码译好带出。

5、接济叶军长家属款可送二十万，廖夫人处亦望送十万，狄兄亦望稍有接济。

执行如何，望告。

中　　央

中央关于美军登陆前加强控制山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

山东分局并告冀鲁豫及华中局：

美军登陆期近，国民党必用全力争夺山东。我为准备条件，以利在美军登陆后获得迅速发展，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力量起见，你们应注意：

（一）训练军队；

（二）训练干部；

（三）加强武工队；

（四）加强群众工作（彻底减租，但防止过左）；

（五）尽可能彻底消灭顽伪；

（六）加强城市工作（可能被我夺取之城市及要道）。

如你们能在半年内加强这些条件，一遇美军登陆，敌军集中对美，我党即可乘机发展，控制广大地区，而不怕国民党的争夺，否则我党将处于不利地位。上述任务，在冀鲁豫及华中是相同的。山东及华中的某些沿海地区，敌将于美军登陆前加强对我扫荡，自应加以注意。

日寇投降后我对伪顽之军事政策

（一九四五年八月）

张饶赖：

日寇投降后，我对伪顽之军事对策，根据以多胜少的方针：

1、打他有战略意义的；

2、打他有胜利把握的；

3、打此个可影响其他的。

整个军事方针：

“暂不作进占徐州打算，但以包围徐州的姿态吸引敌人集中大部以便利我们迅即争夺与扩大乡村中小城镇，消灭伪军，扩大部队，武装群众，打下群众基础，以便长期坚持。”

对顽战术原则：（毛）

1、不浪战，不打得过早，兵力要占绝对优势，待敌进至有利于我之地点，以包围歼灭

---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其一路，再打其余。

2、以打胜仗为目的，不怕暂时丧失土地，不怕部分根据地丧失，只要打了胜仗，不难恢复，甚至可能扩大。

中央关于迅速进攻占领徐州济南等大小城市准备接受敌伪投降给山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

罗黎肖：

（一）日寇可能继续抵抗亦可能投降。

（二）山东军区有占领徐州、济南、德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务，但着重于徐州、济南之占领及其他可能为我占领之城市。

（三）望迅速进攻与招降伪军，争取群众，扩大部队。

（四）望将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为正式省政府。

（五）接受敌投降办法中央将于投降实施后颁布之。

中　央

八月十日

中央关于坚持到湘粤边创造根据地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

王王：

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为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中　央

八月十一日

华中局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

七师：

五日电悉。

一、目前时局无新的进展可告，诸辅成去延安可能。由于我军经出席参政会蒋暗中同意或指示他们来疏通。

二、在美国采取扶蒋压共与日寇诱降策动内战的条件下，国顽在政治上军事上向我加强压力，特别向我边沿地区加强军事进攻与特务活动是必然的。这点特别应加注意和警惕，但只要日本内部不会过早中途发生意外事变（如政变求和投降等）则这种局势不能持久，国顽目前困难仍极大极多，如美国不改善对我关系，则击败日本的时间要拖长，牺牲更大，如国顽最后不放弃抗日则日寇在适当时间仍将给他打击，顽希望敌全面配合其反我是有困难的（虽然敌予顽全面政治配合与局部军事配合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

三、敌伪集中兵力准备决战，故在华南华中各地主动放弃许多城市和地区，但长江下游与津浦路沿线，除非经过决战失败似不致放弃，如果国顽以大军进入上述地区，则敌顽我三方形势必发生新的变化。

四、桂顽为着本身利益与受着蒋顽指使，千方百计想驱逐和消灭我们是必然的，但其防区过大兵力不足，顾虑伤亡，内部和外部困难尚多，故对我们采逐步推进相机发展回避全力决战的方针。

五、在目前条件下，我们一切部署仍应本从坏处作打算与向好处去努力的基本精神，你们对国顽应随时有迎接备战的准备，同时尤应经常加强政治攻势鼓励群众，分化其内部，此点虽然很难见近效，但从长远着想，是最有效之办法。另方面应加紧开展敌后之敌后与顽后地区的游击战争，广泛采用武工队方法深入敌后与顽后地区，团结群众，建立坚强游击根据地，以扩大我今天活动范围，以准备明天普遍发动地方武装起义的条件。

华 中 局

八月十一日

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郑李陈转区党委并告华中局及河南区党委：

午马电悉。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地区建立中央局之建议。中央在未接到你们建议前，亦有此议，并曾决定派徐向前同志前来担任中央局书记，但向前同志因病，短期尚难出发（傅钟同志同去），你们可先将中局建立起来。中央指定郑位三同志为副书记，在向前同志未到前代理书记。并指定李先念、陈少敏、傅钟、任质斌、陈世才、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等同志为中局委员。如你们认为还有某些同志必须参加中局的，请即电告，以便决定。鄂豫皖边区中局直接受中央领导，管理现在五师活动范围内之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

中　　央

八月十二日

军委对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的部署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华中局并李郑：

关于执行中央十二日指示的具体部署建议如下：

一、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县各地并立即在以上各地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造成迎接内战的坚强基础，对京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可相机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能占领时亦不宜作久住之计，而主要的是去占领各该县的农村市镇江南的任务是于占领各城镇后即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群众，屯积资财，布置内战战场，顾祝同大军各分路东进京杭沪通过我区时，不作正面堵截应让其通过即截击其翼侧后尾仍按照自卫原则。

二、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苏中负责解决孙良诚、李明扬、陈太运等伪顽各部二师予以协助，二、三、四师主力则迅速出动巩固占领津浦线，对

徐州、中蚌埠两点之占领主要由二三四各师负责，八路只能配合必须如此才能控制津浦线，贯通华北取得对付李品仙、何柱国的优势，七师皖南部队要打通与苏南联系造成整块农村的连接，七师巢无地区于敌伪投降，准备就地坚持，不能坚持的可退集二师地区协同作战。

三、军部在运河沿线，选择适当指挥位置。

以上意见作为你们部署行动时一个参考，请电告实施办法。

军　委

八月十二日

华中局关于发动群众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一）苏联参战、日本投降，沪宁杭三角地区群众的普遍发动，对国际与全国影响与对反内战，均将起极大作用。

（二）各地党委及武工队，应即按照当地具体情形，在下列口号下，广泛发动组织群众，以各地群众起义的方式，夺取敌伪土顽武装，夺取小据点、消灭伪军、忠救及国顽各种别动队，建立民主政权，大量武装民众，以达完全控制这些地区与准备应付内战。

1、迎接新四军解放一切沦陷区；

2、缴除敌伪武装，武装人民自己；

3、摧毁一切敌伪政权，建立中国人民的民主政权；

4、没收敌军军粮与罪大恶极汉奸卖国贼资财，立即救济工人、农民及一切贫民；

5、逮捕大汉奸卖国贼交人民公审；

6、对一切反正自新的伪军，保证其生命财产与改编。

（三）上海、南京、杭州在我大军未到达前，即以上述口号，首先在工人集中地区广泛号召工人斗争，乘敌人投降，城市混乱之际，发动群众夺取伪军警武装，武装工人自己，普遍广泛成立工人武装自卫队、纠察队，建立工会组织，解散伪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立即没收日敌、汉奸军米食粮，救济工人、贫民，并以工人地区为基础，继续向全市发展。为达此目的，浦东、浙东、江南部应即派部分主力以公开或隐蔽方式迅速进入工人区域，作为组织领导发动工人斗争的核心。

（四）对各阶层分子，即可用新四军代表和新四军所派市长、县长名义与各界接洽，并依靠工人、苦力与城市贫民基本群众的发动占领，在彻底肃清敌伪，建立民主政权，恢复民主秩序的口号上，建立各阶层广泛统一战线。

（五）在群众初期阶段，必然会发生某种左的倾向，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各地党与群众干部，必须正确掌握政策，以免造成秩序混乱，侵害各抗日阶层人民利益，陷自己于孤立，招致失败。

（六）上述各点，由江浙军区、浙东、苏中，立即转告有关地区，立即执行。

华中局对发展江浙步骤方法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粟：

（一）中央与华中局目前对发展江浙方针基本未变，但由于客观形势略有变化，故我对于执行开展任务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亦有适当的改变，在你和叶南下前后我们已向你们指出江南发展任务是包括向浙江及其他新敌后地区大步发展与向苏南、浙西敌后之敌后地区深入发展，同时并指出在你们执行大步向浙江发展任务时应设法注意发展一切敌后之敌后地区作为大发展的巩固基础和将来收复各大城市的农村外围的有力阵地，最后并指出此次发展为巩固的发展，当区别于过去大发展后再来谈巩固。

（二）你南下前的客观形势一方面欧洲战争正在最后决战阶段美国为急于准备在华登陆起见，曾一时采取压蒋助我的政策，日寇为打通交通与阻美登陆起见，亦对湘桂粤赣路的企图日益明显，另方面是国顽继续节节败退与蒋介石在对内对外与政治军事各方面均陷于极度狼狈困难，在此种情况下故我们是主张以较迅速猛进的方法执行发展方针的，但在你到达苏南不久，我们从可靠谍息知敌寇拟利用顽我矛盾有延缓扫荡浙赣路之打算，同时又接你来电报告天目山顽军兵力较强且乏粮食，故中央和华中局主张叶谭各部暂留江北待机避免过早南下，刺激敌伪双方，但当时仍一再指出只要日寇开始扫荡浙赣路或美军在杭州湾开始登陆，则叶谭仍当以迅速猛进的方法执行向南发展的任务，同时并要你加强杭嘉湖与苏南敌后之敌后活动。

（三）在叶南下后不久，欧战即告结束，美国对华公开采取扶蒋压我的方针，日寇为集中兵力准备决战，所亦已停止对顽挺进攻击反而采取撤兵诱降策动内战的方针，此时国顽亦企图利用新的形势对我加强军事政治压力，三战区在专门反共获得敌人局部谅解条件下，迅速集中精锐部队打算驱逐我浙西浙东皖南突击部队在此种新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仍采迅速猛进的方法执行向南发展任务则必将削弱对敌后之敌后的发展和巩固则正中敌顽毒计，并有使我被迫与顽进行单纯决战与连续战斗，陷自身于严重困难的可能，所以在此新的形势下，我们对南发展的基本任务虽仍未变，但在执行步骤与方法上已明确提出，以巩固苏南发展敌后之敌后休整主力为主的方针并指出不要继续挺入顽区主动寻找决战而应采掌握扩大敌顽矛盾与诱顽深入而歼之的方针。

（四）在此新的形势下，我们向南发展方针为何基本不变，因为我们估计到只要日本内部不会过早中途发生意外事变（如政变求和或自动投降等）则目前这种局势是不能持久的，不但国顽目前困难仍极大极多，就是对美国来说如果不改善对我们关系则对击败日本时间必要拖长，牺牲亦必大，同时国顽如最后不放弃抗日则日寇在适当时机必仍将给他打击，顽希望敌全面配合其反我是有困难的（虽然敌伪予顽全面政治配合与局部军事配合在过去现在和

将来都会有），在我分散活动后，敌利用顽我矛盾的可能减少，敌顽矛盾可能增加，所以采取巩固苏南开展敌后之敌后各方面工作为主的方针正是为了争取时间，消除我南下内部的严重弱点替将来形势转变与大步发展准备良好与可靠阵地，同时即使将来形势万一逆转，我们亦有巩固阵地可作进退周旋之余地。

（五）半年来事变告诉我们如果不首先巩固苏南与开展一切敌后之敌后工作则今天和将来均要造成极大的错误，因此你们应本我们上月29日午电精神及二十九日电原则有计划地加强苏南皖南浙西浙东敌后之敌后工作广泛采用武工队方法深入敌后之敌后一切地区，团结群众，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以扩大我今天活动范围，准备明天普遍发动地方武装起义的条件，并把上述地区当作将来向前大发展的巩固阵地，你们只有首先争取时间发展巩固江南阵地才算真正立于进退两便与不败的境地对国顽仍当采取诱歼的方针，尤应经常加强政治攻势，激励群众分化顽内部，此点虽很难见近效，但从长远着想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六）你们对客观局势的变化发展和对中央与华中局的指示文件应经常反复研究并盼将来当面敌顽我三方详情随时电告。

华中局

七月十九日

令坚持苏浙皖并告打胜仗之道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张饶曾赖：

元午电悉。

一、冀鲁豫区已调十个小团共万人南下水东，位于开封、归德线以北，新乡线东地区，任务为相机夺取开、归线及新乡，水东原有八千人，河南王树声、戴季英、文年生、张启龙等部共二万余，李先念部主力不久也将转至豫南，均足牵制李何，故李何不可能全部东进。

二、作战决定于打法，不浪打，非确能聚歼不打，养精蓄锐，以多胜少，例如以五六个团打一个团，可能聚歼。

三、以打胜战为目的，不以占地为目的，津浦能全占则全占之，不能则占一部，又不能则让顽伪全部代替了日寇位置，亦胜于过去局面，只要日寇投降，大局于我有利。

四、江南兵力不调动，有坚持现地，扩展胜利，创建苏浙皖边纵横数百里广大根据地，威震江南江北军亦如此之极大可能。非至万一时机绝不轻言去闽浙赣，此旨望告粟叶，动员全党全军全民为此而奋斗，完成此任务亦取决于打胜仗，打法如上述。他们过去三仗打得不错，只是歼灭性还少了一点。与其调两个旅至江北，不如留在江南夹江配合为有利。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五时

中央关于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徐报：

1、数日来蒋介石以更大力量在扩大内战宣传，动员接近他的中外记者向外广播，企图嫁其责任于我，吓唬人民，好便于他放手内战，继续独裁。

2、我为揭穿蒋之欺骗阴谋，应集中宣传于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在具体问题上，应强调被我包围的敌伪军队应归我缴械，指出五、六年来蒋素不承认、接济和命令的解放区军队，今忽令其留原防待命，其目的即在一方面便于他来解决，另方面便于他进行蒋伪合流，我们反对乱命，即所以反对内战，实际上蒋早已无权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盟国最高统帅如强令日军只许向蒋军投降，不许向我军缴械，即等于助蒋内战，我们坚决反对，国共谈判，蒋之三月一日演说已拒绝于先，六参政员携回方案，又被拒绝于后，故请毛往渝，完全欺骗。而且又骂我们为人民公敌，目前蒋之一切宣传，均为内战做文章，只是步调常乱，空隙甚多，你们应在报纸上在中外人士中配合延安广播坚决地予以严斥，以压倒蒋之反动，推动各方。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均极有利于我们，反对蒋之内战，望坚持此方针以便放手动员群众，巩固和发展我们已得的胜利。

中　　央

八月十六日

中央、军委对目前方针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各党委、各军区：

（一）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协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以扩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

（二）蒋介石占领各大城市及要道，需要相当长时间，国民党内部困难仍多，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三）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中　央、军　委

八月二十二日

日寇投降后华中工作方针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饶张赖并转粟叶：

各电悉。

1、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

2、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

3、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

4、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

5、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

6、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

7、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

8、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9、设法向敌伪购买子弹愈快愈多愈好，同时注意从敌伪撤退区收集军用资材，为持久计。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四日

关于与顽军作战的原则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张饶赖：

（一）陈毅已到太行山正转冀鲁豫不久即可到华中。

（二）李品仙何柱国正向津浦路前进，你们应彻底破坏津浦路和陇海路铁轨枕木全部移开毁坏或埋藏，桥梁炸毁。

（三）在顽军向你们进攻时，你们必须打几个完全的歼灭战才能稳定华中局势，并有助于国内和平与目前的谈判，为了要打胜仗你们及所有高级军事干部必须反复研究毛泽东同志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实行该书上的一切指导原则，你们必须集中尽可能多的主力部队切实整训，开好干部会，灵活通讯联络，养精蓄锐求最有利的机会进行决战，必须诱敌深入，用有力的地方部队与民兵和前进中之顽军进行纠缠疲劳敌人，待其进至我中心地区发生骄傲懈怠等弱点，然后以养精蓄锐之主力出击，彻底消灭其一路，你们不要害怕顽军侵入根据地，失去地方，不要轻易听信地方干部和人民的叫喊，不要轻易以主力和敌人决战，也不要浪战而必须是一战再战即须解决问题，如果机会不好，主力决不打，以后还是有机会打的，可以让桂军进占津浦路一段之后再行决战，只要决战胜利消灭桂顽的大批有生力量之后，一切暂时失去的地方，是可以恢复的，但如决战不胜则须失去更多的地方和桂顽主力作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路而不要一下企图消灭其几路必须用五六个团去打敌人一个团，才能彻底消灭敌人，切忌分散平均使用兵力，切忌用相等的兵力和敌人作战，必须很好准备战场，在人民中地方党政人员中进行很好的准备工作，组织很好的民兵游击队，实行空舍清野，断绝敌人交通，日夜骚扰疲困敌人，肃清叛变分子，组织两面派的斗争等。你们如能切实实行上述原则，桂顽虽强也必能打几个好的歼灭战，过去二师与桂军作战就因为没有完全实行上述原则，所以歼灭战不多，望切实加以考虑和检讨。

（四）桂系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战斗力最顽强的，必须有很好的准备和指导才能战胜它，何柱国的军队是比较弱些，但亦须实行上述原则与之作战，望告四师负责同志。

刘 少 奇

八月二十九日

〔附〕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御前会议记录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保科善四郎①笔记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一段时间内，铃木内阁对此采取“不理睬”的态度。八月八日夜，苏联对日宣战。此时，中国、朝鲜、越南等国的抗日战争都进入了总反攻阶段。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于八月九日上午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对是否接受“公告”进行了争论：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次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主张以保证维持国体、战犯由日本方面自行处理、不作保障占领等作为接受“公告”的附加条件；外相东乡茂德等主张只提保证维持国体一条。对此，争论不休。当天下午二时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继续就此议题争论达七个小时，但仍未得出结论。接着，在当夜十一点半，在天皇出席下召开了这个御前会议。会议一开始，首相提出预先准备好的政府原案：“日本政府根据这样的理解——在上月二十六日的三国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改变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而接受这个公告。”首相、外相、海相赞成原案，陆相、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表示反对，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意见分歧中迟迟争议不下，直到翌晨二时，最后天皇因已经听取内大臣等的意见，表示赞成原案。

御前会议（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二十三时三十分，在宫中防空洞内举行）

“日本政府根据这样的理解——在上月二十六日的三国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改变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而接受这个公告。”

注：外务大臣的原案是：“日本政府根据这样的理解——在上月二十六日的三国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改变日本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要求而接受这个公告。”

首相主持会议（根据旨意）。

根据旨意，枢密院议长平沼出席会议。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朗读《波茨坦公告》。

首相朗读议题的原案，并说明提案理由。

今晨，在最高战争领导会议上已经大体上了解了如下各点：

一、不包括有关日本皇室事项；

二、在国外的日本军队，自主地撤回后进行复员；

三、战争罪犯应由日本政府自行处理；

四、不作保障占领②。

保留对立意见，交付内阁会议。内阁会议上，意见也不一致。

本日的议题是外相的原案，有六人同意。

赞成最高战争领导会议方案的，有三人。

---

① 海军中将，当时任海军省军务局长。

② 间接强制投降国家履行一定条件的占领方式。

少数意见认为：第一项是当然事项，其他项目应尽量减少。

为此，以多数人所主张的外相意见为原案。

外相　说明提案理由。

前次提案时，曾被认为此案不能接受。但内阁会议的结论是：在今天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

其中，必须举出绝对不能不接受的理由。

由于敌方美、英的情况和苏联的参战，美、英的立场已经确定，再要求和缓最后通牒，实为困难。

从对方看来，也没有通过谈判而取得缓和的余地。参酌苏联不顾我方提出的条件而参战的情况，还是不必过分强调附加条件为宜。

就是说，关于自主地撤回在国外的日本军队的问题，在签订停战协定时还可能有机会提出；战争罪犯，是难以接受的问题，但并不是宁愿继续战争也要达到此目的的绝对条件。

但是，皇室，则是重要问题——是将来民族发展的基础。就是说，要求必须集中在这一点上。

海相　（被征求意见）

完全同意。

陆相　（被征求意见）

完全反对。

理由是：因为《开罗宣言》包括否定满洲国，使日本丧失道义国家的生命。

即使接受，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

对于苏联那样没有道义的国家，尤其不能同意想用单方面的条件制成的提案。

即使一亿国民全部战死，犹如活在大义之下。必须继续战争到底。对作战有着充分的自信。

对于美国，也有在本土和它进行决战的自信。在海外各国的军队不能无条件的收兵。并且，本国国民也有人要战斗到底。这样做，必将发生内乱。

参谋总长　我的意见和陆相的意见完全相同。

对于本土决战，已经准备好了。苏联参战虽然对我不利，但还没有到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地步。

现在就无条件投降，对不起战死的人。至少要加进上午（原编者注：即最高战争领导会议）的四个条件，这是让步的最低限度。

枢密院议长　在谈我的意见之前，想提一些问题。

想问一下四个条件。

想问一下外相：了解一下对苏谈判的经过和条件。

外相　七月十三日向苏联传达了天皇旨意，为了使战争及早结束，托苏联调停，结束战争，并想派遣特使到那里去。其后，虽加催促，没有答复。

八月七日来电，预定于八月八日十七时正和莫洛托夫会谈。

昨晚，莫洛托夫拒绝了日本方面签订协定的希望，发表了战争宣言。

枢密院议长　向苏联提出了具体事项没有？

外相　曾经说过，具体事项由特派大使加以说明，所以没有具体地提出来。

枢密院议长　那末，苏联对日本宣战的理由是什么？

外相　塔斯社电表达了苏联的真意。

枢密院议长　苏联声明中写着，日本政府正式拒绝了七月二十六日的三国通牒，是否如此？

外相　没有采取过拒绝的手续。

枢密院议长　苏联政府所说的拒绝，有什么根据？

外相　根据想象说的。

枢密院议长　三国联合公告中所说的虐待俘虏和战争罪犯的引渡，是什么意思？——可否认为在国内加以处理？

外相　以往的例子，大多是引渡。

枢密院议长　外相是否认为可以引渡？

外相　在某种场合下，也许不得不引渡。

解除军队武装，则由敌方强制执行。

枢密院议长　想问一下陆相和参谋总长：

据表示，有着打到底的估计，但是，连日连夜来空袭，所以，我有所怀疑。对于防御原子弹，有没有自信？对于因空袭而造成的国内交通的阻塞，也要求加以说明。

参谋总长　对于空袭，虽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但是今后因为方法有所改进，可望取得战果。然而，决不致因为空袭而不得不对敌人屈服。

枢密院议长　想问一下海相：对敌人军舰的炮击，有没有什么安排（对于敌人的机动部队）？

军令部总长　有过专门使用γ［Gama］（原编者注：飞机的符号）的计划，但是因为用作本土决战的配备，所以，对于敌人的机动部队，没有余力应付。

今后将根据需要，修改作战计划，用相当的兵力来消灭敌人。

枢密院议长　对首相——维持国内治安，很是重要，今后将采取什么措施？粮食方面怎么样？正在越来越严重，现在正向着越来越值得忧虑的情况发展。也可以认为，继续战争比停止战争更造成国内治安的混乱。

首相　完全同感，正在耽心。

枢密院议长　虽然没有充分考虑的余地，但因为情况紧迫，说一下我的意见：

对外相的原案——总的精神，不得不如此。

归根到底，在于维护国体——这一点，同意。

但是这个原案，在字句方面，有极不妥的地方。

在大义名分上不合适——天皇的统治大权不是根据国法而产生的，天皇统治的本体不是为宪法所规定的，只是在宪法上加以表述而已。

在词句上，如果改成“不包括改变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就可以。

其次，关于一、二、三、四这四个条件，外相说敌国认为这没有谈判的余地，但我认为，陆相和参谋总长所说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谈判到了没有希望，而作战却有信心，就应该继续作战。

陛下有继承皇祖皇宗的责任，如果动摇及此，陛下的责任重大，负辅弼之责者更是罪该万死。所以，要看今后的推移和将来的预计，然后才可以决定。

在现在的形势下，这样行不行，应该充分地研究。只是单纯地用武力，决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撇开国民，就不能作战。

以上所说，如果有充分自信，就要有力地挺住；如果没有自信，则不论陆、海军力量如何坚强，也不能继续战争。

只有国体的维护和皇室的安泰，即使全体国民为之战死，也必须加以守卫。

我认为应由圣断来加以决定。

军令部总长　海军统帅部大体上同意陆相和参谋总长的意见。虽然不能说有成功的希望，但是还有自信，可以给敌人相当的打击，在国内也还有斗志昂扬的人（斗志低落的人也相当多）。

首相　经过长时间的审议，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很是遗憾。

此事确属重大，诚如枢密院议长所说，是一个重大问题。

既然意见还有对立，只有仰承圣断（首相仰求圣断）。

圣上　采取外相的方案。

理由：虽然一直尽听有取胜自信的话，但是到现在为止，计划和实践并不一致。又据陆军大臣所说，九十九里滨①的防御工事要在八月中旬完成，但是还没有完成。即使编成了新的师，但是应该发给他们的武器还没有备齐。

这个样子，要对付拥有那样机械化程度的美、英军队，没有胜利的希望。

军人是朕的股肱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并把朕的臣下作为负战争责任的人引渡出去，这是不能忍受的事。但是，在大局上应以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时所作的决断为例，加以效法，忍所难忍，为了将人民从悲惨的结局中拯救出来，为了世界人类的幸福，作出这样的决定。

时间—八月十日凌晨二时三十分

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提议：

如盟国同意对上月二十六日三国联合公告作这样的了解，日本政府即同意终止战争。

一、上述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改变日本皇室在国法上的地位的要求，

二、在外的日本军队自主地迅速撤退后，即行复员。

三、战争罪犯应在国内自行处理，

四、不作保障占领。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627—631页。

① 指日本千叶县东境的海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三年六月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

1937年

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芦沟桥进攻中国驻军，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

8月13日 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

8月21日 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①

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会议决定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国共产党竭力敦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1月6日 意大利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德、意、日在外交上互相配合，在反苏反共旗号下，加紧侵略扩张活动。

11月12日 毛泽东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报告，提出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11月14日 王明、康生、陈云自莫斯科启程回国，经乌鲁木齐、兰州于11月29日飞抵延安。王明这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王明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王稼祥也在座。斯大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积极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12月9日—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12月9日，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我们不应该谈谁领导谁，而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我们"可以因力量的不同而在民主原则下解决谁占优势的问题，但不应有谁投降谁或谁推翻谁的企图。"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他还提出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上述言论影响了一些同志。

12月13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肯定了中

① 复旦大学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18页。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国际领导和季米特洛夫帮助下，在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方面，给了中央极大帮助；对他们在培养干部、出版报刊、反对隐藏在某些党组织中的奸细敌探和进行国际宣传等方面的工作，表示满意。

会后，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即去武汉，组织长江局。

12月2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与蒋介石等会谈。

12月28日 中央书记处就政治局会议情况及工作安排事项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12月 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抵华。首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是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国担任通讯联络顾问的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德拉特文。

邓发回到新疆。

1938年

1月1日 《救国时报》发表社论《1938年的抗战任务》，提出发展充实的和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改善军事工作、广泛动员民众、反对亲日派汉奸、实行抗日外交等项任务。

2月27日—3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长篇发言，强调军队要实行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在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上，他说："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进一步发展了右倾投降主义。①

3月1日 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定，苏联给中国贷款五千万美元。贷款作为中国向苏联购买武器及设备的款项，中国用输出农产品的方式偿还。

3月 中国共产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陈潭秋仍在共产国际工作。

4月 4月5日，张国焘前往中部县（现黄陵县）参加祭黄帝陵后逃至西安。7月，到达武汉。17日，发表书面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4月14日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提出党在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保卫武汉、河南、西安；巩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组织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开展抗日群众运动；巩固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力量。

5月17日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关于4月14日报告的说明和补充，说明中提到中央认为目前的迫切工作是应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党的报告时，王稼祥也在座。

5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五一节宣言》，号召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者援助西班牙共和国，支援中国抗日战争。

6月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认为中国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提出了必须注意的一些任务。

7月1日 苏联又向中国贷款五千万美元。

---

① 发言内容以《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为题，发表于《群众》第一卷第19期。

7月左右　王稼祥自莫斯科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和任弼时进行了重要谈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国际并有文件和一些援助物资交王稼祥带回延安。

夏　苏联国防部派遣北伐时期加伦的助手切列潘诺夫再次来华，担任苏驻华军事总顾问。在这期间，在中国军队中工作的苏联顾问有：作战方面——奇若夫、伊里亚绍夫；各兵种首席顾问：空军——特霍尔，炮兵——石洛夫，工兵——卡里亚金，防空兵——鲁斯基赫，侦察兵——康斯坦丁诺夫及助手米哈依尔·石麦列夫，坦克兵——别洛夫，通讯兵——布尔科夫；西南方面顾问巴宁，西北方面顾问——瓦西里耶夫。苏联志愿空军人员来华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中苏飞行员狠狠打击了日本空军。

9月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宣读宣言，宣言中说："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指出"中国劳动群众组织性的缺乏，妨碍着并延缓着动员一切人民力量来进行抗日斗争事业。为着克服这一弱点，必须由国民党及共产党加紧努力，去吸收劳动群众到各种现有的及新的组织中来，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强的下层群众基础。"

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决定并发表声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中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表示共产国际与反对日寇侵略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华民族是团结一致的。主席团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的党籍。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

一、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

二、开展反对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的强盗进攻的广泛抗议运动，召集群众大会、游行示威等等。

三、组织并扩大对日本侵略者的群众制裁（抵制日货运动，工人拒卸日货，抵制运往日本的军用材料及其他各种物资至日本等）。

四、加强募捐帮助中国，派遣医药救护队来华。

五、帮助日本劳动群众在困难中加紧开展反法西斯反战争的工作。

六、在中国政府同意下，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

9月14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其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共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党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王明作了长篇发言，坚持投降主义。最后，毛泽东作了会议总结，对右倾投降主义作了批判。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步调。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另组中原局和南方局。会后，党中央决定刘少奇领导中原地

区的工作。

1939年

3月 斯大林针对英法想挑动德苏冲突以把“祸水东引”的形势，在联共（布）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之一，是“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①曼努伊尔斯基在会上作了《国际形势与反法西斯运动》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品质俱优的人物。

6月13日 苏联又向中国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

6月一7月 陈潭秋自莫斯科回国，受党中央委托在新疆工作。

8月23日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9月1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阐明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政治意义，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弟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

同日 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

9月3日 英、法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发。

9月10日 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都不能赞助这个战争。

9月1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将国际指示转达王明、博古等，并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方针，指出我党过去所采取的方针与国际指示是一致的。

11月 周恩来到莫斯科治臂伤，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李德随同回苏。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都在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情况十分严重，毛泽东同志领导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决定粉碎敌人的阴谋。共产国际领导同志担心中国共产党离工人阶级太远了，周恩来说我们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锻炼，有毛泽东同志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一些同志听后不以为然。

11月7日 共产国际在《为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民众“拥护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

12月20日 毛泽东为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寿辰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12月21日 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应“向四万万五千万人讲清楚，使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②

本年 苏联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离任回国。

---

①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② 《新中华报》，1939年12月30日第4版。

1940年

2月下旬　周恩来、任弼时自苏联回国，途经乌鲁木齐于3月26日到达延安。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周恩来向中国的抗日战士问好。季米特洛夫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①

5月　国民党政府任命邵力子为驻苏大使，任刘泽荣为参赞。邵力子于6月7日到达莫斯科。

9月29日　蒋介石接受邵力子建议，向斯大林发电征询他对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表示希望中苏两国能采取共同的外交方针。

10月16日　斯大林复电蒋介石："依余意见，中国主要任务在于保持及加强中国人民的军队，……只须中国人民的军队坚固强壮，则中国必可克服任何困难。"②

10月22日　蒋介石复信斯大林，谓"尊论精确周详，……日本无论如何，必为中苏两国共同之敌人。"③

12月　斯大林派崔可夫来华担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随同来华的有十五名军事顾问，于12月底到达重庆。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一百五十架战斗机、一百架快速轰炸机，将近三百门炮、五百辆汽车的援助。

崔可夫来华前，斯大林亲自和他谈了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弱。由于苏联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崔可夫的任务，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苏联才能在一旦遭受德国侵略者进攻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1941年

1月　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报纸坚决谴责国民党政府制造的这起事件。

1月25日　苏驻华大使潘友新拜会蒋介石，大使提请他注意，进攻新四军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力，这样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意味灭亡。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明：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

但是崔可夫和潘友新为避免苏联和国民党关系恶化而对日本侵略者有利，在交涉时都没有公开宣布支持共产党。

4月13日　苏外长莫洛托夫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4月16日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指出"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苏联东面的和平"，使"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它的发言权"，指出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只要中国政府的方针是坚持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苏联是会继续援助的。苏日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④

---

① 马细谱：《季米特洛夫与中国革命》，载《人民日报》1981年7月5日。

②③ 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载中国人民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86—188页。

④ 《新中华报》1941年4月18日。

6月22日 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大规模进犯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立即领导全国军民抗敌，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6月23日 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一、坚持抗日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此援助苏联；二、坚决反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活动；三、同英美及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①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指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完全和我们的抗日战争属于同一性质，都是保卫独立、保卫自由、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而德国法西斯，则与日本法西斯进攻中国完全相同，乃是侵略的、奴役的、非正义的。因此我们与苏联是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宣言提出了"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美、英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等十大任务。

7月1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央1941年7月政治情报》中指出：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与苏联为保卫祖国的反德战争，是目前世界政治转变的枢纽。7月13日订立的苏英协定更将是整个国际联合的枢纽和反法西斯胜利的保障，今后世界政治将环绕这一协定而支配着一个历史时期。日本在作进攻苏联的准备，我们的任务是尽力拖住日本，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则是配合苏联作战，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天国际形势的主要变化，特别是苏英协定的签订和苏美的接近，都在推动中苏关系的进步与国共关系的好转。我们的任务是在于促进这种进步与好转。

9月底—10月初 在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的建议下，八路军和国民党军联合作战，击退了日军渡过黄河意欲控制陇海路及郑州、洛阳的进攻。

10月26日—31日 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朝鲜、越南和中国国内各民族代表出席大会。由朱德作总报告，号召各民族反对日寇，助苏抗战。毛泽东向大会作了讲话，号召各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大会决定组成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延安。同盟宗旨为：团结东方各民族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战线，为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

12月8日 日本法西斯向英美太平洋基地珍珠港等地发动突袭，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②宣布中国应与英美及其他抗日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

---

① 毛泽东：《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4页。

② 《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0日。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应当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又是民众的联盟。

1942年

2月1日 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6月8日，中宣部作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是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也是打破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2月下旬 崔可夫回苏。

5月11日 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①来到延安，同来者尚有医生奥尔洛夫和无线电报务员里马尔。12日，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等领导人接见了他们。中国同志给弗拉基米洛夫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孙平。

[illegible]夏 希特勒集中大量兵力，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进行顽强抵抗。10月9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已突破包围线。

10月12日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中指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他预言：斯大林格勒一役，是希特勒“灭亡的决定点”。②

11月19日 苏军在斯大林指挥下从防御转入反攻。

1943年

2月 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结束。

5月 这时，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事顾问和教官有：军委会代总顾问库巴列维奇、通信兵顾问洛道巴巴、炮兵顾问日列兹内、兵工署防毒处顾问洛巴新等七十七人。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提议书，送共产国际各支部讨论批准。提议书说：各国情况和国际形势已变得更其复杂，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建议：解除国际各支部对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号召参加共产国际的成员“集中他们的力量于全力支持并积极参加反希特勒同盟各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战争，以便最迅速地摧毁劳动人民的死敌法西斯主义及其同盟者和附庸。”

5月2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完全

---

① 彼得·巴甫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1905—1958），早年在沃龙涅什农具厂当装配学徒工，后来在齐霍列茨克机车修理厂当装配工。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1年应征入伍。复员后进莫斯科纳里曼诺夫东方研究院学习。1938年5月至1940年中，弗拉基米洛夫是塔斯社驻华记者。1941年4月—8月再度被塔斯社派往中国。1942年5月，任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11月回国后，在苏联外交部任职。1948年至1951年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1952年被任命为苏联驻缅甸大使。1958年9月10日，在莫斯科病逝。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85—889页。

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①

同日 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及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共产国际在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极其巨大的功劳，毛泽东特别指出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中有很大的功劳。

毛泽东指出，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因为，第一，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过去更为复杂，变化亦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又迅速变化的情况。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集团与反法西斯集团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组织已不适宜。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

报告强调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5月28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6月8日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解散问题。

6月9日 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表通告说：鉴于三十一个支部和组织都已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主席团宣布自1943年6月10日起，共产国际执委会、执委主席团和秘书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宣告解散。主席团委托由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皮克、埃尔科利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处理善后事宜。

（选自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第36—38页。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17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编
页数=606
SS号=10273519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前言
目录
目　　录

巾共中央关于克服投降危险克服抗战困难的声明（1941年2月）
中共中央关于日军进攻河南与我党对时局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2日）
关于目前我之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2日）&毛泽东　朱德　王稼祥
中共中央关于八路军停止给蒋介石一切呈报的决定（1941年2月2日）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通报第二号（1941年2月3日）
毛泽东关于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2月7日）
中央书记处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殉国烈士大会内容的通知（1941年2月8日）
毛泽东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1941年2月14日）
中共中央同意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讨论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14日）
关于执行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政策的指示（1941年2月17日）&毛泽东　朱德王稼祥叶剑英
毛泽东询问周恩来、董必武是否已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等问题（1941年2月20日）
周恩来关于提出十二条和张冲交涉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2月20日）
巾共中央关于谈判解决时局之十二条件应告张冲各点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23日）
中共中央代拟叶剑英致张冲信（1941年2月23日）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2月25日）
周恩来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41年2月26日）
巾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26日）
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各小党派提议组织各党派委员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2月27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各党派委员会的态度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28日）
巾共中央关于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28日）
中央军委对皖南事变后的四点战略指示（1941年2月28日）
总政治部关于我军对皖南事变的态度的指示（1941年2月30日）
中央军委对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战略地区的指示（1941年3月1日）
周恩来关于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日）
周恩来关于各小党派被蒋介石拉拢后的表现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日）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日）
中共中央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给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指示（1941年3月1日）
周恩来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1941年3月2日）
毛泽东关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各根据地对国民参政会应取置之不理态度的通知（1941年3月12日）
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3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3月15日）
周恩来关于拟用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向毛泽东的建议（1941年3月15日）
毛泽东关于同意由周恩来处写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致周恩来（1941年3月15日）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命令（1940年12月25日）
中央关于建军问题的决定（1941年）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1941年4月23日）
胡服在皖南事变问题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5月）
陈毅在皖南事变问题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5月17日）
胡服在干部会议上的总结（1941年5月）

党内对时局错误意见之来源（1941年6月12日）&刘少奇
刘少奇在军分会会议上的发言（1941年6月）
军委总政对新四军四师军政工作的指示（1941年7月3日）
一致努力长期坚持江南抗战（1941年7月5日）&刘少奇
论建军工作（1941年7月10日）&陈毅
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1941年2月）
对苏中今后工作方针问题的指示（1941年3月17日）&陈毅　刘少奇　饶漱石　赖传珠
中央军委对反共军与友军政策及工作的指示（1941年4月）
中央关于准备应付反共高潮（1941年4月17日）
彭德怀对冀热边支持长期战争的指示（1941年5月8日）
中央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1941年5月9日）
中央军委关于粉碎敌之蚕食政策及发展地方武装的指示（1941年5月9日）
中央军委关于青纱帐起整休部队的指示（1941年5月12日）
中央关于老苏区老游击区的指示（1941年6月7日）
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1941年6月12日）
冀南形势与坚持平原根据地的方针（1941年6月12日）&彭德怀
毛泽东关于对蒋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
对蒋、何斗争与联合的方针（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
中央军委指示一一五师建军小册子结论有错误（1941年7月）
中央书记处对大青山工作的意见（1941年8月9日）
中央对晋西南工作方针指示（1941年8月24日）
新军党委关于新军党政组织及工作变更的决定（1941年9月20日）
配合湘洛作战的方针（1941年10月9日）
周恩来对南委工作的意见（1941年10月27日）
华中局对反清乡斗争指示（1941年8月24日）
论扫荡与反扫荡（1941年9月）&陈毅
华中局对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指示（1941年10月7日）
五年来敌扫荡华北的情况（1941年12月）
战争指导问题（1941年）&左权
对国际形势的估计（1941年12月12日）&毛泽东
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1年12月17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应取的政策指示（1941年12月20日）
我党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1942年1月8日）&毛泽东
〔附〕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施行要点（1941年9月6日）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1942年12月21日
）
日汪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1943年1月9日）
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1944年9月5日）
打通粤汉铁路南部作战计划概要（1944年11月）
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1942年6月2日）
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节录）　（1943年1月11日
）
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节录）　（1943年1月11日）
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1942年3月）&刘少奇
对山东工作意见的报告（1942年4月28 日）&胡服

北方局军分会关于对付敌人大规模清乡的指示（1942年2月25日）
北方局军分会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1942年5月4日）
中央北方局、集总野政治部关于展开全华北全面对敌政治攻势的指令（1942年7月7日）
论军事建设（1942年7月15日）&陈毅
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1942年7月）&陈毅
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1942年8月）&罗荣桓
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1942年8月）&刘伯承
关于太行区反蚕食斗争的总结报告（1942年8月28 日）&一二九师政治部
一九四二年华北形势大纲（1942年11月3日）
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1942年11月）&罗荣桓
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1942年11月）&程子华
同意陈饶之分散计划（1943年1月5日）&毛泽东
北方局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
晋察冀边区六年来的工作简报（1943年）
林平关于东江及南番、中顺两游击区及地方组织工作给南方局的报告（1943年3月）
对苏中反清乡的指示（1943年3月16日）&陈毅　饶漱石　张云逸　赖传珠
新四军首长对苏中军区反清乡准备工作的指示（1943年3月16日）
对华中工作指示（1943年6月18日）&刘少奇
我们怎样坚持了华北六年的抗战（1943年7月3日）&彭德怀
新四军在华中（1943年7月5日）&陈毅
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1943年7月7日）&刘伯承
华中局对整理自卫军和提高民兵工作的指示（1943年9月30日）
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1943年12月15日）&陈毅
东江纵队成立特电中央军委（1943年12月2日）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1943年12月2日）
关于国共关系的估计（1942年7月31日）&毛泽东
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
对顽军以斗争求团结（1942年10月25日）&中央书记处
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
周恩来林彪向张治中所提国共问题之四条件（1943年1月）
国民党在十中全会上对我党的对策（1943年1月6日）
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对四条件进一步谈判（1943年1月7日）
国民党对我之办法有三（1943年2月5日）&周恩来
国民党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案（1943年6月）
国民党的五大困难和我党今后方策（1943年6月1日）&毛泽东
蒋胡内战阴谋破产应克服困难保持国共一年和平（1943年7月13日）&毛泽东
对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1943年7月15日）&中央书记处
中央目前宣传方针——揭露蒋之本质（1943年7月21日）&毛泽东
南方局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提纲（1943年12月12日）
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1944年2月4日）&毛泽东
关于反顽清剿指示（1944年3月14日）
对鲁各派顽军工作指示（1944年3月16日）
毛泽东关于时局近况的通报（1944年7月19日）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点协议草案（1944年11月10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函电和文件（1941年10月—1943年12月）

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1941年）&任弼时
中央军委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1941年11月29日）
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942年3月）&毛泽东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
中央军委与总政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1942年6月16日）
北方局、野政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2月5日）
华中局关于今年整风学习的指示（1943年4月10日）
北方局关于整风的指示（1943年8月8日）
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2月4日）
新四军政治部对整风善后工作的指示（1945年3月）
毛泽东致何凯丰、秦邦宪、郭沫若的信（1943年——1944年）
“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
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刘少奇
抢救失足者——康生在中央直属大会的报告（1943年7月15日）
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少捉不杀的指示（1943年12月27日）
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1月24日）
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
中央关于审干反奸问题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11月26日）
对太行生产运动的指示（1943年1月15日）&彭德怀
南泥湾驻军展览生产成绩（1943年11月）
更向前一步（1944年1月25日）&李富春
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1945年4月9日）&毛泽东
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通知（1942年4月22日）
中央关于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的指示（1942年12月1日）
中央对于各军区分区精简的指示（1942年12月1日）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精兵简政的一组函电（1942年8月——1943年8月）
华中执行精兵简政指示的情况报告（1942年5月21日）&陈毅
彻底实行精兵政策（1942年8月3日）&《解放日报》社论
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8月19日）&毛铎
精兵简政的模范（1942年8月24日）&《解放日报》社论
华中局军分会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1942年9月26日）
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1944年8月18日）&林枫
华中局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1944年8月27日）&饶漱石
〔附〕抗战六年来北岳区农村经济与阶级关系的变化（1943年5月）
华中部队准备大发展（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　陈毅
中共军委关于打击阎军东侵，消灭六十一军主力的指示（1944年6月30日）
中央同意五师巩固原地区并向河南湘鄂赣发展的方针（1944年7月10日）
中共中央、军委对华南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4年7月15日）
中央对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1944年7月25日）
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1944年7月25日）
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1944年7月25日）
对华中整训部队的指示（1944年8月22日）&毛泽东　刘少奇　陈毅

同意八路军南下打击耿冯二顽牵制韩顽向四师之进攻（1944年8月29日）&毛泽东　朱德
中央、军委关于民兵工作指示（草稿）　（1944年9月26日）
华中局关于在日寇占领福州后对福建党的工作任务指示（1944年10月）
中央关于巩固中条阵地建立沁河豫北基地的指示（1944年10月14日）
军委对开辟河南根据地的指示（1944年10月14日）
中央对四师的指示（1944年10月18日）
军委关于对阎方针的指示（1944年10月20日）
东江纵队给南方局并中央的报告——对东江当局罪行的控诉（1944年10月）
华中局关于时局与华中党的任务的指示（1944年11月7日）
中央对东江行动与发展方针的指示（1944年11月14日）
东江纵队一年半（1943—1944.6）工作报告（1944年11月）
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及我军发展与扩大解放区指示（1944年12月18日）&毛泽东
对发展江南准备工作的意见（1944年12月26日）&刘少奇　陈毅
中共中央关于武工队〔作的指示（1945年1月25日）
中央关于开展南方工作指示（1945年1月28日）
大后方的一般概况（1945年春）&董必武
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1944年8月）&彭德怀
新四军抗战始末（1945年5月1 日）&陈毅
〔附〕何应钦对（国民党）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摘要）
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政治部关于坚持边沿区对敌斗争对策的指示（1945年2月20日）
中央对潮梅闽西南工作的指示（1945年3月6日）
山东分局关于伪军工作经？简报（1945年3月15日）
华中局关于目前形势与苏中斗争任务的指示（1945年3月15日）
华中局关于深入开展江南新区工作的指示（1945年3月16日）
华中局、军政治部关于伪军伪组织工作的指示（1945年3月27日）
南下支队湘鄂赣边斗争的教训总结（1945年）&王恩茂
琼崖情况报告（1945年5月7日）&林平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5年6月2日）
中央对广东区党委的指示（1945年6月16日）
中央关于对美政策（1945年6月17日）
告时局方针（1945年6月18日）&毛泽东
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1945年6月24日）&毛泽东
军委关于一年内创造五岭基地的指示（1945年7月15日）
〔附〕东纵六月初旬人员武器统计（1945年6月29日）
令启龙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1945年7月22 日）&毛泽东
中央关于开创湘粤边工作指示（1945年8月4日）
中央指示五师应付将来局面办法（1945年8月4日）
中央对广东区党委工作指示（1945年8月6日）
中央关于美军登陆前加强控制山东的指示（1945年8月6日）
日寇投降后我对伪顽之军事政策（1945年8月）
中央关于迅速进攻占领徐州济南等大小城市准备接受敌伪
投降给山东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
中央关于坚持到湘粤边创造根据地的指示（1945年8月11日）
华中局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1945年8月11日）
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1945年8月12日）

军委对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的部署（1945年8月12日）
华中局关于发动群众指示（1945年8月12日）
华中局对发展江浙步骤方法的指示（1945年8月14日）
令坚持苏浙皖并告打胜仗之道（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
中央关于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指示（1945年8月16日）
中央、军委对日前方针指示（1945年8月22日）
日寇投降后华中工作方针（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
关于与顽军作战的原则（1945年8月29日）&刘少奇
〔附〕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御前会议记录（1945年8月9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